朝阳抗战纪实

抗争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朝阳抗战纪实

朝 阳 市 史 志 办 公 室
朝阳市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阳抗战纪实/董砚国主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ISBN7-207-06395-4
(人生的结/宁珍志主编)

Ⅰ.①人… ②朝… Ⅱ.①宁…②董… Ⅲ.抗战史料-文集-中国-当代 Ⅳ.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397 号

责任编辑： 魏杰恒 吴英杰
装帧设计： 天硕

朝阳抗战纪实 董砚国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css.com **E-mail**：hljrmcbs@yeah.het
印 刷 朝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
字 数 450 千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6395-4/Ⅰ·848

定价：3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牢记悲壮历史　矢志振兴朝阳

——序《朝阳抗战纪实》

宋　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翻阅由市史志办、市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编辑出版的《朝阳抗战纪实》，追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的14年苦难岁月，在朝阳这片土地上发生的那些悲壮的故事，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那是一桩桩民族灾难深重到了极点的故事，那是一件件人民的热血沸腾到了顶点的故事。《朝阳抗战纪实》既是中华民族抗战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弘扬革命传统，对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鲜活的历史教材，更是我们以追忆历史的方式进一步激励全市人民振兴朝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豪言！

我们由于憎恶战争，而永远不会忘记过去。自从日本法西斯铁蹄踏碎中华民族悠远的平和与寂静，侵略的魔掌伸向朝阳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那一天起，英勇不屈的朝阳人民就与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谱写了一幕幕恢弘壮烈的英雄史诗。

我们深痛地缅怀在朝阳大地上涌现出的抗日志士们。在1932年1月辽西重镇锦州失守，日寇的屠刀直逼热河，朝阳继而成为热辽地区抗日第一线的危急关头，以朱霁青、王景明、孟昭炎、孟广忠、刘纯启、刘振东、王震、李海峰、蓝天林、李昆山、郑桂林、高体乾、侯封福、李天德、邓文山、郭文联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抗日义勇军高举抗日大旗，誓死保卫家园。他们毙古贺、捉石本、惩汉奸，与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展开了长期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不仅极大地

阻滞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图谋的进程，也有效地牵制了敌人，发挥了配合正面抗日战场的重要作用。

我们深情地追忆在朝阳开展敌后斗争的英雄们。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甚嚣尘上、黑手陡然伸向整个中国的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抗战全面爆发。在洛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周治国、周哲民、齐英、马骥、杨雨民等一大批优秀军政人员，受中共冀东区党分委和军分区指派，分赴热辽地区组织敌后武装斗争，由此而点燃了朝阳地区敌后浴血抗战的熊熊烈火：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游击区、成立抗日区政府，挖路障、炸桥梁、袭碉堡、逞敌顽，让日寇闻风丧胆，令铁蹄裹足不前……一腔腔抗日将士的鲜血在朝阳大地流淌，一曲曲抗日英雄的壮歌在朝阳上空回荡，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在朝阳版图上定格。

我们还将深切地怀念驰骋在全国抗日疆场上的朝阳籍的英雄们。让我们记住这些让朝阳骄傲的名字：陈镜湖、赵尚志、刘桂五、罗文、乌兰……生于建平县富山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并且作为辽宁籍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员的陈镜湖，1927年曾被选为中共“五大”代表，历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中共内蒙特委书记。1933年5月12日在去张家口张北地区点验抗日武装部队途中突遭反动民团伏击而壮烈牺牲，时年仅仅32岁；闻名中外、威震敌胆、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东北抗联“南杨北赵”的抗日名将赵尚志，1925年入党，不仅是东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也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在历经3次被捕入狱、2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的坎坷之后，仍对党的事业坚贞不渝，率领东北抗日军民转战南北、长途奔袭、鏖战不辍，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留下了声名显赫的战绩。日寇也由此对他恨之入骨，将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赵尚志割头并沉躯

松花江；被誉为"捉蒋第一人"的抗日英雄刘桂五，1902 年 4 月出生于朝阳县六家子乡八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东北军任骑兵师长。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侍卫副官处任职的刘桂五受张学良之命，在"兵谏"之中，与白凤翔、王玉攒、孙铭久等在华清池完成"捉蒋"任务，是"西安事变"中的功臣。1938 年 4 月 22 日，刘桂五率部在张北地区固阳县黄油杆子村与日军浴血奋战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36 岁。在随后西安各部为刘桂五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朱德、彭德怀等敬献挽联："贵军由西向东，我军由南向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在 14 年的抗日战争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与倭寇殊死相搏，前赴后继，以身殉国而无憾。也正如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词中所赋那样："……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显赫。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与此同时，我们也沉痛悼念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惨死的无辜亡灵。从 1933 年 7 月 16 日喀左县东赤里赤村第一起惨案开始，到 1945 年 8 月 22 日的大平房惨案，日寇在朝阳制造了大大小小几十起惨绝人寰的杀人暴行，数以万计的民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数万间房屋毁于一炬。其中，仅在北票一地就制造了 5 个埋葬中国矿工的"万人坑"。至今，北票台吉矿区"血泪山"上的那累累白骨仍以写实性的语言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前世不忘，后事之师。60 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人们在和平的天空下自由地生活。但我们绝不能忘记那段苦难的岁月，绝不能忘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英雄们。我们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哲理，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只有对我党'昨天'和'前天'的斗争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繁重的工作，勇敢地担当起'明天'的历史重任"。时刻保持明史知耻、

明史知理、明史知责的高度忧患意识。而更为重要的，我们要将这种忧患意识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作为革命老区的现代建设者，要大力传扬抗战精神，时刻将捍卫五星红旗、维护国家统一作为我们的诤诤誓言，时刻将为党、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作用于朝阳振兴和发展的实践，时刻在变化着的世界形势中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使加快发展成为朝阳全市上下的主旋律和最强音，进一步加快朝阳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步伐，努力在发展中迅速壮大我们的实力，坚定不移地用实力去说话，用实力去彰显中华民族的不屈尊严！

2005 年 7 月

目　录

热土沦陷篇

义勇救亡篇

敌后抗战篇

血海深仇篇

热土沦陷篇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占朝阳综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极力扩张,1932年3月1日建立了伪满洲国,进而不断强化反动统治,清剿抗日力量,在南满、北满治安基本趋于稳定时,便把矛头指向热河。这是日军"恢复全满治安,巩固和确定该国基础的既定目标。"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1933年3月侵占了全热河。朝阳地处热河东部,是热河的东大门,是日军侵占热河的必经之地与重要地区,当年朝阳敌我斗争极为激烈复杂。

一、入侵前日军在朝阳的活动

日军侵占热河蓄谋已久,特别是当时担任热河边境外警备的第八师团,一直千方百计地进行着各种侵占热河的准备工作。

从1932年3月开始,日军飞机即不断在朝阳、开鲁、凌南(今建昌县,下同)、凌源、宁城、赤峰等地上空侦察,散发传单,制造舆论,诬蔑我抗日武装,并投掷炸弹,恐吓群众。

1932年3月21日,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第三装甲列车",从锦县车站出发,沿锦州至北票铁路向前做试探性挑衅运行,下午4时行至南岭车站遭抗日义勇军的袭击,当晚返回锦县车站。

1932年4月4日午时,日军一架飞机来朝阳城上空散发传单,内载日军司令部通告,通告说,通车(锦州至北票间列车)专为"农工商方便,并不是军事行动意思。凡热河境内军队和一切民众诸君好好保护铁路,为公为私合心共济"。5日午时,日军铁甲车2辆、

客车 1 列由锦州开往北票，随车日军及旅客共 60 余人，日军未下站，并声称以后每日通车，而铁甲车不再随来随往。此后，锦州至北票间的民运列车开始不定期运行。4 月 11 日，热河步兵第一O七旅二一四团三营由凌南调朝阳寺驻防(朝阳寺两个连，南岭、扣北营子驻一个连)。

5 月，日军又武装占领了朝阳寺，三营退守南岭。

6 月 21 日，日军一部从锦西侵入朝阳县境内，行至二车户沟、龙潭沟交界，遭到了王震与赵清泉领导的义勇军和当地民团的截击，伊藤等 23 名日军被打死，余者逃窜。当跑到曹杖子后山时又被王文福(王老凿)民众武装击毙 2 人，剩下 6 人逃回锦西。23 日，日军派出一支部队直奔二车户沟企图报复，并有飞机助战，抗日军民与之激战一天，日军无奈退回。

锦州北票间列车运行后，日军借此进行侦察活动。五六月间日军少尉石本权四郎两次潜入北票城。7 月 17 日，石本再次来北票，乘车返回至朝阳寺以西、南岭以东破庙子处，在列车上被义勇军李海峰部抓获。日军闻讯乘铁甲车由朝阳寺驶来，与驻军发生枪战，三营退至扣北营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石本事件”。7 月 18 日，日军飞机突临朝阳城上空绕城半小时飞去。下午 1 时复来 5 架飞机扫射，投掷炸弹 40 多枚，炸死 11 人，伤 21 人，炸死马 21 匹，毁房 10 余处。

8 月 19 日下午 4 时，驻锦日军吉岗参谋通知南岭驻军三营十二连有事联络，即驾铁甲车到南岭一带。十二连连长张澄拒绝日军武装入境，日军竟置若罔闻，铁甲车五辆向南岭逼进。十二连即在山腰布防，王绍曾副官在铁道上掷红旗要求其停车，铁甲车停车后，王副官上前交涉质问日军来势这样猛为何?日军竟反问山上部队是否有意挑衅，王副官回答主要是为了防匪，别无他意。正说着铁甲车就向他冲来，王见势不妙，急忙躲闪。同时日军枪炮齐发，十二连立即进行还击，并破坏了铁路，激战数小时，铁甲车掉轨 2 辆。

日军停战相持一昼夜后退回朝阳寺原地点。

此后，日军企图通过多种办法想要回石本权四郎，均未得逞。10月7日拂晓，日军500余人分三路包围了义勇军李海峰部所在地三宝营子村，动用了飞机枪炮。李海峰率部押解石本权四郎撤退到巴图营子。日军进村，焚烧抢掠，居民死伤百人，烧毁房屋百余间。

1933年1月，日军侵略热河活动越来越嚣张。1月16日上午，日军300余人带迫击炮2门，并有飞机1架，自明水塘门至张飞沟。经姚家沟时，地方自卫军连长刘继周带民众前去防堵，日军首先开枪，双方互攻4小时，日军撤回绥境，日军被打死3人，伤1人。17日，1000余名日军并有飞机4架、坦克3辆，至梨树沟门盘踞。

1月29日，日军50余人侵入北票下府镇，烧毁部分文书帐目，并给贫户白面5袋、煤油2桶、日旗4面，下午离去。

2月7日，日军40余人潜入凌南边境侦察。9日，日机一架入凌南上空侦察。

二、东北军的备战与朝阳驻军

日军入侵热河的挑衅行动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许多爱国人士和民众纷纷拿起武器，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备战抗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大势所迫及各方面的压力，才做出备战姿态，采取一些措施，制定作战计划。以正规军为主、义勇军为辅同守热河。以鲁北、开鲁、阜新、朝阳寺为前进警戒阵地线，以开鲁、朝阳寺为主要警戒据点；以乌丹城、赤峰、建平、朝阳为主阵地线，极力构成纵深阵地带。

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视察热河，同汤玉麟研究防务计

划，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万福麟为第四军团长，指挥丁喜春的独立八旅、缪澂流的独立十六旅、孙德荃的独立十九旅、王永盛的独立二十九旅、于兆麟的独立三十旅。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为第五军团长，指挥孙殿英的四十一军、义勇军冯占海部、热军三十六师两个旅和张廷枢的十二旅，担任热河守备。这两个集团军共约10万余人。作战地域线是以朝阳、凌南、凌源、平泉至承德公路为分界线。公路以南为第一集团军作战地，公路以北属第二集团军作战地。

此时，第四军团部和王永盛二十九旅驻平泉县(八沟)，其六八四团(团长刘纯积)驻三十家子。三十旅驻凌源城和叶柏寿，并在叶柏寿、朱碌科构筑工事。四十一军控制围场、赤峰间。陆军第一O七旅(董福亭部)由凌源进至朝阳、朝阳寺间。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赵国增部驻建平，另有义勇军李纯华、唐聚五部在朝阳朱碌科一带协助。

三、日军的进攻计划

1933年1月28日，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武藤大将对进攻热河发出训示："周密准备，严禁轻举妄动，一旦令下，坚决完成任务"。同时下达了有关作战准备的命令，调整了部分部队的防务，特别充实了第八、十、十四师团的兵力。2月9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攻占热河计划。10日，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参谋会，公布了这一计划。17日正式发出命令，令第六师团从打通铁路出发，经开鲁、绥东、阜新向天山、下洼、朝阳前进，尔后向林西、赤峰、多伦发起进攻。同时，以较强一部从朝阳寺附近出发，由北票铁路方面经朝阳、建平向赤峰方向作战，并负责掩护北票至朝阳铺设轻便铁路施工和北票至赤峰的兵站线。令第八师团以一部迅速占领北票，掩护北

票铁路修整，并指挥该方面的第六师团部队，另以一部严守山海关及九门口一带掩护主力侧背安全，以其余主力成二路纵队，分别从北票附近及绥中西北热河省境附近出发，尽快向建昌附近及其以南一线推进，并不失时机以一部确保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等长城重要关口，掩护主力侧翼。尔后以主力占承德及古北口，扫荡全热河。令在锦州、北票、朝阳、建平、赤峰公路及朝阳、大平房、凌源、平泉公路设置两条兵站线。

负责朝阳方向主要作战任务的第八师团，2 月 13 日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16 日在锦州师团司令部向各团队长及有关部队做了传达。即师团以步兵第四旅团长铃木少将指挥的部队为先遣队，在占领北票、朝阳的同时，把主力向朝阳、锦州及绥中附近集结，准备尔后的行动。以步兵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的部队为挺进队，沿朝阳、凌源、平泉、承德公路快速推进，迅速占领承德。混成第十四旅团长服部少将指挥的部队向绥中、凌源、平泉公路方向作战。第八师团主力接续挺进队前进确保古北口、马兰关、罗文峪、喜峰口、冷口及界岭口等长城各关口，尔后协助第六师团扫荡热河，步兵大佐秋川指挥的辽西警备队在以上作战期间确保山海关、九门口附近安全，掩护师团主力侧背安全，同时确保饶阳河以西师团原警备地区内的治安和交通线。

四、日军入侵朝阳的经过

日军根据拟定的作战计划积极进行部署。2 月 18 日，日伪发表了讨热声明。当天第八师团下达命令，令先遣队于 22 日傍晚开始行动。19 日午后 2 时师团长接到报告，发现南岭隧道方向有轰炸声。日军察觉到行动已被发觉，怕铁路被破坏，经请示关东军司令部，提前在 20 日晚开始了行动。

2月21日，第八师团先遣队中的早川支队乘火车由锦州至朝阳寺。22日在飞机、铁甲车的配合下，向南岭发动数次进攻，遭到守军董福亭旅和义勇军耿继周部的抵抗。23日，二一三团团长邵本良被日本人收买，在前线投敌，遂使北票、南岭两地失守，一O七旅主力退至朝阳、大平房一线。早川支队占领北票，铁道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的装甲列车也进入该地。

日军先遣队尾随早川支队向朝阳前进，途中合并了早川支队，于24日傍晚会同步兵第十六旅团主力一齐到达朝阳以东及以北地区。当夜朝阳城内守军大部分撤走，董旅又有一个营叛变，引敌深入。25日拂晓，日军进攻朝阳，未遭遇抵抗，中午进占朝阳城。第八师团主力也随到朝阳集结。因铁路运输后方补充出现问题，师团长把主力从朝阳出发日期推迟到3月1日。27日第八师团长西义一郎中将从锦州赶到朝阳，第二天又做了新的前进部署，令挺进队突破后，尽快向平泉前进，北路派一支队由建平直攻赤峰与第六师团配合行动。令骑兵队沿大凌河地区协助挺进队在水泉、叶柏寿附近战斗，尔后继续向凌源一带前进。3月1日挺进队、骑兵队和师团主力开始前进，当天占领喀左。师团主力到达叶柏寿时遭到三十旅的抵抗，日军约5000人，飞机9架、铁甲车30辆，陆空联合向三十旅阵地发起攻击，激战六、七小时，日军攻击不下，主力绕道去凌源。三十旅经战斗损失很大，军团又将二十九旅六八四团调来增援，3月9日到达后，同三十旅一起坚守到13日，这时三十旅后撤，六八四团突围后撤到了八里罕、甸子一带。与此同时，李纯华部也积极配合二十九旅、三十旅的作战。

进攻凌源的日军先遣队于3月2日到达凌源东侧阵地，与绥中方向前进的混成十四旅团米山先遣队会合，一起攻击。这时东北军独立八旅、独立十六旅、独立十九旅驻防凌源，但无抗日决心，纷纷后退。2日上午凌源失守，日军主力继续向平泉攻击。东北军撤走后，义勇军郭景珊部在牛河梁与日军混战一夜，击毙日伪军100

余名，在日军飞机、铁甲车的配合进攻下，义勇军才不得不退出战斗。

在绥中方向进攻的日军混成十四旅团，2月27日在白石嘴边门集结，当日占凌南，28日攻击沙帽山后向凌源乘车前进，先后在庙岭、哈巴气遭到了抗日武装的阻击，3月2日到达凌源外围，协同第八师团挺进队攻占了凌源，又向冷口方向前进，进而全面攻陷热河。

朝阳、北票沦陷

1931年,北票属朝阳县管辖,是热河东面重要门户,是热河唯一铁路线的终点站,是热河通向辽西进入华北的交通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北票乃成中日角逐的重心之一。

从地理位置上看,北票东南部有松岭山脉所绵亘,而且从锦州至北票山地重重递叠,锦朝(北票)铁路横断其间,穿越山路长达七、八十里。山地脊梁为南岭山地,山下有近3华里长隧道,火车站建于此处,俗称南岭站。岭东南距朝阳寺20华里、义县城60华里、北票城50华里,是锦朝铁路位于松岭山脉的咽喉。如果自辽西平原遥望松岭山脉似乌云一道,拂绕天际攀越而上至南岭之巅,由此扼守,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而且山沟崎岖凹凸不平,有"十里一洞,五里一桥"之说,火车不能并行,其它运输工具,西进更为困难,所以日军多次进犯均未得逞。

日军进攻热河之方略,首先从掌握锦朝铁路入手。同时,掌握锦朝铁路便于控制北票。北票是热河省最大的煤矿,每年产量50万吨。战前从营口出口,畅销外地,销路以上海及京沪、沪杭两线为最重要。北票煤质绝佳,在经济实业上和军事上都有特殊意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21日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寇的宣言。翌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派许多共产党员深入各地,发动组织抗日。黄显声将军组织热辽各地爱国军民顺乎历史潮流,于12月末组织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指挥部设在北票。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日寇基于侵占热河的需要,嘉村旅团于7日,又急于进犯到义县,以义县城作为西进的桥头

堡,从此构成对热河东部防线北票的威胁,并逐步逼近,做试探性的进攻。3 月 21 日,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第三装甲列车"从锦县车站出发,越过义县车站向北票方向做试探性的运行。由于运行途中不断受到义勇军阻击,至下午 2 时才开到南岭。晚上,探得中国军事虚实之后又返回锦县车站。这是日寇第一次进入我北票境内。3 月 24 日,日军派飞机 1 架侵入北票上空进行侦察。4 月 4 日,又有飞机 1 架飞入北票地区大量散发传单,强硬要求通车。在传单上用中文写道:"通车为商起见,绝无他意,宜当保护,于 4 月 5 日一定通行。"果然,5 日午时,有日军铁甲车两列、客车一列由锦州开往北票,随车共来日军及"旅客"60 余人,强行通过南岭防线直达终点站北票。从此,每日既行通车。7 月 3 日,日军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侵略热河的大本营锦州,与日军师团长和旅团长会商了热河战事问题,决定加速侵略热河行动。恰在这时发生了李海峰义勇军抓获日本间谍石本权四郎的事件。石本权四郎是日本关东军的"嘱托"(即联络员)。石本权四郎带着关东军的特殊使命意在找汤玉麟直接接触,在返回途中,于 7 月 17 日经北票南岭时被义军李海峰部捕获,这就是震撼中外的"石本事件",也称"朝阳寺事件"。石本被捕后的第二天,从大凌河车站开出一列火车,以关东军吉岗参谋为特使带领日军武装直达朝阳寺,企图寻找李海峰谈判。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十分恼火,立即派部队进行武装报复。7 月 18 日,驻义县日军 300 余人悍然出动进攻朝阳寺,汤军董旅官兵退守到南岭车站,日军尾追至南岭,并派 4 架飞机狂轰滥炸。8 月 20 日,日军又派飞机对南岭、扣北营子、北票地区进行侦察、散发传单、投掷炸弹,似乎有大举进攻之势。8 月 22 日,日军派 4 架飞机轰炸扣北营子和三宝营子,并散发传单相威胁。同时又采取软的手段,日军委托朝阳寺当家喇嘛马洪志找李海峰调解,企图说服李海峰放出石本,但遭到李海峰拒绝。日军对此仍不死心,后又派刚投降日寇的汉奸毕占一去找李海峰,利用他们的旧关系劝

降李海峰，并要他放出石本。李海峰对毕占一这种卖国行径严加痛斥，日本关东军对此十分恼怒，于10月7日拂晓调动日军500余人，驰抵三宝营子村，三面包围李海峰的义勇军，日军空中用飞机投掷重磅炸弹轰炸，下有大炮机枪进行攻击，义勇军抵抗不支撤出阵地。日军攻入村内大肆抢掠烧杀，居民苦遭日军残害。据当时调查报告云："当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一百余间，焚烧柴草粮食、财物等项价值难以数计，其三宝营子遭祸至烈，而四周距离村民悉已逃避不归……"。日军采用武力袭击办法没有夺回石本，又动用重金收买。12月3日，日军驻义县宪兵队长矢加部宗太郎派王洪宾带亲笔信去找李海峰，信中"许以赎价日币57万元"换回石本，并以"不放回石本即攻热"为要挟恫吓李海峰。李海峰对此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将石本权四郎枪决在朝阳十家子河套。李海峰的爱国正义行动哗然长城内外，各地爱国军民坚决支持，而日军却大动肝火，将"朝阳寺事件"作为向热河进攻的借口。



日军飞机在大凌河上空盘旋

日军进攻热河蓄谋已久，在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又从多方面对汤玉麟进行诱降活动。他们利用张景惠和张海鹏的老关系，多次派人到热河劝降，还派与汤玉麟早就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化装成商人，经北票去找关系对汤玉麟进行诱降。11月中旬，日军又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玉麟派出公安处的处长张舜卿

前往参加，日方代表有武部阶堂，另加关东军参谋长的代表和锦州日本驻军代表各一人。在会上日方代表向张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说汤玉麟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负责人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

第二、为了满热一体关系，要汤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长修建到承德；

第三、为加强联系，要汤同意允许日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

当时这三条，由汤的公安处的处长张舜卿电告汤玉麟和张学良。张学良在北平复电北票，令张舜卿断然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

张学良主张断然拒绝日军无理要求，反映了进步团体和爱国军民的意愿。

诱降失败，日军恼羞成怒，立即实施其侵热计划。侵热急先锋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长铃木美通少将扬言："进击热河不仅是日、汤之间的重大问题，也是引起国际联盟以至于世界所注目的重大问题"。所以到1933年1月为进攻热河，突破北票防线，开始调兵遣将。调遣的日军有第六、七、八、十二共4个师团，纠集伪军共10万人，以铃木、川原、米山部队为前锋，准备三路进攻。北路由通辽侵犯开鲁，中路由义县进攻北票、朝阳，南路由绥中进取凌南。中路以第八师团为主力，由师团长西义一郎中将指挥，该部所辖第四和第十六两个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和川原侃。日军在进攻之前大造舆论，欺骗威吓群众。第八师团三十一联队十一中队大尉加滕美次郎，连日在朝阳寺附近各村演讲，并利用纸烟、伪币、毛巾等各种"洋货"诱骗民众，强迫各村民众进行登记，不许民众外出或迁移，如果执拗不肯则进行屠杀。同时还派飞机在南岭、朝阳寺、三宝营子等地上空散发传单，让当地民众揭发义勇军。传单上说："若出首举发他们的住处，必有重赏；若能捉到其头目者赏当益重。"最后署名："大日本帝国司令官"。各地日军还强迫各村居民悬挂日本国旗，否则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日军还在各村组织警备队，如当

时记载:"在三宝营子一带组织所谓警备队,令每屯有屯长1人。数屯为1村,每村有村长1人。4个村组织1个警备队,指令队长1人,负责招募队员,在三宝营建一警备队,队长梁凤阁。并有顾问和办事员。此计划推广各村照办"。1933年1月上旬,日军开始在通向北票铁路线上的许家屯、上齐台、七里河驻扎日军,修筑工事,对铁路加强警戒,保护军用物资运输。特别在义县日军数量增加,日军对城门把守甚严,城墙上岗哨持枪鹤立,车站工事如临战事,整个处于战备状态。在南岭附近集结日军500余名,附野炮兵一营同董福亭旅相持。1月29日,日军茂木骑兵旅集中南岭一带,并从各地征集马车80余辆,由日军看押集中到朝阳寺,为进犯北票、朝阳备用。2月初,日军强制锦铁工人百余名到周家屯以西路段,赶修被义勇军拆毁的铁路。2月中旬第八师团步兵700余人,飞机12架、汽车200辆、坦克车8辆、装甲车15辆、铁甲车2列,弹药给养等都陆续运往前沿待命,随时准备战斗。在战事部署就绪后,日军策动伪满洲国于2月18日发表讨热"声明",委任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为讨热总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指挥。讨热声明发表后,关东军准备在2月22日发起进攻,但机密泄露,被迫采取予备行动,由铃木旅团和川原旅团的早川部队、田中部队为先锋,于2月21日发起对热总攻击。首先在南岭一线。清晨,1000余名日军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热河战争,首先占领北票,图为1933年2月21日,日寇窜入北票时的情景。

用大炮掩护，坦克车开路，骑兵冲杀，同时敌机 3 架，投弹 30 余枚，攻破董旅防线，至 11 时，日军控制了扣北营子车站，逼进北票。与此同时，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又在大凌河两岸进攻牤牛营子。由于汤玉麟部队腐败不抵抗，早已望风而逃，李海峰义勇军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向南撤退。日军长驱直入，汤军董旅溃不成军，形成败局。据当时报刊揭露说：热军已欠饷一年以上，军心涣散。汤玉麟得军款近四、五十万，尽已装入私囊，士卒毫无分润，怨气极大，装备甚劣，后又无接济。还揭露说：汤玉麟主宰热河 7 年，平日横征暴敛，热河税捐名称多至 20 余种，民众负担不起，每年弃房产土地而外逃者甚多。同时还揭露说：去冬兴业银行之纸币，每百元仅值现洋两元一角，昔有收入百元者，今以纸币跌价之故，只值现洋两元一角之收入矣。兴业银行之金融政策现如此，皆因汤之次子汤佐辅任财政厅长从中作梗所致。利用其附属之企业操纵纸币价格，籍图从中取利。长子汤佐荣任禁烟善后局总办，实为贩卖烟土、“白面”总机关，残害军民，牟利肥己，如此热河财政由汤两子掌握，实行一切措施全依汤家利益而依归，必然导致热河民穷财尽之境地。由此可见，军阀汤玉麟腐败到极点，只想巧取钱财，不想抗战，所以遇到敌人进攻，便挚妾载金逃之。唯独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抵抗，但又力量单薄，在日军飞机、坦克、装甲车和骑兵的凶猛冲击下，抵挡不住，所以北票在 2 月 22 日



在朝阳城郊的日本炮兵

9 时被日本军早川部队占领。日军占领北票后的 2 月 24 日向朝阳县城进攻，当夜朝阳城守军大部分撤走，同时董福亭旅又有一个营叛变，引敌深入。这样，日军在未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于 2 月 25 日中午占领朝阳城。至此朝阳城沦为日寇之手，并长达 13 年之久。

在东北军顽强抵抗中凌南(建昌)失守

日本侵略军在入侵热河的准备就续后，便迫不急待的于1933年2月17日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的名义宣布“立即向热河进攻”的命令。2月18日，伪满洲国秉承主子的意图，发表讨热“声明”，委任伪军政部总长张景惠为讨热总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指挥，大言不惭的威胁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务于24小时内撤退。日军按原计划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2月21日，中路日军第八师团先遣队早川支队开始出锦州向朝阳寺进攻；2月24日，北路日军第六师团及伪军程国瑞部由通辽向开鲁进攻；南路入侵凌南的日军，由于受到郑桂林部等义勇军在热边的坚决抵抗，才推迟了进攻日程。

凌南县位于热河、辽宁、河北三省的结合部，是热河边陲，东南部之门户，关内外的交通要冲，地势险要，山峦起伏，延绵百里，形成道道天堑险阻，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日本侵略军为进攻热河及华北，必须先取凌南，这是他们第一个侵吞目标。于是，调集了日军第八师团混成十四旅团及伪军丁强部共4.5万余重兵，携3辆担克、7辆装甲车、汽车100余辆、各型重炮多门、随军马车500余辆及12架飞机，在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长服部少将的指挥下，由该部米山部为先遣队，于1933年2月26日从绥中出发，分左、中、右三路向凌南大举进攻。东北军十九旅、八旅、十六旅爱国官兵英勇阻击，一场举世震惊的侵略与反侵略大战在凌南战场展开。

东北军十九旅即孙德荃部，于1932年11月26日就已奉命开进凌南各边防要塞戍边，把全旅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团一营即赵连

会营安排在重中之重的纱帽山防线要冲。赵连会是位爱国军官，并有实战指挥能力。他初到杨树湾子就着手排兵布阵，河东小北沟、蔡杖子一连即岳连；河西、胡家岭、半拉山二连即杨连；三连在朱杖子、石洞子；炮连长姓傅，驻在二道河子后到石洞子；工兵连驻在杨家店、罗锅沟；四连连长王德胜，驻赵家店、康杖子；团部驻黑山科，营部设在黑山科的小南沟，后又迁到石洞子。阵地设在三合屯东山、纱帽山前怀、纱帽山岭、马鞍山四道沟大顶。发动群众在这些山上挖战壕，修掩体。在毛头河床上挖防坦克壕，放置巨石、粗木等路障；并每日都在加紧练兵。每当听到日军进攻消息，赵都亲上前沿，对战士进行护国守土、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的教育。

1933 年 2 月 26 日，日军第八师团混成十四旅团以米山部 1000 余人为先遣队，从绥中等地出发，携飞机 9 架、坦克 3 辆、装甲车 7 辆、摩托车 20 辆、汽车 100 余辆、重炮 24 门、马车 300 辆，沿绥凌大道气势汹汹地开向凌南第一道防线纱帽山阵地，当天赶到兴城县三道沟乡梨树沟集结。27 日拂晓日军沿六股河谷而上，经平山子、沙河哨、骆家岭、于屯，7 时许到狼洞子前石门，敌部分步兵从西、北坡抢占大石门子南山及东山，并把炮抬上大石门子东山，企图掩护主力继续沿六股河谷进入他们准备进攻纱帽山的有利村屯。

东北军十九旅赵连会营长命令参战连队起早进入指定阵地。把战地指挥所设在长砬子山，他下令说："日军已距我不足 10 里，战斗就在眼前，养军千日，用兵一时，我们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要求各连坚决把日本鬼子打回去，人在阵地在，如有弃阵逃走者，军法处之。他要求旗手把军旗换上代用旗，插到长砬子山顶，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把炮及炮弹都抬上山梁。战士们都静静地卧在工事里，严阵以待。在战前，赵营长为阻止敌军顺利前进，于早 6 时，即派骑兵去前石门子，把六股河土桥拆毁，并将已封严的冰都用手榴弹炸开。因这天早晨有些清雾，当敌军都已上满了大石门子东面山顶时，才被十九旅南山骑兵岗哨发现并鸣枪报警。敌军听到

枪声，遂改偷袭为公开，疯狂向大石门子村开枪开炮。十九旅骑兵连听到枪声，赶紧快马赶回报信，幸有云雾保护，除阵亡 1 人 1 骑外，多数安全脱险。战斗正式打响。

东山日军为了掩护主力占领预定地点，用重火力向六股河西十九旅各阵地疯狂射击，打得十九旅阵地烟尘滚滚，敌步兵趁机沿松柏子、锥子山攻入卡路营子；另一股从东山下来顺东拐子过河，抢占前营子。在敌军猛烈的炮火轰击情况下，气的赵营长给机炮连下令说："把鬼子的炮位端掉！"结果，只用 3 炮就把敌人东山上的 4 门炮全部打哑，撤到山下。此时，战场上出现短暂的宁静，东北军根据敌军进攻情况赶紧调整阵地，用军号将三合屯的一个排调到纱帽山前怀东胛子。

上午 10 时，日军各兵种一齐出动，向十九旅主阵地纱帽山大举进攻。先以 6 架飞机在十九旅阵地上空盘旋，狂轰滥炸，接着 20 余门重炮同时发射，倾刻间百余枚炮弹落在十九旅阵地，只炸得纱帽山硝烟弥漫，气浪滚滚。3 辆坦克沿毛头河道向纱帽山岭反复冲击，企图趁势过岭并侦察东北军火力。面对敌军气势汹汹的进攻，赵营长仍镇定自若，指挥全营奋勇还击。他命机炮连："要三炮打中敌担克，否则炮瘪，拿你治罪！"正当敌坦克横冲直撞地冲向阵地前山坡时，神炮手只两炮就把它轰翻了个，被炸得晕头转向败下阵去。第二辆坦克继续向上冲，又被打翻。第三辆坦克仍向岭上冲，同样被打中，使敌 3 辆坦克都失去了伊始的嚣张，不敢再次出战。

午后，日军把 10 门巨炮支在新立屯西南大道上排成一排，向阵地继续炮轰，炸得整个纱帽山被硝烟淹没，但十九旅爱国官兵们仍坚守在阵地上。赵营长仍沉着指挥机炮连，向敌军炮位还击，炸翻敌一门重炮，敌炮手当场毙命，顿时敌炮被打哑，吓得敌军将炮隐藏到新立屯村中。

炮战刚停，敌人由几十台摩托开路，后跟 100 余名日军，从正面向纱帽山岭进攻。十九旅凭借山腰天门洞的有利地形，居高临

下，待敌迫近时，集中火力向敌猛射，打退敌军两次进攻。第三次敌军进攻时，下了死令，不管十九旅怎样打，仍继续向上冲。在面对敌军就要接近十九旅阵地的紧急情况下，赵连会猛地跳起，高声下令说：“大面交、排子枪”。100 名战士一齐跳出战壕，迎着冲至面前的敌军横站两排，交替射击，顿时，打得敌军尸横遍野，落花流水，仓惶败逃。

日军正面进攻纱帽山失败后，已时至午后 3 点，这是对米山先遣队“当日突破纱帽山防线”叫嚣的沉重一击。狡诈的米山为确保其诺言的实现，便改为佯攻正面，实则攻侧面的伎俩。一路由卡路营子西沟抢占十九旅毛头河西侧阵地；另一路由前营子后山攻打十九旅纱帽山东胛子阵地。午后 3 时许，日军 200 余人从卡路营子西沟进去，企图绕攻纱梁时，突遭躲在骆石背后 12 名东北军战士的迎头痛击，仅激战 20 来分钟，就打死日军 20 余名，吓得日军连滚带爬的逃下山坡。此逃敌定神后，复从卡路营子北沟向十九旅四道沟大顶阵地偷袭，因十九旅火力较弱，阵地被日军抢占。他们又用同样方法，向马鞍山阵地进攻，日军只距十九旅阵地不足百米，阵地岌岌可危之际，王德胜连长奉调从赵家店赶到，给狂敌以猛烈还击。经一个小时激战，打死日军 30 余人，残敌调头而逃，十九旅乘势收回四道沟大顶阵地。十九旅英勇的军旗旗手们，将打倒的军旗插起，再倒再插起，一直到次日天明，十九旅军旗仍然在高高的长砬山顶骄傲地飘扬着。

同日午后 4 时许，日军 50 余人在炮火掩护下，抢占前营子后坡，沿山梁向纱帽山东胛子快速偷进，另一股从后杨树湾子的小冰沟上岭，沿阴坡向纱帽山东胛子偷进。两股日军从东、东北两个方向同时进攻十九旅东胛子二连阵地。英雄的杨连长率部早已在此严阵以待，旋即与日军展开了殊死决战。这次战斗，激战 3 个多小时，与日军拉锯 3 次，打死日军 20 余人，天黑时日军也没攻下此阵地，遂不断增兵。日军伍长玉川赤臂上阵，带 100 余日军，向十九旅

二连阵地疯狂进攻，被十九旅击毙。后因二连子弹供应不上，杨连长在带领全连向日军发起第四次反攻时又不幸阵亡。为此，赵营长命二连撤到西肿子与十九旅一连同守阵地，与相距不足千米的东肿子之日军相峙对战，彻夜未停。

东北军第八旅即丁喜春旅，原在北平西驻防，多数战士是爱国心切的青年学生，抗日热情很高，是急行军7天7夜赶来凌南换防的。因该旅装备较为先进，才令其到此接换十九旅防区。但因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多数战士都已精疲力竭，路又不熟，先头部队在陈营长带领下，于同月27日凌晨赶到纱帽山，只接防一部，但多数连队并没有及时到位。日军昼夜进攻均未得逞，遂改为东、南、北三面同时进攻策略，右路经前湾子、于家沟、小脑瓜山及小炮台山绕到纱帽山背后的大北沟，这些日军头天晚上就暗藏在小脑瓜山背后，左路经卡路营子西沟、北沟、干沟到纱帽山背后的朱杖子与胡家岭，中路在坦克、大炮的配合下从新立屯向胡家岭并由东肿子向西肿子进攻。早6点，向十九旅纱帽山阵地同时进攻。此时去胡家岭南山的八旅的连队刚刚赶到，尚在山下，还没吃早饭。十九旅赵连会营长见他们这种疲惫不堪的情景及日军已发起总攻的严峻形势，为顾全大局向八旅陈营长说："你们刚到，人困马乏的先吃饭，我们先多顶一会，把你们重炮先借我们用一下，因为我们炮小打不毁鬼子坦克。"八旅陈营长非但不表示感谢，反冷言回答说："你们能打，我们也能打，我们的炮自己会使。"赵营长听后大怒，遂命令司号兵，鸣号撤防。换防号一响，十九旅战士都迅速撤出战斗。日军听到号声也赶紧抢占山头。八旅战士听到号声，停止用饭立即向南山冲去，当疲惫的战士刚跑到山腰，早已隐藏在南山坡的日军就已抢先占领了阵地，居高临下向八旅上山的战士开枪扫射，八旅战士在光秃的山坡上无处藏身，败下山来。中路的东肿子日军向西肿子阵地进攻，被天门洞中东北军轻、重机枪密集扫射而封锁，不能前进。日军炮队发现本部进攻受阻，便集中炮火，炸塌天门洞石棚子，

摧毁其附近工事。日军随后复向西胛子阵地猛攻。八旅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随着李连长一声令下,全体战士都跳出掩体,在梁鼻上站成横排向冲上来的日军猛烈开火,把日军压到坡下,卧地不敢冲锋。敌军炮兵又向此处打炮,绕到赵家屯前山的日军也从背后向西胛子射击。霎时间,纱帽山西胛子及纱帽山岭被打得乱石横飞、天昏地暗。但八旅战士仍巍然屹立,连敌炮弹落在身边都不躲避,倒下一排又站上去一排,这样一直坚持2个多小时,前后敌军都不敢靠近一步。中路左侧向纱帽山岭进攻的日军见此岭梁上已被自己队伍占领,便大胆沿大路向此岭前进,不料遭到隐蔽在此岭南面花子洞中的八旅战士用重机枪阻住去路,数十名日军被打倒在地,虽经几次冲击都不能靠近此洞半步。岭上日军见本部正面进攻受阻,便顺洞的上部往洞内投掷手榴弹,致使洞中八旅战士都壮烈殉国。随后,日军坦克首先冲过纱帽山岭,西胛子八旅官兵被前后夹击,伤亡惨重,见日军已攻过纱帽山岭,才于上午8时最后撤出战斗。纱帽山防线被突破。

纱帽山战斗,是中日热河大战凌南战场的第一战,这一仗打死打伤日军200余名,阻止日军一昼夜之多,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震慑了侵略军的骄横气势,此战东北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120余各同胞献出了生命,他们给建昌增添了光彩,使名不见经传的古老的纱帽山披上了绚丽的历史光环,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悲歌。从此,纱帽山变成了中华卫国先烈们的永恒丰碑,成了驰名中外的英雄山。

纱帽山战斗是热东、辽西空前惨烈的一次两军大战,当时此地民众曾编歌唱道:“日军兵发纱帽山,中军讨敌上前线;铁牛上下来回翻,天空飞机扔炸弹;大炮机枪响连天,浓烟没天山不见;壮士血水流成河,鬼子尸骨堆成山;两军大战一昼夜,换防兵败真可怜;鬼子杀人不眨眼,从此黎民遭涂炭。”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激烈战斗的情景。

2 月 28 日，狡猾的日军在集中兵力进攻纱帽山的同时，即兵分 3 路向冰沟突进。一路由韩屯经旱沟、大湾沟到大侯乜山梁，遭八旅一个排及三道河子刘洪志带的联庄会 40 多人的阻击。激战两小时后，又经大南沟、小南沟、马尾沟进入大路。二路由韩屯、马道子到马道子岭，在此受到八旅一个排的阻击，激战两个小时各伤亡数十人后，又经大窝铺、烧锅杖子从阎家店入大路。三路即主力部队突破纱帽山防线后，稍事休整，沿大路经黑山科、北桥，在此与漫散的八旅一个排战士遭遇，八旅被打死 12 人。因此股日军走错路而绕经吕杖子、二杖子、弓家沟、孟杖子，到午后 3 时许，三路日军全到彭杖子会齐。

东北军八旅一团一营在纱帽山失利，团部急令先到冰沟的二营杨连前去增援，当午后 2 时走到赵家店时，日机 3 架从黑山科方向飞来，到此低空飞行盘旋，对杨连扫射轰炸。因此部隐蔽在树林子里比较集中，被炸死、炸伤 40 余人，因伤亡过重，遂退到屈杖子防守。其他几个连也相继开到冰沟，准备在此阻击，两军以赵家店为线对垒。刚到马厂沟换防的八旅二团二营炮连奉命马不停蹄地去赵家店，经东岭、喇嘛洞沟提前到赵家店前山，即在沙锅山和毛山顶设卡，严阵以待日军的进攻。

下午 3 时 30 分，日军对东北军赵家店阵地发起总攻。首先用重炮将毛山顶东北军工事摧毁，迫使东北军撤到沙锅山据守。日军复用始攻纱帽山的阵势，在 3 架飞机盘旋轰炸的同时，以 3 辆坦克开路，后边 100 余步兵一齐向沙锅山阵地进攻。

东北军八旅炮连官兵在敌军数倍于我的形势下，没有被吓倒，仍沉着应战，依靠山顶掩体及居高临下的优势给敌军以迎头痛击，神炮手们只几炮就把敌军 3 辆坦克打翻，敌军被炸得血肉横飞，抱头鼠窜。继而日军仍以重炮向东北军阵地进攻，八旅神炮手们又向日军顺山子炮兵阵地还击，将日军一尊大炮炸毁，几个炮手也应声毙命，敌炮被炸哑不得不改换阵地，此时敌机对八旅阵地进行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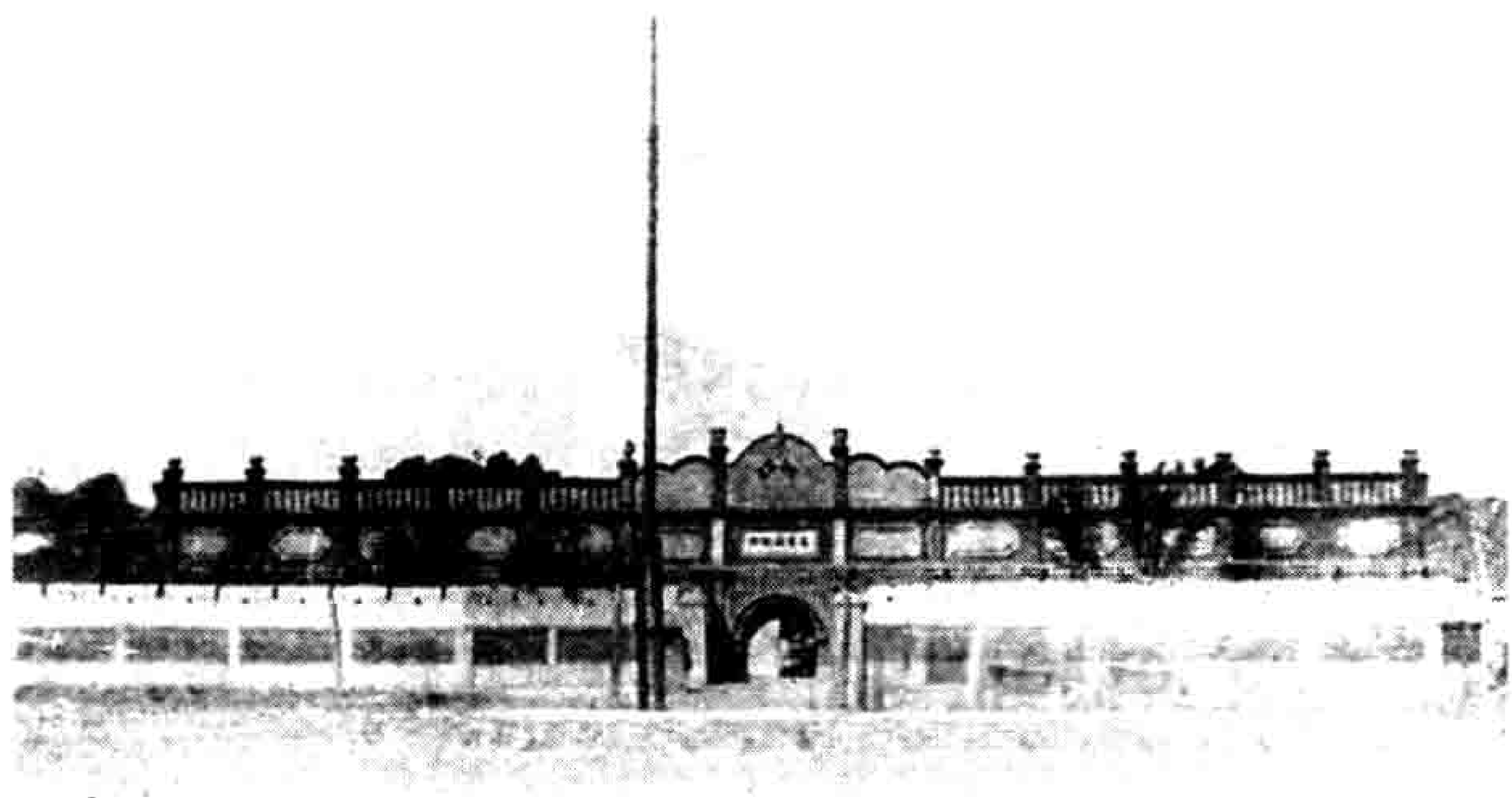
性的狂轰乱炸，八旅的一门炮被炸坏，炮手任树文腿被炸伤。八旅战士用机、步枪同时向敌机射击，吓得敌机不敢低空轰炸，使多枚炸弹都落到山下，轰炸无效只好飞走。敌军气势在被压下去之后，双方仍用炮互相对射，激战3个多小时。

当夜幕降临时，敌军仍未前进半步，迫使其在彭杖子以下各村宿营。八旅炮连也因伤亡过重、弹药缺乏并完成了掩护多数兄弟部队撤退的任务，借夜幕的掩护撤出赵家店阵地。

日军进攻凌南县城也基本分3路进军，从纱帽山经赵家店为中路；右翼是从兴城三道沟经东门、八里铺、康家沟、响水甸子到桦树沟。在此又分两股，步兵、骑兵经安子沟、香瓜沟、偏道子、巴什罕到前湾子。另一股车队、炮兵经上窑、邱营子、隆合宫、西簸箕、天增隆到前湾子，两股汇合在此地宿营。第二天早经土城子、西窝铺、韩杖子、黑山沟、二道岭子、十八拐岭到张家店；左翼由绥中宽帮、大房申、灰窑岭、瓦房沟、八家子、青石岭、大屯、马道子、鸽子洞、盆子沟、骆杖子到二杖子。第二天经袁杖子、石门上磨石堂岭，又经梁杖子、吴杖子、老鸹岭沟到喇嘛洞镇、水泉、坤都营子、大石节子。

1933年3月1日，三路互相呼应，分别同时对凌南县县城最后一道防线磨石堂岭、十八拐岭、蟒挡坝岭发起进攻。

驻守在红草沟岭、十八拐岭及黑山沟阵地的东北军十九旅二团三营的九连、十连、十一连官兵奉命于2月28日夜换防，因换防时间已过，没等接防部队赶到，即从梅杖子、金鱼岭、喀左十二德堡向山嘴子撤走。入侵凌南的右翼日军150余人于3月1日清早，即开始向十八拐岭发起进攻，有两架飞机向张家店东山扔两颗炸弹，炮兵向平顶山及卢家店北台东北军炮楼各打一炮，发现没有反映，便搬开路障，没遇抵抗，于7时许顺利通过十八拐岭防线，进入王丛店、梅家店、张家店，进行早餐。东北军八旅二团王九皋(建昌县宫山咀乡二道杖子人)营奉命到此接防，因地理情况不熟，将黑山庙认为是黑山沟，误入去冰沟的路，正遇日军进攻赵家店，遭到日



日伪时期的建昌伪县政府

军飞机的袭击，队伍被打散，只剩百余人。知走错路后改经龙潭沟、小冰沟、汤土沟、柳条沟，于3月1日8时许匆忙赶到石佛的金杖子、尤家店，因夜行一宿，人困马乏，到村后立即安排做饭。金杖子金振东到王丛店办事，看到日军迅速跑回报信，王营长派战士侦察，到王丛店听王占奎说日军正在梅家店用饭，两个战士听后急往回跑，被警戒日军发现，遂开炮平射，一个被打死在下洼子地，一个被打伤在老甘家后山。日军听到报告后，立即抢占张家店西山。八旅王营长听到炮声速率队抢占金杖子后山，但刚冲到半山坡时日军已抢占了东与北两面制高点，遂向东北军战士开枪、开炮，因战士们在漫山坡无处隐蔽，多数撤到尤家店小北沟，少数向西漫散。日军立刻冲下山梁，将小北沟包围。翻译喊话说："缴枪饶命！"王营长万般无奈，抱着侥幸心理动员战士缴了枪，王营的战士刚把枪架好，随着日军官一声吼叫，敌人3挺机枪同时扫射，60余名八旅战士都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些惨无人道的强盗们将王营士兵集体屠杀之后，又用汽油将尸体点燃。

日军行凶之后，于11时许，经十二德堡、老爷庙、大城子去凌源。被日军集体屠杀的60余人中只有一名幸存。在金杖子北坡坟茔中抵抗的10余名战士也都牺牲。这次战斗东北军共阵亡70余人，逃生者30余人。

2月28日午后4时,左翼日军8个前哨骑兵去磨石堂岭探路,遭把守此岭的东北军十九旅一个排战士的阻击,日军一匹马被打死,激战片刻日军被打退。翌日早饭后,因十九旅撤防,八旅接防没有到位,日军50余骑兵在飞机的配合下,未遇抵抗,就轻而易举地突破防线。日军向白庙子东大岭打两炮没有反映,继而向喇嘛洞老鸹岭沟方向奔去。

3月1日清晨,天气陡然骤变下起了鹅毛大雪。日军后续1000名主力部队乘50余辆汽车赶到彭杖子,在9架飞机配合下,集中炮火向东北军屈杖子阵地大量排炮,随后由多辆坦克及装甲车开路,20多辆摩托车,每辆都配有一挺轻机枪尾随其后,沿毛头河谷边打边冲,300余日军步兵顺河谷两侧山梁一齐冲杀上来。东北军八旅战士因地形不熟,不知哪个山头有自己修的工事,只临时自找地形、地物作掩体仓促迎战,多数指战员被敌人这种凶猛进攻阵势打乱了阵角,纷纷后撤,溃不成军。炮兵听见日军进攻,把4门重炮刚刚支好,敌军坦克就已冲到跟前,一炮没发就弃炮而逃。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已无法控制,只得与败阵士兵一齐后退。正在日军向上追杀到屈杖子南山石门沟口时,突然遭到躲在大石墩后八旅杨连长用机枪的阻击,打得日军抢头鼠窜。之后又对峙多时,一日军官带队向此冲击,被杨连长击毙。敌军过后,英雄只身撤去。由于他的阻击,掩护了多数战友幸免遇难。

日军冲到蟒挡坝岭根的天齐庙时又兵分两股往岭上冲杀。一股从天齐庙北沟向樱桃沟屯冲去,当进攻到此沟中间时,遭到在此设卡的东北军的阻击,战不多时,此部即被日军包围,八旅13位战士全部英勇牺牲。当这伙敌军进攻到樱桃沟东头小庙处,复遭把守此地东北军一个排的阻击,激战30余分钟,互有伤亡,东北军撤走。此股日军8时许从此上岭,顺大凌河东直接经什大营子、梅力营子北去。敌军主力部队紧随坦克、装甲车直奔蟒挡坝岭乱石窑处,又遭山谷两侧东北军的夹击,但由于无重火力,无法阻止日军

坦克前进，才使顺大路撤退的70余东北军官兵被歼于此。随后日军仍以坦克、装甲车、摩托车快速追杀向岭上溃逃的八旅官兵。由于在岭头上八旅一个连队用几挺轻重机枪封锁路面，压着日军一时难以前进，才接迎多数后撤上来的战士得以脱险。随后扼守蟒挡坝岭的连队也向西转移。10分钟后，日军坦克、军车等都相继冲上岭，县城最后一道防线蟒挡坝岭被敌军突破。上岭日军的先头部队由坦克开路、乘汽车从小蟒挡坝横渡大凌河直奔章京营子。有几个因受伤跑得慢的八旅战士被打死在大凌河河套，而多数八旅断后战士都顺章京营子西山撤向喇嘛洞。有一个骑骡子的东北军军官在章京营子屯东，为掩护弟兄撤退，他跳下座骑，以一矮园子墙作掩体，奋不顾身的向日军还击，把先头汽车上的日军一气打下3个，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趁日军还没辨别出开枪方向、停车不前之机，他迅速跑入屯中，凭借民房掩护遁入西山。在他的掩护下，除有7名弟兄阵亡于村东之外，多数都安全转移。气得日军用装甲车追击，因车被土坎挡住，才被迫停止，当敌军复用骑兵追进村庄搜查时，中国军队都已无影无踪。日军先遣队又从章京营子屯调头直奔县城牤牛营子，但凌南设治员郭家鼐等设治局要员刚闻日军已突破赵家店防线，就已弃城向西逃去，因此日军于1933年3月1日上午10时许，顺利涌入城中，凌南县城沦陷。尔后日军向大城子(今喀左县政府所在地)进攻，其挺进队、骑兵队和师团主力于3月1日下午占领了大城子。3月2日，日军西进占领了凌源县城。

在日军入侵热河与东北军戍边保卫战中，凌南防线是最难攻克的，也是战斗最激烈的防线。在这一战场，东北军共打死、打伤日本关东军的精锐部队600余人，击毙日军340人。阻击日军数日，即从1933年的2月27日至3月8日，这是中日热河大战持时最长的战场，也是东北军抗战历史上最为慷慨悲壮的卓著战绩之一。由于他们奋不顾身的浴血奋战，使日军受到重创，狠刹了其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鬼话，打乱了他们的战略部

署，延缓了他们的侵略进程，为完成长城保卫战的部署赢得了时间。同时，鼓舞了我爱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也给建昌人民增添了咏唱不绝的英雄赞歌。

“建平阻击战”后 日军占领建平

1933 年 3 月 1 日，日军占领大城子后，3 月 2 日其先头部队即向建平地区扑来，遭到了东北军驻军的顽强抵抗，守军三十旅首当其冲。当时日军是川原旅团组成的快速纵队配合骑兵大队，并配有 9 架飞机，30 多辆装甲车，陆空联合向守军阵地猛攻，激战六七个小时，守军三十旅顽强坚守，日军急切不得通过，便分派步骑炮联合的快速部队绕道西进，直趋平泉、承德。

三十旅连日激战，伤亡甚众，旅长于兆麟向军团部求援。军团部即令驻守在凌源县三十家子的二十九旅六八四团向叶柏寿增援。增援部队 3 月 9 日早上出发，于当晚 10 时抵达距三十家子 148 华里的叶柏寿左侧朱碌科村，连夜向阵地增派兵力。

原三十旅三八八团的主阵地上一片沉寂，由于夜间未交火，只有少数士兵在阵地内警戒，团长已失踪，连排长均已在白天的战斗中阵亡，守军士兵伤亡殆尽。六八四团团长刘纯积以一、二两营为第一线，第三营为预备队，团部与预备队置于左后方的朱碌科村南端。

3 月 10 日拂晓，日军的 3 架飞机在守军阵地上空盘旋侦察，投掷炸弹，地面步兵亦开始进攻。六八四团第一线的两营官兵予以反击，持续激战两昼夜，双方各有伤亡，但日军未能突破守军阵地。

3 月 12 日夜，守军阵地前沿突然传来大喇叭声音，高叫“皇军邵本良部队到此，欢迎六八四团第二营张执军参加皇军”。守军官兵义愤填膺，猛击敌部，敌被击退。

邵本良原是汤玉麟部一 O 七旅旅长董福亭手下的一个团长，曾驻守在南岭、北票一带。在日军进犯之前，邵本良就惊慌失措，窜

到密云县六八四团,蛊惑旧友第二营营长张执军叛变投敌,遭到张的拒绝,并被赶走。邵本良蛊惑不成,率本团投靠日军。董福亭旅出现了邵本良这样的败类,旋即溃退,南岭、北票失守,热河中路防线顿遭溃败。

邵本良部阵地喊话无效,恼羞成怒。13日上午8时,六八四团主阵地正面的日军增加了坦克车、装甲车、山野炮等重武器,并有飞机9架,一齐向守军阵地猛攻。守军阵地大部被摧毁,连长伤亡过半。午后4时,右翼三十旅支持不住,向平泉撤退;日军则以一部包围六八四团,主力向西追击于兆麟的三十旅。六八四团被围,联络中断。当夜12时许,全团奋力反攻,突出重围,撤到宁城县八里罕、甸子一带,转道张家口。

至1933年3月13日夜,日本侵略军全部占领建平县。

日本侵略者对朝阳人民的血腥镇压与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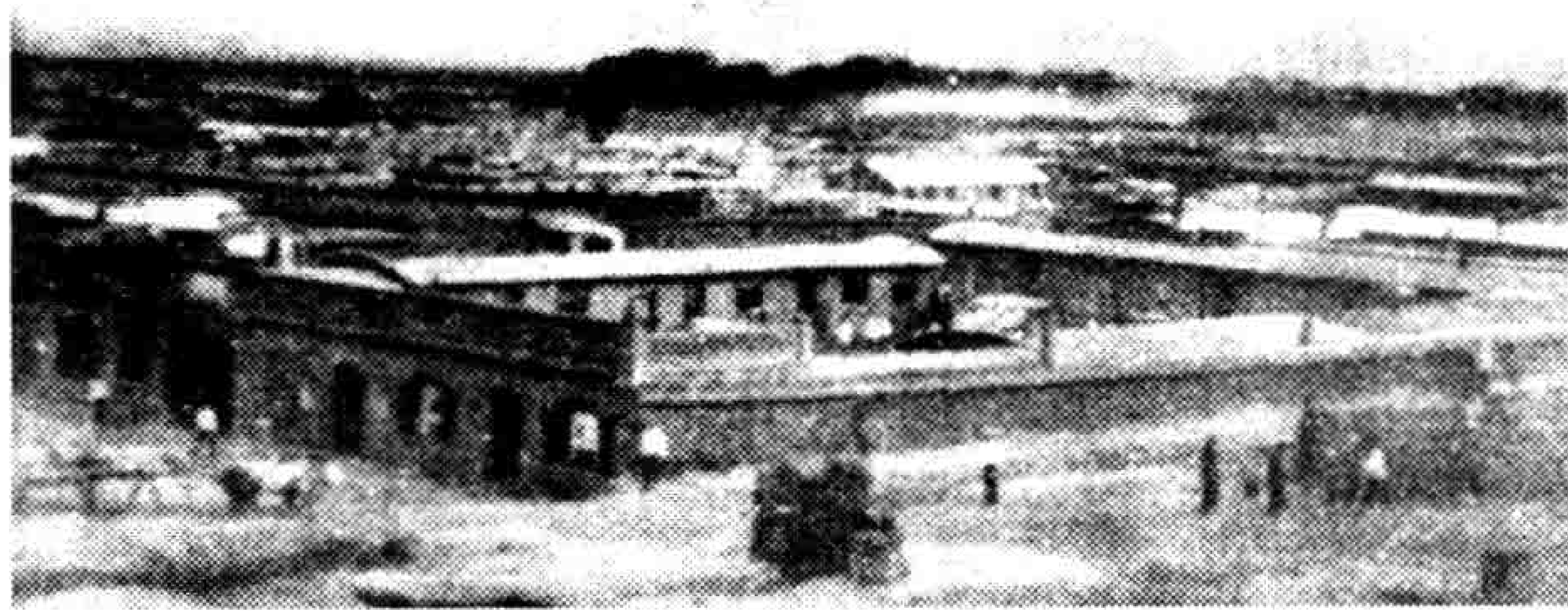
(一)

日本侵略军于1932年5月13日进犯北票南岭。1933年2月22日,北票沦陷,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票人民获得解放,结束了13年之久的亡国奴生活。回顾这段历史,北票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下艰难挣扎在生死线上,日本侵略者在北票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是以华治华建立伪政权。日军侵占东北后,以华治华,采取离间华人的做法,挟持一心复辟大清的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吐默特右旗通过日本特务佘葆、田中抬出被溥仪封为和硕亲王的沁布多尔济。1932年秋,沁布多尔济回到黑城子王府,重新沿用祖业的一套封建机构,拼凑一些趋炎附势的地痞、流氓和恶棍,分别担任了王府的护印协理、军务协理、旗务协理,整顿了王府所属的公益局、庆丰局、庆和局、庆丰分局和内仓等行政组织。同时,建立起保安总队(辖6个中队,24个小队,共500余人)和王府卫队。这是一套蒙民行政统治机构,负责征收亩捐,审理诉讼,维持地方治安施行王道统治,为日本人效力。在伪政权建立的同时,日伪警察组织也不断扩大,朝阳县警察局在北票地区设警察署(分局),各地下设分驻所和派出所。

日军统治实行蒙汉分制。1933年3月25日,日本铃木司令官与清木大尉进入朝阳县城,立即召集城里绅商成立治安维持会,令绅士高明清为治安维持会正委员长兼代理县知事,孙纪五、高鸿昌为副委员长。1933年7月启用原朝阳县建制,从金州派来日军忠

实走卒王永苍任县长。县参事官水上健治，其他副参事官、经理官、警正、警佐、巡官、警长、警士全由日本人担任。县属地方行政组织仍沿用6个区的建制。1933年12月实行保甲制，居民每10户为1个牌，20户为1个甲，每区为1个保，全县共建6个保，58个甲。牌内各户实行"连坐法"，发现某户有反满抗日活动的人，全牌各户都要受到株连。为了"因胡匪蜂起调集驻保游动击匪"，各地均组建了保甲自卫团，至街村制时没有变动。这些组织的警官都由日本军人担任，一些汉奸警察也自称"皇帝陛下警察官"，头戴高帽，脚蹬马靴，腰挎洋刀，手持棍棒，奴性十足地欺压人民。1935年日军"为谋治安之巩固复划全县12个区"。1936年又实行"街村制"，全县划90个村，北票与朝阳划两个街，并按伪满洲国蒙政部准许建立起吐默特右旗的旗公署，沁布多尔济任旗长，其他重要职务全由日本人担任，旗参事官仓田中三，署官山本宗成，警佐横内喜三郎。1940年将吐默特右旗划分成中旗和右旗，吐默特中旗旗长为沁布多尔济，日本参事官为友马善夫。从此，取消了朝阳县建制，实行蒙汉合制。



1933年后日伪统治时期的北票城全貌

二是亡国变种的奴化教育。日军除用血腥屠杀镇压北票人民外，还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进行奴化教育的最反动组织是协和会。它打着"万邦协和"的幌子，宣扬日本"天皇圣意"，发展的协和会员多数是亲日分子。他们渗透到各个机关、学校、工矿和农村，这

些人明面穿着协和服，吃着协和饭，开展“思想战”，暗中却同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和警察署相勾结，提供情报，残害人民。

1940年，吐默特中旗协和会的会长是武剑侯，日本参事官兼任副会长，北票街和各村的村长都兼任协和分会长。他们为统治麻痹中国人民，利用宗教教徒和僧侣喇嘛及卐字会、道德会等所谓慈善团体灌输奴化思想。他们操纵着宣传舆论工具，出版的报刊、摄影一律鼓吹建国精神。《国策文艺》充斥了图书馆和书店，其中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傀儡政权的《建国烈传》、《晨晓满洲》，美化奴役中国人民的《嫩江祭》、《奉天城附近》。当时北票影院上映的电影片子也都是丑化中国人鼓吹日满协和内容的《北方的部队》、《我是满洲国民》、《蜜月列车》、《情海航行》、《壮志烛天》、《东游记》等，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

他们种种的奴化宣传是积极配合日伪军奴役北票人民进行的。1939年强迫20——35岁男性青年参加自卫团，又名义勇奉公队，美其名曰“国民警护”。1942年强迫19岁以上的青年去当兵。检查过的“国兵漏子”被赶到盘山为日本人修稻田，去安达为日军修国防工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宣传“圣战”，配合警察和矫正院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思想犯”，许多人无辜遭到残害。当时群众愤恨地说：“协和坏，协和坏，跟着鬼子把人害，昧着良心说假话，用嘴杀人比刀快。”

灌输奴化教育最为严重的地方是学校。在北票地区有132所国民优级学校，他们在国民学校和国民义塾的10120余名学生中，推行官制文化教育。从学生启蒙教育开始，就灌输“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及日本天皇至上的思想。为了让年幼的学生忘掉自己的祖国，不准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准用中国教材。1935年日伪编的新教材印出来以后，在城市和农村学校普遍推行，教材内容讲的是惟神之道“皇帝即位”、“中坚国民”。重点校的校长和一些教员都由日本人担任。北票街一所学校的校长山田

松雄强迫师生背诵《即位昭书》、《銮训民昭书》、《民国训》，每日早晨必须向帝宫和皇宫方向遥拜。所谓节日，学生要集体到靖国神社朝拜，对师生实行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的教育。

三是搜尽刮光的掠夺政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目的在于掠夺，掠夺是通过日伪政权进行的，制定的政策和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北票地区在县旗分制以前，人民承受着双重经济负担，归朝阳县伪政权管辖时摊派到人民头上的税捐有30多种，每人每年平均负担伪币折合小米约650斤。同时，吐默特右旗王府和旗公署每年又要从农民那里收租达2万余石，此外又增收地皮捐、壮丁费、驿站费、并户税、地方税等数十种。日伪政权还利用喇嘛教来愚弄人民，赋予封建喇嘛种种特权，喇嘛利用地租、高利贷、劳役等剥削蒙汉人民，还通过迷信要人们负担集体念经费、埋葬费、祭品、佛灯等各种费用。在这个时期，由于日伪统治者和王公地主、封建喇嘛等重重剥削，农民每年收人的70—80%都被掠夺去。

1939年8月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对“满洲国”由单纯行政权控制到全盘掌握土地所有权，对王公实行“土地奉上”，直接要农民“出荷粮”。“出荷”额多少按土地面积规定，但土地拥有者中的那些官僚地主豪绅竟明目张胆地与日伪警察、官吏相互勾结，“出荷”的全部负担几乎都压在穷苦农民的身上，农民缴不上“出荷粮”要遭到酷刑。日伪政权组织日伪警察和伪职人员成立“搜荷班”，到农村各户翻草垛，扒炕洞，挖墙角，搜查粮食，最后将农民家中的高粮、谷子、荞麦、麻籽和棉花等物掠夺一空。据不完全统计，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军掠走粮食达360万余石，棉花100万余斤。除“出荷”以外，日军强迫农民种植大烟(鸦片)，一方面搞“鸦片组合”收缴大烟，掠夺农民；另方面将收缴的大烟在民间倾销，谋取暴利，毒害人民。据1935年统计，当时朝阳县(包括北票地区)共种大烟4.5万余亩，产大烟90万两。1937年统计，朝阳县(包括北票地区)被染上大烟嗜好的达6301人，占人口总数的3%，其中有的因长期吸大烟，



日寇统治时期修建的北票火车站

骨瘦如柴，最后葬送了性命。当时流传着“吸大烟三宗宝，穷的快，死的早，抬着轻快臭不了。”“献纳”又是一种掠夺，是日本最深层次的掠夺，小至废铜烂铁，大至畜产、土产，甚至猪鬃、狗皮等无所不有。除“出荷”、“献纳”之外，还有地皮捐、门牌税、交易税、牲畜税、义仓粮、保甲粮等数十种税捐都压在人民头上。

1940年以后，为进一步掠夺，日军采取新经济政策，制定了“七、二五价格”，并实行了“钢铁统治”，收缴民用钢铁。此后，日军又施行“配给制”，粮食、布匹、油盐、火柴等日用品，全部由日伪机构控制专卖，“配给”的数量极少，又加上日伪警察官吏层层克扣，到老百姓身上已剩无几，而且火油掺水，“更生布”一穿到身上几天就破。民间的纺花、织布被禁止，吃大米白面也是违法的，广大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

1931年日本侵略者入侵朝阳之初，朝阳人民的抗日烽火燃遍城乡。全县义勇军、联庄会达2万余人。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先后击毙日军300余名，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充分显示出朝阳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朝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采取了屠杀、镇压与收买相结合的政策，对全县人民进行了残暴屠杀与统

治。

一是进行残无人道的大屠杀。日本侵略者统治朝阳县的13年中，先后进行多次大屠杀，共杀害无辜群众近千人。1933年日军提出要血洗老三区(羊山、六家子、二十家子)。11月15日，杀害了二车户沟群众57人；1934年10月21日，在缸窑岭区下五家子，用机枪扫射和放火焚烧，杀害387人，全村避开死难的只有4人；1937年8月30日，北四家子区水泉村被杀群众100人；石明信沟人民被8次屠杀，死36人；1945年8月24日，日军在大平房枪杀群众84人。

二是建立警察特务机构镇压人民。1933年成立伪朝阳县公署(1940年改为吐默特右旗公署)，下设警务科，内设警务、保安、司法、特务、卫生5个股，专职特务有47人。在城内、大平房、六家子、木头城子等地设立警察署12处、派出所32个、分驻所11个，共有署长12人、警尉30人、警长46人、警士502人，全县共有警察590余人、自卫团720余人。1937年10月，日本关东军守备队200余人进驻六家子，以队长杜边、大田为首组织地痞流氓16人，在六家子成立密侦班，进行特务活动。主要是了解抗日武装线索，经常活动在六家子、建昌、喀左一带。1938年1月，有特务告密，将董家店乡傅宝申抓去要枪，打得昏死几次，险遭杀害。到1940年全县自卫团和蒙古队已达800余人，加上警察计1300余人。日军铃木任蒙古队队长。1943年春，我抗日游击队到处打击日军，铃木授命五个警察署组织特务62名，到处搜集我军抗日组织、人员、装备与活动状况及人民中间的反满抗日言行，许多人遭受过迫害。

1938年以日本指导官中村为首，组成全县警察队500余人，为治本工作班，分赴各村进行“治安肃正”、回收武器、发良民证、向广大群众要枪弹。为达目的，对人民群众施以灌辣椒水、用烙铁烫、香火烧等惨无人道的酷刑，被杀害和致残群众数以千计。

1943年9月，朝阳日本宪兵分遣队派中村为队长，收罗土匪、

流氓29人，组成宪兵队羊山间班，据点设在羊山烧锅。并在城内南塔附近设升官旅店，作为向锦州联络的据点。羊山间班活动在羊山、二十家子和建昌一带。其主要任务是搜捕八路军地下工作人员，监视“王老凿”的活动，镇压反抗他们的老百姓，缴获枪支武器等。1944年2月宪兵队撤走，羊山间班解散。伪锦州省警务厅于1935年9月，派李占太、文占录、刘宽廷等特务分子到二十家子、六家子建立驻在所，设密侦站，专门刺探我军政情报与人民反满抗日言行。曾将凌南、兴隆、青龙等地的我军活动情况报告20余次，并率领讨伐队向我抗日军民进行扫荡。为防止八路军活动，又在梅勒营子设立一支蒙古队，共100余人，日军铃木任队长。1945年春曾去东大道和建平交界地区搜剿八路军。还抓去梅勒营子西沟傅宝千，向他要枪，多次严刑拷打和灌辣椒水，后送县监狱扣押。1944年以后，所有警、宪、特机关戒备森严，天天派人到喀左、建平一带侦探八路军消息，一日一报。

日寇还以极其恶毒手段，收缴武器、弹药。1935年到1936年以伪警务科长田井田次郎为首，组织“治本工作班”，到各乡缴枪，对群众实行灌凉水、火烧、烙铁烙等残无人道的刑罚，杀害群众不计其数。仅董家店附近被杀害的就有薛振东、薛振龄等3人。相继又建立十家连座，即一家犯法，十家同罪同罚。

为防止人民支持八路军抗日，于1937年又强迫偏僻山沟人民“集家并村”。违者烧房子，以藏贼窝匪论处。牛粪洞子东沟510多户，集家并村的240余户，被烧房子数百间；董家店干沟、于家沟、三家房均被赶到董家店屯去住，造成不少群众土地荒芜、农业减产。1945年2月2日，伪讨伐队强迫于家沟全村15户移民北安，人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

三是经济统治与繁重劳役。日本侵略者对朝阳县人民在政治上实行残暴统治的同时，又加紧了经济上的统治和掠夺。在1940年7月实行工商业价值税。1942年又实行配给制。凡人民日常生

活必需品,如:粮、盐、布匹、火油等,统由小卖所统一经营。发横财的只有少数大商人和伪官吏,他们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垄断朝阳经济命脉,造成民族工商业倒闭,市场萧条,物价膨胀。农民一年只配给几尺更生布(棉花皮作的)或市布。同时,地亩捐、房捐、人口捐、屠宰税、工商业管理税等名目繁多。此外,农民还得交纳大量的出荷粮,而后,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悲惨生活。更为严重的是农民自己种棉花纺线织土布,被警察特务发现,也扣上"经济犯"罪名,挨打、挨押,还得罚款。警察特务还借机敲诈勒索,真是敲骨吸髓,轧沙求油。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还强迫群众种大烟,使全县5000多农民染上烟瘾。在城内还设立小卖所,供给烟民"白面"吸、扎,造成不少烟民倾家荡产,卖妻卖子,有的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日本侵略者还强迫老百姓给他们充当战争的炮灰,或担负繁重劳役。于1940年进行了一次国势调查,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户口制度。1941年公布了国兵法:年满19岁男性青年都得服兵役3年,去充当侵略者的牺牲品。国兵不合格者,去勤劳奉公队服劳役3年,还得受法西斯的军事训练。一旦战争吃紧,就调到前线参战。此外,每年春秋两季,要强迫群众修一次公路。平时打更、出探、送信、建筑敌伪机关的劳工,均由群众摊派,出人或出钱。1944年,台子、木城子、梅勒营子群众千余人,都被赶去修董家店大岭梁,稍有迟到、早退者,遭到监工警察的毒打或罚跪,整整修了半年才竣工。日本侵略者带给人民最大的灾难是抓劳工,凡17岁到55岁男子,都得充当劳工。每次要劳工,都由警察抓去,强迫送走,到矿上从事繁重劳动,吃不饱,穿不暖,受尽日本人和把头的层层苛扣与打骂虐待,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死在外地者,不计其数。黑牛营子区有30多人被抓往海拉尔修地道,残死27人。

日伪统治时期,朝阳县广大人民不仅受日伪军警残酷的政治压迫,还惨遭经济掠夺,他们横征暴敛,迫使人民生活无路。

日伪统治时期,朝阳县叫吐默特右旗。当时全旗划分为28个

街村、300个屯(保)。村设村公所、警察分驻所。村公所、分驻所之上有警察署。全县设了多个警察署,分7大片统治全县。凡警察署所在地,均设置一个粮库,以征收附近若干村的粮谷,实为“出荷粮”。

每当秋后征收粮谷时,伪县实业科人员全部分片下乡,布置征收粮谷数量。各村公所按农民所持有的土地亩数,摊派至各屯,屯再摊派到户。地富豪绅土地虽多,质量又好,但因有权有势,有钱送礼行贿,负担的“出荷粮”数量却是不大的。最苦的是中等以下的农民,各家风里雨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交了“出荷粮”,剩不下过冬粮。为镇压农民对交“出荷粮”的反抗,各警察署分驻所的警察,荷枪实弹,非打即骂,翻箱倒柜,强制征收。

1941年是实行交“出荷粮”的第一年。木头城子警察署长来子安和梅勒营子村公所马村长,带领十几名警察与村事务员,前一天就在梅勒营子安下了公馆,鸡鸭鱼肉,烟酒糖茶,用啥要啥。第二天一大早,就召开村民大会,由警察弹压会场。有十几名迟到的农民,被当众拳打脚踢之后,又罚跪在场内。其中有一名迟到者与警察申辩几句,竟被强行按跪在铺有砂粒的地上。众人到齐后,按保分队排列,进入东烧锅大院。先由伪旗公署一股长刘作英讲话,布置交粮任务,再由村公所一事务员公布各户应摊数字,最后由来子安训话。那天来子安穿一身黄呢子警服,头戴战斗帽,身挎洋刀,耀武扬威。他说:“为支援大东亚圣战,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保证军需,大满洲帝国之国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要踊跃交纳‘出荷’粮谷。任何人不得抗拒。如有抗拒不交者,必定依法严惩,绝不宽恕。”他讲完了话要散会时,有位叫刘宝三的农民不听邪,当场大声说:“自家总共还没打10石粮,‘出荷’任务摊了5000斤,实在拿不出,不信可以到家翻箱倒柜”。结果叫警察一顿打。一边打一边说:“叫你硬,叫你硬,没有粮今天要你命。”事后,经过讲情,交出了全部口粮。

日伪统治时期是不准农民买卖粮食的。1940年9月,伪满兴农部大臣以223号敕令颁布了“粮谷管理法”。该法规定:“粮谷生

产者及小作科粮谷取得者及其它粮谷所有者，由兴农部大臣批准交易市场或由地方行政长官指定交易市场。"又规定："建立满洲兴农公社，确定特约收买人经营粮谷……兴农合作社之特约人买入之粮谷由满洲兴农公社卖渡。""对粮谷之需给与价格调节由兴农部大臣决定。地方行政长官对粮谷生产者、粮谷取得者、粮谷贩卖者、粮谷加工者及其它粮谷持有者之工厂、仓库、营业所、车船及一切手续帐簿有检查讯问权力。

日伪颁布的粮谷管理法，还规定有罚则，仅举几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 6 个月以上、5 年以下徒刑，3 万元以下罚金：1 、违犯规定买入粮谷者；2 、违犯粮谷供应或价格调节规定者；3 、不按指示加工者；4 、粮谷贩卖者、加工者、制粉业者与其它粮谷占有者。

伪满警察于 1942 年冬天，在六家子一个集上就没收了农民粮食 4000 多斤。有的农民口挪肚攒省下点口粮拿到集上去卖，想卖了钱买点灯油、火柴什么的，没想到粮食被没收，真是苦不可言。



日伪时期朝阳县税务局小楼

在日伪时期，朝阳旗公署内设财务局征收股，后又成立税捐局，执掌代征"国"税，征收地方捐税，征收滞纳金与处分金等事项。据日伪康德四年(1937 年)县志所载：亩捐为年税，每亩 0.10 元；屠宰捐：猪 1.50 元，牛 2.00 元，羊 0.50 元，由屠商纳税；斗捐：按市价 1%，由买卖粮

食者交纳;车捐:每台一套 1.50 元,二套 2.50 元,三、四套 4.00 元,五套 6.00 元;园捐:菜园每亩 0.30 元,纳年税;营业附加税:按商号资本 6 ‰,纳月税;马车捐:每台车额 18.00 元,车主纳定期捐;人力车捐:每台 4.80 元,纳期税;观览捐:戏剧每日入场金科 3%,营业主随时交纳;营业税附加捐:营业税 50%,纳期税;游典捐:行典者按行典金额 3 一 5%,随时交纳;房捐:按房屋租价 3%,分二期征收;不动产取得捐:按土地及建筑物 2%,不动产取得者随时交纳;矿业税:矿区面积 25%,每年分二期上缴;自动车捐(汽车捐):按客货重量每增半吨加征 5.00 元,期税;木捐:木料价格 25%,一年二期征收。伪康德 3 年,全年收亩捐 46055 元,地捐 45732 元,园捐 323 元,矿业税附加捐 3124 元,矿产税附加捐 1208 元,矿区税附加捐 1916 元,营业税附加捐 16503 元,木捐 252 元,房捐 5281 元。仅据伪满康德 2 年下半年统计:共收屠宰捐 3577 元,戏捐 328 元,妓女捐 815 元,商捐 23752 元,石灰捐 162 元,小肠捐 302 元,驮捐 1146 元,自行车捐 26 元,人力车捐 583 元,马车捐 400 元,大车捐 2615 元,畜捐 437 元,斗捐 3164 元,总捐计 36983 元。

上述苛捐杂税,在伪满初期,全部征收的银洋。到伪康德 8 年(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面临灭顶之灾,更加倍掠夺钱粮财物,各种捐税,年年加码,成倍上升。增加了户别捐,人头捐,鸭、鸡、鹅捐,还向农民要铜铁,几乎把人民的血都抽干了,逼得人民用野菜、豆饼、谷糠充饥,碰上灾年不得不吃观音土。掌管征收捐税的税捐局人员与街村屯伪职员,借收税之机,还大肆贪污受贿,勒诈勒索财物中饱私囊。地主、资本家收入多,纳税少,多数税款都加在劳动人民身上。因而那时的朝阳人民,的确是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据县《公安志》编写组掌握的资料:仅 1941 年到 1945 年的 4 年中,朝阳县农民共交"出荷粮"150 万斤;在日伪统治的 14 年中,全县共交纳捐税 100 万元(指当时伪币)。

（三）

日军在进攻凌南前夕，其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凌南城厢及准备进攻的沿途村庄，进行轰炸、侦察。同时投撒大量传单及宣传画，其大体内容：一是攻击东北军及抗日义勇军如何骚扰百姓；二是威胁军民如不顺从，将死无葬身之地；三是宣扬日满亲善，日本如何善待百姓。如有的传单写着“中日友邦”、“满洲国的小朋友们，咱们一齐拉手吧”等欺骗宣传，他们收买的汉奸们也替其散布：日军是“仁义之军”，“不打骂老百姓”等谣言，以此掩饰日本侵略者的凶恶本性。在入侵凌南的数天时间内，其所犯下的大量罪行就足以揭穿日本侵略者的伪善面具，暴露其法西斯的野蛮残暴的狰狞原貌。

按照国际法规定，对已交枪的俘虏及已失去抵抗能力的伤员不准杀戮，但日本法西斯强盗则公然屠杀一切被俘人员。在石佛的金杖子、喇嘛洞水泉两处即集体屠杀已交枪的东北军官兵100余人。此外，在杨树湾子胡家岭南沟搜出来的10余名东北军战士皆被挑死；在黑山科乡徐杖子下边的大坝处，被缴械的一个排东北军也全被枪毙；在肖台子受重伤的10名东北军也被刺杀，在凌南战场共有250余名被俘人员及重伤员，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所杀害。

这些日本强盗还对我无辜平民百姓大开杀戒。如杨树湾子乡卡路营子屯的东吉有和顾平在本屯西沟老杨家躲兵，被日军抓去带路。因此股日军走到大骆石处遭东北军伏击，日军被打死数十人后败退下来，便把东、顾二人活活挑死在萝卜地洼；王贵发父亲和周老三从西沟里出来与其相遇，就硬说他们不是良民，被挑死在拾金沟口；杨树湾子小北沟的王义珠出屯看看情况，被进屯的日军挑死在本屯外；杨树湾子乡贺畲沟的田庆吉、田玉金，还有罗锅沟朱老大被日军挑死在南河套；于家沟的村民刘保堂及来小北沟屯躲兵的张文才被日军抓住，捆绑拉到纱帽山东脚子即伍长玉川毙命处挑死，用他们俩人为其祭灵；八家子镇青石岭村赵老连，此人好

唱戏,演旦角而留长发,与顺此过的日军相遇被挑死;黑山科乡大南沟李老二被日军传单所欺骗,他说:“不用怕,日军不打老百姓。”别人都跑了他不走,结果被日军抓住打死,此屯李凤雨被打伤;阎家店的耿周氏及次子耿牢棒藏在西山的砬棚里,母被日军打伤,子被打死;南桥刘长富的母亲在西山,腿被打伤;雷家店乡弓家沟屯的吕家新在白杖子与日军相遇,因其镶一个金牙,被日军刺死;在头道杖子的一个石洞里藏着的刘老四被打死,李庆福的父亲、何永江的奶奶被打伤;雷家店乡骆杖子的骆三被打死在大松木沟南梁上;因一日军军官及几个军卒被击毙在屈杖子南山根,日军进村后见人就杀,将没躲避的屈胜、屈秀挑死在村中;白道营子刘喜在坤都营子扛活,拾一件东北军衣服,被日军打死在北河套;三道河子冷二强也被打死在坤都营子;宫山咀乡蒿子沟的岂山被日军打死在三道河子西头后河沟子;因怀疑梅力沟张柏等 3 人打死了日本人,而被日军抓住杀害;南营子王俊的母亲为跑兵被打死在西山坡。在战斗中,因日军飞机投弹、扫射,炸死炸伤的民众也不在少数,如在药王庙、建昌街、什家子等地都有被日机轰炸致死的民众。

日本法西斯强盗罪恶滔天,暴行累累,奸淫烧杀无恶不做。他们为了炼尸把杨树湾子新立屯各家的柴草、门窗都毁之一炬;雷家店烧锅杖子霍清凤家房子被烧为灰烬;把雷家店彭杖子彭玉魁的骡子抢去拉车;把黑山科闫家店耿志成家大柴草垛点燃;黑山科黄土梁屯及宫山咀三道河子屯各家的鸡全被他们吃光;北桥老弓家的一口肥猪被他们追到老虎山湾杀死吃掉。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坤都营子有两名鬼子闯进民宅将妇女轮奸;到十二德堡时,把杨树底下的一个姑娘拦路抓住轮奸后刺死。日军的笔笔血债、累累罪行都昭示了侵略者的凶残面目。

(四)

1933 年 2 月下旬,日军在飞机、大炮、铁甲车的掩护下开始向

凌南、凌源进攻。日军从进攻凌源地区开始,便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凌源地区光是屠杀已放下武器的东北军官兵达 600 多人。在凌南牤牛营子战斗中,60 余名缴械的东北军官兵尽被杀戮,而后用汽油将尸体全部焚毁。沦陷时期,境内遍布军警宪特,并实行连保制,制造了一起起灭绝人性的烧杀惨案。先后于境内搞大屠杀、大逮捕、大扫荡数十次之多。大屠杀有凌源县城沦陷大屠杀、下堡子大屠杀、东赤里赤大屠杀、三家子大屠杀、王峦沟大屠杀、药王庙大屠杀、草篓沟大屠杀、张台子"腊八"大屠杀、白莲教大屠杀等,残杀军民 1000 余人。大逮捕有大河北大逮捕、达摩洞大逮捕、尖山子大逮捕、后槽岭南台子大逮捕、香洼西沟大逮捕、马家沟大逮捕、"七·一九"全县大逮捕、王八盖子大逮捕等,抓捕群众 800 余人,枪杀 60 余人。大扫荡有李家店大扫荡、盆子窑大扫荡、郭杖子大扫荡、西沟里及窑洞里大扫荡、裂子山北大洼大扫荡、花果山大扫荡、窑沟屯大扫荡、孙家梁大扫荡、沙果沟大扫荡等,枪杀军民 40 余人。凌源沦陷 13 年,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军枪杀的抗日战士与无辜百姓多达 14000 余人,在狱中惨死的 12000 余人。日军的杀人手段十分残忍,采用枪杀、机枪扫、战刀砍、刺刀挑、活埋、开水烫、绳绞、油烧、警犬咬、电击、铡刀铡、剖腹、挖心、扒头皮、把人装到麻袋中摔、把姑娘轮奸后杀掉……更有甚者,大城子伪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小田公平一次夜晚命马夫提一名"人犯",用刀撬开头颅取出脑浆,剖腹取出肾脏当"营养品"吃掉,真乃灭绝人性。他们的行刑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用木棍打、钉子板打、皮鞭子抽、将人绑于凳上灌凉水、灌火油辣椒面、把铁桶烧红背到光背上、赤脚走烧红的煎饼鏊子……一次,一伙日军于花果山扫荡时,抓住 7 名妇女,竟让这些人脱光衣服在沙地上扭秧歌,供他们"观赏"取乐,谁不扭,即遭毒打。

从 1937 年起,日军为扑灭境内抗日斗争烈火,除调集重兵进行大规模扫荡和"清剿"外,还制造"无住禁作"(即"无人区")地带,

推行集家并村。他们一方面抓捕16——60岁男子修建部落,一方面以武力强迫民众离开祖祖辈辈经营与居住的家园和土地,迁到指定部落之内。强修部落推行集家并村是日军在境内制造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惨案的继续,是他们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对部落之外的村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且这种"三光"政策反复进行。1937年10月21日,日军到境内铁沟一个15公里长的大沟搞集家并村,强制农户拆房搬家,限期半月,谁要怠慢或拒绝,便遭惨杀。10月25日,日军将该沟丰振伍等12名不愿搬家的农民枪杀,并把沟内西窝铺、郑杖子、西埃、卧虎沟4个屯,全部烧光。1937年10月——1943年6月,先后从铁沟赶出485户2365人,烧毁房屋1671间,将铁沟变成"无人区"。被日军用暴力赶入部落的居民,毫无人身自由,他们不仅受着日伪军警严密监视和保甲连坐制的残酷控制,而且被部落内森严戒律管制着。在部落里居住要有日伪当局发的"良民证",出外得持警察机关签发的"通行证",不得携带粮食、食盐、衣物用品,买东西需持有"购物证"。白天不得远离部落去耕作,晚上不准互相串门,不得三五成群议论国事,家里来人必得先报告,经准许才能留宿。如谁稍有不满或犯其中戒条,轻者遭毒打,重者以"通匪罪名"关押甚至杀害。在部落里,群众几家住在一起,饥寒交迫,苦不堪言,瘟疫流行,疾病蔓延,许多居民被夺去生命。离部落远的地不准种,造成土地荒芜。1943年统计,全县荒芜土地117568亩。农民无粮食吃,只得以树皮、草根充饥。据统计,沦陷时期凌源地区共建部落209个,并村1145个、23231户、117113口人,因集家致死14483人,共毁掉房屋59691.5间,损毁农具、衣物、器具539298件,损失骡马等耕畜2138头(匹),抢走粮食74万公斤。

日军为掠夺沦陷区资源,在境内大搞抓劳工与强行移民。强迫境内劳苦民众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劳役。境内被编入"勤劳奉公队"、被抓劳工、以及被强迫移民人数已无法统计,给凌源人民

带来巨大灾难。被抓去的人，无偿为日本侵略者干活，而且吃不饱，住集中营，受尽折磨和苦难，多数死于外地，侥幸未死的，也多造成终生残疾。

日军占领凌源地区后，便对凌源经济实行“统制”与掠夺。凡属银行、邮政、电报、电话、铁路、采金、矿业、电业、汽车运输等实行日本人垄断经营，当地人只准办一些零散的工商业。1940年后，当地企业一般均关闭。日本人低价雇佣当地劳动力，把掠夺的资源运入日本国内。对农民一是强迫大种罂粟，二是实行“粮谷出荷”与“粮食配给”。农村的好地，多种罂粟，用鸦片剥削和毒害沦陷区人民。鸦片由“鸦片组合”低价收购，高价卖与瘾者，从中赚钱，并且将鸦片大量走私，从中牟取暴利。沦陷时期，境内瘾者已占总人口的10%左右，这些人受到巨大毒害，成为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生活的废人。“粮谷出荷”掠夺农民的粮食，每年境内交粮7000万公斤左右，除供其消费外，均运往日本。而且农民鸦片、“出荷粮”、棉、麻的钱，必须买日军发霉的高粱米来糊口度日，名曰“粮食配给”。当地人不准吃大米，吃大米要坐牢。农村税费多达37种，农民交不起税费，被迫卖地卖屋逃亡者无法计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以伪协和会为中心，开展“金属献纳强调运动”。日军为弥补其战时金属短缺，竟把人民群众手中的金属，包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器物抢掠一空。最后连一个金属汤匙亦不给留下，日用家具上的小五金特别是铜铝制品，必须一律起掉收缴。

日军利用“协和会”、“民生部”，强制推行“愚民政策”及“奴化教育”，竭力摧残中华民族意识。伪“民生部”在所谓“训令”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这就是要中国人俯首贴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的奴才。为了长期奴役中国人民，在沦陷的学校里，日本侵略者强迫教员教学生必须讲“日满协和”、“日满亲善”。教师在校必须教学生唱歌颂日本天皇的歌曲。各沦陷区学校必须上日语课。

教师上下课必须用日语发口令。日伪当局还强迫学生背诵伪满洲国的《皇帝诏书》和《国民训》。在教学内容上竟然取缔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科目。学校教育的目的是要沦陷区人民忘记自己的祖国，甘当亡国奴，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长期侵占中国的狼子野心。

(五)

日军侵占喀左后，为强化其殖民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强化治安”的措施，组建傀儡政权，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最初，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沿用了“蒙汉分治”的办法，制造蒙汉之间的民族隔阂与矛盾。1936年，伪喀喇沁左旗公署在南公营子成立，原扎萨克默尔庚额任旗长，下设6科12个股。其中，警务科特务股长由日本人山口利、铃木雄次、海志根、袁村和中国人刘中林、王仙洲依次担任，共有特务21人。1940年，日伪当局为了集中权力，便于对政权的控制，又实行蒙汉合治，废除建昌县建制，将县、旗合并为喀喇沁左旗，设伪旗公署，治所由南公营子迁至牤牛营子(今建昌镇)。默尔庚额任旗长，日本人赖川五郎任参事官。1943年，默尔庚额被逼去职后，由郭文田继任旗长。旗公署下设总务、行政、财务、教育、实业、烟政、动员、产业和警务科。警务科下辖山咀子、大城子警察署。警务科主任分别由日本人担任，共有特务77人。伪旗公署表面上由中国人出任旗长，但直接受日本指导部的管辖，各项大权由日本人操纵。为防范群众的反满抗日活动，还在各区、乡陆续成立了伪区、乡公所，设守备队和警察大队。大城子、山咀子警察署又设教习所、讨伐队、特搜班、挺身队、侦谍组等。同时建立所谓的“协和”机构。区、乡下又设保、甲，网罗地方上的恶霸、地主、豪绅、土匪、流氓、无赖为爪牙和走狗，残酷剥削奴役中国人民。

在政治上，日伪不断强化统治手段，收缴民间武器，不准民众谈论国事。动辄抓所谓的政治犯、国事犯、思想犯。监狱、矫正院、拘押所等人满为患。对所谓的“犯人”施以捆绑、吊打、电击、炮烙、狼

狗咬、老虎凳、坐飞机、蹲木笼、插竹签、披麻带孝等种种酷刑，有的还被挖眼、割舌，进行活体解剖。为了在精神上统治喀左人民，日本侵略者还组织“道德会”、“协和会”，鼓吹并灌输“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思想，并把其写进各级学校教科书中。以“日语”为“国语”，强迫中国人称“满洲人”，取消中国历史和地理科目，教师上下课必须用日语发口令，逼迫在校学生背诵满洲国的《皇帝诏书》和《国民训》，唱歌颂日本天皇和日本“武运长久”的歌曲，竭力摧残中华民族意识。在文化上普遍推行奴化教育。如1942年在南公营子设立的热河省毓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就由日本人金森第三充任校长，日语被列为主要课程，每周一朝会，均举行升“国旗”、唱“国歌”、读“诏书”等活动。政治上的高压，思想与精神上的钳制，使喀左各族群众饱受奴役与侵害。

在经济上，日伪当局对喀左的剥削掠夺也逐年加重，设立了“兴农合作社”、“棉花株式会社”等机构，强迫民众交“出荷粮”。实行“民生集谷”、“催棉出荷”等，不断催要各种捐税。税捐种类名目繁多，税率不断上升。从1933 — 1945年，日伪在境内共搞了四次战时大增税，各种苛捐杂税多达40余种，人民税负空前加重。并向民众征收和摊派牛、羊、皮革、钢、铁以及干草、干菜、杂毛等各种物资上百种。实行所谓的“配给制”，配给的物资质次价高。规定第三等人(中国人)不能吃一等人(日本人)才能用的细粮。广大民众只能以配给的掺有沙子并发了霉的粮食来糊口，勉强维持生计。1940年，日本侵略者还搞了一次“蒙地整理”，即所谓的“蒙旗土地奉上”。强迫蒙古王公贵族把自己封建领地的大部分奉献给溥仪，由伪热河省给予一次性补偿。奉上补偿及租金补偿全部存入伪当局银行，所生利息交给旗蒙民裕生会(实质上不过是一个许存不许支的特殊金库)。通过蒙地整理，日寇巧取豪夺，搜刮了巨额财富，数以千百亿元计的蒙汉人民的汗水、膏血偷偷流入了日寇的“血库”。为了加强经济侵略，毒害中国人，日伪当局还强迫百姓在境内种植

罂粟,收缴烟土,并在大城子设立了专门经营鸦片的“组合”——大满号(隶属于承德的“大满公司”),专营大烟,供中国人吸扎。全旗(包括今凌源、建昌一部分)种罂粟549934亩,产鸦片1700多万两,烟毒遍及城乡市场,给群众带来了极大危害。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境内资源,每年从境内抓去大批劳工,被送往北票、抚顺等地矿山,劳工多被折磨致残致死。为了满足其军事侵略的需要,还在境内实行募兵制。根据伪《国兵法》规定,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年满19周岁的男性青年,检查合格者征为“国兵”,服役期3年。由日伪当局分配募兵数额,并按人口比例在一定区域内,选一定数量的壮丁。到1941年,境内共征4期伪国兵,检查不合格者一律编为“义勇奉公队”、“勤劳奉仕队”,强行从事修道路、机场等劳役。

在日本侵略者法西斯式的高压统治和残酷剥削下,喀左境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日伪特务、宪兵、讨伐队等还四处窜扰,杀人放火、抢掠财物、奸淫掳掠,其野蛮行径令人发指。下三家一名妇女被轮奸后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丛家沟一名妇女被日本鬼子奸污,她的丈夫为救她而遭杀害。广大民众人人自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日寇铁蹄下的喀左,成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日本侵略者对朝阳的经济掠夺

一、疯狂的资源掠夺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便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增加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企图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最早涉足朝阳的是英国,据史料记载:民国6年(1917年),英国开始享有京奉铁路关外段的特权,派工程师莫勒,以北票岳家沟和三义栈一带为中心,收买土地75平方华里作为矿区,组织钻探,初步形成了北票矿区。民国12年(1923年),北票冠山煤矿第一座竖井建成投产,英国人开始用北票煤作为铁路机车用煤。民国14年(1925年),经北京政府交通部批准,北票煤矿改为官商合办。这时,日本人已从幕后插手,加入资本。最后,日本人把英国人挤出北票煤矿,名为官商合办,实为中日投资。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把东北三省变为它的殖民地,成立了伪满洲国。日寇在东北执行的工业改革,是根据"经济统制"的原则制定的。1932年8月5日公布了《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公开鼓吹"日满经济一体化",规定关东军司令部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统制满洲国的经济支配机构。名义上是日伪合作,实际是听任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摆布。1933年3月1日,公布《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进一步实行经济统制。1934年6月28日,满洲国政府奉关东军司令部的旨意,发表了统制东北产业的详细说明,把东北企业分为三类加以统制:1.公营或特殊会社统制的经济事业,包括铁路、银行等22个行业;2.经政府许可的经济事业,有汽车工业、毛棉纺织业等24个行业;3.自由经营的经济事业,有自营的农

牧业、制糖、面粉工业等 20 个行业，名义上允许自由经营，但在生产与销售等重要环节实行严格控制。日伪于 1937 年 5 月又公布了所谓《重要产业统制法》，凡属国防方面或国民经济重要产业，都在统制之列。可见，“经济统制”的目的，是使被占区的工矿业完全附属于日本的经济体系，以实现其“工业日本，原料满洲”的殖民主义经济政策。朝阳地区于 1933 年被日寇占领后，工业经济彻底沦为殖民地经济，民族工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一是以合办的形式侵吞资本。日本帝国主义对占领区的工矿业，大都采取合办的形式，大量地吸收中国人的资金。这些企业表面看是合办，实际上完全由日本的资本所操纵。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合办的形式，一方面壮大了自己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削弱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可谓“一箭双雕”。这是日本侵略者为达到掠夺中国资金、人力和自然资源，垄断中国工矿业的目的而设下的一个大骗局。据史料记载，伪满大同 2 年(1933 年)，北票煤矿被“满洲国”实业部接收，成为日满合办，改称“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后又并入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据 1940 年 4 月 30 日的资料记载：建昌县和尚房子铅矿、金银矿，大屯的石棉矿，丛杖子的硫铁矿、锰矿都被新京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占有；鸽子洞的重晶石矿，被奉天若松叮番地宇都岩占有；建昌的冰沟煤矿、朝阳县东五家子的黄金矿、长茂河子的石棉矿、瓦房子的锰矿等等，都被日本人用合办的形式给掠夺去了。其中，日寇疯狂掠夺朝阳县东五家子黄金资源就是一例。朝阳县东五家子乡地下埋藏着金、银、铜、铁、钨等矿石，其中最多的是黄金矿石。早在清末光绪年间，就有位徐道台在这里采金。那时的采矿方法还很落后，据老年人讲：用提水的方法，即上百人分两列，从井口到井底排长队。一队人挨人手接手地从井底往井上传送盛满水的水桶，再由另一队将空桶传入井底。如此往复循环，控制井下水位。那时，采取矿石的工具也是笨钎笨镐，所掘下之金矿石，也是用人从井底往地面背。选矿及冶金方法是：用毛驴拉碾

子，将矿石粉碎成细沙状，再将粉沙放入特制的浅平槽形、有一定坡度的木板上，一边从上方注入适量的水，一边用小笤帚从上部来回横扫，将砂石成份漂走，使黄金砂粉留下来。然后再将金砂粉放入特制的小碗形容器内，以高温熔化成金锭。那时的采矿冶金方法虽然很原始，据说也曾有过日产斤金的记录，可见矿石内含金量之多。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经过先后几次勘测调查，决定在这里开采金矿。遂将东五家子村名改为“宝兴村”。开矿的日本人姓建元，据说是一名日军中将，在日俄战争时失去一臂，因而外号叫“缺胳膊”。他当时不仅在朝阳东五家子开金矿，据说还在北票、建平等许多地方开了矿。

1935 年秋，庄稼还没十分成熟时，金矿买下了东五家子村蒙古族宫姓的村南台土地约 50 亩，带青割倒庄稼，修建办公及住宅房屋，并在五家村东沟修起制炼所、分金所、修配所和发电所等。制炼所为四层楼式的建筑，当地人叫它“大楼”。“大楼”附近设有分金所、修配所、发电所，皆为砖石结构之平房。

当时金矿全名叫“热河开发东兴公司株式会社”。办公及住宅区建房 200 余间。在这 200 余间房屋中，大部份是日本人及朝鲜人之住宅及仓库。办公各系(科室)仅占房十几间。可见当时行政管理人数之少。办公室分财务、测量、采矿、制炼、庶务等系。还设有警卫及车队等。

“东兴公司”第一任经理叫森跃雄，是日本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942 年到 1943 年之间的经理姓前田，他满脸紫黑色胡茬，故而外号叫“紫不溜丢”。财务系主任姓山本，外号“大狗熊”。管仓库的负责人姓野田，仓库管理员叫松本。测量系负责人姓平井，年轻的测量员叫星明。星明对中国人很要好，他耐心细致地教中国青年学测量学、制图。后来他被征兵入伍，他和许多中国青年流着泪话别，并坚持通信有一年之久。管吃喝等后勤工作的姓后滕，管采

矿的姓山畸，管制炼所的姓山内。在这些管理人员中，还有姓版上、姓少仓、姓久井的、其中有个青年叫中谷明。

当时有朝鲜族几十人，他们的工作和待遇比中国人好，比日本人差。在众多的中国人中，唯有中国人翻译梁益三和发电厂负责人田子亭能和他们相比。打更的是一名在当地警察分驻所被革职的翟警长。日本人最多时到过四、五十人，矿工有四、五百人。金矿坑口有东大槽、北沟、白石砬、小塔子沟等处。每处坑口均有三四个日本人轮流值班，每坑都设有中国人当工头，下有约100名工人。南山矿坑口开始是满铁公司开采的，地点设在杨家沟。满铁对一切经营管理较紧，当地人叫它“小店公司”。后来满铁把南山坑口卖给了东兴公司，东兴公司将坑口买到手之后，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在那里继续开采。

日本人在东五家子开矿，先后有8年时间，据估计能掠夺走黄金约1000斤。

二是实行“适地适产主义”原则，疯狂掠夺资源。日寇对占领区的经济进行残暴的掠夺，在工业方面，按照“适地适产主义”的原则，使占领区的工业完全附属于它本国的经济体系。在朝阳地区日寇主要是掠夺矿产资源。为了掠夺北票煤矿资源，除了侵吞资本以外，还于1938年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地盘育成法”。其中规定：北票炭矿周围农村年龄在18—55岁的农民，都必须到北票炭矿当义务劳工4个月。除此之外，还从外地抓来大批劳工为之卖命。根据记载，从1933—1945年，共招骗劳工56530人。日本人不顾矿工的安全，不讲作业规程，勒令矿工拼命生产，明知会发生事故，仍迫令工人下井作业。有时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矿方以保护矿坑为由，强行把井口封闭，制造大批工人死亡的惨案。据资料记载：从1934—1945年的11年里，北票煤矿发生的22起重大伤亡事故，共死亡矿工达485人。日寇还用封建把头强制对矿工进行监督管制，不许工人三五成群地谈话，矿工经常遭受把头的毒打。日寇对

矿工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的工资很低，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毫无保障。每当发下工资时，大小把头还要从中克扣，每月到工人手中的钱，所剩无几。由于日寇的残酷压榨，把头的克扣毒打，矿工死亡特别严重。据资料记载：从1934—1945年的11年里，北票煤矿的矿工被折磨致死的达31200人。日寇在北票制造的“万人坑”有5处，其中台吉南山“万人坑”占地17000平方米，已挖掘出6500多具死难矿工的遗骨。从1932—1945年的13年中，日本人从北票煤矿掠走优质煤860多万吨。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日本人在北票所采取的是“人肉开采”政策，铁证如山。当时在东五家子采金的工人达400多人，在长茂河子石棉矿的工人达300多人，在瓦房子锰矿的工人最多达800多人。这些工人在日寇的压榨下为其效劳，朝阳地区大量的矿产资源被日寇掠走。

三是掠夺原材料，排挤民族工业。日本殖民主义者采取军事管制、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方式，把占领区较大的工业都掠取了。而对较小的工业，又进行疯狂的压榨和排挤。主要的方法是控制原材料。他们先后公布了《米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小麦粉专卖法》等。对粮食的收购、加工、买卖均由国家管理。与此同时，还实行了“油料统制”、“棉花统制”、“鸦片专卖”、“烟草专卖”等。建昌县是主要棉花产区，要求农民种的棉花要全部交给兴农合作社。棉花秸上的皮，也要扒下来交官。农家的“纺车”、织布机都在捣毁之列，不许农民自纺、自织、自穿、自用。仅康德3年(1936年)，日寇就从建昌县掠走价值3.6万元的棉花和价值22万元的粮食。把原材料交给日寇，他们生产出棉布以后再“配给”中国人，实行野蛮的压榨。由于日伪对原材料的“统制”，致使朝阳的一些民族工业破产倒闭。据《凌源县志》记载：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凌源有工业88户，到伪满大同2年(1933年)仅剩32户，从业人员仅为41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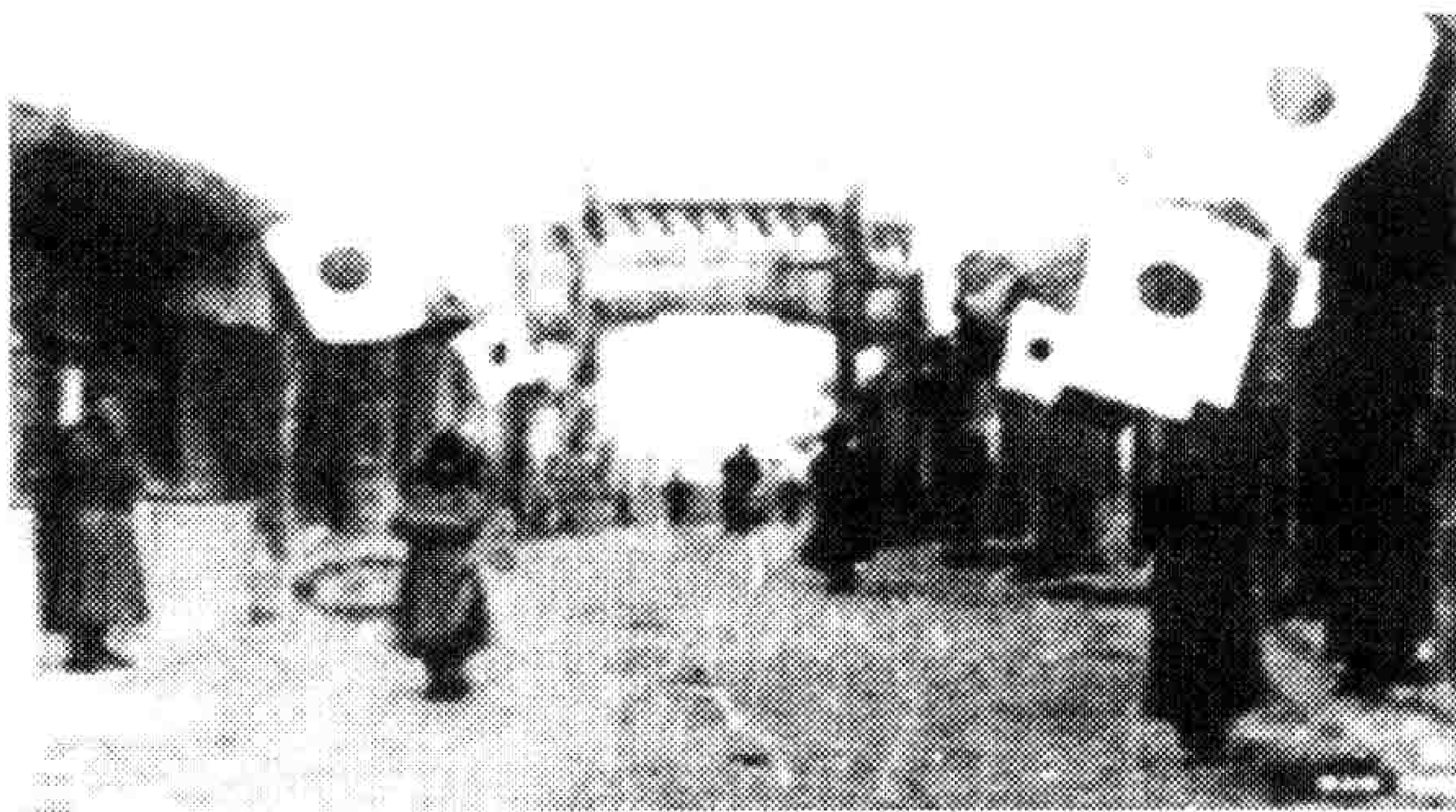
二、残酷的垄断经营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1933 年 3 月，日寇侵占了朝阳。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日满经济一体化”，残酷地掠夺朝阳资源，大力倾销工业产品，使朝阳经济不仅成为日本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倾销“过剩”商品的市场。

日寇占领朝阳之后，朝阳私人资本主义商业一直处在被统治、被垄断的状态之中。日寇的垄断手段主要是：

一是制定统治法规，实行政策垄断。日寇为了在国际市场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争霸，凭借东北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力量的优势，进一步向远东扩张其贸易势力范围。在经济政策上要求伪满洲国以确立“日满经济联系体系”为最高指导原则。民国 22 年(1933 年)，伪满政府根据这一原则和日本政府的指令，制定一个所谓“满洲经济建设纲要”，规定各种主要经济部门必须加以国家的统治，所有重要的经济事业要分类列入“统制”或“半统制”的范围，由日伪政府直接经营、监督经营或特许的公司经营。同时，还设立“专卖局”和农产品收购机构，强制农民将粮谷按官定的价格和数量出售给日伪收购机构。1941 年又专门设立了所谓“专卖统制”、“特殊会社”(独占企业)、“输入联盟”和“统制组合”等统治机构，并施行《产业经济基本计划纲要》、《物价物资统制法》、《贸易统制法》、《汇兑管理法》等，把中国商业所经营的品种无所不包地列入“配给”范围之内，取消了买卖自由。民国 22 年(1933 年)，凌源在日寇殖民统治下，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据《凌源县志》记载：县城工商业民国 20 年(1931 年)的 300 家减少到 82 家，其中有杂货业 36 户，药业 7 户，果子铺 6 户，粮食业 12 户，铁匠炉 4 户，烧锅 5 户，油房 2 户，木匠铺 4 户，染房 5 户。

二是大力兴办商行,实行企业垄断。日寇侵占朝阳后,大搞经商活动,在中央大街、南大街、北大街等繁华街道兴办洋行17户,年销售额131.5万元,控制大商号50余家,相互竞争,实行企业垄断,排挤民族商业。在17户洋行中,既有经营白面、糖酒、文具、化妆品、洋品百货的,又有经营食杂、饭店、器皿和煤炭,就连新闻杂志、酱、油、醋等类物品也不放过经营。比如日本人古田秀颜在中央大街开办的"关东洋行",主要经营食杂和金物类;冈夫政夫在南大街开办的"泰信洋行",主要经营白面、酒、煤等;六股德志、井村一雄在关岳街开办的"大信洋行",主要经营白面、糖和胶靴;还有山田君三郎、植田新平、滕野、旗深、中田广志、竹村秀太郎分别开办的百货店、饭店、洋货店、荞面馆等,广布朝阳城内大街小巷。他们通过这些洋行企业,既控制当地民族商业的发展,又控制居民生活的需要,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流通垄断。当时,朝阳城内民族商业中一些较大的商号,皆被日寇控制,小店铺处于半开业状态,日趋萎缩。到1940年商号已减至175家。建平县最大商品集散地杜镇,各种商业店铺也由76家下降到10余家。



日伪时期的朝阳城

三是大量输入日货,实行商品垄断。据《满洲国外国贸易统计年鉴》记载:1932—1937年日本输入的商品价值,从1.83亿元增加到6.27亿元,5年增加2.5倍;关内输入的商品价值,从6110万元下降到3932万元,5年减少了1/3以上。据1933年《关于日本在北满商业进展的报告》称:"自日本对外汇率降低后,日货倾销全满,极

为活跃，各种货无不有日货挤在其中。今后北满市场将为日本商品所独占，他国货物不出数年，即要为日本商品所排除。”事实正是这样，日本人开设的商店如雨后春笋，在朝阳各县发展起来。日货充斥大小商户柜台，日商几乎独占了全部大企业和批发商业，掌握了朝阳全区的商业经济命脉。特别是1940年，伪满政府公布《物价物资统治法》和《价格等临时措置法》以后，全部商品价格以7月25日为准，一律不许上涨。规定：棉布、花纱、食盐、火柴、粮米、油料等人民生活必须品全部由日本人经营，限人限量“配给”，使民族工商业日趋萎缩。

四是建立日伪金融机构，实施金融垄断。“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朝阳。伪满洲国财政部决定，由伪满中央银行清理和接管兴业银行，实行经济、金融统制。1933年3月，建立伪满中央银行朝阳、建昌办事处，9月1日又分别改为支行。1935年4月1日，建立北票办事处，次年7月1日又改为北票支行。伪满洲国是日寇的傀儡政权，满洲中央银行完全由日本人控制。1933年11月伪满政府公布《银行法》，强行整顿民族金融。朝阳地区民国期间的14户私人钱业，只保留1户，并在资本构成及金额上严加限制。规定不准独资经营，一律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不得少于10万元。这实质是把民族资本纳入殖民地金融体系，成为日伪的附庸。

伪满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共发行纸币、硬币9种。同时，对民国时期流通的货币进行收兑，支持日寇独占东北金融市场；建立殖民地金融体制，实施“货币一元化”、“金融汇兑化”，为日本垄断财团输出资本，为建立殖民地经济铺平道路；通过反动政策法令积聚存款、垄断放款，强迫摊派储蓄、公债，并独霸占领区经济、资源。据资料记载：1939年12月末朝阳、北票、建昌3县储蓄余额为2340206元，从储蓄开办到日寇投降前，储蓄任务增长11倍，占国民总收入的46.2%；强迫发行公债56种，还颁布了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公开敲榨勒索广大民众；推行反动的“金融统制”

办法，强制汇兑管理，垄断金银、外汇，摧残民族金融事业，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在伪满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中，为掠夺更多的农产品，又制定了《兴农金库法》。1943年撤销了伪满中央银行的各县支行，改建兴农金库，是农村金融的专业银行，人员由伪满中央银行移入。其主要业务是专管农村金融，主要为兴农合作社、拓植会社、农产会社、粮栈组合、棉花会社、烟草会社、亚麻农社等机构融通资金，对制造水产农具和产品加工等资金需要，亦予以供应，以适应“出荷”计划的要求。

总之，从日寇侵占朝阳地区后，民族金融业被纳入了殖民地的金融体系，直到日寇投降后解体。

日本侵略者对凌源的经济掠夺

日本侵略者占领凌源后，对凌源人民实行全面统治，血腥镇压：实行了“保甲法”、“甲牌连坐”，发放“国民手帐”、“良民证”、“身份证明书”，实行“国民邻保组织确立纲要”，并强迫人民群众交纳“出荷粮”、“大烟干”、“国防献纳金”以及当劳工、付捐税。伪军、警、宪、特还可随便抓人，实行“思想矫正”，进而制造“无人区”和集家并村，肆意杀害无辜百姓和抗日群众，并实行了疯狂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妄图扑灭人民抗日烈火。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掠夺，更为残无人道。

在经济方面，日本侵略者首先施行了“粮谷出荷”、“粮食配给”、“棉花统治法”、“米谷管理法”、“特产品专管法”。简言之，就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都不许自己处理。违者，以“经济犯”论处。

首先，日本侵略者强迫农民交“出荷粮”。当时，凌源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每亩地平均产 2 — 3 斗粮(每斗 40 市斤)。交“出荷粮”的标准是：有地 1 亩至 50 亩者，每亩交 50 市斤；50 至 100 亩者，每亩交 72 市斤；100 亩以上者，每亩交 90 市斤。不管年成好坏，秋后必须按规定标准数交粮。为使“出荷粮”按时按数入仓，伪警察、青年团还逐村逐户督催要粮。对晚交或拖欠交粮者轻则吊打，重则关押。当时全县共有(包括建昌、喀左)耕地 2628720 亩，按平均每亩地交纳 30 公斤粮计算，每年要交“出荷粮”78861600 公斤。再留出种籽和畜用粮外，农民所剩之粮，只能够维持半年。广大人民群众虽是种粮人，但在日伪统治时期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其次，日本侵略者制定的捐税名目繁多。到 1945 年时，全县直

接税和间接税计有37种。地亩捐已由每亩0.40元增到0.70元,加上甲牌费、公馆小费等,种1亩地每年需要纳税1.20元钱。饲养牲畜要纳捐,养1匹马纳捐8.00元;1头牛纳捐2.00元;每头猪、羊纳捐1.00元;每只鸡一年交50个蛋。此外,还按户征摊棉花秸、血干、杂毛、碎铜铁等,没有实物要摊钱。为了多征捐税,还普遍施行经济调查(即估家底)。如:对房屋、土地、林果等按估价征税17%。更可恨的是还按户要子弹,每户要3枚,没有子弹交钱,限期交出,到期不交,轻则毒打,重则坐牢。生活日用品,日本侵略者强令实行"配给"制(即定量分配,按量购买)。每人每年配给10尺"麻线布",对火柴、火油、"配给"的更少。无论冬、夏,家家用火盆埋火,现用火临时吹,晚上很少点灯照明。配给的食盐不足,山区人民把野菜、树叶糟酸了下饭吃。此外,日本侵略者为毒害中国人民,又强迫农民种大烟,按地亩交纳大烟干。他们用低价收购,再高价售给有大烟瘾者。据资料载:民国16年(1927年)全县种大烟47199亩,到1934年,凌源人民被迫扩种大烟达到218906亩、是民国16年的4.6倍。1934年凌源城内有35个"鸦片零卖所",83户私人烟馆,全县有烟瘾者占总人口的13%。交纳"禁烟税"109453元。由于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使凌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者对建昌的经济掠夺

日伪时期，建昌县的经济全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起来。

对粮食实行《粮谷管理法》。1938起11月公布该法，对稻谷、高粮、玉米、谷子等由满洲国统一收购，名曰："出荷粮"。农民不得自由买卖和贩运，违者判3年以下徒刑或1万元以下罚金；1939年12月又公布了《小麦粉专卖法》，规定面粉加工、买卖和贩运统由国家管理，私人不准经营；1940年9月公布《特产物专管法》，规定对油料及油料加工、粮食加工，一律由国家管理，油料和粮食的产品和副产品，由国家统一管理，私人不准买卖和贩运，违者判刑或罚金。

粮食和油料，统由各地的"兴农合作社"和"粮谷组合"专管。

种鸦片烟的农民除按地亩交鸦片税外，所产的大烟干一律交日伪当局设的收购部门，不得私卖。吸食鸦片的人，按供应指标定期去管烟所购买。

建昌县是棉花主产区，农民种的棉花要全部交至兴农合作社，连棉花茎上的皮也要扒下来交官。产棉区农民原有的轧棉籽的机器和弹棉花的弓，都被日本侵略者捣毁。妇女纺线的纺车和织布机，都在捣毁之列。不准棉农自纺、自织、自穿、自用。日本侵略者将好棉花都运走，将代用品纺织的布和纤维布配给棉农，棉农敢怒不敢言，气愤的将日本配给的布叫"洋鬼子皮"。

矿产资源和开发权，全部被日本侵略者垄断。据1940年4月30日的资料记载：和尚房子铅矿、金银矿，大屯的石棉矿，丛丈子的硫铁矿、锰矿都被新京满洲矿业开发株式会社占有；鸽子洞的重晶石，被奉天若松叮番地宇都岩占有。康德10年2月25日，该矿

石又被白井德二郎所占有;冰沟煤矿负责人虽是徐瀚如,但说了算的是日本人岗任总次。

日本侵略者为了筹集资金,满足战争的需要,又制定了很多捐税法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如:所得税、多种消费税、流通税、砂糖税、家属税、交易税、特别卖钱税、矿区税、门户税、屠宰捐、车捐、小肠捐、地税附加捐、不动产取得捐、畜犬捐、佣人捐、接待捐、木材捐、出产果实捐、地皮捐等等,各种税捐多如牛毛。

1942 年 6 月又公布了《勤动奉仕法》,凡是不被应征入伍的壮丁,都编入勤劳奉仕队,分批分期到各地去筑路,或到工厂去服劳役,或到前线去修工事。吃的是粗粮,干的是重体力活,日本人稍不如意,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实际使用的是无偿的劳动力。

日本侵略者掠夺财物,是通过当地旗政府进行的。旗政府下设公安局、警务科、农务会、农矿股、实业股、兴农股。各地设的兴农合作社,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物产的具体办事机构。当时,建昌县兴农合作社的社长,由旗长默尔广额担任,副职都由日本人担任,理事长是佐佐木仁,理事是静野村夫,实际是副职说了算。各乡镇有警察署的地方设兴农合作分社,主事和司事一般均由日本人担任。如:建昌县分社负责人是大井常人;药王庙分社负责人是长本胜;和尚房子分社负责人是平山茂;建昌农产物交易场负责人是大井常人。

日本侵略者通过所设的各种机关、依照各种法律掠夺建昌的财物无法计算。据记载: 1935 年牛营子村 12000 亩地,应交捐 2233 万元,实收 2791 元;1936 年建昌输出棉花核 36000 元(实际上,棉花全部输出);输入日本纺织品 71000 元,输入国产纺织品 25 万元;1936 年粮食输出 22 万元,输入 8 元,其中大米 47000 元,供日军食用;1934 年征收鸦片税 197000 元,1935 年则征收 113000 元,1936 年征收 175000 元,……。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从建昌掠夺去多少财物,详细数字无法计算。

民族仇恨的铁证——北票煤矿万人坑

北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民国时期属热河省。北票煤炭资源丰富，清代以前就有民间用土法采掘，清末民初，开始小规模开采。北票煤矿的煤质结构致密，呈玻璃光泽，黏结性强，发热量高，含磷、硫成分极低，是炼焦、动力和化工的优质原料。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前的北票煤矿为官商合办，称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官股为京奉铁路局，商股60%为民国政府军政要员如张学良、徐世昌等及银行家如胡笔江、蒋旭庄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京奉铁路关外一段亦被侵占，改称奉山铁路局。当时，北票煤矿是热河境内最大的煤矿。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日本从北票掠夺优质煤炭860多万吨，同时造成3.12万多矿工死亡，在北票留下了5处较大的万人坑。

一、日本侵占北票煤矿

日本侵略者对北票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已垂涎三尺。早在侵占北票前，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即会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北票煤矿作过调查，并在《北票煤矿现状调查》一文中对北票煤矿的现状及前景描绘得相当详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3年2月进攻热河，2月21日上午11时，关东军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逼近北票，守军汤玉麟部队不战而退。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反抗，但势单力薄，22日上午9时，早川部队在飞机、坦克、装甲车、骑步

兵配合下攻克北票县城。从此，北票煤矿沦陷为殖民地，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广大劳工饱尝了被迫害、盘剥、压榨的奴役之苦。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一方面是为扩大其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为掠夺煤炭资源。侵占北票煤矿后数日，关东军即从日本国内招聘石松真一郎等38名职员来北票煤矿就职。接着即一面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的矿业权，一面着手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冠山竖井在“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停产状态)，日本侵略者掠夺北票煤炭的迫切心情由此而知。

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矿业权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在1933年3月初，即侵占北票煤矿后十几天，日本关东军即授意奉山铁路局协同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接管北票煤矿，强令解散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第二步，同年8月，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德田大佐以参谋长小帆的名义宣布奉山铁路局的股份(实为京奉铁路局的股份)不实，失效，解散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并根据日满双方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享有筑路、开矿特权的协定，由日本关东军大崎中佐为日方代表，与伪满洲政府签订协议，成立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日方万表片仓出资，满方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资，日方万表喜藏任总经理，由日方直接经营。之后，原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商股中政府官员和银行家的股份多被判为“逆产”，予以没收；商股的另一部分股份，则以“煤炭由国家开采”为由强行低价收买。

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了北票煤矿的矿业权，为疯狂掠夺北票煤矿煤炭创造了条件。侵占北票后第二年的1934年，即从冠山竖井掠夺走煤炭27万多吨。这当然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婪胃口。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了《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提出关于国防上需要的产业，要实现自给自足，“特别要集

中力量开发铁、煤、石油、电力等基础产业”。随之制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也把煤炭生产放在了重要位置。为适应这一要求，北票炭矿于 1936 年 10 月在三宝开凿调查斜坑，开始扩大掠夺范围，建设新矿井，增加煤炭产量。1936 年和 1937 年，先后成立三宝开发事务所和台吉开发事务所(新建坑口投产后改为三宝采炭所和台吉采炭所)，开发三宝、台吉两新区。1937 年至 1939 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开工建设，1939 年至 1941 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建成投产。一对坑口从开工建设到建成投产，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6 对新坑口建成后，年增加生产能力 100 万吨。



位于北票市台吉南山的日伪统治时期北票煤矿死难矿工墓纪念碑

日本侵略者从北票煤矿掠夺的煤炭，多用于制铁业，为它们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资保证。据日本《战时石炭构造论》一书记载，仅 1933 年到 1936 年 4 年间，供给日本制铁和昭和制铁的北票炭矿的煤即达 93 万多吨，几乎是北票炭矿这 4 年产煤量的全部。

在北票煤矿，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掠夺式”开采，夺肥扔瘦，乱采乱掘，不仅在当时致使瓦斯爆炸、透水、发火等事故频繁发生，

给劳工带来诸多灾难，而且严重破坏了煤炭资源，给以后开采带来很多困难，造成很大损失。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少投资、多出煤，只拣厚煤层采，而把薄煤层丢弃不采，斜坑、坑下主要运输巷道布置在厚煤层和煤层群中间，不顾薄煤层的开采；另一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房式、柱式采煤法，这种采煤方法虽然出煤快，但回采率却很低，只在50%左右，致使800多万吨煤炭资源丢弃于坑下。由于日本侵略者采取的"掠夺式"开采，给以后开采带来许多隐患，致使解放后开采时，瓦斯、冒顶、透水等事故防不胜防。

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成立时，即建立了较庞大的组织机构，之后又多次改组，逐步扩充，日益庞大，法西斯高压统治逐步强化、升级。到1943年3月，隶属伪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改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时，组织机构也随之庞大到极点，下设2部、10课、2所、1院、54个系(包括同一级的科、所、场等)，另有冠山、台吉、三宝3个采炭所，3个采炭所又有26个系，上下有100余个部门。其中的防卫部，原隶属庶务课，称矿卫系，后升格至炭矿直属的部，下设本社防卫队和冠山、台吉、三宝3个防卫队，人员由30多人增强到近400人。防卫部的任务为：调查劳工中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在各出口、材料场、工村站岗放哨；押送"特殊工人"入坑升坑等。1943年，由锦州派遣来的宪兵队，有宪兵、密探、翻译30多人，在各课、系、坑口建有情报网，并与当地旗公署警务科、协和会、火车站等有直接联系，任务是侦察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了解劳工尤其是"特殊工人"的思想动向，秘密检查邮政局的函件、电报和到工村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可疑分子等。宪兵队设有刑讯室，备有捕绳、锁链、手铐、脚镣、刺刀、皮鞭、电椅子、老虎凳等刑具。防卫部和宪兵队，有抓捕、刑讯以至处死劳工的特权，是镇压、迫害、摧残劳工最严厉、危害劳工最严重的两支持枪武装。加强防卫队，增设宪兵队，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而又不许劳工反抗的目的一览无余。劳务课，负责招募、采用劳工；雇员计工、考勤；员

工生活管理；工村家属及独身寮(即宿舍)管理；公私伤处理；另设移动防止班，在工村要道、附近村头设有暗哨，防止劳工逃跑。劳务系有 890 多名员工，大多经过侵略者选拔、培训，效忠侵略者，打骂劳工，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盘剥、奴役劳工的得力工具。

随着掠夺煤炭日益疯狂，新坑口陆续开工、投产，所需劳工日渐增多，招募劳工成为迫切问题。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募劳工有四种手段，就是招、骗、抓、派。以时间为序，开始主要是招，中间则招、骗、抓并用，后期是强制摊派。从 1933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共招、骗、抓、派劳工 5.6 万多人次，因而使北票炭矿在每年有劳工大量减员的情况下，劳工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一招。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初的两三年，只有冠山竖井生产，所需劳工为数不是很多。资料记载，1933 年仅有 1000 余人，到 1936 年，也只有 3000 余人。每年增加劳工 700 人左右，可以靠大柜把头去招。方法是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的督导下，由大柜把头在北票附近各县或到大柜把头家乡去招，即可满足需要。到 1936 年，虽已扩大掠夺范围，向东西两翼扩展，东部开凿三宝调查斜坑，所需劳工，还是大柜把头倪维章及其弟倪福臣，在三宝开拓事务所配合下，从河北遵化招来 200 多人，解决了斜坑开凿所需的劳工。从 1937 年起，三宝一坑、台吉一坑相继开工建设，所需劳工随之增多，加之劳工逐年死伤，不断减员，只靠大柜把头在附近招或到其家乡招，已难满足需要，又加上附近农民对北票炭矿恶劣环境已有所闻，即使再穷也不愿来这儿卖命，日本侵略者、把头只好把眼光放远些，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去招。为此，北票炭矿在济南、青岛还建立了 2 个出张事务所，作为招劳工的落脚点。

日本侵略者为更多、尽快地招到劳工，制定了鼓励政策，多招到劳工，可在“手当费”、“安家费”等项多得到报酬，刺激了大柜把头的积极性，争相多招募劳工，多拥有劳工。台吉一坑开工后，大把

头宋玉见是个机会，亲自给开发事务所日本所长山本送了200元钱的礼，请求协助招劳工。在山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即白得一笔不算小的钱财，又可保证建矿井任务的完成，何乐而不为，于是亲自出马，协助宋玉去一次河南，又去一次江苏，两次招来劳工600多人，保证了台吉一坑建设工程的如期竣工。各大柜把头竞相招劳工，劳工人数增加很快，宋玉、费先等大柜的劳工很快由300多人增加到上千人。1937年末，虽又有一批批劳工死伤，一次次减员，北票炭矿劳工人数还是增至5400人。

二骗。骗是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劳工的一种手段。他们是招中骗，骗中招。每当急需要大批劳工入矿时，一帮帮、一群群大柜把头、书记、查头子、劳务课系人员，由日本职员、系员领队，打着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招牌，摇着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扯起嗓门，到处游说。话说得很响，很动听，如说到北票炭矿做工如何好，挣钱如何多，吃的大米、白面，住的高楼、洋房；还有一些许诺，如可以带家眷，有安家费，保证有住处等。这一套欺骗性宣传是很迷惑人的，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应招到了北票炭矿，见这里如人间地狱，完全不是说得那样，才知悔之晚矣。

1941年，三宝二坑建成投产，需要增加劳动力，大把头之一的倪维章与绥中地方官员相勾结，用欺骗性宣传，将1000多名渔民骗来北票炭矿当劳工。

日伪时期在冠山竖井当童工的张福才说，他家住河北蓟县，日本侵略者大搞“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一家人只好外出逃荒，逃荒途中，遇上北票炭矿招工的把头，把北票炭矿说得人间天上，说你们逃荒没有出路，不如跟我们去挖煤，保你全家能过上好日子。他父亲被说动了，带领全家同一块招来的100多贫苦农民来到北票炭矿。

三抓。伪满洲政府曾就此制定过一系列法规，采取过一个个措施，北票炭矿的侵略者不甘坐等，在继续招、骗不能满足需要的情

况下,采取了更野蛮、更凶残的手段,那就是"抓"。日本侵略者抓劳工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渠道:一是从"集家并村"中抓。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开始,在绥中、北票、朝阳、凌南、凌源、平泉和承德一带搞"集家并村",以阻止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北票炭矿的日伪统治者趁火打劫,乘"集家并村"之机,大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在"集家并村"的3年中,被强抓去当劳工的有2500多人。1941年夏天,在榆树台部落一次抓来青壮年劳工几百人。在朝阳董家店乡,一年之内抓二三次,每次40多人。二是从"清乡扫荡"中抓。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山东青城、高密、惠民等县及河北任丘、丰润等县的大扫荡中,抓了很多青壮年,押来北票当劳工。1941年,在沂蒙山区的扫荡中,70多名游击队员被俘,因全穿着老百姓服装,日本侵略者把他们和老百姓一起押到临沂,后又用闷罐车押到北票炭矿当劳工,住在冠山"协和寮"。1943年,在山东武定府一带的扫荡中,一次就抓了青壮年500名,北票炭矿派人接来当劳工。三是将战场上被俘人员押来北票炭矿当"特殊工人",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死囚劳工"。从1941年起,石家庄、唐山、兖州的监狱,多次给北票炭矿押送过被俘人员。从1939年到1942年,从石家庄监狱建立的"劳动教习所"先后押送到北票炭矿的"特殊工人"就有4000多人。

四派。派是强行摊派,也称"强行征集",即强迫农民到炭矿当劳工。其主要方法一是"地盘育成",二是"勤劳奉公"。

"地盘育成",就是在本地区内培育成功,即炭矿用的工人,可由炭矿周围的人充当,无需到外地招、骗、抓。提出"地盘育成"方案的是一个日本侵略者,名叫板本登。1938年,板本登由伪奈曼旗公署调到伪吐默特中旗公署任职,此人能讲中国话,对中国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可称为一个"中国通"。当他了解到当时冠山、台吉、三宝多个坑口均在建设和生产,掠夺煤炭数量日增,劳工人数虽已逾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到关内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去招、骗、抓

时，便认为这种用工制度有一些弊端：每年外出招工需付出大量费用，且劳工挣的钱每年要往老家寄，这岂不让大量资金流向“国外”(由伪满洲国流向中华民国)；关内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如招工不慎难免让他们中少数人混入，让他们煽动闹事，破坏采炭计划。如果在炭矿附近招收劳工，不但可避免这些弊端，且便于看管，因为他们的家都在附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怕他们不老老实实在炭矿劳作。

板本登的“地盘育成”方案规定，炭矿用劳工，必须由当地人承担。凡附近之男性公民，年龄在 8 岁至 55 岁者，没有特殊病症的，都有到炭矿当劳工服役的义务，每年 4 个月，期限为 3 年，期满发给证书。“方案”经伪满洲政府兴安局批准，1939 年在北票炭矿试行，试行结果，伪满洲政府兴安局认为是个成功之举，指令全满炭矿到北票炭矿学习，并于 1941 年在全满炭矿推广。吐默特中旗公署和板本登本人还受到“传令嘉奖”。

推行“地盘育成”后，吐默特中旗公署内成立了动员科，北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改为动员系，和旗公署动员科共同负责动员、体检、接收劳工任务。旗公署指令各村公所，对居民进行普查，凡符合劳工条件的，均登记注册上报。每次动员多少，根据炭矿需要确定，由动员科提出动员数额，下达各村公所，然后由旗公署动员科和炭矿动员系共同验收。每年动员 10 次左右，每次动员 500 人左右。

“勤劳奉公”，就是强行征集征兵剩余的适龄壮丁，组成所谓的勤劳奉公队，和服兵役一样，从事为期 3 年的义务劳动。这是伪满洲政府“国民皆劳”政策具体实施的办法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办法之一，是“紧急就劳”、“行政供出”的具体化，“供出”即被迫出卖，即群众说的派劳工或者说是抓劳工。1942 年 11 月，伪满洲政府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接着又下达了《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勤劳奉公制度在伪满洲国全境执行。

“地盘育成”和“勤劳奉公”这两项强行征集劳工制度，给日本

侵略者使用劳工、掠夺煤炭创造了方便条件,比原来使用的招、骗、抓省力得多,容易得多,据《北票煤矿事业史》记载,1945 年 4、5、6 三个月,即接收劳工 4455 人,平均每月接收 1461 人,可见其增加劳工之便。且使用的劳工都是无偿服役,不需给报酬。这两项制度带给劳动人民的却是严重的灾难。

二、北票煤矿 5 个万人坑及形成的原因

日本侵略者霸占北票煤矿,掠夺煤炭资源,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劳工进行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盘剥,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的蹂躏,十数年间,造成 31200 余名劳工死亡,在北票煤矿长 28.6 公里,宽 2.2 公里,总面积不足 63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就有万人坑——日伪时期死难矿工墓地 5 处。这 5 处万人坑内的粼粼白骨,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煤矿,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用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的罪恶行径,记载着广大劳工遭受日本侵略者、封建把头残忍到极点的迫害、盘剥、压榨的悲惨史实。日本侵略者在北票煤矿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抹煞不了的。

1、冠山东山坡万人坑。冠山东山坡万人坑,旧址在今冠山二、三工村所在地。当时是两片山坡,山坡上长满了荆棘和蒿草,下边是农家开垦的熟地。两片荒芜的山坡,面积共 31.47 公顷,下面的熟地为 4 公顷。早在 1933 年前,附近百姓家中亲人故去都埋葬到东山坡上,所以人们称东山坡为“义地”,也称“坟茔地”。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后,便开始掠夺煤炭,迫不及待地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开始招募劳工。由于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致使劳工不断伤亡,东山坡这块“义地”便成了死难劳工的墓地。开始,对死亡劳工还给一口旧坑木制作的薄皮棺材,抬到

东山坡埋个坟丘子,后来,见死的人多了,旧坑木消耗量大,炭矿长便下令用席子卷了埋葬。从此,死亡劳工即席子压面,就差黄土压面了。先是在北面即今三工村所在的山坡埋,埋到没有空地了,越过中间的大沟,往南面即今二工村所在的山坡埋。到1937年初,即相隔4年时间,东山坡从北到南已是一个挨一个的坟丘了。据当年的劳工崔鹏举说,1937年前,冠山只有个一工村,是民国期间建的,住户大部分是劳工,另有几家大柜把头。招来的劳工为外工,独身的住"协和寮",带家眷的住附近民房,再多了就搭个席棚暂时住着。那时,经常死人,累死的、病死的、井下瓦斯熏死的、冒顶砸死的,还有上吊自尽的。有个叫刘生的,一年四季赶着辆大白骡子车,从井口、医院、"协和寮"往东山坡上运死尸。在东山坡至少埋有2000多具劳工尸体。埋的人太多了,所以人们称东山坡为万人坑。

1937年春,北票炭矿劳工人数增加到5400多人,炭矿决定在东山坡盖劳工房,东山坡万人坑劳工尸骨多被迁移到北大墙外。

2、北大墙外万人坑。北大墙外万人坑是在东山坡盖房前就选定了的。这处万人坑形成于1937年春。它的特点是一条大沟,沟长1700米,宽43米,深30米,总面积为7.3公顷。大沟从山洼直通西河套,水流入小凌河。这条大沟距冠山竖井1500米,距围绕井口的北大墙500米,所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大墙外。大沟的上梢是沿沟建的石灰窑,称"王记灰窑",下边是一群乞丐的聚集地,在沟帮上掏成大小不一的窑洞,晚上在洞中宿营。窑洞下边就是万人坑。车夫刘生赶的大白骡子车,车上装劳工尸体,盖张席子,一年四季,往大沟运。他将车赶到沟沿,大白骡子早已习惯,主动拐弯,倒车,刘生解开骡子肚带,一掀车辕子,车上的尸体便咚咚几声滚到沟底。可叹这些劳工,死后无人葬埋,让成群的野狗撕咬、吞噬。野狗吃红了眼,居住在大沟附近农民的孩子无人敢到沟边上玩耍。

长年的山洪冲刷,死难劳工的尸骨一部分被泥沙压在沟底,一部分被冲入西河套,大雨过后,河套里、两岸边淤着横七竖八的尸

骨，白骨粼粼。据当时矿上的技术工人、雇员杨晓锋估计，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1937年3月至1940年6月)，被扔进北大墙外大沟里的劳工尸体少说也有3500具。

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煤炭，在加紧冠山竖井生产的同时，加紧建设冠山二坑(时称南山坑，1938年2月开工建设，1940年6月建成投产)，所需劳工随之增加，死亡率也随之上升，日本炭矿长长久美决定把北大墙外万人坑转移到城子地，原因是冠山二坑死亡的劳工往北大墙外运，需经过窑营、达子营等住劳工较多的村子，太招摇过市，怕引起劳工及家属的反感，影响他们的情绪。这样就把北大墙外万人坑转移到了城子地。

3、城子地万人坑。城子地万人坑形成于1940年，位置在北票炭矿西北2500米的郊区，是一片平坦的沃土良田，规模为1.33公顷。在北票炭矿的5处万人坑中，城子地万人坑最大。这并不是说它的面积大，而是它坑多、坑深，埋的劳工尸体多。曾在北票炭矿当翻译的张凤祥说，每年秋天，在未上冻前，炭矿都雇一些农民挖坑子，一挖就是好几排，一人来深，两米多宽，20米长。这是他亲眼看到的。

蒋化民，北票炭矿的老人，曾经在冠山采炭所"协和寮"事务所干过。他说，"协和寮"是北票炭矿最大的独身宿舍，住的劳工最多，87间房子住得满满的。先来的死了，后来的很快补进来，究竟死了多少，真是不计其数。当年的老工人杨晓峰说，城子地万人坑埋的人最多，主要有三点根据：一是北票炭矿3个采炭所，冠山采炭所产煤最多，劳工最多，死亡的人也自然多；二是"协和寮"独身宿舍的总头目是日本人佐佐木，此人心狠手黑，是个活阎王。被他打死的，电死的，烙铁烙死的，还有装进麻袋摔死的人很多；三是冠山采炭所工人闹了几次罢工、逃跑事件后，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被弄得晕头转向，所以对劳工的迫害逐步升级，逃跑抓回来的，十有九个被致残致死。

城子地万人坑解放后不久即变为耕地，现在已是星罗棋布的建筑物。但经多方调查，经众多目睹者证实，城子地万人坑确实是北票炭矿的一处最大的万人坑，埋葬的劳工尸体当在万具以上。

4、三宝万人坑。三宝，俗称尖山子，距北票市区9公里。这里在未开矿前是个闭塞山沟，地域偏僻，人烟稀少。万人坑因之先后占地三处共达6公顷。这处万人坑的特点是很少挖坑，基本上是漫山遍野乱抛。从1936年至1945年，这6公顷土地上已满布劳工的遗骨。

在三宝一坑西北约1000米处有片1.33公顷的杨树林子，它在日本侵略者开发三宝一坑前，是附近农家的“义地”，林子内早有稀疏的坟墓。自从三宝矿一坑往林子里乱扔劳工尸体后，农家的坟墓均悄悄迁走。林子里尸体与日剧增，招来了成群野狗。杨树林被劳工的尸骨占满了，三宝采炭所指令往姚沟扔。姚沟是一片荒芜的山坡，在三宝一坑北2000米处，山坡上荆棘丛生，原是农家放牧牛羊的牧场，乱扔劳工尸体后，这里便再无人来往，无人行走。运尸的车老板是个好心人，自带铁锹，铲些沟沿上的土将尸体草草掩埋一下，但沟沿上土很少，尸体过多，到无土可埋时，便将一排排尸体用领席子盖上，席子又经不住野狗撕扯，车老板再来这里时，上次盖着席子的尸体已被野狗撕扯的东一个西一个，被啃得面貌全非，十分凄惨，好心的车老板只有望尸长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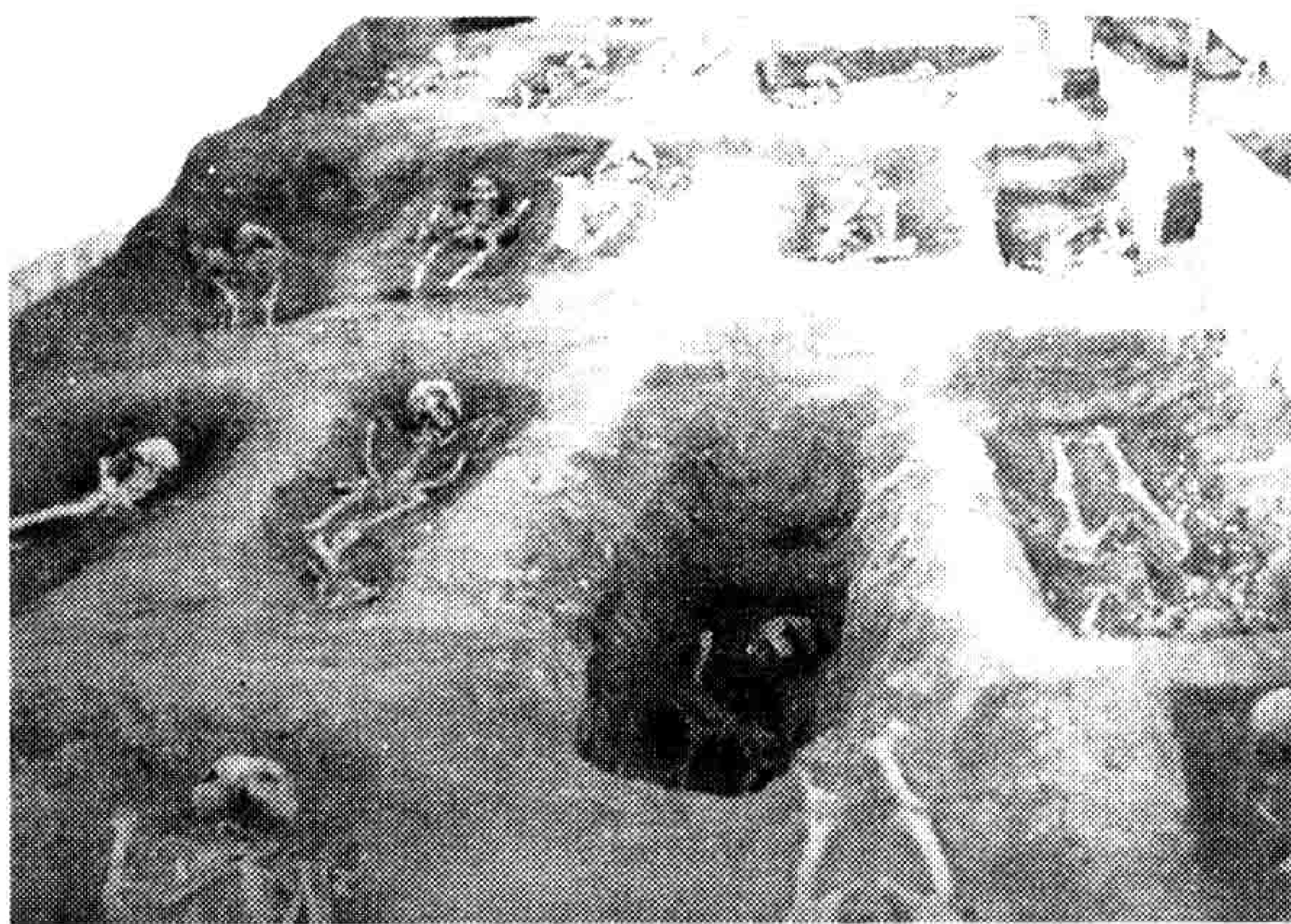
经过一段时间，姚沟这片山坡又布满了尸骨，三宝采炭所总务系又物色了个新地点——距三宝一坑3000米的扎兰营子河南岸，即后来的红砖窑附近。当时这里是片沼泽地，春夏两季进不去车，车老板只好沿着岸边扔，四面八方又聚集来成群的野狗，撕咬、吞噬着劳工的尸体。据目睹者和知情的老人说，三宝采炭所从1936年至1945年近10年时间，惨死劳工足有8000人，死后多数连张席子也没有，没有人埋，全是暴尸荒野。

5、台吉南山万人坑。台吉南山万人坑形成于1938年。台吉一

坑从建设到投产的两年，死亡劳工埋到今台吉六工村附近。当时那里是一片荒地，有附近居住人家的祖坟。劳工埋得多了，当地百姓叫苦不迭。1938 年 4 月，台吉二坑开工建设，坟地离坑口太近，仅 500 米，劳工上下班从此路过，怕引起劳工的不满和反抗，便用这块坟地改建了劳工房，掩埋劳工尸体的地址迁移到了台吉南山，即今台吉南山万人坑。

台吉南山万人坑，占地 1.70 公顷，原是一片山坡地，地是农户李振文的，山坡上部长满蒿草，下部是片耕地。

从 1938 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对台吉煤田进行疯狂掠夺，1939 年 4 月，一坑开始出煤，当年即产煤 120385 吨，1940 年和 1941 年，二坑、三坑相继建成投产，几年中，劳工人数大量增加。这几年，又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掠夺煤炭更为疯狂，迫害劳工更趋残酷，劳工死亡人数大增。当时，“报国寮”设有专门收尸的人，人死了，先放到“死人库”，然后由专门负责拉死尸的大车拉到万人坑。拉死尸的车夫邓树芳证实，往南山万人坑拉死尸，有时一天就拉两趟，那人死得无法计算，一年冬天，拉死尸总有 500 多具。“报国寮”东厢房对面炕住着 40 多人，一冬连饿带冻死了 30 多人。另一间屋，头一天晚上拉出一个病死的，第二天早晨发现，27 个人都让煤烟熏死了，用大车拉了三趟，



北票台吉南山万人坑一角

都扔到万人坑了。他说，看那些劳工死得那么惨，每拉一趟死尸，都心里发酸。

每年秋天，台吉采炭所都雇人事先挖一些坑，准备冬天埋死人。曾在南山万人坑挖过埋死人坑的李国庆回忆说："我 22 岁和 23 岁两年秋天，都在台吉南山'万人坑'给炭矿挖埋死人的坑子，是外包工头子修景年雇的。每年秋天，都找十几个人挖坑。我们挖一个坑给 3 角钱。每个坑挖一尺宽，二尺深。每年秋天都挖二三百个，等不到春天就埋满了。以后小坑埋不下了，还挖了几个大坑，成垛地埋，埋好几层，有的坑埋几十人，看着实在太惨了。"

在"报国寮"内，有病重未死被抬到"死人库"的，也有还未死即被拉到万人坑的。1943 年秋的一个傍晚，给地主放牛的李老汉赶牛下山，忽听山洼里传来呼救声。过去一看，见几只野狗围着一个露着胸肩的青年狂吠，那青年手中捏块石头与野狗殴斗。李老汉用赶牛的鞭子赶走了野狗，救了青年一命。那青年就是在病中还未死就被拉到万人坑的。



北票台吉南山万人坑一角

北票煤矿的 5 处万人坑，唯有台吉南山万人坑至今保存得比较完好。1967 年 5 月，北票矿务局对台吉南山万人坑进行一次全面挖掘整理。挖掘整理工作力求保持原貌，对尸骨未作任何移动。在 1.7 公顷山坡上，就挖掘出劳工遗骨 6500 多具，只要挖开地表，就可见粼粼白骨。

挖掘中发现，日本侵略者掩埋、处置劳工的尸体，分几个不同阶段，有几种不同形式。其

中有一少部分是单人单坑，两坑距离不到一米，有一薄皮棺材，可称作“排列型”，这是初期。其后是多人一坑，有个大薄皮棺材，一个大薄皮棺材装三四个到五六个尸体不等，在同是70平方米的地段，挖出的尸骨有31具的，有100多具的，200多具的，有个60平方米的坑，挖出尸骨240具，尸骨一颠一倒，分层码成垛，可称作“人窖型”，这是中期。再后是往大沟里抛扔。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在1943年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期间是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的时期，是对劳工的迫害最残酷的时期，也是劳工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据拉死尸的车夫说，一辆拉不过来，又添了一辆。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挖坑掩埋，先是在山坡下盖了幢小房，做“炼人炉”，把大车拉来的尸体码成垛，先是倒上“洋油”，后改为架上木柴，用火炼、火葬。最后嫌这种火葬费时费物，即随便往大沟里一扔，抛尸沟底，任雨水冲刷。挖掘时在这条沟底发现700多具尸骨。

北票煤矿万人坑形成主要原因有六：

一是残酷的政治迫害致死。日本侵略者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迫害劳工，首先是政治上的迫害。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统治机构，上自炭矿各课、系，中至各工村、独身寮，下至各坑口、采煤掌子，负责人都是日本人，日本人对待劳工如仇敌，张口骂，举手打。这些足使劳工感到压抑，感到紧张，甚至感到恐怖。台吉大把头郑荣久承认：“‘报国寮’这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压力，就是让住在这里的劳工服服帖帖地报效大满洲国、大日本国。”受政治迫害最重的是被称作“死囚劳工”的“特殊工人”，他们多被关在“报国寮”，劳工都深有体会。“报国寮”一看就是个监狱，周围有高墙、电网，门口设岗哨，如同监狱一般。住在这里的劳工，多数是“特殊工人”，除了来时照相、按手印、登记体貌特征，还在柳条帽上划个红圈作为记号。每天由矿卫队员持枪押送到坑下，升坑后再押回来。晚上睡觉，要互相监督，还要把腰带解下，送到防止班，为的是防止逃跑。从16岁起就在冠山竖井当劳工的赵祥说，冠山竖井的大门，像只吃人的野

兽,张开血口对着通往一、二工村的马路。门口两边有矿卫队员、日本宪兵站岗、巡逻。门内是矿卫队,旁边有一间低矮、阴暗的小屋,上下班的劳工常听到屋内传出的打骂声、惨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再往里走是劳务系,劳工入井,拿一张三联单工票,交劳务系一张,交井下公事房一张,剩下的一张要等干完活,日本系员打个戳,才能出大门;不打戳,就说你没干活,不准出门,不论天气多冷,也得在门内等着。出门如同过鬼门关,验票、看牌、搜身,稍不慎,就是拳打脚踢,甚至弄到矿卫队、宪兵队,受刑、坐牢。那时,没有一天不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这种令人心悸、时时有恐怖感的政治环境,如同一把软刀刺痛着劳工的心扉,使人感到生不如死。幸存的劳工崔鹏举说,1943 年前后,在冠山二坑西部,上吊自杀的劳工就有十几个,其中有因病、因累折磨寻死的,也有因思想上感到恐怖,精神上受到压抑不想活的。

在日本侵略者法西斯高压统治下,劳工没有任何言论、行动的自由。谈论时政,绝对不准,《满洲劳工守则》规定:"闲谈莫论国事,私论者为思想犯,交宪兵队处刑"。就连唠句闲磕也不允许,甚至劳工间互相打个招呼,道声问候,都要给扣上"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私谈国事犯"、"预谋逃跑犯"等罪名,轻则遭顿毒打,重则抓去刑讯、坐牢、处死。曾在三



日伪时期北票矿残害矿工的审讯室

宝一坑当劳工的王景瑞说,1943 年夏,下坑支灯时和一同班劳工小声说了两句话,被采炭所一日本系员看到了,说他说的是"反满抗日"的话,不容分说把他送到宪兵队,对他刑讯逼供,还惨无人道的上了电刑,被折磨个死去活来,在脸上还留有道道伤痕。住在冠山"协和寮"的马洪志,说了句对日本人、把头不恭的话,有人告了密,被宪兵队抓去,严刑拷问致死。台吉一坑劳工刘喜孔,被扣上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帽子,抓到宪兵队,轮番吊打刑讯,后押送锦州宪兵队,不知死活,炭矿宪兵队为此还受到了奖赏。住在台吉"报国寮"的王大根,不甘忍受迫害、摧残,准备逃跑,被事务所负责人日本人高本发现,他立即把全寮的人召集在一起,当众将王大根打死,然后贴出告示:"王大根图谋纠众逃跑……违法抗规,罪不容赦,处以极刑,特告全寮,如有效法者亦遭同罪"。

1967 年,在台吉万人坑挖掘出的死难矿工的遗骨,有的呈向外挣扎状,显然是被活埋的;有的头上有被打的窟窿,有的下肢被打断,是用酷刑致死的;有的尸骨上捆着铁丝,有的脚上带着脚镣子,都是被无故冠以"思想犯"、"政治犯"、"国事犯"而被刑讯致死和惨遭杀害的。



用铁线捆绑后打死的矿工遗骨

劳工暴动逃跑,常有或因行动迟缓,未能走远被抓住的,或因逃出后暴露行踪,被抓回的,这些劳工多被迫害致死。一次,矿卫队从朝阳押解回 6 名逃跑的"特殊工人",押到矿卫队本部,当夜全部

处死。“特殊工人”耿孝金证实，1942年一次劳工暴动逃跑被抓回20余人，在警察署关押了一个多月，打死了四五个，剩下的押到“报国寮”内，双手绑着，跪在地上，毒打、灌凉水，让其他劳工在旁观看，一边打一边问：“还跑不跑？”打完关在“报国寮”内。

日本侵略者不准劳工有任何逾越行为，更不允许有抵触情绪、敌对表现，稍有类似行为，就要大祸临头，定遭严厉惩处。据日本特务，当时在台吉医院化验室工作的张绍恩供认，1941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他到劳工马洪志家串门，一进屋见马洪志匆忙地往炕底下藏东西，问是什么，说是个破广播匣子。张绍恩要拿出来听听，马洪志面有惊慌之色。张绍恩感到可疑，第二天向警察署告了密。马洪志被抓到警察署，数日后死于狱中。

日本侵略者政治迫害的另一招是推行愚民政策，在思想上、精神上麻痹劳工、蹂躏劳工，泯灭劳工的民族意识、反抗精神。日本侵略者给劳工制定了一个《训令》，强迫劳工按傀儡皇帝溥仪在《训民诏书》中说的与日本天皇“精神为一体”，与日本友邦“一德一心”，每天早晨必向天皇行致敬礼。强迫劳工相信日本侵略者鼓吹的“日满亲善”、“民族协和”、“共存共荣”，强迫劳工“采炭报国”，意在使劳工不作反抗，听从摆布，当顺民，任人宰割。《训令》中有条规定，劳工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人”，违者就是违规，就是抗法。

1940年，溥仪发布《国本奠定诏书》，说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护佑下建立的，在之后的《国民训》的第一条要求“致崇敬于天照大神”。所谓“天照大神”，是日本人迷信的“神”，是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编造出来的。就这样一个谎言、邪说，日本侵略者硬把它加在劳工头上，在冠山、台吉、三宝均建有“建国神庙”，强迫劳工要敬仰、遥拜“天照大神”，每天早晨上班前，都要面朝东南，鞠躬致敬，如有违犯，就要惨遭毒打。有的劳工因此被打伤后致死。日本侵略者还制定了个《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

处罚法》,更使劳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就有灾难降临。

日本侵略者、把头还用迷信愚弄劳工,强迫劳工出钱修建“老君庙”,信奉“太上老君”。当时,在北票炭矿各采炭所、工村共修建“老君庙”8处,所需资金全由劳工负担,侵略者、把头还从中渔利。侵略者、把头宣扬“太上老君专管开矿,能保护矿工平安无事”。逢年过节,劳工都要到“老君庙”烧香上供,否则就是违规,常有因此被无辜治罪的。

二是过度劳累致死。日伪统治时期的北票炭矿,生产方式落后,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侵略者为多掠夺煤炭,强迫劳工多干活,劳累是加在劳工头上的一把刀,随时消耗劳工的体质,以至夺取劳工的生命。当时的劳工家属关秋月揭露,她丈夫李邦国,被把头宋玉招骗来北票,在台吉一坑采煤,下坑没几天就说:“这累受不了,这活不是人干的。监工的监视着,一会不能休息,准得累死。”又下了3次坑,升坑后回到家已经摇摇晃晃,支持不住了,饭也吃不下,只想躺着,第二天就死去了。好端端一个人,就这样活活累死了。

1941年起,日本侵略者迫于战争的需要,更加疯狂地掠夺煤炭。伪满洲政府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生产扩充计划》,用以推动战时生产,北票炭矿便不断地开展“大采炭”、“采炭报国”等运动,给劳工带来更大的灾难。一是增加月劳动日数,规定“劳工每月勤绩30个者奖,达不到者不给饭票”;二是延长劳动时间,由12小时延长到14至16小时;三是接连不断地搞什么“努力出煤日”,这时,日本职员、系员、大柜把头一齐出动,手持榔头、木棍、皮鞭到采煤掌子上监督,稍有迟缓、懈怠,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治你个“破坏采炭报国”罪;四是增加出煤限额,完不成扣发工资,还要受另外的处罚。当时的劳工王春说:“我在台吉一坑采煤,有一次,日本系员佐藤硬给我们下了个12个人小班出煤200车的任务,下的指标过高,根本就完不成,大家拼命干了16个小时,才出130车煤,升坑后,佐藤下令扣发我们的饭票,也不给开工资,还打了我们每人几

个耳光子。”

伪满的劳工徐守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4年8月的一天晚上，台吉一坑劳工孙玉廷，在坑下一连干了16个小时的活，已筋疲力尽，日本监工的说没完成任务，不准升坑。孙玉廷实在乏得厉害，坐在柱腿下就睡着了。日本监工看见了，破口大骂，说是“思想不良，破坏大采炭”，先打了一顿，升坑后又把他叫到公事房，几个监工拳打脚踢一顿，又把他装进麻袋里，用脚狠劲踢，踢得他满地滚，以此取乐。踢死过去，不见动了，便朝麻袋上泼凉水，见他动了，又狠劲踢。本已体乏身弱的人，怎经得住这么折腾？几小时后，见他再没动过，就连麻袋扔进了万人坑。

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机关算尽，大量招用童工，让童工担负成人一样的劳役，付给的工钱却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0年到1943年，就招骗童工4213人。这些童工小的只有9岁，大的也不过13岁，和成年劳工一样，受着侵略者、把头的迫害，受着沉重劳役的折磨，因年幼、体弱、力气小，劳累成疾致残、致死者甚多。

冠山选煤厂一个姓郑的童工，身上无衣，肚内无食，本来就身单力薄，哪干得了重活，一天，拣矸子，皮带尽头矸子太多，他用铁锹去捅，被矸子埋住，没有力气爬出来，在旁的日本监工看热闹，不准别人上前去救，不一会没了声息，活活被埋死了。当时的劳工刘万山回忆说，1942年秋后的一天，三宝选煤厂一个姓白的13岁童工在手选车间拣矸子，因为矸石特别多，不住手的拣也拣不过来，累得筋疲力尽，倒在传送皮带上，被皮带活活绞死。

三是严重饥饿致死。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让劳工拼命给他们多出煤，却只给劳工以极低微的报酬，以致劳工和家属生活艰难，忍饥挨饿，甚至因饥饿而死亡。劳工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流：“枕的砖头木头头，披的麻袋头，吃的窝窝头，死了盖块破席头。”这是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劳工工资本已够低，还要从中扣去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以一张当时的工票为例，这是一名叫吴进臣的劳工的工票，上面记着，1941 年 9 月，他在台吉一坑采煤，上了 30 个班，应得工资 28.20 元，他是二头子，手当费 2.00 元，勤绩奖励金 0.35 元，共应得 30.55 元。从中扣去饭票 12.00 元，共济金 2.45 元，前贷金 2.50 元，货与物品贷 2.44 元，石炭贷 2.70 元，共扣去金额 24.20 元，只剩下 6.35 元，是他应得工资的 4.7%。这张工票记录着劳工所受的剥削程度，也记录着劳工的辛酸与血泪。幸存的劳工郝永利揭露说，他听说北票炭矿一天能给五六角钱，便来当了劳工。头一个月，上了满班，算算可得十五、六元。可到领工资时，只得到 5 元多钱，其余全扣去了，到账房去问，还挨了白眼。第一个月，还挣到几块钱，往后，连折带扣，倒欠了柜上的债，再去开支，不能说是开支，只能说是借债，不借，吃什么？

那时吃粮靠配给，要到配给所去买。按配给规定，劳需的(下井采煤的)每月 15 公斤，一般的(干杂活的)每月 12 公斤，家属和小孩只 7 公斤。粮食品种，初期还好些，有红高粱米、玉米面，而后来，按伪满洲政府《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伪满洲国生产的粮食，多数运往日本，支援它的“大东亚圣战”。粮食配给发生巨变，据当时的劳工赵福瑞说：劳工连好一点的红高粱米、玉米面也吃不到了，只配给些发了霉的红高粱米、混合面、橡子面，还有从黑龙江运来的土豆，从吉林运来的甜疙瘩，这些也是按量配给。住工村的劳工如此，住独身宿舍的单身劳工尤其是“勤劳奉公”队员、“特殊工人”，就更艰难，一天两顿饭，每顿都是一碗稀粥和一个窝窝头，这还是上班的，不上班的后吃，粥不够吃时，往里掺凉水，劳工编个顺口溜说：“一进锅房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见人”。当时在“报国寮”住过的劳工徐庆连说到他到“报国寮”吃头顿饭的情景：他们同来的 27 个人，每人先给一小块咸菜(第二顿饭还没了)，饭是红高粱米粥，从大锅掏到大木桶里，掺进几瓢凉水，上边是水，下边

才是饭。有人在跟前看着，谁捞下边干的就要挨打。看着的人说："把稀的喝完，不就是干的了？"他们各喝了三碗水样的饭汤，才看到饭粒，还没等吃完一碗饭，时间又到了，吃饭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到了，吃不饱也得放下碗筷，饿着活该。饥饿，是跟随着劳工的魔影，随时吞噬着劳工及其家属的生命。劳工及其家属因饥饿致死者不计其数。当时在三宝一坑当劳工的王兆魁说，和他同时来矿的有个姓李的小伙子，那年19岁，身体也算不错，可没经受住劳累、饥饿的折磨，吃不饱，活又累，不到一个月，两腿浮肿，又坚持干了几天，已迈不动步，起不来炕。王兆魁把他背到医院，日本医生让放到走廊。他知道他是饿的，升坑后买了张煎饼去看他，日本医生说到死人堆去看吧，死了。

饥饿致死的何止姓李的一人。张玉荣，河北遵化人，受骗携全家7口来北票炭矿当劳工，在台吉一坑采煤，每天干14个小时的活，但工资被七折八扣后，只能剩块八角钱，糊口尚难，何谈养家，不久，老父饿死了。没东西给妻子、孩子吃，无奈卖掉3个女儿，后又卖了妻子和儿子，剩下自己，还难求温饱，饿得病了，不能上班，连4角钱饭票也没有了，不久也饿死了。

四是各种传染疾病致死。日本侵略者只顾掠夺，大柜把头只顾赚钱，致使劳工生活环境十分恶劣，疾病不断发生。劳工居住的工村和独身寮低矮，潮湿，卫生状况很差，尤其是独身寮，如"报国寮"、"协和寮"，一个屋内对面炕，住着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跳蚤满炕蹦，臭虫满墙爬，蚊蝇满屋飞，劳工身上虱蛆成堆，劳工被蚊虫咬得满身疮疤、满身伤痕。吃的卫生条件尤其差，当时的劳工侯跃东说："饭房里苍蝇撞脸，盆里只见苍蝇不见饭。"当时在冠山医院工作的邹裕民说："那时经常有传染病流行，如伤寒、痢疾、疟疾、猩红热等。"当时的劳工桂臣说，1939年台吉倪玉山大柜一次招骗来百余名劳工，正赶上伤寒病流行，不出半月，就死去60多人。幸存的劳工李宝山说，1942年三宝发生鼠疫，日本侵略者、把头对得病人

家用封条封门，不准出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少工人和家属悲惨而死。当时的劳工龙殿元说，他家5口得了鼠疫，门被封条封了，黑夜从窗户上跳出去，找点水喝，找点吃的，母亲和弟弟还是死了。

日本侵略者对恶劣的卫生环境不加改善和治理，对因疾病大批死亡劳工不以为然。如往粥里掺凉水，常引起肠炎、拉肚子，致劳工死亡，却不加改进，照常办理。当时的劳工马玉堂说，有一年三宝采炭所从河南招骗来一批劳工，300多户，700多口人，没地方住，在选煤厂附近挖一条大沟，上面盖张席棚子，就当房子住。由于又湿又矮，不出两个月，病了很多人，又过段时间，即有不少人死去。半年后，已死了300多口人。

尤为甚者是劳工有病不给治疗。冠山、台吉、三宝都设有医院，但都不认真给劳工治病。劳工病了送到医院，不是放在走廊不予理睬，就被说成传染病，将病人关进一个小屋，因没人过问，很快就与世隔绝。曾在“报国寮”住过的劳工徐庆连说，那时劳工吃橡子面、红高粱米，吃不到菜和油，穿的坑上坑下一身衣服，下坑弄湿了，升坑后湿挺着。没铺没盖，炕常年不烧，潮湿冰凉。因此得病的一天比一天多。病了，不给治，送到3号或4号病号房。病号房门老锁着，谁想给送点水，送点吃的也不允许。进了病号房，就等于是死人。冬天连冻带饿，只有冻死、饿死、病死。公事房的人，每天早晨开门看看，死的抬出去，没死的还锁在里边。同他一起来的27名劳工，半年时间死了20名，其中18名因病死在病号房内，另两名是被“报国寮”内的日本侵略者打死的。

劳累、饥饿、疾病，是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加给劳工的三把“刀”，每把都能致劳工于死地，而三把“刀”又往往或先后或同时相加，使劳工一批批死亡。日本侵略者侵占期间，至少有23000多名劳工死于三把“刀”下。

据幸存的劳工介绍，1942年，从河北、河南招、抓来劳工140多人，有的经不住劳累折磨，有的吃不饱，得这样那样疾病，春天来

的，到冬天只剩下几个人，其余全死了。当时的劳工赵福瑞写道："被抓来的劳工，因居住环境恶劣，又水土不服，吃不饱，穿不暖，来到这时间不久，就成批地被折磨死。1943 年初，从山东武定一带抓来 500 多人，不到一年，只剩十来个人"。1942 年在台吉一坑当放炮员的翟广坤说："有一次在坑下遇到一个从河南抓来的劳工也姓翟，我俩认了'当家子'，无人处谈了几句话，他说他们一起被抓来的 120 多人，吃不饱，水土不服，闹病，已死了几十个，他也病过，侥幸没死。过个把月，又见了次面，我把一双水袜子给了他。他很难过，说和他一起来的，只剩 30 来个了，都让饿、病、累折磨死了。从那次见面，再没见到他，这前后也就半年时间"。

五是各类安全事故致死。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用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要煤不要人，致使各类生产事故频繁发生，这也是劳工大批死亡的原因之一。

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根本不顾劳工人身安全，没有劳动保护，不采取安全措施，从采煤掌子到运输巷道，到处都有安全隐患，瓦斯爆炸、突出、冒顶、片帮、水、火等事故不断发生。当时任台吉劳务系公私伤班负责人的黄玉玺承认："每天都有死伤事故发生，公私伤班无一天清闲无事。"

据《北票矿务局志》记载，从 1934 年到 1945 年，仅死亡在 10 人以上的重大恶性事故就发生了 19 起，共死亡 512 人。死亡在 10 人以下的事故则无法统计。从这些事故的性质和原因看，99% 属于人为，由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一手造成。

根据资料记载及部分老劳工回忆，这 19 起重大恶性事故简要情况如下：

1.1934 年 5 月，冠山竖井四道巷瓦斯大量聚集，没采取防治措施，发生大爆炸，附近作业的劳工死 52 人，伤多人。

2.1934 年 12 月，冠山竖井 600 英尺四层采煤，瓦斯超限，继续放炮，引起瓦斯爆炸，死亡 23 人。

3.1937年10月，三宝调查斜坑10个重车跑车，造成12名劳工死亡。

4.1937年10月，冠山竖井井下公事房前，劳工领工票，准备升井，人多拥挤，惹恼了监工史大麻子，将滚热的开水泼向劳工，劳工一齐躲闪，顶上铁梁发生移动，一碾盘般大小的矸石随之下落，将16名劳工砸得血肉模糊，当即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5.1938年3月，冠山竖井西部采煤掌子，日本监工逼着劳工用煤面合泥堵炮眼，炮响后有明火，引起瓦斯爆炸，死亡38人。

6.1939年6月，台吉一坑西四片采煤，瓦斯超限，仍强行作业，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

7.1939年9月，三宝一坑东四片采煤掌子，瓦斯超限放炮，引起大爆炸，死亡劳工21人。

8.1939年，台吉一坑大五片采煤，在掌子上修理风机，修完送电，发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导致19名劳工死亡。

9.1940年4月，冠山竖井采煤，放炮装引药，引药脚线接触安全灯盒子，引起火药爆炸，死亡11人。

10.1940年12月，台吉二坑东四片采煤瓦斯增高，继续作业，发生煤与瓦斯倾出，造成23名劳工死亡。

11.1941年3月，台吉一坑东五片4层采煤掌子大面积冒顶，埋压住11名劳工，全部死亡。

12.1941年7月，台吉一坑东四片采煤，瓦斯超限，日本监工逼着放炮，引起瓦斯爆炸，死亡20人。

13.1942年，三宝二坑采煤，瓦斯超限，未处理继续作业，发生瓦斯爆炸，煤大量倾出，导致32人死亡，20多人受伤。

14.1942年6月，台吉一坑五片东延采煤，掌上瓦斯大，又在掌上修理局部扇风机，起动时产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附近作业及修理风机的50人全被烧死。

15.1942年10月，冠山竖井二号井采煤，在瓦斯超限情况下硬

让继续作业,发生瓦斯连续性爆炸,死亡33人。

16.1943年12月,三宝一坑采煤,瓦斯超限,日本监工逼着放炮,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2人,伤10余人。

17.1943年,冠山竖井西部900英尺一片采煤,在停止送风后仍被迫放炮,引起瓦斯爆炸,21名劳工死亡。

18.1944年1月29日,台吉一坑三片西延,发生发火事故,烧死17名劳工。

19.1945年1月,台吉一坑三片采煤,瓦斯增大,劳工被迫坚持作业,发生重大恶性瓦斯爆炸事故,导致70余名劳工死亡。

这19起重大恶性事故,绝大多数是由于被迫冒险作业或违章作业造成的,日本侵略者难辞其咎,难逃其责。19起重大恶性事故,瓦斯爆炸、倾出事故14起,占70%以上。北票煤矿的高瓦斯与煤突出的状况及危害,日本侵略者是明明知道的。日本关东军特务部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北票煤矿状况调查》就曾提及"向深部开采,将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他们视而不见,事故屡屡发生,仍不加防范,这足以说明,他们只顾掠夺煤炭,不管劳工死活。1938年至1943年这几年瓦斯爆炸事故更趋频繁,就因这几年掠夺煤炭更趋疯狂,经常逼迫劳工冒险作业,把活人往死人堆里推。例如1938年冠山竖井那起瓦斯事故,本已到交接班时间了,可日本监工小笠木说出的煤不足数,不给打戳,不准升井。劳工无奈,继续作业。当时已打完眼,放炮没炮泥了,监工又逼着劳工用煤面子合上水当炮泥,炮一响,喷出火球,引起瓦斯爆炸,38名劳工全部遇难。再如1942年6月台吉一坑那起瓦斯爆炸事故,局部扇风机出了故障,停止运转,日本监工利原带三名电工入井修理,扇风机已停多时,掌上瓦斯必然集聚、增高,三名电工要抬到通风好的大巷去修,监工利原怕耽误时间,硬让在原地修,他还在场监督。等修理完,一起动,冒出火花,引起瓦斯爆炸,附近作业的采煤工和修理工50人全被烧死,利原也搭上一条小命。利原死后又开追悼会,又安

葬到“慰灵塔”,那些劳工却被扔进万人坑。

生产环境恶劣,不安全因素极多,又强迫劳工冒险、违章作业,发生事故,死伤劳工,就不可避免。据不完全统计,日伪时期,事故致死劳工在7000人以上。当时留下首歌谣:“鬼子要煤不要人,把头两手血淋淋,出煤全是用人换,不死也得断骨筋。”

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居然在事故发生后不准抢救遇难劳工。据一幸存的劳工证实,“特殊工人”王殿荣,刚来到北票,第一次下井,便遇冒顶与另两个难友被煤埋住,几个劳工上去抢救,一日本监工说影响出煤,不准抢救,王殿荣等三人全死在井下。1941年8月,三宝一坑七片,发生大面积冒顶,7名劳工被压在下面,其中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劳工,头露在外面,还大声呼救,在场的一日本监工说救出来也没用了,上前抢救的人还可能被压住,不准抢救,7名劳工无一生还。1942年6月,台吉一坑采煤发生瓦斯爆炸后,不少劳工、家属赶来,准备下坑抢救,劳务系日本系员不准抢救,调来矿卫队员强行拦阻,并令人用砖泥封闭出事的大巷,遇难劳工中有没死的也被日本侵略者堵住了生路。

令人愤恨的还有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对在事故中受伤的劳工不予积极治疗。当时的劳工家属宋慧兰控诉说,她丈夫在一次瓦斯事故中被烧成重伤,人还清醒,还能说话,侵略者、把头不予救治,说:“快死了,还救什么!”她请人帮助送到医院,日本医生看都不看,硬让抬出去。她丈夫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疼得高声呼叫,到第二天,便被折磨致死。医院对事故中胳膊、腿脚受伤的劳工,不积极治疗,只采用不人道的截肢(日语“打切”)办法(用这办法医生可得60元手当费即津贴),草率处置。台吉一坑修理工田顺德胳膊被炭车撞断,到医院就被截肢,把下半节胳膊切去了,成了残废,致使全家无法生活。台吉一坑搬运工人苗长庚控诉说:他在坑下遇车祸将左腿砸骨折,抬到医院,不给治疗,躺在走廊,两周没人过问。伤处已化脓,一日本医生才令人抬进手术室,但不是治疗,而是强行

截肢，使他成为残废，并被辞退，被赶出炭矿。

六是实行残无人道的细菌试验致死。日本侵略者坏事作尽，竟用劳工做细菌试验。曾在台吉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日本特务张绍恩供认说，1941 年夏，日本院长板本和他一起进行过两次细菌试验，一次是把患斑疹伤寒的劳工的血抽出 5cc，注射到 10 名健康劳工体内，一次是把患回归热病的劳工的血抽出 10cc，注射到 2 名健康劳工体内。板本告诉张绍恩，这 10 多名劳工多数是要死的。三四天后，被注射病人血的劳工开始忽冷忽热，体温忽低忽高，高时达摄氏 40 度以上，有 5 名劳工死亡。这时，他们又作了血涂片检查，作了人体解剖。日本院长板本很得意，说试验很成功，达到了目的，可以写论文了，还对张绍恩的合作表示了感谢。

1967 年 5 月开始，北票矿务局对台吉南山万人坑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了阶级教育展览馆，用万人坑作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历史见证，作为对职工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教材。

现在，台吉南山万人坑被列为朝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朝阳市教委、文化局列为朝阳市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忘记了过去就是背叛。”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广大劳工所受的种种苦难，万人坑中的粼粼白骨，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北票矿工的浴血斗争

北票煤矿于1932年2月22日被日寇侵占后，被伪满洲国实业部接收，成立了北票炭矿有限公司，由日本帝国主义经营。他们对矿工的统治和压榨，更是残酷的、罕见的、非人道的，所以矿工们的反抗斗争活动也是更加激烈、更加坚强、更加多种多样。

逃矿参加抗日义勇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各地民众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队伍。在锦州、朝阳、阜新等地相继兴起抗日义勇军和救国军。这时的北票煤矿，生产停顿，交通也中断了。由于时局的影响，在大老秦的组织领导之下，有200多名矿工逃离煤矿，冲出了人间地狱，毅然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投身于抗日活动之中。

日常群众的反抗斗争活动：在日伪统治北票煤矿时期，尽管他们对矿工的统治手段残酷毒辣，但是富有反抗精神的广大矿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他们的反抗斗争，其斗争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一是磨洋工，糊弄“鬼”。在井下干活的工人，派人看着鬼子和监工的，监工的来了，就忙着干点，他一走就不干了。二是制造鬼子和汉奸的矛盾。如台吉二井把头郑荣久，有许多马在井下拉煤车。有一次两辆重车撞在一起，挤死一匹马，郑要从马车工人的工资里扣赔金。17名矿工一合计，想出了个对策，把井下的空、重车都停在车场子里，谁也不给拉。鬼子吉本来了，见此情一问，矿工们都说：“郑把头有话，怕累坏他的马，怕赔帐，他不让多拉。”吉本一听气坏了，到井上公事房，用电话把郑把头叫来，二话没说就打他一顿耳光。三是砸日本鬼子。鬼子叫工人拼命干活，工人那怕是去大小便，让鬼子看见都要挨打。工人忍受不了，有时伺机暴打鬼子一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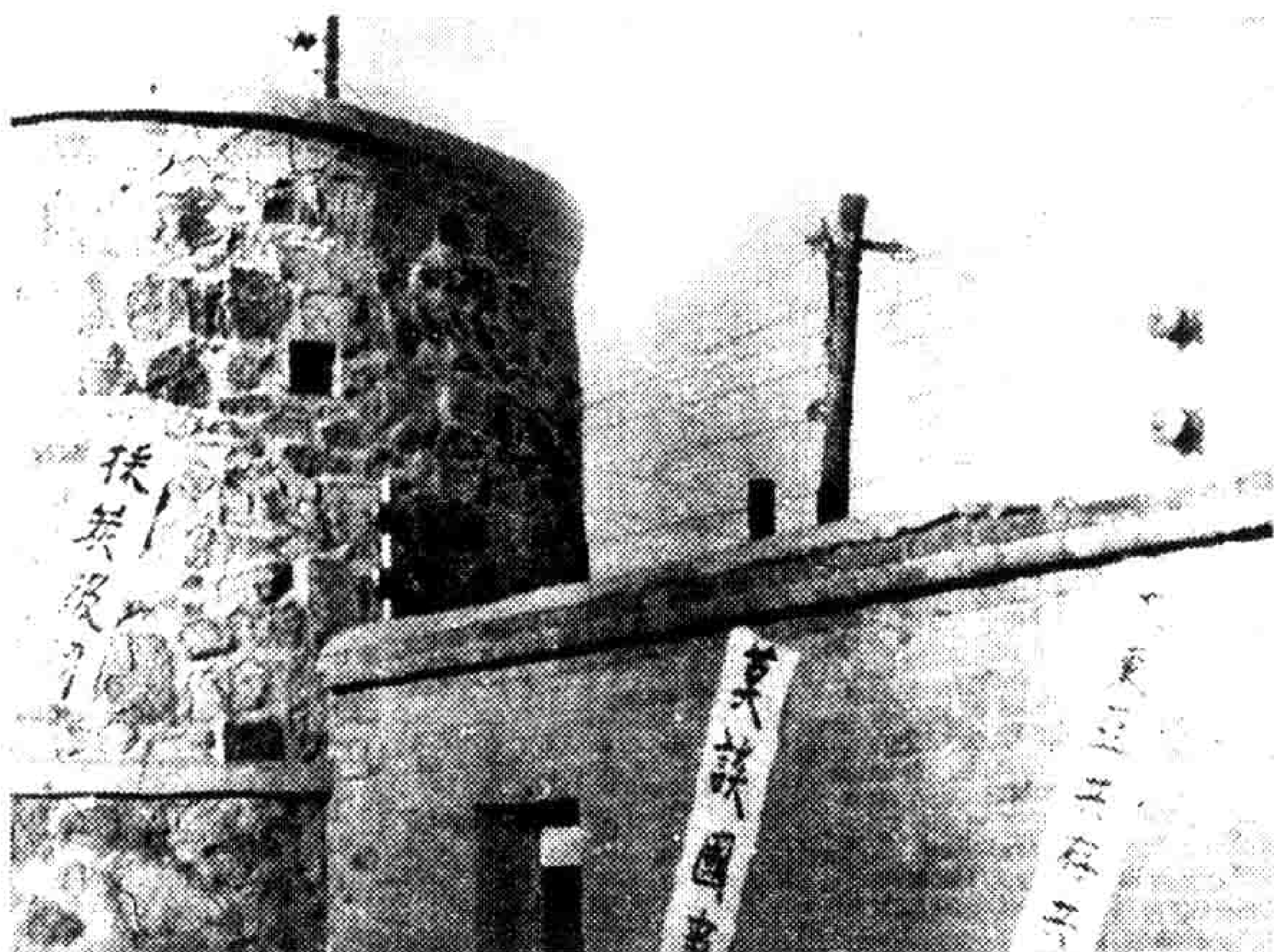
机会，还把鬼子砸死在老塘里。四是制造事故，破坏工具，迫使停产。如：矿工们故意在绞车坡道上不挂车钩，让车落道或跑车；掘进岩石巷道时，往车里装大块岩石，运到井上翻不出去；在坑里放炮时，故意将生产工具崩坏、埋掉等。五是开展小型分散的罢工活动。如：1939年三宝矿安全灯房工具室和电厂的工人，因反对日本翻译陈宝林的野蛮行为，在许俊英和杨晓峰领导下罢工一天，直到矿方开除了陈宝林才了事；1941年底，台吉一井工人为反对开工资时间不固定，在工人阎子原和李宗信的领导下，100多工人罢工2天；1944年4月，台吉二井工人为反对把头刘焕德在开工资前要最近3天出勤的小条，罢工一日。几次罢工均取得了胜利。

"特殊工人"暴动，是北票矿工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1940年初，日本鬼子将我抗日前线的被俘人员共1300多人，从山东、河北、河南、以及黑龙江等地押至北票煤矿，称作"特殊工人"，强迫下井掘煤。他们分别住在冠山"协和寮"和台吉"报国寮"内("寮"类似集中营内的监狱)。这的确是一座人间地狱，到处都有警察、宪兵、特务、汉奸、狗腿子们的看守，并且高墙电网，森严恐怖。这些"特殊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极坏，许多人由于吃不饱，又生病，有的被打骂而死，有的带气就被活埋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统治，1940年的5、6、8月间，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求给予自由，"特殊工人"上千人一连举行了3次集体罢工，经过坚决斗争，矿工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这种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被奴役的地位。于是，"特殊工人"中的党员韩树琪、刘三和于某，在矿井下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组织"特殊工人"暴动，并制定了暴动的时间、信号、逃跑路线和最后的出路。1940年9月4日夜12点钟，趁工人接交班之机，131名"特殊工人"秘密集合起来，每人带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棒当武器，分成两路(一路80人，另一路51人)逃跑。韩树琪带第一路工人迅速冲到大门口，打死两名警察，夺得两支大枪，而后拉开大铁

门蜂拥而出，当夜跑进朝阳县边境的一座喇嘛庙里。次日于某带领另一路人，也到这里胜利地会师。于某对大家讲了话，要求大家坚持到底，一定要找到抗日队伍。会后又重新划分小组，以 2 至 3 人为一组，开始分散活动，分别赴张家口或回山东参加抗日队伍，也有的到东北去找抗日联军去。这些人走后，韩、于二人又潜回北票煤矿，继续组织工人对敌斗争。

1943 年 2 月 20 日傍晚，太阳刚压山，200 多名“特殊工人”从井下升坑，被警察押回“报国寮”。途中碰着装满尸体的大车从院里往外走。尸体堆里还有些人尚在喘气。工人们看见这种惨状，气愤填膺，骂声不绝。大家说：“我们豁出来了，和狗日的拼了。”当时一个叫陈石头的“特殊工人”，听完大伙的议论，对大家说：“我们不能硬拼傻干，要大家一条心和鬼子斗争。想个活路，暴动逃跑”。大家听后都非常赞同。尔后，特殊工人董清康利用扫马路的机会察看了“报国寮”外面的地形，又利用吃饭的机会，观察了食堂里火铲、斧头存放的地方，并进行了秘密联系。不久，他又和于仲贤、王福荣、陈石头等人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制定了暴动计划。不料，秘密计划被混进“特殊工人”里的易县紫荆关西青源村阎炳祥摸到了影，他向敌人告了密。敌人暗地在“报国寮”周围加了看守力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恐怖气氛笼罩着“报国寮”。突然的变化引起了



戒备严森的矿区“报国寮”围墙

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劳工的警觉，他向特殊工人们报告了这一情况。4天后，鬼子悄悄地把哨减少了。董清康、陈石头等人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分析了敌情。他们认为，从加强监视到放松监视，说明敌人并不掌握真实情况，如果趁此机会搞突然袭击，肯定会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又制定了暴动方式、时间和逃跑路线。4月20日晚八点多钟，董清康、王福荣把压在各个角落里的劈柴棒子转移到人们手里。特殊工人刘堤在锅炉屋角下注视着鬼子值班室的动静。这天晚上，值班的鬼子是高本，翻译是赵成宏，还有几个鬼子的狗腿子。晚上9时许，一个个黑影猫腰埋伏在值班室的周围。随后，王福荣一挥手，四、五十人手持铁锹镐头、劈柴棒子等冲进了值班室。鬼子高本一看不好，忙去摸电话，可还没等他把电话听筒拿到手，就被陈石头一镐把他打死，又将电话机打得粉碎。翻译赵成宏及狗腿子们吓得面无人色，跪下求绕。在陈石头命令下，狗腿子哆哆嗦嗦把开大门的钥匙交了出来，铁小门打开了，"特殊工人"全部冲出"报国寮"的西大门。当他们跑到一坑滚笼西边时，10个矿警和日本鬼子也赶到这里。"特殊工人"将他们团团围住，拿棍棒、镐把、斧头等和鬼子、矿警进行了激烈搏斗。由于工人众多，打交手战，敌人处势极为不利，"特殊工人"边战边退，200多人只有少数人负伤。约半小时后，当鬼子的增援赶到时，特殊工人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庄稼地里。鬼子和矿警们只好盲目地搜查了一阵，乱放一阵枪，抬着四五具尸体狼狈地回到矿里。

这次"特殊工人"暴动逃跑事件，对广大矿工影响很大。从此以后，"特殊工人"逃跑、暴动事件层出不穷。1944年4月间的一天晚上，在台吉"报国寮"又跑出40多名"特殊工人"。1944年秋，"报国寮"再次发生100多名"特殊工人"暴动逃跑事件。经过工人们数次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对北票煤矿工人的反动统治，遭到了狠狠打击。1944年末鬼子终于被迫撤销了"报国寮"，将300多名"特殊工人"押往北满，将400多名"特殊工人"放出，改做劳工。

义勇救亡篇

朝阳地区抗日义勇军运动综述

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这个危机，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于是在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炮轰北大营，攻占沈阳城。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至关内，日军随即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然而东北人民，特别是富有革命传统的辽西、热东广大地区的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以满腔激情，愤然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斗争。

日寇入侵，国门洞开，大敌当前，各阶层人士都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把原有的宿怨及矛盾暂放一边，携手共同奋起对敌。当时，驻守在朝阳、北票一线的东北军董福亭旅，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影响下，上层军官对抗日有些举旗不定，但下级官兵爱国心切，斗志很高。他们抢挖战壕、修筑工事、积极做战斗准备，请战气氛浓烈；士农工商各界民气更盛，抵制日货活动遍及城市乡村，学生们奔走呼号，串联民众，宣传抗日救国；农村原抗捐抗税、抵制官府的自发武装，为一致对外而逐步改变宗旨，打起了抗日旗帜；一些绿林好汉激于民族义愤也涌入到民族爱国运动的洪流中来。这些，都为伟大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地处辽西、热东的朝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运动，虽然经历了盛衰的过程，但始终余火不熄，坚持了14年之久，直到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为止。

抗战期间，朝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1月初，为宣传

鼓动阶段。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他们一方面义愤填膺地声讨日军侵华暴行，一方面自发地进行组织串联，从"联庄会"到小股义勇军，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同时在北宁线上还开展了灵活多样的抗日活动。第二阶段，从 1932 年 1 月 3 日锦州被日军占领后，朝阳、北票、凌南已处于短兵相接的第一线。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与日伪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三阶段，从 1933 年 2 月以后，热河省全部被日军占领，没有撤退到关内的各路义勇军，转入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阶段。他们凭借悉知家乡地情的优势，在人民群众掩护下，转战游击，对日伪的反动统治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始终没有离开乡土，用鲜血换来了黎明的曙光，迎来了祖国的光复。

一、战斗在朝阳大地的抗日义勇军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客观上调动了中国人民的反日积极性。1931 年秋冬之时，辽西、热东已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践踏东北的铁蹄声。各界人民已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联庄会"普遍建立起来，为抗日保家进行联防。1932 年春，国民党爱国人士朱霁青(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偕同东北军将领宋九龄来到了抗日前线朝阳地区，发动民众进行武装抗战，在朝阳县羊山乡肖家店村的玉清宫庙内建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同年 8 月，设立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派军事部副部长彭振国，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司令的名义，来到凌源、朝阳县等地开展抗日活动。朱、宋、彭的到来，使辽西、热东自发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支持和鼓舞。同时救国会和东北民众抗日后援会，也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援助。从而朝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活动纳入了有组织的轨道。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民

族利益和国家尊严，在“九·一八”事变后，即坚决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将介石的不抵抗政策。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济南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中共河北省委遵照中央指示，于1932年6月，组建了中共热河特别支部到建平组织抗日武装。中共内蒙特委在1932年末发出了“内蒙特委给热河朝建区义勇军支部的指示信”，对推动抗日义勇军的兴起都起了积极作用。这期间及以后朝阳地区组建起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主要有：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1932年6月，中共热河特别支部赵玉祺、王本初、周复苏三人到建平县朱碌科乡，联系“九·一八”事变后由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回乡的学生高体乾组建抗日义勇军，因走漏消息，被热河军阀汤玉麟追捕而返回北平。8月份，高体乾找到彭振国，经联系准许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高体乾为支队长。于是高体乾在建平、朝阳和敖汉广大地区发展了2000多人，搭起了8个团的架子，这支队伍坚持抗战到1935年末，高体乾才按党的指示到正规部队中工作。

东北抗日义勇军西路军。“九·一八”事变后，北票县跑达沟村人、当时任区巡官的李海峰与义县人马子丹、刘云诚等人组织起一支民众抗日武装。马子丹任司令，李海峰任第三团团长。1932年春，朱霁青到朝阳后，任命李海峰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师长，驻守三宝营子一带。同年9月，又被活动在吉林一带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德林任命为西路军总司令。1933年热河省全部失陷后，李海峰部撤到丰宁县，后被改编。

东北国民救国军第十四师。黑城子乡平安地小荒村人孟昭炎，早年在东北军中任职。“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参加了中华民族自救会，后受朱霁青派遣，举起抗日旗帜，带旧部30余人回到家乡。1932年夏在朝阳、北票及奈曼等地招募新兵，组建起1000多人的抗日武装，被朱霁青任命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十四师师长，活动在

北票、义县及广宁山一带打击日伪军。在热河失守后带队入关，被改编后，孟昭炎在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任团长。

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北票县泉巨涌乡栾家窑村人蓝天林(蓝天林原名为栾天林)。蓝天林原在奉军中当兵，离队后在锦县东苇塘一带联合农民占领盐滩。“九·一八”事变后组建起“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自任司令，薛振芳为副司令。在大凌河一带阻击日军，后转战在北镇、盘山、义县一带，队伍发展到1600余人。日军占领热河后，改称“抗日灭满救国军”，队伍发展到4000余人，在北票、朝阳、建平、奈曼等地坚持抗日到1937年。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第四十八路军。这两支队伍分别由石磐、郑桂林任司令。石磐受伤后，由建昌县大松沟人张镇任十三路军司令。建昌县人邓文风任四十八路军副司令。辽西抗战失利后，这两支队伍撤到关内，但其余部仍在热东坚持抗战。郑桂林部的骑兵旅长王国瑞(建昌县和尚房子乡大杖子村人)，在主力入关后潜伏下来，率部采用游击战术，以小股活动，与日伪军周旋了很长一段时间。

刘振东抗日义勇军。朝阳县七道岭乡小马场人刘振东，早年因被诬陷下狱，获释后投身绿林。1932年春朱霁青来朝阳，与刘振东取得联系，任命其为热东抗日义勇军团长。刘振东在日军占领朝阳后，率部转战家乡，坚持反满抗日活动，沉重打击了敌伪统治，一时声势浩大，1935年10月被日军击散。

“平康德”反满抗日队伍。这支队伍是由建昌县二道湾子大北沟人邓文山组织起来的。他早年随父迁居黑龙江省德都县。“九·一八”事变后曾随马占山抗日。1934年邓文山又举旗起事，自称“平康德”，拉起一支队伍坚持反满抗日，被日伪当局称为“政治匪”。1935年末，“平康德”由黑龙江返回原籍建昌，联系零散抗日武装，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灵活机动地打击日伪反动统治。1938年5

月28日，邓文山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这支队伍随之瓦解。

李天德抗日义勇军。喀左县羊角沟人李天德，原在马占山部下任团长，因枪法精良，人称“打一面”。日军占领黑龙江后，李天德随队伍撤到内蒙古开鲁、天山等地，后与马占山失去了联系，到北平找救国会，寻求抗日途径。在救国会领到一笔给养费，回到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从1935年夏季起，李天德的抗日队伍以喀左的楼子山、铁沟、三道沟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活动，频频打击日伪军。1939年李天德牺牲后，由其侄李凤春(号平分)继续率部坚持反满抗日，直到1944年春李凤春牺牲为止。

反满抗日仁义军。在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活动逐渐处于低潮，日伪反动统治愈加森严时，1937年冬季，李天德部为活动方便，划为几个小分队活动。其中以郭文联为首的一支发展壮大起来，自立旗帜，改称“反满抗日仁义军”。他们在喀左、凌源、建昌三县山区中打游击，一直坚持到1942年，郭文联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为止。

王文福抗日护乡的家族武装。朝阳县长在营子乡石明信沟王文福(绰号王老凿)，在“联庄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以王氏家族为骨干的民众抗日武装。他们以石明信沟为基地，固守家园，不听伪满洲国的一切政令，对来犯的日伪军给以痛击，他们从来没有屈服过。人们称石明信沟为“中国地”，在抗日斗争中整整坚持了14年。

上面列举的是朝阳地区几支比较大的抗日队伍，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抗日武装。总的说从日军入侵到投降为止，朝阳人民的抗日活动从没有间断过。

二、朝阳地区抗日义勇军的战绩

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日军全部侵占热河这一期间，朝

阳地区的各路义勇军与日军作战，主要是在三条战线进行的。

第一条战线，是在日军侵占锦州前后，义勇军围绕北宁路灵活出击，阻止日军南下和西进。1931 年 12 月，蓝天林领导的抗日拥张铁血军在锦县羊圈子袭击了日军南进的先头部队。翌年的 1 月 24 日又攻打了石山站的日军，击毙多人，缴获步枪 50 多支。喀左县人李昆山领导的东北义勇军第十七路军，在北宁路两侧，配合十三路军攻打日军据点，破坏北宁路，使日军南下和西进都造成困难。

第二条战线，是围绕着争夺锦朝铁路(锦州至北票)进行的。日军于 1932 年 1 月初侵占锦州之后，特别是继而侵占义县之后，锦朝铁路便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锦朝铁路不仅是伸入热河省境内唯一的一条铁路，而且铁路终点又是通向工业重镇北票的。日军对北票的煤炭早已垂涎三尺，所以进占义县是他们的战略目标之一。1932 年 3 月 21 日，日军派出满载武装士兵的"第三装甲列车"从锦县出发，沿锦朝铁路越过义县车站，向前做试探性、挑衅性运行。被抗日义勇军耿继周部和孟昭炎部击退。之后不久，日军又派大特务石本权四郎乘民运列车到北票刺探情报，1932 年 7 月 17 日被义勇军李海峰部在南岭车站附近将其擒获，这就是当时震惊日本朝野的"石本事件"。日军就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列为西犯热河的借口之一。

第三条战线，是在锦西与朝阳县边界。1932 年日军占领锦州之后，又向锦西县城江屯进犯，妄图以此做桥头堡，向热河侵入。刘纯启、刘振东等人领导的朝阳、锦西民众抗日武装在江屯附近一举歼灭了日军的古贺联队。同年 6 月 20 日，一股日军从锦西出发侵入朝阳县哈拉贵沟，又向西进到羊山乡，接着又南犯至二车户沟与龙潭沟交界处时，遭到了王震、赵清泉领导的义勇军和民众抗日武装的袭击，当场打死伊藤等日军 23 人，剩下的 8 名日军狼狈逃窜，当跑到曹杖子后山时，又被王文福的民众武装击毙 2 名，其余 6 名

逃回锦西。1932 年秋，彭振国从北平来到朝阳县六家子，联合各路义勇军 4000 余人于 9 月 15 日攻打日军占领的江屯，日军从锦州派来大批援军作战，义勇军退回朝阳县境，锦西前线形成对峙局面，日军西犯受阻。

1933 年 2 月，日军纠集重兵分三路进犯热河省。当时驻守在朝阳、北票一线的热军董福亭旅，因其部下叛变投敌，反戈攻击董旅及义勇军，因而全线动摇，一溃不可收拾。日军 2 月 22 日占领了北票后，随即于 25 日占领了朝阳，3 月 1 日占领了凌南县城　牛营子和喀左的大城子，3 月 2 日占领了建平、凌源，3 月 4 日占领了承德，热河全部沦入敌手。原活动在朝阳地区的各路抗日义勇军大部分撤回关内。留在家乡的几支抗日义勇军，凭借山高沟险进行着顽强的敌后斗争，好似几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中，使日伪统治者惶恐不安。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于 1933 年至 1934 年间，在北票黑城子一带多次惩治作恶多端的蒙奸、伪旗长、"小王子"沁布多尔济，攻打黑城子王府，使日伪当局不得安宁。1935 年 8 月，伪军四十团团副"高二绝户"率 200 多名骑兵追踪蓝天林部，8 月 7 日在蒙古营子的十八畜山坳处，陷入了义勇军的包围，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激战，打死、打伤和俘虏伪军 150 多名，缴获战马 100 多匹，长短枪 110 多支，机枪 2 挺，迫击炮 1 门。蓝天林率



日本侵略军铃木美通少将踏上热河大地的狂态

2000多人乘胜追击，8月8日把北票包围，攻入城内与日伪军展开了巷战。吓得日军四处告急，日军从沈阳皇姑屯、锦县、朝阳各处调兵援救北票。日军援兵未到之前，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向蒙古营子方向转移。此次战役影响很大，伪《盛京时报》和日文报纸《新京日日新闻》都报道了这次事件。活动在朝阳县南部山区的义勇军刘振东部，也伺机频频打击日伪军。1933年秋在羊山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就击毙日军多名。伪《大同报》在10月7日第三版上以《羊山附近战斗战死者姓名》为题报道了这次战斗，声称刘振东"匪部一千五百多名与芦冢部队作战"，报道中还开列了战死者名单：伊藤柯四矢少尉、国枝国治军曹长、佐藤初太郎上等兵等22名。从日军表彰"战死者"荣誉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战斗的激烈及其损失的惨重。刘部又于1935年8月6日攻克了朝南重镇二十家子，处决了汉奸、伪警察署长马兰廷。活跃在喀左、凌源、建昌广大地区的郭文联领导的抗日仁义军和李天德领导的义勇军，经常联合作战，神出鬼没地战斗在高山深谷，辗转打击日伪侵略者。1937年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天下第一军，专打日本人，反满又抗日，杀富又济贫"。"仁义军"经常和讨伐他们的伪军四十一团作战。在1939年和1940年两年中，"仁义军"先后除掉了作恶多端的伪建昌县大城子警察署两任日本指导官小田宫平和日高宗秋。郭文联的反满抗日活动，使日伪当局十分惊慌，几次发出以万元悬赏郭文联人头的通缉令，又派汉奸抄了郭文联的家，烧了房子，扒了祖坟，打死了郭文连的岳父和胞弟。还在郭文联活动较多的地区搞"集团部落"，实行"三光政策"，又调集日伪军轮番追剿，都没有使郭文联屈服，反而"仁义军"声威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据守在朝阳县南部山区的石明信沟的"王老凿"抗日武装，使日伪统治者十分头痛，多次攻打石明信沟。大规模的血洗就有5次之多，但王老凿始终不屈服。从1940年起，日军对石明信沟实行了经济封锁，王老凿就在沟里装起14架棉花车子，自纺自织，还开了3处油坊，视日伪的政令

如空文，自种自食，自织自穿，守住家乡的土地。敌人来的多，“王老凿”就带队伍及百姓钻山沟。敌人不备，王氏家族武装就打回老家，消灭敌人。1943年以后，八路军冀东根据地几次派人来与王老凿联系，肯定他们的抗日功绩，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到底。

三、朝阳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地位

抗日义勇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民族爱国救亡运动。虽然它在日伪军的残酷镇压下，逐步趋于瓦解之势，但是直到日本投降，也未能扑灭这燃烧着的民族抗日之火。在朝阳地区，抗日民族英雄蓝天林壮烈牺牲；1942年著名的抗日义勇军领导人“仁义军”首领郭文联就义了；1944年另一支抗日义勇军的年轻领导人李凤春以身殉国了。但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并没有因为领导人的牺牲而停止，他们的部下还进行着力所能及的抗日斗争，使日伪地方当局不得安宁。朝阳县南部山区的“王老凿”抗日武装，一刻也没有忘记日军的存在，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随时准备还击来犯的日伪军。朝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应有的历史地位。

抗日义勇军兴起的第一阶段，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北宁路上频频打击日本侵略者，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民志、民气，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不能顺利得以进行。

在抗日义勇军进入了有组织的行动，与日军的进犯处于相持对抗阶段之后，各路义勇军相机而袭，连续打了几个震惊中外的漂亮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朝阳南部抗日军民配合锦西广大民众，在1932年初歼灭日军古贺联队的战斗，就曾使日本报刊惊呼：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因此，当1935年10月朝阳县刘振东抗日义勇军被日军打散之后，日本曾欣喜若狂，在日文报纸《新京日日新闻》头版头条位置上，以“古贺联队以来的宿

怨刘振东匪被消灭”为题报道了这次战斗的消息。

1932年7月,李海峰部抓获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事件,更使日军大伤脑筋。日本驻义县的宪兵大队长矢加部宗太郎,以急切心情致函李海峰,要求保住石本性命。由于当时驻守在热河的东北军无心抗战,所以各路抗日义勇军便成了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的主要障碍。

日军侵占热河全省以后,强行建立了各级伪行政机构,留在敌后的各股抗日义勇军不断灵活机动地出击,成了日伪统治者的心腹之患。日军在忙于前方的侵略战争的同时,不得不抽调大批兵力,用于维持所谓治安。《满洲帝国史》、《满洲国警察史》、《省政汇览·锦州省篇》以及《新京日日新闻》、《大同报》等敌伪书刊中,曾不止一次的以忧心忡忡的心情,记述着朝阳地区的所谓“匪情”。如伪《满洲国警察史》第九章第七节中写道:“……东边道地带的杨司令以下的红军系诸匪团,三角地带的阎生堂,滨江省中部及以北地带的赵尚志、张连科、考凤林等,东部国境地带的孔宪荣、吴义成。锦州、热河省境方面的蓝天林、刘振东、苑九占、老梯子、周荣久……”。上述均列为“肃整的重点”。把朝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领导人蓝天林、刘振东等人与杨靖宇、赵尚志相提并论,说明了朝阳地区的抗日活动对日伪统治造成的威胁程度。

在1940年至1944年间,八路军冀东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冀东党组织曾先后派出多股武装进入热河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这时活动在喀左、建昌、凌源地区的郭文联反满抗日“仁义军”,已得知共产党八路军在长城内外开展抗日游击的情报。于是积极行动,扩大势力,破坏日伪反动统治秩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他们一方面和李凤春领导的抗日救国军联合,一方面派人去冀东找八路军。这一计划虽被日伪统治当局发觉,壮举未能实现,郭文联、李凤春也分别于1942年、1944年先后被捕遇难,但是却搅得日伪不得安宁,客观上支持了冀东革命根据地,日军不得不

投入力量来整肃后方，在这里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搞“集家并村”。

由此可以看出，朝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运动，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它做为全国抗击日寇侵略战争的一部分，起到了配合正面战场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冀东区党组织派人到热河开辟热辽抗日游击区，工作之所以开展得较为顺利，是与这里的人民坚持14年的抗日基础分不开的。

朱霁青与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东北 3000 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朱霁青看到当时国破家亡的惨状，忧心如焚，不顾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毅然出关来到抗日前线，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

朱霁青，1882 年生于辽宁省北镇县。原名国升，又名自新，字纪卿。1901 年留学日本，不久便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运动，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任关外民军都督府总参谋长。1912 年任中国国民党奉天支部宣传干事，创办《东三省民报》。1924 年在哈尔滨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创办《平民周报》。1926 年朱霁青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委员。朱霁青素有爱国正义之感，“九·一八”事变后，他万分愤慨，不顾年已半百，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他多方奔走呼号，联络同志，筹备军需。许多人为他的爱国热诚所感动，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他于 1932 年 3 月，带领部分武装和枪支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戎装出关。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地处抗日前哨的朝阳县，在这里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自任总监。

在组建总监部的过程中，也是屡经磨难。朱霁青来到朝阳县时，到七道岭的大马场找汪孝芳。汪毕业于河北省保定农业专科学校，是朱霁青的好友，奉朱的指示，已先期回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朱霁青一行人进入朝阳县境内途经二道梁子村时，当地土匪头子杜清和(绰号杜三秃)，见其所带物资较多，见财起意，强抢了朱所带的全部物资。朱霁青焦急万分，但以大局为重，避免武力冲突，

便多方奔走求援。最后通过好友石凯廷找到了朝阳大屯村河南既有一定实力，又与杜清和相识的王景明、王景友充当说和人。王氏兄弟为人素张正义，慨然允诺。立即带几个人面见了杜清和，晓以民族大义，详论得失，痛陈利害，终于说服了杜清和放回了被扣人员，归还了全部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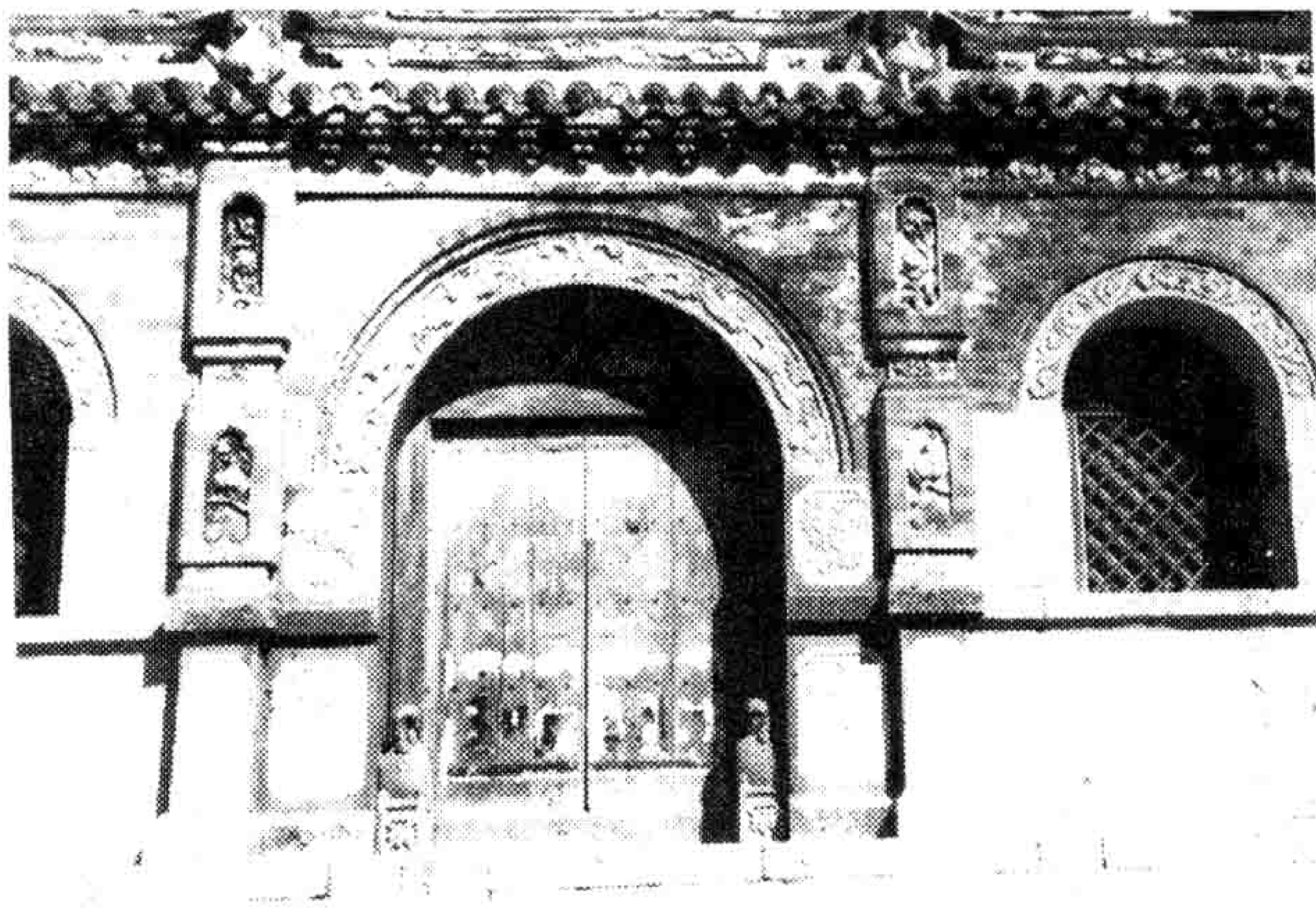
经过这次交往，朱霁青认为王景明兄弟二人，为人正直，见义勇为，爱国心切，值得信任，便以诚相见，把所带物资全部交王家兄弟保存。从此，王家兄弟也成了朱霁青的得力助手。经过汪孝芳、王景明、王景友等人的积极筹办，很快便在大马场汪元平家亮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的旗号。朱霁青委任王景明为东北国民救国军旅长，王景友为总监部的警卫营长。不久，为便于活动和指挥，又把总监部迁到朝阳县南部肖家店村的庙宇玉清宫内，进一步健全了总监部的组织机构，任命了汪孝芳为参谋长。总监部下设参谋、军需、作战、副官等八大处。

总监部建立后，朱霁青带领总监部人员立即不辞辛苦地投入到联络抗日队伍共同抗日和动员组织民众，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来。他在辽西、热东广大地区到处奔走呼号，一一拜访各路义勇军首领，以诚相待，反复申明联合抗日之大义。他首先拜访了奉张学良之命，已先期回到辽西地区组织抗日活动的原东北军宋九龄将军，与宋九龄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经过朱霁青的多方努力，辽宁、吉林两省许多支抗日义勇军部队领导人都与他建立了联系。特别是活动在辽西和热东的几支较大的义勇军队伍都先后接受总监部的领导和指导，有些队伍编入总监部的序列。活动在北票的李海峰部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一师，孟昭炎部编为第十四师，因消灭古贺联队而威名远震的刘纯启部编为第九师，驰骋辽西、热东的郑桂林部被编为第十三师。由辽西退到朝阳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耿继周部也接受了朱霁青的指导。

朱霁青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号召抗日救国，精神十分感人，朝

阳县境内的一些绿林武装和地方武装，纷纷响应朱霁青的号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刘振东、王震、苑久占，甚至曾一度反对他的杜清和都率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的行列。

朱霁青还发出了《告东北城乡各界同胞书》，慷慨陈词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东北广大民众"一心一德，努力奋斗，驱逐日寇出境，以保中华民族的荣誉，以免朝鲜惨剧的再演！"他不仅仅发出一般号召，还以身作则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宣传动员抗日救国。有一次他通过朝阳县羊山四台营子南八排会首朱寿昌，在总监部所在地肖家店召开了南八排军民大会。朱霁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控诉了侵略者的罪行。沉痛号召中国同胞"不论贫富，不分贵贱，有枪出枪，有马出马，无枪无马出人，都要积极参加与日寇血战到底！"演说中，他一声一泪，使与会者深受感动，个个义愤填胸。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较短时间，他的足迹就走遍了朝阳县南部根德、二十家子、羊山、七道岭、黄土坎等几十个村镇，深入宣传组织民众，不到 2 个月就有 2000 多人参加了义勇军。



抗日总监部所在地朝阳县羊山玉清宫正门

总监部还办了一份《抵抗》的油印小报，报道国内国际形势，宣传抗日胜利消息。还设立了一所军医院，由军医主持院务。

为了进一步扩大义勇军的影响，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朱霁青于6月末返回关内，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瞩目和支持。7月2日，他在上海对报界发表了谈话，介绍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进行浴血抗暴的情况，控诉了日寇的暴行，呼吁全国人民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7月12日，他又以“东北国民救国军指挥总监朱霁青率全体武装同志”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各级党部，国民政府各法团、各民众团体，各报馆并转全体武装同志、全国同胞”发了通电。又通过报界发表了东北国民救国军宣言，痛责不抵抗政策，严正指出只有奋起抗暴才是唯一出路，呼吁各路义勇军要协同作战，团结对敌。朱霁青奔走游说取得了重大成果，不仅在舆论上取得了全国广大民众的支持，也筹集到一些款项及军事物资。8月份朱霁青再次返回热东前线。

同年9月，朱霁青在肖家店召开了军事会议，所属的各路义勇军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朱向到会人员报告了关内之行的成果，研究了对敌斗争形势和对策，协调了各路义勇军之间的关系。因7月17日，李海峰部义勇军在南岭车站附近捕获了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日本侵略者气急败坏，气焰十分嚣张，不断制造事端，攻击抗日义勇军阵地。为了回击日本侵略军的挑衅，军事会议决定，采取主动出击战略，攻打日寇占领的义县县城。为壮军威和鼓励士气、民气，朱霁青、宋九龄率各路义勇军领导人在大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检阅。朱霁青及各路义勇军首领身着戎装，英姿勃发，使到会军民深受鼓舞，群情激昂，起到了战前誓师的作用。为有利于作战指挥，指挥部设在大马场。

1932年10月19日拂晓，朱霁青指挥数千名义勇军对义县的日伪军发起了进攻。义军从七里河车站和周家屯分东西两部对义县城形成钳形攻势。战斗异常激烈，激战了整整一天，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义军虽占了义县车站，但敌人凭借坦克、大炮等武器优势据城顽抗，义军无法攻入城内。这时从锦州出动的日本援军又

到,义勇军只好撤退。王景明、王景友兄弟及其他部分义军战士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一仗虽未攻下义县县城,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对侵略者们也是一次有力的震慑。10 月 25 日,宋九龄又指挥义军攻打一次锦州,毙敌 30 余人。

日军对朱霁青、宋九龄指挥义勇军攻打义县、锦州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派 6 架飞机到肖家店、大马场进行狂轰滥炸,并散发传单声言,谁捉住朱霁青交给日本人,给予重赏。日军又派部队到宋九龄的驻地沈家台一带进行疯狂扫荡,并到宋九龄的老家宋家屯烧了宋家房舍。

由于朱霁青矢志抗日,所以日寇对他恨之入骨。据 1932 年 9 月 12 日《京报》报道,日本人“悬赏十万缉朱”。日本人为了捉拿朱霁青,曾施展了种种花招。他们恶毒的一招就是在义勇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寻找代理人。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反复无常的杜清和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叛变了抗日到底的宗旨。嚣张的杜三秃声言要缴总监部的械,捉住朱霁青到日本主子那里去领赏。但朱霁青深受广大民众和义勇军战士的爱戴和信任,敌人的阴谋又一次落空了。朱霁青在热东抗日期间,密切联系民众,对人和蔼可亲,与士兵同甘共苦,平时布衣旧履,天冷时穿着冯玉祥赠送的一件旧皮袄。每餐都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经常吃高粱米饭白菜豆腐汤。下级看他年岁大,设法弄到一袋面粉,要给他开小灶。他得知后很生气地说:“吾既以身许国,死且不惧,衣食何足挂怀!而且士兵均食粗粮,余又何忍独吃白面!”部下均十分感动。这袋面粉长期存于军中,无人食用,成为一段历史佳话。朱平时工作极为勤苦,经常黎明即起,带领义军战士进行操练。因此,他与士兵和民众的感情十分融洽。当广大义勇军战士和民众得知杜清和图谋不轨时,二车户沟的王震和赵清泉,立即把总监部接到王伦沟的艾龙沟村,保护起来。广大民众争相保护朱霁青。杜清和慑于广大义勇军和民众的威力,未敢妄动。总监部迁到艾龙沟后,仍有数百人的直属部队,有马 40 余

匹，步枪200余支，迫击炮2门，机枪2挺，电台1部。他凭借这些武装又组织了一次阻击日寇西进的"大石线"战斗，把从锦西向东开的一股日军击退。

1932年冬，朱霁青的总监部在敌人内外的夹击下，处境十分困难，靠与广大民众同舟共济度过一道道难关。



坚守阵地的抗日义勇军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的迹象十分明显。朱霁青带领义勇军战士秣马厉兵，准备迎敌。2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时，朱率部抵抗，但在东北军撤退的情况下，孤掌难鸣，不得不把部分武器坚壁起来。

1933年5月，朱霁青偕汪孝芳、汪孝坦、祖景恩等人转道回到了北平。在北平他又广泛向各界呼吁，热切要求各界同胞积极支持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运动，造成了很大影响。不久，他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总参议。

忠肝义胆两兄弟

1932年3月，爱国将领朱霁青携带武器弹药来到朝阳县南部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自任总监。素有爱国之志的王景明及其胞弟王景友立即参加了抗日总监部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成为这支武装队伍里的两员猛将。在攻打义县县城的战斗中，王氏兄弟壮烈牺牲。

王景明，于1898年出生在小凌河畔的朝阳县大屯乡玉田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期，靠给人家打短工、扛长活，维持家庭生计。后又与胞弟王景友外出做生意，从锦西的虹螺砚一带贩运当地农民生活日用品，赚得薄利补济家庭生活。有一次遭到土匪的路劫损失很大，从此再也无资做生意了。兄弟二人无奈，去给大买卖人当保镖借以谋生。王氏兄弟为人讲义气，能济人之危，深受乡邻们信任。在护送行商的过程中，他们又结识了一些绿林好汉，更开阔了视野，壮大了声望。王氏兄弟与那些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和横行霸道的土匪恶棍形成势不两立之势，有时就配合绿林弟兄惩治当地的土豪劣绅。这样，使王景明的名声就更大起来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锦州一带，并向义县、朝阳进犯。国难当头，王景明弟兄二人便放弃了保镖的行当，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2年春，朱霁青一行人出关后来投奔已回东北的朝阳县七道岭大马场村的汪孝芳。朱霁青等人携带电台、大批枪支弹药物资，于3月间来到锦西县和朝阳县交界的二道梁子村时，突然遭到恶霸兼惯匪的杜三秃的劫持，连人及全部物资被一并劫走，朱霁青等人在杜家被软禁起来。

朱霁青向杜三秃再三晓以民族大义，痛陈大敌当前，应以民族

利益为重，尽快组织抗日队伍共赴国难。杜三秃执迷不悟，终不放行。朱霁青被他纠缠得十分焦急，偷偷地派出总监部成员石凯廷离开二道梁子到外地求援。石凯廷来到大屯一带，一面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一面广为联络仁人志士，设法营救朱霁青等人，保住军需物资不受损失。石凯廷经过紧张的联系了解，慕名来到大屯河南玉田屯的王景明家。他见到王景明后，便把朱霁青等人来朝阳组织抗日武装的意图和经过详述一遍，又把杜三秃怎样扣留朱霁青等人和军需物资的情况说了一遍。王景明听了十分气愤，拍案大骂杜三秃，然后说："杜三秃不识时局，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朱霁青等人带着军用物资来东北组织抗日武装，这是天大的事情……你不愿意参加抗日，反而扣押抗日的军用物资……耽误了民族大事这还了得！"最后，王景明又说："好吧，这件事包在我王景明身上，我王景明虽然势单力薄，为了营救朱霁青等人，确保所带的军需物资不受任何损失，我就是和杜三秃碰个头破血流也值得！"王景明说完这番话，并以宣誓的口吻庄重地对石凯廷说："请你放心，只要有我王景明在，就要豁出一切来保卫抗日的力量！"王景明说完立即叫他胞弟王景友找来几个可靠的弟兄进行紧急商议，具体研究了对付杜三秃的策略和办法，讲解营救抗日力量是我们每个善良的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又痛数了杜三秃心黑手狠的种种罪行。他重申，我们决不怕，只要有我们弟兄在，就要保护住朱霁青等人及所带的物资。大家听了王景明的讲解都十分愤怒，异口同声地说："大哥，我们听你的，要赶快行动，以防有变。"

王景明看弟兄们都劲头十足，说："立即套两辆大车出发！"他带领 8 名兄弟赶奔二道梁子去会杜三秃。

王景明带领众位兄弟来到杜三秃的门前，大车停在门外，他只身带两人进了院。杜三秃见王景明来了，心中已猜出了几分，不冷不热地接待了他们。王景明毫不怯弱，单刀直入地说："杜大哥，你我交情甚厚，今日有件大事相求，请你赏光允我办成。我是为了顾

全大局，非关我个人的私事，请你把姓朱的一行人及其所带的物资全部放行。因为他们是为了抗日救亡才不辞劳苦回到东北组织抗日武装。他们这种行动对你我以及东北的同胞都是十分有利的，你留住他们及其物资也没多大用场，可是他用这些物资组织起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意义远大，利国利民。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吗？请大哥赏光，将他们速自放行，王景明弟兄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后会有期，定当图报……”

杜三秃听了王景明的这番话，只是翻愣眼珠子不肯答应。不管王景明好说歹说，他总是低着头不言语，即不说放人也不说给物。王景明气得脖子都红了，心一横向随从人员使了一个眼色说：“伙计们，就这么办，杜大哥是抬头不算，低头算，把车赶进院来，咱们为朱先生扛东西装车运走！”王景明按着腰中的手枪，二拇指扣紧板机，双目瞪着杜三秃。杜三秃才抬起头正视王景明，表现出无可奈何的苦笑。弟兄们七手八脚地把所有物资尽都装入车内。

杜三秃平素了解王景明的豪爽性格，又自知截留抗日军需理亏，眼巴巴地看着王景明等人把东西都装车运走，没敢动枪动炮，只是冷冷地对王景明说：“你硬抢霸道惯了，谁敢得罪你呀！”

王景明对杜三秃一笑说：“杜大哥多加海涵，这些东西没有我姓王的一份，都是抗日的物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王景友叫伙计把朱霁青等人领到大车前，让他们清点后，用两辆大车载满军需物资离开了二道梁子。朱霁青等人来到王景明家住下。

朱霁青得到王景明的营救，感到王家兄弟真是侠肝义胆，实在令人佩服。这种爱国至上的精诚，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深受感动，觉得组织抗日民众浑身是力量。住了几日后，朱霁青向王景明提出要把总监部的军需物资全部交给王景明管理，暂放在王景明家保存。王景明考虑到他家距锦州较近，日寇已盘距在那里，恐有失误，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他说明了情况，并向朱霁青诚恳

地说:“我虽不能保管军需物资,如果抗日工作需要我的话,就是让我们兄弟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今后有什么事情就请你吩咐吧。”

朱霁青说:“如果这样,你不肯收存就把我们送到七道岭的大马场汪元平家吧。”王景明按着朱霁青的安排,把他们这一行人连所携带的军需物资全部护送到七道岭的大马场汪元平家。不久,朱霁青领导的抗日总监部就在大马场招兵买马。王景明、王景友兄弟二人也参加了抗日武装。朱霁青委任王景明为旅长(直属总监部),任命王景友为警卫营营长。

王景明自从被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旅长后,在朱霁青的领导下,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队伍,几个月的功夫,由70人发展到500多人。这支队伍的士兵大部分是朝阳南部的爱国青年,需要进行认真的军事训练后才能参加对敌战斗。王景明虽懂些骑马作战的常识,但还未正式带领指挥过这么多的战士。为了带好兵,打好仗,他不断地学习军事知识,亲自到教场操练队伍,很快使队伍提高了战斗素质。王景明所率领的部队战士,个个都敢猛冲猛打。这支队伍成为朱霁青抗日总监部所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

抗日总监部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发展成为20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大凌河以南的一些“绿林”好汉首领先后率队参加了义勇军,就连杜三秃也不得不参加到义勇军行列里来(后来投降日寇当了特务)。

总监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朱霁青与北票、锦西等地义勇军领导人协商,决定攻打义县。攻打义县之前,义勇军在大马场举行了阅兵仪式。朱霁青带领总监部的宋九龄司令和几位师长、旅长等一齐登上检阅台。王景明兄弟也英姿勃勃的地参加了这次检阅。

1932年10月,朱霁青指挥义勇军对义县城分四路进攻。一路主攻东门,一路主攻北门,一路主攻火车站,一路做为后备队。四路义勇军对义县城内的日寇守军形成钳形夹击之势。

王景明所率的旅共有1700多人,武器配备有4门迫击炮,有

手提式冲锋枪,武器较优胜。在朱霁青亲自指挥下,王景明率领部队掩护兄第部队进攻火车站的敌人据点。进入阵地后,他们便在旷野隐蔽起来。

10 月 17 日清晨,攻打义县的义勇军对敌形成合围局势后,发起猛烈的进攻。炮声、枪声响彻云霄,震天动地。王景明指挥队伍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掩护主攻部队前进。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义勇军将士猛烈攻击目标,奋勇前进。这时从城内开出一辆坦克车,喷吐着浓烟冲来,这辆坦克阻住了我主攻部队。王景明在掩体里看得清清楚楚,气得咬牙切齿。不一会,敌坦克停止了射击,从车里跳出几个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端着枪向我阵地扑来。王景明在掩体里站起身不顾一切地端着枪向敌人射击,刹那间敌人倒下了几个。就在这危急关头,王景明已被敌人发现,敌人向他猛烈地射击。他不幸中弹,当即壮烈牺牲。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将王景明的遗体抢回来背下阵地,敌人看清了我阵地情况,坦克又急开入我军阵地,机关枪喷着火舌把我军压制在前沿。正在作战的王景友听到哥哥牺牲的消息,眼含仇恨的泪水,说了声"为哥哥报仇!……"便奋不顾身,端着枪冲向敌阵,向敌人猛烈射击。不幸,王景友也被敌弹击中,倒在血泊之中,为国捐躯了。

战斗结束后,朱霁青怀着沉痛的心情守在王景明、王景友的遗体旁,命战士们把两位志士的遗体抬上运输军需的大车,指令王景明的同乡、战友段士奎护卫,朱霁青随灵车同行,返回了朝阳的大马场驻地。

王景明、王景友的灵柩运回玉田屯,安葬在他们的故乡小凌河畔的大地上。朱霁青率义勇军将士开了追悼会,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为抗日捐躯的王景明、王景友二位抗日志士,小凌河两岸的民众沉痛地记下了日寇欠下的这笔血债。

孟昭炎举家抗日救国

1893年生于今北票市黑城子镇平安地村的孟昭炎(字希尧),家境贫苦,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从12岁就给地主放牛,18岁到东北军张作霖的队伍里当兵,23岁随军驻防天津。

"九·一八"事变后,孟昭炎为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参加了天津成立的"中华民族自救会",并在其中积极工作。1931年末,孟昭炎受宋九龄的委托,收拢过去的旧部下30多人,举起"反满抗日救国军"的大旗,并回到家乡北票宝国老和奈曼旗等地招募新兵。孟昭炎冲破层层障碍,四处奔波,宣传抗日救国、先国后家的道理。首先,动员了自己的家族,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他的胞弟孟昭昆、侄子孟宪增、表弟韩风岐、唐国思等人,先后参加了救国军。当地群众赞扬说:"老孟家忠义救国,先国后家,男儿出征,母女看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招募了1000多名新兵。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朱霁青,任命孟昭炎为第十四师师长。孟昭炎奋起抗日救国,深得村中父老赞许。在《朱霁青传略及其前防情况》一书中载称:"该地实力最大的耿继周部与其十四师孟昭炎等,誓死抵抗,幸未丧失寸土尺地。"

1932年秋,在义县广宁山一带,孟昭炎的队伍与日本讨伐队打了3天3夜。虽然给敌人应有的打击,但终因孤军作战,而陷入敌人的重围。日军派人劝降,孟昭炎为麻痹敌人,便将计就计,使敌人放松了警惕。待半夜时刻,趁敌人不备之机,孟昭炎率领全部人马冲出重围,连夜开到黑城子庆丰局进行休整。1933年初,队伍又向西转移,途经赤峰,遇到蒙古军司令李守信(今北票市马友营乡大庙人)。李以老友和家乡人的身份,劝孟昭炎归顺。孟昭炎因李不

抗日，对其置之不理，继续西进。路遇汤玉麟部队的阻击，后与夏子国、刘黑七等人一同投奔了察哈尔省宋哲元的部队。

1933年春，孟昭炎部被编入抗日救国军第二十九军，孟昭炎任旅长。在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地区，该部队英勇地参加了有名的长城战役。1933年5月，孟部又汇同东北地区义勇军万余人，加入了冯玉祥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孟昭炎与当时驻守赤城的刘桂堂部，在察哈尔省的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县，进行了艰苦斗争。参加多伦战役时，孟昭炎在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共产党员)指挥下，身先士卒，顽强杀敌，与日寇进行了殊死搏斗，经过几天的激战，终于攻克了察北重镇多伦。

1935年秋，日寇在黑河川里达台修建飞机场，并派重兵驻守。孟昭炎率二十九军一个旅，与当时同驻龙门所一带的高荣兹部，出其不意地飞跃古长城，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于7月初的一天深夜偷袭了敌营，经一夜的白刃格斗，将敌人指挥官朱司令击毙，终于捣毁了机场。这一重大胜利震惊了中外，沉重的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激发起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但是，抗日与蒋介石的卖国是水火不相容的，就在赤城召开祝捷大会的第二天，抗日有功的孟昭炎，却被调到其他部队任职。

两年多的亲身经历，使孟昭炎的眼界有所开阔，所以他对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宣言，深为赞赏。这时，他为自己抗日屡屡受阻所苦恼，思想上逐渐有所进步。该部驻守在张家口怀安县时，就在他的默契下，该部两个连哗变起义投奔了红军。为此，孟昭炎受军纪处分，由旅长降为团长。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时，孟昭炎在二十九军任团长，奉令驻守芦沟桥到南苑机场一线。在事变当日，他亲自到火线指挥，并领兵用大刀与敌人格斗。当有人劝孟昭炎避免危险、到第二线指挥时，孟昭炎坚定地说：“我死也死在抗日第一线上！”在孟昭炎的指挥下，全团战士奋勇杀敌，其弟孟昭昆(孟昭炎部下的一个

连长),在与日寇短兵相接拼搏时,用大刀砍死十几个鬼子。当地群众深受感动,有人编成顺口溜颂扬说:“抗日爱国大刀兵,芦沟桥上打冲锋,打死鬼子桥下扔,河水染成红……。”这次参战的部队大部分壮烈牺牲。孟昭炎在连长孟宪增(孟的侄子)掩护下侥幸脱险。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占了北平,抄了孟昭炎的家。而孟昭炎因积劳成疾,重病在身,他只好离开部队,为躲避搜查,最后隐居在赤城县境内。

抗日志士孟广忠

孟广忠，1907年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大屯公社柳条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以务农、教书为业。为人正直，深得乡里尊敬。"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寇的暴行深恶痛绝。1933年参加了"东北抗日仁义军"，任团长、旅长。因积极反满抗日，于1937年10月5日被日寇须乡季三逮捕，惨遭杀害，英勇就义，时年31岁。

1931年1月2日，日寇侵占锦州后，锦西、义县、兴城相继失陷又向朝阳步步进逼。朝阳地区人民同全东北人民一样，不甘心充当亡国奴，怀着炽热的民族义愤，为保家卫国，驱逐日寇，纷纷拿起武器，自动组织抗日武装。就在这年春天，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朱霁青到朝阳、羊山一带进行抗日活动，把当地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国民救国军"，朱霁青为总监，活动于朝阳、义县、锦西地区。当时25岁的爱国青年孟广忠即参加了"国民救国军"，在朱霁青的领导下和王景明、王景友等人，在南六家子、头道梁子一带组织群众抗日，扩大抗日队伍。他们发动群众200多人参加了义勇军，孟广忠被委任为团长，积极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1932年10月上旬，孟广忠随同朱霁青领导的各路义勇军再次攻打义县。但由于日寇早有准备，防范甚严，四周又设有埋伏，经3次激烈攻击均未奏效。义勇军一部被敌寇包围，王景明和其弟王景友壮烈牺牲，战士伤亡了一部分，朱霁青带领义勇军撤回大屯。1933年5月，朱霁青率领一部分人撤回关内，孟广忠也随同撤退。

1935年，孟广忠从关内回到家乡大屯后，以教书、务农为掩护，继续宣传革命，组织群众，进行反满抗日活动。1935年6月，他参加了由苑九占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新华仁义军"，在朝阳县一

带进行抗日活动。

1937 年 3 月,刘子桩介绍孟广忠参加了由军长张广田、副军长王凤林领导的“东北抗日仁义军”。同年 4 月 3 日孟广忠被任命为团长,继续在朝阳县一带活动。由于他积极地到处动员和扩大抗日队伍,8 月份又升任旅长。

在日寇档案中也称:“昭和十二年……四月三日受到团长的资格后,在朝阳县下依靠旧匪贼从事招兵。同年八月二十日止,劝诱营长、连长级十三人入军,并报其军长王凤林,因而受到旅长资格。于是,军长指令,计划纠各部下袭击朝阳县……”从敌人档案这一记载中,也可见孟广忠积极进行抗日的情况。

1937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9 日,在日本锦州宪兵队本部副官兼特高课长须乡季三的指使下,日伪军在锦县、朝阳县、义县等地,大肆搜捕我抗日武装人员。在“东北抗日仁义军”军长张广田、副军长王凤林秘密准备攻打朝阳县城时,张广田、王凤林、孟广忠以及锦县、义县的抗日武装 97 人均遭日寇逮捕。孟广忠是在 8 月 19 日被汉奸杜三秃(朝阳县根德乡头道梁子人)告密,于大屯柳条沟村被逮捕的。

孟广忠被日寇逮捕后,同乡朱仲元等准备武装营救,但追至朝阳根德及二十家子也未能如愿。孟广忠、张广田、王凤林、张文波等 97 人被押送到伪热河省承德市军法处。1937 年 10 月 5 日,孟广忠等 10 人(王凤林死于狱中)被日寇杀害。

刘纯启毙“古贺”威震敌胆

1932年1月上旬，骄横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竟在毗邻朝阳的锦西县境内，遭到了同仇敌忾的朝阳、锦西两县武装民众的英勇抗击，并吃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之谓“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的大败仗。领导这次名震中外抗日壮举的民众领袖就是朝阳大地哺育的又一优秀儿子——刘纯启。

刘纯启，朝阳县缸窑岭乡(1961年划归锦西县)烧户沟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家。青少年时期，即以放羊、扛活为生。共有兄弟5人，刘纯启居三，因头发稀疏，绰号“亮三”。因不堪官府、豪绅的盘剥，青年时期即投身绿林，劫富济贫，深得穷哥们爱戴。“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举起抗日大旗，奋起抗击日寇。在1931年底，他曾参加由毕占一组织的，以反对贪官周铁铮和汤玉书为宗旨的攻打朝阳的战斗。1932年初又成为威震一时的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辽宁省政府迁到锦州。1931年12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辽西，气焰十分嚣张。东北军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影响下，军队及政府机关先后撤向关内。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辽西重镇锦州。占领锦州的日本陆军第二十师团，于1月5日即派出了以古贺传太郎少佐为首的第二十七骑兵联队和以石野中尉为首的步兵小队共100多人，出兵进攻位于朝阳县边境的锦西县城——江屯。随后又派出由松尾少尉率领的粮秣运输队做后勤支援，进驻了江屯。丧失民族气节的锦西县长张国栋于1月6日献城投敌。

官军败逃，日寇横行，县长投敌，这就更加激起了朝阳、锦西两县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民众纷纷主动串联，集结武装，准备抗击

日本侵略者。这时，江屯城内共有日军兵力140余人。当古贺传太郎得知周围群众正在调动抗日武装时，这个骄横自大的军国主义分子，自恃兵强马壮，根本没把中国广大民众看在眼里，决心出城“扫荡”，以显示日本帝国的所谓“军威”。1月9日上午，古贺调兵遣将，派松尾运输队回锦州领取弹药给养，留村上骑兵小队守城，他自己亲率50多名骑兵和石野步兵小队28人去城西，对民众抗日武装进行“扫荡”。这时以刘纯启为首的抗日武装，早已联络好朝阳、锦西两县的张恩远、刘春山、刘振东、李树珍等十几股抗日武装，做好了抗敌的充分准备，并公推刘纯启为总首领。这时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已达2000多人，更有无数的爱国民众做后盾。义勇军在江屯城西的上坡子、龙王庙和西园子一带设下了伏兵，严阵以待。

当古贺率领的一股日军走到上坡子屯，石野率领的一股日军进到了龙王庙屯时，立即遭到了民众抗日武装的突然袭击。由于出敌意料之外，日军仓促应战，陷于被动。而我广大抗日军民则越战越勇，许多民众也纷纷前来助战，一时间形成了草木皆兵之势。

石野一股日寇，被张恩远、刘春山等人率领的民众抗日武装，很快就打得死伤狼籍。石野身负重伤，余敌且战且退。古贺一股日军在上坡子遭到我抗日民众的猛烈攻击后，造成伤亡，抵挡不住。古贺仓皇率部夺路后撤，企图龟缩回县城。当撤退到西园子村时，又遭到刘国臣、刘存富率领的民众抗日武装的袭击。刘国臣等12人占据了村北土坎上的一座旧炮楼，处于居高临下之势，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住古贺一伙的退路。古贺象一头输红了眼的野兽，挥舞着指挥刀率先夺路而逃。刘国臣等人集中目标一齐开火，当即把古贺击中落马。两名日军前来救护，也立刻被击毙。敌机枪队长星野大尉也被击毙。疯狂了的残敌为了夺路逃命，放火焚烧炮楼，引起了炮楼内的火药爆炸。除刘存富等3名抗日战士幸免遇难外，刘国臣等9名抗日战士都壮烈殉国。抗日民众武装在大量杀伤敌人的

情况下，主动地撤出了战斗。下午3时，一伙垂头丧气的残敌抬着古贺等人的尸体，狼狈缩回江屯城内。

这一仗抗日民众武装取得了巨大胜利，除毙敌古贺少佐、星野大尉、石野中尉和野日中尉4名军官外，还击毙日军士兵40余人，击伤20余人，并打死和缴获战马30多匹，缴长短枪数十支和古贺的指挥刀1把。

在古贺大败的同时，奉古贺之命回锦州领取弹药和给养的松尾运输队，也遭到了和古贺同样的下场。松尾运输队30余人，在去锦州的路上，仅走出离江屯30余里的钱搭子屯，就遭到了严阵以待的民众抗日武装的突袭。民众武装虽然武器低劣，但士气高昂，甚至没有武装的广大爱国民众也来呐喊助威，把敌人团团围住。日军依仗武器精良，进行了拼死抵抗。战斗从上午10时，一直打到下午1时。城内的守敌，慑于群众的威力，唯恐送死，也不敢贸然出城。一场血战，松尾运输队的30人遭到了被全歼的下场。抗日军民缴获了机枪1挺、步枪27支、战刀1把、大车5辆。

两役合计共歼敌100余人。虽然抗日民众也遭到了数十人的伤亡，但这一仗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大败仗，杀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和锐气，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抗日战场上，特别是辽西和热东浴血抗暴的爱国军民。一时间，这一仗成了中日报刊的头号新闻，中国各报刊纷纷刊登这一胜利消息。而日本报刊则把古贺之流吹捧为具有“大和魂”精神的英雄，日本军部还追认古贺传太郎为中佐，到处大登特登其所谓杀身成仁、以身殉国的事迹和他的照片。但在吹捧中也本能地夹杂着哀鸣，在日本关东军出版的《满洲事变实志》一书中，就这一事件发出哀鸣说：“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并不得不承认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占领锦州的日本侵略军的头目们，遭此空前重大打击，虽然惊魂未定，但出于军国主义分子的本性，自然是心不甘，他们气急败坏地对锦西、朝阳两县抗日民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

1月10日和12日,他们先后派出足立大队、户波联队和依田旅团的炮兵中队,分别从锦州和兴城出发,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江屯一带大肆"扫荡"。刘纯启领导的抗日武装为避敌锋,保存实力,主动转移了。日军在他们遭受重大伤亡的地方,采取了灭绝人性的报复行动,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仅在西园子一带就屠杀了我同胞40余人,烧毁了民房200余间。在钱搭子屯杀死张广志、刘老臣等数人,烧了民房40余间。

这些侵略者在发泄兽欲、杀人放火的同时,仍然心有余悸,也唯恐古贺事件重演,惊恐之余,于1932年1月16日,夹带着汉奸县长张国栋,把伪旗公署仓惶从江屯迁到连山(今葫芦岛市所在地)。

日军撤出江屯后,刘纯启立即带领队伍进驻江屯,受到了广大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刘纯启除以保安司令的名义,张贴安民告示,维持社会治安外,还受民众推举,以代理县长的身份署理县政,长达40余天。从此,刘纯启更加声威大震,许多爱国志士纷纷投奔他的队伍。刘纯启把队伍进行整顿充实后,正式成立了公安大队,刘纯启任大队长。下设4个中队,由韩国举、陈中山、李全润、李长雨分任中队长。

刘纯启聚众抗日,击毙古贺的事迹很快传开。为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整编东北抗日义勇军时,把刘纯启的队伍编为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三十四路军(一说为三十六路军),任命刘纯启为司令。朱霁青的抗日总监部也把这支部队编入了国民救国军的序列,任命刘纯启为第九师师长。

1932年3月16日,刘纯启率部与孙雨田领导的三十三路军在新台门会师,祭旗誓师后,共同攻打兴城守敌,并先后参加了朱霁青和宋九龄指挥的两打义县和一打锦州的战斗。在打锦州战斗中,义勇军的浑九沟支队何占林部在"二郎洞"被敌军包围。刘纯启率部营救,一场激战,打退日军,使何占林部安全脱险。撤退途中,刘

部在钱搭子屯又与日军遭遇。刘纯启沉着地指挥战斗,除跑掉1人外,歼敌30余人,缴获敌人汽车1辆和武器弹药若干。

1932年10月19日攻打义县失败后,在敌人的收买利诱下,一部分不坚定分子投降了日寇,充当了汉奸。杜清和、曹荣轩等人成了日寇的鹰犬。由于日寇对刘纯启及其领导的队伍恨之入骨,他们便把刘纯启的队伍做为主要攻击目标。他们利用汉奸队伍,除从外部对刘纯启的抗日队伍进行攻打外,还从内部进行破坏,并多次以高官厚禄对刘纯启劝降。但敌人的种种伎俩都动摇不了刘纯启抗日到底的决心。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刘纯启仍率部坚持了敌后抗战,后终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了。但许多爱国志士不甘于当亡国奴,仍坚持小股抗日游击活动。

刘纯启因长期转战在野外,积劳成疾。虽然日寇和汉奸到处搜捕他,但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下,他免遭毒手。后终因医疗条件差,1933年秋病逝在朝阳县根德乡曹杖子村。群众偷偷地把他的尸骨埋葬在他的家乡烧户沟的北山上。

刘纯启死后,曾和他一起参加围歼古贺战斗的战友们——李树珍、张恩远、刘振东等人仍率领小股武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斗争,直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壮丽的抗日事业。

张恩远在围歼古贺战斗中,曾负伤。1935年11月4日,锦西警察署日军指导官斋藤正直带人把张恩远包围在一间偏屋中,当即将张妻打死,张恩远拼死冲出重围,后被人暗算致死。敌气急败坏,放火烧了张家的房子,并把张恩远的父亲和他四弟张恩义杀害。

刘振东率部坚持敌后抗日3年之久,1935年秋被日军重兵包围,刘振东也惨遭敌人杀害。

李树珍曾一度率部撤到关内,被东北军改编,后被缴械遣散。李回到家乡后又拉起队伍坚持抗日斗争,并与王震、刘振东等人多次联合对日军作战。1937年2月7日,汉奸杜清和(绰号杜三秃)领

鬼子兵把李树珍的队伍包围在小水沟，李树珍和30多名抗日战士壮烈牺牲，李树珍的17岁儿子李广福也为抗日而献身。至此，刘纯启领导的、以击毙古贺为引线而拉起的抗日队伍解体了。

日本侵略者对古贺被击毙一事耿耿于怀。因此，当他们占领热河后，便在缸窑岭一带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从1934年到1935年两年间，他们就在缸窑岭一带杀害我同胞400多名。仅杜清和一人告密和领敌人逮捕而送到朝阳杀害的就有130余人。

刘纯启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击毙日寇古贺传太郎的战斗及其他战斗事迹，在朝阳人民抗日救亡史上，将永远是闪耀着光辉的一页。

刘振东转战家乡坚持抗日

朝阳县七道岭乡小马场的刘振东，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民国初年，他年仅18岁就给财主家扛活、做工。这时，同村财主程家被抢，程家告发系刘家叔侄所为，虽无丝毫证据，但程家靠着官府势力，便把刘振东及其叔父刘五逮捕入狱。经严刑拷打，也没得到任何口供和证据，关押几年后被释回家。刘振东一怒之下，便投身绿林，并取号为“振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振东出于民族义愤，很快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

1932年初，刘振东率部参加了以刘纯启为首的抗日民众消灭日寇“古贺联队”的著名战役。

1932年1月3日，已攻占锦州的嘉村旅团司令部，以“扫荡匪贼”为名，派出由古贺传太郎少佐率领的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通称古贺联队)，共87名骑兵，前去攻占了锦西县城(即现在的江屯)。同时，日寇随后又派出松尾少尉率领的26名士兵组成的粮秣运输队、由石野中尉率领的步兵七十三联队一个小队，共28名日本士兵前去锦西支援。

日寇占领了锦西县城江屯的消息传开后，位于江屯附近的锦西、朝阳两县的广大民众，更是怒不可遏。许多地方民团的头面人物，部分绿林首领和军政人员，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自动抛掉前嫌，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共商抗日大计。以朝阳县烧户沟(现归葫芦岛市)人刘纯启(绰号亮三)、张恩远(绰号震东洋)等绿林人物为首，组织广大民众上千人，于1月7日晚包围了江屯。不可一世的古贺少佐，根本没把中国民众看在眼里，9日晚亲自率50多名骑兵和

石野小队的28名步兵出城扫荡。经过一天激战，古贺所率70余名日寇，除十几名逃回县城外，包括古贺在内的其余人全部被击毙。同时，奉古贺命令回锦州运弹药的松尾小队，共32名日军，也在去锦州途中的钱搭子屯被民众抗日武装全歼，无一漏网。1月16日，日寇少数残兵败将，仓惶撤出江屯，广大武装民众占领了锦西县城江屯，并推选刘纯启临时担任县长。这一仗不仅震动了日寇(他们声称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士气。率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刘振东，从此更加坚定了抗日的信心。不久，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偕同东北军中将参议宋九龄来到朝阳、锦西一带，发动民众抗日，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朱霁青的总监部设在朝阳县肖家店。经双方主动联系后，刘振东便率部正式参加了抗日义勇军的行列，并被任命为团长。

刘振东正式举起抗日大旗后，队伍很快发展到700余人。张相臣任副团长，下设3个营、12个连。第一营营长王廷(北票巴图营子人)；二营长卢奎臣(又名洪斌，良图沟人)，三营长姜廷相(又名姜小胡，巴图营人，后投敌)；九连长王九令(黑石营子人，现为农)。

1932年7月17日，刘又率部配合北票的义勇军李海峰部参加了攻打朝阳寺、活捉石本权四郎的战役。

1933年初，日寇有计划的大举进攻热河后，驻守在热河境内的东北军正规部队不战自退。这时，义勇军因寡不敌众，也纷纷取道热河向关内撤退。刘部在撤退途经建平北部时，被其他队伍阻截无法通过，刘又率部回到朝阳县家乡一带。从此，便开始了转战家乡坚持抗击日寇的艰苦斗争。

这时的环境是十分艰苦的。日寇在1933年2月，以重兵长驱直入，连续沿公路攻占了北票、朝阳、凌源以及承德等城镇，大部分义勇军撤走，只剩下部分小股未来得及撤退和不愿撤退的抗日武装，而日寇除不断增兵新占领地区外，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治安的

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刘振东毫不灰心,他利用守家在地、山高沟险以及群众支持的优势,与经常活动在朝阳境内的小股抗日武装王震部、苑九战部(均朝阳人)、李树珍部(北票人)、老梯子部(高鹏振,北镇县人)密切配合,灵活的打击日寇,扰乱日寇的所谓治安。所以,从1933年到1935年,在日寇报刊《大同日报》(汉文)、《新京日日新闻》(日文)及《满洲国警察史》(上卷)、《锦州省政汇览》等书籍报刊中,都曾多次惊呼刘振东的抗日活动。

在伪满《大同日报》1933年10月7日第三版上,以《羊山附近战斗,战死者姓名》为题,报道了刘振东等与日寇一次战斗的简况,报道说:“本月9日在朝阳东方羊山,刘振东、李寿臣(应为李树珍)、王臣(应为王震)之合流匪约1500百名与芦冢部队作战”。为表彰“战死者”的“荣誉”,在报道中开列了战死者名单,即伊藤柯四矢少尉、国枝国治军曹长、佐藤初太郎上等兵、三泽兼雄等22名战死鬼子的姓名、籍贯。从这篇多方掩盖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战斗的激烈,日寇损失的惨重。

在《满洲国警察史》第五篇第五章的主要日志中,还简要记述了刘振东、王震等人于1935年8月6日袭击了二十家子的简况,并在记述中诡称“日本军队救援”、“人质夺回”、“击退”等等。实际情况是:自1934年以来,日寇多次通过关系对刘振东等人诱降,关系人就是二十家子警察署长马兰廷。刘振东等人识破了日寇要通过诱降手段,把刘的抗日部队斩尽杀绝的阴谋,没有上当。于是刘、王联合,于8月6日攻占了朝阳县内的重镇——二十家子,活捉了警察署长马兰廷等人,并枪毙了这个日本人的走狗。待从朝阳来的日寇救援部队赶到二十家子后,刘振东早已率部转移了,又使敌人扑了一个空。

刘振东部一系列的抗日活动,给日寇以沉痛打击,引起了他们极大惊慌。加之此时日寇侵占东北已达4年之久,敌伪的统治更加严密,更加残酷,许多小股抗日武装都被围剿或解散了。所以,日寇

便集中力量，对付尚存的几股抗日武装，刘振东部就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在1935年秋，日寇以驻朝阳的松井讨伐队为首，集中了大量兵力，开始对刘振东进行围剿。

10月7日，日寇讨伐队与刘振东部遭遇。在人力武器都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刘振东仍率部英勇苦战。刘为了保存实力，曾率部几十人突围，往家乡小马场撤退。但日寇以优势兵力紧紧跟踪追击，终于在北四家镜子山下再一次陷于敌人重围，终因寡不敌众，这支坚持了4年的抗日武装力量，除刘振东等少数人化装突围外，其余的都壮烈牺牲。



战斗在抗日前线的抗日义勇军战士

这次战斗后，日寇在伪满新京(长春)1935年10月19日出版的日文报纸《新京日日新闻》的头版头条位置，用“古贺联队以来的宿怨，刘振东匪被消灭”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这次战况，并以“朝阳松井讨伐队的殊勋”为副题，大肆吹嘘其“赫赫战果”。而后，在同年11月27日至30日的《新京日日新闻》第三版上，刊发了《刘振东歼灭记》一文，连载了4天，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战斗的所谓经过，并大肆宣扬皇军的所谓军威。从日寇这种得意忘形、欣喜若狂的举动中，也可看出刘振东率众抗日的业绩。

王震抗日名震山乡

朝阳县二车户沟的王震，贫苦农民出身，青年时闯荡江湖，广为结交，仗义疏财，颇得乡邻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于朝南一带，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监朱霁青来朝阳后，慕王震之名，拜访了他。从此，王震参加了朱霁青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活动。当杜三秃叛变总监部时，朱问王怎么办？王震说：“不怕他，有我王震在，就有朱总监在。谁敢动总监一根毫毛，老子的枪是不认人的。”遂把总监部从肖家店大庙迁到艾龙沟，并给杜三秃捎信：“总监部是打日本人的，势力大得很！有北京的后台，有飞机大炮，我们连日本人都不怕，还怕你杜三秃？不斗你，因为你也是中国人，你要执迷不悟，我们就先把你收拾了。”这一番话真把杜三秃给镇住了，没敢对总监部动手。

王震在家乡二车户沟一带，联合赵清泉与赵万三(联庄会长)坚持抗日斗争，给日寇多次沉重打击。

1932 年夏季，日军进犯二车户沟，王震、赵清泉率众与敌交战，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

1932 年秋，王震大儿子结婚，各地抗日武装首领都来庆贺，王震也想利用这机会，共同商讨抗日大计。正在酒意方浓、话兴正酣时候，哨兵报告说：“日寇进犯，已经逼进沟口。”王震与众首领离席，执枪上马，立即迎击。在二车户沟梁后大块地，打死了日寇 23 名，仅有 8 名逃之夭夭。逃到曹丈子，又被王文福民众武装打死了 2 名。

1933 年 5 月间，从锦西开来日军几百人，进犯王震家乡二车户沟。王震、赵清泉率部阻击进犯之敌，他们把敌人引进艾龙沟，使敌

人钻入了“口袋。”义勇军的战士凭借高山深谷隐蔽起来，日寇找不到义勇军，夜宿于艾龙沟。第二天，敌人即将撤走时，王震率众在周围山上向敌人开火，敌人仓惶撤出村子，义勇军乘胜追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义勇军只有战士崔吉庆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同年5月末，从天台山下来一股日寇，他们用迫击炮猛轰艾龙沟，随后用飞机大炮作掩护，向艾龙沟进犯。王震、赵清泉、赵万三率部同心协力出击，激战半日，见敌众我寡不能久战，边打边撤，大量杀伤了敌人。

1935年春，王震去北京找朱霁青汇报抗日情况。6月，被朱派回查点总监部的武器弹药及处理有关事宜。

这时，正逢抗日义勇军团长刘振东和李树珍准备打二十家子伪警察署，王震就把武器全部交给义勇军使用，自己也参加了打二十家子的战斗。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于1935年8月6日不幸牺牲于二十家子北山上。王震虽死，但他抗日的英名威震山乡。

李海峰举旗抗日救国
智擒石本青史留名

李文玉，字海峰。1889 年生于现在的北票市上园乡跑达沟屯一个中农家庭里，曾在长皋村任过巡官。“九·一八”事变后，他爱国心切，举旗抗日，浴血奋战在辽西、热东，战功卓著。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的铮铮铁骨、抗日爱国之举，受到广大爱国志士的赞誉。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辽吉黑三省相继失守，日寇又对热河虎视耽耽。热河的军阀无视国家兴亡，大肆搜刮民财。朝阳的县官周铁铮就是一个手段毒辣的赃官，他逼得百姓倾家荡产，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热东人民面对这种时局极为不满。刚辞掉巡官离职回家的李海峰对乡邻气愤地说：“东北军有这么多兵，为什么不打呢！他们就知道卖国求荣，吸老百姓的血汗，真恨人啊！”1931 年 10 月，李海峰毅然起兵，他联合刘龙台的马子丹组织起有 30 多人的民众队伍，宗旨是抗日救国，抗捐罢税。

李海峰和马子丹为壮大队伍，首先动员富户有枪出枪、有马出马、有粮出粮。同时也号召穷人们参加抗日队伍。一个多月，队伍就扩大到 200 多人。另外，李海峰和马子丹商议要从撤退的东北军中缴获一些枪械来装备自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东北土地，东北的枪，东北父老保家乡，不想抗日空手走，丢下枪支我们扛！”1931 年 11 月，东北军十九旅的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约 500 人，在宋子泉营长率领下奉命向关内撤退，撤到刘龙台双山口北河套安营。李海峰和马子丹带队围攻，各村联庄会员也到附近山头助威，各山头老百姓向他们呼喊“中国大地不可丢，调转枪口打日寇！”“不打日寇也可以，丢下武器放你们走！”营长宋子泉是位爱国军官，由于当时受军命的约束，不得不违心地率领队伍撤退，但沿途又看到人民抗日

队伍蜂拥而起，促使他又想留在东北抗日，当听到义勇军的喊话后，心情十分激动，所以他果断地向士兵们下达命令说："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互相残杀，全部放下武器，就地待命！"就这样，双方一枪没放，东北军就地解散，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抗日队伍。李海峰和马子丹从这支队伍中得长短枪 400 余支，轻机枪 12 挺，重机枪 8 挺，大炮 2 门。从而，充实武器装备，整顿扩大了抗日队伍，马子丹任司令，郭子章、王占一、李海峰分别任一、二、三团团长。

1931 年 12 月初，马子丹和李海峰率抗日队伍进入北票，受到北票各界民众的欢迎。北票炭矿、农会和商会组织向他们捐献大洋 6 万多块，鸦片 2000 两，还有一批北票造的枪支弹药。

李海峰和马子丹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进占北票，进一步增强了胜利信心。1931 年 12 月 31 日，马子丹、李海峰率部配合毕占一部攻打朝阳，惩办贪官周铁铮。马、李部负责攻打北门，拂晓前发起攻击，经过 3 个小时的战斗，义军攻进朝阳。不久，汤玉麟从承德调来大批援军又夺回朝阳，义军撤退。马子丹和李海峰带队伍退到稍户营子。由于这次战斗损失较大，马子丹撤回到刘龙台，李海峰撤到三宝营子。从此，他们独树旗帜，重整抗日队伍。

1932 年 3 月，李海峰同朱霁青取得联系。朱霁青派来 30 多人充实了李海峰队伍，并把李海峰的队伍改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第四军第一师，李海峰为师长。

李海峰领导的抗日队伍因大部分来自农民阶层，深知民众的疾苦，同时李海峰为人正直，治军严明，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和爱戴。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举大旗，兴义军，忠正仁义李海峰；不扰民，真爱民，一心抗日杀敌人；威武不能屈，金钱不动心，爱国情意深。"

李海峰率部在朝阳寺、三宝营子、牤牛营子等大凌河畔地区袭击敌人，阻击日军西进热河。

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决定"调头把

圣战指向热河省”,并命令驻锦州第八师团要千方百计地抓紧“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日军加紧活动。1月7日,嘉村旅团占领义县。3月21日,日军第三装甲列车进犯到南岭。3月24日,日军飞机侵入北票上空。4月5日,日军由架设轻重武器的两列铁甲列车开路,强行将客车由锦州开往北票,并单方决定自此正常通车。不久,日本关东军派石本权四郎潜入北票进行策反活动,并在北票明目张胆地建立起“关东军司令部北票联络所”,石本任“联络所”的所长,悬挂日本国旗,气焰十分嚣张。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吹虚“石本权四郎是满洲事变单身潜入热河,首先在热河的北票插上日本国旗易于完成作战计划的魁首”。

石本权四郎到北票以后,一方面派遣许多密探潜入各地,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另方面频繁地接触以汤玉麟为首的大小热军头目,利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策反活动。

日军对热河的野蛮侵略行径和石本权四郎的间谍活动,激起了李海峰极大的愤慨。李海峰说:“明其道不惜家产,正其义不怕杀身,我要把‘天’捅个窟窿,摸摸日本关东军这个王牌!”所以,李海峰决定设计捉拿石本权四郎。



被李海峰部逮捕的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

1932年7月17日,李海峰探明石本权四郎“携带某种特别重要任务”返回锦州的消息,立即做好战斗部署。他命令参谋傅兆田带50人埋伏在离南岭车站东十多里的破庙子附近。此处是铁路通过的夹槽沟,沟长坡陡,地势险要,便于动手。为使火车及时停车,傅等用榆木轱辘将铁轨撑开。同时,李海峰还命令连长杨录带领12人,腰掖短枪,身藏利刃,扮成农民模样,进入南岭车站,等候上车。

石本乘坐的列车从北票开出后，义勇军的侦察员也尾随上车。午后1点多钟，火车进南岭车站。救国军侦察员在车上向杨录发出暗号，杨录等12人立即登车，按事先计划，分工做好一切准备，有的坐在石本权四郎的对面。石本权四郎是个中等个头，方圆脸盘，高高的颧骨，托出两只圆溜溜的眼睛，他查觉情况有些异常，狡猾地带领警卫离开客车座席钻入车长室。然而，车长室内也有救国军的人在那里等候他们，气氛极为紧张。



石本权四朗被逮捕的地点——南岭破庙子

火车行至破庙子，车头因脱轨而被迫急刹车。同时铁路两侧开始鸣枪，车上的杨录等人听到枪响立即动手。此时，石本权四郎见势不妙，急忙潜入人群中企图逃走，并要掏枪还击，但还未等动手就被杨录抓住。石本权四郎身边的两个护卫也被另外几位义勇军战上缴了械。旅客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慌失措，秩序顿时大乱。杨录等人高声大喊：“旅客们，不要怕，我们是抓日本鬼子的，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旅客们的钱财我们一点也不要！”旅客们的目光立刻投向石本权四郎身上，石本权四郎被救国军拖下车。下车时石本权四郎手抓车门，一位旅客手拿斧把砸他的手，他“噢”的一声撒开手，摔到车下。傅兆田和杨录等人将石本权四郎拖起，押着他奔上喇嘛洞山，暂押在喇嘛洞山庙里。在庙里义军扒掉石本权四郎的西服，令其穿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用绳子绑上他双手转移到三宝营子监禁。

石本权四郎被李海峰捕获以后，驻锦州日军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又立即向日本国民广播石本权四郎被捕的消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国内外宣传中，称李海峰逮捕

石本权四郎为重大事件,即“朝阳寺事件”或“石本事件”。
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如此大造舆论呢?除日本军事进攻热河的需要外,还因为石本权四郎是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

石本权四郎,于1880年9月15日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官僚家庭里,1902年毕业于明治学院。石本权四郎从小就受到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教育,立志长大“不想留在猫额头大的日本这个岛国里作事,而是着眼于向宽广的海外扩展”。所以,他毕业后立即进入近卫师团当志愿兵,不久提拔为士官勤务。

1904年,日俄战争时,石本权四郎随军进攻俄国租界地旅顺。当时,俄国占领的旅顺东鸡冠山炮垒是比较坚固的,用石本权四郎的话说“是难攻不落的……说不清越过死亡线总攻击多少次,敌人(俄国人)死守炮垒不能轻易让给日本人……日本人进攻损伤是会相当大的”。因此,10月29日,在发起总攻击前夕,石本权四郎给其在日军主帅乃木身边服役的长兄石本贯太郎写了一封绝命书信。

信中云:“我军终于决定明天进行总攻击,我的小队是突击东鸡冠山炮垒。我期望我定能第一个先登上去,决不辱家名请放心。我的行李中有各种物件,这些东西请兄用吧。”“我的骨灰请用卷我肌身的日章旗包起来,送到东京,这是我临终的请求。”

这封信虽言语不多,但把自己在异国土地扩张的野心和武士道精神完全暴露了出来。10月30日零晨,总攻开始,石本权四郎疯狂地冲击,先后身中四弹,最后“从堑壕跌落到山峪,鲜血不断地流出,一声不响地闭目了”。但是他没有死,他这种行径引起日本新闻界兴趣,有的采访报导,有的写诗颂扬。最后,他还到东京在高轮御殿受到了常宫与周宫两殿下特赐“沐浴谒见”。两殿下当看到石本权四郎拿出战斗负伤穿过的血衣时被感动,甚至流出眼泪来。两殿下接见后,依据战功他被叙勋六等功五级,并赐予金鸡勋章。石本权四郎受宠若惊,在伤势痊愈后,再度侵入中国,编入第三军,在

铁岭的西北边缘法库方面战斗。

1905 年,石本权四郎在奉天参加了反对清帝退位,进行复辟活动的宗社党。他参加宗社党,实际是为日本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扶持清朝重立,以死来担当这个任务”,并“活跃第一线”。后宗社党团首领邵荣勋被刺杀而停止活动,日本侵略阴谋未成而“石本饮恨至满洲事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向东三省进攻之际,石本权四郎认为“对天皇做贡献就在此时”,即刻赶到日军特务机关提供种种情报,并亲自率领参加宗社党以来 15 年间以个人身份苦心经营,并亲手训练的部下 600 余人,夜袭新民城,成为日军进攻辽西的开端。

1932 年 4 月 15 日,石本权四郎被关东军司令部招为嘱托,并依照日本侵略者计划,从锦州进入热河加紧活动。

石本权四郎不仅是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硬分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潜伏在中国的“中国通”。因此,石本权四郎被李海峰逮捕,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个沉重打击。对此,汤玉麟和热军认为惹了大祸,便惊慌失措地令驻南岭两个连队追踪李海峰部队,为日军讨要石本权四郎。而在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广大爱国志士无不拍手称快。北京、上海、广州等各进步报刊上都陆续报导了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上海有的报纸还刊登了石本权四郎被捕后的狼狈不堪的照片。李海峰活捉石本的事迹震动了国内外。两个月时间,他领导的队伍也不断扩大,很快发展到 1600 多人。李海峰作战勇猛,指挥得力,战功卓著,被活动在吉东的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之一的王德林委任为东北义勇军西路总司令。1932 年 9 月 4 日,李海峰宣布就职,并发表了就职通电:“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公鉴,慨自‘九·一八’变作,暴日占我三省,继乃陷我热河,得寸进尺,节节进攻,虎啮鲸吞,野心未已,兴言及此,曷胜悲痛,海峰激于义愤,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起义朝阳,历年迭在义州锦县一带,喋血转战屡

挫敌锋，际此国际风云日愈险恶，东北民众水深火热，亟待来苏，正恢复失土之候，尤我人效命之秋，兹奉东北义勇军王总司令德林，委任为东北义勇军西路总司令，即于防次就职，此后在王总司令领导之下，谒诚团结，继续抗日，本不屈不挠之志，努力奋斗，不达收复失地目的，誓不中止，特布闻，诸维垂察。

东北义勇军西路总司令李海峰印(九月四日)

李海峰在义勇军检阅式上讲话中曾说："炎黄子孙不可辱，民族气节不可丢"。李海峰在日本军国主义强大压力面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石本权四郎被捕后，关东军司令部对李海峰使出各种诡计，施展各种压力，但他们绞尽脑汁都是枉费心机。

日本关东军依靠自己现代化装备对李海峰使用武力，在石本被俘当天，日军驻锦州第八师团就从锦州派出携有轻重武器的装甲列车，又从义州(县)派出中村少佐指挥的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分别向热河省前哨阵地朝阳寺进攻。午后 4 时，装甲车开到朝阳寺隧道口，因铁路被义勇军事先破坏，日军装甲车脱轨。随之，义勇军从山上向日军进行了猛烈地射击，迫使日军装甲列车退回义州。

7 月 18 日凌晨，第八师团长西义中将又派高桥支队从锦州出发进攻朝阳寺，支援三十一联队中村少佐。同时，又令参谋吉岗带领一个小队乘装甲车到朝阳寺，并于 19 日邀见了北票参议邵子峰，向他递交了备忘录，给汤玉麟施加压力。从此，日军不断调动武力向义勇军进攻。10 月 7 日，日军派出以早川大佐为首的步兵第三十一联队从锦州出发，经义州、朝阳寺两个据点分三路向三宝营子围剿。一路经稍户营子，另一路经张宝吐，再一路由水泉、房申沟从正北和东西三面向三宝营子包抄。上有飞机狂轰滥炸，下有山炮、轻重机枪射击。凌晨四时，义勇军发现敌情，立即进行还击。由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义勇军从西南方向突围。在突围中，石本权四郎也被押着转移。为防止泄密和日军的偷袭，监禁石本权四郎的地址不断变动。在这次日军袭击之前，义勇军把石本权四郎转移到

离三宝营子十多里以外的房申沟南边仅3户人家的钱宝珠家。狡猾的石本权四郎听到飞机声和枪炮响，就嚎叫着赖在地上打滚。义勇军把他的耳朵用荤油灌住，堵上嘴，蒙上眼睛。当飞机低空掠过时，就将他藏在沟壑的灌木丛中。飞机过后，再把他搭在马背上驮着，跟随义勇军突出包围圈。附近村庄群众大部分跟随义勇军向外突围。没有来得及走脱的妇婴和老人被日军杀死15人，烧毁房屋129间，其它财产损失惨重。当局的调查报告中说："当时炸伤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百数多间，焚烧柴草粮食财物等项价格难数计，其三宝营子遭祸惨重，而四周距离村民悉已避不归……"。



日本侵略军就"石本事件"对义勇军进行报复

李海峰指挥义勇军从三宝营子突围后进入巴图营子，宿营于牤牛营子。日军进攻一无所获，以失败告吹。为防止义勇军的袭击，立即将部队撤回朝阳寺。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李海峰于10月19日，集中全部兵力参加由朱霁青指挥的攻打义州(县)的战斗。

日军在用武力野蛮围剿的同时，还不放过对李海峰诱降。7月22日，石本权四郎的长兄石本贯太郎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授意下，从锦州急忙赶到朝阳寺，住在朝阳寺喇嘛庙内。他利用各种手段收买汉奸探寻石本权四郎被监禁的地点，并利用朝阳寺当家喇嘛马洪志通过小三宝营子亲友白老四向李海峰说情，表示"愿出重金赎回石本权四郎"。后来日本翻译荆子勋被派来到李海峰处谈判。荆

劝李海峰说，投靠日本皇军，以后可以封官晋爵。李海峰听后勃然大怒，拍案站起，严厉地说："你们把我李海峰看成什么样的人，我不要钱，也不要枪炮，更不要官，只要日本归还我国土，否则别想叫石本权四郎活着回去！"

石本贯太郎与荆子勋同李海峰谈判几次，阴谋都未得逞。最后石本贯太郎从朝阳寺临走时颓丧地说："与匪贼们强硬地联络交涉，可是交涉又成了空。"

驻锦州日军第八师团西义中将又利用已投敌的毕占一到三宝营子找李海峰，劝李释放石本。毕占一见李海峰一身正气，就将话题转入陈述"驱汤灭周"旧情上来，但最后他还是露出本意，装作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挚诚，直言不讳地向李海峰劝说："日本人要石本，肯向你出钱，你就应该放他。看咱们这几杆枪能抵得住日本人吗？鄙人之见，以后成其大事，莫不如早日投降日本。"李海峰听他讲完一段诱降的话后，就用古往今来的英雄史实申明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气节。当日深夜，李海峰急速派人送信给热军，驻朝阳热军派一连兵带一辆大车迅速来到三宝营子。清晨，毕占一又会李海峰，见李海峰还是不肯答应放石本。他怒气冲冲地说："文玉，如果放出石本，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否则，我消灭你也是容易的！"李海峰哈哈大笑说："国有国耻，人有人格，你已经投降了日本，当了可耻的汉奸走狗，谁还和你是朋友。"并下令下了毕占一和随从的枪，将毕占一逮捕交给热军。热军将毕占一捆在车上，带回朝阳。

日军为威胁李海峰交出石本权四郎，每天从锦州出动几架飞机盘旋于朝阳寺、三宝营子、牤牛营子上空，投放大量红绿传单，并将每张传单叠成三角形，在三角内放一块硬币，诱骗群众拣传单造舆论。传单中威胁说："李海峰不同日本亲善，逮捕石本权四郎，如再一意孤行，铧子山以南50里顿成焦土，鸡犬不留……"李海峰对日寇每天的威胁极为蔑视。同时，为防止不测，加强了对石本权四

郎的看管。李海峰责令儿子李才、李铎、李和及侄子李荣直接负责监押石本。

石本权四郎虽然被严加看管，但他仍不老实，曾多次对李海峰进行策反活动，说："只要你答应放我，我可以给你金条，给你日币，要多少都可以！"李海峰只是轻蔑地一笑，回答说："中国人视黄金如粪土，需要你们给的是，还我东北三省！"石本权四郎诱骗李海峰不成，又在看守人员身上下功夫，非要同他们磕头结成生死兄弟。他还许愿说，只要放出他逃走，以后保证给他们讨上漂亮的日本姑娘。但同样遭到看守人员们的痛斥。

1932 年 12 月 3 日，日寇驻义县宪兵队长矢加部宗太郎妄想通过信函哀求，要回石本权四郎。信的全文是：

日本驻义州宪兵大队长矢家部宗太郎致李海峰司令函：

"海峰先生大鉴：久仰高风，未获晋晤，诚憾事也，昨会尊友王洪宾，倾谈之下，敬悉阁下处事稳健，度大量宽，诚非常人也，目下被拘钧座之石本氏，系小官民国七年以来之恩人也。氏乃磊落君子，视草人如主如宾，其为草人谋利益而奔走东亚各地，凡有二十余年矣，请询钧座部下当知详蕴。近因图满洲国之理想，贯彻往来于北票方面，连(联)络一切。为人寡欲好谈，年逾半百，昔日之工作，虽有未详，然现在之地位，仅一联络员，换言之即一浪人耳。当无偌大价值之可言。加以老令之躯，竟被拘置其人。等之焦忧，姑置不论，即曾受恩顾也。小官等亦觉惨然可悯也。小官前任锦州，今调义县对于石本一件，切愿求得谅解。窃即以足下之四周环境言之，如将石本释放，则应有种种便宜在焉。小官将私见及希望详述于王洪宾氏矣。

切祈足下观查(察)四周之情势，洞察寸忱，凡所欲言可经商王洪宾。务望以诚意相见，早日解决此事，是所切望。今满洲国治安已经维持就绪，满洲国人，亦欣喜非常，谅所深知，仅西、北两边尚未解决，而军部讨伐计划，已因之硬化，宁置人票于不顾，一举扫尽，

思之痛心状，祈早日放释是所致盼。今后遇机尚思一谒尊颜，余不多赘。敬候回音，顺请近安。

12月3日义州宪兵队长，矢加部宗太郎。

时隔不久，又派王洪宾持信前去与李海峰谈判说："如放出石本权四郎许以赎价日币57万元"，并劝李海峰归顺。李海峰凛于民族大义，气节不移，斗志不衰，继续同日军作战，进行着宁死不屈的斗争。

日军进攻热河是蓄谋已久的事，自占领锦州以后，经过一年的策划，日军已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而军阀汤玉麟口喊"誓与国土共存亡"，实则在承德已准备逃走。热军董福亭旅驻守朝阳，同日军对峙南岭，但团长邵本良叛变投敌，整个战局岌岌可危。李海峰在11月末从牤牛营子转战到朝阳，他对无家可归的义勇军战士不时地发出忧伤的感叹。他最后愤愤地说："日寇侵略热河省，又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将惨死在这群野兽们的屠刀下，我李某何不先处决被日本侵略者荣耀谓最早踏上热河土地，在热河上空悬挂起日本国旗的侵热"魁首"石本权四郎，以上告仓天下慰九泉英灵！"



日本侵略军在修理被义勇军李海峰部拆除的南岭车站附近的铁路

1932年12月15日，朝阳上空乌云密布，北风怒号，砂石飞扬。李海峰在日军侵略情报告急情况下，骑马赶到十家子河套，命令义

勇军战士戒严由朝阳通往北票的大路，并通知附近十家子禁止村民游动。9点钟，石本权四郎被6名义勇军战士押送到河套的沙滩上，这个以侵略中国为己任、终身从事间谍活动的家伙，仰起头朝军国主义的日本，象饿狼一样发出一阵嚎叫。李海峰让朝阳华林照像馆技师给嗜恶成性的石本权四郎照相后，下令处决了石本。

1933年2月，日军占领了朝阳后，石本权四郎的胞兄石本贯太郎火速来到朝阳，立即和几个军曹坐着汽车到处寻找石本权四郎的尸体。附近村庄老百姓都知道石本权四郎被处死掩埋尸体的地址，但是，从大人到小孩谁也不肯告诉敌人。石本贯太郎和几个日军无可奈何，跑到附近庵堂中抓来一位老尼姑，又到十家子抓来一位村长，分别对他们拷问。石本贯太郎穷凶极恶地举起皮带对准尼姑脸猛抽，尼姑瘦骨嶙峋的身子紧缩一下，承受着彻骨疼痛的毒打，几次被打倒，几次趔趔趄趄地爬起来，但始终没有告诉给日本鬼子。村长也是不讲，石本贯太郎被气得七窍生烟，"咔喳"一声抽出战刀，横在村长脖子上，刀刃划破肌肉，鲜血直流，但他得到的回答仍是"不知道"。

3月14日，日军通过华林照相馆在十家子河套找到掩埋石本权四郎尸体的地址。吉冈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找到石本权四郎的电报，并逮捕原义勇军战士韩文和，将韩文和拉到埋石本权四郎的地方。在挖掘尸体之前，石本贯太郎嚎叫着用双手举起战刀向韩文和头部劈去……日军陆军医院的院长金久保冬雄对石本权四郎尸体进行了检验，写了"死尸鉴定书"：

"各大小关节因冻结，挺直像椽子样强硬已不能屈伸，面部，胸腹部，于两肢的前半面招致弥漫性青紫症(发痞)，背面两肩胛骨部、背部、臀部一般招致梢强青紫症，腹部仅膨胀青紫症状，头面及后头部、背部左上肢一般地认为有沙尘凝结在一起的凝血块，两处听道及耳壳内部以及口腔两鼻腔，都充满有沙尘的凝血块。

上腭处门齿下端缺损三分之一，成牙关急状态。后头结节紧上

部皮肤面大开，虽认定是创缘不整的，直径二公分，深六公分触动了骨片的射入口，但无出口，认定出血相当多量。

再者，于左肩胛头直下部，有皮肤面发松的不正园形、直径一点五公分的射入口，搜寻其子弹的入进路，认定在前面上膊骨，骨头下约十五公分部位有枪伤的射出口痕迹。

再者，从前记之左上膊骨骨头直下之射入口(认定侧背的外侧有直径二公分深约六公分能摸得到的口径不整园形是射入口创痕，认定前射出口出血相当多量，属腋窝动血管射创)，其它于左上膊中央外侧，认定有长约五公分枪弹擦痕。

躯干上下肢无可特记事项。

右鉴定完毕。

昭和八年三月十八日

满洲国热河省朝阳关东军临时第三野战医院鉴定

陆军一等军医金久保冬雄印

3 月 18 日，日军强占朝阳民房做灵棚，逼迫朝阳附近 13 个寺庙喇嘛鸣钲鼓为石木权四郎搞所谓的诵经祈祷瞑福。用当时喇嘛话说，善死念佛经虽死尤生，恶死念赎罪经，死后下十八层地狱，这那里是在给他祈祷瞑福?!

3 月 19 日，朝阳警备司令部依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将石本权四郎火化，并派伍长和两名士兵护卫骨灰箱乘专车到奉天。同时，在处决石本权四郎地方正北 50 米处设 1.2 丈高有棱角的墓碑，碑上写着“关东军嘱托陆军少尉正八位勋六等功五级石本权四郎殉职之地”。

就在立碑这天，日军又从街里抓来一个四十左右岁的石匠——杨树廷，将其双手栓在墓碑的围桩栏上。当被驱赶前来的群众到齐时，一个长满黑胡须的日军象野兽一样，手握战刀朝石匠走去，到跟前一阵嘿嘿冷笑，将刀背放在石匠脖子上擦来擦去，突然一声嚎叫，举起战刀向石匠砍去，石匠脖腔热血四溅，衔恨死去。

3 月 25 日，以吉冈参谋为主祭，日军在奉天葬祭场又为石本举行了“盛大无可再加的葬仪”，天皇御前大臣、关东军司令部、侵华各师团、伪满各部大臣及各方面文武官员都送来花圈或挽联，日本国内也发来唁电，赞誉石本权四郎为“圣战之花凋落在热河”。

在日军进攻热河时，李海峰满怀国恨家仇率部向关内撤退，并在兰山参加了阻击日寇的战斗。不久，队伍解体，李海峰和几名志同道合的战友撤到北平继续从事抗日爱国活动。1934 年 9 月 18 日，李海峰和王德林、吴义成等著名抗日义勇军领袖在北平发表了“为‘九·一八’国难三周年纪念告国人书”，继续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

灭满抗日救中国　戎马生涯战热东

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抗日烽火燃遍整个东北的时候，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农民英雄蓝天林率众揭竿而起。蓝天林是北票市栾家窑人，从小家贫在外谋生，在板达营子区当过巡警，后参加奉军，1930 年离开部队，投身绿林报号“平东”，劫富济贫，在锦西苇塘一带占领盐滩。1931 年 10 月中旬毅然举起抗日旗帜，前赴后继，奋勇杀敌，出生入死，抗日七载，转战辽西、热东，最后为国捐躯。他那种爱国主义热情和斗争事迹，至今仍被广大人民群众传颂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绿林好汉蓝天林和他的部下，在田庄台和大洼一带，一面保护他们从官场夺取的盐滩和盐场，一面以惴惴不安的心情，观察东北战局的变化。他们每天都亲眼看到东北军的撤退，一列列载满士兵和武器的火车，摇摇晃晃的向关内驰去，还有些步兵和乘汽车、大车的官兵，犹如惊弓之鸟，慌忙的向南溃逃。难民更是蹭肩接踵、争奔呼号、自寻活路。

蓝天林和部下面对眼前的现实，心中十分酸楚。又听说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准抵抗”，实在是大为不解。11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蓝天林毅然召集骨干会议。这次会议有 20 多人参加，参加的人个个怒气冲天，没等蓝天林说话，大家就已经按奈不住内心的悲愤，有的说：“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通过日本鬼子削弱张学良的势力”。也有的说：“蒋介石要当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把东北这块地盘送了礼！”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说个没完。蓝天林站起来激动地说：“坐失东北不要，老弱妇婴被害，这是何等的道理！日本鬼子很快打过来，我们不能坐等受害，更不能与禽兽为伍，必须找张学

良请缨杀敌!”

会议的第二天,蓝天林带领21名弟兄,登上了从营口方面撤下来的四十九军长官部列车,并通过他们向锦州军部接通电话,蓝天林向长官部问道:“东北军对日寇侵略不战而退是何道理?”长官答道:“军人天职服从命令!”蓝天林问:“我们愿舍死求存坚决抗日是否支持?”长官通过电话请示后回答说:“张副帅有令,对民众抗日支持,你们如果在大凌河一带阻击敌人,军方供给枪支弹药”。蓝天林说:“江湖好汉向来置于枪刀箭刃之间,死而无惧,我们立即起兵抗日。”

蓝天林敢于激流勇进,很快树起大旗。为了表示全体弟兄的决心,红旗特选软缎做成,镶上白缎子飞边,上写“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11个大字,简称“铁血军”(所谓“铁”字的含义,是使军队成为铁的组织,去战胜敌人;所谓“血”字的含义,是为民族牺牲流血,卫国保家)。义旗之下组建军部,蓝天林为司令,薛振方为副司令,王品清为参谋长,并对士兵编制也重新作了整顿。从此,在东北军逃匿的情况下,他们却整装以待,进行抗日。

1931年12月中旬,日军先锋队骑兵百余人,由羊圈子向锦州方向扩张,蓝天林队伍首先接仗,袭击了敌人。随着战局形势的发展,他们先后以大凌河东苇塘和西广宁山为抗日根据地,袭击日寇,破坏铁路运输和电话联系,转战在锦县右屯卫、河甸子、盘山县、大清水沟、小堡子、大洼县的田庄台和北镇等地。铁血军均为骑兵,作战胆量大,枪法准,颇有名望,故又称“虎军”。

蓝天林这支“铁血军”,军纪比较好,他们就地筹饷,除此不再滋扰百姓。因此有些不堪日寇铁蹄蹂躏的破产农民,不肯随东北军撤退远离故乡的旧军人,以及爱国的知识分子,也都纷纷跟随蓝天林进行抗日斗争。另外,有些“山林队”也相继归顺蓝天林指挥。后来,蓝天林为壮大实力,对他们作了大量工作,希望他们在国难当头时不该任意绑票、勒索百姓。如归顺过来的“苑久战”、“战中华”

等山林队伍人数都不少。从此,“铁血军”这支抗日队伍扩大到1600余人,协同其他各部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阻止日寇南犯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12月以后,由于日寇武器装备的优势和对抗日队伍进行频繁围剿,使辽南地区人民抗日活动遭到严重破坏,活动在广宁山的“铁血军”,也被迫向热河东部转移。

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蓝天林在马圈子召开“铁血军”首领会议,研究下步抗日行动计划。蓝天林说,日本鬼子很猖獗,他们已经侵犯到山海关,各处都建立起伪政权,有些地方汉奸直接打击抗日力量,出卖抗日领导人,许多人都遭到杀害,抗日队伍被打散,这里的斗争很难开展下去,是否去热东和漠北地区,那里便于同日寇周旋。参加会议的人,多数赞同蓝天林的意见,愿意远征热东、内蒙,继续同日本鬼子搏斗。但是,有少数人不愿离开故乡,要求暂时隐蔽。唯独黄彩臣老人听到大家发言,却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我全家老小都被鬼子杀害了。儿子是地方自卫团长,被汉奸出卖杀头,妻子儿女也遭血洗,房屋被烧毁,60多岁的我,已身竭力衰,向哪里投奔。”这位老人哭的悲悲切切,大家都沉默不语,暗暗落泪。蓝天林从炕上跳到地下,正义凛然地说:“您老人家不必伤心,您儿子被敌人杀害了还有我,我拜您为义父,只要有我蓝天林在,就有您在。”对此,大家都非常受感动。最后,蓝天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虽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能离得开的都要跟我去,我们暂把士兵遣散回家隐蔽,明日起程!”第二天晚上,蓝天林率11名爱国志士,开始向热东北票方向进发。

这十几名的轻骑携带20多支长短枪,到新立屯经过化装,准备穿过闾山的日寇封锁线。日寇为彻底消灭抗日义勇军,便采取了大村驻兵,小村打更,山上筑瞭望台的措施。蓝天林为避开敌人锋芒,领队专寻小路前进。不料,走到长巴沟突然同敌人遭遇,敌人如狼似虎,围剿上来。蓝天林为使大家脱离险境,命令人们分散前进,

他自己留后掩护，结果臀部挨了一枪。他不怕流血，忍痛且战且走，最后终于摆脱敌人的追击。他们昼夜兼程，爬山过岭，经过四五天的时间，终于回到了蓝天林的家乡——栾家窑。到家乡后，蓝天林就立即去各处串联，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人们拿起武器打鬼子，为再举义旗作准备。

1933 年 11 月 17 日，蓝天林在大甲营子、平房等地，再度举起了绣有“抗日灭满救国军”7 个大字的红色三角狼牙义旗，还张贴了布告，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宗旨：“救国军起事目的，主要是为了推翻满洲国，驱除日寇，消灭汉奸，还我山河”，并号召“子弟袍泽要敌忾同仇，共纾国难。”起事这天，蓝天林还为乡村父老发表演讲，他说：“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无恶不做，百姓日子不好过。我们为保卫家乡，应该有枪出枪，有马出马，没枪没马也要出人，齐心协力抗日。好汉不怕死，有种的跟我走！”他慷慨陈词，乡亲们很受感动。蓝天林为表示抗日决心，他劝说妻子和 3 位嫂嫂返回娘家，要女孩早嫁，男儿当兵，令人用火把他家住宅点着(后来扒掉)。另外 7 户家族也都举家随军抗日，蓝家父子爷们和亲友从军的有 20 多人。在蓝天林的感召下，不几日就集结 300 余人，每个人胳膊上都带有袖标，写有“抗日救国，保卫家乡”8 个小字和“救国军”3 个大字。从此，蓝天林的救国军轻骑兵开始驰骋沙场，威慑敌人，振奋热东各股抗日力量。

1934 年 4 月，救国军扩大到 1000 余人，整编 10 个大队。6 月以后，八仙筒抗日武装周荣久率 400 余人，同蓝天林领导的救国军汇合。“老梯子”、“苑久战”等队伍也同时投靠了蓝天林。台吉营地区 29 个村的联庄会首张宝三和老虎沟地区民团，也率领附近村庄的乡众拿起武器，听从救国军指挥。总之，热东各地人民蜂拥而起，4000 余弟兄啸聚于蓝天林的义旗之下。

蓝天林领导的救国军没有军饷，其给养取之于民。每过一村一邑，向大户和中等户摊派粮草，买卖商户由商会负责人组织捐款支

援。由于百姓痛恨鬼子惨无人道,对蓝天林保卫乡土打日本鬼子深表欢迎,许多人是代筹给养馈送。蓝天林对军纪很重视,曾三令五申,严加告诫,并给军人制定约法三章,即:"不许抢夺百姓财产;不许污辱妇女;不许杀害无辜百姓。"违者严加惩处。每住一村一户,都有军法处的稽察兵检查。最初确有部分积习难改的土匪,奸淫良家女子,被百姓告发,按军法处置,枪毙者不下10人。胡匪"小阎王"好单独"拉绺子",抢夺百姓,后来被蓝天林知道,则诉诸武力,于1934年末将他打跑。所以,群众议论蓝天林的军队时说:"你说他是官兵不开饷,说他是胡匪不叫抢,他到底是那家军队?"最后群众得出结论:蓝天林的军队是一支农民抗日的军队。

救国军在热东地区和内蒙打击的主要目标是:日本侵略军、汉奸走狗及蒙奸王公。吐默特右旗的旗长沁布多尔济(也称小王子),就是最反动的一个。蓝天林代表农民的利益,对他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连续对他发动几次进攻。1934年7月15日,蓝天林调集全部兵力,对沁布多尔济的王府黑城子进行四面合击,战斗到第二天拂晓,将外城攻克(城墙周长8华里),只有内宅尚未攻破。这时,当地广大群众也纷纷起来,手擎刀枪助威杀敌。沁布多尔济拎着手枪,在院内四下督战。日本参事官和几个鬼子,也被吓得魂不附体,呼救北票火速派兵增援。后来日寇调集大量兵力,企图对救国军内外夹攻。蓝天林识破敌人阴谋,在已经给敌人重大杀伤情况下,命令撤军,并分散到各地活动,诱惑敌人,各个击破。1935年6月初,又按蓝天林部署,以周荣久部为主力发动了对奈曼旗的大袭击,这次袭击包围了奈曼旗公署,经过激战,打死打伤伪军几十人,活捉日本署官佐佐木、林三等8名鬼子,激于民愤,被绑到街上示众,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最后被一一处决。

同年8月7日上午,伪军四十团的高副团长(外号叫高二绝户),为袭击救国军,率200余名骑兵,从蒙古营经大巴沟到十八奋南老鹤子山的山坳处,被早日埋伏好的救国军包围。经过3个小时

激战，救国军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 150 人，剩有 40 多名伪军，向北票奔命逃窜。救国军缴获敌战马 100 多匹、长短枪 100 多支，2 挺重机枪、2 挺轻机枪和 1 门迫击炮。8 月 7 日下午，蓝天林率部将北票四面包围，司令部设在腰儿营子，救国军各部同日本鬼子和残余伪军展开了巷战，蓝天林率第一支队战士从冠山进攻，并攻下矿务局，接近铁路火车站。其他各路战士也英勇奋战，节节取胜。这时日寇向皇姑屯、锦县、朝阳等处告急，惊动了奉天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各处日伪军分别乘火车、汽车携带轻重武器昼夜奔赴北票。蓝天林迫于日伪军的压力，又发现“海暇”、“苑久战”、“老梯子”等队伍中有抢夺百姓的行为，唯恐造成极坏影响，经过 3 天的激战，于 8 月 10 日，命令各部火速撤军，向建平、内蒙北部转移。

两年来，抗日灭满救国军在蓝天林领导下，同日寇和汉奸走狗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每次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群众对此深表敬佩。所以，在群众中至今还传颂着这样一首歌谣：“朝阳五区第一军，军长大人蓝天林，顺天而作保民主，杀了富的救穷人。群雄并起把国治，义勇推出日本人，天从人愿成正果，满斗焚香谢上神”。



冰天雪地中在大凌河畔
与日军作战的抗日义勇军

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队伍也有了空前的壮大。自 1935 年以来，又连战连捷，每次都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使日本帝国主义受到很大震惊，因此他们把“东边道地带

有杨司令”(指吉林东部有杨靖宇将军),“滨江省中部及以北地区有赵尚志”,“锦州、热河省境内有蓝天林”列为伪满洲国“肃正工作的重点。”1935年10月初,日寇组织“秋季攻势讨伐”,对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发动全面进攻和围剿。这次日寇开展的秋季攻势,事先作了严密的组织:一、组织朝阳、建平、凌源、阜新、敖汉、奈曼等县旗共同“联防”,集中6个县的伪军,由日军精锐部队配合,兵分4路包围大黑山;二、指令各地自卫团配合警察,要村村设卡,步步为营,企图使救国军没有立足之地,最后使其疲惫拖垮;三、组织若干股蒙古骑兵,跟踪追击,分头歼灭。

蓝天林率军攻打北票以后,主动转移活动在建平和敖汉境界,队伍又扩大到500余骑兵。特别是同建平高体乾领导的抗日自卫救国军(这支军队曾受中国共产党热河特支秘密领导)汇合后,在炮手营子附近,与当地伪军打一次胜仗,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至10月13日,日寇对救国军发动的“秋季攻势讨伐”打响。首先是建平伪满军和日军发动进攻,救国军用迫击炮还击,并用机枪掩护,随后经过贝子府附近向大黑山转移。不料,救国军进入大黑山误中敌人的诡计,陷入了敌人已经布置好的包围圈中。救国军为寻找有利地形,抢占大黑山顶,投入战斗。敌人动用近百辆汽车,车上架有轻炮向山顶猛烈轰击。上午10时,日军又派3架战斗机盘旋在大黑山上空,寻找到救国军阵地,便疯狂地进行低空扫射和投掷炸弹,使各个山头上的救国军遭到巨大牺牲。但是战士们仍沉着迎战,一直战斗到半夜,蓝天林下令各大队要零点突围,突围以后向大乌兰方向靠拢。蓝天林要求周荣久部向北出击,蓝天林率部分人从大黑山的东山口突围,最后终于冲破敌人包围圈,使敌人在大黑山对救国军一举歼灭的企图遭到破产。

日寇发动的“秋季攻势”破产以后,更加凶恶地清剿没有离开的救国军。如:救国军独立团团长张宝三率领的22名战士活动在褚家沟一带,继续同敌人周旋,11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在长条沟同

近百名日寇遭遇，经3个小时的战斗，22名战士和张团长全部英勇牺牲。

蓝天林从大黑山东山口突围，顺老寨川来到祥顺号附近，收集余部约200多人，渡过牤牛河，而后星夜兼程，夺路绕行，3天后到了清河门地区。经侦察，知道日寇在广宁山附近已作好了拦截部署。针对救国军的实力和敌情，蓝天林决定召开领导人会议讨论研究对策，在会上高体乾首先分析了抗日斗争的形势，并提出了去外蒙边疆地区进行抗日的主张，他说："外蒙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们抗日救国，我们应该投靠他们，在中苏蒙交界处同日寇作战。"蓝天林认为，高体乾讲的有道理，并决定向乌珠穆沁地区进发。黑天经黑城子附近后，到建平下洼，准备在南山宿营。刚吃完午饭，敌伪蒙古队就从后边包围上来。救国军听到汽车声就往山上跑，与敌人交火至黄昏，救国军趁天黑，立即从下洼西南经王爷庙进入沙漠。以后又从西辽河响水河过河，到开鲁富通镇。这时已经是11月下旬，北部的天气特冷，部队尚未穿上棉衣。又由于天天打仗，昼夜行军，往往吃不上饭，致使许多战士病倒。特别是带路的刘某，胃病发作，不能随军行走，当时又没有地图，其他人更不了解蒙古地区风俗习惯，因此开会经过商议，决定再返回朝阳建平地区活动，随之向南挺进。这一路往返几千里，不分昼夜都有战斗。当队伍进入下洼时，已人困马乏，而这时敌人又三面围攻。高体乾被迫带部分军队与蓝天林惜别，开往



抗日义勇军坚守在冰天雪地的阵地上

建平方向。蓝天林继续向东南拼杀，直奔大黑山。1936 年初，救国军被迫化整为零，对日寇进行隐蔽斗争。

蓝天林携带武器，在群众掩护下秘密活动在大黑山地区，他向人们说："日本鬼子早晚得被打垮，小王子沁布多尔济和一伙汉奸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他充满着战胜敌人的信心，一方面营救被敌人抓去的战友，一方面又领导部分坚定分子打击汉奸和鬼子。他大哥蓝天支战死在沙场；他二哥蓝天启被鬼子捕获活埋；他的侄子被屠杀；他亲属被鬼子用火烧死；他的骨干王海子被鬼子剖腹挖心摘胆。尽管敌人如此凶狠，但蓝天林一直没有离开家乡的抗日阵地，一直战斗到 1937 年 8 月。在 8 月中旬的一天，由于叛徒告密，被伪满军包围在南平安地。蓝天林很有骨气，誓死不降，身体多处受伤，仍英勇激战两个多小时，最后壮烈牺牲。时年仅 39 岁。

蓝天林坚持抗日 7 年，他先后在辽东、辽西、热东、内蒙广大地区组织"铁血军"和"救国军"，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直到最后付出重大牺牲。他那种爱国主义精神，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传颂，他不愧为中华民族抗日英雄！

抗租抗日的张宝三

张宝三是北票台吉营乡二合成村人，生于1889年。他原籍是山西，因闹灾荒，生活无出路，其祖父逃荒来到北票，投奔早从山西来的开烧锅的张老西儿。到了张宝三的父亲张义这辈人时，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用积攒起来的钱，买了二合成村姓李的1200亩“皇牌”地（“皇牌”地：指从外地迁到黑城子的农民，向王府花钱买下“皇牌”，有了“皇牌”就可开垦在黑城子王府管辖内的荒地，然后按开垦的土地多少向王府交纳“皇牌”地租），开始过上了独立的小康生活。张宝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有土地，又得向王府交地租的农民家庭里。

张宝三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他在青年时期就好抱打不平，敢于出面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深受村民们的拥戴。时至辛亥革命后，按照中华民国政府的规定，为抵御土匪骚扰，允许村民自愿结成保甲、联庄会等自卫组织。河夹芯子一带也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因此也成立了联庄会，并推举了在村民中很有声望的张宝三当了会首，有28个半村在他的管辖之下。

联庄会的成立，虽能抵御土匪的破坏和骚扰，但不能抗王府繁重的地租。每年秋收过后，王府就派人到河夹芯子一带收地租。他们先是要钱，没有钱就得用粮顶。农民交出的粮食，要送到王府专设的收租机构“庆丰局”，再用风车风一遍。如风出谷秕，不但不顶租，而且全部没收，害得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张宝三家耕种的1200多亩“皇牌”地，当然也是交租户。他目睹了王府残酷剥削欺压村民的罪行，对村民痛苦深表同情。为保护当地村民的利益，决定以联庄会的名义同黑城子王府开展抗租斗

争。他告诉全体村民，没有他的许可，谁也不准向王府交地租。村民们有张宝三撑腰，就不怕王府的欺压了。“小王子”沁布多尔济对此很气恼，但由于他们正是衰落时期，拿张宝三也毫无办法。后来，沁布多尔济也吓跑到北京去了，王府的人就更不敢轻易到河夹芯子一带活动了，于是张宝三组织的抗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沁布多尔济通过两姨妹婉蓉(伪皇后)的裙带关系，于1932年被溥仪封为和硕亲王，并兼任吐默特右旗旗长。1933年日军侵占北票以后，日本特务余葆、“顾问”田中等扮演了一出“邀请流浪北京的蒙古王公五世子回东北料理祖业”的丑剧，在紧锣密鼓声中，“小王子”沁布多尔济回到北票，登上了吐默特右旗旗长的傀儡宝座。自此后，黑城子王府有日本人做靠山，对耕种“皇牌”地的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榨，更加变本加利。他们在“庆丰局”豢养了一批凶恶的摧头和打手，到了秋收季节，就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到农民家里摧租逼粮。对不按时交租的，非打既骂，甚至抓到王府关押起来，有的还被残害致死，致使当地百姓民不聊生，流离失所。

张宝三对王府的暴行十分气愤，为保护当地村民的利益，他不畏强暴，决心带领群众继续开展抗租斗争。“小王子”为了收回河夹芯子一带多年的欠租，以解对张宝三的心头之恨，曾几次派摧头到这里强行收租。由于张宝三和村民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摧头，强行收租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小王子”没办法，企图以收买的手段稳住张宝三，以达到顺利收租的目的。他派人到张宝三家求和，说：“你张宝三能否说句话，让村民们都把欠租交了，至于你自己那份，王府决定不要了。”张宝三听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个话我不能说！我也不交租！只要我不交租，你们也休想在村民手中拿走一粒粮！”

“小王子”听说张宝三抗租如此坚决，决定以旗长的身份传张宝三到旗公署。然而，村民们坚决不让他去。大家说：“如果传张宝三去旗公署，我们就都跟着去！”弄得“小王子”毫无办法。为了整治

张宝三,"小王子"同日本人勾结起来,又对张宝三采取了一个欺骗手段:1933年秋的一天,从北票城里开来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翻译,径直把车开到张宝三家。他们见到张宝三后,便拿出传票说:"有人告发你通匪,朝阳衙门传你去!"张宝三想:我根本没有通过匪,更没有做过贼,朝阳衙门传我怕什么,竟毅然跟着来人上了汽车。

谁知汽车并没开往朝阳,而是开到黑城子板达营子村便停了下来,接着上来几个人,连推带搡地把他推到一间土房里。张宝三进了土房后,发现还有几个人已在里边,经询问才知道都是因抗租或交不起租子而被抓来的农民。这时张宝三已完全明白了,这是"小王子"勾结日寇为致自己于死地而耍的一个大阴谋。他想:这里绝不是久留之地,必须想办法逃出去。于是,他用带在身上的大烟土(鸦片)贿赂了看守,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爬出了土房。

张宝三逃回家后,村民们都来探望他。有的人说:"你虽然逃回来了,但小王子决不能善罢干休,一定还会寻机报复,你干脆组织大家反了吧!"也有的说:"小王子有日本人当靠山,有权有势,咱们斗不过他,不如忍了这口气,把欠租都交上吧。"张宝三也知道今后必遭大祸,但还一时拿不定主意,恰巧一连收到了曾在广宁山一带拉起抗日队伍、又回到家乡北票的蓝天林寄来的三封信,劝他要借些机会立即组织民众,拉起队伍,打起反满抗日的大旗。然而,张宝三对蓝天林的主张虽然很赞赏,但又考虑到他现在已是20多口人的大家庭的家长,如就此举事,必殊连家属,另外,他又想到现在拥有2000多亩地的大家业,如果就此造反,其家业也必毁于一旦。因此,又有些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张宝三碰上这样一件恼火的事。1933年冬初的一天,从内蒙过来十几辆卖粮的大车,晚间住在三家窝铺村,结果却被红山咀一伙土匪把拉车的全部牲畜抢走了。他们留下话说:"这是张宝三领着干的,要赎牲口就去找张宝三。"张宝三听说后,更是无地自容。本来就无路可走,这又被土匪索联上

了，只有走组织民众起来暴动这条路了。由于他在当地威望很高，可说是一呼百应，很快就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打起了反满抗日的大旗。

张宝三的队伍刚一组成，斗争的矛头就对准黑城子王府。1933年冬季，他带着队伍首次向黑城子王府发起了武装进攻。他们秘密包围了黑城子，晚间开攻。他们使用的是套筒子、连珠枪等土枪土炮，整整打了一夜，把城门楼打着了火。但是，由于这支队伍刚成立不久，尚缺作战经验，再加上黑城子王府组成的旗警队都是由日军配备的洋枪洋炮，戒备森严，所以一直到天明也没有攻克城堡，张宝三只好带领队伍撤出了阵地。

攻打王府没有成功，张宝三便率队伍到牤牛河东、河夹芯子和西黑山一带活动。他们一是宣传反满抗日的主张，二是继续扩充自己的力量，三是打击土匪，保护农民的生产与安全。有一次"小阎王"带领一股土匪窜到台吉营乡郎家窝铺一带枪掠、骚扰百姓。张宝三就带领队伍包围了这股土匪，在郎家窝铺马场附近打了一仗，当场打死土匪小头目"双标"和"乐子"(包括"小阎王"均为匪长)。此后，"小阎王"这股土匪再也不敢到河夹芯子一带活动了。村民们十分感谢张宝三，都说张宝三的队伍是一心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村民们还集资给张宝三买了一支新式手枪，以表示拥护和支持他领导的抗租和反满抗日活动。

张宝三自组建起农民武装队伍之后，就同蓝天林的抗日救国军加强了联系，并接受了蓝天林的指挥。后来被蓝天林编为"抗日灭满救国军独立团"，任命张宝三为该团团长。

自张宝三攻打王府之后，"小王子"沁布多尔济十分恼火，决心对其实行报复。1934年秋，"小王子"同贝子府相勾结，集结了两府的旗警队200余人，趁张宝三和他的队伍在牤牛河东活动之机，窜到河夹芯子，先是放火烧了新二色村的烧锅，接着就直奔二合成村，把张宝三家的60间住宅全部烧成灰烬。而后，"小王子"又派

20 人的马队，把二合成留下来的几名榜青的看管起来，又从黑城子、板达营子等地抓来四十辆大车，用了两天时间，将张宝三 1200 亩地的庄稼全部割倒，并拉到黑城子王府。他们又到四合成村，把给张宝三榜青户的耕畜、羊群也全部抢到王府。

张宝三闻听这个消息后，立即向蓝天林做了汇报，要求严惩沁布多尔济这个民族败类。于是，蓝天林决定拔掉这个祸根，为人民除害。蓝天林调集了他的全部兵力，并同张宝三的队伍合兵一处，对黑城子王府进行四面合击。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头天晚间开始投入战斗，第二天上午就攻克了外城堡，紧接着将小王子的内宅团团围住。“小王子”和他的旗警队负隅顽抗，一直到第三天上午，日寇调来大量兵力，企图对救国军进行内外夹击。由于蓝天林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对“小王子”给予了严重打击的情况下，便率军迅速撤退了。此后，张宝三所领导的队伍继续活动在牤牛河东、西黑山河夹芯子一带，并同蓝天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进行着艰苦的反围剿斗争。1935 年 11 月初，为避开敌人的锋芒，张宝三按照蓝天林的指示，将独立团化整为零，开始向大黑山撤退。在撤退途中，处处遭到敌人的围追阻截，队伍伤亡惨重。11 月 15 日时近半夜，张宝三和他的弟弟张怀三、大儿子张廷带领 12 名战士，骑着战马撤进了大黑山区的长条沟村。这个村是个只有 6 户人家、46 口人的小沟。然而，这条小沟敌人也没放过。当太阳刚露红时，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的四辆卡车开进了村。张宝三发现敌情后，立即组织战士投入战斗。村民们听到枪声也立即向后山沟转移。张宝三面对 100 多名日军并没有胆怯，为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展开了英勇还击。在激战中，张宝三的大儿子张廷，曾骑着战马冲出了包围圈，但看到父亲和叔父还在继续战斗，又返回阵地继续同敌人搏斗。战斗一直打到太阳要落山的时候，终因寡不敌众，张宝三和全体战士均光荣地牺牲。张宝三时年只有 46 岁，为抗日护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朝阳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卖国政策，东北军不战而退，日寇大举进攻东北。而后，又继续向热河、关内进犯。在这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之际，李昆山毅然奋起组织抗日义勇军，也是在朝阳地区境内第一支举旗抗日的义勇军。

李昆山，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南公营子白草沟村人，生于1896年。他家境贫寒，为人谦恭，以礼待人，仗义疏财，因而人们送他绰号"交得宽"。直奉交战时，李昆山在热河省总督汤玉麟部下为骑兵第二营营长，在随军攻打山西太原时立过战功，受到总督汤玉麟信任。后又到朝阳任副团长，由于和团长汤玉书(汤玉麟之弟)政见不同产生矛盾，遭到汤玉书的陷害，监禁在朝阳监狱。后经故友营救出狱，于1931年11月底离职回家。

1931年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于北平成立后，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救国斗争。不久，抗日救国会的金德宣、李芳廷二人一起来到李昆山家里，对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提出请他出面组织抗日队伍。李昆山当即表示："一定要同日寇血战到底！绝不当亡国奴！"金德宣、李芳廷二人对李的爱国思想深表赞赏，当即委任李昆山为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副司令，在李芳廷司令领导下，具体组织抗日义勇军。事后，李昆山带领朱玉(妻弟)，激情满怀的奔走在建昌、兴城、绥中一带，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筹建抗日武装，深得各界人士赞助。

李昆山首先得到建昌县公安局长郭九朋的支持。郭九朋为李昆山出谋献策，提议先招募建昌岭下各股绿林武装，一不用购买武

器;二有作战经验;三是大敌当前,共赴国难,也有利于地方治安。再以这些人为基础,扩大队伍。建昌岭下大北沟贾凤廷、大屯李芳圃等爱国士绅也表示支持,答应供给粮谷、草料等军需物资。药王庙的原东北军辞职在家的杜春阳也积极协助,并提议要尽早树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为迅速组织抗日队伍,李昆山四处奔波,先后到黑山科找宫九江,到沙磨山找贾凤廷,到韩家屯找韩荣久,到大屯找李芳圃,到高丽沟找玉青,到鸽子洞找佩丰,到新台门找孙雨田等人。利用这些人在当地的威望,互相串联,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就动员出 30 多个有山头名号的大绺子和一部分联庄会,总计 2000 余人,很快组成抗日义勇军。李昆山的抗日义勇军共编 3 个大队(团级),设一个司令部。任命宋吉甫为参谋,韩荣久、单福臣、孙雨田为团长;朱玉、王发、王成喜、李德等人为司令部人员。各团的建制有:草上飞部 50 人;占东江部 60 人;东来好部 100 人;北河(吴万喜)部 30 人;宫九江部 50 人;九江龙部 50 人;窜山虎部 30 人;桥上飞部 100 人;串地龙部 50 人;青山好部 30 人:朱福臣、朱福宝部 100 人(联庄会);单福臣、宋吉甫部 500 人(民团);冰沟窑王老君部 20 人;正大有部 100 人;大五龙部 50 人;爬山虎部 100 人;八条鱼部 100 人;大海部 30 人……这样,一支由民众自发的抗日救国的队伍初步形成。

1932 年元宵节后,李昆山又返回白草沟,进行具体安排。派亲兵王发调大城子王维舟民团,李昆山亲自到冰沟矿调王老君矿工队伍。同时派人分别通知已同意加入抗日队伍的绿林武装和民团,于 2 月末到大屯集中,树起了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的大旗。

为了加强部队的统一管理,提高战斗力,司令部明确宣布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的宗旨是:动员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进行武装抗日,不赶走日本鬼子,决不罢休。同时宣布军纪:一不许污辱妇女;二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三不许挑吃喝……。还组织纠察队,设

总催管带检查军纪。随即派出侦探王发，到绥中一带侦察敌情，准备向锦、绥铁路沿线敌人的驻军发起进攻。此时，义勇军第十三路军石磐司令带300余人与李进行联络，共商抗日大计。石司令先提出部队整训意见，而李昆山认为国难当头，时不可待。他不同意整训，并慷慨地说："不立功，不打败日寇，誓不进救国会。"正在这时得到敌人向青石岭(义勇军驻地)进犯的情报。石司令对李昆山说："我带队伍先去打，你们在这边继续整队。"石磐带队在绥中北部与日军发生激战，因子弹不足，又派人回来求援，李昆山立即从各队抽出一百名精悍手枪队，全部骑马速去打接应。在串地龙(绰号)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火力，马队横冲直撞，只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推了回去。伪军骑兵20多人，刚一接火就逃回绥中城。3辆汽车的日军被打得走不了，钻到大黑沟一家的大院里，企图顽抗到底。这时，义勇军的追击部队赶到，集中火力向里猛攻，一直激战了一天。

1932年3月4日，第十七路军又袭击一次绥中城，打得非常激烈。虽攻城未克，却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其龟缩在城里，再不敢轻举妄动。由于战斗胜利的影响，孙雨田领导第三十三军也来会师，还有绿林武装来投，不久抗日队伍扩大到5500多人。为了乘胜攻打绥中，石磐司令首先向战士们做了战前动员："诸公之众吾来者，皆志在救国，今时机已到，吾欲以身殉国，收复绥中。不知诸兄弟肯随吾前进否?……"诸位战士听到讲话后，士气大振，高呼："愿随司令前进……决不愿与倭寇并存!"经过反复协商决定，于1932年3月18日开始兵分三路，同时动手。孙雨田带三十三路军3000人，就地行动，攻打兴城花营，拦击锦州方面的援军；单福臣、宋吉甫率部500余人，攻打沙后所，阻击敌人向锦州方面逃窜；石磐、李昆山率余部2000余人攻打绥中城。3月20日首先打火车站，激战一夜，因敌工事坚固，又有飞机助战，天亮时义勇军只好撤出阵地。第二天，石司令与李昆山商定于21日夜，兵分两路，再次攻城。并命令王老君率20多人，到六

股河(王八河子)附近破路炸桥。李昆山、石磐两部3月21日晚10点左右派郑大有和串地龙部分人为先锋队,进城先除掉岗哨。夜11点多钟先锋队开始行动。战士朱黑虎光着脚,拿一把板斧,战士小霍手持扎枪,二人先偷着摸进头道岗。朱黑虎一斧子把日军哨兵脑袋开了瓢,小霍把另一个日军哨兵用扎枪扎了一个透心凉,夺了两支步枪。接着,又悄悄地摸到第二道岗哨。朱黑虎用板斧又砍死一个日军哨兵,得了一支步枪。小霍对另一个日军哨兵用扎枪一扎,没扎死,打了一枪,又没打中,结果惊动了敌人,开始了战斗。这时,义勇军大队人马刚进城。石司令带队冲杀,李昆山在城门口指挥。日军出动两辆坦克,来回扫射冲撞,城墙上的伪军也向下猛烈射击,战斗非常激烈。李昆山边打边指挥,有人对李昆山说:“这里太危险。”他却说:“士兵冲锋更危险,当头行人的,不能顾自己安全,忘了弟兄!”在他的指挥下,一个战士机智勇敢地纵身跳上敌坦克,揭开顶盖,用手枪向坦克里的敌人开了火,坦克里的机枪立刻不响了。激烈战斗直到后半夜,终于攻克了绥中县城,打死打伤日军90多人。由于义军伤亡过重,顽敌又拼命死守,为保存实力,李昆山率队边打边撤,最后撤至二台子,已时至黎明。李昆山骑马在路边巡视,听到路边有人声,误认为炸桥人回来。一搭话却被日军发觉,日军立即开枪,李中弹落马,壮烈牺牲。

李昆山牺牲后,日军把李的尸体运到绥中县城,照了相,搜了身。从他衣兜里搜到抗日救国会的委任状,敌人这才得知李是抗日救国军第十七路军副司令,欣喜若狂。日军为了大造声势,恫吓人民,当天午后就在报纸上登出枪杀十七路军副司令李昆山的消息。敌人还企图焚尸示众,后经城内有民族气节的故友,设法将李昆山的尸体运出城外,又辗转运回其家乡予以安葬。在运尸途中,许多男女老幼为其掉泪路祭,表达了广大民众对反满抗日英勇奋战、为国捐躯的烈士的敬仰之情!

举旗抗日保家乡　浴血奋战杀倭寇

——郑桂林与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我国东北，不愿受亡国之苦的东北广大爱国同胞纷纷举起义旗抗战。仅热辽一带就有抗日义勇军50多路。在诸路义勇军中，郑桂林领导的第四十八路军是一支阵容强大、作战骁勇、声威显赫、功勋卓著的英雄队伍。这支队伍人数最多时达15000多人，编成24个旅。它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经历了有史可查的战役就有数百次之多，每次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这支民众抗日武装，始建于1931年11月，初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四路军(亦称十二支队)，1932年2月改为第七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1932年5月以后，由东北抗日救国会统一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四十八路军，同年10月以后，又统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1933年4月，由东北军何柱国的骑二军收编为临永警备一师，同年9月在马厂起义，北上到察东独石口与吉鸿昌领导的抗日讨贼联军联合，暂编为第一师，于同年12月24日，在赤城同亲日派刘桂棠作战中失利，因郑桂林不久遇害而解体。

由于这支队伍使用四十八路番号时间长和使用该番号时声威大震，所以，尽管番号屡有更改，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之为“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又因为它是郑桂林创建和领导的队伍，所以，人们又常常称之为“郑桂林抗日义勇军”。

郑桂林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司令，是一位始终不渝、功勋卓著、深得民众爱戴、全国闻名的抗日将领、民族英雄。

郑桂林原名郑广兴，字香庭，祖籍辽宁省建昌县药王庙乡郑家沟屯。1888 年 11 月 25 日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二道湾子屯的一个农民家庭。郑桂林青年时代就有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为此从吉林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入北京朝阳大学学习。在此学习期间，因受“五·四”运动进步思想的影响，一心寻求救国道路。1921 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牡丹江，应聘到江华办事处，从事街基规划工作。在此时他用自己的工资和家中财产，兴办了牡丹江第一所小学。在学生中组织了激进派学生团体，他经常给学生做报告，传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苏俄“十月革命”等进步思想，以及岳飞抗金、安重根刺死伊藤博文等爱国事迹。在郑桂林的教育影响下，这个学校培养了好几名英勇奋斗的爱国者。郑桂林办学育人的事迹，也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赞扬。

郑桂林培养的进步学生，公开指责军阀当局弊政后，被开除了学籍。实践证明，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于 1922 年 9 月加入了东北军第七旅，任陆军检察官，驻守绥芬河。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郑桂林入伍后，由于踏实肯干，被调到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被委任为东北军第十三旅六三七团任作战参谋，驻防河北保定市。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郑桂林，更加义愤填膺，决心出关抗日。他首先只身乔装回到牡丹江，侦察敌情，体验民意，向亲人倾吐抗日决心。12 月初，偕同李铁铮、吴金铎、胡芷春等 3 名志同道合的同事，离开保定，与东北讲武堂同期毕业同学石兰田、李卓英约会，一同去东北抗日救国会请战。救国会任命郑桂林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四十八路军司令，李铁铮、吴金铎为副司令，石兰田为参谋长，李卓英、胡芷春为副参谋长。

郑桂林为实现自己的天职，从保定一出发就报号“郑天狗”(此

号是由我国民间神话传说“天狗吃日头”借意引用而来的,意在誓做天狗把日本鬼子吃掉),并很快的在辽西一带传颂开来。

郑桂林等被委任后,于1931年11月,带领100多名骨干,从关内到绥中、兴城、凌南、锦西一带抗日前线,宣传组织抗日武装。首先到凌南县药王庙乡高丈子屯找到故友邓文风(邓初是自立山头打鬼子的爱国绿林首领),动员他合伙抗日,邓文风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随后,邓文风走亲访友动员邓连贵、侯德全、王春普、尚汉臣、宋殿元等参加了义军,不到一个月就组织起1000人的队伍。因邓文风在义军初建中贡献较大,郑就请批增补他为四十八路军副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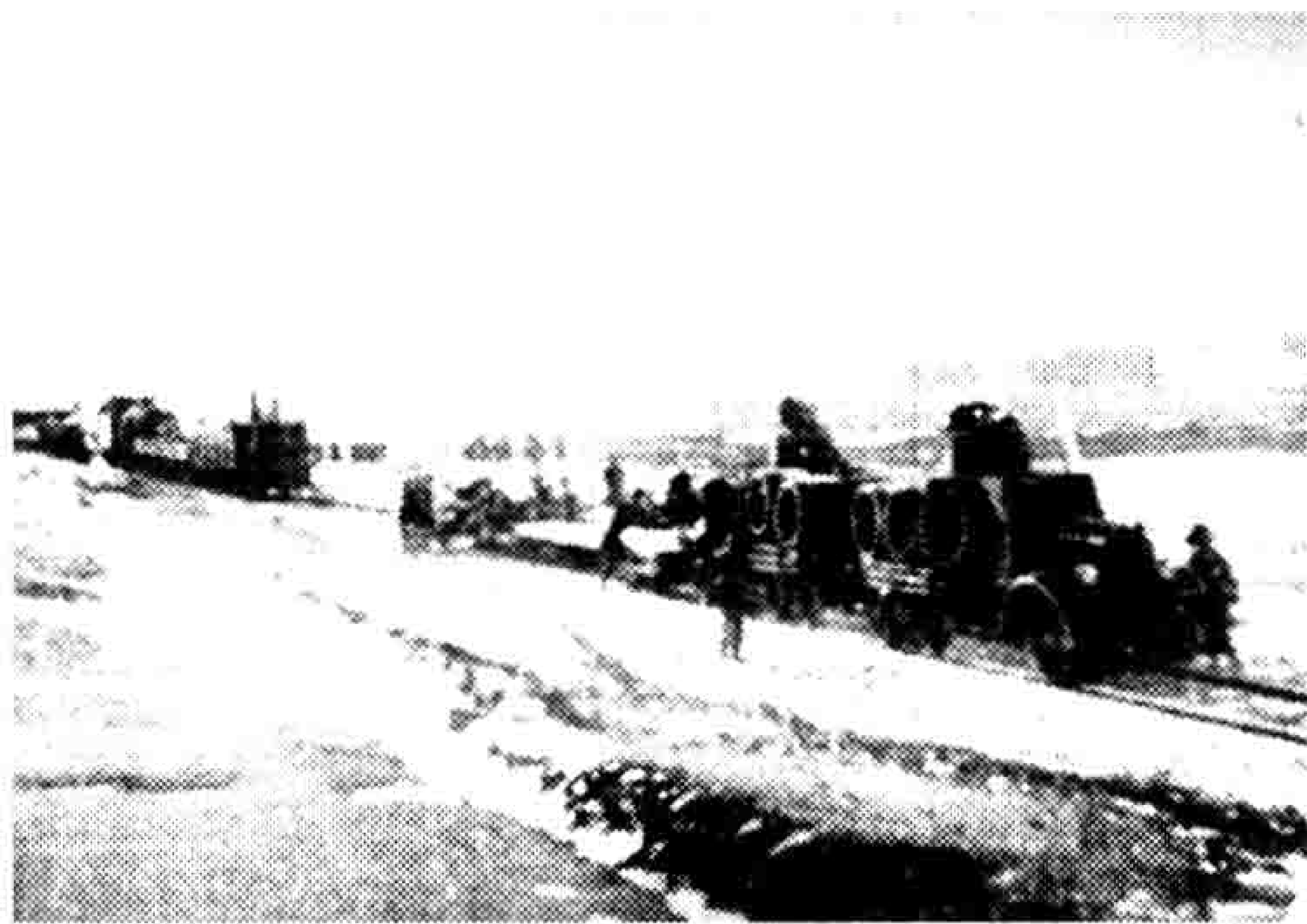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扩充抗日队伍,12月初,郑桂林又亲自到绥中二道沟朱宝福、朱炳君家,先后召集在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开会。在他动员下,绥中的张耀东、刘品山、胡景元、王怀五等相继参加了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郑桂林还派朱宝富等人到长城宣传发动,动员刘明和、李世和、王德化、金德荣等人参加了义勇军。

1932年2月份,郑桂林又亲自到和尚房子大丈子屯,找四区民团负责人王国瑞一起抗日,并委任王为第八骑兵旅旅长。

1932年正月中旬的一天,郑桂林单人独马到建昌药王庙乡郑家沟探家,并在族弟郑中枢的陪同下到祖坟祭祖。郑跪在祖宗墓前,沉痛而庄重地说:“当今日寇妄图灭我中华,毁我宗祖,凡孝子贤孙岂能容异国列强侮我祖先,杀我同胞,小孙桂林决不辜先教,为扶国危,誓为民族尊严而成,望祖先助我一力,保佑第七代玄孙抗日成功!”言毕,泪如泉涌。郑桂林祭祖宣誓迅速传开,建昌民众无不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于是,好多有为青年都怀着爱乡、爱国的心情,踊跃投奔郑桂林部。后又经多方努力,不足半年时间就组织发展起拥有十个旅的万人抗日队伍:第一旅长郎子臣,第二旅长高锡伍,第三旅长张跃东,第四旅长马青山,第五旅长杨尽忠,第六旅长谢宝昌,第七旅长陈甲三,第八旅长胡景元,护卫旅长刘明

和,骑兵旅长王国瑞,别动旅长缪子彬(后叛变)。

郑桂林部初期活动在兴(城)绥(中)一带,由于救国心切,经常主动出击敌人。1931 年 12 月下旬,在兴城的西部大小新民屯一带,邓文风副司令率部与孙玉田部合力扫除了亲日派陈老升的武装力量 100 多人,缴获枪支百余条,弹药若干。接着又袭击了兴城的沙后所、望海一带的盐场。1932 年 2 月中旬,邓又率部到绥中前所车站,将铁轨扒翻,埋设地雷,并隐蔽在 200 米外准备袭击敌人。恰巧日军装甲车从山海关开来,见路被扒就急下车抢修。义军战士乘机一齐出动,吓得鬼子惊慌失措,丢枪逃窜,毙敌 1 人,缴枪 3 支。同年 3 月 17 日,在郑桂林的统一指挥下袭击了绥中车站。敌人为牵制义军,就在绥中西南四方台设防,驻有日军,对义军活动极为不利。同年 6 月郑桂林就调集全军攻打四方台,铲除了障碍。6 月 2 日又率部 1000 余人,由临榆出发,向兴城前进,当晚抵永安堡。日军闻讯,派骑兵 200 余名,携带机枪、野炮,自四方台出动,实行堵击。郑桂林派第十七统带部第二旅,在高岭站展开了猛烈进攻。是夜 11 时,救国军将奉山路拆毁数段,割断电线数处,并将票房破坏,相持两小时许,日军不支而退。是役救国军官长负伤 1 名,毙敌 7 名。6 月 8 日下午 3 时,郑桂林率部仍向兴城前进,行抵古城子,遇日骑兵 12 名,立即围击,敌兵未加抵抗,拼命逃走。9 日上午,郑部全部到达长城附近,派工兵分两部破坏桥梁、拆毁铁道,以阻止敌铁甲车前进。又派第二旅及第五旅卫队营为先锋,第十七统带部第八旅,第三统带部卫



日军抢修被义勇军破坏的铁路

队连及卫队营为主力,分左右翼向车站敌军驻地袭击。日军事前已有准备,张布电网,埋设地雷等障碍物。救国军官兵奋不顾身的冲到车站及马神庙敌军驻地,纷纷投手榴弹,激战一小时,毙敌数名,炸坏敌机关枪2挺,车站房屋亦全部被毁。敌军占居高处,用机枪向下扫射,以致救国军未能冲上去。后因敌寇增援袭击救国军侧面,救国军受重大损伤。敌铁甲车由绥中开到,向救国开军炮,加之敌机又投掷炸弹,迫使救国军不得不退却。然而,敌骑兵100余名及飞机6架,由大道方面追击,至古城子,被救国军掩护队击毙数名,敌遂逃走。此役救国军官兵阵亡21名,内有驱日赶死队员周迪恒。同月,邓文风率义军300人攻打绥中石庄子,缴获了大量军械。同年7月9日又在石柱子西山作战,打落敌机1架,荣获了抗日救国会2000银元的奖励。

1932年7月以后,日军曾向义勇军发动了多次扫荡。7月30日,动员1600多名日伪军,分三路向条石沟进犯。郑桂林率部沉着应战,占据有利地形,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9月份以后,日寇又调集更多的军队,对四十八路义勇军进行大规模讨伐。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郑部仍不断捕捉战机打击敌人。1932年11月30日下午9时,第五路军第五师丁克与第三统带参谋长陈瑞卿,率部联合打退日伪军,攻占了前卫火车站。第二天,由于敌方来援军300多人,义军又转移。日寇企图集中兵力将郑部就地歼灭,为进兵热河、冀东铺平道路。

郑桂林部义勇军越战越强,打出了军威。为了加强此部实力,经救国会决定将十三路义军合编到四十八路军中,改番号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将旅改为师。同时,在绥中永安曹家房子举行了全军阅兵式,救国会负责人检阅了队伍,并拍了电影,全军士气异常高涨。

1933年2月,侵入热河的南路日军又分两路、配有飞机3架,同时向凌南推进。在绥中明水塘门、兴城梨树沟门,被郑桂林部和

彭振国部分别给予堵击，激战2天2夜，给敌军以沉重打击。辽西一带流传一首民谣："天狗咬、蜂子哲，座山旅打得恶，杨麻子不用说"（"天狗"指郑桂林；"蜂子"指邓文风；"座山"指刘柞山；"杨麻子"指杨尽忠）。它真实地反应了当地民众对四十八路军英勇抗日的赞颂。

正当义勇军在前线与侵略热河日军英勇奋战的时侯，蒋介石为达其不抵抗日寇进犯之目的，召关外义勇军进关。郑桂林率部向关内撤退的途中，到时丈子与先到的各部会师宿营后，召开了团、旅以上军官会议。重申军纪，明确任务，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处决了参议官高凤桂（蒋介石亲信，中将。蒋为抓义军领导权，企图控制郑桂林而把他派到郑部任职，并预谋杀害郑桂林）。郑为在非常时期统一全军，加强纪律，不畏高是蒋的嫡系，决然杀掉这个破坏抗日的内奸。事后，深谋远虑的郑桂林及时召见王国瑞，命令其就地潜伏，继续抗日。

郑部进关后，立即投入全国闻名的长城保卫战。1933年2月13日，郑桂林部同朱霁青部义军联合，在大毛山口一带与日寇展开激战。次日，郑部胡子元师又从前石沟向九门口外15里处永安堡、李家堡日军后路进攻，毙敌20余名，缴获机枪2挺，使敌人不敢向九门口推进。26日夜，敌3000骑兵及炮队1000余人，突然向李家堡阵地攻击。义军郑部与韩云浦部合力奋勇迎战，互攻多时，后由义军抄了敌人的后路，敌阵大乱，伤亡多人。在3月15日至17日，日伪军向郑部防地义院口极力轮番进攻，经郑部奋力阻击，终将狂敌击退，给敌以很大杀伤，缴获机枪3挺、步枪45支。3月20日，日军铃木二旅团猛攻冷口，防线危机，郑亲率本军一部参与保卫冷口、喜峰口的战役，配合商震部血战3昼夜，终将敌军击退。在此次战役中，由于郑桂林身先士卒，深入敌后，在罗文峪光荣负伤。3月30日，敌人以步、骑、炮联合兵种3000多人，分左右两路攻击石门寨的前沿沙河寨、邱子峪等地，抗日义勇军与敌战斗激烈时肉

搏，相较四、五次之多，敌炮投我阵地达500余发，数十架飞机盘旋轰炸，轮番扫射。我军虽有半数伤亡，但仍奋战不息。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2日)报导此次战斗时说："我军伤亡不可数计，状况之惨，为历次所罕见。"《新天津报》(1933年4月26日)也报导了："东北救国军(指郑部)约有万余人，连日在边城一带颇为骁勇。结至最近除伤亡者外仅余四五千人……"。由此可见，四十八路义勇军在保卫长城的战役中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郑桂林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是，蒋介石、何应钦之流却求荣卖国，对郑部及其本人施展种种阴谋伎俩，进行诬陷迫害。

在抗日初期，他们骂郑桂林等义勇军是"土匪"，"破坏中央统一"。这次把郑部分配到九门口、义院口、介岭口、大毛山口、冷口、石门寨等地第一线，正规军则撤到第二线"督战"，切断义军的后路，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郑部。但由于郑的正确指挥及其部下的英勇奋战，不但没被日寇消灭，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屡建战功，赢得了更高的威望。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4月16日以北平军分会的名义，命令郑部将防地交给正规军何柱国部，并强行将郑部改编为警备师，划归何柱国骑二军指挥，派到芦台、临永地区驻防。郑桂林为保存这支抗日力量，不得不接受改编。同月17日，将队伍开向新的防地。涉渡滦河时，敌人追击上来，用飞机进行轰炸。对岸又有东北军旅进行堵截，以某团纪律不好为借口，不让通过滦河，实际上是想借日寇屠刀把郑部消灭在滦河以北。在这种情况下，郑桂林亲率1000余名精兵组成的敢死队，对安山石门一带日伪军反攻，与3000敌军血战2昼夜，终将敌击退，毙敌甚多，占领朱各庄。第三天，从黑露庄一带冲破阻截渡过滦河，集中到乐亭一带。后到滦州休整一个月，又开到芦台。郑桂林又一次粉碎蒋、何之流企图消灭这支抗日力量的阴谋。蒋介石凶相毕露，给郑桂林捏造罪名，编造谎言，说郑是受青年党(是要搞华北独立的亲日派)领

导，妄图抄取右派报刊上公开发表污蔑郑桂林的谰言，来加害郑桂林。蒋介石一方面破坏郑的威望，另一方面为向郑开刀做舆论准备。郑桂林敏感地觉察到这是一种阴谋，为此，他于5月12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郑桂林启事》说："查桂林抗日以来，只知杀敌，不计其他，凡属国人有目共睹。乃留琦(造谣文章的属名)氏竟信口雌黄，任意捏造，不惜诬各抗日分子以同流似此，破坏抗日战线，足证为敌作帐，不胜切齿之久，深望国人勿为乱言所惑，是幸。"7月15日，郑桂林又在天津会宾楼举行新闻界招待会。会上，他发表长篇演说，介绍了以前抗日经过，感谢新闻界对义军及其本人的声援，并再次郑重宣告："对外决不畏死，对内捍卫祖国，尽我天职。"表示："抗日夙志，始终不渝。希望新闻界以文字唤起民众，复兴中华。"此举，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的卑鄙伎俩，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派黄郛在塘沽同日本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此协定第一条就是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香河、宝坻、林亭口、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按协定要求，郑部驻地芦台又成了第一线。蒋介石怕郑桂林回师抗日，于6月11日以北平军分会的名义，将郑部调到天津马厂训练。在马厂，郑桂林为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密令胡芷春团、崔井韶团及特务连，于1933年7月22日"哗变"。第二天，郑故作惊讶，亲带骑兵团和剩下的一些官兵追击，以追击为名巧妙地组织了全军的起义，去张家口投奔察北抗日同盟军。

郑桂林部马厂起义之后，使早存杀机的蒋、何之流有了借口。他们通过所把持的报刊，哗然鼓噪，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攻击郑桂林。如天津《大公报》发表关于"郑桂林叛军在大城骚乱(1933年7月8日)，还发表了专题评论："郑桂林兵变之教训"(1933年8月8日)等文章，为进剿郑部大造舆论。与此同时，又调兵遣将去追击、堵截。骑二军长何柱国，驻保定行营钱大军、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派

缪澂流部警察队分路追剿，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郑桂林率起义军经由大城、任邱、高阳、蠡县、望都，从完县进入太行山中。又沿太行山北上，于1933年8月下旬胜利地到达了张家口。

郑桂林到张家口附近时才知道：冯玉祥已被蒋介石逼迫辞去抗日同盟军司令的职务，张家口已被宋哲元部接管。这样，只好接受宋哲元提出的条件，佯装收编，设营张北。同年9月3日，郑趁其不备，把队伍拉出张北，去找吉鸿昌。行至大阁，与南下的原热河省汤玉麟部相遇，又被他收编为别动队，委任郑桂林为司令。不料，汤又与宋联合，郑只好随汤返回张北附近。

宋哲元发现郑桂林私自离开张北，知他抗日决心有增无减，就阴谋策划缴械编散郑部。宋哲元以点编发饷为名，诱骗郑部进张北城内。郑桂林对宋早有戒心，知道此次进张北城凶多吉少，于是处处留心。果然，郑桂林进城后发现了埋伏好的荷枪实弹的宋部士兵。郑桂林当机立断，一枪打死了宋哲元派来的参议官，并指挥部队奋勇还击，边打边向城西北角突围(西北角是一缺口，郑事先为防不测，已安排下接迎部队)。此时，张北城四门紧闭，宋部占据着有力地势，置郑部于四面维谷之中。郑桂林指挥部下朝预定目标突围，经过一番艰苦拚搏，终于冲出张北城，粉碎了宋哲元的阴谋。但郑部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损失了1000余人。

郑桂林虽屡遭中伤陷害，但未动摇他抗日救国的决心。他继续率部东进，终于在1933年9月10日到达察东独石口，与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所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会师，并正式参加了这支英雄部队，暂编为第一师。又于同月14日，实现了吉鸿昌、方振武、汤玉麟、郑桂林四部联合的可喜局面，把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贼联军。抗日讨贼联军先分兵两路，到长城外抗击日寇。方、吉率部去丰宁一带；汤、郑率部混合北上，到沽源境内。

按“塘沽协定”，日军本应撤到长城以北，可是驻密云、怀柔一

带的日军却赖着不走。抗日讨贼联军为了消灭这股日军,并打击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给联军收复热河消除后顾之忧,遂兵分三路挥师南下,于9月22日收复密云、怀柔县城。联军所到之处,受到沿途群众的热情欢迎,群众也纷纷参加联军队伍。郑桂林所指挥的东路军勇猛神迅,曾一度深入顺义境内,声威直逼北平。蒋、何之流闻讯大惊,他们深知单凭本身力量难以抗拒英勇顽强的抗日讨贼联军,便采取了最卑鄙的手段,借用日寇的力量来消灭抗日讨贼联军。日寇出动了第八师团,蒋介石连忙调来两个军加十几个师的兵力,在飞机配合下,于9月24日向抗日讨贼联军进行围剿。吉鸿昌率部应战,经五六天殊死战斗,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因弹尽粮绝而被重重包围在昌平山中,迫使吉、方二人下野,于10月17日离开本部,所属官兵被迫改编。

吉鸿昌失败之后,郑桂林部仍与敌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方、吉离队之前,抗日讨贼联军已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郑桂林临危受命,按吉鸿昌指示率数千精兵(其中有五百骑兵),杀出重围,到河北省北部榆树湾子与张奎元等抗日绿林队伍联合,于12月24日到云洲堡一带与汤玉麟会合,共同攻打亲日派刘桂堂(察东剿匪总司令),将刘包围在赤城。刘桂堂得到察省骑兵第五师的增援,内外夹击,致使郑、汤二部失利。

郑桂林在赤城失利后,为扭转战局,亲赴天津、北平密秘串联,扩大抗日讨贼战线,并找吉鸿昌商讨下步斗争策略。但是,吉鸿昌已在12月25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郑桂林找不到吉鸿昌,又去长辛店等地活动,不幸被国民党北平蒋孝先宪兵第三团的特务秘密逮捕。蒋介石为逃避公众舆论谴责,又把郑秘密押解到北平军分会,于1933年11月18日,施加以"反蒋和图谋不轨"的罪名,在北平宣武区琉璃河被秘密杀害,卒年44岁。他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亦随之解体。

郑桂林部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建树的功勋,将永

载史册，郑桂林这响亮而又光辉的名字，将永世长存。

(二)

邓文风，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副司令。他1900年3月8日生于凌南县(今建昌县)药王庙乡鸽子洞牌邓杖子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人豪爽，见义勇为，深得乡民的信赖。

1924年，家乡民众认为他办事公道，仗义疏财，就推选他带保甲。1926年保甲改编，他被编入汤五帅(汤玉麟五弟，名玉书，号老五)部任连长，驻赤峰、敖汉一带。因不满汤军高官的腐化专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掠掳奸淫、胡作非为，他于1928年秋弃官回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志士，愤然而起，组织义军，杀向抗日救国的疆场。邓文风对乡民们说："我们中国人，绝不能让日寇侵占我们国家，烧杀抢掠。我们大家要去打日本鬼子啊……"。正当他与朋友们谋划、酝酿把绿林队伍变成抗日武装的时候，义勇军四十八路军司令郑桂林，于1931年冬来到邓文风家，看望故友邓文荣(文风之兄)。经邓文荣引荐，使邓文风与郑桂林相识。郑桂林对邓家兄弟说："日寇已侵占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深望兄弟们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参加义军，共同抗日。"郑桂林慷慨陈词，邓文风深受感动，并流着热泪说："大哥，我明白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我一定跟大哥一起去干！"郑桂林走后，邓文风四处串连，动员王春甫、高庆云、杜维繁、邓连义等绿林队伍参加义勇军。又通过这些骨干走亲访友，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组织起1000多人，加入了郑桂林领导的义勇军。邓文风的家乡凌南山区，也就成了义勇军的活动地区之一。这支抗日武装在郑、邓领导下，在辽西抗日救国斗争中立下了卓著的战功。

1931年12月末，邓文风率部与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三路军孙玉田联合，去兴城袭击日寇。他们走到宛家屯时，当地豪绅亲日汉奸

陈老升仗着自己有100多人的武装，竟向义军开枪。邓、孙义愤填膺，率部还击，经两小时激战，打开了这个庄园，缴枪百余支、弹药若干。缴粮万余斤，当即分给了贫苦百姓。不久又袭击了望海、沙后所盐警局，缴枪数千条，缴盐数万斤，当即将盐分给民众。抗日义勇军的两次义举，深得民心，兴绥一带民众交口称赞。

1932年初，四十八路军已发展到拥有5000人之众的义勇大军。在组建、扩建这支抗日民众武装过程中，邓文风贡献较大。郑司令根据大家的意愿，申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补批邓文风为副司令，并颁发了委任状。从此，邓文风在抗日斗争中更加尽心竭力，成为郑司令的亲密战友。他在协助郑司令统领四十八路军转战兴、绥的抗日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邓文风率部袭击绥中前卫车站。此次战斗扒翻铁轨一段，击退日寇装甲车一辆，毙敌一名，缴枪三支。同年3月27日，邓又参加了袭击绥中车站的指挥工作，消灭日寇多人，俘虏数人，炸毁坦克1辆，缴步枪数十支。

4月19日凌晨，日军和汉奸张子卿部800多人，偷偷地包围了鲍庄子一带义勇军驻地，并对义勇军进行了猛烈炮击，使义军腹背受敌，进退维谷。在这紧急关头，邓文风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带领部队以攻为守，冲入敌阵。敌人看我军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便扭头逃向下鲍庄子。邓文风此时又发现另一部伪军以两挺机枪封锁我军退路条石沟口，使我军多名战士连续被打倒。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邓文风怒火满腔，一手提着“手提式”，一手握着手榴弹，一跃冲出掩体，率邓连贵、邓文喜从侧面冲上去，甩出几颗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这两处火力点，终于打开了去条石沟的通道。当邓文风率部撤退时，不幸被敌弹打中腰部，但他仍坚持指挥队伍迅速撤向条石沟。此时，郑司令率部也冲出危险区，占据有利地势，命令部下向敌开炮，12门炮一齐射向敌群，打得鬼子人仰马翻，狼狈而逃。这次战斗敌损伤甚重，我军胜利地粉碎了“围剿”，缴获步枪30支、战马

7匹、机枪1挺，并击毁汽车1辆。

邓文风负伤后，郑桂林派人把他送往北平医院就医，经检查幸未伤内脏，只住院20来天，伤势将好就重返抗日前线了。

1932年6月2日，邓文风同郑桂林率部千余人，从临榆北去兴城，至高岭站遭日军骑兵阻击，于夜22时发生激战。义军将奉山路拆毁数段，割断电线数处，并将票房破坏，相持两小时许，日军失力而退。此战我军负伤军官1名，毙敌七八名。

6月9日，郑、邓率部到达兴城附近，遂派工兵分两部破坏桥梁，拆毁铁道，以阻敌装甲车前进。又派主力，分左右两翼向车站敌驻地进攻，激战一时许，毙敌多名，炸毁机枪2挺，车站房屋全部被毁。拂晓，敌骑兵数百名及飞机6架，由大道追击我军至古城子，敌军被我掩护队击毙多名，余敌狼狈逃去。是役我军阵亡21名，内有驱日敢死队员周迪恒志士。



日军头目窥视义勇军阵地

6月底，邓文风又率300人攻打绥中石庄子，经一夜激战打死打伤日伪军数人，并缴获好多军械。7月9日，又在绥中石柱子西山战斗中，打落日寇飞机1架，获抗日救国会2000银元和一部分军需品的嘉奖。

1932年7月底，邓文风奉命去北平开会，不幸身患重病，抢救无效，病逝于北平前门外西河沿四合老店中，终年32岁。

抗日志士邓文风虽然逝世了，但他那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他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率部投入抗日斗争行列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

兴、绥、建人民的心中！

(三)

王国瑞，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十八路军第八骑兵旅旅长，在辽西地区抗日救国战斗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国瑞原名王金祥，建昌县和尚房子村大杖子人。王国瑞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他的家乡和尚房子，也是兵匪为患，民不聊生。因生计关系，1927年加入了东北军。1928年张大胡子(张明久)组织民众武装“保安总队”打起抗捐抗税的大旗，发动万人之众浩浩荡荡地进行游行示威，砸税卡、惩贪官的时候，王国瑞毅然辞去东北军文书职务，回乡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民众运动中去。他深得张明久的赞赏，称他“是个有胆有识的人”。王国瑞也非常钦佩张明久为人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精神，曾多次对同事说：“做人就要做象张明久这样为国为民、敢做敢为的人！”后张明久收王国瑞为义子，做贴身警卫。

抗捐抗税斗争，直接触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的利益，张明久遭到暗算，1930年底被诬陷为“反对新政”被捕入狱。张明久被多方营救出狱后，秋子沟的和尚房子警察署长刘广富以请赴宴为名，将张打死在秋子沟。同去赴宴的王国瑞带人突围，返回和尚房子，发动八大会围歼刘广富，刘闻信逃去关内。王国瑞亲自带人到山海关海洋镇抓获杀人凶手刘广富并处以死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锦绣河山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此时，王国瑞正任凌南县和尚房子区粮秣委员，专给驻防前沿的热军征集粮草，他亲眼看到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军恐日畏敌，于是对官兵抗日失去信心。他对朋友说，靠这样的军队救不了国，得靠我们自己。正在王国瑞报国无门的时候，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司令——郑桂林一行2人，于1932年2月亲自到王国瑞的家乡来找他，对他宣传抗日的道理，增强了

王国瑞抗日救国的决心。从此王国瑞参加了义勇军。他折卖田产买枪买马，在郑桂林走四五天后，就带领其弟王金林、堂侄王桂伍及卢永贵等13个人去赶义勇军队伍，在绥中黄庄找到刘统带(四十八路军刘品三)，刘领他们见了郑桂林。王国瑞被任命为四十八路军第八骑兵旅旅长，派到绥中大沟随张耀东统带驻防。

王国瑞被任命为旅长后，好多本乡爱国青年及张明久旧部纷纷来投，仅一个多月时间就组建起300多人的队伍。为便于行动，旅下不设团，只分3个连。连长有：朱傻子(绰号，原名不详)、王士禄、卢永贵。全旅装备有轻机枪1挺、大枪100多条、手枪10多只、战马15匹，没枪的战士都配有手榴弹。王国瑞队伍刚刚组建，就向司令部请战，很快被批准参加了战斗。第八骑兵旅在郑桂林的统一指挥下大小战斗打过数十次。王国瑞智勇过人，身先士卒，在跟郑司令转战兴绥、长城内外的日子里，曾得郑司令的多次表扬，王国瑞旅成为四十八路义勇军的主力之一。

1932年3月17日，义勇军郑桂林部攻打绥中县城。在此次战斗中，王国瑞旅主攻绥中西南帽山鬼子据点，打死打伤日伪军10余人，缴枪10多支。

1932年6月10日，四十八路军攻打兴城火车站，王国瑞旅夜晚摸到车站剪断日军驻地铁丝网，将手榴弹投进了日军营房，炸得鬼子兵乱成一团，同时他还派人扒断了两段铁路。当日军组织反击时，郑桂林部已经胜利转移。

在四十八路军打兴城车站的进军途中，汉奸缪子斌(是盘踞绥中西部的一股土匪头子，初投郑部，后又投靠日寇，当了伪军团长)阻止通过并立即上报日军。郑司令下令捣毁其老巢——高丽沟。在炮火的掩护下，王国瑞旅从左侧绕到离缪地只有200米的山头发起攻击，缪支持不住，往绥中方向仓惶逃窜。

以后，在郑桂林指挥下的鲍庄子、四方台、九门口等大小战斗都有王国瑞旅参加。

1933年2月，日寇全面进攻热河。2月29日，日军攻占凌南县县城——牤牛营子。山海关已沦陷，长城吃紧。在这种形势下，上级命令抗日义勇军郑桂林部撤到关内驻防。

郑桂林在进关前，考虑王国瑞是此地人，人熟、地熟，又有独立指挥作战才能，决定王国瑞就地潜伏，继续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斗争。在四十八路军转移时，王国瑞在本旅挑选40个精干而又可靠的人，以晚走为由，秘密潜伏下来。

王国瑞等人回乡后，四处奔走，宣传抗日。但是由于日寇以剿匪为名而到处制造一起起流血惨案，搞强化治安，使一些人产生一种恐日情绪。为煞日寇的嚣张气焰，王国瑞派人侦察敌情，以便寻机袭击鬼子。1933年3月的一天，侦察员马占兴报告：有2个日本军官带30多个伪军去绥中路经和尚房子，正在街上吃午饭。王国瑞认为这是打击鬼子的一个好机会，立即找王桂伍、王廷珠、刘桂祥、王金林、邓广伦等人商量作战方案。最后决定在去绥中必经之路大杖子屯外的山湾处伏击。

王国瑞亲自带领王桂伍、刘桂祥、邓广伦等15个战士到预定地点埋伏好，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钟，这伙敌人终于进入埋伏圈。王国瑞首先向敌军打了几枪，敌人顿时乱成一团。一个鬼子双手持刀挣扎着要与义勇军拼命时，被王国瑞一枪打中当即毙命。另一个鬼子跑到和尚房子街外的东河套也被打死。这次战斗缴获大枪3支、匣枪2支、战刀2把、弹药3箱。这一胜利打出了军威，此后好长时间日伪军不敢路经和尚房子。当地伪职员对王国瑞等人更是望而生畏，有的主动上门和王攀亲结友，还有的暗中给他传递情报。和尚房子一战，王国瑞打开了局面，经几个月努力，义勇军队伍又扩充到300多人，为解决武器问题，经多次侦察摸清了警察署存放枪支的位置和警备力量，王国瑞立即召集王桂伍、邓广伦等人秘密商议夺枪的办法。

1933年12月29日上午，经侦察员刘海纯报告得知，建昌警察

大队到和尚房子来收枪，警察署郑署长带人到北岭迎接去了，现在警察署只剩六七个人。王国瑞认为时机已到，遂下令行动。他带领2名战士带长枪和机枪去和尚房子西山隐蔽，控制至高点；苟玉明等去割电话线。由王桂伍、刘海友堵住警察署人员出入；由邓广伦、李俊安、耿玉明去通知和尚房子街各大商号(庆发德、德发长、至太恒等)，谎称我们已和姜克枝(岭上要路沟一带土匪头，开始表示反日，后投日寇)合伙了，把警察署占了，郑署长被我们绑了，为了你们安全不准乱动，全部停业。各商号的掌柜全都照办了，因此义勇军战士顺利地包围了警察署。看家的警察署警长朱连壁在门口向北张望时，王桂伍也向着朱望的方向一看，发现半里外打着膏药旗的一支马队向和尚房子疾驰而来。王桂伍机智果断，从怀里掏出匣子枪向着敌马队就打了一梭子，同时西山机枪也开槽了，打得伪军象惊弓之鸟拨马遁逃。

警长朱连壁突然听到耳边枪声吓得目瞪口呆。刚想要跑，被王桂伍挡住，强令他领着义勇军战士进院。在马之兴(我侦察员)的指引下找到枪库，把500多条枪，驮走4驮子，余者分给在场群众。第二天伪县警察队胆颤心惊地进到和尚房子街来接枪支，但一无所获。因没法交差，便硬说警长朱连壁私通王国瑞，把他带回建昌处置。

这时，王国瑞领导的义勇军已发展到1000多人，并公开树起抗日义勇军的大旗，成为绥中、建昌一带很重要的抗日队伍。这时，王国瑞根据本部人多枪多的新情况，将队伍作了新的编组：旅长王国瑞、参谋长刘桂香、纪察长耿玉明、军需长王桂伍。旅下仍未设团，共分五个中队：第一中队长苗永枝、第三中队长邓国云、第五中队长田印芝、第七中队长徐占山、第九中队长刘桂祥(为了迷惑敌人空双号)。整编之后，王国瑞领导这支队伍活动在建昌的大屯、和尚房子、养马甸子、温杖子和绥中的明水、秋子沟一带。和尚房子保安队长孙弼臣是铁杆汉奸，为表示向日寇效忠，就派人四处搜集王

国瑞的情报。王国瑞早已察觉敌人的动向，为杀一儆百，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趁孙弼臣回家之机，派人把这个日寇走狗枪决了。

1934年1月26日，王国瑞率领义勇军攻打凌南县城，当队伍徒步越过白土岭到全胜店的时候，遭到伪讨伐队王云五部的阻击。义勇军战士勇敢地向敌阵猛冲，把伪军击退，缴枪2支、子弹300发。当义勇军战士追击到喇嘛洞的时候，敌伪援军乘坐卡车赶来。为避免伤亡过重，王国瑞下令撤到和尚房子的蒲塘沟。

王国瑞在建、绥交界一带活动，使日伪在这个地方一切统治制度都无法实施。当地的鬼子、汉奸向上告急说："第四区(和尚房子)有王国瑞一派的蠢动，在2月12日和县警察队的讨伐队遭遇，以赖其数倍的多势，抵抗达6小时，由于匪祸现税收成绩极为不佳，学校学生害怕匪祸袭击也不敢上学，今日在热河治安虽已确立，唯独凌南治安仍不彻底，实感遗憾"(康德元年《热河省县旗事情》第一七四页)。此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武装开展大"清剿"的时候，所以就把王国瑞旅列为"肃正重点"。

1934年3月5日，日寇调集了日本关东军警备师和凌(源)、兴(城)、绥(中)、青(龙)、南(凌南)5个县的伪军和警察队，对王国瑞部进行大举进攻。

王国瑞获悉敌人要来进攻，就提前做了安排。天刚亮，一股伪军进入了义军伏击圈，猛烈的火力从四面山上射向敌群，但突然又有一大股敌军向义军阵地摸过来，使义勇军腹背受敌。为防止东部防线被敌人割断，义军立即退出阵地，撤到南部防线，利用西、南防线的有利地形与敌相持一直到天黑，曾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义勇军伤亡很大，后因子弹不足只好向南撤退。

第二天，到秋子沟又遭到敌人阻击，只好返回向西退却。当队伍撤到三门店南的千沟岭上，准备下岭时，王国瑞用望远镜一看，有一大队敌军向义勇军方向跑步上山夺取高地。此时王部只剩100来人。在这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力单弹尽的情况下，王国瑞、

耿玉明、田印芝各带一部,分别突围。从此这支威武雄壮、战功卓著的抗日武装就解体了。这支抗日队伍虽然失败了,但他们那种敢打敢拼、毅然迎战的壮举,勇敢顽强、浴血奋战的斗志,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颂。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四)

张镇,字佐廷,1897 年生于建昌县大松木沟村的农民家庭。"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寇侵占我国土、蹂躏我同胞的暴行,张镇义愤填膺,于 1931 年 11 月离开家乡,去绥中宽邦投石磐,被任命为团长。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他亲自奔走说服了绿林兄弟"大靴子"、"大同宁"、"串地龙"等率众参加义勇军,共同抗日。并在六家、荒地、黑山科、大屯等地插旗招兵,宣传抗日救国。各方爱国志士,云聚其部,到年末发展到 700 余人。之后,他率部转战兴绥,打击日寇。慑于义军之神威,日军不敢把魔爪伸向我广大乡村,只好龟缩在县城内。1932 年春,十三路军发展扩大到 2000 多人,已成为辽西反满抗日的一支劲旅,经过水口、松岭子、绥中车站等战斗,歼灭很多敌人。张镇率全团官兵英勇杀敌,屡建战功。

1932 年 1 月 26 日,义勇军 800 余人驻绥中帽盒寺沟。日寇以步、骑、炮 700 余及伪军 300 人企图夜袭,被义军预先侦知。义军设下埋伏,将敌诱入,起而攻之,把敌人打得丢盔解甲,狼狈而逃。是役,毙敌 30 多人。张镇部下朱福和营长(建昌朱杖子人)夺敌机枪 1 挺,子弹 2000 多发,战马 2 匹,敌战旗 1 面。

1932 年 3 月 18 日,十三路军又联合了十七路军,在"抗日救国,决不与倭寇共存"的口号下,围攻绥中四昼夜,于 21 日夜将城攻下。当义军冲至街心时,石司令的脚部被日寇的流弹所伤,张镇、李长海等冒弹将石司令救出,这次战斗毙敌多人。

4 月,张镇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为十三路军司令,带

领义军奋勇抗日。他对部下要求严格，重申军纪：“不准要吃要喝；不准拿人家东西；不准欺压百姓。”有违犯者都按军法重处，严惩不贷。其部下秋毫无犯，深受民众拥护。为了狠狠地打击日寇，张镇又组织一个骑兵团。同年9月侦知驻绥中日军不多，张司令便挑选了兵强马壮的骑兵150人，从朝阳六家子星夜飞奔绥中。是夜十点钟张部兵临城下，将敌四面包围后，突然发起攻击，激战多时，重创敌军。不久，敌人出动4辆坦克，6架飞机对我疯狂轰炸，城内敌军也进行反扑。为保存实力，张镇遂命令义军撤出阵地，转入山区，以待战机。

1933年春，抗战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根据需要，十三路军奉命合并到四十八路军，由郑桂林领导，撤进关内。张镇隐遁回家。2月29日，日寇占领建昌后，张镇的家被洗劫一空，其本人被通缉。从此，张镇流离颠沛，四处为家，直至1945“八·一五”光复后，才又去沈阳，投石磐加入国民党军。

张奎元英年抗日报中华

“自古英雄出少年”。回眸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在冀、热、辽一带，就曾有一位年仅 26 岁，竟担任东北国民救国军独立师司令，统帅万人之众而威震敌胆的人。汉奸石友三给他东亚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头衔，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任他为冀东警备区司令，他都不干，一心要参加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讨贼联军，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日爱国名将张奎元。

张奎元，报号“老耗子”或“金眼老耗子”，河北省任邱县长丰镇张家庄人。1907 年 5 月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弟兄俩人，排行老二。1919 年春，张奎元流浪到凌源县城，正在苦于走投无路的时候，偶遇热河十二军在这里插旗招兵，他为了混口饭吃，到招兵站去碰碰运气，便报名参了军，因年龄小又挺机灵，就让他当了号兵。从此，他结束了无业流浪的岁月，开始了军旅生涯。

1925 年夏的一天，他借上级调该团去外地剿匪之机而对贪官发难，发动全连拒不参加剿匪，企图以此对上司施加压力，要出多年所欠弟兄们的军饷。然而，非但没要出军饷，反被扣上“不听军令，煽动造反”的罪名，各士兵都遭到毒打，并威胁说：“执行任务回来，还要找出领头者，并严加惩处。”

面对这种严重局势，多数弟兄都吓得惊慌失措，可张奎元却被“造反”之词所启发，他对大家说：“一不做，二不休，反就反了吧，天底下这么大地盘，哪还容不下我们，只要我们手中有枪，就什么也不怕！”在他的动员下，全连有 70 多弟兄连夜逃出军营，向山高林密的凌源河坎子一带拉出去。大家都推举年仅 18 岁的张奎元为大当家的。他为存友谊，索性以弟兄们给他起的浑号“老耗子”为山

名。还说:“叫耗子有什么不可,历史上水耗子金贵,年龄虽小,谁不知道他是好汉。”根据他讲的这个意思和他本人眼大而明亮的特点,取个金字,又送他为“金眼老耗子”的雅号,谁知道这个名号到后来,却成了享誉省内外的大字号了。张奎元就这样被逼上了梁山,落草为绿林豪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在这种形势下,好多热血男儿都纷纷杀向抗日救国疆场。一向不畏邪恶,敢同强暴斗争的张奎元欲抗日唯恐政府军阻拦,欲投抗日义勇军又不知投奔哪路,为此心急如焚;为了统一思想,并等待差遣人员联络情况再订结果,遂带队到河坎子一带休整,并就抗日问题进行讨论酝酿。恰在此时,邵本良带政府军 2000 余众包围了张奎元部。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之际,理应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张奎元万没想到政府军会在此时对自己下此毒手。毫无准备的张奎元听到枪声,才急下令抢占河坎子南山,依此有利地势仓促应战,从清晨一直激战到天黑。在官军炮火的攻击下,张部伤亡惨重。为了多数弟兄的安全,张奎元只好命“占北”带领弟兄借夜幕掩护向东北方向突围,自己只带 20 多个护卫在阵地打掩护,结果多数弟兄突围脱险,而张奎元等却被官军俘获,身陷囫囵。初被押入凌源大牢,后因其是重犯,又被解送承德监狱,准备批复后处决。但因抗战紧张,并有人说情,才长押未果,得以幸存。

1933 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吉、黑三省后,又加紧准备进犯热河省。在这热河大战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在全国抗战救国的呼声压力下,不得不做出保卫热河的姿态。在这种形势下,张奎元的好友便借机要求省府释放张奎元,以利增强抗日实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顺应潮流,由汤玉书出面以为了扩大抗日战线为由,释放了一批有能力、有影响的政治犯,张奎元也被开释出狱。

身陷囚笼 2 年之久的张奎元,并没有因此而气馁,雄风犹存,壮志不减当年。他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亲朋好友,特别是

原部的弟兄们都纷纷登门道贺，岳父家、义父家门庭若市。他满怀豪情的对朋友们说："国家是大家的，就得靠大家来保护她。我不当任人欺压的熊包，更不能当外国人的洋奴。如果当局不把我押起来，我早就组织大家去打日本鬼子了，现在重整旗鼓也不算晚。"这充分表达了他临危授命，组织义军的决心。

张奎元准备组织义军的壮举，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东北军十九旅旅长孙兴伍，在行营驻地喀左山咀子接见过他，勉励他为抗日出力，还给他拨了一部分枪支弹药。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总监朱霁清闻讯从朝阳亲赴凌源登门看望，并任命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独立师司令。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于1933年2月初，在凌源沟门子召集了50余人的义军骨干及社会名流会议，宣布国民救国军独立师成立，师长张奎元，副师长胡祺俟。消息传出后，好多爱国民众及离散的东北军和其他各路义军战士都纷纷来投，只经两个多月时间，张部义军就发展成拥有万人之众的抗日武装力量。

张奎元部救国军，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是历来所罕见，其主要原因：一是队伍头领名气大，有威望。张奎元本人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弟兄们信得过，英勇善战胆子大，与战士同甘苦，不搞特殊。二是张部是正义之师，有明确的抗日目标，以救国卫民为宗旨。军有军旗，团有团旗，在红地白牙子的三角形5尺多长的大旗上豁然写着"抗日救国"的大黑字，每个成员都佩戴着"抗日救国"的红底黑字的袖标，得民心顺民意。三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有大令，有稽查处，老实人任总稽查。

张奎元部国民救国军的建立之际，正是热河沦陷之时，多数当地民众都沉浸在国破家亡的悲观绝望之中，缺乏抗日决心和信心。该部人数虽多，但都来自四面八方，基本是以团、营为单位分散活动的，斗志不坚者不乏其人。张奎元为壮军威、鼓士气，统一军令，提高战斗力，扩大义军影响，搞好与兄弟绺子配合，振奋民众抗日热情，争取各界的支持，准备开一次大型集会，但又苦于刚组建的

队伍基本是松散联合，特别是兄弟绺子，多数是重义气而轻军令，即使通知开会也不一定全到，经反复考虑，而想出一个特殊绝妙集合之法(这是由于朋友们对自己生活关心所想起的)。张的原配夫人已在他被押期间，为了她的安全，托人送回原籍，多年不在身边。在弟兄们劝说下，又新订一房夫人，是凌源松岭子姜杖子姜中顺妹妹，她巧舌如簧、风流而泼辣，很适合随军相伴。即以举行庆贺婚礼的形式来个全师大集会，以此对敌示威，点燃民众抗日的希望之火。

1933 年 3 月 1 日，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的第十四旅团攻占建昌后，继续向凌源进攻。张奎元闻讯后，急派战斗力较强的宋子文在凌源南哈巴气设伏阻击，与服部的先遣队米山部激战半天，日军龟田特务营长以下 10 余名被击毙。因敌后续部队赶到，才撤出战斗。3 月 4 日，侵热日军 30 余骑兵从凌源去青龙，住在北炉乡李玉林家，是日夜张奎元率队将其包围。激战 3 小时，战士张志凤等闯进院中，将日军队长中山太郎等 2 敌击毙，获洋马 2 匹，手枪 2 支，银元 1 提包。

张奎元部在牛营子举行全师誓师大会后，率部向凌源南部进发，当到佛爷洞时，却受到伪区联庄会的阻击。张奎元对日军疾恶如仇，对认贼作父的伪职人员也恨之入骨，骂他们是“狗子”，遂向其还击，打得伪联庄会招架不住，弃庄逃走。要路沟区治安队长于清瑞带全区联庄会 200 余人赶去救援。双方交火后，义军急向北撤。于自以为取胜便尾追不舍，不料进入张奎元摆下的口袋阵，被打得落花流水而逃。

张奎元乘胜追击，于 1933 年 5 月 18 日，一鼓作气攻入西汤沟(今老达杖子)。于清瑞、张国兴带剩下的几十个残兵败将，跑到青龙干沟避难。张又派胡祺侯团跟踪追击，经半天战斗，打下干沟，于、张早已逃之夭夭。从此，西汤沟一带被张部义军占领，此地成了伪满洲国内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的天下。

张奎元在西汤沟一带驻军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做了5件事：1.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把原有各追随日伪的牌长全部换上有抗日意识的人；2.筹集军需。向各牌大户捐款，也叫"捐大牌"，仅牛洞子一个牌即交出2.2千元；3.要求各牌动员青壮年参加义军。此时，张部义军已发展到1.2万余众的鼎盛时期。仅西汤沟一地即有两千人参加了义军，新组建程旺、马伍两个团；4.凡有枪的户都要把枪交给义军，出人带枪更好。口号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救国打东洋；5.维护当地治安，打击敢于来犯的"日本狗子"。此间，与伪联庄会打了两次仗，一次在老达杖子南山，把周会川带的伪联庄打跑；另一次是在前槽北杖子打跑姜克芝带的伪联庄。

于清瑞贼心不死，去建昌把伪治安维持会长宫弼臣搬来，宫带领伪自卫团及全县各区治安队2000余人，兴师动众攻打张部义军。宫怕不是义军对手，力主分兵两路，夹击西汤沟。自己带伪自卫团顺后槽过岭迂回河坎子；一路由王化召带药王庙、要路沟等伪区的治安队顺平房子、三岔正面进攻。结果从正面进攻的伪治安队和联庄会遭到义军的坚决阻击。是日夜又遭义军偷袭，被打得狼狈而逃。宫弼臣带的一路，偷袭了河坎子达摩洞，把张奎元的义父马文胜抓获，后被杀害。宫听说正面进攻的一路惨败而归，吓得魂不附体，不战自退。因此被义军打得丢盔卸甲的南路庄丁们骂宫弼臣这是"耍阴谋"。此仗各有伤亡。

在伪凌南县治安维持会几次骚扰的情况下，张奎元决意要打掉这群"狗子"的老窝。为此，在河坎子召开了各团团长会议，他在会上动员说："中国的地面被日本霸占，还支使狗子来咬我们，我们不能在一个小地方打圈子，我们要打下牤牛营子，一为扩大收复失地，在那里安官立县；二为死伤兄弟报仇；三为提高我部实战能力；四为鼓舞士气和民气，也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并没有屈服，不全是汉奸！"在议论作战方案时，亚五龙、天下好等建议是否等条件成熟再打大仗。张奎元郑重回答说："我的意见是一不等、二不靠、三

不怕。日本鬼子不是得了不治之症的野兽，等等他就死了，等我们成熟了，他也站稳脚跟了，狗子就更多了。那时你不打他，他就打你。条件是打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他这番有理有据的讲话，使到会的人都心服口服。

王司平，是喀左姚沟人，因跑得快，故人称狗秧子或巴狗子。他也是带有200余人，而且枪马齐全的绿林队伍，经常在二道营子、汤神庙一带活动。张奎元为增加攻打牤牛营子的把握，也想把他拉入本部，便派人与他联系，动员他联合打建昌。他表面说同意，可人走后他却说：“老耗子打牤牛营子是想安官立县，我们也不想当官，跟他一起干有啥好处；要是牤牛营子各买卖都归我们自己接收，岂不是发财了。”于是他便提前3天单独攻打建昌。夜深时从赵家沟进行偷袭，打到西城墙(土墙)下，炮头在指挥攻城弟兄挖墙时，不慎被伪自卫团营长刘子章用机枪打死。炮头一死，失去指挥，手下争相逃命，做鸟兽散了。张想与王联合，不但与事无补，相反还增加了攻城难度，使建昌伪官吏们提高了警觉，一方面调兵遣将增加炮勇，加强防备；另一方面赶紧向上汇报，要求派兵增援。宫弼臣听说张部义军要打建昌，一为保命，二为保官，亲赴奉天搬兵。

1933年6月26日，张奎元率领全军向建昌进发，一路上大张旗鼓，浩浩荡荡。义军分别从凌源河坎子和建昌西周杖子出发，经魏家岭、碱厂到喇嘛洞，在此受到伪联庄会的阻击，张的先头部队奋力冲入。会头王殿生(必力营子人)仓皇逃遁，其家中的房屋被愤怒义军烧毁，以示惩戒。当晚在此宿营。翌日上午出发，午后2时许，各部都已进入预定阵地，对建昌形成包围之势，3时许战斗打响。

因敌方早有防范，凭借高墙厚堡及精良武器，负隅顽抗，战斗进展迟缓。第二天，张奎元调整了兵力，调宋子文团担任主攻，并以重炮向城内轰击，第一炮就打在伪自卫团驻地北大营，吓得伪团长韩树森跑出军营，躲到永胜和，义军战士打进南营子，攻占县城关

帝庙及西沟河套南大片地方，抢占了制高点轿顶山。义军已兵临城下，伪联庄会被打得龟缩在不足一里的城中。与此同时，张奎元特派"老实人"带队把宫弼臣家包围，但宫家早已人去屋空，为以示惩罚，将其5间正房烧毁。

第三天，正在建昌县城岌岌可危，攻城势盛，城中敌伪官兵被打得无处藏身，多数炮勇都已跑掉只剩少数就要投降，建昌指时可得的情况下，不料，于上午10时许，日军2架飞机从东北飞来，在建昌上空盘旋，怪叫着向攻城义军轮番轰炸，投弹8枚。把吗呢沟吴兽医儿子及4头驴炸死在东河套，顿时攻城义军军情动摇，战局逆转。与此同时，建昌附近伪联庄也接令赶来救援。蓬林庆(外号二大个子)带黑山科牌伪联庄、钟四带红石岩伪联庄占据城东蟒挡坝岭等山头向义军射击；赵延文带领宝道沟牌伪联庄及曹香红的石佛伪联庄趁机从沈家洼子强渡大凌河；因为义军刘玉成团的炮头沈连贵曾是赵的部下，他下令不准机枪手阻击，让道给赵，使赵、曹顺利抢占建昌城制高点轿顶山。他们占据这一有利地形，反向义军射击，来自这东西两面的夹击，对攻城义军造成威胁。此时又得到来自凌源的紧急报告：伪维持会长宫弼臣在奉天搬来的日军500余人在山奇司令带领下，已从凌源火车站下车。在这种情况下，张奎元已感到本部力不从心，他根本不知道内部有吃里爬外的人，他想连一个不足百人的联庄会都能顺利抢占轿顶山，如日军赶来增援，将不堪设想，只好下令主动撤出战斗。


日军投掷未爆的炸弹

张奎元部从建昌撤出战斗，兵分南北两路，即一路由原路，一

路经汤神庙、尹杖子都回到老达杖子、河坎子一带进行休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加强纪律，提高战斗力。与此同时，张奎元还反复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个队伍向何处去的问题，并得出一个孤悬敌后的大规模抗日武装，要想抗日胜利，必须与其他兄弟部队联合的结论。为此，他于同年7月中旬，与护卫营长樊克生等去天津马厂寻找郑桂林，打算与他共谋抗日救国大业。因没见到郑才顺便回故乡探亲。恰在此时(即7月24日)，郑桂林率起义军攻入任邱县城，与张奎元不期而遇。在郑桂林的启发下，使他明白国民党当局是靠不住的，在北方真心实意抗日又有实力的只有吉鸿昌将军。1933年9月上旬，张奎元接到郑桂林的密信，要他速带兵入关，以配合抗日讨贼联军(以下简称"联军")攻打北平。因他部下好多是郑的旧部，听说张决意去投郑桂林，都深受鼓舞。1933年9月15日，张奎元为了配合联军于平北作战，并能与其会师联合，遂挥师南下入关。出要路沟，经干沟、香水，经义院口入关，再经石门寨、柳江、秦皇岛，于9月20日到抚宁县城外。经过休整后的张部义军士气正旺，一路除在杨树窝铺、石门寨有一扫而过的战斗外，其余基本上是所向无敌。原计划由抚宁经玉田去北平怀柔与联军会师，但驻抚宁的于学忠治安军的一个营及当地民团共1000余人，为防张部义军进入平北增加联军力量，奉命不准张部义军通过。张奎元为不误军机便果断下令合力攻打抚宁县城，同时派主力胡祺侯部攻占城南军事要地紫金山，而后居高临下向城内敌堡轰击，吓得抚宁县长刘与沛于20、21日两次向省府通电告急，都因平北战事吃紧而无力增援。经3天3夜激战，打得城中守军招架不住，弃城而逃，于9月23日，义军终于胜利开进抚宁城。

1933年9月20日，蒋、日勾结，在上海达成一个在停战区共同"剿匪"的秘密协定。据此协定，日军出动一个师团进入密云，协同国民党军围剿方、吉、郑的抗日讨贼联军。于学忠要派兵进剿张部义军。张奎元为防南军(国民党军)偷袭，对抚宁城外重点部位也都

加兵布防，对城南制高点紫金山，由原百人守卫，又增加一倍。在县城四门都垛上沙袋，准备与南军一决雌雄。

同年10月9日，于学忠调治安军6000人，携重火力，乘火车开抵北戴河、抚宁周边一带。天刚蒙蒙亮，于部首先命一个团，化装成义军并打着义军旗帜，偷袭紫金山，守山义军没有提防，等到近前发现是南军展开肉搏时，终因敌众我寡，此山阵地失守。午后，张奎元派宋子文团反攻紫金山，经半天激战，此阵地又失而复得。第2天，南军先用重炮轰击守山义军，后又对此山发起多次冲锋，到天黑时，此山终被敌军抢占。第3天，南军在重火力掩护下，向县城周围义军阵地同时进攻。经过5天激战，城外各阵地多数丢失，近万人义军都被压缩在只有4平方里的方城中。南军又用重炮向城内轰击。义军将士凭借着残垣断壁作掩体，与敌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

同年10月20日深夜，张奎元部因弹尽粮绝，被迫放弃抚宁城，打开西门，顺洋河河谷杀出重围。该部在占领抚宁一个月及坚守县城11天的战斗中，曾付出了重大代价，共伤200余人，失散弟兄2000余，有些不便携带的重型武器也被丢弃。

张奎元率部弃城突围后，原想绕道西去与郑桂林部会师，但怎奈西去处处都有政府军关卡，打出30余里，伤亡百余人，仍没能冲出政府军的暗伏关卡，才改向北去，准备打出关外，回到本部发祥地建西、凌南一带暂时休整，以待重整旗鼓，继续开展敌后抗战。于是，张奎元便率部自界岭口出关，经青龙土门子、季杖子，回到建昌县老大杖子岔沟门子村。

1933年10月27日上午9时许，张部义军的先头部队从岔沟门子岭过来，通过岔沟门子屯北岭，即猫岭(在此岭东头山顶上有一石砬子，酷似猫头而得名)向凌源河坎子方向进发。此时，敌伪军都藏在工事内，不敢开枪。一直等下午4时左右，张奎元及司令部人员乘马行至猫岭腰槽子上边时，被义军叛徒全维善认出。他对刘

老万说："干爹，那个骑白马的就是'老耗子'打不打？"在他身边的于清瑞下令说："等的就是他，打！"全维善遂开枪，各敌伪军听到枪声也同时向义军开枪。在这敌弹象雨点一样扑面而来的险恶情况下，张奎元仍临危不惧，索性勒马不前，面对开枪的山头高喊："别误会，我是老耗子，这里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是借道北去！"话音未落，就被全维善的罪恶子弹击中，穿胸落马，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年仅 26 岁。

张奎元，在民族危亡之际，举义率众抗日，在敌占区内艰苦转战，后又旗帜鲜明的步入抗日讨贼的革命道路，曾给中外恶魔们以沉重的打击。他在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革命正义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而死的，死的光荣而伟大。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他临终别言说的好："这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的确，他在这里发祥，在这里战斗，他的战友在这里，他的独生女儿在这里，他为国捐躯在这里，他又长眠在这块沃土里，这里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给古龙河头留下了无数感人传奇的故事，也给大凌河增加了亮丽的风采。他那不畏邪恶、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誓为民族尊严而战的浩然正气；临危授命、"不把鬼子赶走誓不为人"的爱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万古流芳。

高体乾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建平县朱碌科白音代沟村的爱国青年高体乾(原名高赞兴)，正在沈阳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任意践踏和血腥杀害的惨状，意识到了国破家亡的后果，决心找抗日救国的道路，毅然于10月间到了北平。正值东北学院在北平收容东北流亡学生就学，高体乾报名参加了学习。在校期间，他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谈论国家大事，愤恨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日寇的祸国殃民政策，谈到只有参加革命，才是抗日救国的唯一出路。1931年冬，高体乾参加了学生请愿团赴南京，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出兵东北、收复失地的示威请愿活动，迫使蒋介石在总统府召见了他们。这次请愿活动对推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有很大影响。

1932年初，适逢东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组织军政训练班，讲授组织、联络抗日义勇军等项课程。高体乾弃学到抗日救国军政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于2月初离开北平，回到热辽边境组织抗日义勇军活动。

6月间，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热河特别支部，由赵玉祺担任支部书记，王本初、周复苏为特支委员，到热河建平一带改编组织义勇军并组建红军，组织武装暴动，建立苏区政权等等。由特支书记赵玉祺带领，当即到了建平县高体乾家乡一带进行秘密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组织起抗日义勇军队伍200余人。正在队伍不断扩大的时候，由于走漏了消息，热河省督军汤玉麟命令建平县政府进行追捕。特别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继续活动下去有困难，决定暂离建平，于7月末回到北平。

8 月初，东北抗日救国会派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司令彭振国(又名筱秋)，到热辽边境组织、指挥抗日义勇军活动。

高体乾随彭筱秋到了朝阳地区，经彭筱秋同意，又回到建平县组织抗日民众 20 余人，带到朝阳六家子地区，跟随彭筱秋一起行动。这时彭筱秋从北平带来武装部队六七百人，加上朝阳南部义勇军 3000 余人，决定向锦西地区日军进攻，先打江屯。该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拂晓开始进攻，很顺利地攻进城里，把大部日军消灭，少数日军据守两个碉堡顽固抵抗。因锦州日军派来了援兵，并有飞机助战，为保存实力，遂向六家子撤退。不久，彭筱秋回北平抗日救国会。高体乾即率队回建平，继续进行组织义勇军活动。

这时，热东地区抗日义勇军活动逐渐增多了，很多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队伍。高体乾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队伍的影响，于 10 月间把朱碌科附近分散的抗日武装集中起来，在朱碌科街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武装示威游行，并与汤玉麟部驻朱碌科的黄团长面谈，要他支持抗日救国活动。黄既不敢表示支持，也不敢限制。通过这次武装游行，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也更加公开了，对扩大义勇军队伍起了很好的影响。

11 月初，高体乾为了取得党的指示，再次赴北平汇报了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抗日救国会鉴于高体乾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发展情况，遂授予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的番号，任高体乾为支队长。并派王旭和志愿参加抗日义勇军的 20 余人，同高体乾一起回到建平，而后，立即集合部队 50 余人，到凌源县第一军团司令部驻地领取了军服、弹药，赶回各地分发给各团。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又先后到下洼、公营子、小塘等地活动，在较短时间内使抗日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3 年 2 月，义勇军队伍仍分散在各地活动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调集了大量兵力，于 2 月末兵分三路从开鲁、朝阳、凌南向热河进犯。汤玉麟的军队不战而逃，日军长趋直入，于 3 月初侵占了

承德。这时，高体乾带领抗日义勇军100余人，从下洼回到朱碌科地区。因通往第一军团的路线被日寇截断，就从榆树林子向西经深井、小塘等地，跨过老哈河进入八里罕(今宁城县)，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会合，再向隆化转移。当部队进入霍里火川高山深谷后，遇到汤玉麟自卫军的突然袭击，把义勇军部队拦腰截断，造成对义勇军前后夹击的包围形势。这时，高体乾还在包围圈外，率队从外面出击了堵口子的自卫军，并与被围部队主力取得联系，一齐奋起还击。经过一天的激战，把汤部的自卫军击退。第二天，自卫军又在霍里火川坝上伏击，正好与高体乾十二支队遭遇。高率部反击，夺占了制高点，与第二军团主力配合，又把汤部自卫军击溃。后经隆化县、丰宁县进到察东沽源县一带休整。

4月，高体乾率领义勇军部队到沽源以南独石口后，与北平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党派谢子长、阎红彦(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到高体乾的义勇军部队，传达了党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方针政策，并指示要尽力巩固和扩大这部分抗日武装。6月，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归孙殿英部队收编。高体乾遂带十二支队单独返回热西，在围场、丰宁、隆化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7月，与从第二军团回来的项忠义部会合，共同活动。

10月初，吉鸿昌、方振武、汤玉麟合作抗日，汤军从独石口、赤城、居庸关方向向北平进攻。高体乾和项忠义的义勇军随汤部崔旅进到赤城以南，因方振武、吉鸿昌东路军失败，汤部亦撤回沽源一带，由宋哲元接收遣散。高体乾、项忠义的义勇军又独立活动在大滩(河北沽源县内)一带。时已冬初，天气寒冷，尚无棉衣，最后被东北军骑兵第五师收编，驻在龙关县附近，准备过冬后再返热河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但不久移防河南，驻在驻马店地区，到1934年夏被遣散，高体乾遂从河南返回北平。

同年夏，高体乾又从北平秘密回到建平一带，继续组织武装抗日。为了解决武器，在公营子赵久洲的帮助下，高体乾返北平，带来

原来义勇军的3个战士，经过周密的计划，细致的侦察，摸清了公营子“大满号”(鸦片组合)的情况。利用一天中午休息的机会，高体乾带领3名战士，手持赵久洲在警察分驻所所长那里借来的两支“自来德”手枪，突然闯进“大满号”院内。没等院警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他们的八支长短枪全部缴获，又从“大满号”的后院门撤走，安全地回到了预定地点。为了隐蔽目标，当晚把枪掩藏好，夜间几个人分散回了北平。

1935年春，高体乾又从北平回到家乡，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从建平县南的公营子，北至敖汉旗下洼，西到奎德素、平庄西五家煤窑，东到老虎山(今属敖汉旗)走了一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继续秘密组织武装抗日队伍。6月初，高体乾回到北平，又找到赵玉祺和原义勇军的战士7人，返回到建平公营子，又集合起来当地的义军战士共20余人，以抗日自卫救国军的名义，利用缴获“大满号”和自筹的枪支，先在建平南部、后到建平北部地区进行昼伏夜出的游击活动。这时日寇强化治安，统治很严。在建平南部活动时，一天拂晓前进到小石佛沟村宿营，走漏了消息，天明敌伪军占领南山开始打枪。高体乾率队占领了石佛沟村北山，边打边向西高山转移。在敌人包围下，坚持战斗到黄昏，立即率部队突围，安全转移到勿沁吐鲁东山的水泉沟(今建平县张家营子公社)马云龙住村隐蔽。以后辗转进到炮手营子(今敖汉旗)以南地区活动。

这时，从大黑山来的抗日救国军监天林部约3000人，在倒阁老(现敖汉旗境内)以南地区活动。经过联系和协商，与蓝天林抗日救国军会合，共同抗日。还有朝阳南部刘振东的抗日队伍2000多人，也积极活动，严重地威胁了朝阳、建平两县日寇的统治。日寇纠集各县的日伪军、警察和部分空军配合，进行秋季大扫荡，妄图把高体乾和蓝天林的抗日队伍消灭在大黑山地区。他们与敌人接触后，即从倒阁老营子边打边撤，经贝子府(现属敖汉旗)进入大黑山地区。在大黑山的附近，经过10余天的大小战斗，最后高体乾与蓝

天林的队伍被包围在大黑山里，除了南面地势险要不能通行外，敌人在东、北、西三面同时进攻，并有飞机助战。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艰难境况下，两支抗日队伍在高体乾和蓝天林的亲自指挥下，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战斗到黄昏。夜间，义勇军从大黑山东坡敌军的薄弱处分散突围，终于打破了敌人的围剿，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突围后，高体乾带着队伍在大黑山东的牤牛河西岸山区，又与蓝天林部会合。因这一带日伪军活动猖獗，为了保存力量，他们会商，暂东渡牤牛河到广宁山地区(今北镇县境内)，以避其锋。

当进到清河门(现阜新市境内)地区，广宁一带的日伪军已有戒备。因到那里也很难立足，故高体乾向蓝天林提出：北进到内蒙的乌珠穆沁一带，依托外蒙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较易坚持，也可得到外蒙的支持。蓝天林同意了高体乾的意见，计划从黑城子王府，经下洼、后甸子、开鲁县西部、天山县东部向乌珠穆沁地区前进。当夜出发，在黑城子王府地区与敌遭遇，边打边前进，拂晓前进到下洼南山区。休息到中午，日伪军又从北面的下洼和南面黑城子王府追击，从下午又战斗到黄昏。趁夜幕摆脱了敌人，向后甸子方向前进。经过五六天沙漠地区的行军与战斗，才进到开鲁县西的富通镇地区。由于向导突然发病，不能带路，又无行军地图，不敢冒然前进。所以，又决定重返大黑山地区。在返回途中的沙漠地区，又不时遭遇蒙古(王子)小队的袭扰，反击时他们就分散逃跑，宿营时又来夜袭，使部队得不到休息。快出沙漠地区时，在羊羔子庙拂晓宿营时，蓝天林部吃过早饭就出发了，高体乾部休息到中午，发现四周沙沱子有蒙古王爷府的骑兵在活动。立即组织好前卫、后卫，率队突围，边打边走30余里，打退了蒙古小队的包围和追击，在王子庙附近又与蓝天林部会合。接着就夜间行军，在下洼北山地区与日军又打了一仗。这时，日寇在这一带由“扫荡”转入“清剿”，在形势越来越紧的情况下，为了缩小目标，高体乾与蓝天林商议决定：两部分开活动，蓝天林向大黑山地区行动，高体乾带着队伍向建平县以

南地区转移。

高体乾所率的义勇军在倒阁老营子地区，又遭日伪军的“清剿”。50 多人的活动也很困难，就边打边分散，最后带 20 余人向建平南的公营子地区转移。途经建平县北部的一百小钱梁东部山区(罗卜沟乡)宿营时走漏了消息，天明后发现伪军和地主武装正在布置包围。高体乾立即带队突围，占领了一百小钱梁高地，与敌人展开了战斗，边打边走，至黄昏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了马厂西北部的山区万家营子附近，找到了同学万寿阁，了解了日寇在这一带的“清剿”情况。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战士非常疲劳，在村中吃饭稍休息后，当夜又向建平县以南转移。由于人困马乏，战士们在马身上睡着了，而走进了日军在建平县城东建筑的简易飞机场。高体乾发现后，由于熟悉地形，迅速撤出机场，沿小路到建平县南山区村庄。休息一天后，夜间又行军到榆树林子区，把公营子一带的武装人员分散回家隐蔽，又把北平带来的人隐蔽起来，他再次返回北平。从此，高体乾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高体乾所组织率领的抗日义勇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战在朝阳地区的一支抗日民众武装。在两年多的抗日斗争中，不仅对日寇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也真正地点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抗日烽火。高体乾所率领的抗日义勇军为保卫中华，抗击日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侯"托天"率众顽强抗暴八年

侯托天，名封福，号"托天"，喀左县甘招乡宋家店人(原属建平县公营子区宋家店村)。1899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1932年到1940年，他领导联庄队员抗捐罢税，组建抗日救国军进行抗日斗争，在凌源、喀左、建平一带震动很大，其斗争事迹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际，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对国内人民却变本加厉的压榨和搜刮。1931年，汤玉麟主政的热河省征收的所谓国家正税(上缴省的)就有24项之多。除此之外，地方摊派的还有保甲捐、治安捐等等名目，真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侯托天为了生计在公营子开了一个杂货铺，因为苛捐杂税繁重，濒临倒闭。1932年春节，家族中一些青年人到他家拜年，谈起了生活疾苦、日子难熬的情况，他思之再三后，便说："当今的政府腐败，社会荒乱，连年逃灾，捐税重重，日本鬼子又要向我们这地方侵犯，老百姓甭想过好日子了"。青年们问他应该怎么办？他说："只有把大伙组织起来，拉联庄抗捐税，打日本，才能有生活出路。"大伙听他讲的在理，就异口同声地说："你领头吧，我们同你一起干"。就这样他下了决心，毅然到公营子关了小杂货铺，借几支枪来，很快组织了20多人的联庄队伍。为了加强力量，又与邻村王营子的王占成联庄队伍联合起来，共有50多人。联合后，侯封福报号"托天"，王占成自称"盖地"。从此以侯、王为首的一支抗捐税的联庄队伍，在建平、喀左、凌源、朝阳一带活跃起来了。

为了扩大联庄会的影响，取得各界人士的支援，于1932年1

月底开始扩充队伍。正在这时,公营子塔下匪首胡树,带领40余名土匪到牤牛河南王英沟抢掠,侯托天闻讯率部前去阻击。胡树望风而逃,侯部紧追不舍。沿途经过桥子、王杖子、柳树底下等村时,100多名带有武器的联庄队员,也积极参加了剿匪活动。联庄会追到杜家沟时,胡树见势不利,请士绅杜保出面讲和。侯托天提出:“以后不准到牤牛河南岸骚扰,有事时听联庄队调遣,不许伤害百姓。”胡树答应一定遵从。至此,这股土匪再也不敢过河胡作非为了。群众对这件事,深表称赞,许多村联庄队伍,主动要求与侯托天联合。随之联庄队伍逐渐扩大起来。不久,各村联庄齐集牤牛河南岸的十八奤开会,共同推举侯托天为首领,规定每半月集合操练一次,一村有事各村相助,抱住团儿,为民除害。并经大家商定进行抗捐罢税斗争,各种捐税一律不交。为造声势,决定首先拿盐局子开刀。当时,公营子盐局子是由恶霸地主孙珍父子伙同北荒地地主李增奎承办的。他们设立盐警武装,收缴盐捐刻不容缓,绑勒群众,拆房砸锅,横行无忌。对贩盐者和零售商贩的食盐,随意没收,甚至还要关押人。而他们官卖的食盐,掺砂使假,任意抬高价格,每斤高达3角小洋。对此,群众无比气愤。为平民愤,解决人民亟待解决之事,侯托天率领联庄队员,于2月20日去公营子攻打盐局子。孙珍父子闻讯,带领盐警逃到十里以外的梨树沟门,孙珍钻到一家墙旮旯放着的空棺材里躲藏起来。联庄队员追到北荒地,也没看见李增奎,未抓住盐霸。经搜查找到五袋盐,随即给群众分掉。接着又捣毁了盐局子,然后带领队伍到甘招、水泉、九神庙等地进行了抗捐税的广泛宣传。从此,这一带对食盐的买卖和贩运,再也没人敢管了,盐捐和其他税收也就此罢除了。

联庄队抗捐罢税的行动,深受群众拥护,因而声威大振,方圆四、五十里的联庄会都陆续前来与侯托天联合起来,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对于侯托天领导群众抗捐税的斗争,建平和凌源县政府十分恼火,屡屡呈文请省府调兵前来镇压。侯托天对此也早有预

料，告诫各村联庄会加强警戒，同时大量收买、制作火药、柳木炮等武器，随时准备与反动政府军警较量。6 月 15 日，凌源驻军热军董旅的一个排 21 人，全副武装到甘招一带侦探侯托天的情况。路经三家菜园子时，被侯托天部下张殿柱发现，张即带领联庄队员将其包围，打死 1 人，逃 1 人，俘 19 人，缴获全部武器装备后释放。为报复此次被围击之仇，旅长董福亭派曹营长率队前来镇压，曹占领了东赤里赤，联庄会在章京营子布防，两军对垒，激战两天不见胜负。第三天，曹营长分兵两路：一路仍从东赤里赤进攻；另一路由四家子、杨杖子包抄过来，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两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毙敌连长 1 人、号兵 1 人，联庄队员也有 3 人牺牲。后因西边防线被突破，加之弹药不足，形势不利，联庄队决定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张殿柱带领撤到南亮子一带，一路由侯托天带领撤到水泉沟里。敌人攻占了章京营子，由于未能消灭联庄队，就对老百姓大发淫威，挨家逐户进行搜查，抢劫财物，并烧毁了民房 27 间，然后扬长而去。

侯托天由于拉联庄队抗捐税、反官府声威大振，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得知后很重视。为把这支武装力量转化为抗日队伍，于 4 月末，北平方面派单宝玉来宋家店联络。6 月上旬，又派薄琼到宋家店召开了群众大会，检阅了 1000 多人的队伍。在会上，薄琼讲了话。他着重讲了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并提出准备成立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七路军第四旅的意见。为了筹集军火和经费，薄琼、单宝玉由侯封武、侯锡荣护送回北平救国会联系。侯托天在当地筹措子弹，并做建军的准备工作。为此，侯托天派人通知四家子屯恶霸地主王三鬼子(王学芝)，让他捐助一些子弹，并按时送到。王让其子王廷相送来两包大烟。侯托天扣留了王廷相，退回大烟，叫他拿子弹来赎其子。可是，王廷相在夜间企图夺枪逃跑，看守人员侯锡久摔伤，另一名看守人员张殿选开枪将王打死。

6月29日，薄琼带领单宝玉等人二次来到宋家店，并率队到五家道虎沟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七路第四旅，发了写有“抗日救国”的红袖标，正式委任侯托天为第四旅旅长，司令部设在大杖子庙里。会后薄琼和侯托天按予定时间，于7月10日带领300多人，经东赤里赤，绕过大城子，到三台接到裴佑宸押运的2驮子子弹、4驮子手榴弹，还有一包现款(天津字)。返回时，到大城子镇西头，在进街前，宣布纪律，然后由几十名马队为先导，进入大城子街。大城子警察分局局长王震，恐怕被歼，事前带警队到南哨一带躲避。局里只剩20多人，见侯托天队伍进街没敢开枪，全被缴械。这次共缴获大枪40支，并捣毁了分局，放出被押“犯人”(多为运销食盐商贩)。第二天返回经过四家子时，召集贫民分掉当地恶霸王三鬼子粮食400多石。群众分完剩下70多石粮，运回司令部以作军用。这一行动既惩罚了地主，又解救了贫苦农民的燃眉之急，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各个胆战心惊。热河省警务处在对凌源县公安局呈文的批示中说：“查该匪侯托天，胆敢聚众，抗拒警团，占据乡镇，强抢官所，撕毁文卷，绑掠人票，实属目无国法，猖撅已极。除备案外，仰饬所属严缉，务将此股悍匪，期日歼灭，以靖地方”。8月27日，董旅又派张子斌带一营人来镇压。侯托天率部立即去宋家店占领了后山，与敌人经过半天多的对峙，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战斗逐渐失利，当侯部撤到三官庙楼子山时，又与官兵遭遇。此战之后，军心涣散，加之农事大忙期已到，多数救国军战士回家不归，王盖地(占成)的部下也从此脱离了队伍。薄琼等感到形势不利，便动身返回关里了。为继续开展抗日斗争，侯托天又到大马架子与正在袁振民部阅兵的救国会军事部副部长彭振国联系，从那里得到一车棉军装和一部分天津字现款。

1933年全热河沦陷后，公营子驻有日军和一个伪军中队，为首日寇叫敖村谦三。这些日伪军经常四出窜扰，奸污妇女，杀害群

众，抢掠财物。下三家一名妇女被轮奸后，又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从家沟一名妇女也被日本鬼子奸污了，当地群众对日寇的罪行恨之入骨。5月4日，侯托天率20余人，在牤牛河岸陈家沟北梁，遇见3个日本鬼子追逐2名青年妇女，侯托天随即下令开枪。1名鬼子被打死，另两名狼狈逃窜。因此激怒了日寇，于5月间又出动伪军到甘招一带进行讨伐。侯托天的部队被攻垮，从此转入了游击式的抗日活动。

由于日寇的频繁进剿，抗日活动更加困难，侯托天的义军最后只剩五六个人了。在7月26日处决东赤里赤警察所长董某时，又有2名抗日战士牺牲。1934年3月1日，侯托天和侯锡久至公营子一带活动，在南山屯与一队伪骑兵相遇，他们边打边撤，打死伪军一人，侯托天腰部负伤。此后，侯托天便到外地养伤，暂时停止了抗日活动。日伪军为了彻底消灭这支抗日武装，经常派特务到宋家店进行侦探，派讨伐队到宋家店一带搜查，还在甘招设立了伪警察分驻所，以监视这里的动向。

侯托天养好伤以后，为筹措抗日经费，东山再起，决定把存放的3支枪卖掉。1940年8月19日，侯托天凌晨到家让人看枪，看枪的人还没来，大城子警察署李小胡带领50多人的马队先来了，团团包围了侯托天的家。2挺机枪架在门口，敌人进到院里向屋里射击。侯托天蹲在灶炕边，与敌人展开了战斗。他趁敌人机枪换梭子的时候，猛冲出门，边打边跑，飞步奔向门前的河套，想冲进对岸的树林子中去。但是，刚跑到树林子边，就被密集的子弹打中了，一腔热血洒在家乡的土地上。

侯托天拉联庄队抗捐税、又组建救国军坚持抗暴斗争8年之久，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直至壮烈牺牲。他为人民、为反满抗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威武不屈“打一面” 誓死抗日李凤春

李天德是喀左蒙古族自治县羊角沟三道沟人。189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在家劳动，过着贫困的生活。18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下了关东闯绿林，以后参加了马占山的队伍，因他枪法好，在战斗中能独挡一面，弟兄们为他送号“打一面”。

“九·一八”事变时，李天德正在马部任团长，他积极参加了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活动，带兵打过五站，分过洋行。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李部撤到内蒙开鲁、天山等地，后因与马占山失掉了联系，李天德毅然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寻求新的抗日途径。

李天德与抗日救国会取得了联系，领得一笔给养费，带着他的侄子李凤春几经辗转回到家乡。1935年夏季，他以楼子山和大铁沟三道沟为根据地，组织起一支以其亲兄弟6人和5个侄子及亲友为骨干的50余人的抗日队伍。1936年春，他又在三道沟搭帐篷，安大锅，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扩充军力。期间，郭文联、王老首、东保国等十几支绿林武装相继来投，抗日队伍逐步发展到300余人。大家拥戴李天德为司令，树起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大旗，并确定了反满抗日的宗旨。他对部下常讲：“我们主要是打日本鬼子、伪警察。在具体打法上是先割掉他们耳朵(掐电话线)，后砸断他们的腿(拆断铁路)，把日本鬼子全部赶出中国去。”同时还规定了严明的纪律。他一再告诫部下说：“谁如有劫道、砸明火、奸污妇女等不良行为，要严惩不贷。”要求部下住在老百姓家要给挑水、扫院子，吃饭要给饭钱。为了解决军需，对大户的捐款给予记帐并开收据，声明等抗日胜利后如数奉还。正因如此，这支抗日队伍在朝阳、喀左、建昌一带活动，深受老百姓拥护。群众称颂他们“说是官兵不开

饷，说是土匪从不抢”。由于得到群众的拥护，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到1936年末，队伍已增加到700余人，有轻机枪2挺，重机枪1挺，长短枪支也比较齐备，经常进行游击活动，打击日伪政权。日伪统治者对李天德抗日义勇军十分害怕，把他列为热河省“治安肃正”的重点对象。昭和十二年(1937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绘制的日文资料《满州国匪贼分布要图》把“打一面”列为要匪之一绘入图中，并指令当地日伪军警集中兵力进行围剿。

1937年5月11日，日军30多人的骑兵和伪军四十一团的200多人的骑兵在指导官管奇指挥下，进攻三道沟，围剿李天德。在日伪军到来之前，李天德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了戒备。在铁沟东面的鹰嘴子山上修筑了工事，等候应战。日伪军来到后把马匹安置在铁沟门外，从铁沟的西坡爬上平顶子山、牛头山和元宝山等，双方遥相射击，打得很激烈，战斗一直进行了两天两宿。义军打死日伪军3名，到第三天义勇军伤亡很重，特别到傍晚时分，义勇军首领之一李景龙也中弹牺牲。这时李天德、李天祥等分析了形势，认为打下去不利，应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于是乘夜带队下山转移了。翌日凌晨，日伪军听不见山上有枪声，攻上山去找不到李天德的踪影，便恼羞成怒，下山闯进三道沟村。人们由于怕遭日伪军的杀害，早已躲进了深山密林。他们找不到人，就把牲畜、粮食、衣物等抢劫一空，接着放火烧毁了全村12户60余间房屋。同时又将李景龙的首级割下来，带到烧锅杖子村，挂在街头示众三天，妄图以此恫吓抗日军民。



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作战

1937年秋季，日伪军

四十一团和建昌县讨伐队再次开进铁沟围剿抗日义勇军。李天德率众在朱杖子、东山根进行阻击，打死打伤伪军数人后就向南撤走了。经铁沟奔歪脖子山到柳家沟时，义军又遭敌军堵截。由于腹背受敌，致使义勇军伤亡 20 余人。

日伪当局为了彻底消灭李天德抗日义勇军，把总长达 30 华里的铁沟山区划为"匪区"，调集大批日伪军警到这里施行"三光"政策，搞"集家并村"。从 1937 年 9 月至 1939 年间，日寇就从铁沟里赶出 485 户、2268 人，烧毁房屋 450 间，在铁沟门建立了"人圈"，把人们拘禁起来。在这里特务横行，汉奸当道，致使 17 户家破人亡，37 人惨死。铁沟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洗劫，30 里的铁沟成了一片荒凉的无人区。

日伪军警的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爱国军民的义愤。1937 年秋末，李天德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南下进关。就在这时，驻防在朝阳大平房子的伪军骑兵连有 40 人哗变，他们把连长枪毙后，携械来投。李天德欢迎他们的到来，经改编后立即率部队 700 多人向关内进发。他们从铁沟出发，途经大梯子岭、乱泥塘子等地，急行军 3 天，到长城边的新台门附近与日伪军遭遇，敌人以 2000 多兵力进行阻击。敌众我寡，加之义勇军长途行军，战士疲劳，不得已又往回撤退。当义勇军撤到建昌二道沟子红石砬一带，日伪军乘 30 多辆汽车带大队骑兵、步兵尾追上来。义军在这里打了两天两夜，然后边打边向朝阳柏山方向撤退，敌军步步紧追。当退到柏山，义勇军凭借天险，又坚持苦战了 2 昼夜，打到第三天的中午时分，一颗炮弹落入义勇军阵地，炸死 11 名战士。李天德率众又迂回到红石砬，与敌军继续战斗。抗日义勇军连续作战 7 天 7 夜，仍陷于重兵包围之中。

在这种敌众我寡、形势非常危急的时刻，李天德、李天祥、李凤春、郭文联等首领会商，决定化整为零，就地分散，四面突击，以免全军覆没。就这样，李天德率其一部，王老首、郭文联、东保国等各

领一支队伍分别突围出去了。

从此，这支700多人的抗日大军，分为十几支抗日小分队，灵活机动地进行游击活动。他们时聚时散，互通情报，互相配合，对日伪军警进行打击。

1938年初夏，李天德在六官营子上滴达水村抓住了2个大城子伪警察署的特务，带到卧虎沟薛杖子北山处决。

自从大队分散以后，李天德经常率十几人的小分队夜行晓宿，穿山越沟，进行抗日游击活动，频频骚扰敌人。1939年春的一天雨夜，李天德带队从水泉的下湾子去三家行军途中，因驴打前失，被摔下来，摔伤头部，他被抬到三家村时，已经奄奄一息了，牺牲时年仅49岁。

李天德牺牲后，他的侄子李凤春(号平分)担起领导这支抗日义勇军的重任，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40年9月中旬，伪喀左旗公署(1940年初废建昌县，设喀左旗公署)警务科的特务梁秀峰、侯锡三到卧虎沟东杖子、甘招、东赤里赤等地搜集情报，诈取民财，欺压百姓。8月15日，梁秀峰家唱皮影，梁、侯也一同观看。当地群众向李凤春告发，当晚李带队摸进梁家，捉住梁、侯，就地枪决，为民除了害。

1943年春，李凤春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一天夜里他们从影壁山后烧锅杖子伪警察分驻所到大凌河北瓦房一带，在长达30余华里的沿途中张贴了“打倒日本鬼子！”“八路军就要来了！”“警察们赶快学好，不学好就把你们斩草除根！”等标语。这年冬天，伪喀左旗公署警务科派特务分子修静波、郭春雨、杨大个子到铁沟搜集情报，李凤春获悉后当即带人出击，打死了修静波，活捉了郭春雨。把郭带到南亮子河套处决，只有杨大个子逃了命。

李凤春的抗日活动，给日伪军警以沉重打击，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因此，1944年春，日伪军警调集兵力“围剿”李凤春。伪喀左旗公署讨伐队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跟踪追击，把义勇军

的队伍打散了。李凤春在羊角沟的小黑山亲戚家里躲避时,不幸被特务分子发现捕住。敌人抓住李凤春的第三天,由大城子伪警察署长李伍亲自带领大批伪警察把这位坚持10年之久的抗日义勇军首领带到铁沟崔杖子杀害了。当地群众怀着崇敬心情把他的遗体掩埋在巨石奇松中间。至今,忠墓犹存。

李天德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从1935年秋到1944年春李凤春壮烈牺牲,经历了将近10个年头,对日伪军警和汉奸走狗给予了沉重地打击。他们的英雄业绩至今仍在朝阳地区,特别是喀左县群众中广为传颂。

誓死保卫中国地　浴血抗战十四年

仅住着100多户农民的朝阳县石明信沟，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史中，却留下了光照史册的灿烂一页。石明信沟位于朝阳市南90华里、柏山中段，属于长在营子乡管辖。沟长十几华里，沿沟分布着韩杖子、孟杖子、二道沟、西南沟等几个自然村落。伪满时期，沟内住着100多户人家，仅几百口人。这么个普通的山沟，在辽、吉、黑、热四省的辽阔疆域中，是一块名符其实的弹丸之地。但石明信沟人民在日军侵华的14年中，坚决不接受日伪的反动统治，他们凭藉山高沟险、林密石多的地理优势，与日伪当局浴血苦战了14年之久，直到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领导这一抗日斗争的人，就是在辽西和热东地区颇有名气的“王老凿”——王文福。

王文福一家，世代居住在韩杖子村，历代务农。伪满时期，王家已形成十股20多户，全家族共有150多口人，在沟内人口居首。其他外姓人，也大都与王家连亲。王文福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是长门长子。由于他性情暴烈，办事死“凿”，因此他在青年时期，人们便送绰号叫他“王老凿”。他们亲兄弟四人，人们也就习惯的称呼为“二老凿”、“三老凿”、“四老凿”。

“九·一八”事变后，朝阳地区也和东北各地一样，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风起云涌之势，“王老凿”一家也投入到这一历史洪流中来。他三弟王文祥，原在黑龙江闯绿林，“九·一八”事变后在当地参加了民众抗日武装，受挫后回到家乡，他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日寇倒行逆施的情况讲给家人听，这对推动王文福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起了很大作用。王文祥又在家乡参加了民众抗日武装。1932年6月，一股日军侵入朝阳县南部，遭到了王震、赵清泉等人领导的民众抗日

武装的袭击，被击毙 23 人，剩下的 8 名日寇在向锦西溃逃途中，又遭王文祥率领的民众抗日武装的截击，日军被击毙 2 人。

1933 年 3 月，日军侵占了热河省以后，原在朝阳地区内活动的各路抗日义勇军队伍、民众抗日武装，有的随东北军撤退，有的就地解散了，也有一部分武装留在原地坚持敌后斗争，以游击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这时，王文福的武装退守回石明信沟内，闭山自守，采取了一种特殊形势的反满抗日斗争。其特点是，从不主动出击日伪军警，但坚决拒绝日伪的反动统治，日伪当局的一切政治、法律在石明信沟一律无效。日伪军警来讨伐，来的少便兵戎相见，来的多便退却山林，以避敌锋，敌退我回。就这样，王文福领导石明信沟民众与日伪统治者顽强斗争了 12 年之久。

从 1933 年至 1945 年的 12 年间，日伪军警曾多次对石明信沟进行血腥的讨伐和围剿，其中较大规模就有五次：

1934 年 6 月 1 日，刚刚站稳脚跟的日本侵略者，便对石明信沟民众大兴问罪之师。这天拂晓，300 多名日伪军闯进了石明信沟。天刚亮，人们发现日伪军进了沟，纷纷向沟里跑。由于沟深林密，多数人逃出了虎口，但也有些人被日伪军杀害。王文福的三弟王文祥就是在这次日军围剿中被杀害的。他的堂弟王文儒来不及逃走，藏在秫秸垛内，也被日军搜出后枪杀了。



“王老凿”画像

同年 12 月 17 日，日伪军又一次出动重兵，对石明信沟进行更大规模的烧杀和抢掠。这天清晨，日军骑兵突然闯进石明信沟，将住在沟门的王景山、温志祥等 21 人抓走，沟里群众闻讯立即转移。第二天，1000 余名日伪军警进入沟内扫荡，并把头天抓去的 21 人带回，企图引出“王老凿”。进到

孟杖子屯时，把在山上的宋石头开枪打死。日军看“王老凿”不出来，气急败坏，把抓到的21人蒙上眼睛，堵住嘴，推到河套当中，全部用刺刀挑死。日军在沟内又反复搜剿抢掠了6天，又抓住了十几名群众。有的人在押解途中逃出了虎口，未跑的全部惨遭杀害，有的人被杀后还倒上汽油放火焚尸。日伪军这次进剿，共在沟内烧杀抢掠了7天，沟内群众共34人遭杀害，同时把韩杖子、孟杖子、西南沟3个自然村的200多间房子也全部烧光，并抢走了所有财物。

日伪军警撤走后，王文福立即带领家族及沟内其他群众回到沟里，重整旗鼓，重建家园，仍是拒不降敌，坚持我行我素。

从此，日伪当局对石明信沟更加视为眼中钉，在年年都派兵进剿石明信沟的同时，也间或施展招安手段，多次派人对“王老凿”劝降，并封官许愿。“王老凿”皆不为所动。

1935年冬，日伪军200多名骑兵又一次进剿石明信沟。把群众予备过春节的物资和食品一掠而光，抓不到人就放火烧了群众搭建的临时简易住房。

由于每次日军进剿石明信沟时，都有汉奸分子勾引或带路，但有些沟外的群众佩服王文福的骨气，事先从沟外给他送信。

在石明信沟第一次被围剿后，王文福曾联合另一支由李树珍领导的反满抗日武装，攻打了与日寇相勾结的山咀子东沟大地主张文广的张家大院，以示警告。

1938年11月26日，30多名日军，分乘两辆汽车突然闯进石明信沟。这时沟里群众正在秋收。王文福闻讯后，跑到山头上一看鬼子来人不多，便开枪打死了2名日军。双方一直激战到下午，日本兵怕天黑后人少吃亏，傍晚时乘汽车撤退了。在这次战斗中，王文福的三儿子王俊峰牺牲了。

1939年7月19日，日本军官鸠枝率领100多名伪军和警察，对石明信沟又一次进行围剿，遭到王文福率领的沟内民众武装的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日伪军的连年讨伐和围剿，并未达到消灭“王老凿”和压服石明信沟人民的目的，他们从1940年开始，便对石明信沟施展了更加毒辣的阴谋。以集家并村为名，把该沟划为无人区，以武力强迫一些群众搬出沟外，对那些无法赶走的人，就在沟周围设警察分驻所，以图用封锁围困的办法，使“王老凿”就范。可是敌人的这一招又失败了。

为围剿“王老凿”，日伪军在石明信沟附近设置了几个伪警察分驻所，久而久之都成了“两面”警察所。有些伪警察看到了王文福和石明信沟人民坚持反满抗日的义举，唤发了他们的民族情感，从心里同情石明信沟民众。有的警察预感敌伪政权的不稳固性，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愿死心为日本侵略者卖命。还有一些伪警察受到了王文福的小恩小惠，有的警察分驻所长竟认了王文福为干爹。因此，这些担负围困任务的警察，却成了王文福的耳目。沟外一有风吹草动，王文福早已了如指掌了。

王文福为了在经济上打破日军的封锁，在此期间，先后在沟内装起14架轧棉花车子，进行自种、自纺、自织。又开设了3处油坊，还有鞋铺、帽铺等作坊，这条沟便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些事都是违犯日伪经济法令的。沟外在日伪统治下的群众，正愁着有棉无处轧，有豆无处榨。“王老凿”开了轧花厂和油坊后，沟外群众纷纷翻山越岭进沟轧花和榨油。那些被强迫迁出沟外的群众，又悄悄搬回沟内居住。由于大部分伪警察都与王文福有联系，因而那些到石明信沟轧花和榨油的人畜车辆，常常在警察眼皮底下通过，略施小贿即可，只瞒过日本人的耳目而已。这不仅加强沟外群众和石明信沟民众的联系，也增强了沟外群众对“王老凿”的信任，许多沟外群众赞誉石明信沟为真正的“中国地”。

石明信沟民众的反满抗日斗争，日伪当局视如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绞尽脑汁，在1944年开始对石明信沟民众又一次施展了毒辣的手段。

1944年下半年，日本军官亲自出面，由伪吐默特右旗旗公署总务科长何石葛都仍(蒙古族)引路，进石明信沟对王文福劝降。王家对来人以礼相待，给茶喝，给饭吃，但表示不能投降。吃饭时，王家人不陪客，由王文福的儿孙配戴武装送饭送菜。日本人一再表示友好，拿出带来的布匹和衣物要送给王文福，王家拒收，弄的日本人很尬尴。“王老凿”对日本人表示，你们来坐客，当客人接待；你们要打，我们就打。气的日本人灰溜溜地回到了朝阳城。日伪当局招降不成，更加羞恼。从1945年开始，便对石明信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讨伐。

1945年7月15日，由伪吐默特旗公署警务科长日本人大道义行率领800名日伪军警对石明信沟进行讨伐。由于早有人给王文福送了信，沟内群众都早已撤退了。日伪军警进沟后抓不到人，见物就抢，见房就毁。只搜出4名70多岁的老人，把一位年已76岁的韩守昆老人，活活用战刀砍死，并放火焚尸。把王家的棉花车子全部砸碎、烧光；将所存棉花全部拉走；还放火烧了所有的住房，并把残墙断壁推倒，挖出地基；又把沟内的所有石碾石磨全部砸碎，把水井填死。一直烧杀抢掠了8天，直到片瓦无存，遍地废墟，日寇认为沟内已不具备人的生存条件时，才带着几名被抓群众，于7月22日撤走了。

敌人走后，“王老凿”带人又回到沟里，又一次开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石明信沟人民，就这样在浴血苦战中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王文福领导石明信沟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事迹，闻名遐迩，不仅传遍了辽西和热东地区，甚至远传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因此，冀东党组织派到热河敌后开辟工作的几支武装工作队，都承担了与“王老凿”联系、联合反满抗日的任务。

1944年3月，活动在热东地区建平县北部的“锦热边远征工作队”周治国(当时还兼任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周哲民率一支小分队(共8人)，曾专程克服重重困难拜见了“王老凿”。先由王文

福的四弟王文玉出面会见，随后王文福也和周治国、周哲民同志见了面。周治国向王文福出示了证件，公开了身份。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周治国、周哲民同志向王文福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讲解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他们反满抗日的功绩，也鼓励王文福要坚持抗日到底。这使闭锁深山的王文福深受教育，王文福也向小分队同志谈了他这十多年的遭遇和今后的想法。双方约定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相互支持。

小分队在石明信沟住了几天后，由于走露了消息，便决定立即返回建平。分手时，王文福要给小分队经济资助，被周治国同志婉言谢绝了。王文福派人从山路把小分队送出了石明信沟。

1945 年冀东区党委第十六地分委，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组织了 4 个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后开辟热辽地区。其中由周鸣岐领导的朝(阳)建(平)新(惠)武工队和由华裕民领导的朝(阳)锦(西)义(县)武工队，都曾与王文福主动取得过联系。

当周鸣岐领导的朝建新武工队于 1945 年到建昌县东部时，派韩德发等二同志到石明信沟找“王老凿”，共商抗日大计。王文福表示欢迎武工队进驻石明信沟共同抗日。周鸣岐带队伍向石明信沟进发时，由于受日伪军重兵追剿，未能如愿。

华裕民带领的朝锦义武工队，也于 7 月上旬游击挺进到石明信沟。但这时正值日伪军调兵遣将，准备对石明信沟进行大讨伐，因而未能联系上。

在周治国、周哲民、周鸣岐、田丰同志回忆录中，都记述了他们与“王老凿”联系共同抗日的情况，并对王文福的抗日义举也都做了恰当的评价。

邓文山抗日救国战死沙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它长期霸占我国东北的野心，便推行了以华治华的政策，成立了伪满洲帝国，扶植溥仪为傀儡皇帝，称帝号“康德”，借以盗名欺世。反满抗日英雄邓文山，则针锋相对地报号为“平康德”。

“平康德”这一驰名四方的名字，既是邓文山的报号，也是他组织领导这支抗日武装的代称，又是他们的行动口号和奋斗目标。“平康德”，这一响亮的强音，既表达了邓文山的抗日救国决心，也体现了我中华民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邓文山，别名邓海峰，1905年5月3日出生于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大北沟村的农民家庭。1919年春，随父邓存珍移居黑龙江省德都县红化棋屯。1926年冬，21岁的邓文山投奔滨江一带较大的绿林首领——青龙(本名张云阁)，在他手下任“带打”(负责保卫)，报号“草上飞”，后改为“海中山”。1928年夏被奉军收编，“青龙”任营长，邓文山任副营长。

“九·一八”事变后，“青龙”欲投降日本，邓文山决然与其分道扬镳，拉出一部分人，投奔了马占山将军领导下的抗日义勇军，被任为团长，曾参加过江桥抗战。

马占山失败出走后，邓文山等因抗日无路，报国无门，只好暂归家中，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1934年3月，正值伪满洲国建国2周年之际，邓文山组织100多名志同道合的弟兄，重新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推选他为首领，报号“平康德”；副首领杨老五，报号“平日军”；刘景阳报号“复中华”。从此，一支威震敌胆的抗日队伍，出现在祖国北疆，灵活机动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6年4月，邓文山率队回到德都一带，并通知各部到北山集合。“平康德”、“平日军”、“复中华”等响亮的报号，越来越使敌人恨之入骨。于是，敌人就把邓文山划为“国事犯”、“政治匪”、“国贼”悬赏缉拿。邓文山部下范作元，在北兴旅馆为动员他人参加抗日而不慎走嘴失密，敌人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后，赶忙调集2万名日伪军，把“平康德”各部包围在北山林中。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敌人投入飞机、大炮，妄图一举歼灭“平康德”部。邓文山指挥部队沉着迎战，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由于敌兵众多，为了保存实力，邓文山只好决定分散突围。

1936年9月末，邓文山率属下100多人突到茂山，但仍未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此时已近严冬，寒风刺骨。邓文山部历经连日恶战，颠沛跋涉，体力消耗极大，如不能迅速突围，就会全军覆没。邓文山再次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他率七小队从山南麓突围，时值清晨，大雾弥漫，战机难得。邓命令将子弹集中到枪法好的弟兄手中，要求弹无虚发，枪不落空。部队沿林深树茂的山谷悄悄行动，见鬼子露头就是一枪，接连打死20多名敌人(其中有3名日本军官)。敌人不敢露面，就用飞机、大炮狂轰乱炸。战斗持续了一天之久，夜幕降临时，邓文山又改路朝东突围，在老百姓的引导下，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弟兄们回到家乡北部山林中潜藏起来。日军找不到邓文山，就拿其父母亲属出气。邓文山的老父亲被敌人捉去，投入大牢，受尽了严刑拷打，邓的外甥张邦子，年仅18岁，就被日寇活埋了。邓母吕氏也身遭毒打，虽幸免屠戮，但终因思夫念子而患病身死。惊悉生母噩耗，邓文山不顾一切跑回家中，为母吊孝。日本特务朱振江(被邓开除的)深知邓的为人，猜测他定会回家为母送葬。于是，朱振江连夜勾结日伪军，把邓家团团围住。邓文山沉着冷静，在院墙四角的炮台上各打几枪，迷惑敌人。然后，趁敌慌乱之机，借夜幕的掩护越墙脱险。几百名敌人竟没抓住邓文山，气得日本指挥官暴跳

如雷，便命令士兵放火烧房。霎时间，邓宅成为一片火海，20多间房子，1000多石粮食，4挂大车，3个作坊均化为灰烬。就连石碾子敌人都不放过，他们用火烧热，又泼凉水，使其爆裂为碎石。

凶狠的敌人未就此罢休，又将邓家亲属的户口注销，赶回原籍。北山周围百里的村子都驻有日伪军，封锁山林，不准百姓出入。扬言如果抓不住邓文山，就把红化棋屯的老百姓斩尽杀绝。

邓文山在战斗中负伤，此时伤口未愈，行动不便，敌人封锁又紧，给养很困难。11月初，邓文山忍痛决定：把枪支弹药埋藏起来，幸存的10名弟兄，分头潜伏，伺机重整旗鼓。"平康德"队伍终因众寡悬殊，暂时解散了。邓文山在黑龙江无地容身，不得已于1936年12月初，同妻子李氏一起，携两支短枪回到故乡——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大北沟村。与此同时，黑龙江敌寇通电建昌伪警务科，要认真追捕"平康德"，并派特务前去追寻。

邓文山回到建昌后，在李景林、安振林等乡亲们掩护下，多次脱险，并通过李景林的引荐与郭文联(报号"仁义军")、陈化洲(民众抗日救国军的首领之一)、刘大瞎障(报号"绿林好")、马五、杨胖子、庄稼人等结识，并和他们联合起来。李景林又支援邓文山3支大枪和一些子弹，并对他说："你的名气大，日本人追着打你，你应该尽快地拉起队伍来。"

邓文山辗转回家乡的途中，在锦西骆驼沟张万城家(邓的姐夫家)，与邓连贵接头时就谈过再组织抗日武装之事。邓连贵、邓连义、邓连波等人都是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副司令邓文风部下的骨干，他们是在郑桂林进关前一次战斗中，失散回家乡的义勇军战士。邓文山一说要再组织起民众抗日救国武装，他们都非常赞同。于是，他们就走乡串户，秘密宣传发动，为"平康德"重新组建抗日武装起了重要作用。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1937年4月初，"平康德"队伍又组建起来。队长邓文山，副队长邓连贵，先锋队邓连义，还有安侠、张玉昆，商玉香、吕国选、柳宪仁、邓连珠等30多

名骨干。这支队伍仍沿用在黑龙江时制定的纪律,军需来源主要是向各大户摊派,对群众秋毫无犯。

1937年冬,从北边来了300多土匪,要给大北沟扫窑(匪语:全抢的意思),并要去抢二道湾子商号。邓文山知道后,不避艰险,立即与其首领"大真字"进行交涉,向他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打鬼子的道理。邓慷慨陈词,使其大开心窍,遂停止抢掠,并与邓交了朋友,使大北沟免遭一场劫难。所以,他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不久,他的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平康德"的反满抗日武装再次崛起,正是日伪统治相对稳定时期,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致使"平康德"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只好在距县较远、交通闭塞的建昌东部山区转战周旋,寻机杀敌。其中几次战斗,使敌伪军胆战心寒:一是三枪退众敌。1937年3月,邓文山为了扩大联合,带几名骨干到朝阳县六家子去找"大明字"(报号)。正在这时,六家子警察署带着自卫团来打"大明字"。邓文山就主动带人打头阵,远的他不打,单打近战。当敌人靠近时,他就喊:"是朋友快离开,不怕死的就上来!"因头次交锋,谁也不知道他的本事,敌人还继续前进。邓又喊:"看你们的旗丢了!"话落弹出,一枪打断了敌方的旗杆。敌又往上冲,邓又说:"看你帽子!"一枪又把前头敌人的帽子打掉了。邓又说:"看你们的脚下!"话停枪响,打得敌人脚下起了烟。只3枪,打得敌人哗然而散。二是两枪获轻机。1937年5月,"平康德"部与追击他的县讨伐大队长霍美廷带的讨伐队遭遇。敌人用轻机枪猛烈地向"平康德"部扫射,打得义军抬不起头来,并有1人牺牲。邓文山怒不可遏,瞄准敌机枪手猛击一枪,打得他脑袋开了花。第2个射手刚爬到机枪后,邓又击一枪,把他脑袋也揭了盖。伪警察们见事不妙,狼狈后撤。这时,邓文山亲自掩护着一个战士,下沟就把机枪夺了过来。三是砸合同洋行。日寇为了毒害中国人民,到处设洋行。药王庙街北有一个合同洋行,就是卖毒品的老窝。邓文山知道后,于1937年夏季的

一天深夜，带10多名战士，跳墙而入，把这个洋行给砸了。四是怒惩杨志凌。药王庙伪警察署长杨志凌，是效忠日寇、残害同胞的铁杆汉奸。1937年秋末的一天，他带一个随从进入大北沟。适值邓文山等人在周文美家开会，有人报告说杨志凌到沟里来了，邓文山决定惩罚杨志凌。杨志凌和随从正在马上东张西望，邓文山一枪就把杨的马打倒，随从惊吓得掉下马来，两个家伙弃马而逃。邓文山抓住他们丢下的马，骑上紧追。当邓跃马赶到跟前时，吓得他们魂不附体，连连叩头求饶。

1937年3月一天午后，"平康德"部在黄丈子小东沟等屯休息，突然被伪热河省第五宪兵团500多人包围得水泄不通，激战半日。群众都以为"平康德"这回可完了。可是，次日拂晓"平康德"的队伍一个人影也没了。日本鬼子军官气得大骂："宪兵团是饭桶！"

1938年5月，日寇调热河省第五军管区伪满洲军与建昌、绥中、兴城、锦西、朝阳等5县讨伐队，集中到建东围剿"平康德"部抗日武装。在5月8日鸡叫时，"平康德"部秘密行至玲珑塔村棒棰山脚下的李半仙沟屯(仅三户人家)后，邓文山首先布置挖战壕、放哨、做饭。凌晨5点钟时，战士们正在用饭，突然响起枪声。邓文山一看，周围山头全被敌人抢占，队伍已陷入重围。为了节省子弹，减少牺牲，便命令邓连贵、邓连义进入掩体监视敌人行动，要弹无虚发；其余战士全部进屋隐蔽。这次战斗，敌人蓄谋已久。各县伪警察队及伪满洲军四十一团，早已在房申沟、杨树沟、高丈子、后营子等地布防，形成了一个弧形包围圈。伪军四十二团、第五宪兵团和日本岗本炮兵连对"平康德"部已尾追多日，使义军已精疲力尽，因而3个在山顶放哨的战士全睡着了。等被声音惊醒时，敌人已摸到面前，来不及报告，只好采取打枪报警。

战斗一开始，敌人就向"平康德"部隐蔽处猛烈炮击，疯狂扫射。狭小的山谷，被打得碎石横飞，浓烟蔽目。5个小时后，敌人开始向山下摸。邓连贵、邓连义急报邓文山，要求大家一齐应战。邓文

山要大家继续隐蔽，自己夺门而出，冒着纷飞的炮火，敏捷地进入掩体，举枪便射，3 枪打倒 2 个敌人。其余之敌，再不敢向山下移动。下午 2 点，邓连义想去接替邓文山，并给他送水。然而，刚爬到战壕边，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邓连义不幸以身殉职。炸飞起来的石头，又碰伤了邓文山的头部。他负伤后，由邓连贵接战。敌人不知道邓文山被炸伤，仍不敢妄动，只有继续打枪打炮。掌灯后，邓文山拄着拐杖率部撤离棒棰山，向东转移。

此次战斗，“平康德”只有 28 人参战，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因此，“平康德”部伤 2 人，阵亡 4 人。而敌伤多人，毙 2 人。

邓文山由于过度疲劳，加之流血过多，从棒棰山走出 7、8 里路就昏倒了。由邓连贵背到大北沟，藏在屯西的长脖子沟二道洼子坝墙下，后转移到小团山下小土沟中，由邓文山父亲和李长春大夫秘密护理。

棒棰山突围后，由于叛徒“双合”告密，敌人几次搜山，继续追捕邓文山，未找到，就严刑拷打当地民众，追问邓的下落。民众谁也不说，日寇给邓连生、邓文清等人灌辣椒水。尤甚者竟把邓连贵的父亲邓文忠、邓连义的弟弟邓四喜和王银匠等人无辜杀害。有一天，日寇把全村人都赶到河套，并命令跪下。鬼子训话说：“如不交出邓文山，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一言不发。邓文山受伤时正是阴雨连绵季节，伤口感染，治疗又不及时，所以伤势越来越重。其父邓存珍，眼看着生命垂危的儿子心酸地问：“贵子(邓文山乳名)，你感觉怎么样?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邓文山让把邓连贵找来。邓连贵赶到叔叔眼前，告诉他要转到外地治疗。邓文山说：“我不行了，别再为我冒险了。我死后咱们的队伍就得你组织了，可别散呐，国仇家恨不能忘啊，要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啊！”说完，把他身上带的枪交给邓连贵，便停止了呼吸。

邓文山虽然牺牲了，但他这种坚决反满抗日、不畏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抗日英雄郭文联及其领导的仁义军

郭文联,原名郭文明,喀左蒙古族自治县草场人,1912年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为人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深得乡邻信赖。

1933年日寇侵略魔爪伸到凌源、建昌、喀左县各地大肆烧杀抢掠,激起了他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烈火,更激发了他抗日救国的热忱。1935年他年方23岁时,就毅然举旗起事,展开了反满抗日活动。

伪甲长王国信忠实为日寇效劳,认贼作父,依仗权势,鱼肉乡民,欺压群众,并以郭文联闯绿林抗日为嫌,调戏侮辱其婶母及其妻子,霸占其土地。郭文联于1936年春,把王国信抓住,拉到十八台梁上处决,除掉了这个汉奸恶霸,为地方除了一害。

1936年春,李天德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连续与日伪军警作战获胜,郭文联便率领弟兄投奔李部。1937年秋,随李部准备进关,被日伪军阻截返回。日伪军2000多人、30多辆汽车跟踪追击,追到建昌二道湾子红石砬和朝阳柏山,连续进行7天7夜的激烈战斗,伤亡惨重。敌军围困重重,李天德看形势危急,大队人马行动不便,就决定分散进行突围。郭文联率部冲出后,便离开了李天德的队伍。

1937年冬,郭文联的队伍由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并正式报号"抗日仁义军"。还提出了"反满抗日,杀富济贫"的口号,并规定了对穷苦百姓不抢不夺,不挑吃喝,不调戏妇女等严明的纪律。他们捐大户搞枪支子弹,完全用于军需。除汉奸,打鬼子,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因此,"仁义军"便在喀左、建昌、建平县等地逐渐声扬起来。郭文联有一套杀敌的过硬本领,他身带2支短枪,双手使

用，弹不虚发，敌人闻风丧胆。这支队伍另一个领导人是河北省马兰峪的张国栋，以前在李天德义勇军中，后到“仁义军”队伍，号为“水湘”。他有胆识，有韬略，说话和气，能讲出反满抗日的道理，懂得打仗的战略战术，与郭文联配合得非常和谐。仁义军的队伍士气旺盛，非常活跃。他们号称自己的队伍是“天下第一军，专打日本人”。他们在将近8年的抗日斗争中，与敌人周旋作战达百次之多，对日伪地方政权给予了很大的打击。他们英勇作战，坚贞不屈的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1938年3月16日，郭文联率领70多人，携带轻机枪1挺，在大城子西南沟与日伪军警讨伐队交战。从16日早晨打到17日，把敌人打得惊恐不安。建昌县伪警务科长向热河省警务厅长报告说：“仁义军越打势力越大，队伍增到80多人……正和满军警察对峙交战。”请求调兵前来围剿。此后，仁义军又在南哨南山、石门沟牛蹄子山、建昌大黑山等地多次与敌人交战，使日寇与伪满军警特务不得安宁。

7月5日，郭文联领导的仁义军，在建昌大黑山与日伪军警作战，相持不下。傍晚，仁义军便向敌人喊话叫号：“把你们的人全调来，3天后牛蹄子山见个高低”。郭文联拉着60多人趁天黑撤出战斗，把队伍带到牛蹄子山下作了战斗部署。7月8日，刚一鸡叫就吃完早饭，登上海拔755米高的牛蹄子山主峰，占据了各个山头的险要处，控制约有5里长的高山脊梁。有的伏在大石砬子后面，有的伏在挖好的战壕掩体内，持枪荷弹，严阵以待，准备打击进攻的敌人。太阳露红前后，日寇从绥中、建昌、药王庙、大城子等地调来的1000多名日伪军警和讨伐队，到了牛蹄子山脚下，从四面把山包围起来。户子沟、下店、心同杖子、马家梁、谷家岭、后司杖子等村庄都布满了日伪军警。日本指挥官金叶，一面亲自上阵督战，一面传令各个据点伪兵向山上进攻。顿时枪声四起，从牛蹄子山东北侧面向上进攻的敌人，很快爬到了圆石砬子，接近东山顶。此时，郭文

联率领战士一跃而起,跑出掩体,开枪猛射,把敌人压下山去。敌人有的负了伤,有的摔坏了腿,吓得敌人爬在山根沟边不敢再轻举妄动。从高山北侧的帽头山坡,在鬼子指挥官的督促下,一群伪军警向山头进攻,接近山顶时刚一露头,又被仁义军打了下去。两路冲锋失败,吓的敌人不敢再轻举妄动,只是不停地向山上打枪。仁义军居高临下,镇定自若,一边回击敌人,有的战士还一边拉着胡琴,打着梆子,唱着二黄,嘲笑敌人。同时,还不停地向敌人喊话,宣传抗日救国,教育伪兵不要当亡国奴,并叫号说:"鬼子走狗们往上攻啊!你们露露头,试试我们的枪法准不准!"结果,上千敌人团团围攻一天,各个山头依然是仁义军的阵地。在天将傍晚时分,日伪军用 10 挺机枪从两面向牛蹄子山的东山峰猛扫,企图强攻上去。战斗是十分激烈的,张国栋越出战壕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了。趁天黑战斗间歇之机,机智勇敢的郭文联,率队从西山梁上悄悄地向下转移,几个围山的伪警察发现有人,忙喊一声"谁?"仁义军一声不答,却把枪朝这几个家伙一对,他们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了。就这样,队伍顺利地过了卡子。守到第二天早晨,日伪军警全面向山上围攻,等打到山顶,连仁义军的影子也没见到,气得鬼子指挥官大骂部下无能,又指责有人通匪,然后无可奈何地撤走了。

日寇小田公平,是建昌县大城子警察署指导官兼特务系主任。他自从 1937 年调到大城子以来,作恶多端,罪行累累。他屠杀中国人民常用的残酷刑法有:灌辣椒水、灌"洋油"、用香烟烧、用烙铁烙、往手指缝里夹子弹、用皮鞭子抽、用带铁钉子的木板打、打得血肉模糊后又洒盐面,还把人装在麻袋里往地上摔,用刀子挖人的肋骨等等。在抓劳工时,小城子一个叫王成的青年不愿意去,被抓住活活打死。有一个叫刘义的人,因说过反满抗日的话,就被他们抓住点了"天灯"。在抓劳工时,遇见一个名叫"刘中国"的人,说他的名字是反满的,也挨了一顿毒打。小田公平带着狼狗,常在大城子街上耀武扬威。有一次,他纵使狼狗把街上行人暴立业咬得鲜血淋

淋，他却哈哈大笑，以此取乐。还有一次夜里，他令马夫王福提出一个“犯人”，用刀启开头颅取出脑子，剖开腰部取出肾脏，拿去当滋补剂吃。他对于抗日义勇军更是恨得要命，只要听到一点信息，就带日伪军警去追捕围剿，并通令所辖各地，那里有“匪”不报，就以通匪论处。

小田公平出生于日本静岗县滨松市。他的上司赞誉他为“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的勇士，实质上他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以宰割中国人民为乐事的杀人魔王。大城子一带蒙汉族人民，对小田公平恨之入骨，无不把他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郭文联领导的仁义军，下定决心把小田公平除掉。在 1939 年 3 月的一天夜里，仁义军 10 余人来到南哨的五道营子住下，吃过早饭后，就让甲长白俊杰去大城子警察署报告。小田公平得知仁义军的消息以后，立即调集日伪军警、特务 100 多人，分两路向五道营子进发。一路越柏沟梁顺画匠沟下去，从南面攻；一路顺南山嘴沿大道插下去，从北部打。

仁义军早已做好了准备。五道营子西南有一大片开阔地，在距村庄 1 里多远的地里，有 30 亩左右坟头密集的坟地，仁义军 10 余人事先都隐蔽在这里了。日伪军警来到以后，在村中搜不到人，据探听知道进了坟地，他们就两边夹击，向坟地进攻。因为仁义军所处的地形十分有利，又有层层的掩体，打了半天多，日伪军空发很多子弹，仁义军只还几枪，一直没有攻进去。小田公平到五道营子村西头老魏家门口，用望远镜向坟地窥视。郭文联的弟兄“爱国”看准了这个目标，一颗仇恨的子弹穿过小田公平的胸膛，时间不大他就断了气。

小田公平被击毙以后，日伪军警被吓得丢魂落魄。仁义军队伍乘敌人一阵慌乱之机，从容地撤出坟地，渡过大凌河，安全地转移到南部山区去了。

仁义军击毙小田公平的喜讯，很快传遍城乡各地，广大人民为之拍手叫好。

小田公平被仁义军击毙之后，伪建昌县警务科又派鬼子日高宗秋到大城子警察署任指导官。这个家伙未上任前就在其主子面前表示：一定要为死去的小田公平报仇。因此，他一到大城子就疯狂的对仁义军进行搜捕和围剿。仁义军中的"爱国"(阎广德)，在击毙小田公平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但他腿部负了伤，正在亲戚家里治疗。日高宗秋派特务探听情报后，就急令几十骑日伪军警跟踪追捕，使阎氏父子 4 人惨遭杀害。日高宗秋还扬言要彻底消灭仁义军，要扑灭大城子一带的抗日烈火。郭文联对日高宗秋的行径了如指掌，所以也下决心一定要及早除掉这罪恶滔天的仇敌。

1940 年 5 月 13 日晚，仁义军 13 人到距大城子 12 里远的南沟门村住下。第二天清早，让伪甲长张振去大城子伪警察署报告，以便把"恶狼"引出洞来消灭。日高宗秋闻讯，立即调集日伪军警 70 多人，带轻、重机枪向南沟门村扑来。他兵分三路：一路爬上东山，企图从村后边冲下来；一路越西山梁，想从村西南面堵截；日高宗秋亲自带领一路，从北边顺沟直插入村里，妄想一举把仁义军置于死地。这时，仁义军早已严阵以待。上午 10 点以后开始接火，仁义军借有利的地形，打退了东西两路敌人的进攻。这时，北面由日高宗秋亲自率领的 30 多名日伪军警，已攻上半山腰，郭文联率领部下 7 人，居高临下，用火力把敌人压在坝堰底下，抬不起头来。日高宗秋嚎叫着，让伪军往上冲。仁义军也高喊："有种的鬼子汉奸们往上来呀！"日寇的忠实走狗大城子伪警察署警尉补袁风翔，用机枪发疯一般地向山上猛扫。仁义军一名战士瞄准袁连打数枪，将其击毙，吓得伪军战战兢兢，不敢上前。日高宗秋见势不利，急得暴跳如雷，一边叫骂，一边亲自往上冲，并端起机枪扫射。因为这个家伙头戴钢盔，目标明显，郭文联认定是日高宗秋，趁其扬脸向上看时，一枪击中头部，他立即向下滚去。日高宗秋被打死以后，日伪军警连滚带爬向山下溃退。此时，郭文联也带领队伍顺大虎洞沟越梁向安得营子方向转移了。

郭文联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有时出没在喀左、建昌、凌源地区进行游击抗日，有时往返于天津、承德、昌黎、赤峰等地进行秘密联络。通过联络情报得知，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在长城内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郭文联认为满洲国已走向必然灭亡的道路。因此，便准备扩大势力，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郭文联与几股抗日武装的领导人明梅亭、王春荣、张义、张永亮等多次磋商后，于1941年8月28日，在铁沟黄某家里召开了13人的秘密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时局，统一了认识，并共同议定：1、要破坏日伪要劳工和募粮的计划，扰乱敌人；2、要迅速组织广大民众，把三十家子、山嘴子、大城子等地的红枪会联合起来，把李凤春领导的抗日救国军、郭文联领导的仁义军都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杀富济贫自卫军"，等待时机，实行武装起义；3、由张永亮(他曾与关内八路军有过联系)负责与共产党、八路军(李团长)联系报告情况，"请求指令，谋议一决"；4、拟定了自卫军的编制、旗帜样式和袖标；5、行动计划是：首先袭击敌人经济重要据点大城子，获得资金、物品，救济贫民，充实军备；接着进攻叶柏寿、三十家子等地，收复失地，掌握主要村子，实行独立，建立自治政府，设置自治机构；以武力为基础，没收土地，谋求税收，努力恢复衰弱状况，逐步扩大根据地；同共产党、八路军一起驱逐日寇。同时又竖起"杀富济贫自卫军"的大旗。自卫军战士的袖标上的字是："共产军一日成功"。会后，8月29日在吉利缶营子开始行动。当时队伍有仁义军42名，红枪会员50名，其他各部100多人，总计200多人。还没有集中起来向敌人进攻，就被日伪警特发觉，便开始战斗。由于敌人不断跟踪追击，连续数月，每月都要作战，中队长王春荣、张义都在战斗中牺牲，队伍损伤严重，其更大的壮举未能实现。

郭文联领导的仁义军，经过数年与日伪军警的战斗，声威大振。不少警察分驻所和地方的伪甲长，对他们十分惧怕，只好明为日寇效劳，暗为仁义军送子弹，送情报，为其活动提供方便。对此，

日伪当局极为恼火。日寇在继续加强武力围剿的同时，又发出用万元悬赏捉拿郭文联的通缉令，到处张贴。同时，又派死心塌地效忠日寇的伪喀左旗警务科特务警尉王子敬，出任仁义军的抗日根据地车杖子警察分驻所所长。

王子敬到车杖子以后，就用重金收买了甲长苏昌。因苏原与郭文联关系密切，所以王、苏合谋设一个美人计：将苏的叔伯侄女苏桂馥，送给郭文联作妾。1942年1月15日，苏昌亲自在家设宴，并请郭文联作客。他们事先作了预谋，安排了警察，封锁了交通，并商定待酒后郭文联持手电筒从屋里出来就开枪打死他(因当时只郭文联有手电筒)。没想到，酒后苏昌的长子苏天一(青年学生)拿郭的手电筒出屋了，刚走到门口被开枪打死，这下子露了马脚，郭文联"当"的一枪把苏昌打倒，转身飞步到门口，又一枪打死警察陈相，接着越墙而过，边打边走，冲出了敌围。

王子敬一伙日伪警察特务分子，对郭文联施美人计诱捕未遂，又想出了新的诡计：对郭文联的家族、亲戚、朋友进行抄、抓、杀，让仁义军无站脚之地。1942年以来，日伪军警抄了郭文联的家，烧了他的房子，扒了他家的祖坟，把他的岳父也抓去进行严刑拷打致死，把他的弟弟小恩也抓去砍了头，把他的朋友石俊峰、任本新等人也抓捕入狱，并扬言："哪里让仁义军落脚，就把哪里杀光、烧光、抢光。"同时，调集大批日伪军警，在仁义军经常活动的区域内加紧围剿，这给仁义军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仁义军的队伍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等待时机再集中起来打击日寇。

伪喀左旗警务科特搜班，进一步加强了对仁义军的侦察网。同时，又极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收买叛徒。凌杖子有个凌如喜，以前曾在仁义军的队伍中，是郭文联的表兄，他与郭关系甚密，郭对他很信任。王子敬就在这个人身上打了主意，暗中把凌找去，一面威胁，一面利诱，指令凌如喜必须把郭文联抓住。说："你要抓住郭文联给重赏万元，抓不住就要你脑袋。"从此凌如喜屈膝投降，成了

可耻的叛徒。

这时,郭文联在当地活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便去翁牛特旗、赤峰等地进行联络。叛徒凌如喜得知后,即向王子敬告密,王又责令凌去跟踪,并派特务搜寻。1942 年 3 月 5 日,郭文联从翁牛特旗太平村孟家店向林东方向转移,他用牛车拉着家眷、物资,走到赤峰东门外车坏了。趁郭正修车毫无防备时,突然被事前暗中监视的特务和山田警部抓住,投到伪喀左旗公署(建昌)伪警察署狱中。

郭文联被囚禁在监狱中,为表坚决抗日之决心,显示中国人民的骨气,坚决不吃日伪监狱做的饭,日伪警察不得不去建昌街上给他买饭吃。日本鬼子想用软化手段收买、劝降,遭到郭文联的严词痛斥。以后又用残酷手段,严刑拷打,逼他认罪,郭文联坚贞不屈,破口大骂,骂凌如喜是“民族败类”,骂警察特务是“亡国奴”、“走狗”。义正词严地对日本法官威胁利诱予以驳斥,他说:“老子是中国人,我宁死也不能当亡国奴!”日寇软硬兼施的种种诡计都宣告失败以后,于 1942 年 5 月 17 日,特别治安厅作出杀害郭文联的决定,5 月 18 日于建昌街北门外将郭文联砍头示众。

那一天是建昌集日,日伪警察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在山头和路口都架着机枪,放有重兵把守。把伪旗公署各机关的职员都集合到场,根据伪满高等法院指令:由锦州地方法院审判官、承德地方法院审判官、承德地区警察厅检查官和喀喇沁左旗建昌地区法院审判官共同“审判”。郭文联昂首挺胸走到堂前,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坐在堂下一条板凳上,对于敌人的无理审问,他闭口不答,予以蔑视。当法官宣布对他无理判罪时,郭文联立即站起来骂道:“你们侵占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民,罪恶滔天,我打死你们日本鬼子,是为中国人报仇……”骂得敌人狼狈不堪,只好拿毛巾把郭文联嘴堵住,用汽车拉到刑场。郭文联到刑场上,更是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敌人把毛巾拿掉后,他仍然骂不绝声。这时,日本刽子手石琢(外号大胡子)拿着战刀,先用战刀在郭文联脖颈上一试,

郭文联回头一口,把石琢手腕咬下一块肉来。石琢又一刀把郭文联的头砍下,血注直喷起五六尺高。这种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精神,在场的凡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为之悲痛和感动。和郭文联同时被日寇杀害的还有石俊峰。

郭文联牺牲以后,他领导的仁义军队伍虽然不存在了,但他的部下、他的亲人以他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他的爱人高文静和他部下刘荣等,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

叛徒凌如喜因为出卖了抗日英雄郭文联,成了日寇的走狗,请了功,受了赏,得了富贵荣华。可是,好景不长,仅过三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伪满傀儡政府垮台,祖国光复,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了。1945 年 9 月的一天,由郭文联的部下张秉谦率领原来仁义军的 6 名弟兄,到凌杖子把凌如喜抓住,绑在树上,一边打,一边问,审训他叛卖郭文联的罪行。打到半死,拉到河套,将他的头枕在石板上,然后搬起一块盆口大的石头砸去,砸的脑浆崩裂,嘴脸皆无。这个出卖抗日英雄郭文联的可耻版徒,受到了应得的严惩。

郭文联及其领导的仁义军,为民除害,为国捐躯,与日寇浴血奋战将近 8 年,经历大小战斗达 100 次之多,打死日本鬼子和伪特、军、警 100 多人,并震撼了建昌、喀左、凌源的日伪政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英雄气概。至今,仁义军的许多传奇性故事和动人的事迹,还在广大群众中流传。

袁振民抗日救国志不移

袁振民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抗日义勇军著名的领导人之一。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的白山黑水，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全境，又向热河进犯。就在这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紧迫形势下，正在喀左县东哨乡大马架子村任私熟教员的袁振民，毅然投笔从戎，于 1931 年末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1931 年 10 月，袁振民在故友许水亭的推荐下，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他为抗日义勇军团长。袁振民出于爱国思想、民族义愤，欣然从命，于 11 月开始，组建抗日义勇军。袁振民首先串联家族兄弟、亲友、同学，相继联合各个联庄会，把这些民众武装力量统一于抗日旗帜之下。经袁振民积极努力，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组织起抗日武装队伍达 1300 余人，并在东哨乡大马架子村树起“抗日义勇军”大旗。

袁振民抗日义勇军团部，下设 4 个处(政务处、军法处、供给处、电讯处)，辖 3 个营和 1 个卫兵连。

第一营：营长傅子香，营部设在兴隆庄；第二营：营长姜桂武，营部设在杨树底下；第三营：营长袁振恕，营部设在大马架子；卫兵连：连长万兆生，连部驻团部所在地。

袁振民在积极组织抗日队伍的同时，还认真抓了军事训练和不断改善部队的装备、提高军事素质的工作，随时准备同日军作战。

1932 年 5 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李向元、宋庆博等人来袁部校阅。袁振民率卫兵连、第三营全体战士共 300 余人，持长短

枪200多支,战马100余匹,列队受检。军容雄壮,斗志很高。检阅者当即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抗日义勇军的性质、任务、军纪、军风等等。

1932年7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部长彭振国,率领3个团(程韶华炮兵团、辛桂林步兵团、方子舟补充兵团)从关内北上辽西,阻击日军西进,到大马架子与袁振民团会师。同年8月初,彭振国率4个团的兵力,挺进锦西、兴城、绥中一线,阻击日军西进。军部驻小药王庙,指挥各团对日军作战。彭部长命令袁振民团攻打屯。袁团在程韶华炮兵团的掩护下,乘夜幕降临时向江屯守敌发起了进攻。袁振民令傅子香营、姜桂武营迂回到左右两翼夹击,他亲率大刀连、骑兵连从正面出击。经3个多小时的攻坚战,终于攻进江屯,把日伪军压缩在两个大院里。密集的炮火,打的敌人晕头转向,敌人凭借高墙壁垒,负隅顽抗。拂晓前,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可是袁团早已撤出阵地,回驻地设防了。

相距抗日义勇军驻地约15华里的新立屯,设有日军军需供应站。为消灭敌人、武装自己,彭部长又命令袁振民团奇袭新立屯。袁振民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率骑兵200余人,奇袭日军军需供应站。经几小时的巷战,杀伤日军数十人,其余日军仓惶逃跑。袁团烧毁了供应站的房屋、仓库,拆除了防御设施,缴获了一批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还将缴获的大米、白面就地分给群众。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2年8月下旬,日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便从锦州调来精锐部队围剿抗日义勇军驻地盘子山。敌人妄图把驻盘子山的抗日义勇军一举全歼。而彭振国部长得到侦察情报后,立即作了周密的战斗布署:兵分三路,分进合围,伏击偷袭之敌。彭部长亲自率领200多名战士,埋伏在盘子山以北,切断敌人退路;又令程韶华炮兵团埋伏在盘子山西侧,瞄准敌人运动集中的目标,准备打个中心

开花;令袁振民率大刀连、骑兵连从南面出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当偷袭的日军摸进盘子山,刚钻进义勇军伏击圈内,义勇军指挥员一声号令,伏兵四起,喊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袁团直冲上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扔下50多具尸体、4挺机枪、60多只长短枪,向东遁去。由于盘子山大捷,袁振民被提升为旅长,各营营长提为团长,并拨发给军服3000套。

1932年11月下旬,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在郑桂林司令指挥下,分兵三路,同时攻打绥中、东辛庄火车站和华营守敌。第十九旅旅长袁振民,奉命主攻华营之敌。在未发起总攻之前,袁振民带领一个小分队去华营侦察敌情。袁对敌人的火力、布防情况尚未摸清,就遭到敌人的伏击。这时,预定总攻时间已到,袁振民也只好下令向华营进攻。因此,不仅未能攻克华营,反而被敌人包围。袁部大刀连连长陈冠斗壮烈牺牲后,袁振民下令向卫屏山方向突围。当冲出重围、撤到卫屏山时,队伍已损失很大。袁振民认为:敌强我弱,又与彭振国失掉联系,只好带领余部撤回东哨,待机再起。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以后,又纠集重兵向热河大举进犯。这时袁旅大大减员,无力与日军作战。到6初,袁振民解散了队伍,他便退隐于秦皇岛。1934年4月6日,袁振民被凌源伪警察署以"反满抗日"罪逮捕,经大城子农商各界联名出保,2月后被释放。

1935年2月13日,大城子警察署长张明阁邀请袁振民出任大城子商团团长兼保董,并再三催促"临期早至不误",但袁拒不就职。日伪当局恼羞成怒,于7月6日又将袁振民逮捕,转押于锦州监狱,直到1939年经多方营救出保才获释。祖国光复后,他又为我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9年他曾被选为喀左县政协委员,于1968年冬病逝。

打倒日本子　杀尽“黄皮子”

喀左蒙古族自治县白塔子乡二道营子村，在伪满洲国时期是喀喇沁左旗公署管辖的头道营子村。此处设有村公所、日满协和分会和警察分驻所3个统治机构，对人民的奴役和统治长达12年之久，在这里曾发生一起以李印凌为首的白莲教徒反满抗日的壮举。

1942年冬季，经白莲教的一位师傅张振东介绍，在二道营子以李印凌为师傅立坛，开展白莲教活动。李印凌首先在家族、亲友中秘密宣传“日伪统治以来，天地皆暗，日月无光，即将出现七七四十九天不见太阳，世界必一大变。入白莲教者以‘南无天缘太保阿弥陀佛’为十字真言。有弥勒佛护身，方可免此劫难。”宣讲教内无尊卑贵贱之分，教徒皆平等。在群众中以除邪、捉妖、治病为由，秘密串连，立坛发展教徒。2年多的时间，在二道营子的李家、徐家、刘家和此三姓的至亲好友中，发展白莲教徒50余人。每年秋后，李印凌把自己的一部分粮食分给贫困的教徒，要大家有饭同吃，患难与共。

1944年，日伪当局为其战争的需要，进一步加深了对广大人民的奴役，加重捐税，多要劳工。这年秋季，头道营子伪村公所，强征100多名青年去黑龙江黑河当劳工，其中有一些是白莲教徒，李印凌发动教徒以“打倒日本子，杀尽黄皮子(他们称穿黄色协和服的伪满军政官吏为“黄皮子”)，不做亡国奴，不去当劳工”为口号，开展了一场反满抗日的抗暴斗争。

10月30日上午，头道营子伪村公所，强逼110多名青年集结起来，由周振仁带领去当劳工。白莲教首李印凌认为天时已到，不可坐失良机。于11时许，正当劳工队伍从村公所院里走出时，白莲

教徒30余人，全部头罩白布巾，身穿白上衣，佩带白莲花，怀揣弥勒佛，手持红缨枪、菜刀、镰刀和透甲锥等武器，呐喊着“杀！杀！杀！”“打倒日本鬼子，杀尽黄皮子！”“有仇报仇！有冤伸冤”的口号，从街头巷尾一齐冲向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砸毁了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的电话机、门窗玻璃，推翻了办公桌椅，打开枪库，搜出9支步枪也摔碎了。伪村长吕振生吓得心惊胆战，一气跑5里多路到白沟躲了起来。伪官吏和警察们被这突然袭击，弄得昏头转向，不知所措。有的跑到八家子警察分驻所，给旗公署警务科打电话，说来了八路军，有的脱下“黄皮”逃命去了。

伪喀左旗公署警务科科长贵岛显二，接到头道营子警察分驻所被袭击的电话，立即向旗公署参事官富永义雄作了报告。富永义雄一听八路军压境，慌恐不安，急令督查处处长柳树声，带警察队20余人为先头部队，乘汽车马上出发。令警察讨伐队队长马振远，率120人为主力，火速前往。又令宪兵队杨队长带宪兵八名，前去督阵。富永义雄与贵岛显二亲统各部进行战地指挥。同时，富永义雄又向锦州、绥中发电，请求派军队速来增援。

李印凌率领白莲教徒捣毁伪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之后，即向建昌进发。出发前，30多名白莲教徒集中在关帝庙里，明烛、烧香，个个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进行“上法”，祈望“能刀枪不入，登山过河如走平地。”然后立即向建昌伪旗公署进发。当走到大三家东山时，与一汽车全副武装的伪警察遭遇。车上架着机关枪猛扫，教徒们蜂拥而上，奋不顾身，一往直前，转瞬间冲到汽车附近，伪警察吓得慌慌张张，柳树声忙下令撤退，汽车一挑头栽进路旁沟里。警察们在慌恐忙乱中跳下车，有的被磕得头破血流，嚎叫着四处逃窜。白莲教徒未追击这些逃窜的伪警察，将汽车上的玻璃打碎后，继续向建昌挺进。过荆条沟经立龙山下，当行至扎兰营子时，又与警察讨伐队和伪宪兵队相遇。这伙日伪军在富永义雄指挥下，向白莲教徒迎面扑来。此时，柳树声带的警察也纠集起来，占据了立龙山高

地，从背后向白莲教徒们射击。李印凌等教徒们处于腹背受敌，但毫不畏惧，在方圆不过百米的田野挥戈冲杀，迂回前进。他们时左时右，时起时伏，几次冲杀都被警察讨伐队密集的枪弹打回。日伪军警以机枪、步枪面对手持长矛、菜刀等武器的白莲教徒展开了疯狂射击。经过近 3 个小时的激战，白莲教的勇士们虽然奋勇冲杀，前仆后继，但是终因寡不敌众，武器不济，李印凌等 18 名教徒，先后被击中。勇士们的鲜血溅在大地上，溅在白衣上，溅在头巾上，也溅在洁白的莲花上，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了。

10 月 31 日上午，日伪当局让村民在扎兰营子姑子庵后十丈远处挖一大坑，将死者不分男女一起埋入坑中。而村民面对这一惨景，深念民族风俗，挖墓坑时在当中给留下一个小隔墙，将 5 男 13 女分放两边，埋起一个巨大的肉丘坟。

事后，日伪军警察又在建昌、二道营子等地到处抓人。仅 10 月 31 日一天，就将死者家属和可疑的人捕去近百人，关进监狱。11 月 9 日，经严刑审讯后，认定白莲教搞的是“封建迷信”活动，蛊惑民众所致，释放了一般教徒和群众，妄图平息民愤。又通令死者家属，可扒开肉丘坟认领尸体。李印凌一家战死 3 口。刘富一家也领回 3 具尸首。

被捕去的王长顺、王金才、李谷氏、徐香莲，则以“国事犯”论处，由建昌转押于承德监狱。王金才死于狱中，王长顺等直至“八一五”祖国光复以后才获释放。这次远近闻名的白莲教徒举事，虽有一些迷信形式，但对日伪军警进行了英勇作战，战死者 19 人，坐牢者 4 人，失踪者 1 人，斗争虽失败了，但对日伪统治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敌后抗战篇

朝阳地区敌后抗日斗争综述

一、"七·七"事变前后的热河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速战速决",吞并全中国的战略野心,于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新战争。爱国的国民党军官兵在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从此爆发了全国抗战。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历史发生根本转折的大事件。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由发动局部战争转变为发动全面战争,走上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罪恶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也由自发地局部抗战发展为全国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全面抗战。

在"七·七"事变前后,热河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33 年 2 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热战争至 1935 年 6 月《秦土协定》签订,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的殖民统治秩序确立时期。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占领热河,镇压热河人民的反抗斗争,建立起一整套殖民统治秩序,把热河完全纳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

第二阶段,从 1935 年 6 月至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热河的殖民统治秩序加强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使热河变成它永久的、巩固的殖民地和继续侵略扩张的基地,对热河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使热河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第三阶段,在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

步强化对热河的殖民统治秩序时期。日本侵略者把热河变成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前沿基地，疯狂地推行法西斯统治和战时经济体制，进行穷凶极恶地搜刮和横暴的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后，更加积极地推行野蛮的军事镇压和血腥的屠杀政策，把热河沿长城一线划为“西南国境”，派重兵驻守。在承德设立伪第五军管区，辖4个步兵旅、1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队。在所有驻宪兵队的地方，机关、企业和学校都组织了秘密情报网，搜集各方面的情报，监视各阶层的动态。并强化警察机构，在全省建立警察署70处，每个警察署都设有几处警察分驻所。日伪军、警、宪、特互相配合，对热河人民实行灭绝人性的屠杀。

同时，对热河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早在热河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最大垄断资本“满铁”，就窃取了阜新新邱煤矿的矿权和赤峰的电力工业开发权；热河事变后，日本的垄断资本攫取了热河的铁路建筑权、矿产开采权、土地使用权等几乎全部经济权利，修筑了锦承铁路和锦朝铁路北票至朝阳段；北票、赤峰的大型煤矿全为日本所有；电力、交通等部门多为日本资本所占据。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热河民族工商业，经日本垄断资本的排挤，多数倒闭，少数勉强维持的企业也处在萧条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对热河经济摧残、掠夺最大量、最毒辣的莫过于推行鸦片政策。他们制订了《满洲国鸦片法》，指定热河全省为种植鸦片重点区，将鸦片的种、制、运、卖、吸等完全合法化、专卖化。

日本侵略者还以摧残中国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为手段，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日伪当局强令热河人民不得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对带有中国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从省到各县、旗、村普遍设立了协和会和协和分会，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机关，鼓吹“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等胡言乱语。在学校由日本军国主义爪牙和汉奸文人总揽教育大权，他们一方面迫害有爱国思想的师生，另一方面推行所谓日语化、共荣化和职业化的殖民地

愚民教育，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中小学生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必须举行"朝会"，分别向东京和新京"遥拜"。每月还要举行一次"诏书奉戴日"，向师生宣读伪满皇帝国本奠定诏书，这些都使本来就比较落后的热河教育事业，又一次蒙受了严重摧残。

日伪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化统治，象套住热河人民身上的枷锁，使穷困的热河人民生活愈加穷困，也更激起热河人民对日伪统治的切齿痛恨和对独立自由生活的渴望。热河人民的抗日烈火，只要遇到火种，就会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

二、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决策的提出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12月底，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正面战场上，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单纯的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加上政治制度和军队制度的腐败，所以在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军队的进攻面前，一溃千里，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等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这样，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既已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就进入了主要地位。

在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为进一步具体地确定全面抗战纲领和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规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确定党在这一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早在会议前的8月初，毛泽东、洛浦和周恩来、朱德之间往返的3封电报中，就提出了派一部分军队远出热河，发动冀热察的游击战争，胁敌后方的意见。会议中又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

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确定发动冀热边地区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又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整个华北工作，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同月，刘少奇指示中共河北省委：八路军已渡过黄河，正向太行山及北岳地区进发，河北省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党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要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三、热辽敌后抗日游击区的开辟和建立

1940年至1945年，冀东区党分委和军分区组织八路军的骨干人员跨越长城，深入热辽部分地区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抗击日寇的侵略，牵制了大量日伪军的有生力量。在冀东区党分委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我军政人员以青龙、平泉、承德、宁城、建平县为中心，在东至朝阳县，西至围场、隆化县，南至长城，北至喀喇沁旗等10个县内开辟了一片抗日游击区，并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先后曾组建过12个区政府。

（一）开辟了伪满敌占区抗日根据地，组建周治国游击队。1940年春季日伪军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地大扫荡。时任冀东军分区三总队特务队指导员的周治国，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和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便把部队化整为零，在长河川潜伏起来，积极发动群众反扫荡，开展对敌隐蔽的斗争。不巧，这时周治国染了

重病，地下党组织通过韩平把周治国送到长城外青龙县的楼台子李翠家中养病。病有好转时，周治国就一面锻炼身体，一面查看楼台子的周围地形。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群峰重叠的地方，往东30多里就是有名的都山，很适合八路军领导群众打游击。在这里周治国调查了民情，了解到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当地群众生活非常困苦，他们痛恨日本侵略者，不愿当亡国奴，在冀东抗日热潮的影响下，他们也迫切要求抗日救国，只是缺少领导人。此外，周治国还了解到当地在旧中国成立保乡团时的枪支，虽被伪满洲国收缴去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武器仍保存在群众手中。这对发展抗日武装是很有利的。旧中国时的保乡团头头孙景华、刘丰年、韩凤武还都在，而且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如果能把这3个人争取过来，对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是有利的。为此周治国不等病全好，就返回关内，在迁西县东荒峪找到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向他汇报了在关外养病期间所做的调查。李运昌在听取周治国的汇报后，决定派周治国到关外开展敌后抗战的组织领导工作。

周治国辞别李司令员，按照依靠群众的教导，首先从新集动员出贫农李怀义，串联了远房亲属周万余，然后又通过周治国表哥刘明做通了有爱国思想的上层知识分子刘墨卿的工作。刘墨卿老婆的娘家在都山西南的松树沟住，她娘家有4个弟弟，二弟名叫张祥林，是孙景华、刘丰年、韩凤武当保乡团头子时的部下，为人耿直、忠厚、交际宽，很有威望，并且有反满抗日要求。于是经刘墨卿引路，周治国等离开了冀东，穿越长城，又来到张祥林家。经过周治国反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交谈了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日寇、收复山河的一些想法。张家四兄弟不仅积极拥护，而且还串联了他们的亲朋好友，通过以亲串亲，以友访友的办法，发动群众，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很快深入人心，要求参加抗日部队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周治国就发展了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抗日小游击队。11月，游击队已发展到50多人。

队伍发展起来了,但枪支奇缺。为了武装自己,11 月下旬,根据侦察员了解的情况,游击队打下了日本人在峪耳崖沙金台开的金矿,21 名日本鬼子,除 1 人逃跑外,全部被击毙,生俘 30 多个伪矿警,缴获三八大盖枪 37 支,盒子枪 7 支,子弹 5000 多发,还有伪币 3000 多元。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周治国带领游击队,又打了几个小仗,也都获胜。春节夜晚,周治国等人又打下了喜峰口的三道关海关税局,得 20 多支大枪,1 挺机关枪,打死 3 个鬼子,生俘伪军 30 多人,赵振香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这几仗打完后,士气很高,周治国的部队发展到 100 多人,当时在这一地区可称是一支人员精干、武器良好的游击队了。这个游击队当时没有命名,因周治国是指导员兼队长,所以群众都叫周治国游击队。这支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是:东起青龙县的西南、西北;西到承德县的东南部;南从长城以北;北至平泉县一带。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影响,周治国派李青山、李学会等 40 人到锦承铁路以北光头山一带开辟敌占区。由于这是一支刚组建起来的游击队,缺乏建党、建政的干部,所以周治国在战斗的空隙把开辟热南敌占区的工作情况向冀东区党分委和李运昌司令员作了书面汇报,并再次请求增派干部。

(二) 成立青平工作团、组建 4 个抗日区政权。1941 年 4 月根据冀东区党分委指示,在热南成立青(青龙县)平(平泉县)工作团(县的建制),周治国带的游击队被命名为青平游击队,并且上级又派来葛春生、刘汉臣同志。周治国任工作团主任兼游击队指导员和队长,以军事为主,抓全面工作;葛春生同志任工作团副主任,负责建党、建政工作。

当时建政的重点是平泉县以南和青龙县的都山西南、西北地区。因为在成立青平工作团之前,这片游击区已有了组建区政权的基础,所以到 1941 年秋冬之际,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组建了 4 个区,甚至有些村子还建立了村政权,村设办事员、武装委员、农会主

任、妇救会主任及交通员等。对伪甲长基本没动，而是经过做工作把他们变成“两面工作人员”，能够真心向我们，假意向敌人，应付日伪。

1941年冬，冀东区党分委决定将青平工作团改为青平办事处。主任是新派来的张真理，副主任仍是葛春生。此时已将周治国同志调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十二团一营副营长。并从青平游击队选调100多名精干的指战员和好的武器改编到十二团一营三连。剩余的100多人，充实到青平办事处领导下的4个区。

（三）成立冀东军分区第一远征工作队及组建4个抗日区政权。1942年4月初，周治国接到军分区调令，组建挺进敌后的远征工作队，周治国任冀东军分区第一远征工作队队长，李宝华任副队长，另有区干部崔建舟，此外挑选了张野溪等15名战士，组建了第一远征工作队，并于1942年5月挺进到平泉西北部光头山南面圣祖庙大营子，与1940年派往光头山一带开辟敌占区的李青山等五六十人会合。

1942年7月初，第一远征工作队打下围场县东南的毛大坝警察所，缴获20多支大枪和一些其他战利品，初战告捷，鼓舞了士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和保证对部队的供应，在6月份首先以三沟、六沟为中心组建第一区。区长是崔建舟，助理员是张旭。第一区活动范围大体如下：东部，北起光头山——圣祖庙——五道河——南到六沟；西部，北起三家——前庙——头沟——肖杖子——三沟——南到六沟；南部，六沟以北；北部，西起三家，东到光头山。因当时第一远征工作队开辟的区域较大，而适合做建政工作的干部又太少，因此派副队长李宝华回冀东汇报工作，并要求增派干部。冀东区党分委7月份派来了贺文涛、高捐雨等。于是又组建了第二区，贺文涛为区主任（书记），高捐雨为区长，赵洪山为助理员。第二区活动范围如下：东部，北起蒙和乌苏——黄土梁

子——南到平泉；西部，北起光头山——圣祖庙——五道河——南到六沟；南部，西起六沟——七沟——东到平泉；北部，西起光头山——杨树梁——东到蒙和乌苏。8月份组建第三区，李惠友任主任兼区长，纪福东任助理员。第三区活动范围如下：东部，北起旺业店——四道沟——打鹿沟——西洼——南到蒙和乌苏；西部，北起荒地——岗子——南到头沟；南部，西起头沟——前庙——三家——东到光头山；北部，西起荒地——大庙——东到旺业店。
10月初，冀东区党分委从训练班结业学员中分配来13名干部，因此除组建了第四区以外、还充实了一、二、三区和游击大队。当时第四区区长是苏振东，组织委员是甄斌，农会主任是张健光，副主任是王文焕。第四区活动范围如下：东部，北起平泉，南到大吉口；西部，北起六沟——武场——南到八家；南部，与原青平工作团的四区相交，即西起八家——满杖子——东到大吉口；北部，西起六沟——七沟——东到平泉。

以上4个区，每个区都在百里以上。远征工作队在这些地区秘密地发展了一些党员，他们在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等方面起了骨干作用。各区基础较好的村子还建立了村政权和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在一区还搞过征收粮款工作。对敌人实行了分化瓦解，在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的同时，对伪牌、甲长，村公所伪警察，警察署的伪官吏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国，不残害百姓，八路军是不伤害他们的，而且还保护他们的家属和财产。在八路军的教育下，许多接受了教育的伪官吏，便向鬼子汇报假情报，而把敌人的真情报设法转告我们，成了八路军的耳目。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使开辟敌占区的工作得到顺利发展。

1942年秋后，冀东日伪军进行了第五次“强化治安”。八路军主力约有2000人左右转移到外线，到第一远征工作队组建的一、

二、三、四区休整两个月左右，没有因暴露而被迫打仗。到年底主力部队往关内返回时，为了把“围剿”冀东的日伪军引到长城以北，以便迅速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冀东抗日根据地，于是在几天之内连续打下了平泉北部、西部的黄土梁子、八里罕、三沟、六沟、七沟、毛沟、五家等警察署和所属的四五十个警察所和村公所。当时打敌据点的行动，不仅在承平宁地区，而且在青龙、兴隆等地区也是同时进行的。

主力部队帮助第一远征工作队打开了局而，把大片隐蔽的游击区变成了公开的抗日根据地。群众和我军政人员欢天喜地庆祝解放，并准备在春节开个庆祝大会，同时总结部署下一步工作。敌据点被打后，伪热河省惊慌失措，急忙向伪满洲国新京告急。新京为了确保西南国境线，便抽调 9 个满洲旅、1 个装甲旅、2 个骑兵旅、27 个讨伐大队直扑而来，加上热河原有的兵力计有 10 万日伪军。

1943 年春节，大批的敌人对长城以北的热河地区进行了疯狂“围剿”，并在青龙、平泉、承德、宁城、兴隆等县驻有重兵，在抗日游击区先反复“围剿”，而后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第一远征工作队的游击队和地方干部 200 多人，以及高桥带的冀东三区队 100 多人(一部分)被包围在光头山。当时正赶上下大雪，平地都有二尺深，敌人用机枪疯狂地扫射。经过 3 天 3 夜的激战，远征工作队从光头山北部冲出来，到围场县边境时，剩下 60 多人的高桥领导的三区队转回冀东。由于敌人不断地扫荡，第一、二、三、四区的区政权均被敌人摧垮。为了坚决执行开辟敌占区的指示，周治国带领突围出来的同志，转移到敌人重兵包围的外线。1943 年的 3、4 月间，又在平泉的东北部和平泉到凌源铁路以北及省城西南部又秘密地开辟出一片游击区。

(四) 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的成立及第五、六、七、八抗日区政权的组建。冀东地委(原冀东区党分委)为了坚持和加快发展热辽

地区，给未来收复东北四省失地打下基础，1943年5月决定成立承(承德)平(平泉)宁(宁城)联合县办事处，并派来杨雨民、陈革、张立文、宋兴邦等同志及高桥同志带领的冀东地方主力部队三区队，于5月底(或6月初)在光头山东南部的齐家岱川沟脑(无人区)找到了坚持在“无人区”斗争的同志，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办事处会议。会上杨雨民同志传达了冀东地委的任命：杨雨民为县工委书记兼三区队政委，周治国为办事处主任(即县长)，高桥仍为三区队队长，陈革任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宋兴邦任秘书科长，张立文任民政科长。领导核心及分工是：杨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周负责建政，高负责军事。经冀东军分区决定三区队为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的主力部队。会后，周治国带领同志们立即行动，打下了光头山西面的日伪开办的烟筒山银矿据点，缴步枪20多支和一大批物资。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反复摧毁“人圈”许多处。敌人气急败坏，在这个地区又进行大扫荡。由于敌强我弱相差千百倍，使拥护抗日不进“人圈”的群众，特别是村干部、积极分子被敌人抓去很多。仅在光头山附进的村庄就抓捕400多人。凡被抓去的均被杀害，没被抓走的山区群众又都被赶到“人圈”里去了。因为没有食、住之处，党政军及地方同志无法存身，不得不转移到日伪军重兵包围的外线。杨雨民和高桥带领金荣久、张一宇以及三区队向宁城县西部和喀喇沁旗及赤峰以西的方向开辟工作；张立文带领张野溪、李惠友等同志转移到宁城县西南部大明塔周围开辟新区；陈革带领一些人到松树台、道虎沟周围，即平泉县东南部开展工作(陈革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宋兴邦带领一些人在4个老区坚持对敌斗争(宋不久被捕)；周治国带领40多人的县游击队及贺文涛、李惠友区长等10多名地方干部，向平泉东部、宁城南部、凌源西北部开辟地区。这次八路军去的这些地方虽然都是敌占区，但过去八路军没有去过，日伪军对这些地方没有派大批军队反复“围剿”，比较利于我军的活动。经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八路军的游击队又重新开辟了方

圆400里的游击区，于1943年的6月组建了第五和第六抗日区政权。

第五、第六区组建不久，我军就连续打了许多仗，杨雨民和高桥所带的是主力部队，对敌人打击更重，于是敌人又调重兵“围剿”这个地区，我军几乎是天天打仗。9月初，我军被围在凌源西部的裂山沟大山上，上有2架飞机侦察、扫射，下有日伪军讨伐队和骑兵旅围追。杨雨民同志召开了办事处紧急会议，决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突围后留下少数地方干部继续秘密组织发动群众，其余大部队立即转入关内。当夜，八路军冲出了包围，突过锦承铁路，穿越平泉、青龙县，且战且走地又打了三四天才转入关内抗日根据地。在迁安县东水峪周治国找到冀东地委。这时冀东地委已改为冀热边特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李运昌同志任特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司令员。他热情地接见了周治国这支由热河敌占区返回的部队。

(五)成立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特委决定周治国等重返承、平、宁地区，并成立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由周治国兼队长，增派周哲民为指导员，任务是向叶柏寿至赤峰铁路以东尽力发展，在可能情况下，相机深入东北腹地了解情况，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取上联系。

1943年秋末，周治国、周哲民带队又深入热辽地区。为了寻找抗联，曾到过朝阳、吉林等地，但未能联系上。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于1944年3月末，在叶柏寿北部一带又开辟了一片游击区，准备成立为第七区，拟任李润斋为区委书记兼区长，赵洪山为助理员。

同样，杨雨民、高桥带领的部队也开辟出一片游击区和组建了第八区政权。后来敌人又调兵“围剿”，在战斗中高桥壮烈牺牲，杨雨民带领伤亡惨重的部队于1944年夏返回冀东。与此同时，第七区也被敌人“围剿”。周治国等凭借高山密林，在群众的支持下坚持

到10月份。后来，敌人搞“集家”，许多村庄变成“无人区”，群众被抓进“人圈”。干部、战士无处吃、住，服装也早已破烂不堪，无法防寒，周治国带领仅剩下的11名同志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包围，于11月初，最后一批返回冀东。

1941年至1944年，周治国在冀东党的领导下，在热辽部分地区先后组建的12个抗日区政府，虽然这些区政府被敌人摧毁了，但我们以较少的干部、战士，在伪满洲国的西南部，点燃了抗日的烈火，建立了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也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其他抗日战场。同时使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人心，为收复东北失地打下了基础。

凌绥青联合县的建立及在朝阳的敌后抗日斗争

1942年5月，冀东军区为了进一步开辟热河地区，曾集中4000兵力配合各游击队、民兵对日寇展开攻势，使承德、平泉、兴隆、宁城、青龙、绥中等地联成一片，与冀东解放区连接起来，致使敌伪“在热河行政无法行使”。日寇对此惊恐不安，在1942年秋季对冀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

冀东军分区和冀东地委为粉碎日寇的扫荡，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执行“在条件艰苦地区，不发展就不能巩固”的方针，于1942年秋末冬初派出两批武装工作队以宋国祥为队长、张仲三为指导员的有40多名干部及50多名武装的工作队，到临榆、抚宁北部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并逐渐向凌源、绥中方面伸展。派出冀东十三军分区十二团一营(营长周家美，后是杨树元，副营长马骥)到口外的青龙县境内花果山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活动，逐渐向都山、双山子、龙王庙及建昌岭上的要路沟一带开展工作。不久冀东地委又派出以张化东、信修为首的两支武装工作队，也到口外东部一带活动。

为便于开展工作，1942年12月，根据中共冀东党委决定在青龙县靴脚沟成立了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张化东任联合县工委书记，宋国祥任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张仲三任联合县办事处副主任兼民运部长。1943年春，热南抗日工作大发展，这时热河中部的承德、平泉、巴里罕和凌源、青龙、绥中的大片山地已连接起来，并和锦热路南连成一片，构成了冀热辽抗日游击区的重要组成部份。为加强党的领导，冀东党委指示撤销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单独成立了凌(源)绥(中)青(龙)联合县。张化东任联合县工委

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张仲三任民运部长兼宣传部长，信修任民政科长。联合县办事处设在青龙县的靴脚沟，隶属于冀东三地委(后改十六地委)领导。地委指出，成立这个县的主要目的，是便于我党政军在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开展活动。具体任务是：扩大抗日游击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宣传、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打击汉奸，发展地方组织，建立政权和革命武装，牵制日伪有生力量，为我军向东北进军奠定基础。

在临抚凌绥青联合县活动期间，为保卫我党政机关并配合开展工作，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一营曾受命开辟滦河以东地区。凌绥青联合县成立以后，这支部队在凌绥青工委领导下，配合地方开辟地区，活动在青龙、建昌、凌源、绥中等地，扩大新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组织发动群众一致抗日，建立地方武装。1943 年 7 月，十二团一营改编为七区队，罗文任队长，凌绥青联合县工委书记刘光路兼政治委员，马骥任副队长。

凌绥青联合的主要领导干部几经变化。联合县成立不久张化东调走，刘光禄接任工委书记，与刘光禄同来的何济民任组织部长，信修由民政科长改任办事处主任，张仲三职务未变，周鸣岐任工委秘书。1944 年刘光路调走后，七区队队长罗文任工委书记。

凌绥青联合县成立以后，主要活动在青龙、绥中一带。在凌源(包括现建昌、喀左等地)较之少一些也开辟晚一点，大体上有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创建抗日游击区，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凌绥青联合县成立以后，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和深入敌占区进行工作的斗争形势，工委决定以小股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形式，隐蔽在群众之中，扎根串连，组织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1943 年秋至 1944 年春，联合县开辟岭上工作，齐英(化名郝友)带领苗树青、许忠、张玉民、王起先、李玉甫、潘凯、李殿威、古明、苏德永、吕振霄等区级干部，各带五六名同志组成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向岭上突击。

为便于活动，工作队按片分成几个组：古明组，组员有于海生、刘春阳、常安等，活动在牛营子一带；李殿威组，组员有张玉书等，向喀左大城子一带开进；王起先组，组员有张义、李丰等同志，在山嘴子、四官营子一带活动；张玉民组，组员有王平等，在汤神庙一带活动；吕振霄组，组员有李玉民等在碱厂一带活动；苗树青组，组员有常荣久、李玉甫等，配合各组、在岭上广大地区进行游击活动。还有齐英同志带一部分武工队员到喀左县南部山区平房子，马家沟一带，开辟地区，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

由于岭上敌人封锁严密，所以工作组的活动，只能运用游击方式，昼伏夜起，每到一地，只能住宿一二天就走，离敌人据点比较近的地区，想方设法争取和利用下层人物及日伪组织中的下属人员，否则，就难以立足。在离敌人比较远的边沿地区，则积极依靠贫苦农民，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主张，讲清日本必败，抗日必胜的道理。通过一系列的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有些地区建立了许多关系人，如喀左马家沟的杨永财、邢殿才、任景海和建昌要路沟的李春方，凌源刘杖子西沟的王万相等。

因建昌岭上一带开辟工作较晚，我军的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敌人统治较严，因此，仅在这一带建立一个游击区，许忠任区长兼区委书记。

为了加强联合县各游击区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便于沟通情报、输送干部，联合县委决定建立一条由青龙，经大杖子、四官营子至叶柏寿的地下交通联络线。由联合县联络科科长霍郁领导和组建这条秘密联络线。并于 1943 年冬到 1944 年春，曾 3 次到于杖子、山嘴子、四官营子一带活动，建立点线关系。

建昌岭上是个游击区，建党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在极个别地区由个别负责同志发展了极少数党员。要路沟是游击区与青龙相连的边界地区，这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许忠在建昌和青龙交界的龟石岭、梯子岭、大小鹰岭(现属建昌管辖)、黄

石岭等处，建立了党的组织。据第一批入党的党员樊恩回忆，大小鹰岭于1943年2月开始建党，最初没有支部，是一个党小组，樊恩任组长，与黄岩等处共建一个支部，由曹子明任支书，韩老大(韩福)任组织委员。党员有大小鹰岭的樊恩、樊振贵、刘进员、徐福、李春芳、李清，黄石岩的曹子明、曹庆云、韩福荣、材余荣、李杰、李俊等人。这些同志，给抗日游击工作队以很大帮助，如运粮、保存粮食等。



这是建昌县老达杖子乡牛洞村角茹永祥的家。抗战时茹是我军的关系人。1944年七区队马骥队长率部常住他家，并在这里为部队筹粮筹款。伪满时这里也是“人圈”。照片中的白墙是“人圈”的围墙。

二是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凌绥青联合县工委建立后，决定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1943年秋，冀东区党委和军分区决定，将十二团一营改编为第七区队。七区队在马骥领导下，负责凌绥青地区武装斗争。他们活跃在青龙东部，绥中、建昌、凌源交界地区，出没在深山密林之中，实行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或出敌不意，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或乘虚而入，捣毁敌人的老窝。敌人一听到马骥部队，无不胆战心寒。他们在这里进行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其中较大的几次战斗有：

1943年初，霍郁在些迷子以西侦察好情况，立即与马骥部队联系。马骥带两个连的兵力来到已预定的地点潜伏下来。敌人约400人，拉开很长战线，当大部队即将过完，只剩下一个机炮排时，

被我部队包围伏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次战斗，缴获敌轻机枪4挺，重机枪2挺，炮2门，俘虏敌人1个排。这次伏击战，震惊了敌人，鼓舞了战士的斗志，扩大了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1943年5月6日，在青龙与建昌交界地区，我地方游击队(李杰队长)配合马骥部队，共400多人，在杨树窝铺打了一次胜仗，缴获敌人机枪3挺，步枪60支，手枪10多支，汽车3辆。

1943年秋，马骥部队于青龙出发，到凌源的佛爷洞、沟门子、松岭子、茶棚、红石砬子、三十家子，直抵凌源城郊，由凌源城河东，绕道牛营子、三道湾等地，与敌人发生过很多次大小战斗，其中较大的战斗，是茶棚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敌人一个队长，打伤5名伪军，其余人员狼狈溃逃。后来，又在二道湾子等地与敌人一个营伪军和一小队鬼子进行战斗，消灭敌人一个机枪排，俘虏1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

1944年3月间，根据上级指示，七区队奉命增援在光头山被围困的三区队(高桥部队)，因中途被阻返回。在返回途中，距凌源西北30多里的地方，突袭了尾追的伪国军第三团和一个鬼子大队，击毙国兵重机枪连副连长1人，俘敌一个重机枪班，缴重机枪2挺。与此同时，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以突袭的方式，曾捣毁过老达杖子警察分驻所，打掉过茶棚分驻所的炮楼，还多次打过要路沟警察署。使敌人和伪军警人员提心吊胆，对我八路军非常畏惧。

1944年春，我地方两个游击小队和马骥部队两个连在喇嘛洞南新开岭的锥子山南沟伏击一次日本军，打死日军100多人，活捉3个日本兵，缴获机枪2挺，迫击炮3门。同时，党领导绥中、建昌边沿地区的民兵，在水泉沟开设了土地雷厂，用果匣子、洋油瓶子、木箱等，装上炸药、铁片、安上雷管，制造土地雷，发给青年骨干民兵，他们在根据地军事要道，埋设了大量地雷，狠狠打击了敌人。一次，当地民兵在夜间把地雷埋在和尚房子警察所的门口，早晨警察

一出门有人就被炸倒，其余警察吓得一天不敢出门。后来，敌人向我们根据地扫荡时，先赶牲口走过，然后才敢走。

由于我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和民兵的有力配合，共同作战，使我军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敌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马骥领导的七区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由原来200多人，发展成为一支8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也得到了发展。

三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掀起群众抗日高潮。凌绥青联合县工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结合在敌占区进行斗争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主力部队和各个工作队在深入到敌人统治区以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采用亲连亲、友连友的办法，在各地培养一批忠诚可靠的关系人，并以他们为基础，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要求充分利用地方上有一定民族感和爱国心的上层人物，做敌伪下属组织牌甲长的争取工作。

我军和工作队根据上述指示精神，经过一段细致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各个地方组织了一批关系人。如建昌要路沟的刘进元、李春芳，凌源佛爷洞南台子村的杨宝全、杨玉民；三家子的董秀云，沟门子吴杖子的李国林、林贵，河坎子的张岳、张润、高祯等。在敌伪下属组织和下属人员中，有些明着担任伪职务，实际为我们做工作。如要路沟的沈春林、庞振，新开岭的李连科，平房子的伪协和会书记王文秀、伪村助理员张占营等。干沟、新开岭、和尚房子、要路沟等一些当地的伪警察署、分驻所也与我们拉上了关系。

另一方面，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惩制了极少数甘心效忠日寇，作恶多端的首要分子。如要路沟孤山子的陆甲长、吴坤杖子的部落长均被我枪决。

在上述这些地区和有关系人的村子，比较有利于我武工队人员开展工作，能够大张旗鼓地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为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基础，把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

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在凌绥青联合县各边远地区的伪警察署,是日寇统治中国人民的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机构,其头面人物则是各个地方的实力派。如何正确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就成为在统一战线中比较重要的工作。七区队队长马骥,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灵活地掌握和运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审时度势,权衡得失,把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的斗争性相结合,使统战工作取到了显著的成绩。对要路沟警察署长张松波的统战工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马骥根据张松波这个人的表现,认为他对日寇既有依存和一致的一面,同时又有相矛盾和害怕的一面,他害怕自己管辖的地区有八路军活动,鬼子知道对他不利。对八路军是既反对又害怕,他害怕八路军打他和下属分驻所的薄弱地区,这样,他就有被我方拉过来的可能。于是,我方开始了对张松波的统战工作。经过多次通信来往和直接面谈,对他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希望他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好事。同时,对他也进行一系列的说理斗争,双方终于达成了暂时的妥协。马骥对张松波提出的条件是:

1、不准欺压打骂老百姓,不准向老百姓逼要情报;

2、在你们出发前,事先要通知我方出发时间和路线,我方可给予让路,为避免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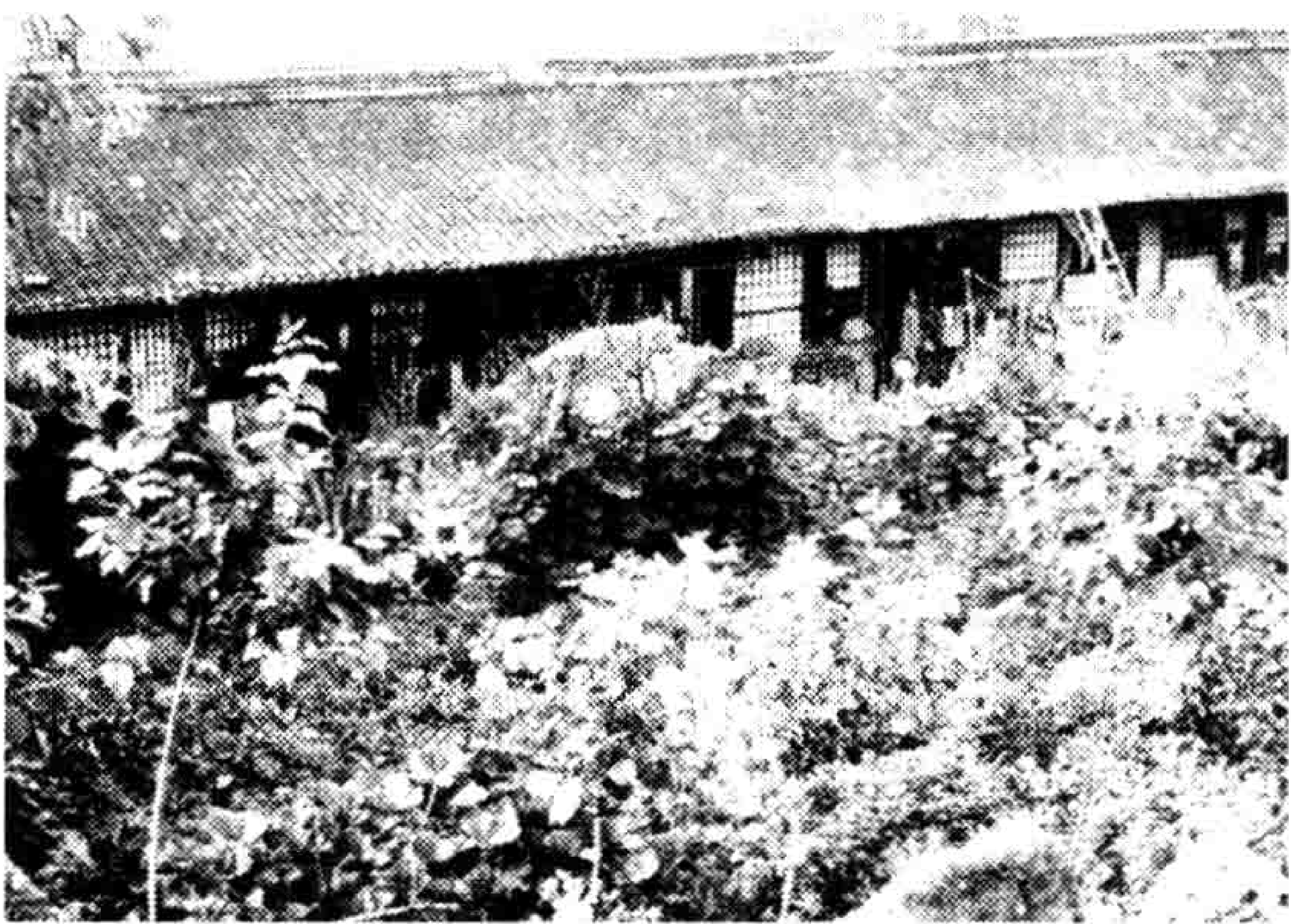
3、我部队从你所管辖的地区通过,不准开枪,同时我们也不干扰你;

4、不准杀害我军伤病员和地工人员。

并指出,只有按这4个条件去作,才是你的唯一出路,否则你们将会遭到我军的消灭。

在提出上列条件的同时,我方也对他做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条件:

1、可以不在你管辖的地区做显著的抗日活动,如破坏交通、



马骥率领敌后武工队住过的民房

割电线、贴抗日标语等；

2、在你这个地区，尽量不打仗，鬼子打来了，我方只打鬼子，不打你们；

3、如你被暴露的话，跑到我方来时，我方可以负责你的生命安全。

这些相互条件，体现了在统一战线中对各种不同的敌对势力，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又打又拉、打拉结合的斗争策略。对张松波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1943年秋天，张松波借口我八路军打了他的尖子山分驻所和枪毙他手下一个特务，又加上辽西地区日本加派了国兵，对我进行围剿。于是，他扬言一定要打八路军，气焰十分嚣张。马骥经过认真分析，决定对张松波斗争采取有礼有节，打而不歼的方针。对张松波要打他一下，但不能打得太狠，打狠了，会把他完全赶到日本鬼子方面去。打他，就是打击他的嚣张气焰，使他认识到八路军不是软弱可欺的。为什么不彻底消灭他呢?因为，如果把他消灭了，日本人必须要另派新人，多设据点，而派来的新人也许比张松波更坏，这样对老百姓和我军活动更为不利，对我们通过要路沟到凌源的捷径也会增加更多的困难。如果不消灭张松波，我们的地工人员和联合县的领导同志，在情况紧急时，还可以到要路沟来躲一躲，使要路沟成为缓冲地带。

因此，当张松波伙同霍三喇嘛讨伐队在红旗杆一带与我七区队的部队交上火后，马骥将部队隐藏在要路沟南几里地一个村子

住下。这时张松波的主力部队已经外出,要路沟伪警察署兵力空虚,马骥只派一个排去攻打要路沟伪警察署。当时要彻底捣毁警察署是不成问题的,为了教育张松波,并未真打。只打了一会,把马骥给张松波的信留下就走了。张松波闻信赶回,见警察署并未被我打掉,又看到马骥给他的亲笔信,受到了教育和感动。他马上写信向八路军表示感谢,并主动撤掉吴坤杖子、河南两个分驻所以示谢意。

由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武装斗争的顺利开展,青龙的大部地区、建昌和尚房子至老爷庙以西、要路沟至沟道以南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出现了我军干部战士,即使身着军衣,单独行动,从要路沟到口里,伪军也不挡道的畅通无阻局而。

四是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的斗争。凌绥青联合县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使敌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造成了对日寇统治的严重威胁。日寇为扑灭抗日斗争的火焰,企图切断我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阻止我军向其后方纵深发展,于是,调集伪满各地兵力,在长城内外,制造所谓"绝缘体"和"无住禁作地带,大搞"集家并村",造成一道断绝口里口外的封锁线。

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把大批人民群众驱赶到被指定的"人圈"。随即把原来的房屋完全烧毁,不许再有一个人存在,也不许人们到这些地带耕种。敌人搜索队如在被赶走的原来地区发现有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枪毙。

实行"集家并村"的村庄,仅凌源地区就有刘杖子、刀尔登、沟门子、三十家子、肖杖子;喀左地区有铁沟里、马家沟、和尚沟、东南沟、西杖子;建昌地区有汤神庙、要路沟、新开岭、和尚房子、喇嘛洞、黑山科等地方。

据凌源已查到的资料记载:全县无人区面积为1500多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6%;被赶进"人圈"的民众达7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22%,其中有3600多人因冻饿而死。

据当时建昌县要路沟地区统计，大约163个村庄、4100多户，被迁并成19个部落，被迁入人圈的达20500多人，被拆毁房屋16400多间。据19个部落统计，1943、1944两年共死去6271人，占部落人口总数的20%。

联合县工委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的斗争。我八路军和武工队员，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宣传党的政策和反“集家并村”的斗争意义，组织群众与敌人的“集家并村”做针相锋对地斗争。敌人宣传“集家”的好处，我们就对群众大讲“集家”的坏处。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人圈”，我们就组织群众晚上扒，敌人修了多日，群众一时就把它扒掉了。敌人晚上不回营，我们就组织力量打。未进“人圈”群众的房屋，虽被敌人几次扒倒和烧毁，但群众仍然反复盖起简易小房，搭起马架，挖开地窖，修理出山洞子等，坚持不进“人圈”，与敌人做顽强的斗争。凌源三十家子的董云秀在“集家”前后3年中，一日也没进“人圈”，为此曾受警察多次毒打，房屋也被烧掉，但他不怕敌人欺压，不怕天寒无房住，仍在山沟里坚持斗争，还给我武工队送信送饭。沟门子地区老杖子村李国林、林贵等12人，不进“人圈”，住在山沟地窖子里，虽经敌人几次破坏，仍然没有离开此地。我地下工作人员齐英、苗树青等人，坚持在这一地区活动时，就曾在他们掩护下，同敌人进行斗争。佛爷洞沙果子沟全屯有45间房子被日寇烧毁，但全屯群众就是不进“人圈”，敌人反复烧房，群众反复搭起马架子住。由于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打击敌人，推迟了敌人“集家并村”的计划。日伪在1943年6月被迫宣布5次集家失败。

后来，敌人向“集家并村”地区增派“讨伐队”和伪国兵看守，训练当地的土豪劣绅，并在围子里建敌人据点，武装“人圈”。由于敌人力量过强，手段非常残酷，又加上在反集家斗争政策上出现一些偏差(开始不进人圈，拆毁人圈，在初期是正确的，但当敌人下大力量搞集家并村，而我武装力量不能控制的时候，未能及时改变政

策),结果使群众无房住、无饭吃,被敌人强迫赶进人圈,使我抗日力量受到一定损失。

冀东十六地委根据上级党委指示,于1945年春撤销了凌绥青联合县工委,成立了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机构——十六地分委,继续领导游击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直到"九三"胜利。

凌绥青联合县在朝阳地区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虽然时间较短,地域不大,但在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全体指战员和武工队员扎根群众之中,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3年冬,联合县民政科张玉民,来到岭上建昌开辟工作,在黑山嘴子,因汉奸告密,被地主武装包围袭击,张玉民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随行的20余名同志,仅有十几人冲出重围,其余全部被敌人杀害。

1944年1月25日,霍郁来岭上活动,在木头凳子一个老乡家里休息,被敌人包围,他虽脱险,但他的警卫员陈树林为了掩护霍郁而中弹牺牲。同年正月,武工队的王起先、李殿威、张义、张玉书、李丰等同志,在喀左山嘴子被汉奸告密,包围被俘,英勇不屈,在建昌被杀害。凌源刘杖子西沟贫农王万相,为了保护我游击队员张大山安全养病,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拒而不言,后被敌人活埋在深坑里,已奄奄一息,坚持没说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掩护了张大山的安全。此类英烈事迹不胜枚举,这许许多多有名和无名的先烈们,永远活在朝阳人民的心中。

承平宁联合县与锦热边远征工作队

1943年5月,在以周治国领导的青平工作团和远征工作队的基础上,经冀东地委批准,建立了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由杨雨民(化名黄云)任联合县工委书记,周治国(化名国田)任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县长),陈革任组织部长兼武装科长,宋兴帮(又名李正平)任秘书科长,张立文任民政科长。配属联合县活动的为冀东军区直属第三区队,队长苏然(化名高桥),政委由杨雨民兼任,副政委郑紫明(又名郑维家),区队党总支书记为郝福鸿。联合县成立后,即在平泉北部的七家寨召开了会议。

会议明确了联合县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发动群众抗日支前;发展抗日武装,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有计划、有目的地袭击敌人,镇压极端顽固的汉奸;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人圈",反对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斗争;建党建政发展群众抗日组织;在敌后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会后联合县及三区队的领导同志便各带一部分人员分开活动。

承德、平泉、宁城位于热河省中部地区,在承平宁联合县成立以前,已经建立4个游击区政权。联合县成立后,经过艰苦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抗日游击活动迅速向热东方向发展,重新开辟了方圆达数百里的游击区,并在1943年秋成立了承平宁联合县的第五和第六游击区。

1943年秋,冀东分区又决定成立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由周治国兼队长,派周哲民为指导员,率领部分武装工作队,相机逐步向东发展,以便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他抗日队伍取得联系。所以远征工作队建立后,主要在联合县的最东部第六区活动。

第五区的范围是以跨凌源、平泉交界处的大裂山沟为中心，包括宋杖子、三十家子、三家、黄土梁子、二十家子等地区。区委书记常野，区长李惠友。

第六区的管辖范围，以驿马图川为中心，跨越宁城、建平两县，活动地区大体包括叶柏寿以北，天义以东，建平以南地区。第六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是贺文涛(化名高山)，区委组织委员赵军，区助理员李润斋。

第五、六两个区当时只配属了一个区小队(又称基干队)。队长张野溪，副队长蒋秀魁。区小队当时共有40多人。

抗日游击政权的建立，给灾难深重的热东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我党政军人员所到之处都播下了反满抗日的革命火种。

从1943年秋季起到1944年秋季，承平宁联合县大部分工作人员暂回关内的一年时间里仍有一些同志坚持在建平、凌源境内活动。1943年冬，郑学明带三区队一个连进入建平境内活动。周治国、贺文涛领导的县区工作人员紧密配合郑紫明所带的部队一起活跃在叶柏寿以北广大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如同一把尖刀，插在了敌人心脏。

1944年春，郑紫明所带的部队和贺文涛等地方同志一起，从叶柏寿以北的山嘴子、哈巴气开始向东活动，经过朱碌科到达朝阳北部的老虎山一带，然后又游击活动回到叶柏寿以北。这次活动使许多群众亲眼看到了八路军的大部队，人们奔走相告："高桥部队过来了"，广大群众深受鼓舞，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联合县和三区队领导游击区内的党政军民与日伪统治者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是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寇，长我中华民族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1943年到1944年间，他们砸"大满号"，端"分驻所"，打伏击，搞奇袭，连续打了几个漂亮仗，大大挫伤了敌人锐气。

1943年7月19日，奇袭宋杖子的战斗，就是一次威震敌胆的

歼灭战。

宋杖子车站位于锦承路的中段,虽不是全路的重点车站,但由于它正处于我承平宁联合县第五区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以敌我双方都很重视它。敌人在宋杖子车站驻扎了一个警务队,并由一个日本人马昶担任队长。

1943年夏,正当我抗日工作人员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活动之际,连续发生了敌人跟踪追击事件,说明敌人掌握了我们的行踪,这对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解开这个谜,我们派人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原来宋杖子车站的警备队长马昶,是这一带的日本特务机构的领导人,它领导着一个严密的敌特情报网。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就是凌源城里的日伪人员也都对他十分尊敬。在我们得到的伪宁城县警察署的一份情况通报上,也表彰马昶的情报工作搞得好,对所辖地区八路军的活动情况掌握得及时准确。张野溪领导的基干队,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并请示有关领导,决定立刻拔掉这个眼中钉。经与三区队二中队队长纪洪恩和指导员王梦聪共同商量后,制订了具体的战斗方案。决定由张野溪率基干队直插宋杖子车站,奇袭马昶及其警备队,二中队负责阻击打援和站外警戒。

7月19日半夜,战斗按计划打响,一举击毙了马昶夫妇和另外一名日本鬼子,警备队全部缴械投降。敌人从铁路东西两面开着"毛斯嘎"车来援,均被我阻击部队拦住。拂晓前,我军胜利撤出战斗。这一仗我们未伤一人,而使铁路沿线的日伪军警恐慌不安,闻风丧胆。

8月初,又在平泉、凌源交界的帽子山一战击毙平泉县协和会长日本人仁科和宪兵队长夏古,更使敌人恐慌万状。

二是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培养抗日积极分子,撒布革命火种。我党政军工作人员每到一地,都是从发动教育广大群众入手,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气节教育及形势教育,并从普遍的教育中发现、培养抗日积极分子,这样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个牢固

的立足点。

承平宁联合县第五区区长李惠友同志只所以经常活跃在三十家子的喇嘛洞一带，就是因为在这里已培养起一批忠实、积极、可靠的抗日积极分子。马玉堂、王昆、伍国儒、马占坡、王五等人，经常不避艰险为我军政人员收集情况，送递信件、收送军鞋，掩护伤员，安排食宿等等。马玉堂同志还被正式发展为地下交通员。

由于马玉堂为我党政人员办事，所以当1944年3月李惠友等人撤回关内以后，日伪机关到处捕捉他，使他一年多时间不敢回家，在山沟里过风餐露宿的游击生活。后来又有我区小队人员张玉、李学会(受伤)投奔他，要求他协助回关内，他借来400元钱(伪币)做为给带路人的报酬和3人的路费，才把张、李3人送走(后来卖了4亩地还了这400元的欠债)。马玉堂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一直坚持在山沟里忍饥挨饿，直到1945年6月李惠友等同志从关内重新返回，他才从山里回来。

第六区的同志在活动范围内，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也很快在群众中交了些可靠的朋友，建立了一些联络点。如小塘北新地山上的老贫农张连城，哈巴气的武珍，万寿西杖子邱北沟的邱瑞，小塘兴隆地的张连廷、郑文生，小塘七家的郎耀东，白家洼的王海廷，叶柏寿北山嘴的苑景阳，尚子沟的董玉国、郭明久，大杖子的范玉龙、章忠等，都是我军培养的抗日积极分子。他们热心协助我党军政人员开展工作。在1944年敌人疯狂围剿扫荡时，我六区工作人员贺文涛等同志就曾在哈巴气武珍等人的掩护下达几个月，所以当时同志们亲切地称呼哈巴气为“小根据地”。特别是建平青峰山独分子沟的张瑞轩、张瑞廷兄弟二人，不仅经常给我军搜集情况，还到处穿针引线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协助我们发展扩大抗日积极分子的队伍。

有了这些忠实可靠的抗日积极分子，使敌后抗日的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一些条件好的村庄形成了抗日游击

村，在这些村秘密地发展了一些抗日救国会会员，还有人直接参加了革命队伍。如小塘公社兴隆地的青年农民陈祥，就是在1944年春季正式参加革命队伍的。

三是严惩怙恶不悛的汉奸，分化瓦解敌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43年12月周治国、周哲民率领队伍，在热赤铁路的东段横过公路时，抓到了一个武装警察，即未打他也未骂他，而向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他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然后还给枪支把他放了。后来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他不仅未暴露我们，有时还给我们送情报。

无论是党政军负责干部或工作队员，每进驻一地都首先对伪牌甲长进行工作，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宣传抗日必胜，侵略者必败的道理，提醒他们认清时局。这样做了以后取得了显著效果，有些牌甲长慑于压力不敢向敌人出卖我们，更有些人在我们教育下，唤发了民族良心，成了真心向我，假心向敌的两面人物，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如建平大杖子的大甲长赵青山、五龙台的地主张国良、建平县警察署的警尉管向衡都是经过我们争取教育后，积极协助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的。

1943年冬，郑紫明率三区队一个连在贺文涛协助下袭击了建平深井的伪警察分驻所。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郑紫明同志只带3名战士和1名向导，先头进入伪警察所，大部队在后隐蔽跟进。当摸进屋里时，一群警察正在赌牌，这时带路的老乡大喊一声："同志们来了"。警察们一听都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郑紫明和3名战士把枪口对准警察们，大喝一声："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这时警察们乖乖地站在一起。郑紫明同志开始给伪警察们训话："你们不要害怕，一不要你们的命，二不要你们的枪，只跟你们借样东西，不要别的，只要你们警区的地图。"警察们把地图拿来送给郑紫明。接着郑紫明又对警察们训话："这次我们放了你们，也不收缴你们的枪支弹药，但今后你们不许再欺负老百姓。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忘

了咱们的祖宗，中国人要齐心合力打日本鬼子，不要甘心当亡国奴。你们应该立功赎罪，不要死心塌地当汉奸……。”警察们连说：“照办，照办。”然后郑紫明同志拿着地图就撤走了。以后这个警察所成了两面警察所，特别是警长王家利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周治国还在这里印了《告东北同胞书》的传单。有一次郑紫明和周治国就住在离深井3里的一个村庄里，一股鬼子来这里清乡，到了深井警察所，警察们向鬼子谎报说，他们管区内没有八路军，把鬼子骗走了，掩护了我们的同志。

但对个别死心为日伪效劳的汉奸，则予以严惩，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枪决汉奸王殿丰就是一例。王殿丰，建平沙海东丰太村石匠沟人，外号王狗子，当过伪警察，是个“大烟鬼”，由于向敌人报告我们的行动，所以敌人加紧对我们的跟踪讨伐。为了把王殿丰向敌人报告的情况核实清楚，周治国派赵青山、樊俊生、李成帮3人，扮成伪旗公署的特务模样，到王殿丰家核实。赵青山问“这地方有八路军活动，你怎么不报告呢？”王殿丰连忙说：“我早就向沙海警察所报告了，去了3次都得了奖，头一次给我10块钱，第二次给我100斤盐，第三回给我两把铁锨和两条烟卷。不信，你们问他们去！”赵青山他们听后假意夸奖他一番，又问他：“八路军再来还报告不？”他连说：“报告，报告。”赵青山又对他说：“你跟我们到旗公署去一趟吧，对你有重赏。”王殿丰高兴地跟赵青山他们来了。一到周治国那里，王殿丰一看傻了眼。我们又重新问了口供后，叫他找人取保以便释放，可是无人保他。后经研究，为了警告其他敌伪人员，决定处决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在沙海五龙台处决了王殿丰后，还在居民张国良的大门上贴了处决布告。内容是：

“为东丰太村石匠沟屯，居民王殿丰，男，年37岁，不行正道，甘心认贼作父，报告我军行动三次，受到敌人奖励二十余元。巡捕到案，情愿认罪，罪予枪决，除此民害。

切切此照

主任周治国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镇压了王殿丰，对附近地区的敌伪人员是一个很大震动，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自己，引起敌人更大规模的疯狂围剿。

四是联络抗日爱国志士，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成立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逐步向东开辟游击区，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周治国、周哲民等同志在热中地区活动时，就听人传说许多有关朝阳县石明信沟的王老凿坚持抗击日寇的事情。当他们进入到建平境内以后，关于王老凿的传说，听的就更多了。有的说："满洲国制不了王老凿。"有的说："小日本占领东北，把大股抗日武装都消灭了，民间的枪支也都收去了，可王老凿管的那个地方就是齐心反满抗日，小鬼子干瞪眼，没办法。"还有人称赞石明信沟是"中国地"，甚至有的把王老凿传得"神"了。

周治国和周哲民对王老凿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下，能有这样坚持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人，是十分可贵的，决定亲自拜访一次王老凿。其目的是探探王老凿的底，看一看王老凿到底是何等样人。如真象传说中的那样，就联合他共同进行抗日斗争，还可以探听东北抗日联军的消息。

最后决定由周治国、周哲民亲自带队，并挑选了李润斋、杜明岐、赵青山，樊俊山、李成帮、王玉华等同志组成了一个精悍的小分队，于 1944 年 3 月中旬从叶柏寿北部出发，到朝阳县石明信沟去拜访王老凿。

虽然从出发地到石明信沟只有约 200 里的路程，但当时环境是十分艰苦的。不仅各村都有敌伪的岗哨，又加上天冷、衣薄、路不熟，只能昼伏夜行，而且还必须爬山越岭钻山林，不能走公路。每人带了几斤炒米，饿了吃炒米，渴了喝泉水。有时走到山沟里独门独户人家，就叫老乡给做点饭吃，有时就找向导给带一段路。最后走

到朝阳县梅勒营子时找到了一个叫迟光显的老乡(在朝阳街里开过店)给当向导,他路很熟,一直把小分队带到石明信沟梁家营子的梁守志的家里。周治国真诚地向房东公开了身份,说明了来意,并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赞扬了王老凿的反满抗日义举,请他给王老凿捎个信,希望能见面谈一谈。开始时房东婉言谢绝说:"日本鬼子和警察天天抓王老凿,烧他的房子,他的行动没有定处,我找不着他。"又说:"我和王老凿也说不上话。"经周治国,周哲民等同志反复工作,又给他看《告东北同胞书》的传单,迟光显又在一旁帮腔,房东才改变语气,叫家人烧水做饭,让小分队先休息一下。饭后闲谈中,房东才向周治国等同志介绍了一些王老凿的情况。

小分队等了两天,房东仍说没找到王老凿。这时队员们天天给房东挑水、扫院子、做饭,自己缝补衣鞋。同时周治国、周哲民又反复向房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又把冀东军区发给周治国、周哲民的委任状给房东看了,并交给他一些《告东北同胞书》的传单,请他转送王老凿。一直等到第四天下午,房东梁守志才告诉周治团,今晚王老凿来见面。

这天晚上,王老凿和他四弟王文玉带4个卫兵来到梁守志家,和周治国及小分队全体同志见了面。

周治国、周哲民再次向王老凿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讲解我党抗日救国的政策主张及国际国内形势,赞扬了王老凿坚持反满抗日的行动。王老凿听了以后很高兴。

王老凿向小分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说:"日本人搞了个满洲国,老百姓可遭罪了,种棉不让纺线,种麦不许吃面,纺线织布、吃白面就犯罪。又要劳工,又要这个捐,又要那个税,弄的老百姓没法活。我就不听他们的,我把这块地方的老百姓联合起来打小日本。"又说:"我们哥四个,老三是抗日救国军的头头,叫日本人打死了,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我就盼望咱们的军队过来打倒满洲国,给我三弟报仇。""日本鬼子派人劝我到城里去,说有酒喝、有肉吃、

有官做、有马骑，我就是不去。他们见我不降，就调兵打我，围剿了三四回。这山沟地形复杂，我们熟悉，一钻山沟他们连影也见不到。他们虽然人多，可有劲使不上。没办法他们就烧了我的房子，抢走了东西，不管怎么折腾我就是不投降。"

当周治国问他们的武装情况及其是否与抗联有联系时，四老凿说："主要是我们哥俩带七八个孩子，还有沟里的 20 多个青年，一共 30 多人。我们和外边哪也没有联系，就是靠我们自己。靠这一山沟的老百姓和这个大山林坚持到现在。我们不想到外面去，就为保护住这个小山沟的乡亲。满洲国不准我们织布纺线、榨油，我们偏干。鬼子恨透了我们，劝降不去，围剿又打不着，没办法在这周围安了许多警察所看着我们。他们来的人多了我们就钻山，人少了就打。"

当谈到合作抗日时，王老凿说："合作可以，但我们不能出去。"

双方谈得很融洽。最后四老凿告诉周治国，你们来石明信沟的事，日本鬼子已经知道了，给你们带路的迟光显已被捕了，敌人在石明信沟周围已加派了岗哨，风声很紧，近几天又可能"清剿"。小分队当即决定返回叶柏寿游击区去。临行时，王老凿拿出 50 元钱相赠，被周治国婉言谢绝了。随后王老凿派人把小分队送出了石明信沟。

回到叶柏寿以北的游击区后，周治国与周哲民商量，在王老凿那也没有探到关于抗日联军的消息，决定做进一步的努力，由周哲民回家乡去走一趟。周哲民的家在吉林省瞻榆县，但周哲民已离家 10 多年了，也不知家中有啥变化。为稳妥起见，决定派青峰山的抗日积极分子张瑞廷先去探听虚实后，周哲民再回去。张瑞廷到了周家一看，周家没啥大变化，所以便回来向周哲民报告了情况。为了此行的顺利，由小塘的郎耀东找人给周哲民照了个半身像，又通过关系，搞了个"良民证"。然后周哲民化装成教师，张瑞轩化装成农民，二人便结伴而行了。

从叶柏寿上火车后，途经锦州、沈阳、四平，到太平川下了火车，又改乘汽车，一路上虽遇多次盘查，但靠这个假良民证过了关。周、张二人到了周家后，住了两天张瑞轩便回来了。周哲民通过胞兄周凤及老同学侯朝金、方铁声等到处探听有关抗日联军的消息，但始终找不到联系线索。周哲民此行虽没达到与抗联联系的目的，但他秘密地对乡亲、朋友、老同学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抗日必胜的道理，对长期生活在日本铁蹄下的群众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周哲民同志回到承平宁联合县第六区与周治国会合后，两人研究决定，周哲民先回冀东向军区首长汇报远征工作队的工作。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1944 年春起，日寇集中了重兵对承平宁联合县和三区队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和围剿，敌人用成万兵力对付几百之众，虽然靠广大群众的掩护，许多同志安全脱险，但终因寡不敌众，我党政军广大干部战士也遭受重大伤亡。特别是三区队队长高桥于 3 月 29 日在宁城附近的老西沟战斗中壮烈牺牲，承平宁工委的组织部长陈革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这对承平宁地区的斗争是一个重大损失。在敌人的重兵“围剿”面前，为了保存实力，我们采取了避实就虚办法，尽量减少公开活动，干部战士暂时隐蔽在群众之中。

五区区长李惠友等 5 人 4 月 22 日便由马玉堂找向导引路，从喇嘛洞出发，向关内撤退。青纱帐起来以后，承平宁地区的党政军人员开始有计划地向长城内撤退。周治国、贺文涛等也在 1944 年夏秋之际，先后从建平地区出发，回到关内冀东根据地。

大批人员撤退后，承平宁联合县仍留下民政科长张立文等少数人就地坚持斗争，他们主要活动在天义、宁城一带。

1945 年春，冀东区党委又先后派出一批党政军工作人员出关恢复地区。李惠友与石成山、李明华、张恩一行 4 人，于 7 月上旬，又回到了五区所在地的喇嘛洞一带开展活动，直到“八·一五”祖国光复。

开辟马家沟抗日游击区的斗争

马家沟一带抗日游击区是我党开创的凌绥青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从1942年秋到1945年秋，我党武装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经历了艰苦的斗争，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为"逐日寇复东北"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秋，冀东党组织派来建昌、喀左、凌源两个突击组：第一突击组有陈树民、李育民等4人；第二突击组有王起先、古明、苏德永、李殿威、张义、苗树青等6人。他们从青龙的望北沟出发，经天盛号的田家沟，于1942年9月5日由王殿祥(田家沟人)以密输贩(倒卖布匹)朋友为名引荐到山嘴子的马家沟杨永才等家里落脚。从此开始了抗日游击区的创建工作。

敌占区的人民，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生产力极其落后，生产、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特别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以后，贫苦的人民陷入了更重的灾难深渊。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反抗性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求解放的迫切愿望，对党派



道虎沟村马家沟抗日游击根据地

来的武装工作人员由衷地高兴,真诚地欢迎,许多群众都积极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提供方便条件,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的武工队员到马家沟一带以后,立即进行工作,其主要策略和工作方法是:一是通过关系人,以亲连亲,以友通友,由近及远,逐步扩大,进行秘密串连,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二是争取开明士绅和利用敌伪基层政权人员,使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三是积极了解敌伪组织、军事情报,以便在适当时机予以有力的打击。按照这样的工作方法,武装工作人员陈树民、李育民、王起先等同志经杨永才以亲友关系串连了南沟邢殿才,上杖子任贺远,常胜沟阎怀德、黄万仓。又经黄万仓介绍串连了平顶山沟的张凤林、西大杖子王国珍、邢杖子邢宝海(伪甲长)、北岭郭士耕(伪甲长)、白沟张占祥(伪甲长)、喇嘛沟许文奎等人,靠这些人再进一步串连其亲友,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到 1943 年初,串连工作逐步扩大到山嘴子、五家子、四合当、四官营子、白塔子、二道营子、南公营子等地,并准备到大城子一带活动。1943 年末,以齐英为队长的岭上武工队又有一部分武装工作人员也到这里开展工作,使这一带武装工作人员逐步增加到 20 多人。在此期间,以马家沟为中心,大体分 3 片进行活动。李育民、常荣久等同志在马家沟以东;陈树民、贾珠等同志在梁西;王起先、李殿威等同志在山嘴子河北。这些人按片下去开展工作,每隔三、五天到马家沟开一次碰头会。这样,坚持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这些武装工作人员有优良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对人民秋毫不犯,吃饭按规定交钱,与广大群众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住在农民家里,经常给扫院子、挑水,教群众学唱抗日歌曲,讲抗日斗争故事,帮助割秋、砍柴、烧火做饭,甚至同有的关系人一起到关内做买卖,以解决生活困难。群众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大家都自觉为武装工作人员保守秘密,因而使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在马家沟周围几十个村子中都

串连了一些关系人，培养了一批抗日斗争的骨干分子，吸取了一部分革命性强、斗争坚决的青年参加武工队，并通过他们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斗争政策，使人民了解到："日本鬼子的寿命不长了，共产党、八路军很快就会打过来了，人民解放、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从而增强了人民抗日斗争必定胜利的信心。同时，通过对伪牌、甲长，伪警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能够"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仅不反对抗日救国，不残害百姓，还能为武装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保守秘密，提供方便。部分伪官吏也被争取过来，如伪二道营子村协和会书记王文秀、伪村助理员张占营能主动为我武装工作人员提供情报。这就为进一步发展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我党武装工作人员在马家沟一带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当局的不安，建昌警务科经常派便衣特务到马家沟刺探情报。1943 年 10 月，我武工人员李殿威把两颗手榴弹放在黄万仓家里，黄的姑娘拽断拉弦被炸死。虽对外说是让砸明火的毛贼给打死的，但仍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敌人频繁地派遣特务到那里探听消息。10 月 23 日，二道营子伪警察分驻所自卫团员王国相、张凌云、邸洪金、薄海仓 4 人在平顶山沟同我武装工作人员陈树民、李育民相遇发生争执。经牌长张海山和解，他们对枪起誓"回去决不报告"，但其出尔反尔，第二天就带人来搜捕，未找到我武装工作人员，就将牌长张海山抓去。我武工队组长陈树民同志对此非常气愤，夜间来到伪所长王国柱住处警告他："张海山命在你手，如受迫害，武工队与你算帐。"王被吓得丢魂落魄，连连说是。不久，张海山被放回。

敌人发现我武工队员后，对马家沟一带进行接连不断的特务活动。为了消灭我武装工作人员，1944 年 1 月 10 日，20 多名警察、特务对马家沟附近几个村庄进行逐家逐户的搜查，没有找到武装工作人员，就将 13 岁以上的人捕去 56 名，到二道营子警察分驻所一个一个进行严刑拷打审讯，逼问八路军武工队的住处及活动情

况。二傻子杨永儒挺刑不过说出“老头们知道”。随之,敌人就对所有的老头用木棒打,用麻绳抽,用凉水灌,用烧红的煤钩子烙,绝大多数人在这种酷刑面前毫不畏惧,英勇不屈,只字不漏八路军武装工作人员的情况。只有贪生怕死的杨永福屈服于敌人,供认出:“八路军在杨永才家过的阴历年……”结果使一部分抗日骨干分子被押送到建昌监狱,以国事犯定罪判刑:杨永才15年,邢宝海和张占祥20年,许文奎5年。张占祥死于狱中,其余同志直到祖国光复才被释放。

敌人为了破坏抗日游击区,建昌、山嘴子、凌源、大城子等伪警察署所有的日伪军警、特务、讨伐队及其所属人员倾巢出动,对我八路军武装工作人员进行围追清剿。1944年1月下旬的一天,我武装工作人员苗树青、阎玉甫(李云青)、苏德永、张桂友、古明同志在牛营子被特务发现,随即进行转移。建昌和山嘴子伪警察署立即调集100多名日伪骑兵,跟踪尾追到地势险要的裂子山,经过一场激烈战斗,苏德永、张桂友、古明同志英勇牺牲。1944年1月31日我武装工作人员王起先、李殿威、张义、张玉书、李凤等同志来到窑沟屯,被山嘴子警察署警长李万仓、于树田等30人包围逮捕,后押解到建昌监狱,惨遭杀害。

针对敌人的疯狂围剿,我武装工作人员,抓住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惩罚。1943年秋,绿豆沟田树清出卖我情报给敌人通风报信,被我武工人员捕获处决。1945年5月29日深夜,我武装工作人员在齐英率领下一举捣毁盆子窑警防所,击毙杀害我武装工作人员的刽子手、部落自卫团团长李万仓。以后,又处决了为敌人带路围剿我武工人员的裂子山周大盔。

1944年夏季,鉴于日伪调集重兵对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的疯狂扫荡和我地区武装工作人员的伤亡情况,上级指示:为保存实力,除留少数武装工作人员继续在这里工作以外,大部分同志暂时撤入口里,等待适当时机再返回。我地区大部分武工队员撤走。

1944 年下半年，凌绥青工委根据冀热边特委《对恢复口外工作决定》的指示，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了恢复凌绥青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和具体措施，于 1945 年春组织武装工作队又重新深入到口外开辟工作。齐英等同志在马家沟一带继续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斗争，一直坚持到“八·一五”祖国光复。

岭上武工队的敌后抗战

一、开辟岭上根据地

1943年秋季，中共冀热边特委做出的《关于恢复热南地区的决定》中，提出了进一步向敌伪腹地发展的任务，并把凌源(含现在建昌、喀左两县)岭上地区列为主要开辟目标之一。这一地区一直是民众自发反满抗日活动的活跃地带，所以日寇曾在这一地区制造了多起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事件。

为了开辟这一地区，加强党对这一地区民众自发抗日斗争的领导，在临榆县境内，杨关口一带，抽调干部战士组成了一支有20余人的岭上武装工作队(隶属于凌绥青工委领导)，由齐英(化名郝友)任队长。

岭上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以前后槽山区为依托，逐步向外开辟，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设法过锦承铁路以北，与活动在承平宁地区的高桥领导的三区队取得联系，以便协同工作。

武工队的队部除齐英外，由武装干部苗树青、负责爆破的米永林、交通警卫人员常荣久、杨守环、尹成、王喜昌等人组成。下面由王起先、李育民、李殿威、张玉书、李凤、朱文秀、古明、于海生、刘春阳、苏德永、李云卿、宋守金、张玉山、张贵友等同志分别组成了几个突击组。队员中有部分同志，从1942年以来曾在岭上地区分散活动过，这就为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为了慎重起见，齐英先派苗树青等4人组成侦察组为全队开路。然后齐英随后率队从柳关峪出发，跨越长城，经青龙到达了后槽地区。在这被敌人践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他们遇见了一个宁死不进“人圈”的老人刘林，

从此刘林便成了武工队的第一个堡垒户。武工队就从这里迈出了开辟岭上地区的第一步。

武工队到达岭上的第二天，便在后槽岭平顶山的树林里召开了全体武工队员会议，研究了任务，确定了分工区域。由王起先、李殿威、古明、苏德永、李云卿、张玉民、陈树民等同志分别率领各突击组，活动在要路沟、碱厂、汤神庙、牛营子、松岭子、山嘴子、马家沟等地。在这纵横数百里的区域之内，武工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与日伪统治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如同一把尖刀直刺敌人的心脏地区，有力的震慑了敌人。同时也给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同胞带来了希望的火花。“八路军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日伪统治者和广大民众都十分注意武工队的动向。

各突击组从发动群众入手，工作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在自己的活动区域内都建立了一批可靠的堡垒户。这些堡垒户都怀着抗日救国的一片赤诚，协助武工队做了大量工作，经受了无数次严峻的考验，甚至做出了很大牺牲。这是武工队开展工作的群众基础。齐英带领苗树青等人，以后槽为中心，指挥并配合各突击组开展工作。

经过一段短时期的努力工作，在马家沟、山嘴子和要路沟建立了两小块比较牢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结交了一批患难与共的穷朋友。这些人虽然自己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他们却甘心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拿出自己家中的最后一顿口粮，去给抗日的武工队员们吃。这是武工队工作的第一个成果。

齐英正确的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孤立一小撮死心塌地的汉奸，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沟门子村有一个开明士绅蔡香久，此人有民族气节。齐英通过多种渠道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和他交上了朋友，他不仅出钱出物资助武工队，而且还多次掩护武工队，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沟门子驻一个伪军讨伐队，队长王介臣也是当地人。此人虽效忠日寇，但为人狡猾，有狡兔三窟之心。齐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经过几番文武交锋，软硬兼施，武工队终

于和他秘密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给方便的君子协定。

面对那些作恶多端、卖身求荣的铁杆汉奸,也采取了一些严厉的警告措施。歪脖杖子村甲长张凤祥,是一个效忠日寇,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的人。一天夜里,齐英带领3名武工队员,由群众带路,越墙闯进了他的家。齐英用枪逼住张凤祥,对他进行了严厉警告,并晓以民族大义,吓得张捣蒜似的叩头求饶。齐英从容撤走后,把他吓的大病了一场,并以有病为名辞去了伪甲长职务,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张凤祥被武工队警告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对敌伪人员震动很大。有些人开始收敛,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作恶了。有些牌甲长逐步和武工队靠拢了,有些人还成了武工队的耳目。如马家沟甲长邢宝海、张占祥,二道营子牌长张海山,协和会书记王文秀,伪村公所职员张占营,都为武工队做了不少工作。

二、武工队夜袭盆子窑

盆子窑座落在凌源南部七老图山、燕山的余脉与鲁努儿虎山、松岭的余脉的交会点。从盆子窑到南大岭一带的山大沟叫后槽,山势险峻,沟长坡陡。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带的高山密林深谷,从1943年开始,以齐英为队长的岭上武工队,就在这一带坚持活动,在这偏远的山区留下了许多战斗故事。

日寇为了彻底割断我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遏制八路军武工队的活动,疯狂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凌源县的河坎子、三家子、刘杖子一带均被列为"集家"重点。

1943年,日伪在盆子窑修了南北两个"部落",方圆100华里以内的300户人家、1800多口人都被强赶入这两座"人圈"。"部落"里围墙高筑,大门紧闭。北"部落"在山坡上,有东西两个大门;南"部落"与之隔河相望,西北两面有大门,东南两面是小角门,早晨开



盆子窑人圈遗址

门，晚上关门，伪自卫团荷枪实弹，白天黑夜时刻有人站岗巡逻。老百姓一早离开“部落”，出去几十里作庄稼活，夜间回来睡下后听到钟响，还得赶快起来，到围墙上进行防八路演习。如果有谁不去，自卫团就会找上门去狠揍一顿，轻则说你思想不良，重则说你私通八路。在这“人圈”里，群众整天吃不饱，睡不好，挨打受骂，提心吊胆，日子没法过。盆子窑“部落”自卫团长名叫李万仓，副团长叫曹营。他们手下有13名伪自卫团员，每人手里有一支手枪。

在南“部落”的西北角，日伪还设了一个警防所，五间平房，一个大院，四角设有炮楼。这里距沟门子分驻所和山嘴子警察署都有四、五十里，离公路也有二、三十里。代理警防所长名叫吴贺廷，有一支手枪，所里还有赵海龄、华本荣、李焕文等3名警察。李万仓当过伪警长、警尉补，1943年“集家并村”建成盆子窑“部落”后，又在这个“部落”当自卫团团长。他一贯效忠日寇，积极搜捕八路军，多方面刺探我军情报，拼命推行“集家并村”，带领自卫团去烧房子、拆窝棚。盆子窑地处凌源、建昌、青龙三县的交通要道，他经常抢劫来往客商、百般敲诈勒索民财。另外，此人流氓成性，利用权势，奸污妇女。对于这个无恶不作的汉奸和流氓，群众都盼他早日命归西天。为了替百姓申冤报仇，为了给斗争扫除障碍，齐英率领武工队1945年重返岭上后，决定夜袭盆子窑，干掉李万仓。

在这次行动的前几天，武工队派遣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混进

"部落",把里面的地形、兵力部署和人员行动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且得到可靠消息,由讨伐队长王介忱率领的沟门子讨伐队已经从盆子窑开往刀尔登,敌人没有什么部队可以接应。武工队根据这些情况,决定于夜间给敌人来个突然袭击。按照作战计划,5 月 29 日黄昏时,武工队从建昌开过来,到宣杖子吃过晚饭,挑选几名群众带路,借着夜幕的掩护,开始了紧张的夜行军。来到王杖子村,队伍悄悄地停下。按预定方案兵分四路,每路各由两个人当向导。4 支队伍象四把尖刀刺向南"部落"的四门。

当进攻西门的武工队运动到围墙下面时,敌人两个哨兵发现"部落"外面有些黑影儿,一个壮着胆子朝着黑影问:"干什么的?"下面马上气冲冲地回答:"妈的,狗眼不识真人,老子是沟门子讨伐队的!"上面敌人一听声音有点不象,就一扣板机"叭"的打了一枪。子弹刚飞出膛,围墙外就扔上一颗手榴弹,2 人都被炸伤了,他们带伤跌跌撞撞钻进围墙上的炮楼里,谁想屁股后紧接着又飞进来一颗手榴弹,吓得他们魂飞魄散,抱着枪钻进"部落"西北角的警防所里。趁围墙上无人防守的功夫,武工队搭人梯上了围墙,跳进去砸开门锁,门外的队伍一拥而入,强攻西门成功了。

当进攻北门的队伍运动到围墙下时,两个打更的群众刚接班。听到外面有动静,一个吓得钻进警防所院没敢出来,另一个人顺着马道往上走,糊里糊涂地还以为这是"部落"里演习呢。因为警防所规定,农历每月初一举行防八路演习,全"部落"男女都要集合起来,上围墙巡逻。这天后半夜正是农历六月初一,说是演习也不算离谱儿。他走到围墙上,伸头一看,还没分辨出怎么回事,外面就扔进一颗手榴弹来。轰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吓他一大跳。此时外面机枪又爆豆儿般响起来。"好,看样子是八路军攻部落"。他先是一惊,后是一喜,也不去报信儿,跑进围墙边的一个空房子里侧脸外瞧,见几十名八路军从北大门冲了进来。

武工队攻进"部落"后,迅速在西、北两门架上机枪,朝警防所

射击，用火力盖住敌人，又在两个小角门派上哨兵把守，守住四门，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候，武工队兵分两路，一路由齐英队长率领，去攻占“部落”西北角的警防所；一路由苗树青率领，直扑“部落”内李万仓的老巢。

此时，正在睡梦中的李万仓听到外面的枪声，以为是警防所搞演习。不过他心里还是不托底，于是穿上衣服就到副团长曹营家去。一路上枪声越响越紧，他来到曹家，惴惴不安地对曹营说：“二哥，事情不好，听声音好象是八路军来了。”这曹营虽然挂着自卫团副团长的头衔，实际上是为我军通风报信的“两面人”。他老家住在宣杖子，苗树青带战士经常在他家落脚，和他的二儿子曹振海交情很深。听李万仓这么一说，曹营说：“大兄弟，别害怕，你快回家去吧，出事还有二哥我呢！”李万仓心事重重地回到自家，四外枪声已经响成一片。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八路军要是来了，肯定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于是他就打开自家后门，溜到后院，钻进柴禾垛藏了起来。时候不大，游击队把他家院子围上了。苗树青破门而入，带着战士冲进东屋一看，被褥在炕上放着，人却没有踪影。苗又转身走进西屋，只见一床被子正在地下发抖，撩开被子，李万仓老婆和孩子露出头来。没等问话，也没等李万仓老婆说话，一个战士朝墙上挂的中堂镜“啪啪啪”连打三枪，震得屋子嗡嗡响。李万仓的大儿子“妈呀”一声高声喊到：“爸爸，我妈叫人打死了！”李万仓在柴禾垛听儿子这么一喊，明白这等于告诉八路军自己就在家里，于是战战兢兢地走到屋里。苗树青弦外有音地说道：“回来好，够朋友。”又掂掂自己的手枪，问道：“李万仓，你有这家什吗？”李万仓把头点得象鸡啄米一般：“有，有，在东屋顶棚上，我领你们去取！”李万仓带着苗树青取出手枪，回到西屋后被武工队捆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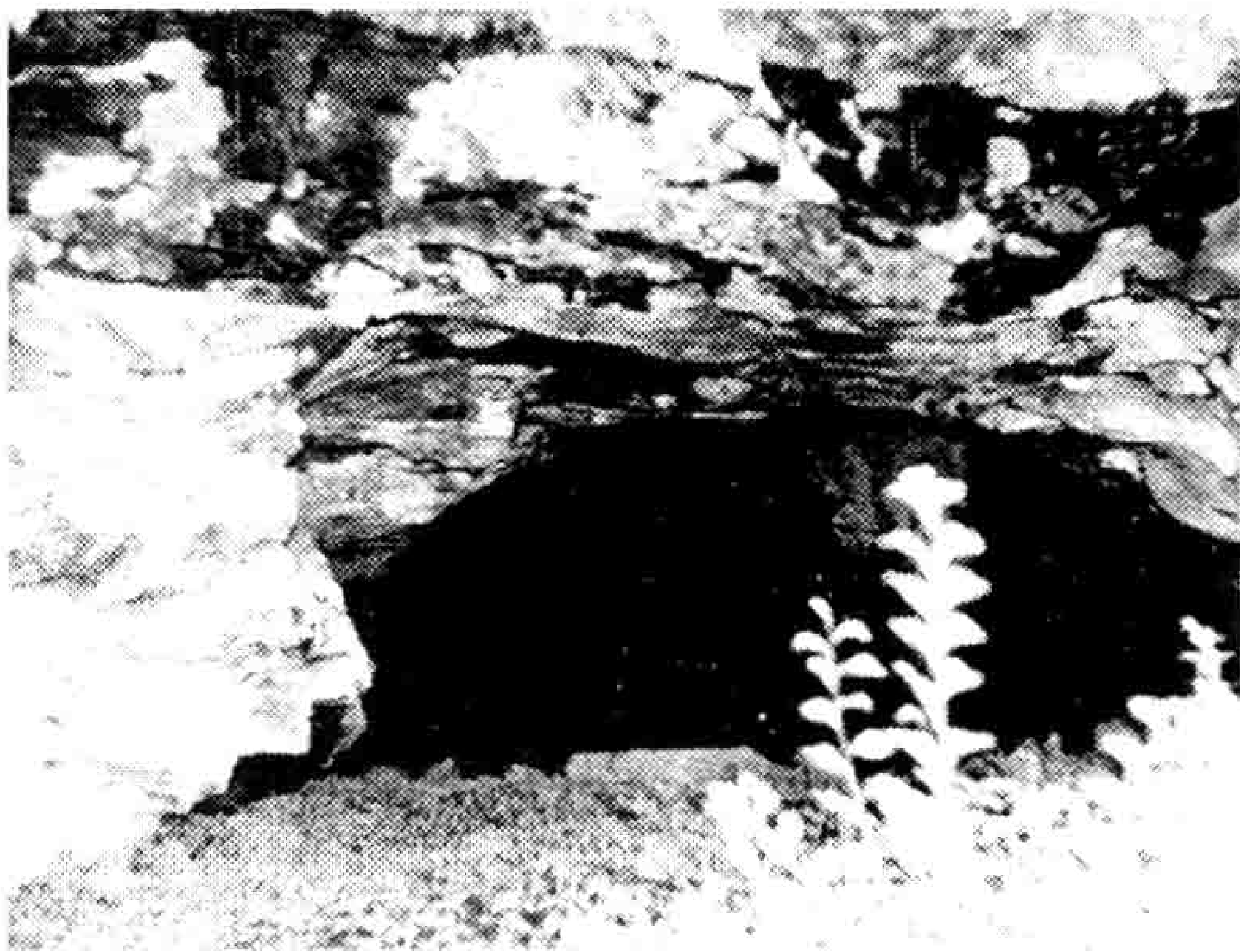
李万仓这边束手就擒，警防所那边却打得激烈。齐英带着战士包围了警防所，可自卫团员和警察们凭借有利地势，不肯轻易放下武器投降。警察赵海龄抄起一支大枪，爬到炮楼子的第二层打算射

击抵抗，一扣扳机却卡壳了。他从枪架上又拿起一支大枪，想从底层的枪眼往外打。他刚把枪顺出去，齐英队长就用左手扳住枪筒，右手伸出手枪顺枪眼猛地一开火，“唉呀”一声，子弹打在赵的小腹上，赵扔下大枪，再也动弹不得了。这时候，自卫队员在炮楼里还是朝外打枪。游击队员拿来一个炸药包，靠在西北角的炮楼上，一声巨响，炮楼被炸开个好大豁口。齐队长朝战士们喊：“往里冲！”说着就要带领战士冲进去。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苗队长带着五花大绑的李万仓来到了。于是便停止进攻，让李万仓喊话叫里边投降。李万仓哭丧着脸扯着脖子喊：“别打啦，八路军人多……咱们打不过……交枪不杀，不交枪我就没命了……”自卫团员们看自己的团长都投降了，炮楼子被炸开了，也就无心恋战，顺枪眼把大枪一棵棵扔出来，举起手乖乖地当了俘虏。从双方接火到结束战斗，总共不到两个小时。除了三两个不在所的警察和自卫队员及侥幸漏网的吴贺廷之外，余下的都没逃脱当俘虏的命运。游击队对俘虏们进行了训话，放火点着了警防所的平房和炮楼，借着熊熊的火光，又发动群众，推倒了“部落”和警防所的围墙。日伪苦心经营了 2 年多的盆子窑，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被打了个七零八落。

趁武工队在这边发动群众破坏围墙之时，苗树青带人来到曹营家，进门一看，曹营不在，只有他生病的二儿子曹振海躺在炕上。苗与他很熟，直接了当地问：“二哥，咱们年纪人(指曹营)呢？”曹振海半天没吱声。原来他怕事情有意外，已经让他父亲曹营到别人家的粮食囤子里藏身，并嘱咐他不去叫千万不要出来。看曹有顾虑，苗树青解释说：“二哥，你别不放心，咱们年纪人明里是“部落”副团长，暗里却是八路军的耳目。我们是有规矩、有情有义之人，绝不能伤害他。但你总得想，我们打到这里来，闹了个惊天地动，把正团长抓走了，对副团长连个边儿也没沾，日后日本鬼子和讨伐队来了，他可怎么交待？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给李万仓陪个绑，你再找群众保他。有人保，我们就放，你看怎样？”曹振海一听，有道

理，于是就打发孩子把曹营找回来，跟着武工队走了。

武工队从5月29日半夜时分来到盆子窑“部落”外，攻四门、炸炮楼、烧警所、刨围墙、训俘虏，一直持续到天亮。战斗结束后，他们告别盆子窑的穷苦乡亲，扛着新缴获的大枪，带着李万仓和曹营真假两个俘虏，满怀着胜利后的喜悦迅速地转移了。翻过一道山梁，来到梁东大黑沟，全村的男女老幼都高高兴兴地走出门来欢迎自己的队伍。看到他们带的两个俘虏，不少人都站出来为曹营说话，说他为人老实厚道，热心为邻里乡亲办事，不反对八路军和共产党，给日伪干事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并异口同声地要保他。齐英问群众：“你们要保曹营，那么李万仓呢？”群众七嘴八舌地说：“曹营是老实人，我们敢兜着。李万仓我们不敢保他，怕吃不了兜着走。”听大家这么说，齐英叫人给曹营松绑，并假意训诫他一顿，命令他不要给日本人真心干事儿，要支应八路军，及时给武工队送情况。又说八路军是看在老百姓的面上放了你，你要是真心为日寇效劳，下次捉住可不客气。对于这番“训诫”，曹连连点头，李万仓看群众不保他，感到事情不妙，他一边跺脚一边哭着对曹营喊：“二哥呀，我回不去啦，我完啦！……你可救救我，把我保出去呀……”曹营也没搭理他，转身取道上了梁。武工队把李万仓带到扁石尖子山的后沟，绑在一棵大树上，对他进行了



此洞位于建昌县魏家岭乡山湾子村二道沟上沟的山坡上。当地群众称此洞为蛇蝎洞。洞高2.5米、深6米，宽4米。1943年至1945年齐英率岭上武工队经常在这里住宿。

严肃的审问，然后齐英代表人民宣布对他处以极刑。三班长朝这个衣冠禽兽猛刺几刀，又“啪啪啪”补了3枪，结束了这条狗命。

这次战斗，武工队一举捣毁了盆子窑“部落”，火烧了警防所，除掉了地头蛇，活捉了十几名俘虏，又缴获大枪12支(另一支不知被谁扔到井里，过后淘井时捞上来也交给了游击队)，手枪1支，弹药一部分，给盆子窑“部落”的反动武装几乎来了个连窝端，而武工队自己却不伤一兵一卒，未失一刀一枪。

三、重返岭上战斗

1945年1月，中共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冀热辽区党委于二月做出《关于热辽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同年4月重新调整机构和区划。撤销了凌绥青联合县，重新成立了几个联合县。并派齐英重新组成一个30多人的武装工作队。

1945年5月中旬，齐英带领他的新老战友，从抚宁县麻官营出发，经过峪阳口出关，几天急行军，又重新返回离别10个月的战斗故地——岭上后槽沟。武工队员想起那些血洒在建凌大地上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想起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武工队的抗日积极分子，有的人至今仍在日伪的监狱中坐牢，他们的心情分外激动。他们立即来到了抗日堡垒户中间，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那些坚决抗日的群众像传送喜讯一样，暗暗地传递着“郝队长又带人回来了”的信息。齐英同志又设法找到了去年牺牲的武工队员杨守环的弟弟杨贵林及其老母，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和资助。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齐英和同志们共同商量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战斗方案，把敌后抗战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军民同心　抗日救国

1943年秋,由周治国、周哲民率领的锦热边远征工作队及承平宁联合县部分工作人员和郑紫明同志率领三区队部分干部战士先后进入建平北部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与建平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军民并肩战斗,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治国等来到建平后,每到一村都首先封锁消息和交通要道,以防走漏风声,进而了解敌情、地形和居民情况。先找该村拥护抗日,而且起带头作用的群众,然后争取和瓦解伪职人员,让他们"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抗日坚决的就吸收为工作联络员,通过他们召集群众会。每次会上,他们都讲:"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专门打日本的。日本必败,我们必胜。"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国内外形势。为了让大多数群众早日醒悟,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周治国等几名同志在1944年2、3月间,通过争取过来的深井子伪村公所的职员,秘密翻印若干张抗日传单,分头张贴,以示民众。仅从朝阳至建平的沿途村镇就张贴了33张《告东北同胞书》和宣传标语。《告东北同胞书》的内容是这样的:"东北的同胞们,你们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不愿当亡国奴的东北同胞们,团结起来,我们八路军已派人到那边与你们联系,希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唤起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工作。不久,我们的军队即可打到你们的家乡,使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在方圆约200华里的地区同时出现标语和传单,不仅把敌人吓破了胆,使之不知过来多少八路军,而且对日益觉悟的广大群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日本帝国主义对人民统治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广大人

民群众盼望八路军早日来解放他们。见到标语，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军队快要到来，从而更加坚定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总结前段工作，布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进一步把抗日救国活动引向深入，周治国等同志于 1944 年 1 月 29 日在哈汤沟独居的蒋老八家邀请了各阶层人士吃饭。应邀的有王洛地屯谢振锋，傅家台子屯傅连山，姜家湾子姜茂林(伪甲长)，哈汤沟张振奎(伪甲长)，喇嘛沟屯李文甲，和尚地屯管俊生、管彦士，仓子屯王化忠，建昌沟屯潘兴，闹羊沟屯魏子兴，西南窝铺段凤春、段凤起、独分子沟屯张瑞轩、张瑞廷，新城地屯尚举，共 15 人。饭后，周治国说："我们来到建平时间虽然短，大家对我们的抗日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很大支持，为了我们的安全，你们担惊受怕，一有敌情，你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通风报信，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此，我代表全体工作队员向你们表示感谢！今天把大家请来，略表谢意，还得麻烦你们回去后，动员群众做军鞋 200 双，准备粮食 50 石，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民族爱国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反满抗日游击活动，周治国等在开展活动上采取了"以亲引亲、以友引友"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对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不论民族、不论阶级出身，都取团结的态度，对伪官吏等也是以教育为主，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由于他们对群众赤诚相见，工作开展得比较快。独分子沟(现属青峰山乡)有个叫张瑞轩的 1932 年曾经在内蒙参加过抗日救国军。周治国知道后觉得这个人很关键，便于 1943 年腊月 26 日下午，同周哲民、李成邦、樊俊山同志一道，由段凤春、王化忠做向导，到张瑞轩家中做宣传动员工作。周治国对张瑞轩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抗日救国，保护老百姓的，眼下日本帝国主义横行霸道，民不聊生，但你们不能认为中国就亡到底了。中国有能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率领的大部队在关里打得鬼子望风而逃，共产党派李运昌司令员到热河搞抗

日救国工作。李司令员又派我们到围场、建平来开展工作。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炸,蹦达不了几天了.我们听段凤春、王化贵介绍,你们哥俩(张瑞轩、张瑞廷)好交好为,私官两方面都吃得开。想让你们今天晚上把深井伪警察分驻所长和伪村公所村长找来,我要和他们谈谈反满抗日的问题。你们这个屯子四面环山,周围沟岔多又有树木,是一个既安全又方便工作的地方。"张瑞轩听后便和他三弟张瑞廷商量,决定先找村长陈忠宇(陈和张瑞廷是叔伯连襟)。然后再报警察所长杨松田。就这样,在当天夜间,张瑞廷徒步到深井找到了陈、杨二人。陈、杨二人得知八路军找他们时,感到非常惊讶,于是硬着头皮,带两名随员,连夜赶到张瑞轩家。周治国和他们见面后,单刀直入阐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周治国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奉李运昌司令员之命来建平开展抗日救国游击活动。开辟解放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咱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应该有民族气节。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来开展这个活动,如有满洲军、宪兵队、讨伐队出动,你们就设法通知我们。另外,如能搞到建平、热河省地图给我弄一张。"他们沉思了一下,表示听八路军的话,愿为抗日救国出力,谈完后,他们连夜返回深井伪满村公所。

第二天,周治国又在张瑞轩的协助下召集独分子沟下营子6户群众开会。周治国在会上阐述了八路军的政策。同时规定了以三击掌作为联系活动暗号,即:击一下表示有生人,击二下表示有敌人,击三下表示平安无事。时隔两天,深井村伪村长陈忠宇派人送来一张建平地图,还附有一封信,让张瑞轩转给周治国。以后北四家子宋甲长弄到一张热河省地图也交给了周治国。在张瑞轩协助下,工作队还争取了一些当地的伪官吏,使他们变成了"两面"工作人员。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工作队在叶柏寿以北的方圆200里的范围内交了许多忠实可靠的朋友,为下一步继续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44 年 3 月工作队还派人到朝阳县石明信沟拜访了坚持反满抗日的王老凿。对死心塌地的汉奸，工作队也进行了重点打击。如处决汉奸王殿丰，对敌伪人员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1943 年 12 月，平庄伪骑公署监督尉管向衡(原名管文焕)乘火车回和尚地探亲。在沙海车站下车，行至汤沟梁与周治国等同志相遇，被抓住，带到工作队队部。周治国耐心向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育他要热爱祖国，改邪归正，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能死心塌地当亡国奴、汉奸。管受教育后，表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为抗日出力。管被放回不久，周治国带领一部分同志到和尚地开展工作，管向衡主动找他们，并送来一张地图。

1944 年 3 月初，我八路军 200 多人，从小塘到石匠沟经叩勿素去长皋。八路军走后，为了蒙骗日本特务，派周治国争取过来的伪牌长尹殿祥去东丰太警察分驻所假报军情——说有 10 多名八路军从此经过。与此同时，汉奸王殿丰也向日寇密告我军真实情况。日本特务股长板护对尹殿样产生怀疑，派人逮捕了尹殿祥，说他私通八路虚报军情。并于当天下午把尹殿祥押到沙海东河套，要杀头示众。当地群众 50 多人赶到现场，强烈要求特务头子板护释放尹殿祥。日寇拒绝群众要求，正准备对尹殿祥动手时，伪旗公署警务科监督警尉管向衡来到现场，他用日语和日本特务板护说了一气，使尹殿祥得到释放。

1944 年 4 、5 月间，周治国带领 17 名八路军战士到愁水坑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住在柴国庆家，受到柴家热情接待，他们在柴家召开了 30 多人的全村会议，宣传、发动群众起来反满抗日。因为走漏了消息，一天下午，日伪讨伐队在愁水坑潘某的带领下，包围了整个村子。周治国同志立即把队伍集合好，由柴国庆带路，顺着西沟到长满茂密榛柴的西山隐蔽起来。敌人满以为有把握抓到八路军，不想落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气急败坏的敌人，恼羞成怒，把

柴国庆的父亲柴海捆绑起来。用镐把、马棒逼他供出八路军的人数和下落。面对豺狼一样的讨伐队和丑恶的潘某，柴海耳边响起了周治国的声音：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绝不能听从日本人的摆布，让日本人在我们国土上胡作非为……于是，他咬紧牙关，任凭敌人的毒打，一声不吭。敌人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也没得到一点情况，便把他拴到马脖子上出村追赶我军。当敌人追到西沟里时，周治国在柴国庆的引导下，带着队伍安全转移了。

周治国等人在建平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时，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一有空闲时间，就教唱抗日歌曲。他所到之处，大人、小孩都能学会一些激发抗日斗志的歌曲。这富有政治色彩的歌曲在当时起到了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进行抗日的积极作用。至今，当地一些老人，对此还记忆犹新。如富山乡的武珍开口就能唱出周治国教唱的歌曲。下面是他回忆的两首歌词：

(1) 打倒小日本

小日本呀心不公，一心要把中国征，该着人民有灾星呀，失落了东三省。

张少帅呀上南京，中央政府议军情，这才耽误了大事情呀，十月水蒸笼。

宋哲元呀大刀兵，芦沟桥上打冲锋，打死鬼子桥下扔呀，河水血染红。

蒋介石、殷汝耕，都是汉奸头一名，抓国兵呀要劳工，不用刀砍用枪崩，叫他自己去挖坑，埋他个倒栽葱。

有朱德呀毛泽东，二人组织八路兵，大兵发到北京城，大炮响咕冬。

(2) 棒子叶

棒子叶青又青，菜花开，开满墙，八路军真勇敢，扛机枪，上战场，机枪扫，手榴弹崩，崩死狗杂种。

1944 年 3 月 19 日中午，三区队副政委郑紫明率领 100 多名八

路军战士，由小塘的茶台沟来到东新地，与日伪满洲军遭遇，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敌人虽然被击溃，但我军连长丁贵、战士王喜贵、张惠民却负了伤。我军在道虎沟找到李文元、夏春发等七八个老乡，由他们把王喜贵、张惠民送到老窑甲长李凤久、郑连龙家，把重伤员丁贵抬到前沟安排在国玉林家里。当夏春发安排完走出国玉林家的大门时，碰上有100多人的伪满洲军讨伐队。有个叫姜振和的讨伐队员，边打听八路军的下落边往国玉林院里走。夏春发见势不妙，就对姜说，屋里是月房屋，不能进去。讨伐队才转头向营子走去。进营子挨户搜查一气，也没见到八路军的一个人影，只好集合队伍离去。

第二天清晨，讨伐队又来道虎沟搜查。李文元等知道消息后又偷偷地将丁贵转移到南沟隐蔽起来。讨伐队走后，李文元便拿着点心和热饭汤给丁贵送去。之后，冷兰和李文元又商量把丁贵抬回村里，安排在下树林子李堂家医治。李文元还叫人把小窑子医生李泽斌(李文元父)请来给丁治疗。没等李医生弄来药，伤势很重的丁贵就离开了人间。丁贵牺牲后，李文元找几个人，把丁贵的遗体抬至大南洼，放在准备好的木板上，上面又盖一层木板，然后用石头筑起一座烈士墓。同年4月18日，周治国为了纪念烈士，亲自到道虎沟发动群众给丁贵做了棺材，将烈士遗体重新择地进行埋葬。参加埋葬的群众，向烈士庄严致祭，决心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以慰烈士英灵。

李凤久为了两名伤员的安全，当天半夜找人用毛驴把王喜贵和张惠民从三家送到兴隆山郑秀春家护理。他回家和父亲商量后又带上李泽斌配制的治伤药和新买的26尺青布，送到郑家。给伤员先上好药，又让郑用新买的布做两套农民衣服，给伤员穿上。以后，李凤久就经常给伤员送药。7天后，他又将伤员转到东沟司振利家。第二天晚上日本人大仓带着100多满洲军的马队，经过小窑子去兴隆山，被李凤久看见，于是李又把伤员送回陈宝山家，就这

样为了安全，先后转移伤员五六次。

一天，两名伤员正在司振利家养伤，王明珠带着30多名满洲军突然来到司振利家搜查，由于司振利事先把两名伤员藏在草垛里，才免遭不幸。以后，李凤久又把伤员送到三家西梁丰占元、丰国贤家。经过100多天的精心治疗，王喜贵、张惠民两名伤员恢复了健康。正当他俩急着要回部队，李凤久给弄好两张证明书，并准备好100元钱做路费时，周治国亲自来接两名同志归队。

1944年4月下旬，日本鬼子集中了日伪讨伐队500多人在建平各地“围剿”八路军，他们分成两队，一队假称八路军，穿着破烂衣服走到前头。每到一处就跳墙钻院，见人就鬼鬼祟祟说：“我们是八路军，后面有讨伐队追我们，你们家若有八路军，快叫他跟我们跑，一会讨伐队就来了！”另一队在后边跟着张牙舞爪，佯作追赶前边的“八路军”。一天深井村伪村长陈忠宇得知由朱碌科、榆树林子方面来了一些宪兵队、讨伐队搜查八路军，就派人通知张瑞轩转告周治国，周治国得消息后，立即转移到山上隐蔽起来。

敌人的反动伎俩很快被日益觉悟的广大群众所识破，日寇宪兵队恼羞成怒，凶相毕露。他们找不到八路军的踪影，就拿群众出气。他们刺伤了仓子屯的王化民，砸断了平房东沟陈子生的脚脖子，毒打了建昌沟的李茂春，并把上前说情的李母的乳房穿了个透眼。对日寇的罪恶行径，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不但没有在日寇屠刀面前畏惧，反而更增强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1944年6月29日拂晓，满洲军四十四团骑兵八连12个骑兵，突然到独分子沟将张瑞廷逮捕，带到张家窝铺张振芳家，逼着他供出八路军的下落。张瑞廷不说，敌人就使用灌凉水、夹筷子等酷刑。最后又把他带到东丰太警察分驻所交给日本鬼子重审。尽管严刑用尽，丝毫没能动摇他保护我党抗日干部的决心。第二天从天义又来了一个日本宪兵队长，亲自对张瑞廷进行审讯。从早8点一直审到下午5点，敌人往他手指缝里夹子弹、别木棍。用尽了残酷毒辣

的手段，仍动摇不了张瑞廷，诡计多端的日本宪兵队长一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掏出香烟笑嘻嘻地递过去，并甜言蜜语地对张瑞廷说："要在一个月内抓到周治国，赏给5000块大洋；愿意当官也行，任你选。"但遭到张瑞廷拒绝。敌人见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概无效，便以为他参加了八路军，于是，第三天把他带到凌源、黄岱等地，让群众辨认是不是八路军。所到之处，群众皆称不认识，敌人只好把他带回东丰太释放回家。

群英奋起毙顽敌

1945 年 8 月上旬，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周治国和三区队队长高桥，带队伍 120 多人，到五区盘道梁一带活动。五区区长李惠民和区小队长李青山带区小队共 20 人，从喇嘛洞出发，走了 30 多里，去盘道梁向他们汇报工作。8 月 15 日，部队的哨兵发现有敌军向我驻地袭来。敌人是平泉县日本宪兵队长仁科带日军和伪军共 140 多人来扫荡，妄图一举吃掉我们。县、区的领导同志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采取了敌进我退的办法，走小路，钻山沟，撤向宁城驿马吐一带。但敌人紧紧咬住我们，尾随不放。面对敌人，李惠民同高桥经过商量，一致认为，我们对裂山沟一带人熟、地熟还是要回到那里去，对我们有利。这样，绕了个 200 多里的大圈子，经过 3 天的时间，又回到了裂山沟。可是还没摆脱敌人，情况却更加险恶，不仅地下有敌人尾追，天上还有敌机，一面侦察，一面俯冲扫射，有一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了。战友的牺牲，更加激起了三区队队员对敌人的仇恨。高桥的部队从裂山沟的大沟里又迂回到盘道梁一带，来到了和盘道梁“连脊”的帽子山。这里两山夹一沟，山高沟窄，敌机施展不开，它也就没有办法了。高桥到达帽子山，已是一天上午的 10 点左右钟，正是盛夏季节，骄阳似火，晒的人大汗淋漓。高桥、周治国和李惠民在帽子山顶开会研究歼敌作战方案。高桥无论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也总是情绪饱满，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他幽默地对李惠民说：“李区长，我们和敌人在你管辖的地面，转了几天圈子，对敌人的人数、装备和他们那两下子都清楚了，这回得研究一下怎么收拾他们了！”八路军整天东走西转，饭不应时，成年累月睡不上个囫囵觉。这几天的迂回虽然艰辛，对八路军

来说还无所谓。可是对于敌人来说，就不然了，已经把他们拖够呛了，该到收拾他们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在山顶上，居高临下，极目望去，帽子山和盘道梁连结，南北走向，上边是山，下边是沟，绵延30多里，而且基本上都是两行平列的山梁并行，两山夹一沟，地形十分险要。根据地形，周治国、高桥和李惠民制订了一个消灭强敌的战斗方案：日伪军追击三区队必然从帽子山的下段西南山口进来，于是将队伍每5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埋伏在帽子山沟两边的山坡上，借梯田和庄稼隐蔽，组成向下俯射的火力包围圈后，出其不意，打他一个冷不防，必致顽敌于死命。为了节省子弹，准确地杀伤敌人，大家议定以高桥队长的枪声为令。



八路军武工队战斗在崇山峻岭之中。

当这个战斗方案向战士们部署后，战士们高兴地说这个办法高。可有些战士又觉得自己的子弹少，怕杀敌时使不足劲、解不了恨。正在这时，五区的地下交通员马玉堂，把寄存在他家的200粒大枪子弹及时的送到前线。群众对我军的支援更加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战士们趴在梯田埂上，藏在庄稼棵子里，石头热的烫人，地里风丝不透，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心急火燎，口干舌燥。大家从上午11点钟进入阵地，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钟，还不见动静，虽然又渴又饿，可是大家谁也不吭声，双双眼睛都在盯着山口和沟膛。下午3点钟左右，由远而近的人喊马嘶声打破了山沟里的静寂，敌人露头了。前边是伪军，后边是日军，他们自恃人强马壮枪炮多，大模大

样地进了沟，钻进了包围圈。日军队伍中有一匹高头大马，是伪平泉协和会长任科骑在马上挎着“王八盒子”手枪，带着战刀，十分骄横，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敌人离得越来越近了，“叭”的一声，高桥队长的枪朝任科方向打去。顷刻间大枪、机枪、手榴弹，象雨点一样向敌人射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把敌人惊呆了，当他们举枪还击时，三区队的枪声更加密集。敌人妄图抢上山坡占据制高点，扭转在沟膛低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三区队紧紧抓住有利战机，向敌发起了冲锋。“同志们，冲啊，杀呀，向日寇讨还血债！”枪声，喊杀声，震荡着整个山谷，发出了强烈的回声。仁科骑的马受惊后，飞起两个前蹄，发出惊恐的嘶鸣。三区队和区小队的战士们向这个明显目标一齐发射，任科被击中落马。敌人看到他们的主子被击毙，慌慌如丧家之犬，狼狈逃窜。整个战斗只用 40 多分钟的时间即告结束。在战斗中，我部无一伤亡，毙敌 10 多人，其中日军 8 人。缴获敌枪支 10 多支和部分子弹。在打扫战场时，战士特别看了仁科的狼狈样，这个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头部和胸部各中一弹，直挺挺地倒在那里，鲜血流了一地。战士们扒下了任科的牛皮大马靴，做成了枪套和皮兜子，以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

草篓沟人民的抗日斗争

凌源县大王杖子乡草篓沟村位于凌源县的西南郊，这里两山蜿蜒、沟壑纵横。抗日战争时期我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第五区党政人员在这里领导人民群众和日伪军警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用他们的鲜血描绘了英勇悲壮的历史篇章。

结识八路军，参加抗日组织。祖国光复前，在草篓沟村的小东沟里住有陈国瑞等两户人家。陈国瑞为求生计，从 19 岁开始往返于刀尔登、松岭子、三十家子、宋杖子、榆树林子之间，贩卖土布、大烟土、牲畜等，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特别熟悉。1941 年秋的一天，陈国瑞赶集和郭敏同住在刀尔登的岳济生小店里，两人攀谈彼此相识。以后郭敏提出和陈国瑞一起做买卖，并几次到陈国瑞的家，但未暴露真实身份。1943 年 6 月，郭敏领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第五区(区政府设在三十家子喇嘛洞)区长李惠友和区主任常野到陈国瑞家。李惠友问陈国瑞："你认识八路军吗？"陈国瑞说："不认识！"李惠友说："我们是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抗日队伍，东北父老兄弟姐妹正遭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压迫，我们要挺起胸来抗日救国，抗日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李惠友接着又鼓励他说："你别怕死，死了还有人给你报仇，只要我们给人民群众做点好事，会给后人留下个好名。"陈国瑞听了区长李惠友的至理之言，欣然同意参加抗日组织。以后，他的家成了堡垒户。

接受党的任务，成立抗日组织。1943 年 6 月中旬，常野和李惠友向陈国瑞部署工作："你要扩大抗日组织，选择 7 到 9 个忠实可靠、不投敌、不变节、决心拯救东北人民打日本鬼子的人，奋起抗日……"经过陈国瑞的积极动员，将黄家沟的陈福荣、水泉沟的张

作武、贾杖子的孟广苓、王勤和孟广儒、帽子山的刘勤等人组织起来。这些人大都是有志青年,很有民族气节。如孟广儒在民国时期任过松岭子自治局长。日本侵略者占领凌源后,他毅然弃官回家,以教私塾为生。一天夜里,常野、李惠友在贾杖子北沟的马鞍子山给这些人开会,常野讲了话。大家表示:不论是谁被捕,都不能暴露抗日组织,任何时候也不投敌变节,只要人不死就一定革命到底。会后,李惠友给大家部署了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并指派陈国瑞为联络员随时勾通情况。这样,草篓沟村的抗日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并随即投入了频繁的抗日活动之中。

巧妙设计谋,掩护八路军。1943 年夏的一天晚上,常野到了小东沟,住在陈国瑞家。第二天一大早,陈国瑞的媳妇薄锡芹起床做饭,开门去抱烧柴时,发现前山有 200 多日伪警备队,便转身到屋内告诉了陈国瑞,陈马上到东屋告诉了常野。情况万分危急。常野问:“怎么办?”陈国瑞媳妇说:“不要怕!把你用被盖好,蒙上头,来人搜查就说是我娘家叔叔,到这里病倒在这儿了!”常野主任躺在炕上,长苗撸子压在枕头底下,枪缰绳露在外边,她就将枪拿到外屋扔进泔水缸里,然后沉着冷静地去做饭。

一会儿,敌人进到陈国瑞家,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一个伪警察问:“炕上躺的是谁?”薄锡芹说:“是薄杖子我娘家叔,来到这儿病了,已经两天多一点饭也没吃了。”这个伪警备队员上前揭开被子,拔拉一下常野的脑袋,常野没动,也没睁眼,伪警备队员也没再继续追问。敌人没搜出什么,扫兴地走了。

为了确保我地下工作者的生命安全,陈国瑞在东房山墙后紧靠山根的二楞台上挖了一个五六尺深有半间房子大小的地窖,靠南边的坝墙子留有透气孔通气,透气孔还可以作观察用。窖内用木板搭一张床,铺些茅草供我地下工作人员休息,只要一有情况,便可随时进去隐蔽。窖上留有一个小门,平时用柴禾堵上(现在还存有残迹),地窖十分隐蔽,是我地下工作者隐蔽藏身的好地方。

深入虎穴，教育伪警。1943年6月中上旬，常野、李惠友几次带陈国瑞、张作武、王勤、孟广荃、孟广儒、刘勤、陈福荣等人去宋杖子车站，到列车乘警王克兴和宋杖子警察分驻所苗所长家去做策反教育工作。教育他们不要效忠日寇、与人民为敌，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伪警察所苗所长被教育后，不久连吓带病死去了。接任分驻所的胡所长也被常野和李惠友带人教育过。被教育后表现很好，在张野溪游击队袭击宋杖子车站时，为游击队消灭马昶提供了方便。

1943年8月中旬，常野带领陈国瑞、孟广冬、刘勤、张作武等人从草婆沟出发，根据事先得到的情报去三十家子东梁，将从头道沟回三十家子伪警察署的罪恶多端的伪警长尚文忠抓住，押到贾杖子西北山的滴水洞关押了11天。经教育后，将其手枪留下释放他。后来，尚文忠被敌人内部处死。

捉拿韩家犬，营救被捕人。新房子大地主老韩家哥五个，老大韩凤荣是个恶霸，在三十家子西老爷庙当掌柜的，老二韩凤林是大王杖子伪自卫团长，老三韩凤祥在三十家子开杂货铺，老四韩凤歧平时无恶不做，老五韩凤权是韩家大当家的。这5人效忠日寇，与人民为敌，对八路军更是恨之入骨。常野、李惠友多次教育他们改恶从善，他们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多次向特务告密，追捕常野、李惠友等我党政人员。1944年1月，李惠友率领乔四等10多人在草婆沟活动，住在韩友家，由于韩凤荣家告密，被茶棚霍部队的特务发现，双方打了一仗。第二天韩友家的房子被霍部队给烧掉了。

1944年4月的一天夜里，常野、李惠友乘韩家五子给其母祝寿之机，率领陈国瑞、张作武、孟广儒、孟广荃、刘勤、陈福荣等人直奔新房子韩家大院，捉拿韩家五子进行教育。由于敌人狡猾，结果只抓住了韩凤林，其余哥四个从后墙逃走。

李惠友等将韩凤林抓住后，绑在大石龙山石砬根的大树上对其进行教育，并令其交出1只手枪和2000元伪币后，经人做保放回。韩凤林被放回后的第3天，茶棚霍部队200多人包围了草婆沟

一带。霍部从天主山和帽子山搜查过来，将张作武、刘勤、王会，陈宗明、陈福荣搜出抓走。由于常野、李惠友、陈国瑞、孟广儒、孟广荃、刘勤及时撤离才幸免被抓。

霍部队把抓到的5人带到冯杖子进行毒打，追问常野、李惠友等人的下落。他们始终不供，气得敌人暴跳如雷，竟将王勤倒栽在泔水缸里泡淹，但王勤仍守口如瓶不供丝毫线索。敌人万般无奈只好将5人带回茶棚进行关押。张作武被敌人用火筷子将身上、脸上烙得遍体鳞伤，肋骨用枪刺给刮掉了肉；陈宗明被用辣椒面掺火油浸灌得脑袋脱了一层皮。常野和李惠友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全力营救，终于在这些人被关押一个月零两天之后被保释回家。王会经过毒打回家后不几天就死去了。此后日本宪兵队和霍部队又对草篓沟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带走30多人，在茶棚关押9天后才放回。

抗日群众被捕，革命浩气长存。1944年，日伪搞集家并村，从郭家沟以南直到帽子山、水泉沟的几个村子都并到新房子，由韩风权当部落长。由于敌人大面积制造“无人区”，我地工人员活动受到了限制，奉上级命令，五区干部战士暂时撤入关内。随着集家并村的推行，韩家五个恶霸和日伪统治者勾结起来对抗日群众进行更为疯狂的反扑。同年9月下旬，水泉车站的伪警备队和警察分驻所派人到草篓沟小东沟抓走陈宗明，送往建昌警务科，10月12陈被折磨而死，时年49岁。几天后，孟广儒又被敌人从新房子围子抓到承德，7天后也被折磨致死，终年46岁。日本人紧接着又带领水泉车站伪警备队将27岁的王勤从围子中捕去，送往承德处死。9月初敌人又从围子中将孟广荃、孟广儒捕到叶柏寿，2人也被折磨丧生。遇害时，孟广荃30多岁，孟广儒50多岁。张作武、陈福荣也被抓往承德，被关押了20多天后才放了回来，张作武回家没到10天就去世了。陈福荣被折磨成病，回家养了2年多也与世长辞了。刘勤、陈国瑞分别流落到内蒙和大石桥躲避才幸免一死，其余与抗日活动有关的人员全部遇难，为抗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夜袭宋杖子火车站

承平宁办事处所辖的五六区开辟不久，连续发生了几件怪事。第一件怪事是，八路军五、六区基干队接连3次秘密行动都被敌人发现了。头一次是一天夜间，基干队从凌源西南开过来，在魏杖子一带沿铁路走了一段，然后又直奔三十家子的喇嘛洞。赶到目的地时，天还没亮。为了不打扰老百姓，基干队队长张野溪就把队伍隐蔽在喇嘛洞的山上，打算天亮再叫门。没等到天亮，却发现顺着铁路从凌源和杨树岭两个方向开过来三四辆“毛斯嘎”(铁路上载人的小车，也叫轱辘马子)，电灯明晃晃的，上面坐着全副武装的铁路警务队。为什么几个车站的敌人在夜间一齐出动了呢?这说明基干队的行动暴露了。第二次基干队是从刘杖子西边开过来，钻林子，打算经桦子炉、赵杖子，直奔狐狸山。刚过青龙河，就看见敌人又坐着“毛斯嘎”来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基干队悄悄地从原线撤了回去。第三次基干队是从宁城县的朝宝沟出发，来到平泉县的草袋子沟、于杖子一带活动。不到半天，敌人就寻踪觅迹追上来了。更令人奇怪的是，这里是大山沟儿，离铁路20来里，本不属铁路管辖，谁知开来的却是铁路警务队。连续几次暴露目标，使张野溪的脑袋里划起了问号：每逢到凌源以西铁路两侧活动，虽然格外注意隐蔽，却总是基干队前脚刚到，敌人后脚就追了上来。他们也没有“千里眼”和“顺风耳”，消息怎么这样灵通呢?

第二件怪事出在宋杖子车站警务队。基干队暴露目标后，堵截和尾追的敌人，哪次也少不了宋杖子车站警务队，而且总是最先出动。那次去草袋子沟、于杖子讨伐基干队的，也是宋杖子车站警务队。这还不算，敌人每次出动回来后，几个车站的“毛斯嘎”总要开

到宋杖子车站，而且人总是跳下车，到警务队的屋子里聚一小会儿，看样子好象是碰碰头、开个会。这些蛛丝马迹引起了基干队的注意：宋杖子车站警务队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联络点？这里是不是驻有敌人的头面人物？

为了彻底弄清这些情况，张野溪派三班长去宋杖子一带侦察。他出去七八天之后赶回驻地汇报，结果又发现了两件怪事。

一件出在日本鬼子马昶身上。这家伙40岁左右，名义上是宋杖子车站警务队长，实际上来头却很不一般，他与别的鬼子不一样，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不但汉语说得很流利，而且深知中国的民情风俗。作为一个军人，他有时穿警服，但更多的时候则穿便衣。平时不管对谁，总是摆出一副平易近人、和气温顺的面孔。谁要求到头上，他都尽力帮忙。比方说，当时火柴、煤油、食盐等实行配给，谁要缺了这几样东西，找他开个条子，马上就能买到手。另外，他替人办事后从来不收礼，给他送大烟、塞票子，他一概不要。如果送筐鸡蛋什么的，他就留下来，却总是让老婆给装点火柴、烟卷、糖果之类的东西带回来，算计一下比那些鸡蛋还值钱。更为奇怪的是，他家供奉着观音菩萨，可他早不拜，晚不拜，一看有人来了，才跪在那里烧香叩头，俨然象一个虔诚的宗教徒。由于这样，附近许多群众都说他心眼儿好，不欺负中国人。一个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而且还是车站警务队的队长，为什么这么仁慈善良？这种仁慈的后面究竟包藏着什么祸心？这个鬼子的所作所为真是有点怪。

另一件怪事出在一个铁路工人身上。宋杖子车站有个巡道工，平时经常给马昶家挑水、劈柴或做其它零活儿，可以出入他家，看样子很得男女鬼子的信任。可是他出去巡道时，却不负责任，往往出站不远就到路边去走，根本不认真检查铁轨和枕木。说他不效忠日本鬼子吧，他却很得马昶的信任。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连续遇到了以上一系列怪事，基干队就开会分析研究，凌源以西铁路两侧，基干队来一回就挨敌人一回追，你往东他就往东，你

往西他也往西;顺铁路走被发现,不顺铁路走也被发现,根本不给你站脚之机。敌人的消息这么灵,说明他们肯定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十分有效的秘密情报网,而且肯定有高级特务在指挥。那么,这个高级特务是谁呢?敌人几次出动都有宋杖子警务队,他们每次出动回来后又总是在宋杖子车站聚齐,马昶虽然是这个车站的警务队长,却始终装扮出一副慈善的面孔。根据这一系列情况判断,这个特务头子十有八成就是马昶。如果这样判断确实不错的话,那么从这人很会耍手腕儿、干得十分隐蔽、巧妙来看,就很可能是个受过专门训练的高级特务。正判断不清时,张野溪收到了上级转来的一份伪宁城县警察署的情况通报,内容是通报表扬宋杖子车站警务队长马昶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所辖地区八路军的活动情况掌握得及时准确,连人员、枪支都一清二楚。张野溪一看,通报上说的人数和枪数,跟基干队的一点也不差。敌我双方的情报充分证明,宋杖子车站警务队确实是敌人的一个点、一只眼,日本鬼子马昶确实是一条咬人不露齿的恶狼。他坐阵宋杖子车站,指挥着一个秘密情报网,严密监视着我们的行动,对基干队开辟新区形成了很大障碍。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张野溪决定奇袭宋杖子车站,干掉马昶。这样,不但能使敌人的特务情报系统失灵,而且还能震动锦叶铁路沿线,对基干队开辟凌源、建平两地,实现将敌人的后方变成前方的战略目的将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基干队的干部战士对奇袭宋杖子车站的信心都很坚定,异口同声地说:“打”!

为了打好这一仗,张野溪决定和李班长一同去宋杖子侦察。前几天,基干队刚刚消灭了热河省警务厅的两个特务,缴获了两枚特务证。于是张野溪和李班长就模仿他俩的样子,腰里掖好枪,带好特务证,李班长扮成卖丝线的,张野溪扮成贩猪的,离开队伍驻扎的草袋子沟,穿村过店,一路吆喝生意,大摇大摆地直奔宋杖子。到了地方四外一瞧,虽说是6月天气,街上却冷冷清清,村里没有驻军,只有个警察分驻所,仔细侦察一番,并无异常情况。到村公所门

前，出来进去的也没人搭理他们。看看村里没有什么动静，张野溪等就出了村南，径直朝车站警务队奔去。走了半里多路就到了，看见门口有个警察站岗，两手抱着枪，没精打彩的。绕到院子后面一看，墙外拴着一条狼狗，离老远就竖起两只耳朵，恶狠狠地瞪着张野溪等。看了车站和附近的地形，对究竟怎么包围，从哪下手，张野溪心里初步有了底。为了进一步摸清警务队人员武器情况，张野溪和三班长商量决定找车站那个巡道工谈谈。根据上次侦察的结果，判断他这时候正在高杖子村。于是张野溪就钻进铁路旁边的一块高粱地，隐蔽起来耐心地等他。

这时高粱还长得不太高，蹲在地里一伸脖子就能看到外面的情景。约摸等了半个时辰，就看见那个巡道工背着兜子，扛着镐头，大摇大摆地出了高杖子村，不一会儿就上了铁路，然而却不在路心走，嘴里哼着小调儿，漫不经心地在铁轨一边儿的小道儿上晃荡。当他走到张野溪隐蔽的高粱地旁时，张野溪看看四外没有别人，就忽地从地里站起来，朝他小声喊："老乡，你下来，我们跟你说儿句话"！看到高粱地冒出两个人来，他倒没害怕，顺着路坡下来就进了高粱地。张野溪等 3 个人顺着垄沟坐下，还没等我开口，他却抢先问道："同志，你们二位叫我做什么？"

张野溪一听好奇怪，不生不熟的，无缘无故怎么开口就叫同志？莫不是看出了我们的什么破绽？为了弄清他的底细，张野溪猛地从腰里掏出"二十响"，用枪口对准他的胸口说："找你来做什么？是要你的命！"

他听了丝毫没有惊慌之色，十分坦然地说："你说的不是真心话，你们不是要我的命，而是要马昶的命！"

听他道破了张野溪等的秘密，心里一惊，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名字我不能告诉你。我绰号叫'大老黑'，宋杖子一带的人都知道，你们就叫我'大老黑'吧，我是车站上的巡道工。"

张野溪说:“你也不象个巡道工啊?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回答说:“你也不用细问,问我也不告诉你,有啥事就说吧。你们不是为马昶来的吗?我猜得出来,因为这是公开的秘密。你们在喇嘛洞、桦子炉、于杖子挨追,这些事谁不知道?你们需要啥情况我都告诉你,咱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

听了他这番话,张野溪才收起了枪,心里想:这个“大老黑”,可能是关内派出来秘密开展工作的同志,因为属单线联系,所以不能吐露真情。想到这儿张野溪便说:“这么说,我们真的是同志了。那你就把马昶和宋杖子车站警务队的情况详细介绍一下吧!”

“大老黑”也没推辞,详详细细地向张野溪介绍起来。马昶名义上是车站警务队长,实际上是锦州铁路局派来的高级特务。凌源和平泉的警务团长到这里来,他也从来没出门接过。可他去凌源办事宪兵队长得派小汽车上站去接。他手下养着两三个便衣特务,同时又在铁路沿线建立了“爱护村”和侦缉队等组织,耳目相当灵通。你们的队伍从魏杖子一上铁路,侦缉队就报告了水泉车站,水泉车站又报告他,于是他就往各处挂电话,不一会儿,凌源、杨树岭等车站的“毛斯嘎”就都开出来了。“大老黑”还说,宋杖子车站警务队员不到 30 人,武器都是大枪。原来有一挺机枪,前几天调到叶柏寿去了。车站上只有马昶和他老婆是日本鬼子,他家和警务队之间有地道相通。

听完“大老黑”的介绍,张野溪说:“你提供的情况很好,你能不能给我们画个草图?”他说行。不大一会儿就在张野溪给他的一张旧纸上把警务队的地形图画了出来,哪儿有电话,哪儿有炮眼,哪儿是马昶家,哪儿是地道,画得清清楚楚。画完后他便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张野溪回答说:“打算明天晚上,你看怎么样?”

他说:“行,要打也得半夜 12 点以后,等锦州到承德的那辆票车开过去。”

临分手时,张野溪问他:“明晚你能不能接应我们一下?”

他说:“行。”张野溪定准第二天晚上11点以前在高粱地里碰头,不见不散,然后就分手了。

走在路上张野溪心里寻思:这个“大老黑”听口音是丰润县人,但他究竟是不是关里派来的同志?他提供的情报究竟是不是可靠?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张野溪回到草袋子沟驻地后,就连夜开拔40里,把队伍转移到了宁城境内的朝宝沟。当张野溪和三班长把侦察来的情况向队里的干部们汇报以后,大家研究再三,一致认为这一仗应该打。但敌方有30多人,张野溪只有40余人,如果抽出一部分力量在车站东西两端的铁路桥头阻击打援,攻击的力量就显得不足了。大家正为此事犯愁时,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三区队的二中队开过来了,在离张野溪十里的村子宿了营。张野溪一听喜出望外,吩咐通讯员马上请来二中队的指导员王梦聪和队长纪洪恩,经商议都同意打这一仗。这样,两支部队合在一起80多人,力量就足够用了。张野溪最后商定由二中队抽出两个班阻击,其余的在车站外设置包围圈,由张野溪带领基干队的战士主攻。为了防止意外变故,张野溪又决定把行动推迟一天,派三班长按约定时间在宋杖子与‘大老黑’接头,如果情况没有变化,就告诉他行动时间推迟了,叫他次日再来接头。张野溪又叮嘱三班长说:“我们把队伍带到草袋子沟等你。明晚接完头后,就是再累你也得连夜赶回来报告情况,而且越快越好。”第二天夜间,基干队按计划到了草袋子沟。深夜两点钟,三班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情况没有变化,‘大老黑’9点多钟就到高粱地等着接头。”张野溪和二中队的领导交换了情况,马上命令:“出发!”那天张野溪和李班长去宋杖子侦察时,早就看好了一个去处——宋杖子西南角的山上有个山洞,洞很大,能藏百人左右。基干队的战士们一路急行军,在天亮之前及时赶到宋杖子山上,80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山洞里隐蔽起来,又派出了岗哨严密封锁消息。用带来的粮食在山上的两户老百姓

家做了饭,吃饱喝足养精蓄锐,只等夜间12点来个神兵天降,直捣日木特务马昶的老窝,打他个出其不意。

1943年7月19日的半夜时分,天上飘着浮云,地上朦朦胧胧的,对基干队夜袭有利。好容易盼到夜间11点,基干队按计划准时从山洞出发。二中队派出两个班,分别到二十里堡和高杖子桥头埋伏起来,以逸待劳,专打敌人的援兵。剩下的基干队同志,则无声无息地运动到了车站附近的高粱地准备进攻。基干队战士蹲在地里,瞪大眼睛盯着不远处的车站,屏住气息倾听四外的动静。到了12点,只见由锦州开往承德的客车到站了,不一会儿又长鸣一声,呼啸着开出站去。又过了五六分钟,下车的旅客都走净了,车站又归于一片沉寂。这时候,张野溪小声命令往下传话:"上"同志们马上按战斗方案悄悄地行动起来。二中队在外面设置包围圈;张野溪和一班长及通讯员3人杀院外的狼狗;二班长带3名战士去进攻马昶家,其余战士直扑警务队。张野溪和一班长、通讯员3人手拿洋刀,朝拴狗的地方匍匐前进,恐怕弄出动静,连大气也不敢喘。谁知那条狗很厉害,在快接近它时到底发现了张野溪,"汪汪"地叫了起来。张野溪心里一惊,手起刀落,一下子就把它的脑袋砍了下来。杀狗的任务完成了,张野溪命令一班长赶快检查一下各路的战斗准备情况,自己带着通讯员和几名战士径直朝警务队的门口扑去。到了门前伸手一摸是铁门,窗户外也上着钢筋,屋里点着灯。借灯光一看,马昶不在屋里,大多数警务队员都在鼾睡,只有一个50多岁的嘴唇上长着一抹黑胡子的老鬼子正在灯下收拾东西,看样子是刚下火车。根据情报得知,警务队根本没有此人,管他是谁,干掉再说!张野溪举起手中的"二十响","叭"地一枪就把他送回老家。第二枪响过,桌上的电话也应声开了花。听到枪响,正在做美梦的警务队员乱成一团,有的急着穿衣,有的忙着找枪,有的顾头不顾脸地找地方保命。屋里正热闹的时候,张野溪听马昶家传来一阵手榴弹爆炸声。原来二班长带着战士扑到马昶家时,这家伙刚从警务队

回来不久，听见战士们砸窗子，又听见外面枪响，就飞快地从床底下的地道口跳了下去。二班长他们破门而入，顺着黑糊糊的地道口朝里面扔了几颗手榴弹。那边手榴弹响过不一会儿，两个鬼子就从警务队的地道口钻出来了，第一个出来的是女鬼子，一手握着一颗香瓜手榴弹。听到有人往里打枪，她就把两颗手榴弹顺窗户使劲扔了出来，落在张野溪眼前，嗤嗤地冒着蓝火苗儿，趁它没有响的时候，张野溪飞快拣起一个扔回屋去，轰地一声爆炸了，屋里腾起了烟雾，随后传出女鬼子一阵凄厉的惨叫，张野溪刚要去拣女鬼子扔出的第二颗手榴弹，马昶又扔出来一颗，滴溜溜落在张野溪脚下。说时迟那时快，张野溪猫腰拾起随手扔出去，在窗外响了，谁也没炸着。当张野溪腾出手想去拣地下剩下的那颗手榴弹时，谁知它却“轰”地爆炸了。张野溪只觉臂部猛地受到一击，用手一摸，血顺着伤口流了出来，队里有两名战士也挂了花。张野溪轻轻活动一下，觉得骨头没折，伤不算重，也就没有声张。张野溪看见警务队里只有马昶一个人不停地往外打枪，那些警务队员抵抗并不积极，就命令战士们一面还击马昶，一面朝里面喊话：“同胞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放下武器，不要当铁杆儿汉奸！”“是中国人都躲到南面来，我们要朝北面扔手榴弹啦！”

趁战士们喊话的时机，张野溪走到警务队的西山墙，撕下一块衬衣想扎扎伤口。通讯员问：“怎么样？”张野溪小声说：“没关系，不许乱嚷！”通讯员二话没说，伸手就给张野溪包扎伤口。张野溪靠在山墙上，只听头顶上“哗啦”一响，一只大枪伸出来，叭叭开了几枪。好险，原来是敌人的一个秘密枪眼！张野溪的通讯员急了，抡起洋刀用力朝那只枪砍去，谁想一下子砍进大枪木把子里夹住了，刀拿不下来，枪也抽不回去。张野溪抓住这个时机，朝枪眼狠狠地打了一梭子，只听屋里“妈呀”一声惨叫，咕冬一声一个人倒了下去。

这时候，张野溪和一名战士用洋刀砍断了铁筋，顺窗子跳了进去。伪警察们吓得瑟瑟发抖，直喊马昶已经被打死了。那个战士仔

细一看3个鬼子都被炸得血肉模糊，确实已经命归西天，就从窗口把鬼子的武器扔了出来。因为警务队员全部放下了武器，因此基干队对他们的枪支一律没动，只是对其进行了训话教育。这时，袭击宋杖子车站消灭马昶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张野溪一看表，从开始进攻到结束战斗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车站上的枪声平息了，而车站东西两面又热闹起来。原来在桥头阻击的同志和敌人接上了头。从凌源方面开来的敌人援军，到二十里堡大桥就被二中队的同志堵住了，几枪车灯就被打灭了。敌人没有胆量过桥，只好把“毛斯嘎”停在桥头，往这边开机关枪。从老锅、三十家子方向赶来支援的铁路警务队，在高杖子桥头也中了基干队的埋伏，4辆“毛斯嘎”被基干队用横在铁轨上的大石头掀翻了两辆，另外两辆狼狈地逃了回去。基干队和二中队同志怀着胜利的喜悦，迅速撤出战斗，连夜急行军20余里，赶到平泉县的杨树底下村宿了营。

通过这次战斗，八路军基干队不仅消灭了3名日本鬼子，缴获了3支大枪，2支短枪，更主要的是打瞎了敌人的眼睛，打聋了敌人的耳朵，使基干队能够深入凌源铁路两侧的广大群众中去，如鱼得水，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因为此次战斗发生在铁路大动脉上，消灭的又是高级特务，当然就有力地震慑了敌人，扩大了影响。战斗胜利以后，北到叶柏寿、赤峰、锦州，南到平泉、承德和古北口铁路沿线的日本鬼子和警务队吓得惊慌不安，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喜笑颜开，奔走相告。

摧毁老达杖子伪警察分驻所

1942年10月的一个早晨,一支70多人的队伍,来到了凌源县河坎子东庄村。这是凌(源)绥(中)青(龙)联合县七区队马骥同志带领的队伍。部队到了老乡家,抄起扫帚就扫院子,拿起扁担就挑水,乡亲们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好队伍,连连称赞。

上午10点多钟,八路军召开群众大会,给大家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来听会的群众有80多人,部队的战士除了在四外放警戒哨的外,其余的50多人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由马骥队长讲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无数父老兄弟姐妹死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之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的领导核心,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全国人民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他还讲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众要帮助子弟兵了解情况,保守机密,必要的时候,还要给八路军带路、送信、做军鞋、送给养,支持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只有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

会后,乡亲们安排几家给八路军做了饭,做的新小米干饭、炖羊肉。饭后,天已经黑了,八路军集合队伍转移了。八路军来东庄以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东庄村的乡亲们积极给八路军做军鞋,支援前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42年11月20日晚上,马骥同志带领八路军110多人,来到了离东庄村3里地远的南台子村。当时全村有人家30户,家家都住上了八路军。部队进村后,行人只准进,不准出,四处都设了岗哨。第二天早饭后,有四五个八路军改穿了便衣,奔老达杖子(现属

建昌县)方向去了。在各户的战士很早就起来了,给乡亲们挑水扫院,还帮助做饭的大娘烧火,并向乡亲们宣传抗日道理。等那四五个便衣了解情况回来以后,吃过晚饭,部队在村东头集合。南台子的杨永宝、杨占一、杨占宽、杨永春、杨玉开、杨奎、杨明等7人,自告奋勇给八路军带路,有的人带着木匠干活使的手锯,以备完成八路军交给的任务。部队出村后奔东山口经过黄岩沟、大台岭向老达杖子方向进发。部队走到大台岭一边用锯锯倒通往老达杖子伪警察分驻所的电线杆子,一边隔一段距离放一组路卡,断绝行人。大伙七手八脚,紧张动作,很快锯倒20多根电线杆,并剪断了电线。夜间10点钟左右,部队就来到了老达杖子附近。八路军让带路的7个乡亲,隐蔽在山沟的沟岔里,告诉他们不要出来,等八路军打下分驻所再回家,以免在打仗中被流弹误伤。八路军在四面放好岗哨,其余人迅速散开,把老达杖子警察分驻所包围得水泄不通。这时伪警察还在院内睡大觉。八路军刚要开火攻打,忽然发现从范杖子村方面走来一个警察,被在外边埋伏的八路军抓住。八路军当即向他交待政策,让他叫开分驻所的大门,不许声张,否则就要受到严惩。他顺从地叫开了大门,八路军一拥而入,高喊:"中国人决不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缴枪不杀"。在炮楼里值勤的警察和睡梦中惊醒的警察,乖乖地交了枪。就这样,八路军一枪未发,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分驻所。俘伪警察8人,缴获大枪10支。八路军对伪警察进行了训话,警告他们以后不准给日本当走狗,欺压百姓,勒索民财。这次一律宽大处理,今后必须改恶为善,如要再干坏事,被八路军抓住,绝不轻饶。警察们连连点头,答应照办。八路军点火烧了敌人的炮楼和分驻所的房子,然后转移。

八路军摧毁了老达杖子分驻所,鼓舞了抗日群众,吓坏了日伪军和伪警察。不少群众传说,八路军来去无踪,多高城墙也挡不住他们,老达杖子警察分驻所的警察们,被飞来的天兵缴了械,下回要是再干坏事就来取他们的脑袋。

怒除汉奸沈朋林

1943年春季，日本侵略者为了割断我抗日军民的鱼水关系，围剿我抗日游击队，巩固其反动统治，对我山区人民实行了野蛮的集家并村。是年3月，日伪把建昌要路沟大英沟、小英沟、连同东沈台子、大龙腰子、天桥子、下坎子、万草沟、小东沟等8个村庄的房屋拆烧殆尽，将贫苦百姓全部赶进了娄杖子部落。尽管如此，仍未能割断群众同抗日部队的联系。他们不怕死，仍为八路军送鞋袜、运军粮、报送情报，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娄杖子部落长沈朋林，充当日寇走狗，破坏我抗日活动，侦察我方情报，屡次追截、扣留群众为抗日游击队送去的物资，死心塌地的为日寇效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3年冬季，我地下党员刘进元、李春方二人从后槽为八路军买来4驮子粮食，走到娄杖子附近时，被沈截住，将刘、李及粮驮子全部带到部落里。并对刘、李二人毒刑拷打，企图从刘、李口中得到我方情报。刘、李坚贞不屈、只字未露。沈恼羞成怒，要将刘、李二人以私通八路论罪送往要路沟警察署。多亏部落里的好多人说情，让刘、李给沈买了礼物，沈才把刘、李放走。但4驮粮食和毛驴被沈据为己有。

为了争取沈朋林，1943年冬末，我八路军马骥部队给沈写去一封信，邀他到河北干沟会面。沈接信后，连看都未看就将信撕毁烧掉，继续充当汉奸走狗。

1944年春，我八路军马骥部队第二次给其写信，警告他要悬崖勒马、痛改前非。沈不但将信烧毁，还大骂："几个臭八路匪，成什么气候！"事过数日，我地下党员刘进元从韦泰沟为八路军买来两

驮子粮食，在群众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娄杖子部落。沈闻信后，追了十几里将刘及粮驮追回，非送警察署问罪不可。由同情抗日的伪甲长衣文章出面说情，给沈送了二两烟土和一些烟卷，沈把刘毒打一顿放走，粮食和驴全部没收。同年 4 月，大英沟抗日群众张文余和化装成百姓的八路军战士于耀廷(后判变投敌)从后槽为八路军买了 3 驮子粮食，准备送往岭下我军驻地。走到娄杖子与天桥子交界的山岭时，被沈截住，把人粮带到围子里，对张、于二人酷刑拷打，逼问是给谁买的粮食。张、于二人一口咬定买粮是为做买卖，沈才将人放走，驴和粮食全部没收。同年 5 月初，沈又在天桥子与楼杖子交界岭上将我化装成百姓的八路军战士和他为部队买的一条牛截住，把人毒打一顿放走.牛被没收。

基于沈朋林的种种罪恶，我八路军确认沈已不可救药，便决定将其除掉。1944 年 5 月 23 日傍晚，八路军马骥部队武工队队长陆光，青龙木头凳区抗日游击队队长刘起，在大英沟地下党员刘进元家的旧房基里，详细的制定了行动计划。夜间 10 时左右，2 人带领 30 名游击队战士，从刘家起身，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娄杖子部落外，布置了岗哨，监视敌情，随即兵分两路：一路由刘起带领，从侧翼攀进部落；一路由陆光带领，直奔紧闭的大门。陆光到大门前，高声喊到："开门！我们是要路沟警察署的，找你们部落长有急事！"站岗的大统(拿步枪的叫小统，拿大枪的叫大统)问："你们姓啥、叫啥？先报出来我好告诉部落长"。没等说完，翻进部落里的刘起等人已摸到其身后，一声低语："把手举起来！"岗哨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举起双手。我战士打开大门把陆光等人接进部落。战士们冲进岗楼，把睡觉的岗哨抓起来带到大门口，由陆光和部分战士看押。刘起叫一岗哨带路去找沈朋林，岗哨把我战士领到部落西北角沈朋林的门口，刘起命哨兵叫出沈朋林，并随岗哨走向大门口，刚到大门门楼下，我隐蔽的战士一拥上前将他绑了起来，沈情知不妙刚想叫喊，被我战士用破布将嘴堵塞住。走到大门口，刘起返身对呆站

在门边的岗哨说:“告诉老百姓,就说沈朋林给国兵带路去了”。

我战士将沈架到吴坤杖子和娄杖子交界的水沟里,“砰!砰!”两枪,枪毙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沈朋林。

八路军除掉沈朋林,穷苦百姓拍手称快,也震慑了一部分倾向敌伪、反对抗日的伪满官吏和土豪劣绅,给根据地的人民增添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行军途中的一场袭击战

1943年11月上旬，七区队队长马骥，奉上级命令，率120多名队员从青龙出发，计划到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地区与三区队取得联系。一天，马骥部队途经凌源南部的松岭子、饶阳杖子、茶棚，宿营在两山夹一沟的下杖子屯。在屯内外布下岗哨，并派遣侦察员侦察敌情，准备第二天出发执行上级任务。

宿营地下杖子屯距离茶棚日伪警察分驻所仅有5华里，茶棚警察分驻所得知我军宿营下杖子屯后，吓得惊慌失措，急忙向三十家子日伪警察署打电话请求支援。三十家子警察署距我军驻地40华里，曾遭到过马骥部队的打击，已是惊弓之鸟，所以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指令茶棚分驻所去同路经松岭子押军粮的伪军联系。

第二天中午，茶棚警察分驻所10余名警察，同70多名押运军粮的伪军纠合一起，企图攻马骥部队于不备。可马骥同志神机妙算，早已布阵于下杖子屯南北两山，等待着歼灭进犯之敌。日伪军警直到钻进下杖子沟里才发现中我军伏兵之计，想调头逃脱，已为时晚矣。我军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敌群扫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伤亡惨重。伪军警料知他们难有生路，便向我军阵地冲来，当冲到距我军阵地100米左右时，我军向敌人投掷了数以百计的手榴弹，炸声响处，浓烟滚滚，炸得敌人抱头鼠窜，滚下山坡。我军随即冲下山头，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溃不成军，抵挡不住，向刀尔登方向逃窜。警察也逃回茶棚分驻所。

这个分驻所周围筑有高墙，四角设有炮楼，墙外挖有宽两丈有余的壕沟，沟内积水丈深，壕上有吊桥。逃回的警察闭紧大门，龟缩到炮楼里窥视我军动向。

当晚8时许，马骥召开班排长会议，决定乘敌人惊慌未定之机，袭击茶棚警察分驻所。当夜10点包围了茶棚警察分驻所。狡猾的敌人依靠有利工事负隅顽抗。弹不虚发的马骥队长，瞄准敌堡炮眼一枪打死日伪警长陈玉堂，随后大部队一拥而上全歼了敌人。

马骥为执行上级任务，部队连夜往三十家子喇嘛洞出发，去与张玉游击队会合，张玉游击队正在距喇嘛洞附近的马家毯整训，听到马骥部队到来，整队出迎。会师后，两支部队互相拥抱，充满了欢乐气氛。游击队长张玉知道马骥部队一路作战，此时需要休息，便命令本部加强警戒。1944年1月13日，两支部队共同向平泉进发，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刀劈汉奸李荫棠

1943年11月的一天，承平宁联合县第五区的地工人员李向清、乔中和与乔胜等4人携带短枪，初次来到距北炉南12华里的小西洼子屯刘凤久家中，说明身份，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天傍晚离开刘家。同年12月25日，李向清，乔中和等地工人员从距小西洼子东15华里远的牛营子赶回小西洼子刘凤久家中住宿，途经桲椤树杖子、刀马杖子屯时，李、乔等武工队员特来到桲椤树杖子屯伪甲长胡振武家中休息，了解敌情。又到刀马杖子屯伪牌长李荫棠家中歇息，争取李荫棠为我工作，并向其提出要保密，不准走露风声。当晚李、乔宿在刘凤久家中。李荫棠得知后，立即跑到北炉伪警察分驻所报告。第二天早晨，伪警察分驻所长李谦率领警务人员和讨伐队七、八十人赶到小西洼子，占据这个屯的东面、北面小山的制高点，架起机枪，隐蔽埋伏。之后，令部分伪警察下山包围刘凤久家的宅院，妄图活捉我武工队员。

进入院内的几名伪警察，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向住有我地工人员的房屋冲去。此时我武工队员从狗的吠咬声中分析定有敌情，正准备突围时，发现了进院的伪警察。我地工人员向敌人打了一枪，又从屋内抛出一颗手榴弹(未爆炸)。进院的伪警察被吓得躲避到刘家西厢房里。院外的伪警察听到枪声顿时惊慌失措。乘敌人慌乱之机我武工队员打开房屋后门越过院墙，进入连接院墙的西山。埋伏在东山、北山梁上的敌人用机枪猛烈扫射，子弹打得山石横飞，尘土飞扬。因我武工队员行动迅速、敏捷，全部安全脱险。

刘凤久家却因此遭到株连，刘金汉(刘凤久的儿子)被捆绑到北炉警察分驻所惨遭毒打，不给饭吃，后经花钱出保才被释放。从

此以后,伪警察经常窜到小西洼子屯进行搜查,扰得群众不得安宁。对此,武工队决心除掉李荫棠这个日本走狗。

1944年2月9日午夜,在外打麻将的伪牌长李荫棠回到家中,刚要入睡时,院外有人叫门,让他去警察分驻所有事。李荫棠开开大门走出两步远时,被我武工队员李向清、乔胜、小王等人将其抓住,押解到距刀马杖子屯200米处的小山坡上,处死了这个日伪统治者的忠实走狗。

由于我武工队员在刀马杖子、石佛沟一带频繁活动,日伪统治者非常慌恐。他们不甘心灭亡,于1944年春在石佛沟屯建立了部落(人圈),将小西洼子、怀杖子、帽子山等屯群众集家到石佛沟的"人圈"里,企图割断我军民关系。直到祖国光复,这里的群众才得到了解放。

于建华为民除害

凌(源)绥(中)青(龙)联合县所辖地域除了现在的青龙县独山一带以外,还包括现在的凌源县刀尔登、三道河子两个乡和大河北乡的西部地区。

1943年,独山区的八路军到现在的三道河子乡白杖子大队西大山屯一带活动,经常来这里的有区长于建华同志。他当时三十六、七岁,大高个,威武、机智、勇敢。西大山屯20多岁的贫农青年张玉璞是八路军的联络员,他一心一意向着八路军,常和来往的八路军接头,经常给八路军了解和反映情况。当时,西大山屯归敌伪政权的白杖子甲管辖。所以八路军一来到西大屯,对当地情况,特别是白杖子甲里敌伪活动的情况,就了解的一清二楚了。

西大屯一带常有八路军来的情况,日伪也察觉了,日伪在白杖子一带大搞集家并村,妄图割断我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维持其血腥统治。白杖子甲的甲长丛林梓和集家委员丛广梓是亲叔伯兄弟。他们二人是鬼子的恶犬,十分凶恶,蛮横一时。丛林梓在当甲长以前,曾当过伪满警尉,作恶很多。他耀武扬威,气派很大。出门时,坐在大靠椅上,椅子的两旁绑上长竹杆,顶上搭上白布棚,叫4个人抬着走。他的随行人员还得带着茶具和点心。在集家并村中丛林梓和丛广梓二人又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到处欺压、打骂和折磨群众,逼着老百姓拆房子往白杖子屯搬,谁要是不搬或者搬慢了,他们就派人放火烧房子。他们两个还逼着老百姓出工,到白杖子屯修围子建"人圈",干活谁要不使劲,他们非打即骂,老百姓恨透了这两个汉奸。

在当地进行地下活动的八路军,得知丛林梓、丛广梓的这些情

况后，为了教育他们两个改邪归正，多次对他们二人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俩个以后不准干坏事，欺负老百姓，要给八路军筹集鞋袜等物资。但这俩个家伙却死心塌地与八路军做对，甘当铁杆汉奸。罪恶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向日伪军报告八路军的情况。

于建华决心除掉这两个坏蛋，给当地群众出口气。经过详细的研究和安排，在1943年6月19日，于建华带着地下工作者谢奎、高贺等8人，夜间10点多钟来到白杖子村头的伪甲公所门前，留几个人在院内注视着窗户，其余人踹开门进了屋，抓住了在那里住宿的20多岁的事务员伊德常，把他绑了起来。让伊到白杖子屯去叫出丛林梓、丛广梓(二丛住在一个院)。伊德常说："我怎么叫呀？人家要是犯了疑惑也不能出来呀！"八路军告诉他说："你就说刀尔登警察署长和日本人池精来了，找你有事。"伊表示照办，就跟八路军走了。留下的几个八路军把伪甲公所的文件划拉到一起给烧了。

于建华带着伊德常来到白杖子屯街中老丛家大门口，伊德常照着八路军告诉他的那几句话叫门。丛林梓听到后，穿着裤衩出来开门。他刚把大门开开，就被几个八路军上去拽到了门口外，命跪下，留下几人看着丛林梓和伊德常，其余的八路军都进了院，直奔丛广梓住的正房东间屋外，用枪刺挑开了窗户上的冷布，枪口对准丛广梓，命令他出来。狡猾的丛广梓说他从外屋门出来，八路军强令他从窗户跳出来。这个家伙光着上身，一出屋就被八路军战士按住。于建华等人把他带到大门口外，和丛林梓挨肩跪在一起。这两个平时飞扬跋扈，到处作恶的坏蛋，此间吓得浑身乱颤。为了惩恶镇邪，八路军代表人民就地处决了这两个汉奸。

于建华他们处决了两个汉奸后，带着伊德常走到二里地外的许杖子屯东沟。八路军都集中到了一起。伊德常非常害怕，于建华对他说："我就是你们这块的区长，叫于建华。你知道我们这是干啥不？"伊德常说："我不知道。"于建华说："我们枪决这两个汉奸为的

是除暴安良。这两个家伙太可恶了。你比他俩强些，今天不杀你，今后得学好。”伊德常连忙答应。于建华又接着说：“今后我们还要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你要向日伪报假情况，我们上东你说西，人少你说多。”伊德常说：“好、好、一定照办。”于区长让人把伊德常身上绑绳解开，放他回去。

6月20日，马杖子伪分驻所所长白玉柱听到丛林梓、丛广梓二人被八路军处决的消息，带了20多人来到白杖子，埋了两人的尸体。

为了灭掉敌人的气焰，于建华又带领八路军在离刀尔登不远的尖山子抓住了平日作恶多端的马杖子分驻所方警尉，把他处死在尖山屯西沟里的一棵树下。消息传来，群众私下奔走相告，喜形于色，那些汉奸们个个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凶恶气焰有所收敛。

霍郁与三百里地下交通线

霍郁原名叫王才(王福才),原籍黑龙江省北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南廷芳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骑兵一军。抗战一年后,部队撤到察哈尔省编入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1933年离开部队做一段"东北救国会"工作。1937年又参加唐聚五组织的游击队,编入冀中军区战斗序列,称"东北抗日游击总队",司令员唐聚五。1938年9月,奉晋察冀军区指示,调往冀东,准备条件打回东北。1939年4月,在迁安西莲花院北大平台山,我游击队受挫,唐聚五等几位领导不幸牺牲。当时霍郁正在老乡家养伤,后返回冀中军区华北分会工作,当年9月军区又决定由顾绍雄领导北上。分会人员组成4个工作团,霍郁在冀东东进工作团,团长李斌,到冀东军分区后由直属司令部领导。1942年,晋察冀分局组织"东北工作委员会",同时组建"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冀东东工委,李运昌兼书记,赵濯华任副书记,委员有张化东、杨雨民。东北籍的主要工作人员有:马斐文、王杰、王青侠、刘云鹤等。霍郁所在的"东进工作团"人员编入冀东东工委。

1942年12月,由赵濯华、张化东率领十几名同志通过迁卢抚昌地区,到抚宁县台头营东山区,与先期开辟地区的宋国祥领导的武装工作队会合。东工委的工作是秘密工作,借开辟临抚凌青绥地区的工作做掩护,进行东工委的秘密派遣工作和挺进东北工作。霍郁和马斐文的公开身份是联合县办事处的科长。

1943年7月间,地委书记徐志和挺进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赵濯华、张化东在抚宁县蚂蚁沟西山大庙里开了两天会,研究如何尽快打开由河北抚宁县蚂蚁沟通往东北辽宁省建平县(叶柏寿)300

多华里的交通线。经研究决定：由宋国祥、霍郁两位同志负责这项工作。他俩接受任务后，感到有压力，东北地区敌人封锁过严，又没有我们的工作基础。他俩反复分析，终于理出了开展工作头绪，看到了有利条件。首先是我军两次突破口外，对那里的人民有影响，唤起人民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其次，利用党的统战政策去教育团结那些愿意抗日救国的上层人士，让他们转变思想真心抗日，假心向敌；其三，挖掘工作线索。开展工作的措施找到了，劲头也足了。按予定计划，1943 年 8 月，第一个交通联络站在青龙县木头橙附近喇嘛洞建成，站长王庆洪，建这个站的齐佐廷(小粮贩子)和路老生两人协助做了好多工作。第二个交通联络站于同年 10 月在青龙县岭上俞杖子诞生，站长姓俞(外号叫俞拐子)。这个人很能干，虽然腿残(拐子)但走起路来还很快，一天走几十里路没问题，还善于做保密工作。第三个交通联络站是通过齐佐廷与一个蒙古族认干亲的关系，于 10 月末，在辽宁省建昌县山嘴子(今喀左县)附近村子建立。站长姓李，是蒙古族，这个人虽然是位少数民族，但是在这一带很有影响，两口子经营小买卖，有爱国之心。第四个交通联络站就不顺利了，好长时间找不到线索，往北深入更难了。因为敌人发觉了霍郁他们，到处有特务监视，从城镇到农村，到处都听到要捉拿八路军宋国祥和姓霍的。当时他俩想：反正我们头上没粘贴，没有暴露，敌人是认不出来的。所以，他们化装成布贩子，边隐蔽边工作，步步往北深入。恰巧找到了建昌县汤神庙的刘秀峰(罗文的舅舅)。罗文在当时任我地方部队七区队政委，霍郁与他接上关系。通过言谈，了解到这位老人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所以将建立交通联络站之事向他做了交待。12 月在汤神庙建成第四个交通联络站，站长刘秀峰。这个人当时在这块土地上有威信，老实人不欺、坏人不怕，经常在人群中打抱不平，混官差事的人们都怕他三分，老百姓都拥护他。有一次，霍郁和宋国祥在他家吃饭，正好汤神庙警察所所长也在同桌陪他俩。这位所长喝了几盅酒后别有用心地对

霍郁说:“上边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捉两个八路军,一个姓宋的,一个姓霍的,听说他们就在咱们这一带活动,就是抓不到。老兄可以帮帮老弟的忙,打听打听消息,抓住了八路军,日本人给赏,给黄金,老弟亏不了你。”刘秀峰坚定沉着,对那个所长说,这年头兵慌马乱的,得学点好,不能办缺德的事,不然的话脑袋要丢了。长点心眼别给日本人卖命的干,可以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不要露风头,露风头没有好下场。我们是中国人,总应该有点中国人的味道吧!要有点爱国之心,要留德,不然千古留骂名。再说八路军也不是好惹的,据说那些人都是文武双全,善于夜间活动,你要是惹了他们,你也好不了,何必呢?还是留点退身之路好。这年头干点啥事还不混点饭吃!你看这二位老弟跑点行商,贩卖点布匹,又不担什么风险,我看很自由自在。咱们这里人们缺布匹,他们贩来布匹卖给咱们,一方面得点利钱维持生活,一方面也救济了我们这块人穿衣问题,乡亲们欢迎他们。为大伙做点好事的人总是受人们尊敬的。这个所长受到刘秀峰一番教育后,从此再也不嚷嚷抓八路军的事了。第五个交通联络站的建立更是困难重重,伪满洲国的特务多如牛毛,处处搞严密封锁。在村子里搞集家并村,小村并大村,山村房子烧掉也并大村去,然后把村子四周搞起围墙,不许群众随便出入。敌人想利用这种方法隔绝人民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霍郁与宋国祥想尽一切办法开展工作。他们以布贩子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遇到基本群众,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宣传反对集家并村。一天遇到一个跑行商的人叫王老殿,通过相处,发现这个人有爱国之心,霍郁认为这个人爱国之心能靠得住,把布交给他去卖,向他透露意图,交了底。王老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表示决心为抗日救国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五个交通站于1944年7月正式在建昌四官营子(今凌源县)附近村子建立,站长王老殿,他任联络站长后,工作泼辣有胆量。他有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利用行商的身份很快打通到建平县叶柏寿与口里抚宁蚂蚁沟总站的交通线。当时

韩玉喜是总站站长。从此正式与高桥、杨雨民他们接上了口里与东北的工作关系。

当时各情报联络站工作规定两条纪律:一是严格保守组织秘密,在任何环境下直至付出生命,也不许泄露组织领导和同志们;二是畅通交通联络,不许积压、不许丢失,违者受组织处分。

打通口里与辽宁省建平县叶柏寿交通线,历经一年时间,从1943年7月份接受任务到次年的7月份建成。这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对开辟东北地区工作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建站任务全部完成后,霍郁与宋国祥在同年7月份,返回口里抚宁蚂蚁沟,向东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赵濯华汇报。他表示很满意,并提出两点意见:第一、让霍郁回口外继续做情报站的巩固工作;第二、宋国祥打进辽宁省锦州伪军管区司令部,作情报工作。

宋国祥是黑山县人,青年时代在东北讲武堂学习过。他有个老上级在锦州伪军管区司令部工作,借助他的关系在那里找个隐身的差事。宋国祥同志接受新任务,当即去东北,找到四官营子交通联络站站长王老殿,送到锦州伪军管区司令部,接上头后宋国祥就留在了那里。几个月后,由于宋国祥的通讯员刘志友投敌叛变,向敌人暴露了口外几个交通联络站的负责人,这些人相继被捕。他们没有一个变节,一直坚持斗争。王老殿、刘秀峰等同志遭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保守了组织机密。宋国祥同志在锦州也被捕了,一直关押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出狱。

由于叛徒刘志友的出卖,口外几个交通联络站负责人被捕,敌人也到处设密探抓霍郁,无法开展工作,经请示领导同意,霍郁又返回口里。1944年11月被分配到临抚昌联合县敌工部任部长。

地下交通员马玉堂

马玉堂是凌源县三十家子喇嘛洞红帽沟人。1943年,八路军冀东军分区派出地下武工队到喇嘛洞一带开辟地区,发展马玉堂担任了地下交通员,在他家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他多次为地下武工队传递消息,站岗放哨,冒死掩护人民子弟兵,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3年3月7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民俗"龙抬头"的日子,人们都歇工。马玉堂从红帽沟赶回相距3里地的老家马家屯看望父母。他一进家门,看见父亲马元站在当院,阻挡他不让进屋,说家里来了八路军正在休息。马玉堂听后喜出望外,因为他早就听说八路军是好人,专打汉奸坏蛋,不顾父亲阻拦,一步窜进房门。屋里有3个人,一个挎盒子枪的年轻人坐在炕上写字,两个背大枪的年轻人坐地下的板凳上。他说明身份,和3个人认识以后,知道写字的是八路军区长郭敏,另两个是他的警卫员,他们是到这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郭敏和马玉堂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攀谈,给他讲抗日的道理,使马玉堂懂得了不少过去不懂的事情。郭敏见马玉堂是个有热血的老实农民,于是与他交了朋友,又在一张桌子吃了饭。分手时,郭敏问了马玉堂的住址,表示过几天一定要去他家看他。

从见到八路军后,马玉堂天天盼着郭敏他们来。一天半夜,郭敏他们果然来到了马玉堂家。郭敏进一步向马玉堂讲抗日道理,讲革命胜利的前途,讲如何团结起来反抗日本鬼子等。郭敏问马玉堂:"马大哥,我说的这些中听不?你记住没?"马玉堂说很中听,我都记住了。从此以后,马玉堂成为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第五区的一名地下交通员。马家也成为这一地区的我方第25个联络点。

根据我方的暗号，按《百家姓》的顺序给他起了个代号叫“孔八河”，以后又改为“子明”。

当上交通员后，马玉堂就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积极给八路军探听情况，传递消息，跑腿带路。1943年6、7月之间，郭敏奉上级命令调走，临走时交代说马上就有别的同志接替他的工作，让马玉堂和他们接头。郭敏走后不久，有一天，一个看去20岁出头，背着盒子枪的年轻人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红帽沟，坐在当街的大木头上休息。马玉堂一看来人好象是八路军，心想可能是新来的区长找他接头，于是就装作看热闹的走到当街。年轻人看马玉堂个子挺高，就问：“你贵姓？”马玉堂答：“我姓王。”年轻人又问：“你们这里有姓马的没有？”马玉堂回答：“没有。我们一个村差不多都姓王。”年轻人又上下认真地看了他几眼，然后问：“我们上你家喝点水行不？”马玉堂说“那怎么不行？各位请吧！”于是就在前边带路，把3个人引进了自家院子。一进屋，年轻人就说：“我看你挺高的大个子，你是马玉堂吗？”马玉堂不知来人的确切身份，怕中了敌人的圈套，赶紧说：“我不是，我姓王。”这时候年轻人从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儿递给他。马玉堂接过一看，上面写着6个字：“马玉堂，孔八河。”见到这张纸条儿，马玉堂才知道来者确实是自己人，便如实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原来年轻人就是新任区长李惠友，小个子是警卫员高景旺，人称“小旺子”，另一个叫李占山。从此，马玉堂就同李惠友出生入死，共同战斗，一起度过了难忘的3年。

1943年10月的一天，李惠友带着警卫员小旺子和李占山到马玉堂家。马玉堂安排他们3人在屋里稳蔽，晚上到排长王云家里去住，自己下地干活去了。下午，马玉堂的姑娘到山上来告诉她妈要生孩子了，叫爸爸快回家去。马玉堂请接生婆到家，一会儿，他女人就生了。正在高兴的时候，忽听外面有人大喊：“来国兵啦……”他跑出屋门一看，房后的山坡和房前的河沟及对面山顶敌人都放上了岗。马玉堂觉得大事不好，八路军出不去这可怎么办，他急中生

智，进屋对二嫂说："二嫂子，你快刷锅烧水！"接着又让母亲把盛洗孩子水的尿盆子和装胎盘的粪箕子冲外放在外屋地中央，然后进东屋对李惠友等同志说："来伪军了，把村四周都围上了，怎么办？"李惠友当机立断："大哥，我们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马玉堂说："没别的办法，你们就上月房屋躲一躲吧！"说罢就把3个人推进西屋。

马玉堂走出西屋，拿着镐头，假装到院里挖坑埋胎盘。刚走下台阶，就见3个伪兵端着枪进院了。他赶紧迎上前去，假装不知问道："先生，你们来有事吧？"伪兵恶狠狠地说："搜查八路匪！你家没窝藏着吧？"马玉堂笑嘻嘻地回答："我说没窝藏不中，还得请先生们搜查。"说着领他们搜了厢房，"有没有？""没有。"又看了门房，没有，再上后院和正房东屋，都没有。几个人从东屋出来，要上西屋时，马玉堂说"西屋占了房，我老婆刚生了孩子，先生要是不嫌，就到里面搜一搜。"说着竟抢前一步，做出了要撩门帘的架式。几个伪国兵瞧瞧地中间的粪箕子，又看尿盆子，挤挤眼睛，耸耸鼻子，问："生个啥？"正在烧水的二嫂机智地说："哼，生个倒霉的锅台转儿！"伪兵相互交换了一下眼光，就说："不看了！"端着大枪就到别家去了。就这样，马玉堂把伪军骗走了，保护了李惠友他们。



喇嘛沟北梁，是李惠友等人经常活动的地方

1943年冬，日伪开始在喇嘛洞搞集家并屯，把方圆十几里内的农户都撵到杨树底下村的围子里去住。同时加强了对游击队的围剿。1944年3月中旬，李惠友等同志在马家沟里与日伪军遭遇。

我方寡不敌众，于是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马玉堂当时也在这里，仗着地形熟悉，一个人突了出去。在分散突围以后的十几天，李惠友派人给马玉堂捎来口信，叫他去打路沟的老红沟，有要紧事相商。马玉堂接到信后立刻动身，走到马家屯外面的老母猪沟，看见山梁上站着一个人，朝他直摆手。马玉堂一看摆手人的架势，断定洞里肯定藏着突围出来的八路军。于是迅速转身回家，拿来了十几个豆包，一壶水。到山洞一看，果然有3个八路军，是区委书记常野和两个警卫员。马玉堂把他带来的豆包和水给了这3位同志。听说马玉堂要去见李惠友，3个人也就决定同去。到了老红沟张家一看，那里一共有8个人，除张玉、李惠友外，其余都是战士。加上新来的常野3人，一共17人。大家聚在一起研究下步的行动方案。李惠友根据目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决定暂时退回口里。11个人集中一起目标太大，分散开行动安全。张玉说宁城县八里罕甸子有个苏晓德，是大烟贩子出身，去口里的道最熟，跟我们的交情也不错，可找他带我们进口里。张玉带5个人去找苏晓德，李惠友5个人由马玉堂安排。

马玉堂把李惠友他们安排在裂山梁和喇嘛洞交界山上的银洞子，天天派人去送饭。马和李核计，打算请平泉县水泉沟的王凌云当向导，此人也是大烟客，对进口的路特别熟，跟马玉堂是朋友。马玉堂跑到水泉沟一说，王点头答应了，但说自己有大烟瘾，犯瘾就走不动，得买几两大烟路上用。马玉堂为大家做好了半斗米的干粮，又跑到马家屯任全家里赊了2两大烟。天黑时，他揣着大烟就顺沟摸回了红帽沟的家。当时他家正请人拆房子，被迫往围子里搬。炕上放好了桌子，还有一盆水饭。他问妻子："拆房子人不吃饭?"妻子着急地说："你咋回家了?来兵了，正在抓你呢！"马玉堂也没说话，盛碗水饭，脚蹬炕沿刚扒下去半碗，就听外面狗咬了。他打开后门跑出去，突然从水沟里跳出一个挎盒子枪的伪军，上去就把他兜里的烟土按住了："这是什么?"马玉堂平静地回答："是烟荷包

烟袋。”那人听罢松开了手。马玉堂看他不注意，利用夜色掩护，掏出兜里的烟土扔到路旁的草棵里，然后陪笑脸对那人说：“先生，你老别误会，我可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哪！”伪军说：“庄稼人也不许出村，你痛快给我回去。

马玉堂趁势跑到邻居王国俊的院子里，二人没等搭话一个伪军就带着大枪走进来，朝他们呜哩哇啦喊话，听声音象是朝鲜人，马玉堂一看他边说话边拍胸口就明白了，是要看良民证。王国俊掏出来递了过去。当时天已经黑了，马玉堂没有良民证，趁着伪军把王国俊的良民证举到眼前仔细看的功夫，他赶紧跑了出去。2个伪军喝住了他，他抬头一看，一个拎着盒子枪，一个提着机关枪。拎着盒子枪的问马玉堂有多少房子。马玉堂说有13间，全拆了。伪军说：“全拆了好哇，八路匪没地方呆，冻死，饿死他们。”马玉堂顺水推舟回答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打跑了八路咱再盖。”看伪军对自己不大怀疑，马玉堂就说：“先生，我可没带良民证啊。”伪军起了疑心：“你不是好人吧？”“哪能不是好人，我的良民证放在围子里，我寻思这里拆房乱糟糟的，怕弄丢了，就没敢带。”伪军说：“没良民证你别出去，就在这里呆着。”马玉堂点头应允，看两个伪军拎着枪走了，他赶紧往山顶跑去。在山上听见不少人在他家嚷嚷：“方才山坡上有个大个子，说他没有良民证，那一定是马玉堂！哼，活活让他跑了！”敌人扑了个空，没办法就拉着队伍走了。马玉堂听听没有动静了，悄悄下了山，找到扔在房后草棵里的烟土，赶紧往银洞子沟里奔。马玉堂把一行人送到银洞子沟，依依惜别。王凌云把5人安全地送回口里。

喇嘛洞集家并屯不久，马玉堂的姐姐娶儿媳妇，叫他去陪客。他刚端起酒盅，羊馆跑进来说：“来国兵了，听说是抓你！”马玉堂撂下酒盅就往村西跑，恰好碰见3个伪军从西边搜过来，端着大枪喊：“混蛋，你往哪儿跑？”马玉堂站了下来，说：“我也没跑呀？”于是被3个伪军带回村里。一个伪军边走边问：“你姓啥？”马答：“我姓

王。"走到马玉堂姐姐家门前，伪军问："那家的房子咋没拆？"马答："他们今天娶媳妇，娶完再拆。"一听这话，3个伪军就朝这家奔，还让马玉堂抱了捆柴禾。进了院子，一个伪军问："你们娶媳妇在哪儿找先生择的日子？"马玉堂的姐姐搭言："先生你说咋着？""你不怕犯天火吗？""先生说笑话了，你看也没着哇？""没着。"伪军恶狠狠地说："没着我不会给你点着吗？"说罢问马玉堂有没有火柴，叫他把顺路抱的柴禾点着。马玉堂陪着笑问："先生，真格的你就让点？"伪军问："你是牌长咋的？"马回答："牌长不在家，我不得不张罗张罗。看在我的面上，别点了，走，几位到我家用饭去。"于是他半推半让地把3个伪军弄到自己家吃饭。小米饭小葱拌豆腐，几个人吃得正香甜，马玉堂就让他姐夫杜兴上房去砸房盖，结果落了一饭盆土。伪军说："你们干什么？可别砸了！"马玉堂笑嘻嘻地回答："不砸，吃完饭你们也得给点着。"伪军说："点什么？你自己拆就不点了。"马玉堂这才招呼姐夫下了房。吃饭中间，伪军告诉马玉堂说，他们是抓马玉堂来的，一共来了6个人，有3个到马家屯去了，其中1个是日本人，名叫野田，并嘱咐马玉堂到外面好好看着，发现3个人来，也叫他们来吃饭。马玉堂说："行啊，这点小事我办得到，一定叫他们到我家吃饭。"借这个机会他出门就跑了。3个伪军吃完饭，去马家屯那3个也从沟里下来了，其中1个人前后打量着他们进的这个院子，自言自语地说："唔？这个地方我好象来过，这是谁家？"问问隔壁的王雨，王看马玉堂跑了，就说："是马玉堂的家嘛！"一个伪军后悔地说："得，方才让咱们吃饭那个人贼眉鼠眼，大高个子，准是马玉堂，生生让这小子从眼皮底下跑了！"

马玉堂地下交通员的身份暴露后，日伪军多方搜捕他，使他有家不能归。冬天住在马家屯的旧房框子里，春夏住在屯外的一个羊圈里。为了防备敌人，他在山上有两个"保险地"，一个是大老虎洞山上有个大石棚，出口在一片乱石窖里，刚刚能钻进一个人，很不易发现。另一个是石槽子山上的一个洞，也是口小肚大，洞口盖着

茅草，十分秘密。有一次马玉堂被一个伪军追捕，他就朝后石槽子的山洞跑，悄悄钻了进去，随后就拽把茅草把洞口盖严，只听见伪军在洞口上面自言自语："唉，奇怪呀?脚前脚后跑上来，难道他长翅膀飞了?"

张玉在1944年3月和李惠友分手以后，带着5个人去宁城八里罕甸子找苏晓德带路进口里，结果不但没找到苏晓德，反倒叫日本鬼子逮捕了，押解到承德。3个多月后，他们和宋兴邦等18个人一起逃了出来。宋兴邦等同志回口里了，李学会因受伤和张玉同志留在马玉堂家屯外的一个躲避点(羊圈)养伤。他们用3块石头支起一口小铁锅做饭。没有药，天天用干白菜水洗伤口。养了两个多月，李学会的伤好了。张玉对马玉堂说："我们俩也不能在这儿久站了，也得进口找组织去，你想法找个人带路。"马玉堂又去找王凌云，谁知王说啥也不去。马玉堂好说歹说他才松了口："实在让我送也中。可我家穷得吃上顿没下顿的，得先交给我400元钱。"马玉堂一听，心想自己身上一文无有，上哪儿去弄这400元钱呀!但一想到交通员的责任，就咬牙应承下来。他把王领到张玉二人隐蔽的地方，他费劲巴力借了400元钱，又从围子里拿了30张煎饼，都交给了王凌云。王把二人安全送回口里，回来时给马玉堂捎来张玉写着"子明"的名字，下面有四句话：保守秘密，心比天地，X X X X，千万注意。"马玉堂看后十分激动，一连看了好几遍，最后把它撕碎了。事后，为了还400元外债，他忍痛卖了4亩好地。

1945年夏季，阴雨连绵。马玉堂躲在羊圈的角落里，用两根小竿儿支起两个大笸箩当屋顶，一张吃饭桌子放在地下当炕，晚间搭，白天拆，以防被敌人发现。雨下大了的时候，马玉堂坐在铺盖卷上，躲在笸箩下，根本动弹不得。小羊圈里，桌子底下全是水。雨大，柴湿，做不了饭，只得饿着。雨连续不停地下了三四天，连冷带饿，马玉堂四肢无力，迷迷糊糊动弹不得了。雨刚一停，父亲就顺着山赶来，给他带来几个饼子，马玉堂吃了两个，送老人涉过山洪，上了

山梁他才转回身。哪知到羊圈一看，留下的几个干粮让狗都给偷吃了。3天后，马玉堂又饿得奄奄一息了，恰好这时沟底的吴国忠上沟里串亲戚，经此见了马玉堂，留给他几个豆包，才救了他的命。吴国忠回去把实情一说，他妻子就拐着小脚儿领着两个孩子到沟里来了，拿了10多个鸡蛋，拿了一些干粮，见马玉堂饿得皮包骨的样子，禁不住痛哭一场。

1945年7月，马玉堂接到李惠友捎来的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一双鞋，一双袜子，一条裤衩儿，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是送给马玉堂用的。来人说李惠友他们从口里来，过三五天他就到马玉堂这儿来。听到这个消息，马玉堂怕李惠友找不到自己，就在马家屯的旧房框子里用秫秸搭了小棚，日夜等着李惠友。7月25日的夜间，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马玉堂和跟他作伴的外甥都难以入睡。突然，外甥捅了捅他，小声说："舅，外面来了狼，在大门槛子上蹲着呢！"马玉堂借着打闪的亮光仔细一看，好象是个人，就大声问道："你是不是老李呀？"外面那人答道："是。"马王堂顶着雨跑出去一看，果真是李惠友，身上披着一块黄油布。"你快进来吧，别浇着啦！"李惠友说："外面还有3个同志呢！"进小棚里经李惠友介绍，马玉堂知道到那3个人是张恩、赵明华和石成山。马玉堂把4个人安顿在小草棚里睡下。次日，有人来借水罐子，马推说这4人是大烟贩子。马跟喇嘛洞庙上的道士赵华南交情很深，以后又把他们安顿在庙里歇息了几天。过了一些日子，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三十家子也换了旗子。李惠友4人就带着武器接收了三十家子，同党组织联系后，任命赵明华当了区长，命令李惠友和张恩去接收赤峰。在此期间，马玉堂曾去赤峰看望过李惠友，在那里住了9天。李惠友动员他出来工作，但他因家中父母、幼子无人照料，就婉言谢绝了。从那时到现在，马玉堂一直在家务农。

高祯热心救伤员

在凌源南部山区的河坎子一带，提起高祯救伤员的故事，在上点年岁的人中没有不知道的。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事当成一种美德加以传颂，并引以为荣。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和华北的广大地区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我八路军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挺进敌后，开辟东北。活动在凌、青、绥地区的八路军游击队——“马骥部队”，利用这一带山多林密的有利地形，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神出鬼没地同鬼子斗争，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所以“马骥部队”的名字使敌人闻风丧胆。

凌源南部山区河坎子，是凌源与青龙的交界处，这一带群山连绵，林深径小，马骥部队没来之前就有游击队活动过。这里的老百姓深受八路军的影响，群众基础较好。他们常为游击队捐粮献物，为部队救护伤员。军队和老百姓结下了鱼水之情。

1942年10月，马骥部队刚从都山打完仗又来到这里，他们首先来到沙果子沟的北沟张跃(较开明地主)家里。部队的同志向他说明来意：“我们有个伤员叫葛振山，战斗中脚部受重伤，不能行动，暂留在这里，你们要帮助护理一下，待伤愈归队。”这样的事这一带常有，群众总是肯冒风险完成救护任务的。于是葛振山就留在张跃的家里，部队又转移了。

张跃虽说是个地主，但对八路军给他的任务是不敢不完成的。因为他是地主，所以常有些日伪人员来往，如果真的让他们发现了他家藏有八路军的伤病员，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便宜。张跃怕惹出事来，把葛振山藏在自己家放粮食的地窖子里，3餐送饭。张跃考虑

这样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于是他把家族的侄子中医张碧臣找来，商量如何安置好葛振山。经过再三商议，决定把葛振山转移到山庙沟张碧臣的把兄弟高祯那里去。高祯那里是小山沟，人家少，很少有人去，这样八路军伤病员的人身安全就保证了。说也巧，张碧臣正准备找高祯商量此事，第二天高祯到他的药铺来抓药。张碧臣便把这事一五一十的说给高祯，高祯听完后，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坚巨任务。

当天，高祯没回家，直接就到了北沟张跃家里准备接伤员。

残秋十月的夜晚，天高气爽，皎洁的明月照得山川、大地一片洁白。山乡静悄悄，只有高祯一人背着葛振山在山间弯曲的小道上一步一步地朝着林深处走去。

也许是高祯心情太激动了。他忘记了疲劳，任汗水浸透了衣裳，一鼓作气背葛振山回到家里，此时已经半夜多了。

回到家里，妻子老小都还没睡，都在惦念着他。见他背着一个大汉，大汉看上去好象比高祯长几岁，中等个，细身条，脸色苍白，穿一身黑棉衣，脚穿夹鞋，显然不象一般平民百姓。高祯的妻子不免有些着慌。高祯也二话没说，一面叫妻子马上做饭，一面安置葛振山，工夫不大，把葛振山安顿好了饭也熟了。高祯这才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妻子听后也欣然地笑了。葛振山吃着热呼呼、香喷喷的小米饭和炖豆腐，感激不尽地说："太给你们添麻烦了。"高祯接过话说："咱们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你们打仗也是为了我们，好好在这养伤吧。"

葛振山自到高家后，享受的是高家贵客待遇，毡子给他铺，好的给他吃。为了安全，高家让他住在后院的仓子里。住下后的第5天，住在东山洼的胡长友家丢了一只大公鸡，找鸡来到了高家的后院，一眼发现仓子里有人，便问高祯那人是谁？高祯眉头一皱机灵地说："那是我亲戚帮助我扫仓子呢。"就这样支吾过去了。虽说是一场虚惊，但是他们一家还是吓得心跳个不停。这下子可使高祯犯

了难。把他转移到哪好呢?在家照顾倒方便,可是也不安全呀?想来想去,想到了他小时放羊去过的距他家3里路远的大达子岭阳坡有个达子洞,那儿山高没有道,平时很少有人去,达子洞地势险要,谁想进去,非得有不怕死的精神才行。去达子洞要先上山尖,然后手拽山柴小树,光脚蹬住石缝,往下边下,下到两米深才能溜到洞口小平台上。平台上长满了稠密的柴草,把洞口围住,在山下啥也看不见,洞口不小,里边有半间屋大,人能站得开,住人满行。想到这,高祯和葛振山商量到洞里去养伤的事,葛振山完全赞同高祯的意见。天黑后,高祯背着葛振山,奔达子岭去了,较陡的地方,高祯就背着人爬,慢慢往前挪。上到山顶,往达子洞去,伤员不能自己往下溜,高祯就用带来的大绳,一头拴在山顶杏树上,一头拴在葛振山腰上,把他慢慢吊到洞口平台上。然后又返回家中,拿来羊皮、毡子和一捆干草,把这些东西又吊到洞口,自己才光脚爬了下去,把葛振山背进洞,铺好草、羊皮和毡子,把一切都安顿好,高祯累得腰酸腿疼,可他还是乐呵呵地和葛振山商量以后怎么办。他怕葛振山着急憋闷,便安慰他说:“你放心,有我高祯在,就有你葛振山在。我天天按时给你送饭送水,还要把你的伤治好,什么时候把你侍候的和好人一样什么时候拉倒。”高祯的一席话,说得葛振山心里十分感激,两眼充满了泪珠。



高祯给伤员葛振山送饭的瓦罐

此后,高祯风雪不误,天天按时给葛振山送饭。为了不让别人发现,高祯的妻子每天在鸡叫前就起来做好饭,由高祯摸着黑送上

山去，在人们早起之前再赶回来。晚上，在别人睡觉后，高祯再去达子洞看望葛振山，并取饭罐子。高祯怕葛振山一个人呆着闷得慌，就陪他唠磕，有时呆到半夜才回家。葛振山在山洞里养伤，地点安全，他和高祯一家人心里都托了底，可是由于洞里的条件较差，阴冷入骨，伤口不见愈合，还有些恶化。因此就这么干养不吃药是不行的。吃药还没钱，高祯就东挪西借才凑上了 6 元钱(合 6 斗小米)，偷偷的步行 30 多里地，在佛爷洞村找到一名治红伤的中医先生，买了口服和外用的两种药，拿回去后给葛振山用上，结果还真见效，伤势逐渐好转起来。在高祯护理葛振山期间，张跃在经济上给了高祯一些接济，为护理伤员提供了方便条件。

高祯象照顾自己亲人一样护理葛振山，每天两个来回奔波 20 来里，自己还要干活。特别是“三九”天起大早上山，冷风刺骨，棉袄被打得透心凉，脸就象刀割一样。到了山上还得脱光脚往洞口溜，脚丫子蹬着石头，就象踩在冰块上一样，扎得钻心。但凭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不管怎样艰难，他都咬牙挺着，毫不动摇。为使葛振山伤势早日好转，家里的人，每天都把给伤员送的饭安排好，自己喝稀的，把好吃的留给伤员，让伤员顿顿吃上净米的干饭。



为高祯立的记功碑

葛振山在达子洞养了 3 个月的伤，伤口终于愈合，人胖了，身体也壮了。1943 年 2 月 1 日，葛振山同志回到了高祯家，高祯家做的高粱米江豆干饭，又给做了点好菜。饭后

葛振山说:“为了让我养好伤,你们家担惊受怕,起早贪晚,操了不少心,受了不少累。我也没有别的感谢你们,只有回去勇敢作战,早打败日本侵略者,让祖国早日获得解放,以此作报答吧!”临行,高祯把葛振山送了一程又一程。为防止暴露目标,葛振山同志再三恳求留步,双方含着晶莹的泪珠,依依惜别了。患难之交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俩人分手,不断回头张望,直到看不见了,才算罢休。

军民鱼水情

1943年初春到秋末，在凌源县大河北朝阳洞川，活跃着一支凌绥青联合县游击队所属的一支小分队。队长张大山，原籍是青龙县李连杖子，参加革命前在当地开店，和朝阳洞川的一些人认识。他参加革命后，借地利、人和条件，到朝阳洞川开辟工作，主要活动在现在的大河北乡西郭杖子村的邵家梁、西沟里、西郭杖子、西坡屯，还有西山嘴、碌碡沟屯。

朝阳洞川山高岭密，坡陡路窄，沟壑纵横，柴草繁茂，是开辟抗日游击活动的理想地区。这里的西沟里屯坐落在山怀里，周围是山，仅有5户姓王的人家，是八路军经常落脚的地方。日伪反动派为了割断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老百姓不搬家，他们就烧房拆房。尽管如此，老百姓在日伪军走后，依然回到家园，他们在房壳上棚个简单的盖住下去。张大山带领着游击队照样到这里来。

1943年6月22日晚，张大山带领郭义等7名同志住在王万相家房壳里。23日早晨，张大山等人正在吃饭，西山头上的哨兵发现从沟外来了100多名日伪国兵和宪兵。这些家伙是获悉了八路军活动的情况，从平泉开来围剿八路军的。张大山等人闻讯后，迅速行动，跑出房壳，钻进房后的山沟奔到西山，跑了半里左右，藏在草棵子里。日伪军来到屯前在南边和东边支起了6架机关枪，5户人家被围个水泄不通。把全屯10多口人赶到了王万相家房前空场上。领头的日本鬼子哇啦了几句，翻译就问："谁是王万相？"看来王万相家住过八路军，日伪都很清楚。王万相当时56岁，身体魁梧，很有胆量。他应声站了出来，说："我是王万相。"鬼子问他："你把八

路军藏到什么地方了?”王万相说:“我没藏八路军。”日本鬼子问他往山上跑的人是谁,王万相也不告诉他们。鬼子气急败坏,亲自把王万相绑上,一下撂倒在地,嚎叫地说:“不说出八路军的去向,就活埋你。”日伪军逼着在场的王彦、王增等人挖坑,日本鬼子亲自动手把王万相推进坑里,用锹铲土就埋。王万相的老婆立即上去抓住日本鬼子手里的锹把不让埋。鬼子说:“你告诉我跑上山的是谁,就不埋他。”王万相老婆说:“放羊的人上山了。”日本鬼子要把上山的人叫下来看看。王万相16岁的小儿子王瑞,赶忙扭头就往西山坡跑,边跑边喊:“谁上山放羊去啦?快下来吧!”当时西坡屯的李富正在山上,就搭了话,说:“是我。”就下山来了。他来到人们跟前,那个翻译官上去就给了他两个大嘴巴,打得鼻口出血,气狠狠地问:“你往山上跑什么?”李富机警地回答:“我怕你们打我。”翻译官又说:“你这一跑,差点送了一个人的命。”然后,翻译官跟日本鬼子哇啦了一阵,就告诉人们把王万相从坑里拖出来了。王万相在土里被埋了几分钟,满脸憋得青紫,都不能喘气了,人们招呼了一大阵,他才醒过来。

日伪军闹腾了一大阵,一无所获,懒洋洋地撤走了。

中午时分,隐蔽在山上的张大山等7人,又回到了西沟里屯,他们先去看望为了掩护自己险些丧了命的王万相,称赞了他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安慰他好好养病,并告诉他不要看日本鬼子那样猖狂,他们末日就要到了。王万相由于伤势过重,治疗无效,在7月15日死去。一个纯朴的农民,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掩护自己的子弟兵,献出了宝贵生命。

西沟里屯被敌人包围袭击后,游击队长张大山带领同志们转移到平泉干沟等地活动。1943年7月,张大山身染重病腹泄不止,被折腾得瘦弱不堪。张大山让游击队的段同志陪他回到凌源县大河北西郭杖子西坡村找郭万存养病。郭万存和张大山是老相识,怕把病员放在自己家里容易暴露,就把张大山安排在水泉沟炭窑洞

里护养。西坡屯 20 多岁的农民郭富，自告奋勇，担负起养护张大山的任务。

炭窑里很窄小，里边只有 3 尺宽，3 尺高，5 尺长。郭富给张大山从家拿去了褥子和被子，连做饭的马勺也预备下了。他白天做饭，晚间做伴，精心服侍张大山。附近农民郭万存、王振青、王瑞等人也隔三差五赶来看望他，并给他送吃的。经过一个月的休养，张大山病情大有好转。为了确保安全，经和张大山商量，人们先后把张转移到离水泉沟 7 里远的菠萝洼屯石洞子里和窑洞屯郭品仪家养病。在转移时，被菠萝洼的王振英发现。王振英是专给西山嘴围子的伪甲长范进臣探听八路军情况的，他立即向范进臣做了报告。榆树沟警察分驻所得到报告后，由一个姓李的所长带警察和自卫团四、五十人，由范进臣带路到窑沟屯把郭品仪家包围，将张大山抓住，用马驮走。当经过西郭杖子屯时，年青的羊倌张廷山看到后，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乡亲们，大伙非常着急。敌人把张大山带到榆树沟分驻所以后，从此音信皆无。大家千方百计地寻找，设法营救他，没能如愿。

由于西沟和西坡屯是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经常落脚点，敌人搞集家并户时，许多群众又抗拒不去，而且和八路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所以引起了敌人的仇恨。1943 年 10 月的一天，从青龙县来了伪警察和宪兵 50 多人，先后包围了西坡和西沟里屯，进村就指名抓人。在西坡抓了郭万存、郭永发、王万廷、邵凤权、王耀，在西沟抓走了王有和王增。

敌人抓走这些人后，把他们带到离西沟里 20 多里远的平泉县东门杖子，在那里敌人对郭万存和王增进行了审讯和严刑拷打，敌人为逼问出王增跟八路军和张大山的关系，把他衣服打破了，后脊背也打坏了，也未得到王增的招认。凶狠的敌人又用筷子夹他的五指，手指被夹得鲜血淋漓，但王增还是没有承认，使得敌人梦想落空。

这7个人被捕后，西沟里和西坡的乡亲们，托人拿物往回保他们。结果保回了郭永发、王万廷、王耀、王有、邵风权等5人。敌人认为郭万存和王增问题大，有保也不放。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敌人没有抓住确实的把柄，只好把郭万存和王增也放了回来。7名被捕的群众在敌人的淫威下不屈不挠，终于获得斗争的胜利。

刘永春、刘永生在北票的地下抗日斗争

1942年秋，冀东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确定了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游击战争要深入敌后、向东北方向发展的方针和任务，工作重点是城市。为此，党组织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经过训练，由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遣，开辟东北工作。刘永春也是这时由晋察冀东工委员张化东派到北票来的。

张化东找刘永春交待工作时，分析了东北的战局，指出在北票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一、北票是辽西北部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日本鬼子控制辽西地区的重要据点；二、北票煤矿的工人是从各地抓来的劳工，他们饱尝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痛苦，对日本鬼子最恨，我们在那里工作容易扩大影响；三、北票是座煤城，是敌人在关里扩大战争的物资来源，我们在那里活动意义重大。去那里的具体任务有4条：一、找到可靠的社会合法地位，站住脚；二、及时了解北票地区日伪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定期汇报；三、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启发爱国主义精神，组织秘密的抗日救国会；四、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发展党员，但要单线联系，不要发生横向关系。刘永春接受了党给的任务，于1943年4月，秘密向东北出发了。

刘永春出发的地点是在滦河东的一个小村庄，一位姓王的交通员送刘永春到山海关。那时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满洲国”，去东北要在山海关起所谓的“出国证”，由日本鬼子的大东亚公司办理。刘永春经过许多周折，冒着很大的危险，领取一张“出国证书”，乘火车到了将要开展工作的新地方——北票。

当时，北票这座煤城就是一座人间地狱。这里有高大的围墙，

墙上有铁丝电网，通行地方有岗哨，在岗哨上，敌人持枪鹤立，戒备森严，在大街小巷处处设卡，层层封锁，对中国人监视盘查甚严。那时，北票地区的沁布多尔济，任伪吐默特中旗旗长。旗公署设在南山，他同日本人狼狈为奸，互相勾结，利用军、警、宪、特，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他们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混入北票地区，就到处抓政治犯。刘永春到北票首先把在关里游击区用过的刘春明的名字改为刘永春，通过王玉书(他们曾在1937年一起做过工)的关系，在冠山矿以搬运工人和放炮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始地下工作。做地下工作不能同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同组织联系和汇报工作也要按事先预定好的暗号进行。如上级派人来接头，以摸袄第几个扣为标记，写信联系要互相称“表兄”，内容是平常家信。在介绍国际形势时，用东地暗示苏联，西地暗示希特勒。刘永春还于1943年末，回冀东找到张化东，将北票地区情况做了全面汇报，参加了一个月地工部组织的训练和学习。在学习结束时，又逐个地交待了任务。张化东亲自把刘永春叫到一个小屋里谈话，要刘永春重返北票，指示进一步获取北票地区敌人情报，壮大我们的力量，扩大我抗日斗争的影响。

1944年1月份，刘永春又回到北票，在矿里推镐车。刘永春每天出入井口，看到日本鬼子像疯狗一样，手持铁榔头凶狠狠地向工人喊：“要勤劳奉国多出煤，不然死了死了的。”刘永春想这是敌人做垂死挣扎了。他们为了要煤、多出煤，把井口变成吞人不吐骨的魔窟了。北票的工人对日本鬼子最恨，他们也最有反抗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刘永春抓紧了对工人的宣传，讲共产党毛主席救穷人，讲八路军抗日斗争故事，久而久之在工人中传播开了，说“八路军会飞檐走壁、杀富济贫、打日本鬼子。”同时刘永春还组织工人带头消极怠工，破坏井下电线和雷管等。最后选拔有觉悟和经得考验的工人，发展他们入党。陈忠、李振起、石德山等就是刘永春发展的。在日本投降后，这几位同志全参军南下参加了解放战争。

刘永生，化名刘明久。河北省滦县杨柳庄簸箕掌人。1936年来北票矿做工。1941年回原籍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2月经孟宪久介绍参加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太山队(地工部临时代号)训练班学习。3月由方飞、孟宪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被党组织派往北票搞地下工作，直至日寇投降。

1944年春，冀热辽东北工作委员会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滦河西岸抗日游击区物色熟悉东北情况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经过短期训练，4月份，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化东在临抚昌联合县小河玉秘密地向刘永生交待了去北票煤矿作党的地下工作的任务。张化东指出：北票是辽西北部地区战略要地，也是日本鬼子控制辽西地区的重要据点和掠夺煤炭资源的主要地区。那里人口集中，工人又多，我们在那里开展工作最易扩大影响，所以那里工作意义重大。张化东和方飞先后对刘永生提出4条任务：一、发展党员对象以工人为主，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向关系，秘密建立地下党的组织，逐步壮大党的力量；二、成立抗日救国会，动员和组织抗日力量，准备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三、打入敌人内部，侦察敌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建立情报网，及时向上级汇报；四、组织发动工人怠工，制造生产事故，拖延生产时间，保护矿山资源。党组织交给刘永生800元伪币，作为地下活动经费。刘永生接受任务后，作了充分准备，经过组织介绍，找到交通员，在山海关办理了“出国身份证”，于4月下旬的一天，乘火车到了北票。

刘永生到北票后，为站住脚跟，先隐蔽在岳家沟他舅舅李文玉家。此时，舅舅已去世，只剩舅母和孩子，没有人手，挣钱收入少，因此刘永生的到来很受舅母欢迎。从此，刘永生以做豆腐为掩护，开展工作，很快和附近群众混熟。

这里是穷人杂居的地方。久而久之，人们认为刘永生“好交好为，扶困济危，敢作敢为，是个好人”。所以，刘永生不仅立住了脚，而且又有了做群众工作的活动基础。

刘永生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在群众中扎根，躲避开敌人搜查和特务的跟踪，决定找一个不易被敌人发现的活动阵地。他物色到石家大院。这个大院，外有围墙大门，内有工人、小职员和小贩杂居，便于同他们交朋友，互相帮助谋生。不久，刘永生同石万坤结成干兄弟，并认了石万坤之母为干妈。此后即在他家利用晚上时间宣传共产党、毛主席解救穷人的道理，讲述八路军在关里打鬼子的故事，启发人们爱国主义思想。这里成了秘密活动场所。

为尽快地开展工作，刘永生通过朋友介绍，先后去冠山矿和台吉矿两处下井采煤。在工人中物色受鬼子迫害最惨、仇恨最深、反抗力最强的人进行教育加以培养。然而，日本鬼子和汉奸警察手拿棍棒监督工人，严加控制不许集堆唠磕，只要被发现集堆唠磕者就当成政治犯抓去，实施上大挂、鞭子抽、灌辣椒水等酷刑。6 月份，刘永生因在一个地方串联被警察抓去审讯，但是刘永生不怕敌人拷打，誓死不承认，使敌人无可奈何，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刘永生出狱后返回关内，向党组织汇报和请示工作，汇报了在北票潜伏活动情况和发展党员计划。张化东指示说："这样发展党员计划很对，要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要少而精，不要多而不纯。刘永生汇报时提到北票有个"在家里"的封建组织情况，请示可否利用。张化东指示："只要立场站得稳，参加也没有关系"。刘永生请示想发动工人暴动，组织抗日救国会，与日本鬼子和警察进行明面斗争问题。张化东说："不要性子太急，要慎重。如搞起暴动来与我们接不上关系，你们工作会受很大的损失。还是要隐蔽，没有组织指示决不准搞其它的活动。"同年 9 月，刘永生带着上级拨给的一部分款又回到北票。在北票加入了"在家里"。"在家里"是个封建行帮组织，这里面的当家人为扩大自己势力，往往同敌人中权威人物勾结，在社会上以合法地位出现。刘永生利用"在家里"组织作掩护，广泛接近人民群众，进行深入宣传。他用小鬼子欺压工人的实例说明当亡国奴的痛苦，并阐述要想解放就得同敌人作斗争的道理，激

发工人的爱国热情,组织工人罢工或制造生产事故。如工人李少先被鬼子打得遍体鳞伤痛苦难言。刘永生热情地关怀他,并向他说明:日本鬼子压迫我们,咱们暂时受点气,将来他们一定完蛋。还介绍冀东李运昌领导人民打鬼子及开滦煤矿罢工情况,最后又教他斗争的方法。

1945年7月初,李少先联合张庆恒组织起100多名工人,为要求按时开工资,愤怒地砸了台吉一坑劳务系,将催班把头的脑袋打得鲜血直流,迫使大柜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从此,工人逐渐有组织地破坏生产,采用剪电线、摔安全灯、毁雷管等手段,拖延生产时间,使煤的产量日趋下降。

为了把对敌斗争推向新阶段,急需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刘永生根据上级指示对早已物色的发展对象,积极进行党的基本常识教育,婉转地启发工人骨干的入党愿望并向他们交待任务,进行考验。如要求他们向亲友和工人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灭亡,抗日斗争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收集敌人内部情报,了解工人们的要求;带头领导工人破坏生产,打击汉奸走狗等。刘永生根据他们完成任务情况和每个人具体表现,先后一一个别发展。决定发展对象,由刘永生个别谈话,或在李文玉家,或在石万增住处,或在水塔山坡,以唠嗑、走路、观光等形式,宣布某人已成为共产党员,并通知候补期时间。这样从1945年2月份开始到7月前,发展4批,共25名党员。这25名中共党员分散在台吉、冠山、铁路和街里各行业。刘永生为迎接我军抗日大反攻,决定在党员中酝酿成立抗日救国会,为组织暴动作好准备。于是,他分头和党员商议,并部署任务,开展工作。共产党员李雨廷,到工人中串联和动员,向他们说:"八路军是咱穷人军队,专为老百姓报仇,八路军队伍已过长城,快打过来了,愿不愿参加?"许多人都偷偷地表示:八路军来了,我们也拿起武器杀鬼子。这样一传两、两传仨,很快在工人群众中传出日本鬼子要"完蛋"的消息。共产党员李奎元在铁路跑车板(北票至

金岭寺),经常向20多个青年擦车工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这些青年也盼望尽早参加八路军。经过单独商量、个别串联、分头行动,组织武装暴动条件日渐成熟,

7月20日在王顺应家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有李雨廷、周长荣、李继春、王金堂、耿明哲、张银、李奎元、梁玉山等八九个人参加。他们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延安发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快要灭亡号召全国人民要积极行动起来,配合人民军队大反攻的消息,决定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立即组织准备暴动。经过几次会议,决定8月17日暴动。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行动目标是砸日伪警察分驻所,夺取枪支,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迎接大部队到来。具体分工是刘永生、李雨廷、梁玉山负责组织砸大柳树分驻所;张银、王顺彬负责砸南山分驻所;王金堂领人去骆驼营水圃(水源地)抢枪支;周长荣带人去砸北门外岗楼。暴动方法是以工人在坑口吵架为由,扭斗到分驻所,使看热闹人多时突然动手夺取警察枪支,然后迅速向予定地点转移。行动计划决定后,他们分头准备。刘永生去岳家沟“四合胜”四掌柜家暂借伪币4万元,作为暴动成功后活动经费。并带领王永德一起去外地踩路线、看地形,沿途向农民作抗日打鬼子的宣传。他们冒着酷暑步行几百里,分别到了大凌河南的章吉营、朝阳、牤牛营子等地,做好了暴动前的一切准备工作。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计划没能实行。

日寇宣布投降后,刘永生孤身闯进沁布多尔济的伪旗公署,凛然正气地以八路军冀热辽军分区地工人员的身份同敌人谈判。落魂失魄的“小王子”沁布多尔济无可奈何,答应了刘永生提出的3个条件:一、废除伪旗公署,旧职人员不许动,等候共产党的命令;二、改伪旗警队为保安自卫队,不许欺压老百姓;三、成立维持会,选举各方面代表参加,发动工人,宣传群众,保护矿山财产。

8月23日,国民党军官方凯带着国民党身份证,背着电台,掖

着手枪,来北票找到“小王子”。“小王子”找到了“靠山”,欣喜若狂,立刻派狗腿子领着打手去孟照喜和李奎元等处搜捕刘永生,扬言“抓住枪崩了他”。

刘永生在工人们的掩护下,被迫离开北票,到建昌找上级党的组织。齐英介绍刘永生去叶柏寿找二十五旅副旅长杨思录。杨思录任命刘永生为二十五旅直属工人大队队长,分配给他几支枪,用汽车送他回北票进行扩军。9 月下旬刘永生在北票矿务局南门外以刘明久名义挂上“工人大队”招兵牌子,动员群众参军。到 10 月末,工人大队已达到 700 多人,11 月下旬,奉二十五旅的命令,开赴平泉,改编为二十五旅工兵营。

周鸣岐武工队西征历险记

1945年6月，周鸣岐被冀东十六地委任命为朝(阳)建(平)新(新惠即敖汉旗)武工队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政委，许明任办事处主任。同时配上9名干部和14个人的武装班。在荒地村，冀东地分委书记张化东具体地向周鸣岐和许明交待了任务：“你们今晚就出发，以朝阳的老虎山为阵地，在此以南以北地区，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首先能够站住脚，而后再向内蒙扩展，到内蒙成立蒙古骑兵武装，力争与苏联红军接上头”。同时又指示：“要注意培训当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好统战工作，争取有民族意识的上层人物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你们深入敌区困难很多，比如离开地委的领导较远，通讯联络困难，生活供给要靠自己解决。你们有抗日救国的光荣传统，有打游击的经验，特别是有吃苦耐劳、英勇战斗的作风，因此分区党委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新的斗争任务。”

周鸣岐接受新的任务后，把23名干部、战士集中一块进行动员，并按要求主动于6月某日8点钟，带领武工队从义院口(抚宁县)出发。当冲出关外之后，很快被日本侵略军发现了。敌人认为八路军有大部队进入热辽山区，急忙从各地调兵遣将，尾随武工队进行追击和堵截。可是武工队已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突然插到了敌人的心脏。所以日军、伪军、讨伐队同时大叫大嚷：“不得了啦！八路军的大部队从天而降，到处都是呀！”武工队夜间行军，白天宿营，净走山道，不找响导，每到一个小村，先把全村包围起来，放上岗哨，只准进不许出。进村后，战士、干部不管多困多累，都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挑水、扫地，做群众宣传工作。有一

天，周鸣岐部队住到一个10多户人家的一个小村，队部住在一个富户家里。女的吓跑了，男壮年躲起来，只有老头老婆来应付武工队。周鸣岐一面宣传八路军的政策，一面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这家还有点不信，就在警卫班长铺盖底下放上几百块钱的满洲老票来试试周鸣岐到底如何。班长殷占波发现后，马上报告周鸣岐，并把钱交了上来，周鸣岐知道这是来试探武工队的，所以立即命令殷班长，把钱原封不动送交户主，户主老头儿感动地说："你们是真正的八路军呀！"于是全村的人都回来啦，看着武工队喜笑颜开。在这天夜里，周鸣岐把群众召集起来开了个生动活泼的群众大会。开始由他们诉说着苦难的14年，接着周鸣岐就向大家作了讲演，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胜利的新形势，宣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给大家唱了"解放区的天"这首歌，这个小村热闹了一宿。武工队怕暴露目标，就动员群众散去，可是群众迟迟不愿走，有的就说："不怕，狗日的是秋后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你们晚上在村子里吃住，白天到山上睡觉，我们村不会有人去日伪那里报告的"。武工队在这个小村住了两天，就与群众建立了鱼水相依的感情。

武工队从小塔子沟出发，经过梨树沟(绥中)、明水塘门(绥中)进入了建昌的黑山科，绕过黑山科据点，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行程半个多月，每到一地，调查情况，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声威。因此，许多群众把武工队说成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兵天将，都会飞檐走壁，每人都是几套衣服，还有讨伐队的衣服，白天找穷人谈话，晚上到富户家去住"。据点里的鬼子、伪军、讨伐队听了这些半真半假的情报，也都信以为真，吓得惊恐不安。

有一天，武工队准备天亮前宿营。可是从山上看看四外一个小村也没有，只有一个黑乎乎的大村横在山下。人们此时走了一宿，又渴又饿，又困又累。继续往前走，怕暴露目标。经过大家商量，当机立断，在30分钟之内，包围了这个大村，实行了严密的封锁。然后选择了一个大的院落(四合院)放上隐蔽哨之后就进到了院内。

经过一了解，这家大院的主人姓朱，这个村叫朱杖子，这个小地主乡绅就是朱杖子甲长。周鸣岐进院就碰上院主人，这人50多岁，穿着长袍马褂，见了周鸣岐文文雅雅地边作揖，边苦笑着说："贵军从天而降，欢迎、欢迎！"周鸣岐一面命令部队找门板搭脚手，挑水做饭，一面就和这位绅士拉起话来。周鸣岐说："对不起老先生！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我们是先遣队，为了解救人民出水火，大部队很快就到，今儿住在这儿，请你给个方便！"老绅士急忙把他请到屋里，小声地说："不瞒长官，我姓朱叫朱福义，因我为了这几亩薄田，为了维持地方，我当这村的甲长，我弟弟在玲珑塔当了一名受罪的警察所长，我们不是为名图利，甘当亡国奴，实属保护家乡，保护地面"。周鸣岐看他忐忑不安的神情，对他说："你不必害怕，我们不是把在满洲国做事的人都当成坏人、汉奸看待，有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为了地面不受蹂躏不得不出头露面，有的是甘当亡国奴，死心踏地跟着日本人残害自己同胞。因此，我们共产党对前种人是团结的，愿意联合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日。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阶层，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只要他做的是有利于人民的工作，我们就欢迎。八路军为了抗日救国，一切流血牺牲早就置之度外了。我们对每个为敌伪做事的人，谁好谁坏，心里都有一本帐，我们会按其表现区别对待的。"朱福义听了周鸣岐的宣传，马上让家人端茶做饭。周鸣岐说："这个不必，八路军有铁的纪律，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他以十分钦佩的眼光看着周鸣岐说了一句："我朱福义活了50多岁，没做过恶事，请你看着我的行动吧！"周鸣岐又盯上他一句："今天我军到贵处来，如果有人胆敢丧尽天良，向敌人报信，那我们对他就不能客气，这样人我们就叫他汉奸，那我们就要先除奸而后再打鬼子……，如果今天暴露了目标，敌人真的来了，对不起，你这个院，连你全家恐怕也好不了……"。朱福义听了这话，更感到十分沉重，马上回答："队长，你就放心吧！这个我完全明白"。朱福义出去之

后，武装班长殷占波对周鸣岐说："这位朱绅士的三弟朱福庭在青龙教过书，还是我的老师呢。"周明鸣就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告诉殷班长以师生的感情，抓住有利时机向他做政治思想工作。殷占波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经过殷班长一来二去的拉师生关系，做思想工作之后，朱福义全家很快和武工队亲热起来，朱福义的恐惧心理也就消除了大半。于是，这位甲长，就主动的布置村民给武工队站岗放哨，又把武工队住朱杖子的消息偷偷告诉了他弟弟玲珑塔的警察所长朱福庭，同时还详细的把各据点的兵力、武器配备等情况向武工队作了介绍。

第二天下午3点钟，突然发生了情况。敌人3辆胶轮车拉着几十个鬼子，两边和前后有100多名讨伐队保卫着，直奔朱杖子而来。有的同志对这个老绅士产生了怀疑，认为是他送的信，敌人是为我们而来的。有的提出要乘敌人不备来个突然袭击，然后拉上山去。周鸣岐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也产生了同感。立即把这个绅士找来，当头训斥了他一顿，然后提出要打。朱福义吓坏了，连忙指着自己的心窝说："我不是坏人，我绝对没有派人去报告，你们要相信我。这帮人不是来打你们的，他们是来……""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是去建昌过路的鬼子，你们看那个熊样，那象打仗的！""那怎么办吧！""我有办法，要求你们都在大院里隐蔽好，千万不要暴露，千万不要暴露！你们一暴露，我全家就都完了，这个村也就完了！我恳求你们千万不要暴露，更不要打呀"！老绅士说着，几乎要哭起来。

为了全村的安全，周鸣岐和许明等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当即命令部队严格隐蔽，做好战斗准备，看这位绅士的举动再作决策。刚刚部署好部队，鬼子讨伐队已来到了村口。就见这位朱绅士带领几名村丁，笑哈哈地向鬼子迎了上去，胶车上的鬼子一见，急忙问："八路的有吗？""八路的没有，平安无事，太君的咪西、咪西！"老鬼子一招手部署了岗哨，叫甲长朱福义烧点开水，并说休息一会就

走。老绅士听了,很快叫人送水,拿烟,鬼子兵抽着烟,喝着开水,嘻嘻哈哈闹了一阵。休息了半个小时,就拉着队伍走了。当晚周鸣岐找朱福义研究了武工队走后如何应付敌人,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又招集了一些贫苦农民骨干开了会,然后就和他们告别出发了。

武工队来到野鸡沟,这个村离朱杖子 40 华里,离玲珑塔 50 华里,离建昌 70 多华里,是个四面距敌较远的小山沟,并且打起仗来能进能出,能攻能守。进村后,放上岗哨安安稳稳睡了一天。然后武工队几个领导干部开了会,商讨要到朝阳县境内,摸清情况,再向老虎山一带进发。周鸣岐根据周治国提供的线索,决定派人到朝阳石明信沟去找王老凿联系。会散了,周鸣岐和许明刚迷迷糊糊睡了一小觉,突然警卫员报告:"沟口上来一个便衣,慌里慌张向村里跑来。""把他抓住送来!"不多时,这个便衣进了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报告说:"报告队长,我是朱所长派来送信的,你们到此,上边已经知道了,已向所里打了两次电话。催所里迅速探明情况,实际上所里早已知道你们到此,为了欺骗警察署,所长回答'没发现八路。'可是署里不信,直接派特务侦察,所以发现了你们。"他喝了一碗冷水继续说:"所长说,求队长赏个脸,请求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免得双方受害……。"这个送信的人还没走,第二个送信的人又跑来了。这个人慌张的更不象样子,进屋就说:"上面催得太紧,实在不行呀!现在玲珑塔的鬼子已出发,快到沟口河套啦!所长请求你们赶快上山躲一躲,山上山下只有我们警察队,我们会掩护你们的,我有半句假话愿对天盟誓……"

周鸣岐与许明商量一下,立即命令部队撤出野鸡沟,向后山转移,并做好战斗准备,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转到山上不到半个时辰,就见 200 多敌人,扇面形摆开,拉着战斗队形,乒乓地打起枪来,周鸣岐一看前面冲进村庄的是穿着黑色衣服白帽边的警察队,跟着的是穿着黄皮子的讨伐队,最后是一小队日本鬼子,在一个骑着马挥动指挥刀的鬼子军官指挥下,嚎叫着冲了上来。当一队警察

进村扑空后，向山上打了一阵枪，然后，就向村西撤去。日本军官有点不相信，用望远镜向山上左看右看，由于武工队隐藏的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形迹，也就跟着向西撤去。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消耗1万多发子弹，转了70里地大圈子滚了回去，而武工队一枪没发，安全地又撤回了野鸡沟。

武工队进村刚住下，天就黑了。在黑黑的山道上，上来一匹毛驴和两个人，经过盘问知道又是朱所长派来的人，就把他们接到村里，弄清了这是朱所长派人来跟我们谈判和送行来的。为首的一个人，向周鸣岐点头哈腰说："朱所长的意思，只要你们离开他的警戒区，你们要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周鸣岐当时提出："谢谢朱所长的关照，我们没啥苛求的条件，不过今后走这条道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保证我们粮款筹措，保证我们武器弹药补给供应。我们可以撤出他管辖境内，否则这就不好说了。"这个谈判代表马上表示："所长说一定确保你们安全，一定给你们粮款，至于枪支弹药的供应吗，所长虽没说，下官看来，枪支弹药是日本人发的，恐怕很难从命，不过小来小去还可以商量。"周鸣岐说："好吧！告诉你们所长，物资的援助可多可少我不计较，最重要别忘了你们是中国人，别丧了中国人的良心。"这两个代表满口答应："请放心，我们一定按队长的训示去做"。说完把毛驴身上的礼物猪肉、白面、粉条还有两条骆驼牌的香烟卸了下来。还特别送来一份朝阳县的地图。并说："转达朱所长的话，这是兄弟一点小意思，队长一定要赏脸收下，并恳求队长今晚一定给留个面子离开此地，如今后用着兄弟的地方一定效劳。"同时这两个代表又反复诉说："这几天建昌、朝阳的鬼子很注意你们，各地都下达通令，叫我们闻讯速报。隐瞒不报，要追查罪责。我们干这行的也是实出无奈呀！"周鸣岐说："好吧！东西我们收下，代我谢谢朱所长，就说抗战胜利后给他记一功，请你们回去吧！"

送走了警察所的谈判代表之后，正巧武工队去朝阳石明信沟

谈判代表韩德发两位也回来了。他们汇报说:“王老凿很客气,同意我们进他的石明信沟,可以在那里驻防,粮弹供给他们都可以,就是要他出来和我们一块打鬼子,他说不能答复,来了之后再作商量。”因为周鸣岐相信有周治国的老交情,去了后他不会耍花腔,所以决定了下步的行动,向朝阳的石明信沟进发。周鸣岐说:“同志们要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不久就要在老虎山下扎下根了。”当晚武工队美美地吃上一顿猪肉炖粉条,按计划离开了野鸡沟。

武工队穿过玲珑塔、丛杖子,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朝阳县六家子境内。当武工队艰难地行军一宿,天已大亮了,还没找着村落,武工队慌忙下了山,在一个叫张棚沟的村子外边埋伏下来。周鸣岐一面命令部队休息待命,一面派人到村里烧饭,饭还没做好,村里的老乡就来报信:“鬼子上来了,你们快上山吧!”突然发生的情况使武工队吃了一惊,当武工队爬上张棚沟的大山,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东北方向的大河套里,能有蒙古骑兵队 100 多名,尘土飞扬地向这里冲来。后边紧跟着 100 多名的讨伐队。向东南一望,从玲珑塔方向开来 100 多鬼子、伪军,向这边冲来,很快逼近了山下。向西一望,也有不少穿黑衣服的警察正向山上爬来。武工队已经四面被包围在这个不高的山上。周鸣岐和许明等几个党员开个临时小组会,决定:一、从正面突破骑兵的重围,向石明信沟方向靠拢;二、突不出去,就转身向玲珑塔、朱杖子方向突围;三、万一突不出去,剩下一人也要跑回去报告。即使全队阵亡也不能让敌人活捉一个人,并且对小分队做了紧急的动员工作,传达了党小组的决定之后,小分队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殷占波同志选拔了三四名射击准确的战士,并说:“听我的命令,一齐开火。”战斗部署刚刚布置好,100 多蒙古骑兵队疯狂地一面射击,一面飞跑爬上半山。殷班长说声“打!”一阵子排枪当场就打倒了两名骑兵,其余的骑兵调转马头向南、向北乱跑。殷班长一声命令:“冲下去!”20 多名勇士立既向山下跑去。刚到半山腰,讨伐队的机枪同时开了火。

周鸣岐立即命令:“上山里隐蔽!看准一个打一个,节省子弹要紧!”武工队的战士们冒着敌人枪弹,爬上了山顶。

周鸣岐和许明商量,如战斗能坚持到天黑,武工队就有希望突围出去,如果敌人在白天冲上山头,周鸣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四面八方的敌人不但没停止攻击,反而越加疯狂。他们乘着炮击的烟雾,满山遍野地向山上爬来。在这紧急的关头,周鸣岐命令全体同志把文书信件和所发的雨布、新鞋、夹被等物全部轻装埋在地下,长枪都上刺刀,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殷占波提醒周鸣岐说:“是否从敌人薄弱部猛打猛冲突围。就是死光了也甘心。”“对!这是个道理,不能拼死拉倒,党还需要我们开辟朝、建、新这块地区呢!”于是周鸣岐和许明反复观察了西部情况。虽然有100多警察和棒子队堵击,但他们的战斗力不强,只要武工队集中一个冲击,他们就会垮下去。并告诉大家,听命令突围。

这时,几个方向的敌人已离武工队不到1000米了,亡命之徒拥挤着向上爬来。周鸣岐立即命令:“用排子枪打!”一阵排子枪打下去。接着命令大伙:“放石雷砸死这群王八蛋。”这时,周鸣岐和许明、殷占波等人一声命令:“向西突围冲下山去!”就带头向西面边打边跑冲了下去,这一冲击,吓得伪警察、棒子队放了几枪就四散逃走。武工队打开这个突破口,沿着大河套一气跑了30多里,来到离朱杖子20多里的一个小山根,选好地形,放上岗哨,准备休息一会,做顿饭吃,哪知山东边200多名讨伐队,顺着山沟



八路军武工队向朝阳进军

突然出现在武工队背后，他们大喊大叫："捉活的呀！土八路快投降吧！"。武工队忍耐着劳累、饥饿又爬了起来，个别战士冒火地说："拼死拉倒，别受这窝囊气啦。"周鸣岐对着敌人打了3枪，大声命令着："上山！上山就有出路。"武工队员们又一鼓作气爬上了大山。

此时，讨伐队在鬼子的督令下，用钢炮、机枪掩护，企图冲上山来活捉周鸣岐，武工队每人只剩下几发子弹，便集中大家的子弹，由三五个同志集中用排枪猛打，其余同志用石头猛砸，霎时山石滚滚，200多名日伪军警，让武工队一阵连打带砸吓得屁滚尿流，趴在地上。

当敌人又一次发动冲锋时，闪电雷鸣，瓢泼大雨下了起来，武工队冒着大雨，转向山北麓朱杖子方向撤去。

那知天黑路不熟，刚要下山，就听一个战士喊叫一声掉进大沟里去了。周鸣岐命令互相拉着衣襟，向大沟爬去，不想到了沟口，武工队23名同志身不由己的都滑到沟里。这条大沟有十几丈深，三五丈宽，两边大石竖立，杂草没膝，确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人们实在饥饿，劳累走不动了，加上天黑下着大雨，路途泥泞无法前进，于是周鸣岐命令大家："放上岗哨，暂时休息！"每人在沟两旁选个避风避雨的地方用军帽把脸一盖熟睡了。第二天的傍晚，已经日落西山了，同志们才醒来，武工队整装出发，查点一下人员，全队无一伤亡，可惜那个先掉进沟里的战士却找不到了。

武工队员每人喝几口泥汤水，就顺山沟下了山。刚到沟口，就发现有人。武工队员立即卧倒，观察来人举动，及至那人来到尖兵跟前被抓住了。周鸣岐一看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头。就问"你是什么人？到这来干啥？"那人一听我们是八路军，惊喜地对我说："我的老天爷呀！还是你们哪？你们白天就在这沟里吗？太危险了，从早8点到晚上5点，讨伐队就出动300多人，在山上搜了一天；玲珑塔、黑山科、和尚房子、药王庙4个据点的敌人都出动了，搜了一天没搜着你们，回到村里除了抓鸡杀羊、抢东西，就是把乡民吊打的死去

活来,说我们私通八路,追问你们下落呀!”又说“队长!村子千万不能去,这里不能呆,你们乘黑夜快离开这里吧!”周鸣岐一听,这是一位善良纯朴的老农民,不会对我们使歹意,就问:“你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合适?”老农民想了想就说:“你们过了河套向西南去,西南山上有一座庙叫大胡仙庙。庙在半山腰,多年庙宇失修,烟火中断,轻意没人上去,到那最合适。”“庙里的人你熟吗?”“熟!他们都是好人,和我还有亲戚呢。”武工队又打听了周围的敌情和村镇,认定到那里是比较合适的,于是周鸣岐说:“谢谢你,帮我们带路好吗?”老农满口答应。

武工队过了干河套,爬上西南山,又走了10多里,在大山的山半腰,看见黑乎乎一片松林,武工队钻进松林走不多远,就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寺庙。武工队在庙外进行警戒,就让老农带着我们一位同志进庙。时间不长儿,老农民领着两位道士走出庙外接我们。这两位老道,见了武工队很害怕,一声没响把武工队领进庙院,住到了大殿里。

周鸣岐带人察看了这座庙前后情况之后,心里有了底,这座庙,是在半山腰上修起的,东南西北都有上山和下山的通道,是一座孤立的四斗庙院,地势对我有利。

住下后立即派哨兵严密封锁,就连带路的老农民也不能放他回去。然后就向道士们作宣传工作,筹粮吃饭,老道士起初很害怕,企图让武工队住一晚,吃顿饭就走,免得带来灾祸。于是他开口就说:“你们的威望我很了解,但是眼下还是人家的天下,到处都有日本兵搜剿,所以这里也不能久居,请大队长原谅。”周鸣岐说:“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达了,这里的天下很快就是人民的天下。黎明前总是还有一阵黑暗,一见太阳就全是光明了”。周鸣岐向他们讲抗日形势,讲了我党的政策,讲了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这两位老道士豁然开朗,连忙说:“粮食我有,柴草不缺,你们要啥,只要我能办的一定办到。”

整整两天两宿没吃饭,没睡好觉了。在这里吃上道士做的小米饭、大咸菜,武工队吃得饱、睡得好,在这儿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一天两宿。在这里,武工队开会,总结了这段的战斗、工作,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于第3天就出发了。

出发前,老道士们怕武工队员们饿着,又拿出米来每人装上一袋。武工队把仅有的七八条新夹被送给了他们,又给了一些钱,老道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激动地说:"你们真是天下的好军队,天下一定是你们的呀!"周鸣岐说:"抗日人人有份,你们这也是一次贡献呀!""这是应该的!"就这样,武工队当晚离开了这里,按着预定的计划前进了。

牺牲自己保护人民

岭上武工队以王起先为组长、李殿威为副组长，李风、张义、朱文秀、张玉书为组员的6人地下工作组，深入到现在凌源县牛营子以东到喀左县山嘴子(包括现在的凌源县五家子、四合当)一带活动。这些同志年青力壮，最小的朱文秀只有16岁。

工作组通过积极工作，很快在马家沟游击区站稳了脚跟，他们开辟的地区还包括张涵杖子西北沟屯，还有和西北沟一山之隔的喇嘛寺沟屯、赵杖子屯、窑沟屯。他们所以选择了这些地方，一是这里群众爱国抗日热情高；二是这几个屯山连山沟连沟，平时好隐蔽，有敌情便于转移。从敌伪政权管辖区看，这几个屯分属牛营子和平房子两个伪警察分驻所。两个分驻所驻地距这里均在25华里之外，属于敌伪统治薄弱地区，对八路军开展地下活动很有利。西北沟屯的农民王巨朋爱祖国、恨日本，拥护八路军，自愿当了八路军的地下联络员，他家也成了“堡垒户”，王起先工作组经常和他联系并住在他家，1944年的春节，王起先等同志就是在王巨朋家过的。1月29日，王起先等6人正在王家休息，来了一个叫李树生的小羊倌。李树生没进院，碰见了王巨朋的父亲王增善，怕李树生碰上家里的八路军，就没让他进院，可是粗心大意的王增善却把家中住有八路军的事透露给了李树生。李树生回到离西北沟屯8里路远的谢家沟屯姑姑家，信口对姑姑和姑父说了王巨朋家住有八路军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地刘森、刘发哥俩知道这事后，就报告给在牛营子专门搜集我八路军活动情报的马专友(解放后被判刑)，马立即报告给牛营子伪警察分驻所。

王起先等6人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和住处，以防被敌人发现而

受损失。29日,他们离开王巨朋家,乘夜路于1月31日拂晓前,来到了离西北沟屯7里外的窑沟屯刘珍家(堡垒户)。王起先等6人到了刘珍家后,刘家热情招待。刘珍的妻子刘于氏忙给同志们做饭。王起先等6人连日奔波,常年睡不上个囫囵觉,今天刚转移到新的地方,又是信得着的"堡垒户",所以饭都没吃便倒头睡着了。

饭做好以后,刘珍进屋看大家睡得正香,他不忍心立即叫醒他们,便出屋来嘱咐自己16岁的儿子刘相礼说:"过一会你叫他们吃饭。饭后把他们送过北梁,到沟里老高家待着,保证安全。"刘珍说完就忙着去沟外老于家帮助料理丧事。

刘珍离开家门,走出不远,看到从沟口外来了一帮全副装武气势汹汹的敌人。这是牛营子伪警察分驻所接到情报后纠集的日伪讨伐队跟踪追击王起先他们6人到这里来的。刘珍见事不好,就急忙往家里跑,进屋后大声说:"不好了,敌人来抓你们来了!"王起先他们闻声起来后,忙问刘珍怎么办?刘珍说:"我看你们跳过院墙,朝东北方向的梁上撤。"动作麻利的王起先、朱文秀、张玉书3人出屋跳过墙,就向北山方向跑去。屋里的李殿威、李风、张义等3人为了保守党的机密,忙把一些机密材料放到灶内烧。此时,敌人已把刘珍家院子围得水泄不通。前面梁上,敌人还架起了机枪。李殿威、张义、李风3人隐蔽在屋内,给手枪上好子弹,准备迎击敌人。屋外的敌人狂呼乱叫,让屋里的人出来,扬言要是不出来就点着房子,把屋内的人全烧死。刘珍沉着地走出屋外,刚出大门口,牛营子分驻所所长刘广文上前一把将他揪住,厉声地问:"你们家住着多少八路军?"刘珍想说屋内没外人不行,就说是建昌县来的日伪人员。刘文广气急败坏地说:"还敢撒谎,明明是八路军还胡说!"这时,上来几个人用枪把子狠打刘珍,并逼刘珍回屋,把八路军给叫出来,不然,不仅要杀死屋里的八路军,对刘家的人也要斩草除根。刘珍被迫回屋后,将情况告诉了李殿威他们。李殿威当即立断地对李风、张义说:"同志们,我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保护人民,绝不能因为

我们让老百姓搭上性命。”说完，他们3个人勇敢地走出了屋，被敌人捆绑起来。他们虽然被捕了，但保全了刘家人的性命和房子。

王起先、朱文秀、张玉书3人从刘珍家跑出来后，刚要上梁，也被敌人围住。原来敌人除在刘珍家院外有个小包围圈外，还有个大包围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起先3人也被敌人抓住。敌人抓住王起先等6名八路军后，又抓走了刘珍、刘相礼及刘珍的侄子刘相良和小羊倌李牢帮。因为刘相礼年纪小，又有病，走到郭杖子屯时被放了回来。

王起先等6名同志被抓走后，人们十分痛心，非常怀念他们。对给敌人送情报的坏人和日伪反动派更是痛恨。谁知事出凄巧，王起先他们被捕不到一个月，给敌人送情报的刘森、刘发二人都得暴病死去。群众知道后，拍手称快，说：“老天开眼，恶人不得好报应！”

王起先等6同志被捕后，被敌人带到牛营子伪分驻所严加看管了一宿，又和刘珍等3人一起被送到山嘴子警察署，敌人给他们照了像，又赶紧把他们送到建昌县警务科。敌人在审讯王起先等同志时，他们视死如归，一直没暴露党的机密。当敌人问到刘珍和他们的关系时，王起先说不认识刘珍，这是头一次到刘家。在这样危难的时刻，王起先等同志考虑的还是如何保护人民，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后来，王起先等6名同志都被敌人杀害了。他们为了抗日救国，解放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刘珍在伪建昌警务科监狱里，受尽了敌人的酷刑。他是个坚强的汉子，一口咬定不认识王起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八路军，他们这是头一次到自己家，自己原以为是建昌来的日伪人员。敌人找不到刘珍和八路军有来往的证据，又要不出口供，在1944年3月放回了刘相良，4月放回了李牢帮，10月又放回了刘珍。刘珍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虽被折磨得满身是伤，腰间有几处流脓，但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牛营子分驻所和讨伐队一起抓捕了王起先和刘珍他们后，平

房子警察分驻所闻讯也在管境内抓捕嫌疑犯。1944 年 2 月 2 日，伪分驻所长何清连带着 30 来个讨伐队员到张涵杖子的西北沟屯，抓走了家里曾住过八路军的王巨朋、白永昌，还抓走了李景余。敌人在审讯王巨朋时，给他“轧滚杠”、“灌火油辣椒面”，但王巨朋拒不承认他家住过八路军。敌人找来小羊倌李树生“对嘴”，他仍顶着，不认帐。敌人没有办法，先放回了白永昌和李景余，过了 8 个多月，又放回了王巨朋。

朝阳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赵子卿

赵子卿，曾用名赵思、赵振河、赵光军，1921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西古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8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易县第十二交通站站长，县人民抗日自卫大队政治指导员、区武委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派出所所长兼区直党支部书记。1944年12月，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工作。

1945年5月受党组织的派遣，于6月12日到达日伪统治区的朝阳县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长期潜伏，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在敌伪军政和一切伪组织开展瓦解和争取工作，养精蓄锐，配合反攻。”

赵子卿肩负革命重担，落脚于胞兄赵振江家里，通过赵振江结识了从河北省来朝阳谋生的几位老乡，交了穷朋友，依靠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下工作。不久赵子卿发展了赵振江、王永丰、姜生明、刘四海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1945年7月1日，在朝阳县城秘密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赵子卿为组长。

赵子卿以做苦力的身份，带领王永丰等人深入到城内居民、学校、朝阳北部的大庙一带和南部的一些地方，了解民众抗日情况。经一段秘密调查后，赵子卿了解到朝阳城内存在着国民党地工人员，其头目叶相桐的公开身份是伪兴农合作社职员。

从此，对叶的活动，赵子卿予以缜密的窥察。同时对朝阳旗公署(吐默特右旗)中层职务以上的日伪职员和警察，都进行了摸底，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朝阳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单永善等重点人物的罪恶事实，进行了重点掌握。

1945 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胜利江山归于谁的时候，叶相桐自封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发展党员，声言高挂国民党县党部招牌。日军的走狗单永善等成立中央军朝阳县保安军司令部，还计划扩到 2000 人。伪旗长宝音乌勒吉与各界头面人物协商成立地方维持会，自任会长。朝阳的乡村有一些头面人物，以"除奸灭匪"为旗号，重新笼络兵戎。一些惯匪也乘机活动。这一切，对赵子卿开展革命工作十分不利。赵子卿认为，处在严峻的时刻，必须先发制人，把握斗争的主动权。他与叶相桐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赵子卿到旗公署找叶相桐，以东北工作委员会朝北工作组组长的身分，向叶相桐提出了三条指示：1. 不能挂国民党朝阳县党部的牌子，不要发展党员，必须等待上级的指示；2. 敌伪警察不准改编为中央军朝阳保安军；3. 缩减现有军队人员，回乡为民，绝对不允许成立保安司令部。叶相桐未敢妄动。

事后，赵子卿与叶相桐又进行一次交锋，叶承认赵是他的上级，邀他到旗公署给股长以上的伪职人员作演说。赵子卿毫不犹豫地到旗长公馆，在由宝音乌勒吉招集的股长、警尉以上伪职员大会上，赵子卿慷慨陈词，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向他们指出弃暗投明是唯一出路。同时又与单永善展开一场舌战，挫败了敌伪人员的气焰。第二天，叶相桐、宝音乌勒吉等人，企图在喇嘛庙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向赵子卿发难，赵子卿以其智慧和勇敢战胜了他们，并在群众大会上进行了满怀胜利激情的讲话，使到会的人都受到教育，稳定了朝阳形势。

1945 年 8 月下旬，苏联红军进驻朝阳。9 月初，赵子卿和姜生明去锦州，向中共辽西地委、专员公署汇报工作。当即任命赵子卿为朝阳县县长，张荣远代理中共朝阳县委书记。赵子卿和张荣远立即回朝阳筹建县人民政府。

1945 年 9 月 10 日，朝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赵子卿代表县

政府宣布伪旗公署人员一律留用。控制使用叶相桐，任命他为县政府秘书。根据地委、专署的部署，县政府颁布了四项决定：1、立即释放伪满监狱中的所有在押犯人；2、关闭当铺，合理清理抵押物；3、解散妓女院；4、打开粮仓，救济饥民。这些措施的实施，广大人民欢天喜地，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百姓谋幸福的。与此同时，赵子卿主持建立了200多人的县支队。

人民政府成立后，不甘心失败的敌伪分子企图进行破坏。9月17日，赵子卿接到情报，说叶相桐和北票蒙古王府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小王子”让叶相桐捉捕赵子卿押送北票，朝阳县县长由叶相桐担任。赵子卿和张荣远，根据确凿的情报，立即到苏联红军司令部说明情况，要求给予紧急援助，平息预谋叛乱。苏军司令部立即打电话向驻锦州苏军司令部报告，并把情况通知八路军锦州卫戍司令部。司令部首长立即决定成立了朝(阳)北(票)卫戍司令部，任命宋国祥为司令员，火速带领一个营和十几名地方干部赶赴朝阳。宋国祥率部队到达后，赵子卿带领县支队，紧密配合，逮捕了叶相桐，一举粉碎了其蓄意已久的叛乱阴谋，在组织上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热辽人民支援前线

9月下旬，赵子卿和张荣远，与朝阳参加过抗日的3支地方武装队伍的领头人赵清泉、王文福(王老凿)、苑久和商谈后将3支队伍改编为朝阳县独立团、朝阳县第二支队，朝阳县公安大队。任命王文福为县政府联络科长。

1945 年 11 月,中共朝阳县委员会建立,王怀义任县委书记,赵子卿仍任县长(县委委员)。

1946 年 1 月 4 日,国民党军大举向朝阳进犯,为避敌锋芒,赵子卿和王怀义奉上级指示,带领朝阳县党政机关干部和县支队作战略转移,撤到青龙县境内。1946 年 5 月初,赵子卿与王怀义率领朝阳县党政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重返朝阳境内,赶走了六家子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占据了柏山中段,县政府驻扎在达子三家,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建立了 4 个区级人民政府,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扩大了朝阳南部的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纪实

一、奉命出关，挺进东北

1945年，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在击败德国3个月后，出兵远东。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次日，苏军150万人组成多兵种合成部队，沿中苏、中蒙、中朝边境3500公里的战线。从东、北、西三面，向日本关东军70万人和伪军30万人发动了进攻。

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布我国抗日大反攻时刻的到来。10日，朱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命令各地人民军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收复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切失地。11日又发布第二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向辽宁进发；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冀热辽区党委、军区接到命令后，于8月13日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8个团、1个旅、两个支队，1.3万余人(占当时部队的三分之二)，4名军分区司令及4名地委书记兼政委及2500多地方干部，由李运昌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冀热辽挺进军前方指挥所，李运昌任书记兼司令员，率队挺进东北。先由靠近东北热河的第十四、十五、十三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一梯队，由军区直接组成第二梯队，于8月中旬分3路，北出长城各口，迅速进入东北、

热河。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由李子光同志任书记，领导热河党的工作；成立热河行政公署，领导热河的政府工作。

会议确定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热河的任务是：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东北、热河的日伪武装及日伪汉奸势力；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为后续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开辟通道；中路十四分区和中路十五分区，配合苏军解放热河，东路十六分区和军区第二梯队，配合苏军解放辽宁、吉林。

苏军从 8 月 9 日发动攻势到 8 月底，击败了日本关东军主力，占领了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旅大、承德、赤峰等大城市及主要铁路线。但日军残余武装没有完全投降，广大中、小城市尚未解放，还有许多地方的日军在负隅顽抗，有的直到 9 月间，还在进行抵抗。至于伪满军还有成团、成旅的武装，不但没有缴械投降，而且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城市的伪满国宪，则持枪挂刀为国民党党部及汉奸维持会站岗放哨，压迫人民。我军进入热河、东北后，经过战斗和工作，才将他们解除武装、消灭或改编。



热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

西路十四军分区部队第十三团、十六团一部和北进支队 2000 人，由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副政委黄文率领，8 月

中旬由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进军。在兴隆县争取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岗率伪满国兵4个团、7个讨伐大队和警察队共10000余人起义，解放了兴隆、承德、滦平，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师。原在围场活动的北进支队王文所部，8月18日，与由多伦南下的苏军会师，解放了114场、隆化等县城。

中路十五军分区部队第十一团、五十一团2800人，由司令员赵文进、地分委书记宋诚率领，8月17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8月20日在平泉与苏军会师，在平泉外围解除了伪满军一个旅的武装，接管了8座县城，俘敌伪人员5000余人。

东路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第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临抚昌支队，约4000人，由曾克林、唐凯率领挺进东北，第一仗就攻打山海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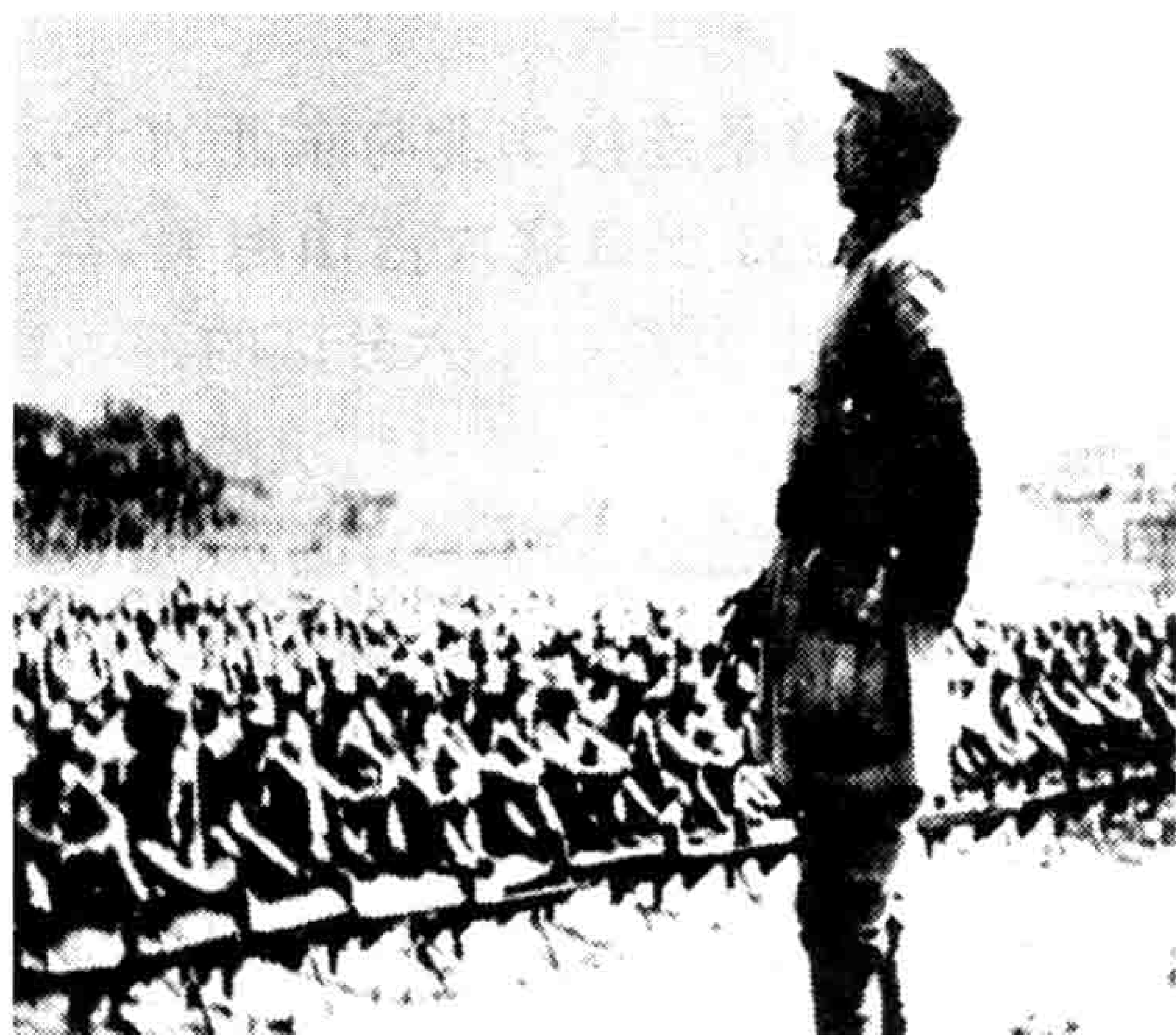
二、与苏军会师，配合解放山海关

北宁铁路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大动脉，山海关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1933年日寇攻占山海关，盘踞山海关已12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我冀热辽十六分区的部队和人民，就是在山海关这块战略要地周围，长城内外进行抗战的。日寇经常从此出发向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烧杀虏掠，“清剿”、”扫荡”，使山海关内外附近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对我国人民欠下了一笔又一笔血债。

1945年8月，我军举行对日大反攻时，山海关城内的日伪军2000余人拒不投降，成为我军挺进东北的障碍。要攻克山海关，必须先打下山海关附近的外围据点。十六分区部队先打下了张各庄车站和樊各庄日军据点，又于8月20日打下山海关外围的重要据

点海阳镇。28日打下柳江和石门寨煤矿。拔掉了山海关外围据点后，8月29日，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由九门口出关，经一夜行军，于30日上午迎着朝霞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前所车站，解除了该站伪满军400余人的武装，切断山海关至绥中敌伪联系。我军经10天作战，扫清山海关周围的日伪据点，使山海关成为一座孤城。这时，得知苏军从林西、赤峰方向经叶柏寿、凌源等地南下，向山海关方向前进。南下苏军由一位上校和一位少校营长伊凡诺夫率领，约60多人，带大炮3门，分乘汽车5辆和吉普车，向我前所车站开来。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很高兴。

抗日战争中，中苏两国军队相隔千山万水，各自在东西两个战场上，打击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队。1945年8月，由于苏军出兵东北，使两国军队会师，同在一个战场上打击日本法西斯军队，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我军为表示热烈欢迎与苏军会师，临时抽调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奏起"迎宾号"，部队排成四路纵队，呼口号，行军礼。两军领导人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中苏两支部队会师后，我方向苏军介绍："冀热辽是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8年来，我们在这里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的作战。这次我们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武装，收复东北失地。""目前山海关还有日伪军2000余人和日伪驻该城的地方政府人员，没有缴械投降，对我挺进东北不利"，"希望苏军配合，共同攻打山海关，



李运昌在给部队战士讲话

消灭守城敌人”。开始，苏军迟迟不表态，经我方再三交涉，苏军报经他们上级同意，直到下午才同意配合我军攻打山海关。经中苏双方指挥员研究决定：攻打山海关由我军担任主攻任务，苏军以炮火配合。并决定 8 月 30 日 12 时以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和苏联红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山海关日军发出通牒，命令敌人无条件投降。通牒指出：“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举行对日大反攻。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全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红军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即派中苏两军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去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 2 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

我军派侦察科长郑公然、参谋董占林、敌后干事齐勇为中方代表，苏军派一名副连长和两名战士，手持转盘枪，挂着苏联国旗，共乘苏军吉普车驶往山海关送通牒。1 小时后，日军一名上校带领一个班出城，与中苏代表谈判。由我方当面交给通牒。苏军副连长提出：“限全部日军及伪军下午 2 时在火车站 200 米处集合投降，交出全部武器。”日军指挥官借口北支派遣军司令官村定大将奉有蒋介石命令，拒绝向中苏军队投降。苏军代表上尉副连长当即怒火冲天，连连对日军指挥官大骂，苏军战士端着转盘枪，吓得日军抱头跑入城内，将城门关闭，顿时战斗气氛紧张起来。城内敌人也登上城墙垛口，作战斗准备。这时，我军部队已跑步到达山海关外不远的地方。我军指挥员和苏军当即决定攻城，以武力消灭守城敌人。

未攻城前，再次向守城敌军发出最后通牒，但日军守城司令官顽固不化，再一次拒绝投降，并对我军加强戒备。中苏双方指挥员当即下定决心，消灭守城敌人，并对攻打山海关作了部署。

30 日下午 5 时，各部队部署就绪后，在统一命令下，由苏军首先向守城敌军开炮轰击。十二团、十八团从南北两翼同时向指定目

标发起攻击。一时枪炮声大作,敌人也进行顽抗。经1个多小时的战斗,十八团由团长周家美指挥,首先夺取城内的制高点,将红旗插上“天下第一关”的城楼,掩护部队向城内突击。十二团在团长杨树元指挥下,首先夺取火车站,肃清敌人,而后炸开城门,迅猛向城内敌人突击。守城日军见城内外制高点已全部被我控制,形势不利,大都无心恋战;伪军眼看日军弃城溃逃,纷纷举枪投降;守城日军指挥官妄想组织巷战,进行顽抗,但由于我军攻击猛烈,敌已丧失斗志,有的举枪投降,顽抗的均被我军击毙,敌人此时已象无头苍蝇,到处乱窜,争相逃命。我十二团、十八团及苏军部队对未放下武器的敌人,穷追猛打,不给喘息之机。经过三四个小时激战,除一部分日军逃跑外,城内日伪军全部被我消灭。

在我军与敌激战时,被压迫长达12年之久的山海关人民,怀着对敌人十分仇恨的心情,不顾安危,提着开水,捧着食物,涌向街头,支援我军作战。在人民群众积极援助下,山海关战斗取得了胜利,被国民党蒋介石奉送给日寇的山海关及被奴役的数万同胞,才得到解放。

战略重镇山海关解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共同战斗的结果,两军指战员万分高兴,共庆胜利时,人群中不断发出“斯大林、毛泽东乌啦!”的欢呼声。

这次战斗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50余人。伪军警由于眼看日寇失败,无心为日寇送死,当我军进入山海关后,稍作抵抗,即全部缴械投降。临榆县伪县长陈维廉及伪政府人员、伪满海关人员也缴械投降。此战共毙俘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各种子弹百万发及大批日伪军屯积的军用物资。

我军打下山海关的消息,很快在长城内外传开,振奋了根据地的军民,被奴役的山海关人民更是欣喜若狂。当夜,山海关各条街道张灯结彩,悬挂彩旗,燃放鞭炮,商店开业,欢庆解放。山海关胜利的消息,还通过电台迅速传遍全国。《解放日报》于1945年9月6

日在第1版用大字标题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向全国作了广播:“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及沦陷敌手12年之久的榆关镇,已于8月30日为我军光复。”

山海关收复后不久,我军前方指挥部进驻山海关,与苏军在山海关的负责人和滦东地区专员于明涛同志见面。苏军表示很友好,并派汽车迎接我军入城,山海关人民群众也列队欢迎,场面非常热烈。

我十六军分区部队打开山海关以后,稍事休整、扩充,在曾克林、唐凯同志率领下,于9月4日乘火车进入锦州与苏军会师,并消灭盘踞锦州地区的伪满军两个旅及沿线伪宪警。然后由十八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接管锦州市,控制了辽西战略要地。

三、进驻沈阳,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建立民主政权

十六分区司令部接管锦州后,于9月5日率领十二团及朝鲜支队2000余人,乘火车迅速进入东北最大城市——沈阳。我军突然出现在沈阳,影响很大,苏军感到意外,对我军来得如此迅速有怀疑。开始,不准我军下车。面对这一情况,曾克林和张化东、刘云鹤同志带着参谋人员到苏军沈通司令部交涉,卫戍司令卡夫东见到曾克林时曾责问:“你们是什么军人?从哪里来的?谁叫你们来的?”这很不礼貌的责问是曾克林同志没有料到的,但他仍心平气和地向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奉延安总部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的。”卡夫东向曾克林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这时曾克林也说:“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是毛泽东、朱德。我们是奉他们的命令来沈阳

的。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有延安总部的命令。”卡夫东很生气，发了一顿脾气，仍不同意我军进沈阳。这次交涉无结果。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同志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中央二号命令作根据，一定要和苏军据理力争，排除万难也要进驻沈阳。曾克林等同志第二次找卡夫东交涉，卡仍坚持不让下车，又无结果而回。直到下午 3 点，曾克林和唐凯同志第三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这次他俩态度都很强硬，一见卡夫东，唐凯同志便伸出胳膊，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着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标志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出来一个政治干部叫格拉辛科，此人态度和气，较老练。曾、唐两同志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和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和你们部队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我们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报问莫斯科。”苏军听了这一席话，感到有道理，格拉辛科和卡夫东耳语进行商量，最后表示同意下车，但要驻到距沈阳市 30 里外的苏家屯去。尽管这样，与苏军 3 次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傍晚部队接到下车的命令，2000 多人迅速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身着一色黄军服，战士每人一个钢盔，带着子弹盒，枪都上了刺刀，每连 9 挺机枪，队伍显得威武雄壮。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冲破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反动势力的阻挠，自动涌上街头欢迎。广场和街道两旁聚满了人群，当部队排成四路纵队沿大街唱着“八路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出发时，沿途群众高呼口号：“不当亡国奴！”“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当时国民党军的一个坏分子趁机捣乱，扔出一个手榴弹，炸伤了一个老百姓，群众一拥而上，当场将他打死。人们骂着：“14 年东北人民被卖国贼蒋介石

国民党出卖，过的是亡国奴生活，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更生布，日本鬼子、汉奸、特务任意屠杀、欺凌中国人，我们盼望着解放，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你们还捣乱！”当人们看到自己的队伍行进在大街时，许多人流下了眼泪。人们说：“这下子好了，该是出头的日子来到了！”

在队伍行进中，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呼后拥，并肩而行，象举行一次庆祝胜利解放的大游行。苏军有两辆装甲车为前导进行护送。当苏军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自发地欢迎中国八路军时，也非常震惊。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马上改变原先的态度，派了两名上校，坐着吉普车，前来追赶队伍，在途中拦住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于是，部队又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歌曲，走向小河沿驻地。许多群众夹道欢迎，直送到驻地，不愿离去。

9月6日，十六军分区司令部搬进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政治部搬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部队仍驻小河沿。这样，我军力排万难，总算站住了脚。当天，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派人来市府大楼找唐凯同志到苏军司令部会谈。他们询问了我党我军的一些情况及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等等。唐凯同志回答了他们提问的问题。9月7日下午，苏军驻沈阳最高司令部，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派来两名上校军官到市府大楼十六军分区司令部，通知曾克林、唐凯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了电报，你们确实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

曾克林、唐凯到了苏军司令部。最先打击日本关东军、攻击沈阳的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和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即苏军驻沈阳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会见曾克林、唐凯同志，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苏军驻沈阳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们均在坐。

克拉夫钦科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

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

曾克林、唐凯同志说:“8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冀热辽是我军战斗的地方。这次我们出关,与你们部队会师,配合作战,打开山海关,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唐凯补充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蒋介石消极抗战,躲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的。”

曾、唐还向苏军讲了延安最高统帅部发表的第一、二号命令的精神。当唐念到“为配合苏军有效地消灭日本关东军、伪满军,收复东北。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时,克拉夫钦科、图马尼扬及各军负责人均非常高兴。

克拉夫钦科说:“我们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接着,就对今后我军和苏军如何配合,肃清各地敌伪武装势力问题,进一步进行了会谈。会谈后,我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并发布安民告示。9月30日,党中央正式下达命令,令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番号,苏军也通知驻东北各地的部队,凡佩带有“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在各地自由活动,不受限制。从9月7日会谈后,苏军对我军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对于后来我军继续挺进东北,开创东北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六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得到很大发展,并一度接管看守关东军在苏家屯的军火仓库,取出大批武器弹药,装备了部队。9月14日,十六分区部队即开赴南满,接管鞍山、辽阳、营口、抚顺、本溪等城市,并坚决消灭了南满的日伪残余势力。我朝鲜支队参加了消灭通化日军3000余人的战斗。盘踞辽阳的伪满军1个团,在伪满大臣于芷山的儿子于学谦指挥下,拒绝向我军投降。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全部消灭。从本溪逃入平顶山的残余日军1000多人,在我驻本溪部队发出通牒后,仍拒绝投降,被我军二十一旅及警卫部队

围剿歼灭。仍在辽阳奉集堡机场的关东军林木航空大队(有飞机 20 余架),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投降我军。驻连山关、凤凰城的日军航空大队地勤人员向我投降。伪保安部队约 100 人,经我二十一旅包围,解除武装。

我冀热辽部队自 8 月中下旬进入热河、东北,至 11 月底,各部队经过战斗和发出通牒,共解除伪满军 3 个旅、2 个团,60 个县、市的伪满警察大队等约 4 万人的武装以及日本关东军残余 5000 人,并在兴隆争取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岗部 1 万人和青龙县伪讨伐队张金祥部 2000 人起义。

9 月初,我前方指挥部和第二梯队 5000 人及大批地方干部出关,9 月 16 日进入沈阳。当时,苏军态度很好,派 300 人到车站欢迎。

我十六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即与东北抗联冯仲云同志取得联系。9 月中旬,在长春的原东北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等又亲来沈阳与十六分区部队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军进入沈阳后,东北抗联利用广播电台,向全东北人民传播了冀热辽部队已到沈阳的消息,这既鼓舞了东北人民,同时,关内各解放区,主要是晋察、山东派到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原在东北潜伏的地下党员,得到消息后,都纷纷前来接关系,仅东北工作委员会系统就有 100 余人。这些同志向我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对我军接管东北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集资财,肃清敌伪残余势力,扩大部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曾克林飞赴延安,我军接管热辽地区

冀热辽出关部队攻克山海关,迅速进驻锦州、沈阳,提高了我军地位,扩大了我党影响,争取先机之利,接管了城市,给日伪汉奸

和国民党反动派以严厉打击。但由于东北是重工业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妄图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东北，因此，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我军政工作人员迫切需要了解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及时得到中共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但当时通讯技术落后，不能达到目的。

恰好这时，苏军驻长春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要与我党中央联系，9 月 14 日，苏军代表卫斯别夫上校及翻译谢德林和曾克林一起乘机飞赴延安。在机场，受到杨尚昆、伍修权同志的迎接，并与彭真同志见了面。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已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当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及我军在东北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彭德怀、叶剑英、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汇报时，不时提出问题，曾克林一一作了回答。听取汇报后，中央对冀热辽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挺进东北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

曾克林同志在延安期间，苏军上校卫斯别夫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延安总部转达了苏军照会，并与朱德总司令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我军接管(锦州在伪满时为 1 个省，辖辽西 14 个县)。至此，我军已全部完成对热辽地区的接管工作，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血海深仇篇

日寇残害朝阳人民所犯罪行综述

在东北抗日的14年中，朝阳大地是一块愤怒的大地、燃烧的大地；朝阳人民是不屈的人民，英雄的人民。在艰苦卓绝的喋血抗日斗争中，无数忠贞英勇的朝阳儿女，无私无畏，以身殉国，视死如归，舍生取义，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家乡的山川大地上。日寇对朝阳人民的抗日壮举恨之入骨，所以他们占领朝阳后，便对朝阳人民进行猖狂的血腥报复。他们一方面对仍坚持抗日的义勇军，调集重兵进行清剿扫荡，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所谓“强化治安”措施，奸杀烧掠无所不为，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的统治。特别是他们还丧心病狂地制造了一系列集体屠杀事件，使无数同胞惨遭毒手。他们杀人手段也极其残暴，刀砍、枪杀、肢解、剖腹、掏心、火烧、塞冰窟窿、刺刀挑、铡刀铡、狼狗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摧残妇女的罪行更是令人发指。

1933年7月16日，日伪军300多人，从朝阳出发到大城子一带进行抢掠活动。他们途经甘招东赤里赤村时，由于任意践踏庄稼，抢掠牲畜、殴打村民，遭到了村民的反抗，于是这伙暴徒便立即对东赤里赤村民进行血腥屠杀。两个小时便把好端端的一个小山村的59间房屋化为灰烬，杀死村民32人、伤5人。

日寇特别对义勇军经常活动的地区，进行有预谋的血腥屠杀。

朝阳县南部的二车户沟，是义勇军首领王震的家乡，1932年6月，一股由锦西窜入朝阳县境内的日寇小分队，在这里曾与义勇军交战，日军头目伊藤等23人在这里送了命。8名残敌在逃回锦西途中，又在曹杖子后山，被王老凿派人截击，打死了2名，只剩6人逃回本部。从此，日寇便对二车户沟伏下杀机。日军侵占朝阳后便

预谋血洗二车户沟。11 月 9 日，一股日军部队又一次闯到二车户沟，村民听到汽车声便四处逃散，日军将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杨玉峰和田凤岐开枪打死，又把部分群众从山上圈回来。日军头目训话说："好人的别跑，跑的都是红胡子，如果你们再跑，就统统的打死……"敌人说完真的没再施暴就撤走了。鬼子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欺骗了善良的中国民众。所以，当 11 月 14 日又一股日军窜来时，群众没有逃散。当天，这股日军只到龙潭沟去看了伊藤等人的墓碑，没动武，群众更麻痹了。没想到，15 日一大早，敌人便包围了二车户沟，大开杀戒。凡青壮年男人见一个杀一个，枪杀、刀砍、刺刀挑，手段十分残暴。

日伪统治稍得安定后，日寇更变本加厉的实施他们的报复阴谋。从 1934 年和 1945 年，日寇在朝阳大地大肆屠杀，制造了许多集体屠杀惨案。

1934 年 5 月，一股 30 余人的骑兵在羊山以西与义勇军武装交火，有 7 名日军溃退途经南营子村时要进村隐蔽，村民以武力对抗，没让他们进村。5 月中旬，又一支日军与当时驻在南营子一带的义勇军王震部交战，击毙日军 10 多人。5 月 19 日，一股日军从朝阳出动开到南营子村外，便用枪炮对村内齐轰，村民开始四处逃散，敌人便出动 1 架飞机在空中扫射。敌人一边进村杀人，一边烧房子。全村立刻浓烟滚滚，大火冲天，鬼子的吼叫声和村民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由于村民逃的快，大部分得以逃脱，但仍有 27 人遭杀害。全村 400 多间房屋，只剩下一间小茅屋，余皆化为灰烬。

就在同一天，建昌县的一个只有 20 多户人家的小山村——王砬子沟也遭到日寇屠杀。因为这里曾是义勇军活动的地方，被日军骂为"匪窝"。这天一早，一股日军突然袭击了该村，正在村头闲坐的 2 位老人立即被击中，在地里干活的 11 名青壮年全部被杀害。又把村中的妇女老幼召集起来，命令全村立即迁出村外进入"人圈"。日军撤走后，逃散的群众回村收敛尸体，共 13 人被杀害，2 人

受重伤。死难者中，岁数最大的62岁，最小的仅12岁。

由于王老凿(王文福)领导的石明信沟坚持反满抗日，不接受日伪当局管辖。日伪军出动1000余人于1934年12月对石明信沟大肆清剿，未来得及逃走的34人全遭杀害，烧毁房屋200多间。被杀的人还被放火焚尸，鬼子在沟内烧杀了7天才撤走。

同年11月，日军还在建昌县的药王庙地区出动300多名日伪军进行大搜捕。把曾任义勇军营长的李云阁及反满抗日志士李长奎等17人逮捕。日寇对他们施以酷刑，叫他们交出所谓“匪徒”名单和武器。这17条硬汉子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面对强敌的暴行毫不屈服。日寇气急败坏，把17名志士绑赴刑场。临刑前，日寇头目仍进行引诱：“交出的不死，不交出死了死了的。”李云阁高喊：“怕死就不做中国人！”另一志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死不当亡国奴！”话音刚落，敌人便开了枪。17位爱国志士倒在血泊中，他们把自己的一腔碧血洒在了生养自己的故乡大地。

朝阳县下五家子村(1961年划归锦西县)曾是义勇军经常活动的地区。日军占领热河省后，曾3次出动日伪军对这里进行清剿，都遭到爱国民众武装的抵抗，造成伤亡。1935年11月16日早，大批日伪军突然包围了下五家子村。把全村100多名青壮年赶到西河套，用机枪逼住。先把早已被捕的姜佐周等3人押回当场处决，然后对人群用机枪扫射，顷刻间，成排的人倒了下去，浸在血泊中，尸横遍地。鬼子兵又在死尸中巡视，发现蠕动或呻吟者立即用刺刀刺或补射，又把尸体倒上汽油放火焚尸。随后鬼子兵又进村一户一户的搜，不分男女老幼见一个杀一个。杀人狂们满足了杀人欲后，又在村中放火，全村顿时一片火海。日寇3个小时的烧杀，全村387人惨遭杀害，逃脱幸免者仅11人，400多间民房化为焦土，这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35年至1936年间浴血转战在朝阳大地上的各路义勇军，朝阳的刘振东部、王震部、北票的蓝天林部、建平的高体乾部、喀左的

李天德部以及建昌的邓文山部……向日伪军警频频出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因此，日伪当局把对义勇军的仇恨，更加发泄到广大中国民众身上。

1936年初，120多名日军追击蓝天林余部张宝山领导的一小股义勇军，在长条沟村把未来得及撤走的义勇军战士和百姓共26人全部被杀害。最后在村中又搜出1名60多岁的李老太太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然后又灭绝人性地剥光死者的衣服，暴尸荒野。

5月24日，日军又进二龙台川烧杀时，在三道梁子村遭一冷枪。日军气急败坏，立即把油房沟村的群众全部赶到三道沟村的一个大猪圈内，强逼交出“凶手”。未找出开枪的人，就在人堆里拉出王希贤等4人当众杀害。5月26日，日寇又把王增店村的王景阳、王海等6人逮捕，动用了种种令人发指的酷刑，把王景阳绑在板凳上，顺鼻孔倒灌掺了辣椒面和汽油的凉水，最后灌得王景阳从头发根往外渗血，真是残暴绝伦，6个人被活活折磨致死。同年7月，日军又把这一地区划为“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政策。在郭家湾村修了一个“人圈”，把附近各村200余户，1000多口人全部赶入一个大“人圈”。在集家过程中和集家后，又有无数群众被杀害和折磨致死。

1937年8月30日，日寇在日军小头目小野的葬身处——朝阳县水泉村制造了一起屠杀百人的血腥惨案。当日伪军包围了水泉村时，村民邱凤最先在村口发现了，撒腿就跑，当即被鬼子开枪打死，然后包围了村子，将村中49人驱赶到一座三间房子的房间里，四周架起机枪，然后放火烧房，往外跑的便开枪射击，可怜49位同胞全部惨死在枪弹和火海之中。邻村东杖子村村民，看见北水泉村起火，又听枪声和呼救声，知道鬼子又行凶了，立即向村外跑。在山上放哨的日本兵立即向群众开枪，一些人中弹死亡。日军立刻又把东杖子村包围并逐户搜查，把村里群众全部赶到村前的一条沟里，用机枪杀害，在村内放火烧房。在3个小时内对两个村的血腥屠杀

中，共有99人遇难。丧心病狂的日寇，杀了99人犹觉兽欲未足，在返回朝阳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叫毛凤祥的过路人，不问青红皂白就用刺刀挑了。日寇头目狂笑着伸出大姆指说："一百的死啦死啦"。

1938年11月，日寇制造了娄家沟惨案。娄家沟是抗日英雄蓝天林家乡附近的一个村庄。日寇在这里抓了11名义勇军战士和家属。日冠强迫附近3个村的村民来观看，当众将11名志士用铡刀铡死后，又把在别村杀害的10颗人头，共21颗人头挂在一棵大树上示众。当年悬挂人头的老树至今犹在，它是日寇血腥暴行的历史见证。

杀人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在他们覆灭之时，在朝阳大地上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平房惨案。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乃至全国万民欢腾。8月22日，一列满载"劳工"的列车开进了大平房车站。这些人是在日寇铁蹄下，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中，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幸存者。他们渴望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园与亲人团聚。这时，一辆载着12名日军的压道车和列车开了个对头。按常规理应压道车给列车让路，但这些骑在中国人头上的恶魔，早已霸道成性，不但不让车，还强令列车退回去，让他们先行。对日寇早已恨之入骨的火车司机和广大民众当然不肯。争执中，一个日寇开枪打伤了火车司机的左臂。激怒了的群众高喊："鬼杂种！投降了还要野蛮！""砸死这群鬼杂种！"……红了眼的日军少佐，指挥鬼子兵，摆开阵式要向工人开枪。正在这时，伪铁路警备队赶到，队长于黑子一枪击毙了日军少佐，一场混战，打死了11名鬼子兵，只逃走了1名。

这时，正在金岭寺车站集结的一大批日军听逃回去的日本兵一说，这些日暮穷途的恶魔，第二天竟然出动100多人，乘坐一辆装甲车赴大平房进行疯狂报复。8月24日下午，日寇的装甲车开进了大平房车站，鬼子兵下车后从东北西三面向大平房攻击，见人就杀，跑慢的尽遭毒手。刹那时，刀光剑影，枪声阵阵，男哭女叫，血

肉横飞，火光冲天。一名姓寇的孕妇落入敌手，日寇先挑出她腹中的胎儿，然后又把胎儿穿腹。最后日寇抓住十几个少年儿童，强令他们到站台上给前天毙命的鬼子们洗尸，又逼他们把鬼子尸体抬上火车后，把这群孩子在站台上杀害，并割下人头给鬼子祭灵。2个多小时的一场血腥大屠杀，84人惨遭杀害，246间民房被烧毁。

上述事实，仅是日军在朝阳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部分。他们还经常以“国事犯”、“经济犯”、“思想犯”等罪名，把数以千计的民众投入监牢。所谓“重案犯”还要送到承德审理，其中大多数人惨遭杀害或折磨致死。

日寇制造无人区，实行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阴谋，更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同胞受难。仅喀左的铁沟，从1937年10月到1943年6月就有485户、2365人被赶到铁沟“人圈”，烧毁房屋1671间，集家中37人遭杀害，有17户人家家破人亡。集家后又有数十人被折磨致死。

日寇妄图以灭绝人性的屠杀，吓倒朝阳人民，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愤怒的朝阳大地，英雄的朝阳人民，抗日救国的怒火，始终熊熊不熄，直至彻底埋葬了这些十恶不赦的恶魔。

虽然时间已过去60多年了，但重温这段惨痛历史，仍令人发指，发人深醒。这国仇、这国耻，不仅进一步教育人们认清侵略者的本性，还告诫人们，这也正是国家软弱的后果。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虽已成为历史，但正当我们举国奋起，振兴中华，改革开放建设强大祖国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将给人以新的启迪。

东赤里赤惨案

东赤里赤(蒙语，石头多的意思)，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甘招三角山下、大凌河北岸的一个原有80多户蒙、汉两族群众杂居的村庄。这里的人民素来善良、质朴、勤劳，世世代代从事着农业生产。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到处进行烧杀抢掠的时候，东赤里赤人民也未能幸免。当日本侵略军铁蹄第一次踏进这个村庄时，日寇就实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犯下了滔天罪行。

1933年7月16日，日军驻朝阳警备队同朝阳保安队300多人从朝阳出发，企图到大城子一带进行抢掠活动。当他们经羊角沟、东台子，涉大凌河，奔东赤里赤时，在村南任意践踏庄稼、抢夺牲畜、殴打村民，蓄意制造事端，寻机逞凶。当他们受到联庄护青人员邹立田、白万升(蒙族)等人的反抗时，日伪军警便立即动用所带全部武器——迫击炮、机关枪、步枪、战刀等，向东赤里赤进行疯狂进攻。

首先，他们用迫击炮和机关枪进行轰炸和扫射，并摆开半圆形的阵势向村中步步围攻。村庄被炸烂了，一个安静的村庄顿时变成了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紧接着，这群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手持枪刀冲进各家各户，进行烧、杀、抢、掠。村南第一家是贫苦农民张玉德家，当时一家5口人正在吃午饭，听到枪炮响，就赶紧让16岁的女儿张振英顺墙豁爬出，躲避到高粱地里去。此时，鬼子已来到跟前。张玉德一出大门口，就被一个鬼子军官用战刀砍在头部，应声倒下。张妻郭氏听到丈夫的惨叫声急忙从屋里往外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又被那个窜到屋门口的鬼子军官砍死在门槛子

上，怀孕几个月的胎儿也被挑了出来。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见到爸爸、妈妈被杀害了，哭叫着跑出来，扑在鲜血淋漓的尸体上，也被日寇打断腿，劈开脑袋，给杀害了。人被杀光了，日寇又用火烧了房子。贫苦农民夏文德全家6口人，除了儿子出门走亲戚外，他和妻子、儿媳妇、两个孙女都惨遭屠杀，仅有的3间房子也全烧成了灰烬。贫苦农民王文学的母亲听到了外边枪响，怕女孩在外边被伤害，爬到房上刚喊出女孩的乳名“冬冬”，话音未落，就被打死在房上，鲜血顺着房檐流了下来。

在密集的枪炮声中，许多老百姓知道是日本鬼子屠杀人民来了，都急忙离开家向庄稼地跑去躲避。王国选领着12岁的儿子向西山坡的高粱地里跑，被鬼子发现打死在半山坡上。鬼子怀疑地里还有人，便用机关枪向西山坡扫射，把整个西山坡的大部分庄稼都象刀切似地打断了。韩二粉匠的妻子领着5岁的女儿，抱着刚满9个月的儿子藏在麻地里，因她家的狗跑进麻地被发现了，鬼子就用机关枪、步枪向麻地里乱打一阵子，结果3个人被打死了2个，只剩一个被母亲楼在怀里吃奶的孩子。鬼子大肆烧杀之后，又重新进行一遍搜查，4个藏在关帝庙里讨饭的乞丐，也有3个被搜查出后，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

两个小时以后，以日本军官傲村为头子的这群日伪军警认为要杀的人杀了，要烧的房子烧了，想抢的东西抢了，然后，荷枪提刀，狞笑着扬长而去。这时的东赤里赤，村中是大火，天空是黑烟，遍地是鲜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尸首到处都是。其中有的是被砍死在屋里，有的是被杀于院中，有的是被挑死街头，有的是被打死在田野。仅仅两个多小时，日伪军警就在东赤里赤杀死32人，打伤5人，烧毁房子59间，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被推入了无限悲愤的苦难深渊。

二车户沟惨案

1932年6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一支武装队伍从朝阳南部侵入哈拉贵沟一带进行骚扰，接着向东进至羊山，21日又从羊山继续向南进犯。当这支日军行至二车户沟与龙潭沟交界处时，被驻守当地的义勇军察觉，义勇军团长王震协同联庄会长赵清泉，率领100余人的队伍迎头截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歼灭了以伊藤为首的日军23人，剩下的8名残匪狼狈逃窜。逃出不远，在曹杖子后山，又被王老凿派人截住击毙2名，其余的6人仓惶逃回本部。

1932年6月23日，日本侵略者又从锦州派出一支队伍到达羊山，然后从羊山往二车户沟进发，企图报复。当时，义勇军队伍离开这里去执行任务，只有当地武装起来的群众和敌人坚持了一天的战斗。敌人虽然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下有轻重机枪扫射，无奈我中国同胞斗志甚坚，抗拒甚烈，敌人屠杀二车户沟的计划未能得逞，遂退回锦州。

1933年2月，朝阳失陷后，日伪统治机构相继建立，一些汉奸走狗协同日本侵略者，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朝阳各地，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从此，朝阳方圆几百里的地方，村村哀鸿遍野，户户母哭子啼。人民昼不得食，夜不能寐，背井离乡，以避抢掠屠杀之苦。

在"日本人要血洗南三区"的紧张气氛中，1933年初的一天，一股日军从北部侵入二车户沟。这次来的敌人较多，步兵乘坐着汽车，停在下窝铺屯，点火烧了场院上的庄稼和下窝铺的房屋，有60多户的200多间房子全被烧毁。这时，村内的人因大部分跑到村外躲起来，才未被杀害。

1933年11月9日，日本侵略者又侵入二车户沟。当人们听到

汽车响声，就四处逃奔，有的往东沟跑去，有的往上沟跑去。当时，杨玉峰和田凤歧正在地里干活，未能躲开，被日寇无故开枪打死。接着，日寇把逃跑的群众从山上圈回来，给大家开会说："好人的别跑，跑的都是红胡子，如果你们再跑，就统统的打死……"敌人就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欺骗了善良的中国民众，稳住了民心。敌人说完，真的没杀没开枪就离开了村子。到了11月14日，一股日寇坐汽车从东梁开过来。因上次敌人欺骗说跑的不是好人，人们没识破那个阴谋而信以为真，所以这次敌人来了，群众也没跑。敌人进村后，抓住王勇和周延荣2人给带路，到龙潭沟去看碑(陈美营子村的狄文林为讨好敌人，给前次被打死的伊藤等人立的纪念碑)。敌人看了石碑，兽性更加发作。11月15日，天刚放亮，敌人就开来3辆汽车，载着60多人，一下子就暴露出狰狞的面孔。他们手扣扳机，子弹上膛，刺刀闪寒光，晨曦照鬼影，趁民众大部尚未起床之机，包围了二车户沟村，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凡是搜出年龄在15岁以上的男子，见一个杀一个。枪打、刀砍、刺刀穿，一刹时，屋里屋外、院里院外、街头河边躺满了中国的男性成年人的尸体。也有少数孩子含着妈妈的乳头被害死在炕上。其中有的被割下头来，有的被打了四五枪。就这样一个清早，不到3个小时，二车户沟全村仅有的60名男人，除一名外出未归，郝文章和王世云两人躲进柴草堆里未被搜出而幸免外，其余57人全部被杀害。在这次惨案中，王勇家爷四个全部被杀害，王彬家爷三个遇害。

敌人走后好几天，人们都不敢回到村里来。被残害的尸体无人掩埋，有的被狗撕坏，有的头部被砍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是谁，有的身首分离，景象之惨，目不忍睹。后来，周围群众到二车户沟帮助掩埋尸体，一时无法弄到棺木，就用板柜装殓尸体、用席子卷起来埋葬了。

惨案过后，一片悲凉。有许多妇女精神错乱，有的人不敢进屋睡觉，只好几家集居在一家。周宽老人每夜为群众守卫，敲着梆子

喊着“没事了,快睡觉吧!”为遗孤剩寡、老弱妇孺们仗胆。房子已被烧光,人们无处安身,就临时搭起马架棚子住下。

这场惨案过后,人们在哀痛之余,怀念起一位好心的中国同胞:在这次大屠杀中,有一名姓邹的翻译在第一天到二车户沟时,假借喝水的机会,见到下沟赵兴林,要赵给上沟传个信说:“明天早晨有大事叫人们躲一躲。”赵兴林又找到杨永孝和上、下沟人说了这个口信。可惜人们听了这番话不相信,并说:“日本人要杀人还告诉你?”(因信了敌人说“好人不跑”的话,所以没有躲避)并责怨传信人说:“自己就害怕,还来吓唬人。”如果当时听了这位好心的邹翻译的话,会少死许多人的。

小桃北沟惨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1933年3月又侵占热东地区。东北各地民众纷纷举义旗,组织抗日义勇军,与日寇在辽西一带和长城沿线浴血奋战。原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中任骑兵旅长的王国瑞,被总司令郑桂林派遣回原籍(建昌县和尚房子)组织义军坚持抗战。和尚房子乡小桃北沟惨案,就是王国瑞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与日军激战后,日军实施报复,残酷枪杀无辜群众的一桩惨案。

小桃北沟是一个有17户、60多口人的僻静梨果山村。1934年1月3日,天刚蒙蒙亮,侵占绥中一带的日本侵略军出动3辆汽车载着100多日本兵向建昌西南岭下的和尚房子偷袭而来,企图消灭王国瑞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到和尚房子就与坚守在后山上的义勇军第三中队长邓国云率领的部队接上了火,枪声密集,火力很猛。此时,小桃北沟前面的大黑沟梁上也有火力点向日军袭击,这是义勇军整编后第一中队长苗永枝(绰号自由)率领的十七、八个人,由三股水沿小干沟来到小桃北沟。早8时许,他们路过小桃北沟,从大黑沟山头到大杖子后山,沿线占据要隘地形,设下哨卡。当发现邓国云部与敌人接上火,而且越打越猛时,为分散敌人火力、接援兄弟部队,苗永枝部立即向敌人发起了攻击。

小桃北沟村民刚要准备吃早饭,苗永枝部的"总炊"让村民给战士准备早饭。这里的群众听说给打日本鬼子的王国瑞义勇军准备饭,就争先恐后把自己的饭菜送给战士们吃。查宝山、姜振田、王德3家已做好饭菜,先由查宝玉、贺殿文、姜振堂、查宝珍、查宝山等5人主动送饭上山,送饭人还没到位,一股敌人向小桃山猛扑过

来。苗永枝等十几名义勇军战士见敌人冲过来，就夺路向水路沟方向撤走了。敌人追到水路沟山头，见义勇军战士已撤走1里多路追赶不上，就用机枪向村中疯狂地、报复性的扫射。当时把躲藏的卢金玲(19岁)和小妞(王惠轩的妹妹来小桃村走亲戚的，14岁)3名姑娘给打伤。敌人又到附近山上搜查，到老花沟把躲藏的虞文会、卢铁林、王芝栋、王芝祥、查宝玉等5名农民搜出，硬说他们是掉队隐藏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连打带踢带去小桃村。到离村不远的地方又把贺殿文、查宝珍、查宝山3名农民抓走。

上午11时许，敌人带着8名青年农民进村。村中各家只剩下老年人、妇女和孩子看家护院，当听到吆喝声、狗咬声，预料是鬼子进村了，都胆怯的出来观望。查绍清、王俊、王指、王殿荣等老人出来，看到日本鬼子兵中间夹杂着8名青年农民，都是自己的亲人，知道被日本兵带走没好事，便不顾个人安危，出面担保，向日本军官说情："这8个人都是本村无辜的良民，不是义勇军，把他们释放了吧！"可是，凶恶残暴的敌人不但不答应，反而怒目圆睁，恶狠狠地对几个老年人各打几个嘴巴，打完后，哇啦几句就带着8名农民向村外走去。到村头时，唯恐他们反抗、逃跑，停下来叫用各自的腰带、腿带全都捆绑起来，然后，就连推带搡带走了。下午3时许，到胡杖子村(今梅家房子)路南边土坑子旁停下来，凶残的敌人把8名青年农民踹跪在地上，开枪杀害，唯恐枪打不死，还向被害人的胸膛各补刺一刀。当打死5人、另3人未被杀害的时候，敌人突然接到义勇军要



惨死路旁的中国同胞

打回来的情报,随即慌忙地向大南沟逃命去了。

日本兵撤走后,幸存者查宝山、查宝珍、贺殿文3人相互解开绑绳,急忙奔回本村。

胡杖子村民赶到现场,把5个人的尸体送到小桃北沟外。当小桃北沟村民把尸体抬进村后,家族和村中人目睹惨状,无不悲痛欲绝,骂不绝声:“这些狗强盗太狠毒了,他们早晚会得到报应的。”

这5位青壮年被杀害后,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极大损失和痛苦。卢铁林因妻子病故,与7岁的儿子相依为命,被害后,幼子只好被其姑家抚养。王芝栋妻子已故,留下5岁的儿子,被害后,孩子只好由家族抚养。王芝祥是7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全靠其1人扛活维持生活,被害后,一家老小在饥寒交迫中苦度岁月。虞文会家7口人,被害后,因生活困苦,熬不过而相继死去。查宝玉家6口人,孩子都小,被害后,只好靠妻子常年奔波,生活苦不堪言。

王砬子沟惨案

座落在建昌、喀左接壤处的王砬子沟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偏僻山庄，交通闭塞，地势易守难攻，进退有路，因此，“民众救国军”和“仁义军”常到这里扎营落脚，与敌人周旋，寻机袭击日本鬼子。

当时，此屯有20户人家、100多口人，多数是受地主、汉奸、日本鬼子剥削压榨很深的穷苦人，对鬼子、汉奸极为仇恨，经常抗拒日本鬼子索要的什么“出荷粮”、捐税等，节资用来支持“民众救国军”、“仁义军”的抗日斗争。鬼子和汉奸对这里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把此屯诬之为：“土匪老窝，男的绑票，女的看票，放羊的站哨，没有一个好人。”

1934年5月19日这天，太阳虽已升过山顶，但由于薄云笼罩却是暗淡无光。村里人和往常一样，早已下地干活，有的还去了丛杖子赶集。正在这时，平静的山谷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几十发子弹落在村中。顿时，硝烟弥漫，天昏地暗。李学成、李振发两位老人正在村中树下闲坐，当即被打倒。村里好多人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日本鬼子与汉奸蓄谋已久的血洗王砬子沟就这样开始了。日本关东军大队长林木亲自带着300多名日伪军，动用六七台大卡车，架起几门大炮、多挺机枪，重重包围了王砬子沟。重炮轰击后，日伪军在飞机侦察掩护下，从四面凶狠地向屯里猛扑过来。这些野兽是见影开枪，遇人就挑。正在地里干活的11人全惨遭杀害。

鬼子兵闯进村就挨家挨户搜查，把家家都砸得破烂不堪。后又气急败坏地把杀剩下的男女老少连踢带打，全部拖赶到村中的大井旁，令男女各站一边。鬼子兵把群众团团围在中间，四角处架起机枪。象肥猪一样的矮个子军官林木，瞪着血红的眼睛，手握战刀

在群众面前走来走去，咆哮着逼问："你们的，为什么窝藏土匪？""土匪的都藏到哪里去了，不说统统的枪毙！"任他怎样喊叫，谁也不肯作声。林木气得急步跨出队外，举起指挥刀就要命令开枪。正这时，一个伪军官急忙跑到林木跟前交头接耳地嘀咕一气，才没有开枪。后来才知道，那伪军官说："这些都是女人和孩子，杀他们也没什么用，把他们都杀光了再抓土匪就费事了。"因此，这些老小才得幸免。

接着，林木就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向大家训话。意思是说：以后再不准窝藏土匪，再来土匪就报告，并命令全屯统统迁到村外。林木问大家："你们的男人都干什么去了？"有人回答说："下地干活去了。"这时林木才想起干活的人全都被他们杀害，抑制不住豺狼杀人之快而放声狞笑起来，随后又假充善人把糖球扬给群众，借以取乐，最后才挥手下令带队伍滚出沟去。这些杀人成性的野兽一边走，一边学着被杀害者的动作和死前的惨叫声，边学边哄笑，把屠杀中国人民当作他们的寻欢取乐，是何等猖獗！

鬼子一出屯，人们都急忙寻找亲人，结果找到的都是躺在血泊中的具具尸体，只有 2 人受重伤(李学成被炸伤，李清芳胸部中弹几天后也相继死去)。这次惨案中，有 13 人被夺去了生命。其中有外屯 2 人，李振发是到岳父家探亲被炸死的，李井新的姥爷老孙头是接女儿回家被挑死在半路上的。遇难者有被炮弹炸死的，有被枪打死的，还有中枪后未死又被挑死的。最小的季立东(12 岁)跟父亲季学用去玩，父子同时被挑死。年纪最大的齐永学老人(68 岁)也被挑死，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还把死者李洪才的头皮剥了下来。吉奎的身上被机关枪扫射得象筛罗底一样，放羊的李根带被抓住后，先被敌人剜去了双眼，后又被挑死，李殿举赤手空拳跟敌人搏斗，双手被割了好几道刀口，被敌人挑死后又被剖了腹。其惨状真是不堪入目。

身遭大难的王砬子沟的群众，并没有被敌人屠杀所吓倒，对敌

人的搬家命令置之不理，宁可忍饥挨饿也不离故居，顽强地生活着，千方百计地接济着爱国武装的抗日斗争。因此，鬼子更加气急败坏，在血洗后第二年又伙同汉奸白所长把全村所有的房屋用火点着，除了两栋平房被救外，其余100多间房子全被烧光。造成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尽管这样，多数人家还是坚持住在家乡，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在废墟上搭起马架子，没吃的靠挖野菜、剥树皮度日，衣衫单薄靠拢火取暖。在日本鬼子统治的十几年里，他们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斗争着。

南营子惨案

1934年5月，一队日本骑兵约30多人，从羊山附近的南营子东胡同直奔村南而去。这队日军在羊山以西遇到了抗日武装的截击，经过一场战斗，有7名日军溃退到南营子。当时，村中有人主张将这7名残敌干掉，但是有人却说："这乱子惹不的，不叫他们进村就是了。"于是没让这7名日军进村。这7个日军只好从村外向东北方向逃去。这为日后日寇实施报复屠杀南营子埋下了引线。

5月中旬，一支日军又从南边过来，行至黑牛营子附近，被义勇军的团长和联庄会的会首王震、赵清泉等人发觉。王、赵立即率队迎击。经过战斗，敌人败退突围，沿山路向朝阳方向撤退。敌人撤至大四家子的东南沟一带时，又遭到另一支抗日队伍截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我方打死敌人10多名，其余敌人突围继续向朝阳方向撤退，撤至北营子时，敌人想凭借北营子垣墙房顶，负隅顽抗。王震、赵清泉这时已退至南营子，以猛烈的炮火把敌人赶出了北营子。敌人认为这次攻击也是南营子群众发起的，又加之月初没让那7名残兵进村，两事合一，日寇开始屠杀南营子。

1934年5月19日将近中午时，从朝阳方向过来的一股日伪军，乘坐一辆汽车，一到南营子村北，就用大炮轰击南营子。群众发觉后，都纷纷跑向西山和东河套。这时又来1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侦察，发现外逃的群众就立即进行扫射。就在这种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大批日军进入村中，挨门逐户地开始搜捕抓人，并在飞机侦察指引下，开始向西山追捕群众。凡是隐蔽在离村较近的群众，不管是青纱帐里的、在山坡上的，还是沟旁的，敌人一发现，就用刺刀挑死。这次屠杀将要完结时，村里敌人便开始抢东西、点火烧房。

这次大屠杀，我无辜同胞共 27 人被害。其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几岁的儿童，有正在孕期的妇女。真是血溅沟壑，尸横田野。谢云奎一家 9 口人，有 7 口被害，只逃出兄弟 2 人。当时他全家逃出村外时，一直朝西山跑去，他的儿子谢硬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年青腿快已跑上山顶，回头一看，敌人正在杀害他的父母和亲人，他立即从山顶抓起两块石头，又径直地朝敌人冲过来。敌人看见慌了手脚，丢开别人，向他开枪射击，这位善良而勇敢的青年应声倒在血泊里。

进行屠杀时，村里浓烟滚滚、大火熊熊。鬼子的嚎叫声和在火光下遇害者的纵横尸体，构成了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经过 3 个小时的血洗，全村房屋被烧毁了 400 多间，整条后街只剩下了一户人家。这一户是王三爷子家，因他年过 80，耳聋眼花，敌人用刺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威胁他也不出屋，点起大火来他就拼死扑灭。不知什么原因，敌人把他杀死，却未烧他的房子。洗劫过后，外逃群众不知村内情况，不敢回村。事过几天后，从远处山岗上看到村内烟火熄灭，才陆续回到家中。

水泉沟惨案

日寇入侵朝阳初期，羊山、黑牛营子及六家子一带抗日活动最频繁，那里的联庄会、抗日义勇军先后多次打击日寇。刘振东、王震、赵清泉、苑九占、王老凿等抗日首领都是使鬼子闻名丧胆、恨之入骨的人物。

1934年，抗日义勇军在镜山村(今朝阳县北四家子公社)北部的水泉沟南山打死了日寇头领小野。义勇军撤走后，鬼子在小野毙命处立了一块石碑，并在碑前发誓说，早晚要给小野报仇。当时，镜山村管境内，南北各有一个叫水泉的小屯。南水泉在今南台子村，屯北有条沟叫秋皮沟；北水泉在今老爷庙梁北，这个水泉屯旁有条沟叫邱家沟。南水泉有位叫徐老品(绰号)的，参加了在北水泉南山打死小野的那一仗。据说，他当时是义勇军一个小头目，打仗还挺勇敢。事后鬼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徐老品这个名字自然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日本人在朝阳站稳脚跟之后，朝阳大部分地方的老百姓都被迫当了"顺民"，唯有黑牛营子、长在营子、北四家子一带受王老凿影响，时有反满抗日活动。1937年有人向县警务科告密，说徐老品以他的家乡水泉一带为基地，学王老凿和日本人作对。徐老品的名字早已在案，这一告密，勾起日本侵略者的旧恨新仇，决心血洗水泉、秋皮沟一带村庄。

1937年8月30日上午，伪县警务科调集了150多人的马队，赶到了镜山村公所(北四家子唐杖子)。日军头目找来伪村长刘子奇和土豪寇振东，问他们水泉沟、秋皮沟在哪里?这本来问的是徐老品住的水泉沟，但因没说明白，刘子奇、寇振东等以为他们是问

曾和义勇军打过仗，小野被打死的那个水泉沟，就告诉他们说在梁北(有人说刘子奇有意包庇南水泉，故意把日伪军支到北水泉的)。

当日中午，天气炎热，北水泉沟一片恬静。村民们干了一上午活，收了工，准备吃午饭。只有少数人为了顺便捎一挑山柴还没有回家。东杖子(和水泉紧挨着)一个叫刘功的村民正在村边，一抬头，哎哟，鬼子马队满山遍野向他扑来。先头几匹马已经到了他跟前。他战战兢兢地上前要给溜马，一个伪警察在马上喝问："哪个村叫水泉沟。"刘功往水泉一指说："那就是。"那警察顺刘功手指的方向，一马当先直奔而去。其后马队也紧紧跟随。刘功向四面山上一看，各个山头都布置了岗哨。当鬼子向水泉沟进发时，村民仇凤正在门口纳凉，见来了鬼子要跑，没走几步，就被鬼子开枪打死。鬼子人马包围了水泉沟和邱家沟，以召集村民开会为名，把凡是在家的人都赶到一座房子里，敌人从外面封死门窗，架起机枪对准门窗口，然后在屋四周堆起柴草，点起了大火。刹时，火光冲天。屋里喊爹叫娘之声，惨不忍闻。有的人用力破门窗冲出，不是被大火烧死，就是被敌人机枪打死，到会的 49 人无一幸免。

东杖子群众看见水泉沟起大火，听见哀号，正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时，眼尖嘴快的村民刘喜大喊："快跑！"只这一声喊，提醒了人们，人们有的向山上跑，被敌人山上岗哨开枪打死，有的向沟里躲，被鬼子搜出。敌人包围了东杖子，又挨门逐户搜查，逼人们去村前的小沟里"听会"。"到会"的人多数被敌人用机



水泉沟惨案日军第二杀人现场东杖子村孟克里沟

枪打死，共有50人。只有几个人是压在死人堆下幸免的。两屯共有99人被害，鬼子在2个多小时之内杀死99人，犹未满足兽性，非要补足百人之数不可。敌人回到解杖子时，在老李家碰见了一个走亲戚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毛风祥。是哪里人？答的是梁北歪脖山人。敌又问离水泉多远？说不远。话没说完，他就被敌人用刺刀挑死。日军头目狂笑着伸出大拇指："哈哈，一百的死啦死啦！"一个伪军得意的说："百里缺一，在数难逃啊。"水泉、邱家沟及东杖子外逃的人们过了好久才敢陆续回村。大热的伏天，死难者的尸体已发腐，隔二三里顺风能嗅到腐臭味。村内，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骨。许多尸体被狗拖狼拉得残破不全，这一个头颅，那一支胳臂，柴草丛中到处是人肠人肝。尸体因为发腐，面目已很难辨认了，人们只有从衣着及身体的特征上认亲人。李景会全家8口人死了7口，这7口人中一位是老母亲，一位是发妻，5个顺肩的女儿，大的18岁，最小的7岁，死时拉着手，收尸时分手都分不开，第二年春天，李景会也含恨忍悲而病死。钱凤生一家4口、恩振廷全家5口，这两家9口人当时一口没剩，靠附近乡里亲朋帮助掩埋了尸体。村中的哭声和惨景一直持续了好久。许多劫后余生者说：想起当年惨景，现在还心有余悸呢！他们指着山坡上的坟头说："那是五女坟，5个多么好的闺女呀！"那是我们亲人的坟。

药王庙惨案

日本侵华关东军佐藤大队长为了巩固他们军国主义的政权，消灭建昌岭下一带的抗日力量，于1934年11月，带领200多名日本兵和20多辆大卡车，骑马拖炮，象一群疯狗一样，沿着朝阳通往兴城的大路，杀气腾腾地扑向药王庙警察署辖地。一到药王庙，敌人就威逼乡民开会。会上，佐藤气势汹汹地叫喊了一阵子后，金翻译官说："太君讲，你们统统的通匪，不将匪首送交出来，就将你们全部杀头……"死一般的沉默，人们谁也不肯吭声。

然而，认贼做父、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铁杆汉奸"竟将当地义勇军首领和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提供给佐藤。佐藤兽性大发，便迫不急待地下令围剿了药王庙、鸡冠山、施杖子、响水甸子、锥子山等村庄，进行了7天之久的残酷"扫荡"和烧杀掠夺。义勇军旅长杜子扬虽然没有被敌人抓住，但房子却被全部烧毁。在严酷的搜查下，义勇军营长李云阁、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李长魁、杜大贵、赵万室、赵小八和张老根等17人被敌人抓住。敌人对他们施以严刑拷打，令其交出枪支、子弹，同时还威逼他们交出所谓"匪徒"名单。他们个个宁死不说。

气急败坏的佐藤指挥日本兵，竟将这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者们全部枪杀。这17个人走到刑场时，昂首挺立，横眉冷对持枪的鬼子兵。就在这短暂的时刻，佐藤还紧紧追逼他们交出枪支、弹药和所谓"匪徒"名单，"不交死了死了的。"义勇军营长李云阁在这生命最后的时刻，挺起胸膛对侵略者说："怕死就不做中国人！"其中有一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死不当亡国奴！"遇难者们大声呼应。声音刚落，17人就倒在血泊之中。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们

并没有就此罢休，又用铡刀将这些人的人头铡下，同时，把领呼口号那位勇士的心给挖了出来。

佐藤杀人后，就召集全警察署管辖的村长、所长、甲长、牌长和乡民上万人，在刺刀威逼下开大会。他们把被杀害的人头摆在高桌上，个个都插有标签。写着什么“匪首某某”、“有枪弹不交者，斩尽”、“谋反不法者，视此”，佐藤耀武扬威地站在汽车上。金翻译官高声喊道：“喂！大家站好，太君讲话啦，好好听着。”佐藤板着凶恶的面孔，叽哩咕噜叫唤了一通，谁也不知道他吼叫些什么。金翻译官眦着金牙，装出一副笑脸，拉长调门说：“乡民们，太君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事，大家不要怕，太君说只要你们守法，把枪、子弹，把‘匪首’供出来，都是大大的好人，违者是要杀头的”。会后，乡民们议论：“这伙鬼子杀人不当小鸡，他们不死绝，日子没法过。”

佐藤走后，留下山田和杨翻译，仍以回收武器为名为非作歹、到处搜刮民财，对乡民每 7 天开一次会。鬼子对来者有时下令全部下跪，有时还往他们身上泼凉水。对抓来的人更是严刑拷打，有的屈打成招，没枪就得给大洋(钱)。孟子升是一名教书先生，就因没枪没钱，在 1936 年 12 月 16 日被鬼子枪杀了。

耀武扬威、杀人成性的日寇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在建昌这块土地上，民众抗日武装仍在不断地给侵略者以沉重地打击。

柳杖子惨案

柳杖子村地处建昌东北部，与喀左、朝阳两县交界，是谷杖子的一个山环溪绕、风景秀丽的山庄。这里原来住有 34 户、100 多口人，分为上下两屯。上柳杖子 14 户 50 多口人，下柳杖子 20 多户 80 多口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大地区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这里的群众为了民族大义和全国人民一样，不甘心当亡国奴，奋起抗击日寇。他们有的参加民众救国军，有的积极支援抗日武装，有的抗捐抗税，给鬼子汉奸以有力的打击。凶恶的敌人哪能容忍人民的反抗？他们要拔掉柳杖子这个“土匪窝”，杀绝“暴民”。

柳杖子村的灾难终于降临了。1934 年 12 月 18 日这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一群鬼子兵闯进上柳杖子，下令把全村男女老少，一齐赶到村东头庙前集合，挨个查手验肩，看有没有用过枪的，结果一无所得。最后一个鬼子军官通过伪军翻译官说：“土匪八路军来了你们要报告，不报告都统统的枪毙。”敌人折腾 2 个多小时，打死了不少鸡禽和猪狗，撤出沟去。

与此同时，下柳杖子则发生了灭绝人寰的惨痛事件。30 多个鬼子兵来到村头，逼着贫苦农民柳宪生为他们带路。柳宪生宁死不肯，结果活活被鬼子挑死。这群气急败坏的日本兵向村里开枪开炮，狂轰乱射，一时间把这个小小山村炸得房倒屋塌，人伤畜死。鬼子兵闯进村后，指使恶狗咬人，很多人被军犬咬伤。这次事件，群众被打死 1 人，重伤 2 人，房屋被毁坏多间，其它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1935 年 6 月 27 日，日本强盗对这里又进行第二次烧杀。这天，人们刚吃过午饭，30 多个鬼子兵在一个叫岗本的日军头目带领

下，又重重包围了这个山村。鬼子首先向村中开枪开炮，把这个僻静的村庄立即炸得天昏地暗，家家户户都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炮火停止以后，闯进村子的鬼子兵逐户搜查，惨杀我无辜群众 6 人，重伤 2 人。其中张国良为了躲避鬼子向后山逃跑时，被鬼子打中，他当时没有死，被鬼子发现后，用刺刀活活挑死。一小女孩张小者 13 岁，小男孩张福长 11 岁，姐弟二人全被鬼子枪杀。58 岁的张有也是穷苦人，因病直不起腰来，鬼子进村后他赶紧往后山坡爬去，被鬼子发现一枪打中，当即死去。此外，重伤二人中杨刘氏 60 岁，听说鬼子来了，往后山坡爬，被鬼子打中腹部，鲜血流了满地。张高民见鬼子来了，也跑到后山，被鬼子打穿脚心。

日本鬼子在柳杖子的两次扫荡清剿，任意杀害我同胞 7 人，重伤 4 人，计死伤 11 人。

柳杖子村的群众并没被日本的屠刀所吓倒。当 1945 年我八路军小分队又来到柳杖子村时，人们欢欣鼓舞支援小分队。八路军小分队出发时，梁为斗、张振志等主动给带路送到朝阳石明信沟(王老凿处)。一次有一个八路军战士小宋负伤，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小宋留下养伤。

二龙台川惨案

二龙台川在峰峦起伏的大黑山脚下，川流由西向东，沟壑纵横，峭壁悬崖。山上树木成荫，山下清泉畅流。这里是劳动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为了隔绝当地人民与蓝天林等抗日队伍的联系，对这里的抗日民众进行了残酷镇压，并在这里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血洗二龙台川的系列惨案。

1933 年 11 月，蓝天林在大甲营子树起“抗日灭满救国军”的大旗，给大黑山区苦难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大黑山区人民也自动组织武装，保卫家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仅在北四家子乡以北的水泉、王增店、陶家沟、榆树底等 20 多个村庄就组织起 4 个联庄会，呈现出同仇敌忾的好形势。蒙奸沁布多尔济一看便慌了手脚，他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强令大黑山区解散联庄会，交出枪马，否则要血洗五区(当时属朝阳县管辖)，荡平二龙台川。

为了保护同胞，携手抗日，蓝天林的队伍决定进驻大黑山区。1934 年 1 月 7 日午时，南面山顶上响起 3 声礼炮，这是救国军进山的联络信号，紧接着两面 1 丈多高、6 尺多宽的红地白字写着“抗日灭满救国军”的三角狼牙大旗出现在山顶上。同时在进山峡谷要道两面的山坡上，也扬起 4 面联庄会的大旗，4 名联庄会长骑马并列在石门道口。他们对空鸣放一枪，表示欢迎义军进山。蓝天林率领大部分马队和部分步兵共 1000 余人威风凛凛地走下山来，十分有秩序地开往各个村庄。义军所到之处，不打不骂，不挑吃喝，不动百姓分毫，彼此情同自家人。在春节期间，蓝天林与当地群众协商，将二龙台川 4 个联庄会编入抗日灭满救国军的序列。从此，蓝天林将二龙台川作为抗日的一个根据地。

1935年3月初，救国军第一支队在联庄会“上排”的协助下，缴了到三道梁子收缴民枪的一伙警察的枪马。5月8日，联庄会“下排”又配合救国军的第十支队在鸡冠山伏击了日寇4辆军车，打死日寇多人，缴获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6月1日他们又在克洛湾阻击了日寇2辆军车，之后他们又相继在汤沟和东官一带多次与日伪军交战。7月13日蓝天林调动全军人马，攻克了贝子府，消灭日伪军和警察20多人，击毙了王府里10多名炮手，缴获机枪2挺，步枪10多支，子弹若干发，同时还砸了3个大商行，获得了大量的军需给养。8月8日，蓝天林指挥各路义军围攻北票，威震百里方圆，惊动了奉天警察厅的日寇汉奸。日寇汉奸日夜调动朝阳、赤峰和通辽、阜新附近的所有日寇和伪军1万多人，并出动2架战斗机，20多辆铁甲汽车，于10月13日将大黑山围得水泄不通，救国军在蓝天林的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由于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救国军被迫于午夜从大黑山的东部松树山尖处突出重围。义军突围后，战斗停止，但是炮弹炸药打着了的山林之火还在燃烧，山谷里还不断地传出战马嘶叫声，甚至还可以听到义军伤员的呻吟声和躲进深山密林里妇婴的哭啼声，整个山区笼罩着血腥的恐怖气氛。

日寇追击蓝天林的义军离开后，紧接着大批警察开进各村，先在二龙台川上游，警察们端着枪把各村的老百姓全部驱赶到王增店的大河套集中训话。伪村长周凤在警察护卫下站在土台上拉着官腔嚎叫着说：“蓝天林几千人马都搁不住皇军打，你们联庄会几十条枪，还能搁住打啊！这回你们惹下了大祸，皇军要血洗二龙台川，大人小孩要杀个根芽不留，是我在皇军那里为民请罪，皇军才饶恕大家，但也有条件：一是各村要按户敛钱赎罪，二是联庄会的成员交出枪马，三是惩办勾结蓝天林的祸首。这是皇军的命令。”这个汉奸对群众训完话之后，警察们分别到各村，把枪马户的家产给掠夺一空，并且在临走时还把这些户的房屋放火烧毁。

1936 年初，日寇伪军曾多次进山烧杀。以长条沟为例，敌寇先后两次火烧，两次推墙，共进行 4 次洗劫。其中一次，张宝三率义军从东边返回大黑山进入长条沟后，120 余名日寇乘 4 辆铁甲汽车随即包围了这个村子，敌人使用机枪和炮把这个村庄打成火海，26 名义军和村中没有逃出的百姓全被杀害，连村中一个 60 多岁的李老太太也被凶恶的敌人搜出用刺刀捅死。死者的衣服全被剥光带走，尸体暴露荒野，除张宝三尸体被人偷走掩埋外，其他人的尸体被野狗吞食。

5 月 24 日，一群日寇和警察闯进三道梁子，其中一个日本鬼子挨了一冷枪，日军便气急败坏地冲进油房沟，将大人小孩全部赶到三道梁村圈进一个大猪圈里，在猪圈的四周架起机枪。日军指使伪军将王希贤、王希兰、董福生、米存志拖出人群，硬让这 4 名无辜的群众为日寇抵命，这 4 个人怒视着敌人，最后倒在血泊里。翌日日寇又将小四家的程永和及其 3 个儿子抓来，硬说他们爷四个同蓝天林有联系，将他们枪杀。东荒的徐仁不忍日寇暴虐，利用给群众治病的机会宣传抗日，后因叛徒告发，也被日寇砍头示众。

5 月 26 日，日寇和伪军又闯进王增店，抓住王景阳，硬说他私通老蓝，有枪有马，将他绑在板凳上，往鼻孔里灌凉水、掺火油和辣椒面子。王景阳被日寇灌得顺头发根往外冒血，最后悲惨地死去。没过几天，王海、王录、苏九、解贵、李士宽等人也被抓住，带到黑城子王府灌凉水、压滚杠，相继被致残致死。

7 月末，日寇在大黑山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勒令居住在二龙台川上游的 20 多个自然村居民，10 天内扒掉全部房屋，否则以通匪论处。8 月 3 日，日寇讨伐大队长、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佐藤，突然带领 100 名日伪军乘坐两辆铁甲汽车开进山区，先是机枪扫射，而后放火烧房子，屋内的衣物、粮食及牛羊猪鸡，全烧为灰烬。

迁不动的房屋，拿不走的田地。人们为了活路，在大火过后，又从深山密林里偷偷地回到村庄重建家园。这年冬季，日寇大平带领

7个日伪军，从山外白塔子等地强制赶来500余名老百姓进山，用携带的镐头、铁锹、木杠子到各村扒房子。敌人先是放火烧，而后推倒残墙断壁。仅2天时间，20多个村庄的几千间住房和畜棚荡然一平。

日寇对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令人发指。他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青年妇女。对反抗的妇女，他们便把她裸体绑在板凳上，进行轮奸。有时轮奸青年妇女时，还逼她的生母站在一边看。有一次，日军抓来一名裹脚的妇女，轮奸前强迫她打开裹脚布，进行无耻调戏。这个妇女的年仅8岁的孩子吓得哭喊妈妈时，被日军抽出战刀砍死。有的妇女被日本强盗剥光衣服裸体照相，轮流奸污，最后她们在日寇狰狞的笑声中被刺刀挑死，有的被奸后含羞自寻了死路。在郭家湾附近村子200多户人家，1000余口人中，含恨死去的就有100多口，其余的人都被赶到郭家湾。日寇怕郭家湾同救国军有联系，又从山外抓来几百民工，在郭家湾村四周挖了一条200丈长、9尺宽、1丈深的沟壕，并在村口修上木板吊桥，早晨放下，晚上吊起来，由伪军看守。村民出入要手持木牌，外来亲友要详细盘查，如有不周就被当成义军探子抓起来。这一年瘟疫又流行，许多人染上伤寒和霍乱，但警察“狗子”不准人们外出求医，10多天就死亡20多人。有的户逃到外地给人家做零工糊口，趁夜间回到山里莳弄地。1937年秋，石头梁子村的人们分别从内蒙回来收秋，被汉奸周凤报告给日军。日军和警察把



当年惨案的目击者肖树春老人在向青年人讲述日寇的暴行。

群众场园的庄稼垛都点着火，火光四起，黑烟滚滚，燃烧了两天两宿。这个村王大个子从山上回来想救火，被日寇抓去，日寇说他是蓝天林的人，将其绑在马脖子上，带到大黑山北口，用战刀砍死。从这以后，人们再也不敢进山里。山里人烟绝迹，田园荒废，野狗出没，白骨鳞鳞。这就是日寇血洗二龙台川后的惨状。

长条沟惨案

长条沟村是北票市北四家乡王增店村的一个村民组。这条沟从沟口到沟里，共8华里长，沟两侧为高山峻岭，是地势比较险要的地方。在日伪统治时期，以蓝天林为首的抗日救国军，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当时长条沟有3处住有人家，上长条沟只有1户人家，中长条沟有2户人家，住户最多的就算是下长条沟了，那时也只有6户人家，46口人。

1935年8月，日本侵略者为镇压蓝天林所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曾调集了大量兵力围剿大黑山，开始了秋季大扫荡。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不得安宁。长条沟的村民们，为免遭屠杀，有的投亲靠友搬走了，有的在山里挖了地窨子，随时躲藏起来。11月15日半夜时，有一支马队忽然来到长条沟村，把没有走脱的10来名村民召集起来，让男人去村边遛马，女人给烧火做饭。这支马队进村后，先是派了一名战士到地势较高的房框山山梁上放哨，然后就开始吃饭。从表情上看，这些人很和蔼，不象是土匪。但从精神上看，却都很疲惫。有一个人吃着饭就睡着了，把饭碗掉在地上也没有醒来。经打听才知道，这个马队是蓝天林抗日救国军独立团的人，为首的叫张宝三，是团长。他是台吉营子人，据说他曾组织500多人跟着蓝天林抗日，经常转战在台吉营、黑城子和牤牛河东一带。这次是奉蓝天林的命令，为避开日本侵略军围剿的锋芒，向大黑山区撤退的。队伍从东台吉营出发，一路上到处受到日伪军的围追阻截，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只好化整为零，分散着向大黑山前进。他与弟弟张怀三、儿子张廷和12名战士为一个小分队，经昼夜奋战，左冲右突才来到长条沟。吃完饭后，张宝三就让战士们就地

休息了。由于一路上的劳累，使他们很快进入了梦乡。但就在这时，有4辆满载着荷枪实弹的日军汽车，已顺着马蹄印追到了长条沟口，抓住一个叫宋奎的农民，让他带路冲进了长条沟。当时，在房框山梁上放哨的哨兵，忽然听到后背山下有响动，就离开岗位朝着响声方向摸去，最后才弄清是两个村民在山脚下挖地窨子。他和这两个村民商量，能否回村去帮助他们遛马。因而，他不仅没有发现敌情，连汽车的马达声也没有听到。待他返回山梁上时，村里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当日军的汽车开进长条沟的时候，在村边遛马的村民，首先听到了汽车马达声。他们忙丢下马匹，顺着山沟躲进深山里去了。家住村头的李占家，也提前听到了汽车声。李占家74岁的老母先让两个孙子赶紧顺山沟往东山坡跑，回头又招呼儿媳和她一起钻进东山沟。她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又年事已高，没跑几步就跑不动了。当她看见儿媳妇已钻进了东山沟，索性就不跑了。她刚要返身回家，日军的汽车已开到村口。日军跳下车抓住李母，手指着正往东山坡跑的孩子，指责她放跑了“红匪”，举起战刀就将李母砍死了。

日军下车后，很快控制了东山梁和村口，架起了机关枪，直冲着长条沟村。张宝三发现日军已经进村，知道情况严重，想冲是冲不出去了，决定同敌人决一死战。他先是让群众赶快趴在炕沿底下，嘱咐她们千万不要乱动，然后冲出房门组织战士们选好地形，做好战斗准备。在太阳刚冒红的时候，战斗打响了。敌人的机枪、步枪象雨点般地往村里疯狂扫射，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张宝三和他的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英勇还击。有一个叫陈刚的战士，枪打得很准，他爬上一堵土墙，一枪就撂倒一个日本兵。但目标已被东山梁上的日军发现，当他要打第二枪时，一阵机枪子弹扫来，陈刚身着数弹，倒在了血泊中。张宝三的儿子张庭，打仗也很勇敢，他抓住一匹紫红马，飞身上马，边打边冲，冲出了包围圈。但一想到父亲和叔叔们还在继续战斗，不忍心自己只身逃生，就又返回阵地继续同敌

人搏斗。这场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救国军终因寡不敌众，张宝三和全体战士均牺牲在日军的枪弹之下。

战斗结束后，日军开始进村对各间房屋进行全面搜查。在老百姓家柴草房里搜出了一具已被打出肠子的尸体，一个翻穿棉袄、用绳子捆绑着的活人。这个人和死者是兄弟俩，活着的叫张廷志，是死者的哥哥，死者叫张明志。这哥俩个是西官营梁杖子村人，是到梁北贩盐路过此地遇难的。张廷志看到弟弟被打死后，为保条活命，才把棉袄反穿上，又用马缰绳把自己绑上了。当日本翻释官训问他时，他就谎称是被张宝三他们绑票抓来的，并说明了自己和弟弟是贩盐客商，就这样他幸免一死，被放掉了。

日军搜村之后并没有离去，而是把干草都堆放在房屋周围，惨无人道地放起火来，村里的 42 间房子全部点着，一直到房子被烧得落了架，他们才狞笑着上了汽车。

第二天早晨，村民们陆续地回到了长条沟，看到房子被烧，尸横满村，有的尸体已被大火烧焦，此情此景令人目不忍睹。村民们眼含热泪，先把李占的老母亲安葬了，然后又把张宝三等 15 具尸体都集中到南山沟，以便来人认领。第一个认领的是小四家村一个姓郭的，他是张宝三的朋友，他在群尸里只找到了张宝三和张怀三的尸体。张庭的尸体因面目难以辨认，没有找到，只好把张宝三哥俩埋在南山脚下。当时，他在坟边插了两棵柳树条，第二年春天有一棵柳树条活了，现在已长成老柳树了。第二个来认尸的是张廷志，他带人把其弟的尸体运回西官营梁杖子掩埋了。后来听说，张廷志死后，他的妻子领着两个男孩改嫁了，把一个不足两岁的女孩送了人，弄得家破人亡。第三个是陈刚的家乡人，把他的尸体认领回去。其它尸体再没有人认领，村民们一起动手，将这些抗日英烈的尸体，一个一个地埋在了南山沟里。

这就是长条沟惨案始末，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

下五家子惨案

缸窑岭乡下五家子村(1961 年划归锦西县),曾是刘纯启等各路抗日义勇军经常活动的地区。日军占领热河后,锦西县警察局指导官、日寇平间曾率日伪军三次进剿下五家子,都遭到爱国武装民众的坚决抵抗,而未得手。其中一次,平间率汉奸讨伐队长曹荣轩等 100 余人进攻下五家子村时,中了群众武装的埋伏,被俘 5 人,受伤 17 人,缴枪 5 支。从此,日伪当局对下五家子民众恨之入骨。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于 1935 年 11 月 16 日,在下五家子村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事件。

当时,缸窑岭驻扎有一支日本守备队。队长绰号疙瘩胡,副队长名叫井上正光,这两个杀人成性的军国主义分子网罗汉奸密探,到处刺探情况,捕杀我爱国同胞,残酷镇压抗日群众。他们先以下五家子村人参加了刘纯启领导的消灭古贺联队的战斗为借口,诬说下五家子人都是土匪。他们又以突袭手段抓捕了下五家子村人姜佐周、杨树祯、张臣等人,逼骗他们交出曾经抗击过日寇的爱国群众名单。日寇用尽各种酷刑,阴谋都没得逞。下五家子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已有所提防,为躲避日寇残酷暴行,暗暗地搬出村子,白天劳动在田间,夜间宿在山沟野地,与日寇周旋。日寇变换手法耍出新花招,大搞欺骗宣传,大讲“日满亲善”、“皇军不杀好人”等谎言,麻痹群众。还用物资施以小恩小惠,如用给病人看病、给孩子们糖果、玩具等手段以稳定人心。同时,暗使密探阻拦群众外出躲避,对于已经搬出的人家,则采用威胁利诱的办法骗其回村。日寇经过一个阶段的宣传欺骗,见时机已到,即开始下了毒手。

1935 年 11 月 16 日黎明前,日寇出动驻缸窑岭所有部队,突然

包围了下五家子。接着，翻译官领着鬼子兵，挨家逐户叫起正在沉睡中的群众，把100多名青壮年男子赶到西河套“开会”。日寇首先把从缸窑岭押回的姜佐周、杨树祯、张臣3人推到刑场，当场杀死。荷枪实弹的鬼子兵把西河套围得密密层层，还怕群众跑掉，又用群众自己的腰带、腿带绑起群众。群众曾几次挣脱绑绳要冲出去与敌人拼命都未成功。凶恶的日寇用3挺机枪同时向人群猛扫，顷刻间人们成排地倒下去，尸体浸在血泊中。之后，鬼子又做第二次搜查，发现有蠕动和呻吟的，马上补一刺刀或补一枪。最后，鬼子又在死难者尸体上倒上汽油，放火烧毁，以掩盖其罪恶行径。

在村外大屠杀的同时，村内鬼子也下了毒手。日寇把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儿童，用刺刀逼到屋里，用绳子绑起来，然后放火，整个村子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反抗的、想逃跑的，一个个被惨杀在庭院内外。烧杀持续3个多小时，全村64户、400多口人，除串亲外出和在敌人枪口屠刀下挣脱幸免者外，被害共387人，400多间房屋全被烧毁。村内外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门庭院落只剩下残断墙壁，已成为一片焦土。当时，在杀人场和村内从敌人的枪口及屠刀下拼命争斗中，共逃出11人。白金祥，在敌人机枪扫射时被压在死人身下，他豁出一条命跑出杀人场，先跑到自己家，见大火正在燃烧，妻子和他刚满周岁的儿子已被鬼子杀死在枣树旁。他母亲倒在外屋地下，肠子拖在外面，还没断气，听到儿子呼叫声，老人家说不出话来，用手比划叫儿子快走，然后含恨死去。白金祥眼含痛泪，从后院跳墙逃了出来。刘国珍(女)，是回娘家的第二天就遇到这场灾难



令人惨不忍睹的被日寇杀害的中国儿童尸体

的。她眼见兄嫂和侄儿们惨遭杀害，悲愤交加，操起一把菜刀冲出家门。鬼子兵看见紧紧在后边追赶，刘国珍踏着亲人的尸体，穿过浓烟烈火，机警地藏了起来。当她发现藏身地方有一个青年，又忙退出来，并对青年说："我不藏这，你是个男的，将来可以为下五家子人报仇。"说完又跑到村中的小庙里躲了起来。鬼子兵看见她钻进小庙，就用刺刀乱扎，刘国珍举起菜刀，暗下决心，只要鬼子敢往庙里钻(庙门很小)，就把他的狗头砍掉。鬼子用刺刀扎不着，也不敢往里钻，就抱来一捆干草堵住庙门，放了一把火，然后走开了。浓烟熏得刘国珍喘不过气来，她用力推掉庙门和燃烧的干草，扑灭身上的火焰。当烧杀声音渐渐消失时，她悄悄地回家一看，全家 18 口人全被鬼子杀害了。刘明善，全家 7 口人没有到广场上去，躲在屋里，6 口人被刺死。当鬼子端刺刀向他刺来时，他猛一躲闪，只被刺透了前襟，另一个鬼子向他后心扎去，他急忙一闪，右肋受了伤。刘满腔怒火，奋力和鬼子搏斗，身上挨了 7 刀，鲜血渗透了衣裳。他趁机抓住一个鬼子的枪管，飞起一脚，把鬼子踢倒在火堆里，随即冲出家门。鬼子开枪未中，他才逃出了虎口。刘勤，是从杀人场上跑出来的，敌人在后面紧追，他看无法脱逃，就跳进井里。鬼子追到井沿后，往井里打枪，打死了原来就藏在井里的另一个人，而刘勤幸免于难。刘治中，当时只 13 岁，鬼子兵把他同 6 个孩子一起绑在树上，要放火烧死。点着火后，鬼子兵就离开了现场。他挣开绳子，又忙着解开另外 6 个孩子的绑绳，然后撒腿就跑。但那 6 个孩子跑到半道又被鬼子追上，全遭杀害。其余几个人，刘国才、刘国廷弟兄是从火堆里爬出来的。9 岁的刘国凡同母亲跑到山上，被压在为掩护他而中弹身死的母亲身底下，才幸存下来。贾芦氏，被打昏过去(鬼子当她已经死了)，后慢慢醒过米，才得活命。吕振江妻子跑到北山坡上负伤逃掉。8 岁的杨宝玉被鬼子打伤后，爬到乱草棚里才保住性命。日寇这次的大屠杀，当场跑出的仅有这 11 个人。他们是幸存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

娄家沟惨案

娄家沟距北票县城约25公里，是北票通往黑城子公路边上的一个村庄。该村栾家窑是抗日英雄蓝天林的家乡。蓝天林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医巫闾山以东举起“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的大旗，1933年又转战到家乡，号称“抗日灭满救国军”。蓝天林同刘振东、老梯子、周荣久等抗日队伍联合，向日寇发动一次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围攻和突袭。如1934年奇袭奈曼、二打黑城子王府、1935年围攻北票等，都给日伪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蓝天林这支队伍成了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搞得敌人焦头烂额，是日伪统治者心头之患。在这种形势下，日伪统治者派来以“活阎王”佐藤为队长的日本讨伐队，四处“追剿”蓝天林的抗日队伍，并在娄家沟村设置伪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以强化治安。还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我抗日志士，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这颗抗日火种。



日寇杀我同胞惨状

1938年11月24日，日寇在娄家沟又用铡刀杀害我同胞11人，制造了娄家沟惨案。这11名同胞，多是蓝天林队伍的成员(其中一人因哥哥是蓝天林的部下，也被抓来了)。他们被俘

以后，受尽了严刑铐打，但始终不屈服。于是，敌人凶相毕露地用铡刀杀害了他们。

这天早晨，天空布满乌云，北风刺骨，雪花纷飞。佐藤率100多名日伪军乘军用卡车冲进娄家沟。接着，娄家沟等3个村的居民，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能走路的孩子，均被伪村长和伪警察驱赶着到杀人场上，杀人场设在村南靠树林的一片开阔地中间。东面是佐藤的指挥台，西南北三面挤满被日伪军荷枪实弹包围起来的群众，场上架起4挺机枪。上午10点多，11名爱国同胞被日伪军用枪托打着，推拥着，押到一口铡刀前。站在最前面的是爱国志士齐孝祥。他被日寇捕抓两个多月，经受各种酷刑，腿骨被打断，头部血肉模糊，但他面对敌人，怒目而视，临刑前向家乡拜三拜，而后抬起受伤的手掖掖袄领，便毅然躺在铡刀上。此时，佐藤从太师椅上跳下来，手握战刀哇啦一阵，翻译官接着翻译成中国话说："皇军说，谁要再反满抗日杀头示问"随后便开始动刑。刀下头落，血花四溅，洁白的雪地顿时一片殷红。



杆上挂着一颗颗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头颅，杆下站着一名待毙的中国人。这就是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事后，佐藤命令将11个血淋淋的人头连同从外地携来的10个人头，一起挂在路边的大杨树上示众。

八家子惨案

1938年，日寇为了实现其长期占领东北，巩固东北殖民地的狂妄野心，在沦陷区内，强化日伪统治政权、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力量，千方百计地收缴人民中间的斗争武器——枪支、弹药。在建昌以日本宪兵队为主配有伪警察组成武器工作队下乡搞“肃正”，逐村收缴武器，并大肆屠杀无辜的人民群众。八家子境内一日发生3起惨案就是一例。

1939年2月8日早，人们还没吃完早饭，青石岭屯的伪牌长就召集各户去于家大院开会。从药王庙区沙河哨分驻所来的日本鬼子队长山本带着3名日本兵和10多名警察，全副武装，走进会场。首先山本训话，他哇啦哇啦地讲一阵子，接着翻译杨XX说：“大家不要怕，皇军是来帮助建设王道乐土的，皇军不杀好人，大家有枪交枪，有子弹交子弹，不交死了死了的有。如知道谁家有枪不说，死了死了的有，大家快说。”讲完话会场上一片寂静。停了一阵子，鬼子山本用贼眼环视群众，见人们都不言语，就露出刽子手的凶相。他从人群中把赵东泰(民间艺人)拉出问：“你的说，谁家的有枪？”赵不语，鬼子兵就把赵东泰头朝下绑在房梯子上，用枷棍枷住两腮，使其张口，用水桶往口内灌凉水。灌的赵东泰头发茬子直冒血沫。灌饱了还惨无人道的用脚踢，赵东泰的嘴像泉眼似的冒着血水。再问他，他仍不语。鬼子兵就把赵东泰从梯子上卸下来，推到人群前，上去3个日本兵手中端着上刺刀的枪往赵东泰身上捅。赵东泰用手夺刺刀把手割了很多口子鲜血直流。当赵东泰被折磨得要死的时候，刽子手用铡刀铡下赵的人头，摆在会场前的桌子上，威胁群众说：“谁不说，就同他一样！”接着又把刘俊儒、杨春瑞拉出来

也给灌凉水，当灌到头发根渗出血津时，杨春瑞的父亲杨殿相忍不住强行制止，被日本鬼子一棒打昏在地。快到中午，刽子手行凶杀人、威逼群众交枪的伎俩没有得逞，就带着赵东泰的人头离开青石岭奔往顾家屯。强盗们走后，群众在悲愤中掩埋了赵东泰的无头尸体，并把灌昏和打昏的人抬回家中抢救、养伤。

日本强盗中午时分赶到顾家屯，伪牌长把群众赶到赵存恭的大院，会场放着一张桌子，摆着赵东泰血淋淋的人头，叫人们跪在桌子前面，旁边用赵家的木头椽子笼着大火烤。鬼子强逼跪着的群众交枪，人们不言语，鬼子就从火堆中抽出带火的木棍朝人们头部或身上乱打。当场有很多人的棉衣着了火烧着肉也不敢动。打一遍又一遍也没打出 1 支枪 1 粒子弹来。日本鬼子一招不成又换一招——灌凉水。把顾家屯的齐明祥、季凤玉、宋尚勤拉出来，分别绑在梯子上，用枷棍枷开嘴灌凉水，直灌到头发根冒血津、口喷血水才肯罢休离去。群众把被灌的同胞抬回家中，经一宿才复醒。齐明祥得了水肿病，浑身发黄，不能干活，后死去。宋尚勤、李凤玉也由此身患重病相继亡故。

当日下午日本鬼子赶到沙河哨，也是把群众集中一起，叫跪在地上，前面摆着赵东泰的人头，强逼群众交枪、交子弹，不说还是先打后灌。把狼洞子屯的李廷友从人群中拉出来灌凉水。这回灌的凉水中掺进了火油和辣椒面，灌的口中喷血水还灌，直到李廷友气绝身亡、含恨而死才住手。

日寇在八家子 3 个屯残害无辜群众，制造了当场惨死 2 名、由此致死 3 名、致残 3 名人民群众的血案，这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在建昌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日军火烧大杖子沟

凡 70 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记得日本鬼子当年火烧大杖子沟、血洗召都巴的惨案。

1945 年 7 月 14 日，一个连的日军从北票三宝撤回朝阳，这些惨无人性的侵略者每到一处则鸡犬不宁。他们在北票的哈尔脑，大杀大抢折腾了一天，渐近黄昏时才向西流窜。从哈尔脑到召都巴区大杖子沟，只是一山之隔，天黑时，这伙强盗就来到了杠头沟沟外的大杖子沟村。一进村，遇到男的便打，见女的就抓，吓得村民们东奔西逃，哭天喊地。

该村除两家大户(地主)外，大都是贫苦的老百姓，人们早已恨透了这些强盗，人人心中都埋着一颗复仇的炸弹。因为村民居住分散，所以这些日本军也就三人一伙、五人一帮地挤进各家。他们每到一家，打骂声、抢夺声，狗吠猪叫声、妇女哭救声便乱作一团。其中有 4 个日本军闯进了田三炮家里(因家境困苦，从小就卖身给地主当炮手，故起名田三炮)，三炮和他年迈的老父亲对视了一下眼色，就溜出了外屋。他爷俩还没出院，就被一个军官叫了回来，掏出手枪便顶在三炮的脑门上，呜哩哇啦地说："……你的，好吃的拿来，热水的送来……"三炮强压心头怒火，给他端来一盆洗脚水，又把唯一的一只公鹅杀掉，递给了那个龟头尖嘴的军官。他们见是带毛的鹅，都火了，劈头盖脑地打了三炮一顿，非叫他把鹅煮熟再端来。三炮一边煮鹅，一边嘀咕着："这仇我非报不可。"

已是午夜时分了，4 个日本军人吃饱喝足后，把碗筷扔了一地，醉薰薰地躺在炕上睡着了。三炮借着从门缝透出的一线亮光，看得真真切切。于是，他蹑手蹑脚地溜出家门，找到老父商量对策。

老父一听他要干掉这几个强盗，先是一愣，反问道："小三，你敢吗？""宁可让他们打死，也决不当奴才……"斩钉截铁的这句话，使老人放了心，点了头。而后，田三炮手握一把利斧，老人拿一个镐头，一前一后悄悄地推门进屋，同时下手，结束了这4个强盗的性命。田三炮收藏好枪支，然后将4具尸体背到离家一里以外的一口干井旁，推到井下。

第二天，日军在召都巴镇集合，清点人数，这才发现少了4个人，于是发了疯似的和伪村长要人。伪村长跪地央求日军宽恕，并一再表示帮助日本人尽快找到凶手。事后，伪村长来到大杖子沟，挨家逐户地查巡此事。正好碰上田三炮，三炮慷慨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干的！与乡邻无关！告诉日本鬼子，有种的来……！"伪村长一听吓了一身冷汗，掉头就跑。随后，100多名日军疯狂地卷了回来，架起机枪就向杠头沟猛烈扫射。田三炮一个人端着大枪还击，一枪一个，半个时辰就干掉了10多个日本兵。日军一看不好对付，一面向朝阳求救，一面撤回到召都巴筹划对策。

这时，有的好心人劝田三炮说："三炮呀，快跑吧，看来凶多吉少啦。"在乡亲们的一再劝说下，田三炮眼含热泪说："老邻旧居，大叔大婶，我连累大家了。留得青山在，来日再报仇……"从此，他远走高飞了。

16日，日本侵略军聚集了几百人，由伪村长引路开进了大杖子沟。见人就抓，全村几十户的房子全被烧光，上百口人无家可归，有2名村民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

大平房惨案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占热东与辽西各地的日军接令向指定的地点集结，立即缴械，等候处理。与此同时，被日寇抓去的国兵、劳工，也都砸烂枷锁，纷纷返回故土。在这一喜悦和混乱的局面下，铁路线的交通，一时造成紧张。

8 月 22 日傍晚，尽管大雨连绵，凌河洪水猛涨，大平房车站上还是挤满了男女老少，他们顶风冒雨，守在车站，等候自己的亲人早日归来，全家团聚。这些老乡们，有的在候车室交谈着胜利的喜讯，有的跑到站台翘脚观望。忽然一阵汽笛声响，室内室外的人们都跑到站台，等候列车的到来。

正在这时，只见从西边开来的一辆溜道车上坐着 12 个日本鬼子，有的身穿便服，有的仍穿着鬼子的军服。他们开到大平房车站，把车立即刹住，气势汹汹地找到车站站长赵镰铭，要住宿、要吃饭。当地的维持会害怕鬼子闹事，给做了饭，安排了住宿，当晚无事。第二天早上，这群鬼子，十分害怕当地人民收拾他们，在日本少佐队长指挥下，一大早，就要开动溜道车东逃。哪料，正巧从东开来一列火车，车上坐满了从抚顺、阜新方面回来的劳工和勤劳奉仕队。车到大平房车站停下，双方开了对头，各不相让。日本鬼子还象往常那样蛮横无理，跳下车就强令该车司机把车倒回，司机不让，双方发生口角。一个会开车的鬼子兵，爬上车头，就要搬闸把车倒开回去。中国司机坚决不让，气急败坏的鬼子兵拔出短枪，就向中国司机开火，当场打伤了司机左臂，血流满身。司炉工人火冒三丈，顺手抄起煤铲，向开枪的日寇劈去。鬼子闪躲过跳下车头，向他同伙的鬼子叽哩哇啦叫了一阵。鬼子们登时满脸杀气，准备开枪打死车头上的司机、司炉，好动手倒车。就在这时，列车上的劳工、旅客、铁路员工群起义愤，大声叫骂着："鬼杂种，投降了还耍野蛮！""砸死这

群狗杂种!”有的抡铁锨,有的拿石头和日寇展开了决斗。日寇少佐队长正拿枪要打工人时,铁路警卫队队长杨黑子带警卫队冲了上来。他一枪把少佐队长打死,接着乱枪齐发一阵,又打死10个鬼子。剩下一个穿便服的鬼子被打伤后,在混乱的人群里逃走了。

那个受伤的鬼子乘混乱时,溜进了民宅,钻到一家猪圈里。等到天黑时,他连夜跑到金岭寺,向集结在那里的鬼子联队做了报告。这伙日暮途穷的侵略者,怀着不甘失败、报复、歇斯底里的心情,第二天就纠集了约200名鬼子兵,操起武器,乘一辆装甲车向大平房开来。

金岭寺的铁路工人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通知了大平房车站。害怕大平房人来不及躲避,又故意把道岔搬错,使日寇装甲车脱了轨,一直拖延到24日下午,鬼子才能开车。金岭寺的铁路工人,为使自己同胞不遭杀害,冒着极大的危险,到大平房车站,将这一消息也告诉警尉魏德馨,魏也通知了维持会,通知了当地的头面人物。他们当中有的提出组织反击,有的要组织群众赔罪,有的说要求来苏联红军。众议纷纷,莫衷一是,把时间给耽误下去,而且根本没通知当地群众。到日寇的装甲车开来了,他们扛着枪掖着炮,收拾自己的贵重,领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扔下群众逃跑了。

24日下午1点多钟,满载鬼子的装甲车开到大平房车站。这伙日军跳下车,东边沿着小塔子沟,西到庄台营子的大土包,形成东、北、西一个大的扇面形,向大平房迂回包抄而来。狡猾的鬼子为防村民向东、向北躲避,在东边的高地和北边的山包上都架起了机枪。鬼子的大队人马,一班班,一排排手持大刀、快枪,从东、北、西三面向村里冲去,他们进村后,对村民见一个杀一个,远的开枪击毙,近的用刺刀挑死。村民毫无准备,一见鬼子来势汹汹,也摸不清多少鬼子。一听枪炮响,人们就惊慌失措到处乱跑。就在这一混乱过程中,残忍的鬼子兵又施展了他们贯用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刹时,火光冲天,枪炮轰隆,刀光血影,男哭女叫,血肉横飞。一

名姓寇的妇女,怀孕即将分娩,实在跑不动,就藏躲在草垛里,被鬼子拉出来,先用刺刀穿腹,挑出婴儿,然后把婴儿也进行了穿腹。一个姓王的 10 岁男孩跟他爹向外跑,鬼子先在猪圈旁挑死他爹,把这孩子拉到车站,逼着他和被抓来的十几个孩子给死去的鬼子洗尸。洗完之后,鬼子叫他们把死鬼子抬上车,然后把这群孩子拉到站台,一个个割去脑袋给死鬼子祭灵。

凡是躲不了的老弱病残的人,几乎都被日寇杀死在炕上。能躲开的男女老幼,也被逼到村南的大树林子里。因大凌河水猛涨,过不了河,大部分被鬼子杀死在树林里。有几个过河逃命的也被洪水卷走了。此时的大平房街上,横躺竖卧着一具具尸体,血流满街,惨不忍睹。2 个多小时,残忍的鬼子兵竟杀死我无辜的百姓男女老幼 84 口,烧毁民房 246 间。大平房的人民,14 年来,受尽日寇的屠杀、蹂躏,刚刚熬到了日寇无条件投降,又一次惨遭已经投降的日寇的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用中国活人作细菌杀人试验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争,把中国活人称作“木头”,进行细菌杀人试验。

日本特务张绍恩,曾在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做过化验工作,参与用中国活人做细菌试验,残害死无数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1940年7月,张绍恩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因他在学校就参加了日本的秘密特殊组织,所以在毕业分配时,把张绍恩作为特殊人员分配到北票炭矿的本部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是北票炭矿的中心医院,因医疗设备比较先进,基本上是给日本人看病的。张绍恩到医院后,日本人把他分配到化验室工作,主要是熟悉和了解日本医学派的化验常规,使之能更好的为日本人服务。

为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联系,接受任务,张绍恩暗暗的作好了接头的准备。两周后的一天,张绍恩拿着学校发的两封特殊信件,递交给北票警察署。过了一会儿,张绍恩随着一个翻译官走进警察署的署长室。一个小个子的日本人见张绍恩走进来,打个手势,叫他坐下。那位领张绍恩进来的翻译对张绍恩介绍说:“这位是黑田先生。我姓赵,叫赵德生。以后我们是会熟识的。”这时,黑田站起身来,对张绍恩说:“张先生,来了很好,现在分配在那工作?”张绍恩说在炭矿本部医院,将来还要分配到台吉医院工作。黑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您年轻有为,先熟悉熟悉情况,在这个地方好好干……。”随后,他又向张绍恩介绍了北票的治安情况。张绍恩要走了,黑田拉着他的手说:“张先生,半个月后您到我这再来一次,咱们详细的谈谈吧。”

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张绍恩又去了警察署。一进署长室,就看

见黑田正坐在屋里等着他。这次黑田再三告诉张绍恩:“等你到了台吉后,先熟悉一下矿上的情况。当前矿山情况很复杂,您要通过您的业务关系,注意一下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情况,并要注意在和您接触的人物当中,发现可疑的行动和现象,有事随时向我汇报。”就这样,张绍恩在局本部医院干了2个多月的化验工作后,把他调到台吉分院去了。

台吉医院,实际上是个门诊所。这里没有病床,只有两间观察室样子的房间,有时这里也住几个病人。当时,台吉分院有1名日本人坂本当院长和1名日本事务长,还有日本护士3人。有中国大夫3人,护士5人。其中有男护士1人,药房和事务人员各2人。日本人院长,只给日本人看病,看病的地点在西边房间。而中国入看病,只能在东边房间。

张绍恩到台吉医院2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坂本把张绍恩叫到他的诊室,对他说:“我打算作两次试验,请您帮忙合作。这两次试验:一个是将斑疹伤寒病人的血液注到健康人的身上,观察病情和病人变化,由你帮助我打打针,再做些别的病情观察;另一项试验是把回归热病人的血注入到健康人的臀部肌肉上,然后再观察病情,必要时可作病理的切注。这次试验,由你替我作。必要的病理切注检查,由我自己来作。对这两次试验,将来我要写个论文,请你多加帮忙。”张绍恩当时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1941年冬季的一天下午,坂本领着一名日本护士急忙来到张绍恩的房间,叫他收拾一下立即跟坂本走,张绍恩跟他们照直走进了一个大院。原来,这个大院是日本人在台吉矿秘密设立的又一个变相集中营——“报国寮”。这里住的都是从外地抓来的人。“报国寮”的四周都围着电网,日本兵把守森严。住在“报国寮”的人集体上下班,统一行动,上下班都得有人看管着。

进了“报国寮”的一间小屋后,坂本说:“快换衣服。”张绍恩立即穿上胶皮靴子,戴上帽子、口罩。然后,被领到了另一间屋子里

去。一进屋，张绍恩突然愣住了，只见1个中国矿工被3个日本人架着胳膊，硬被按倒在一个墨黑色的铁床上。那人在呻吟的挣脱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健康人。日本人逼做试验的中国工人叫"木头"，这屋里已绑来十几名"木头"，被几个持枪日本兵看守着。

试验开始时，他们叫"木头"只穿着裤衩，被绑在柱子上或床上。那个日本护士先从患伤寒病人身上抽血，每人抽5CC，然后再注射到健康人的血管里。就这样，一次就作了10个人的试验。在这10人中，张绍恩作了四五个人，坂本作了两三个人。在回来的路上，坂本对他说："这次试验很危险，在这被作试验的10个人中，大部分人是要死了死了的"。

一连几天，张绍恩看见坂本差不多每天都去"报国寮"，每天早晚去两次，是到观察室去观察被作试验者的病情和看化验结果。

几天以后，坂本又一次找到张绍恩说："今晚10点钟，你来我那里再帮帮忙吧。"10点钟他准时去了。这时，坂本正在事务室，张绍恩进屋后，他拉了张绍恩一下说："走！跟我来！"他把张绍恩领到了他的诊室。诊室的窗户遮得严严的，屋正中间放着一张手术床，床上躺着一个尸体，上面盖着一条白单子。张绍恩正惊慌时，坂本对他说："来帮忙做一下尸体解剖。"说完，俩人就急忙地换上了衣服，开始了工作。还有个日本护士，在旁边帮忙。在手术中，坂本特别注意这个人的肝脏。只见他取了一片组织，放在了固定的溶器中。然后又把尸体包扎好，就洗手换衣服了。张绍恩想，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细菌研究吗？作完了手术，坂本对张绍恩说："这个事，谁也不能说"，张绍恩哼了一声就赶紧走了。

第二年春天，张绍恩又帮他作了一次试验。这次是在门疹室作的。这天大约9点钟，张绍恩进了门诊室，只见屋内有6个病人。在这些病人中，有2个是患有回归热病症的，4个是健康的人。首先，坂本欺骗那几位有外伤的健康人说："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法，是特别有效的。"开始，张绍恩从两名回归热病人的身上，各取10CC的

血，分别注入两名健康人的肌肉中。然后，再给那两名病人各打一针“606”，就叫他们走了。那4名健康人就留在观察室内观察。这次试验，都是张绍恩作的一般注射。三四天后，病人才开始发冷、发烧，体温由低变高，可达40℃以上，这时，再作血涂片检查。张绍恩发现这次试验未发生症状变化。到第5天，张绍恩又从被注射人的局部取一小块肌肉组织，再作化验，这才发现，4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注射后发现了症状，张绍恩就取下了有症状变化的人的组织，交给了坂本。

在日军侵略者侵占中国期间，在北票炭矿就有500多名称为“木头”的中国人被作细菌试验。

张绍恩不但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用中国工人作细菌杀人试验，而且张绍恩在日本侵略者的豢养和怂恿下，也充当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成为人民的罪人和历史的垃圾。

日本侵略者在热河省开展的“特别工作”

在日伪统治时期，满洲16个省，唯有热河省开展了“特别工作”，即“防共、反共、灭共”的工作。

1941年，我华北冀东革命根据地，派赴东三省一部分抗日力量，这部分武装部队(包括地下工作者)，以当时的热河省青龙县境内都山为中心，分赴兴隆、平泉、建平、敖汉等地，发动抗日活动，创建更加广阔的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一有察觉后，便惶惶不可终日，穷凶极恶地要除掉这心腹大患。他们在自以为统治比较稳固的伪热河省境内接壤的冀东青龙、兴隆等部分山区县，大肆施行镇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特别工作”。

第一、建立“无住地带”(也称“无人区”)。所谓“无住地带”，就是为了割断共产党、八路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山大沟深、草丰林密、比较隐蔽、便于开展抗日斗争的山区，划线埋桩定为“无住地带”。并在桩上横钉木板，上边写上“无住地带”4个字。在其范围内，禁止有人来往活动。如果有人走进这里，或从其中路过，一旦被日军、警察、宪兵、特务发现，就会被认为是八路军、游击队或共产党嫌疑分子而逮捕入狱。轻则勒索钱财，取保释放；重则严刑逼供，首先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施以灌辣椒水，灌火油，坐老虎凳等种种暴刑。有的甚至长期拘禁，不容取保，最后竟至监毙。当时，比较大型的挂号的“无住地带”有：青龙县境内的都山地区、半壁山一带，兴隆县境内的雾灵山一带，喀喇沁中旗(平泉)的光头山一带，喀喇沁右旗(建平)境内所辖毛沟五家村的朝脑沟梁一带，还有毛沟七家村的毛金坝梁一带。如果时局紧张，敌我双方斗争比较激

烈时，日本侵略者就随意确定“无住地带”。对“无住地带”里的老百姓限期迁入指定地点。如果逾期不迁，则以谋反抗拒集家论处。由指挥机关(特别工作班)指派警察讨伐队，率领并监督镐头队，硬行把房屋扒掉或放火烧之，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逼得老百姓哭叫连天，目不忍睹。

第二、大搞“集家并村”。“集家并村”首先是从青龙县开始的。1941 年喀喇沁右旗本部曾派出第一批协和青年行动队，去青龙县半壁山应援“集家并村”。青龙和兴隆两县是伪热河省“集家并村”的重点。从 1943 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集家并村”，逐渐蔓延到喀喇沁中旗(平泉)。该旗协和会本部事务长仁科(日本人)，协同军、警、宪、特亲自带领协和青年行动队积极参加“集家并村”，充当反共急先锋，曾嚣张一时，后被抗日军民把他干掉，砍掉他的头悬挂在高杆上示众，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从此，日本侵略者反共的活动更加隐蔽，更加狡猾了。于同年 4、5 月间，喀喇沁右旗(建平县)毛沟川的五家、七家、旺业甸三村，也被划入进行特别工作的范围内，相继开始了惨绝人寰的“集家并村”。“集家并村”的指挥机构是由伪县、旗公署的军、警，以及协和会的主要成员组成特别工作班，负责“集家并村”的全盘工作，在当地坐镇指挥。所谓“集家并村”就是在公路或大道两旁的原有部分村庄，或没有村庄的平地上划一个大圈子，确定了“部落”点。然后强迫被划归该“部落”里的来自山沟的零散住户，到“部落”里盖简易房居住。进“部落”后，凡 15 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先去修围墙和炮楼。“部落”墙宽 5 尺，高 1.2 丈，四角各设一个炮楼。围墙外有大壕沟和铁丝网。“部落”内，小房一家挨一家，有的几家住一间小房。每个“部落”常驻几名或几十名警察讨伐队员(有本省的，也有从外省调来应援的)。居民出入“部落”必须持有“居民证明书”，否则不许出入。一遇情况紧张，就几天不许居民出入。警察特务一到夜间就挨门挨户地查户口，常常借此之机强奸妇女，掠夺财物，无恶不作。每年每户配

给麻布7尺，每户每月配给海盐7两、火柴1盒。这些配给品经过县、村、甲、排的层层剥皮折扣，发到老百姓手里所剩无几。居民没有火柴用，只好用火石打火。常常是一家做饭，多家讨火。人们没有灯油，就用松柴照亮，熏得人们鼻子、眼睛都是黑的，看上去好象黑窟窿，黑得吓人。许多老百姓全家穿一条裤子，盖一床破被。有的20来岁的姑娘，腰间围块破羊皮，连屋都不敢出。非但如此，警察特务还巧立罪名，任意抓人入狱。他们见到3人以上结伙闲谈，或夜间点灯闲谈，就以“谋反”罪抓去入狱。见到谁家有灰布衣服、饭盒、裹腿等，就以“私通八路”罪抓去囚禁。发现哪一家存有大米、白面、纸烟、油、盐等专卖物品，就以“经济犯”的罪名抓入监牢。居民稍有反抗，就施以重刑，动辄“杀头”、“枪毙”、挖坑“倒埋活人”等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什么残忍的手段都用。每个“部落”里的住户，最多的竞达300多户，处于偏僻地带最少的也有70多户。“部落”里由于人、畜、厕所都挤在一起，极不卫生，经常发生瘟疫，常常造成人畜大量的死亡。因此，抗日群众把“部落”叫做“人圈”，誓死不进集家圈。人们常常是白天修围墙，夜间就去拆掉，与敌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还有的居民不堪忍受敌伪的暴行，往往在夜间起来暴动，打死警察，拆毁“部落”，返回“无人区”里坚持斗争。

第三、建立挺身队和保乡团。日本侵略者为了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斗争镇压下去，彻底摧毁抗日政权，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就从各军管区调来大批伪军和大批警察讨伐队，进行围剿。就象青龙和兴隆这样重点县份，哪个县都有四五个团的伪军和十几个警察讨伐大队，连刚开始集家的喀喇沁右旗毛沟五家一个村，就由热河第五军区派来一个营的兵力和由省派来一个警察讨伐大队看管。不仅如此，还动员全县所有的军、警、宪、特和伪职员、协和会的成员，当时叫做“总动员”，积极行动起来，除搞好“集家并村”之外，还要建立挺身队和保乡团。所谓“挺身队”，就是把各村的居民凡年在18岁至35岁的男性公民登名造册，以“部落”或自然屯

为单位组成挺身队。由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联合选派骨干充当队长。由当地警察分驻所或协和青年行动队，给以军事训练。训练的科目，包括一般军事基本动作，如何射击以及发现情况如何报告的规定等。所谓保乡团就是把 36 岁至 45 岁的男性居民，登名造册编制起来。每个村为总团，由村长兼任总团长。甲为分团，由甲长兼职分团长。具体任务由挺身队长安排，分配给“部落”把门、轮流站岗放哨的任务，充当挺身队的帮凶或补充缺额。

建立挺身队和保乡团，不仅在集家区里建立，而且在尚未集家的地区也同样组织建立。比如当时喀喇沁右旗(建平)除毛沟五家、七家、旺业甸 3 个集家村外，其余各村从王爷府开始，经过公爷府、龙山、西桥、楼子店、新地、东丰泰(沙海)、叶柏寿等直至本旗最南部的榆树林子、朱碌科为止，全部建立了保乡团和挺身队。到 1943 年 1 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召开全旗灭共大会时，伪旗长乌拉巴图在会上宣称，已在全旗 39 万人中选出建立保乡挺身队的就有 24 万人。以“全旗总动员，彻底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为口号，大吹大擂，以挽救他们苟延残喘的政治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后，对中国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统治，妄图把这一地带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是我热河西部是联接冀东的战略要地，在这块国土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其残酷的“特别工作”，肆意屠杀我中国同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游击区强行“集家并村”

日本侵略者在派出重兵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肆“清剿”的同时，日伪当局还炮制了“集家并村”的政策。从 1942 年秋开始，关内外日伪军协同行动，在长城沿线挖沟筑防，大搞“集家并村”。逼迫群众修“部落”，制造“无人区”，以期割断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44 年 7 月，日军首先在伪喀喇沁右旗公署召开了为“灭共”而集家并村的大会，随即在建平黑水、青峰山乡等北部几个较大集镇和建昌的西南山区，以及凌源的北部、西部、南部山区，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集家并村。他们不管当地人民的死活，强迫群众住进“人圈”。还组织“拆破班”，对没拆迁的房屋全部进行拆毁，如果有人不拆迁或稍有拖延，则按“私通八路”、“思想犯”的罪名予以逮捕。

1944 年夏，山咀子伪警察署、二道营子警察分驻所出动全部人马到马家沟一带大搞集家并村。并扬言：“愿集家者 3 天拆完房子搬走，拆不完者一律用火烧光，不愿意集家者就去蹲大狱”。人民誓死不愿拆掉自己的房屋，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山咀子警察署就派 10 名警察和 100 多人的镐头队到马家沟屯强行“集家”，仅 1 天就将全屯 22 户、110 间房子全部拆得“四脚落地”，杨文国家 3 间房子因其坚决阻止拆毁，被放火烧光。男女老幼凄凄惨惨、哭声不绝地被警察们持枪荷弹驱赶到了道虎沟村；杨永春因儿子有病连愁带气被赶走后 2 天就含恨而死；杨旺因儿子被捕，房子被拆，气得疯疯癫癫，终日骂不绝声，被逼身亡；刘万才的妻子因怀孕快要临产，忧怨成疾，不久也丧失了年轻的生命。其他被集家的人民也都遭受了很大的灾难。

日军强迫人们住进“人圈”后，在内部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人圈”周围筑有围墙、碉堡、炮楼，由伪警察日夜看守，并有巡防队，行动队等敌伪武装设防巡逻。老百姓出入“人圈”必须登记，想种地也不得早出晚归。同时还订立“检举”、“汇报制度”，常以反日嫌疑犯为名，屠杀无辜群众。土豪劣绅和汉奸特务活动十分猖狂，对人们随意迫害、侮辱，日伪军还在“人圈”里抓劳工，强迫他们下煤窑、做奴役，许多人在受尽摧残后死亡。由于住宅拥挤，人畜混居，致使瘟疫流行，很多人被疾病、瘟疫夺去了生命。因生活无着，一些人只好逃出人圈，背井离乡，下了关东。

为了彻底摧垮我抗日根据地，气急败坏的日本侵略者还在“集家区”外划定所谓的“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惨无人道地实施“三光”政策，大肆搜捕烧杀和抢掠。

日本侵略者在喀左集家并村与铁沟无人区

铁沟是喀左羊角沟南部的偏僻山区，处于喀左、建昌、朝阳三县交界地方。这里山高岭峻，有大小山峰500多个，最高的楼子山海拔1091.1米；沟壑纵横，有长短沟200余条，最长的铁沟达30多华里；草木繁茂，沟深草密，共有21个自然屯。由于地势险要，被李天德领导的义勇军作为抗日根据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绘制的日文资料《满州国匪贼分布要图》，把铁沟划为"匪区"，并多次派特务到铁沟进行搜查。

1937年5月11日，日寇指导官管奇亲自带领日伪骑兵230多人，攻入三道沟进行围剿。李天德率部与日伪军激战3天，击毙敌人3名，后因义勇军首领之一李景龙中弹牺牲而撤退。战斗结束，日伪军疯狂闯进三道沟屯，人们怕遭日伪杀害已躲进深山密林，他们找不到人就把牲畜、粮食、衣物等抢劫一空，接着又把全村12户60余间房子全部烧毁。

日伪当局为了搞垮铁沟抗日根据地，调集大批日伪军警到铁沟实行"三光政策"，大搞"集家并村"。1937年10月21日，勒令所有农户拆房搬家，限半个月拆净搬光。为催逼搬家，于10月25日将丰振伍、汤小喜、刘殿柱、马振芝、李殿相、肖振汉、丰朝宗、刘光、刘亮、刘殿耀等12名农民拉出枪杀，借以恫吓人民。但因当时正值秋收完毕，柴草成垛，粮食满仓之际，兼之运力不济(人担驴驮)，道路坎坷，搬运东西实在困难，尽管日夜不停也未搬完。日寇对此极为恼火，疯狂嚎叫，喝令把距离沟外35华里的西窝铺、郑杖子、西埃和卧虎沟4个屯，统统烧光。刹时，51户人家的214间房屋火光冲天，浓烟翻滚，几百口人呼天喊地。一连烧了3天3夜，连同粮草

等物也都化为灰烬。日寇又来搜查,发现各家房壳未倒还能搭棚居住,随令警察组织扒墙队,挨家逐户将房壳全部推倒,并把人们驱赶到铁沟外新建的"人圈"里。

铁沟人民虽然被逼搬进人圈,日伪军警还是不停地循环往复去搜查,生怕有遗漏或未搬者。歪脖沟是铁沟沟口的一条横沟,沟里沟外各有一个小屯。1938 年 11 月中旬,日伪派警察和讨伐队把全屯 9 户 50 间房子统统用火烧毁,把人们一齐赶进"人圈"。

1943 年 6 月,烧锅杖子警察分驻所警长邢山到歪脖子沟外屯搜刮民财,遭到群众拒绝,邢一怒之下也硬逼这里的 12 户、85 口人搬走。

这样,从 1937 年 10 月到 1943 年 6 月,在反复进行"集家并村"的过程中,先后从铁沟赶出 485 户、2365 人,烧毁房屋 1671 间。使 30 多里长的铁沟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无人区"。

1938 年,日寇抓劳工去北票背煤。伪大城子警察署劳工股长孙继武又到铁沟"人圈"抓人,为防止劳工潜逃又令其家属也跟随前去。一次就抓去张立相、丛廷雨、董国志、南国才等 44 户、270 人。被抓去的人在那里象牛马一样,被日本鬼子驱赶着进行繁重的劳动,有的被累死,有的被砸死,有的病死,有的致残,无一不留下惨痛的创伤。有些人为了躲避抓劳工,跑到深山里,长年不敢出头露面。崔杖子王廷宪一家夫妻俩和儿子 3 口人,在大山里靠山劈缝搭个小棚,用石板做炕常年居住,冬天吃雪水,夏季在深夜到 4 里外担水吃,没



日伪时期被日寇烧毁的民房

粮食就用野菜、野果和树叶充饥。

1939年春发生传染病,朱杖子"人圈"12天就死了壮年人12口,小孩16名。仅朱占鳌一家就死了5口人。活过来的人都是死里逃生,生活极其艰难。"人圈"里因棚子窄,住人多,一年四季除睡觉硬挤在一起以外,平时人们都得在屋外活动。这年除夕晚上,朱占祥妻子临产时还在窝棚外边,把孩子生在院里,当人们听到婴儿啼哭声,跑出一看,小孩已冻在地上,用铁锹铲起抱进窝棚,结果腿部冻坏,造成终生残废。

朱杖子北沟李玉发的母亲,1939年外出讨饭走到蝴蝶沟梁上,活活被恶狼吃掉,只留下一些残迹和衣物,连一点尸首都未找到。

被集家的人们真是灾难无穷、痛苦无边,长期处于衣食无着、性命难保的艰难竭蹶之中。但是铁沟人民没有屈服,他们面对屠刀,胸燃怒火,时刻都在想方设法与日寇进行奋战。

凌源集家并村惨状

凌源的刀尔登警察署管区的河坎子(今河坎子乡)一带村庄，修筑了8个“人圈”，搬进1032户、5524人，其中被日伪军打死、饿死、愁死和病死的达669人，占人口总数的20%。三十家子警察署管境内的山嘴村李有生一家，由于父亲、哥哥不进“人圈”被敌人活活打死，5岁的小孩有病带不走，被日寇纵火烧死在房屋里。他的侄媳被赶进“人圈”惊吓致死，被打死的父亲尸体不准埋，只好趁黑夜偷偷的用秫秸裹身掩埋了。据初步统计从1943年春起到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时止，日寇强制在凌源县城的北部、西部、南部山区15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占全县总面积的46.5%，建筑“人圈”100个，搬迁进入“人圈”的较大的自然村436个，占全县自然村总数的20.58%，搬入“人圈”11645户，迁进“人圈”人口达70100余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23.3%，因受逼迫、冻、饿和瘟疫症而死亡了3611人。拆掉房屋77200多间，烧毁1080余间。损失牛181头，驴182头，骡马16匹，羊1900多只，猪1500多口。损失箱柜760多口(个)，锅2430口，缸1400余口。损失小农具和小家具88000多件，陈列摆设物品11000多件。损失粮食(被烧毁)16万多公斤。

日寇虽然搞了集家并村，群众人身进了“人圈”，但心时刻想着共产党、八路军，借去田间生产的机会，偷偷带出几斤粮食千方百计的送到八路军的手中。有些群众离开“人圈”后就不回去，吃住在窝棚里(在旧房框周围用柴禾野草搭的棚子)，八路军来了同八路军吃住在一起，汇报情况。敌伪军为了驱赶群众回“人圈”，多次拆、烧窝棚。尽管敌人不断的进行破坏，群众仍住在山洞、石棚里坚持斗争，一直到抗战胜利，搬回原地，重建家园。

柴木沟集家并村

建昌县魏家岭乡柴木沟(也叫苇子汰沟)从沟口到沟底全长20公里,山高、岭大、沟深,树木多、柴草密,交通不便。自1942年以来,冀东党委先后派出张仲三、许忠等同志到这里开展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抗日活动。

日寇为割断我党和人民的联系,采取集家并村的毒辣手段,山大沟深的柴木沟自然不会幸免。当时,这条沟分为31个屯,456户,2300多口人,都被并到沟门子的杨杖子、孤山子和南场3个围子里。要路沟警察署从岭下调来国兵漏子组成拆破班,对一些不拆房的集家户,拆破班就动手给拆掉,柴木沟这一条沟就被损坏房屋1000多间。

杨杖子村原有9户人家,集家并村后,猛增到176户、955口人,围墙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00米,现盖的房子又矮又小都是对面炕,一家有10口人也是一铺炕,有的就在屋地上铺点柴草住。原有住户的牲口棚、碾棚也住上了人。这个围子只有一口井,吃水十分困难。猪鸡没有圈,人便到处是,卫生条件非常坏。1943年夏季瘟疫流行,从圈子里每天都要往外抬死人。原四道沟王老四一家7口人,5天时间就死了5口(老伴、长子、长子妻、次子、次子妻),只剩下一个孙女和他。李忠家8口人一年死去4口(母亲、弟弟、妹妹和他),剩下老婆和几个孩子。特别是原住户李文波一个院住4家:康大个子、葛文秀、两户姓王的共40口人,仅2年时间先后抬出30口人。从集家到解放,这个围子一共死了200多口人。

1944年春,开始从围子里成批往黑龙江省密山、绥化等地强迫迁居,这个圈子一次就走10多户、50多口人,2年多时间内,死

去一半多,有几户音信皆无。

围子大门有部落警和自卫团轮流站岗,居民出入都要检查,从围子里出去的人不叫带吃的和粮食,生人不准进围子,早晨太阳不出不开门,晚上太阳不落就关门,回来晚了就得在外面蹲着。围子里夜间要查户口,谁家多人要盘问,少人也要追查,弄不好都要挨打受罚。

农民的土地多数不能及时耕地、耪趟,土地荒芜,收成减少,吃烧日益困难。

孤山子围子集家户王占和(弯沟人)被定罪为私通八路,霍部队(讨伐队长名霍荣廷)逮捕未遂,便对其母亲、老婆、弟妹进行轮奸,并烧掉他家住房和家具物件。

柴木沟的群众被集家后,不仅土地难种,生命难保,更给我党地下工作和生活也带来困难。可是,这里的群众,一方面为了种地、生活,另一方面为了给我地下工作者送吃的和传递消息,都不肯离开原住地,房子被拆掉,他们就搭临时简易棚吃住。汪金住在柴木沟头三道沟沟里,三面靠着大山,他和他父亲汪余山,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树林中间盖起一间棚子(离 10 米远都看不见)。许忠、齐英和苗树青同志经常住在这里,工作队员宋连升在这个棚子里养伤一个多月(有情况时就背进山沟里躲一下)。后来汪金被吸收入党化名金同。贾文举住在柴木沟的北沟里,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山洞叫狼洞,在洞口上架起树枝,里面铺上柴草,作为临时住处,地下工作者常来这里落脚,许忠在这里养病 2 个多月。李纯家门前有个土沟,他利用沟壁挖了个地窑子,进口处用柴草盖上,里面搭上炕,也是一个较好的住处。还有许多户,就着房壳子搭起木杆,盖上柴草,我地下工作者就和他们吃住在一起。

柴木沟的田金来(较富裕户)已被我地下党吸收入党化名全胜。集家后,被要路沟伪警察署派到榆树底下围子当部落长。贾文举有些文化,被委任为榆树底下围子里的小学教员,他的对象张淑

芹回来种地就成了通信员，有一次她给送信遇上讨伐队，她就把信塞进裤子里，安全地通过了。

1944年夏的一天，齐英带岭上武工队来到柴木沟里。岭上武工队已3天3夜没吃上饭，汪金通知田金来后，他从围子内搞出黄豆一斗、小米二斗，由汪金、汪有(被吸收为党员化名有山)和汪来3人抬着粮食，由田金来护送出围子大门，连夜送给武工队解决了吃饭问题。霍部队(伪讨伐队)追在沟口外也不敢轻易往里进，最后霍部队打了几枪撤走。平时，工作人员来多了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从围子里往外运。一次外边急需粮食，汪金叫她妈装病，用驴驮粮食以去要路沟给母亲买药为名(田金来叫部落警察给送出门去)把粮食送到我工作人员住地。

杨杖子围子分驻所长朱连岐、自卫团长赵秀云常带自卫团到柴木沟里去搜查，发现谁家旧房壳子里有人住，就给拆掉或者给烧掉，对群众非打即骂，他们还指使自卫团，对各围子严加警戒。武工队员苗树青等人，于1944年夏季的一天，在孟杖子刘万君(较富裕户，其父刘玉当过甲长)家，给刘作工作，叫刘把杨杖子围子警察分驻所所长朱连岐请来。几天后，朱带一名警察来到刘万君家(旧房壳子里的临时棚)刚坐下，我党地下工作者苗树青等2人也进来对面坐下，当时朱很害怕，苗对他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哪！现在你们是为日本人办事，以后要为中国人办些事，老百姓搭的棚子，不要再给拆掉，对围子里的百姓不要管的那么严，谁家都有妻子老小呀！我们大部队快来了，吃的用的要多给予方便，你们做的好事、坏事群众都清楚，忘不了你们！朱连连点头答应。此后，自卫团进沟里来再遇见生人绕着走，群众在旧房壳子里搭的棚子也不再毁坏了，围子的大门管的也不象以前那么严了。一次，沟里粮食不足，刘万君就用一头大黑驴从围子里往外驮小米，部落警站岗也不限制，群众上地里干活带点吃的，带点粮食也放宽了。

杨杖子围子甲长(兼部落长)陆林为人很坏，修围墙时，经常打

骂群众。一次，把齐景凤从围墙上推下来，险些摔死(齐一气之下跑去当八路);他向群众要东西、摊花销都非常狠。还有自卫团长赵秀云心毒手狠，群众早对他恨之入骨。孤山围子部落长武成也非常坏。1944 年秋季的一个下午，八路军吴怀、齐景凤等十七、八个人，在孤山子围子陆林家里先把陆林、武成逮捕，当赵秀云从后门给陆林送信说八路军来了，刚叫开门一进屋就被逮住。随后将这 3 个坏蛋一起带到广场上，当众处死了陆林和赵秀云，武成陪榜后，又狠狠教训他一顿释放了。

此后，杨杖子围子警察分驻所所长常常不敢在围子里住，部落警和自卫团上沟里搜查也少了，群众在围子出出入入也松多了。

建昌西南山区的集家并村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以后在建昌西南山区，涉及13个乡约占全县三分之一的地方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将世世代代生息耕耘在这里的100多户、6万多农民，用武力驱赶在108个"集团部落"之中。自1943年春季至1945年夏的3年时间，就有1万多无辜百姓死于瘟疫、屠杀和饥寒交迫之中。

建昌系热河省所辖，地处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是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塞。"九·一八"事变后，这里即是伪满洲国的南部边缘，又是我冀东根据地的北部前沿，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这里成了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前，我冀东党组织就在长城沿线开展工作，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斗争。1942年夏，中共冀东区分委和十三军分区，派出武装部队和武装工作队，分头挺进滦东、辽西开辟游击区。根据上级指示，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一营副营长马骥带领一、二、三连从关里开赴长城外。同年秋季，马骥部队由青龙老岭一带挺进到建昌的和尚房子、新开岭、要路沟、魏家岭、老达杖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他们先后在要路沟的大南台、大小鹰沟、山西、马台子，老达杖子的东南沟、西周杖子、牛洞子等地，多次秘密召开群众抗日积极分子和伪牌甲长会，宣传抗日道理及党的政策，播撒抗日火种。

在我党我军的开导教育下，很多牌甲长成了抗日两面人物，表面应付敌伪，暗中为我党、我军出力。要路沟大龙腰子的甲长衣文章，马台子的甲长庞振，老达杖子贾杖子的甲长杨海荣，牛洞子的甲长齐德政，东南沟的甲长刘忠等，都曾多次给我军筹粮食、征衣

物、传送情报。

我党、我军的顽强斗争,广大山区民众对开展抗日的支持,以及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发展,使建西抗日游击区迅速拓展开来。要路沟、老达杖子、魏家岭、和尚房子等地已基本形成了抗日游击区。日伪在建西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民众的抗日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面对我党我军在建昌西南山区抗日游击区的不断拓展,日本侵略者更加惊慌失措。为了摧毁我抗日游击区,封锁八路军开辟东北的路线,确保"满洲"这块扩张全球的补给基地,日寇在1941年,就开始把从山海关到古北口的长城线900多公里范围的"无人区"向北推进,妄图通过制造"无人区"的办法,彻底摧毁我党、我军和民众间的鱼水关系,从而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

1943年初,敌人经过精心策划后,即在凌源南部、绥中西部、建昌西南部着手实施制造"无人区"化。建昌西南山区10余个乡范围的数百户分散在山沟里的小屯住户全被赶进了较大村庄居住(百姓称之为"小集家")。同年春季,敌人对"集家并村"政策开始了全面实施。建昌西南山区划定的"无人区"范围是:自西部的老达杖子、要路沟、魏家岭、头道营子、碱厂、喇嘛洞全境和王宝营子一部分,至南部的新开岭、贺杖子、石灰窑子全境和宫山嘴、温杖子、养马甸子一部分,共9个乡(指现区划)的全境和4个乡的一部分。在这划定的涉及13个乡的"无人区"范围内,自然村达600多个,总户数为1.2万多户,总人口达6.4万多人。建昌县(现区划)的总面积为31769平方公里,"无住禁作"地带面积为92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0.4%。

在划定"无人区"范围的同时,敌人发布通告,限定"无住禁作"地带的所有居民,必须拆毁房屋,在指定的时间(一般为15天左右)内,把能带走的物资带走,迁入指定的"部落",不能带走的物资全部毁掉,原处不得留一人。如不搬迁或借故拖延,则按"私通八路"

“思想犯”予以严惩。

为了保障“无人区”化的顺利实施，敌人还调集一批军、警、宪、特，开向“集家并村”地区，与当地伪军、政骨干结合，采取暴力手段强行推行野蛮的“无人区”化。还组织了“拆破班”，对百姓自己不拆的房屋，就进行破坏性的拆毁。自 1943 年 3 月至 5 月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建昌西南山区“无人区”范围内的 652 个村庄 12479 户、64562 口人被敌人赶进了“集团部落”。据不完全统计，在敌人对“无住禁作”地带有 41486 间房屋被烧、拆毁掉，约有 529254 万件器皿、衣物、农具被抢走或毁掉，有 650 头驴、马被宰杀，122.4 万斤粮食被抢走。



日寇在集家并村中建立的“人圈”

在修筑“部落”围墙时，敌人强迫所有 15-60 岁的男性平民轮流出工，有不出者，轻者打骂，重者按“思想犯”拘捕起来。从 1943 年 3 月至 8 月，在修筑 109 个“部落”中就有 90 余名无辜百姓被打死，近 200 人被打成重伤致残。王宝营子黑沟的樊秀章，在轮到他出工时，因老母病重，只晚去了一会儿，便被活活打死。喇嘛洞和新开岭两个乡分别都有 30 余人被当场打死或打成重伤后不治而死。

为了维护“部落”的治安，每个“部落”除设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部落”警外，还从青壮年中挑选出二、三十人，边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边对这些人进行奴化教育，使其为他们出力。训练结束后，就发给这些人步枪、火枪或棍棒。发给火枪棍棒的称“大统自卫

团”，发给步枪的称“小统自卫团”。任务是：协助“部落”警察站岗放哨、看大门，防止八路军的袭击，监督百姓行动等。其实，这是日寇“以华治华”的野蛮手段。

“集家并村”后，敌人还大肆摊派或强抓青壮年，送往外地为其充当苦力。据不完全统计，“集家并村”后的3年内，建昌西南山区的109座“人圈”内，约有2500人被强抓劳工。仅1944年，要路沟下平方子“人圈”内就有马会等40多名青壮年被抓了劳工，送往奉天(今沈阳)一带做奴役。3年时间，2000多名劳工有100余人病饿而死，尸骨弃之于异乡的荒郊野外。

由于“部落”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宅拥挤，人畜混居，致使“人圈”里到处是粪便、污水、臭泥坑，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老鼠、跳蚤等害虫迅速繁衍，造成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横行。自1943年夏季至1645年夏季，西南山区109座“人圈”的64562人中，就有12238人被瘟疫或其它疾病夺去了生命。有的人早晨把别人抬出人圈，到晚上，自己又被别人抬出去了。甚至有的“人圈”死了人都没有人抬。

要路沟的19座“人圈”内，分别居住着来自163个自然村的4100户、20500口人。仅3年时间，就有6270口人因染上瘟疫或其它疾病而死去。占“人圈”总人口的30.5%。瘟疫最重的下平方子“人圈”，3年时间内，就有104个小孩和183个大人死于瘟疫。该“部落”在1944年夏季的一个夜间，竟有11具孩子的尸体塞在“人圈”大门墙角，等待翌日开大门后扔掉。老达杖子吴杖子“人圈”，共居住14个自然村的153户、760口人，3年时间内，就有306口人因染上瘟疫而死去，占该“人圈”总人口的40.3%。魏家岭杨杖子“人圈”的王老五家7口人，1944年夏季，5天时间就死去5口；贺杖子小庙沟“人圈”的贾林，全家8口人，有6口大人死于瘟疫，只剩下一个7岁的男孩和一个5岁的女孩，这苦难的小兄妹在死去了父母，失去了生活依靠后，只得沿街乞讨，在死亡线上挣扎。

天灾人祸，已使“人圈”百姓的生活无法维持，而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从1943年始，从征税20种，增至34种之多，较大项目的实物税和捐税有粮谷出荷、民生集谷、义仓粮、粮谷株式会粮、地亩捐粮、地亩附加粮等等，合计每亩缴粮38斤之多。正项捐税有：民生税、地亩税、地亩附加税、门牌税、协和会税、牲畜税等等。

还有日伪敲诈百姓的所谓“杂项费税”，如送菜、送柴、部落费、维持费等10余种。如有违抗不交或所交钱物不如意的，挨打是轻的，重则扣上“反对大东亚圣战”的罪名，送入监牢。要路沟土金塔“人圈”中的王景文家有土地50亩，打下的粮食因不够交各种苛捐杂税，3年时间里卖掉土地15亩。除了交纳各项税费，他家每年还要向“维持会”交猪肉150斤，粉条280斤，白菜1500斤，木柴3000斤。

除了苛捐杂税外，敌人为了控制粮食、食盐、布匹和其它生活用品到八路军手里，市场一律不准买卖交易。百姓所用的粮、盐、布等全靠敌人的所谓“兴农合作社”配给。如布匹，经层层扒皮，“人圈”内的百姓每人每年只得到一尺多，有的“人圈”甚至连一尺也得不到。食盐更难，“人圈”居民一年的配给盐不够吃一个月。

“人圈”的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敢赶集，怕被日伪诬为“政治犯”、“经济犯”、“秘输犯”等罪名，遭到迫害甚至杀头。1944年腊月的一天，要路沟土金塔“人圈”患有精神病的农民王峰，腰间揣有2块大洋到要路沟集上，被要路沟伪警察署警务科长仓科大二(日本人)带领的伪警察搜出，就硬说他是八路军的“秘输犯”，不容分说，就拉到东河套砍头示众。

“集家并村”使山区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荒芜。造成土地荒芜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除距“部落”5里之外的边远山区皆被敌人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不许人、畜入内，如有违者，敌人就开枪打死，使边远山区的土地撂荒。二是“人圈”大门每天都是日出三竿才开，日头老高就关，使百姓无法适时耕种土地。

三是大批青壮年被强抓劳工，押往外地充当苦役，家中无劳力而使土地不能耕种。四是由于瘟疫流行造成大批劳力死亡，致使有地而无人耕种。

土地荒芜了，断绝了百姓的衣食之源，加之敌人残酷的经济掠夺，致使许多山区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冻饿而死者屡见不鲜。新开岭房身沟上坡屯的10户人家，被赶进“人圈”后，有5户因生活无着而背景离乡，下了关东。要路沟土金塔“人圈”的180户人家中，要饭的有18户，逃荒的有10户，做长工的50户，糠菜半年粮的80户。

敌占区军民的反“集家并村”斗争

富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建昌西南山区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反“集家”斗争。

中共十三地委为加强反“集家”斗争的领导，于1943年3月，成立了临抚昌和凌绥青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同年夏季，凌绥青联合县工委将八路军十二团一营改编成七区队，后又编成数个武工队，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到青龙、建昌西南的广大山区宣传反“集家”斗争。

在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八路军的宣传教育下，建昌西南山区的“无住禁作”地带，有很多群众不惧日寇的高压政策及法西斯暴行，坚持在山里，也不进“人圈”受敌人的蹂躏。老达杖子易杖子的刘汉荣、刘俊父子誓死不进“人圈”。最后，当敌人欲强行将他们拖进“人圈”时，一起自尽而死。要路沟大、小鹰沟和统子沟等地的群众，坚决不进“人圈”，房子烧了，他们就搭窝棚住，窝棚烧了，他们再搭起来。统子沟张玉学家历经7次烧拆，始终坚持在山里。贺杖子腰岭子群众朱万深和王金、王玉福父子等不进“人圈”，他们在山里凭借地势挖地窨子，洞口用柴草伪装，敌人不来，他们就出来种地，敌人来了，他们就钻进山沟躲藏，整整3年。喇嘛洞上五家子农民刘长海，因甲长杨XX带人扒他家的房子，愤怒地一菜刀将杨砍倒，然后带着庄里7户不进“人圈”的群众，逃往外地，表现了人民群众顽强的斗争精神。

在领导群众不进“人圈”斗争的同时，我八路军武工队多次于夜间与群众配合，把白天修好的“人圈”围墙扒倒或炸毁。有的围墙要经过数次修、扒，好几个月才勉强完工。老达杖子贾杖子“人圈”

的围墙从春修到秋，也没修完。1943 年的除夕之夜，黄石砬武工队长李杰，带领部分战士，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用炸药包将贾杖子“部落”围墙炸毁数丈远，并放火烧毁了“人圈”门的岗楼。日伪军警对此惊心丧胆，而“人圈”内外的广大群众，都深受鼓舞，坚定了反“集家”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在日寇“集家”政策实施后不久，中共凌绥青联合县工委为了便于和加强斗争的开展，使之取得更大的成果，派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林堂在大鹰沟组建起第一个党小组，由樊恩任党小组长，党员有刘进元、李春芳。西南山区第一个党小组的建立，标志着民众抗日斗争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阶段。

当时，由于敌人对山区经济的无限度掠夺，以及对粮食、盐、布匹、医药等生活必须品的严密封锁，使“人圈”内外的穷苦百姓生活濒临绝境。但是，为了支援八路军、武工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广大群众宁可让父老妻儿忍饥挨饿，挨冷受冻，也要把仅有的一把米、一粒盐，冒着生命危险，送到亲人手中。大、小鹰沟的地下党小组的3 位党员在对敌斗争，支援抗战工作中，身体力行奋不顾身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并带起一批群众参加到斗争中来。他们 3 人一直没进“人圈”，自 1943 年春至 1945 年夏，他们 3 人给八路军筹粮、购粮不下 50 石，筹送鞋袜近万双，并不顾个人安危，将粮物及时送到我军手中。1944 年，刘进元曾因为我军购粮而被捕入狱，受尽折磨，最后经我地下党组织全力营救，才得脱牢笼。1944 年春，大鹰沟张文余在为我军购粮途中，不幸被娄杖子“部落”长沈朋林和“部落”警抓住。沈拷问张为谁买粮，张一口咬定是贩粮做买卖。沈便用脚狠踹其腹，使张腑脏受伤，尿血不止，没过 3 天，便死去了。魏家岭柴木沟沟深林密，汪余山、汪金父子曾利用各种条件，千方百计为我军筹送粮物，侦察敌情，掩护我军伤员。1944 年 8 月 13 日，由于叛徒出卖，汪余山父子不幸被捕。在狱中，父子俩坚贞不屈，虽受尽酷刑，但对我党我军秘密誓死不露，后来，汪余山在狱中绝食 10 天，

光荣就义。老达杖子东石片子的老中医杨秀成，还把一位重伤员隐藏在家里，他亲自采药煎药，端水送饭，终于把垂危的伤员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

为了进一步开展敌后斗争，开辟岭上抗日根据地，1943年秋后，我地下党组织和八路军武工队在老达杖子、要路沟等游击地区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首先通过关系人搭桥铺路，利用通信、密谈等方式对伪牌、甲长等地方上层人物进行宣传教育争取工作。

要路沟伪警察署长张松坡原是日伪亲信。为了教育争取张松坡，1944年初，马骥亲率七区队诱敌倾巢“追击”。我军到魏家岭四道沟后，马骥又率部连夜急行至要路沟，将警察署包围，留下一封劝告信，没采取任何惩罚措施，就撤走了。第二天张松坡回来后，深受感动，立即给马骥回信悔过，表示以后绝不再与八路为敌。为了给我军提供活动方便，张松坡还撤掉了南部的两个警察分驻所。此后，自老达杖子到和尚房子一线岭边地区，基本上联成了一片，我军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局势也得到了扭转。

然而，也有极小部分地方日伪势力，死心塌地效忠日寇，我军则对他们采取严厉打击的手段。要路沟娄杖子“部落”长沈朋林，曾多次拦截刘进元、李春芳、张文余等人为我军购买粮食的驴驮，还将张文余毒打致死。在“人圈”内，沈欺男霸女，百般刁难穷苦百姓，实属罪大恶极。魏家岭杨杖子“部落”长陆林、自卫团长赵秀云二人也是铁杆汉奸。为了打击少数，教育多数，鼓舞人民的斗志，我八路军、武工队分别除掉了沈朋林、陆林、赵秀云3个铁杆汉奸。这一行动，大大震慑了敌伪的反动气焰，加速了两面政权的建设。使伪甲长、“部落”长、“自卫团长”等方面敌伪政权的头目，明着应付敌人，暗中给八路军办事。

针对敌人的疯狂围剿，我武装工作人员，抓住有利时机，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对那些作恶多端、卖身求荣的汉奸、特务也绝不

手软，或者登门警告，或者杀一儆百。

1943年秋，我武工人员捕获处决了出卖情报并给敌人通风报信的绿豆沟人田树清。1944年4月，齐英率岭上武工队攻打日伪的双庙警察分驻所。当天夜里，武工队从开明绅士蔡香久家出发，翻过山梁直奔5公里外的双庙分驻所，用生铁壳装上15公斤炸药，攻破了目标，吓跑了伪所长陈冠卿。不久，又处决了为敌人带路围剿我武工人员的裂子山周大盔，从而有效地震慑了日伪在游击区内的反动气焰。

1944年夏季，斗争形势更为严峻。鉴于日伪对凌绥青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我武工人员的伤亡情况，上级指示，为保存实力，除留少数人员继续在这里工作以外，大部分同志暂时撤回口里，等待适当时机再返回。齐英率岭上武工队撤回关内临榆县境内进行修整，我地区大部分武装工作人员随即撤走。但抗日军民反“清剿”，反“集家并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中共凌绥青联合县根据形势需要，加强统战工作力度。通过社会关系，与敌伪组织和“人圈”内的上层拉关系，利用他们惧怕日军也不敢得罪抗日军民的心理，教育他们认清形势，以给自己留条后路，表面敷衍敌人，真心为我办事，争取立功赎罪。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教育争取了一些敌伪中下层人员，对发动群众，瓦解敌人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4年下半年，凌绥青联合县工委根据冀热边特委《对恢复口外工作决定》的指示，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了恢复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和具体措施。于1945年春组织武装工作队又重新深入到口外开辟工作。1945年5月，中共冀热辽区党委根据《关于热辽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精神，撤销了凌绥青联合县，凌源、青龙单独设县。委派齐英为中共凌源县工委书记兼凌源县武工队队长，率凌源武工队重返岭上继续开展斗争。

齐英率队到达岭上根据地后，与当地的抗日积极分子取得联

络，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并决定首先除掉追随日寇多年、带日伪军围捕杀害我岭上武工队人员的汉奸自卫团长李万仓。1945 年 5 月 29 日深夜，在当地堡垒户刘林和杨贵林等人的带领下，齐英率武工队与坚持在当地抗日的游击队配合，奇袭盆子窑“人圈”部落，一举捣毁盆子窑警防所，推倒“人圈”围墙，缴枪 16 支，处决了李万仓，并把部落里的上万斤粮食连夜用大车送到要路沟的大小鹰沟抗日根据地。7 月，齐英又率部配合青龙县抗日游击队攻下了大杖子“人圈”，打死日伪军 2 人，俘虏 30 多人，缴枪 30 多支。此后，在岭上一带继续发动群众，深人开展抗日斗争，一直坚持到“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一起疯狂的逮捕事件

1943年1月13日，日本侵略者在凌源刀尔登尖山子，制造了一起逮捕群众43人的事件，其中被绞死1名，关进监狱10名(死在监狱9名)，被押送充当劳工的32名。

伪满时期以尖山子为中心点的柏杖子、柏家台、西沟、下仓与虎头石等10余个村庄(伪甲事物所设在尖山子)为一个甲。这个甲地处在凌源县刀尔登西南20华里，是个纯山区。这里山高路险，树木柴草繁茂，很适应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秋季开始，我冀东十二团一营以两个连的兵力奉令向青龙都山东北地区活动，破坏平泉铁路、电线，袭击平泉、汤道河、朝阳山等处敌人据点，消灭敌伪组织。尖山子甲和四邻的毛家店、马杖子、胡杖子甲等，是我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每当我军走后，敌刀尔登警察署的特务便时常赶到此地，会同尖山子甲长张余(解放后被关押，保外就医时死去)，以缉查私通八路为名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对此，当地群众恨之入骨。

此情况被迁(安)青(龙)平(泉)联合第八区(设在青龙汤道河)民政助理于建华和通讯员张荣轩得知，便下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效忠日寇的伪甲长张余。经区领导同意，于建华带领5名区干部，于1942年冬的一天午后来到尖山子甲西沟庄。经调查得知张余在家。于便令3名区干部站山放岗接应，自己和通讯员张荣轩化装后，大大方方的离开西沟庄去尖山子甲。他们来到尖山子甲张余的院当中时，张余的哥哥张庆见有两陌生人便来到院当心。当于建华问他张余在哪间屋子里时，他奸滑地回答说，在东院。于建华没听张庆的鬼话，通讯员张荣轩手持短枪、抢先进入正房。

于建华看到西厢房北间敞开一扇窗户，屋内似乎有人，便立即

奔到窗前。屋内一个普通打扮的人，正躺在火炕上抽大烟。于建华便举枪对准这人，厉声说道："不准动，你是干什么的？"这个人连头没抬回答说："我是出特的！你是干什么的？"于回答说："我是刀尔登警察署出特的！"这个人立即说："我是建昌警务科的！"这个人本想用自己身份压人，但没想到八路军已到他的眼前。张荣轩从正房屋出来，也急奔西厢房。二人将这个人绑了起来。甲长张余乘机溜出西厢房奔正房跳窗逃走。于建华便将被抓的人带到西沟庄，经过审讯后得知此人是刀尔登警察署的警尉补房继武，由于房继武平素罪恶累累，民愤很大，当即被处决在西沟庄外。

伪警尉补房继武被处决后，敌人疯狂地寻机报复。1943 年 1 月 13 日早晨，伪刀尔登警察署讨伐队和日本宪兵队 40 余人，在日本宪兵队长赤津精男的率领下包围了尖山子、柏家台、西沟 3 个村庄。将 3 个村约 200 人赶到尖山子庄外河滩上，开会进行训斥，然后抓走成年男性群众 43 人，由刀尔登装入汽车押送到凌源受审。审后将他们分别送到承德、阜新、鞍山、四平、本溪湖等地服刑。被逮捕判刑的群众有：张国云，判刑后押送承德被绞死；王墉死在承德监狱；王勇、王林、申宝余死在鞍山监狱；王宗廷、申维军死在四平监狱；王云、王维死在本溪湖监狱；王发在本溪监狱重病后回家；胡海清押送承德监狱；裴云押送到抚顺充当劳工死在抚顺。申宽、王甫、王任德等 32 人押送到阜新充当劳工……。

上述 42 人，除死在监狱里的以外，余者直到 1945 年"八·一五"祖国光复，才回归家乡。

疯狂地搜捕　不屈的人民

凌源县南部河坎子一带山势陡峭险峻，在凌(源)绥(中)青(龙)抗日联合县成立前后为我抗日游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八路军和武装工作队经常出没于此，拔据点、杀汉奸，给敌人以有力地打击。这里的人民群众为八路军做鞋、送情报、当向导，护理伤病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4 年 1 月 2 日，驻守在青龙县三道河子金矿的日本侵略军的一个中队约 50 多人，到前槽抓了一个乡民给带路，窜到东沟大抓所谓“私通八路的嫌疑犯”。凡是在家的男子都一律被赶到庄里受审。敌人把马瑞馥 20 多岁的儿子马占川毒打一顿后，追问他谁通八路？马占川没有回答，敌人又将他扔进水缸里淹泡，捞出后再进行毒打，门牙被打掉好几颗，满嘴鲜血直流。

敌人得不到什么情况，就把其中 10 多个人押到西庄(和东沟相距二里)的河沙滩上跪着，然后又包围了东庄和西庄进行挨门逐户地搜捕。一个日本兵在搜捕时见朱连元和朱延庆父子正在炕上编席，用刺刀便要挑死朱延庆，朱延庆的母亲上前劝解阻拦。朱延庆乘机跑出去混进人群，才免得一死。

日本侵略军把抓来的人都赶到西庄的街中心，从东沟抓来 10 多个人也赶到这里，两处合起来计有 70 多人。令这些人向北朝着日本军官跪下，并两手作揖，一动也不许动。日本翻译进行审问：“你们给八路军杀羊吃没有？给做饭吃没有？”翻译边走边问边叫骂，但是却无人回答。这个翻译走到高文奎跟前，凶狠地问：“你说，八路军来过没有？给八路杀过小鸡和羊吃没有？”高文奎回答说：“八路军来过，也给杀过小鸡和羊！”这个翻译官顺手提起一根棍子

使劲向高文奎的面门杵去，一下子将高文奎的门牙杵掉3颗，又进行毒打，致使他当即昏倒在地人事不省。当日本翻译官问出吴丙志是东庄小学教员时，就说："你的是八路匪的教员，教的统统是小八路匪！"说完就左右开弓打了一顿嘴巴，将吴丙志两腮打得当时就肿起老高，连话都不能讲。

这伙日本侵略军毒打审问完群众后，把认为可疑的30多人全部绑走，押往河坎子的大西沟。从东庄到大西沟有10多里路，一路上被捕的群众屡遭敌人的打骂，吃了不少苦头。傍晚时分，这些群众被押到大西沟程锦家过夜。

3日的早晨，凌源的特高队(中国人)40多人分成两股又进行大逮捕。一股去达魔洞甲的东庄、西庄抓人；另一股到香洼甲的大西沟和日本侵略军汇合。日本侵略军把抓来的牛瑞、马瑞、陈震、马占川、臧文、陈广田、高文坤、吴丙志等8人带去青龙县关押10天后才放回来。特高队逮捕的程锦、程坦、程殿和、王山、王秀、王荣、程相等人，连同2日日本侵略军押在程锦家的约30多人，由特高队押往佛爷洞村公所。走到梯子岭根时，东庄30多岁的吴丙会在敌人的毒打折磨下，加之连饿带累就走不动了，凶残的敌人就一枪将他打死在路边。等这些群众在敌人的押解下到达佛爷洞时，天已经快黑了。这时从建昌来了一辆汽车，敌人让这些群众上了汽车送往凌源。当汽车走到刀尔登杨杖子河套桥头时，汽车的轱辘掉到桥下，车也差点翻到桥下。此时，天已大黑，敌人又让被抓来的群众步行前进。趁此机会，东庄的陈岐藏在桥头底下准备寻找机会逃跑，但被敌人搜出，枪杀在桥头。敌人将被捕的群众带到刀尔登住下，4日将他们用汽车送到凌源，关押在大什字东的福德客栈。在福德客栈，敌人对抓来的群众施以酷刑，逼供审问谁通八路军，给八路军办过什么事。不说就严刑拷打，压杠子、灌辣椒水、灌煤油，还有的用半开水顺头顶往下浇，无所不用其极。被抓的这些人除个别经过保释外，其余的全部被定为"私通八路的国事犯"，送往阜新煤窑

罚做苦工。这30多人有的死在半路、有的被折磨死在煤窑,也有的后来逃回老家。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里的人民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相反,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反动统治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决,立场更坚定。他们前仆后继,继往开来,坚持和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至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附录一：

在外地坚持抗战的朝阳籍抗日英雄

在外地坚持抗战的朝阳籍抗日英雄

（按姓氏笔画排序）

乌兰，原名宝力格，1922 年 9 月 15 日生于朝阳县嘎岔村。“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1 年 3 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9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参加了伊克昭盟的游击队。1940 年在内蒙独立旅政治部工作。1941 年 7 月又被派到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了卓索图盟沿革和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及蒙汉聚居地区的政策，为开展蒙民工作奠定了基础。1946 年 2 月 2 日，卓索图盟分会成立，乌兰被选为副主任，并分配到热辽地区开展蒙民工作，任蒙民工作队政委，并担任十一、十二支队政委。1947 年 7 月 4 日，乌兰任卓东工委主任。1949 年 5 月 20 日，乌兰转业到内蒙古自治区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任。建国后任内蒙古轻工业厅厅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人民政府委员。在内蒙工作期间，被选为全国妇联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中共八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 年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顾问。1987 年 4 月 5 日，病逝于北京。

刘桂五，字馨山。1902 年 7 月 4 日出生于朝阳县六家子乡八家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 年到宋哲元部当学兵，后入热河白凤翔部任排长、少校连长、上校团长。1935 年冬，东北军经整编成立了骑兵军，刘桂五任骑六师第十八团上校团长，是骑兵六师的主力。刘桂五的抗日爱国思想，直接影响到骑六师师长白凤翔，骑六师与红军经过多次交往，结成了友谊关系。1936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坐镇临潼华清池，强迫张、杨执行他的“剿匪”计划。12 月 8 日，张学良将刘桂五召到他的公馆西楼，经过亲自试验刘桂五的忠心和胆略之后，面授如何逼蒋团结抗日机宜，刘桂五毅然接受。12

日清晨，刘桂五在骊山山坡虎斑石下的枯草中捉住了蒋介石。刘桂五在蒋介石身旁认出他侄子蒋孝先，知道他是在北京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当即开枪将他处决。捉蒋任务完成后，刘桂五升为骑六师少将师长。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刘桂五所率之骑六师在永济、风陵两渡口过黄河，在大同、丰镇一线与日寇激战。10 月 6 日，敌人以伪军 3 个师的兵力和部分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大举进犯绥远。两军对峙，连续激战 3 天。自进入绥远半个月内，刘桂五率骑六师官兵，英勇抗击侵绥日伪军，歼敌 600 余人，击毁敌坦克 3 辆，铁甲车 1 列，数次创造以少胜多的战绩。1938 年 4 月 21 日，刘桂五和马占山宿营于百灵庙西南黄油杆子村时，又被敌重兵围困。22 日凌晨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激战中，刘桂五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年仅 36 岁。1961 年 7 月 25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破例追认了东北军将领刘桂五为革命烈士。

陈镜湖，字印潭，号小秋，曾用名陈龙川、陈士秋，化名李铁然。1901 年 10 月 25 日生于原热河省建平县哈巴沁村(现辽宁省建平县富山乡南井村)。1923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辽宁籍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 年曾被选为中共“五大”代表，历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等职。1923 年陈镜湖在李大钊、张太雷等同志的直接帮助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李大钊同志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党组织曾多次派他回到直隶一中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党、团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天津市早期党的活动贡献了力量。1923 年 6 月，陈镜湖服从党的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从此，他以其特殊身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4 年 1 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做出了贡献。1925 年初，陈镜湖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公开身分是国民党热河省党部执行委员。1925 年冬，中共北方区委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任副书记，陈镜湖被选为

执行委员。1930 年,陈镜湖任中共内蒙古特委临时书记,兼管组织工作,从此化名李铁然。10 月 2 日,陈镜湖当选特委书记,主持内蒙古特委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33 年 3 月,陈镜湖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公开身分是抗日同盟军参议,党内职务仍担任内蒙古特委书记。5 月 12 日,陈镜湖奉命带领参谋朱耀远及警卫员从张家口乘车去张北县北部点验抗日武装,在桦树梁遭到当地反动民团袭击,不幸牺牲,时年 32 岁。1983 年 1 月 7 日被辽宁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赵尚志,辽宁省朝阳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珠河反日游击队队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等职。1933 年 10 月,赵尚志找到中共珠河县委,建立起珠河抗日游击队。12 月,赵尚志率队在火烧沟与日军正规部队激战 6 小时,消灭敌人 20 人,击毙日军大队长 1 人。1934 年 3 月,赵尚志在秋皮屯召开东北反日联合军成立大会,被推选为总司令。1934 年 6 月,赵尚志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8 月,赵尚志率哈东支队袭击敌铁路交通线 91 次,毙敌 46 名,伤敌 102 名,敌经济损失 130 万元。1935 年,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兵力达 6000 余人,把反满抗日斗争推向高潮。1938 年 1 月,赵尚志应苏联邀请赴苏,后被苏方关押。1939 年 6 月,苏方以"误会"为理由,释放了赵尚志。7 月,赵尚志率 100 余人返回抗日战场。1940 年 1 月 28 日,中共满洲省委以反王明、康生为由,错误地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并撤消了他党内、军内的全部职务。1941 年初,赵尚志被调到苏联去学习,在那里再次受批判。同年秋,赵尚志终于返回祖国,投入到更加残酷的战斗之中。1942 年 2 月 12 日凌晨,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分驻所时,被特务刘德山打伤被俘。12 日上午 9 时,赵尚志将军壮烈牺牲,年仅 34 岁。1982 年 6 月 8 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

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为赵尚志同志恢复了名誉。

赵尚朴,是赵尚志的二哥,1906年出生于朝阳县喇嘛沟村,1932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奉组织派遣,参加了由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抗日挺进军,在绥远前线与日军进行战斗。1938年4月,挺进军失利后,被分配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工作。历任晋西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晋绥三分区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晋绥第二纺织厂政委兼厂长、太原市工委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回哈尔滨市工作,历任中共太平区委书记、哈尔滨电车厂政委兼厂长等职。1958年任哈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曾任哈尔滨市一至六届委员会委员。1980年1月被选为哈尔滨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12月离休。

赵尚武,是东北抗联英雄赵尚志的胞弟,1920年1月出生于哈尔滨市。1937年“七·七”事变后,年仅17岁的赵尚武,毅然走向抗日前线,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西战团经过调整后,奉命奔赴抗日斗争的最前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2年12月3日,赵尚武在掩护同志转移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附录二：

在朝阳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党政军部分人员

在朝阳坚持敌后抗战的我党政军部分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骥，满族，河北省蓟县人。1932 年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3 年春，到抗日名将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任侦察参谋。1938 年 7 月，参加了冀东大暴动。1939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东十二团特务连连长、一营一连连长、副营长，第七区队副队长、队长，十二团副团长、四十八团团长等职。1946 年 2 月，任辽西省军区二分区司令员。1947 年 7 月，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第三师师长；骑兵纵队改编后，任骑兵师副师长。建国后，马骥一直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领导、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装甲兵第一编练基地副司令员、东北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华东军区装甲兵技术部部长。1955 年马骥被授予上校军衔，后又晋为大校，曾荣获“坚持中坚”奖章。1955 年 9 月入南京军事学院装甲系高速班学习，1957 年 4 月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坦克学校副校长、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技术学院院长、院党委书记，装甲兵司令部顾问等职。1981 年离职休养。

刘光路，又名刘行一，河北省安国县人。凌青绥抗日根据地开创者之一。1930 年离家进北平求学。读书期间秘密参加了学生运动。1931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 9 月 18 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光路任安国县农会主任，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活动。不久，党组织决定让他担任冀中区总农会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长。1943 年夏，刘光路接替张化东任凌青绥工委书记职务并兼任第七区队政委。1944 年秋，刘光路奉命调往冀东滦东地委，任地委委员、滦芦联合县委书记。后来，又担任

八路军四十九团政委、十七地委组织部长、冀东区党委巡视员、党校组教科长，1949年后又任南下地委常委。解放后，任中南交通学院教育长、党组副书记，后任中央有色金属总局教育处长、冶金部吉林电气化专科学校校长、吉林江北联合夜大学校长、长春黄金设计院院长、冶金部长春地质专科学校校长。1987年离职休养。

齐英，原名齐云龙，化名郝友。191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常兴店乡郭三家村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参加抗大学习，1939年6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学员班长，冀中军区作战参谋，冀中十二团作战参谋，岭上武工队长，凌源县(包括建昌、喀左)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临(榆)抚(宁)昌(黎)联合县武装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建昌独立团政委、中共热东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民运部长等职。1946年3月1日，齐英在从建昌要路沟去凌源南大岭一带剿匪中不幸牺牲，时年34岁。

宋国祥，中共党员，1908年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白厂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到东北军当兵，先后任连长、营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便毅然弃暗投明，参加了坚决抗日的八路军，不久便在挺进军第十一支队任参谋。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历任冀东主力部队十二团作战参谋、凌(源)青(龙)绥(中)武工队长、中共临(榆)抚(宁)凌青绥工委委员兼办事处主任、冀东区东北工作委员会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朝北卫戍司令员、二十二旅副旅长等职。1942年12月，根据冀东区党委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共临抚凌青绥工作委员会和临抚凌青绥办事处，宋国祥任工委委员兼办事处主任。1943年底，宋国祥由于叛徒告密，在义东站被日本宪兵队逮捕。1945年9月上旬，宋国祥被任命为锦州卫戍区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9月18日，锦州卫戍司令部任命宋国祥为朝(阳)北(票)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45年10月，宋国祥调回锦州任我军二十二旅副旅长。1946年7月31日，宋国祥到朝阳县六家子执行任务光荣牺牲时，年仅38

岁。

张化东，1914年6月26日生于辽宁省西丰县。1932年参加抗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随即加入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张化东被派到静乐县、婷县任县委常委、武装部长和组织部长。1939年初，调任中共岚县县委书记，领导当地军民开展抗日斗争。第二年，张化东调任中共晋绥边区分局岢岚地委常委兼武装部长。在此同时，组建了临(榆)、抚(宁)、昌(黎)、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党工委，张化东任书记，又成立了联合县行政办事处(即县政府)，张化东兼任办事处主任。1945年春，冀东第十六地分委成立，张化东任组织部长。8月，奉中共中央命令组成八路军东北挺进纵队，张化东任纵队党委组织委员。9月，张化东任沈阳卫戍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并兼做东北地下党人员的组织关系接转工作。10月，沈阳市人民政府成立，张化东兼任沈阳市公安总局副局长。11月，东北局决定成立辽西第一军分区，张化东任司令员兼地委常委和专员公署专员。1950年10月至1980年，张化东调任中国进出口总公司经理、中国赴东欧5国(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贸易部进口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前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首席参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代理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顾问、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局长。张化东同志自1963年以来，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离休前为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现住北京。

张野溪，1909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迁西县。1942年3月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通讯员、干事、基干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内蒙古乌丹县公安局长、公安队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任锦州铁路局公安队长、锦州铁路局凌源车站林场场长、党支部书记。1979年离职休养。1989年6月26日因病逝

世，终年80岁。

李钟奇，原名李连芳，1913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原热河省)建平县建平镇油房地村。“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义勇军，并任支队长，参加了著名的江桥战役。1933年5月，李钟奇在抗日同盟军三总队任支队长。1936年10月，李钟奇回到红一军团任骑兵团参谋长。同时，组织决定他无候补期入党。1937年7月，红军改为八路军，李钟奇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长。1938年2月，李钟奇任八路军邓华支队参谋长。4月，李钟奇又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1941年1月，任晋察冀军区骑兵团长。1944年4月，陆军中学与抗大总校合并为总校二大队，李钟奇任大队长，1947年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副教育长，1948年任华北军大副教育长兼校务校长，1949年11月调军委军教育局工作。1950年任军委军校管理局副局长，1952年任军校部助理部长，1957年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9年任二十四军副参谋长、参谋长，1964年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离休。

杨雨民，原名杨维华，曾用名杨友明、黄方。1910年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大庙乡(现大夫营子乡)西别列沟大窝铺村的贫困家庭。青年时曾就学于北平大学，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冀中参加抗日工作，任民运部长。1943年，任中共承(德)平(泉)宁(城)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八路军第三区队政委。1943年5月，冀东军区和冀东区党分委在原有一、二两个区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8个区队，杨雨民任第三区队政委。1944年，杨雨民任热河行署副主任。1945年11月，杨雨民当选为热河省政府副主席，主管民政工作。1971年6月9日遭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逝世。

周治国，曾用名周建华、国田，1917年5月出生在河北省迁西

县东寨村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3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参加冀东红军抗日游击队。1938 年参加冀东抗日联军,历任特派员、宣传员,抗联十四总队、二十三总队、三总队副总队长、指导员;青龙县、平泉县游击大队队长兼指导员、冀东八路军十二团一营副营长,晋察冀十三军分区第一远征工作队队长,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县长。1938 年周治国参加了著名的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率队活动在遵化、迁西等县。1940 年 7 月,任新组建的三总队指导员,发动群众反扫荡,开展隐蔽的对敌斗争。1941 年 4 月,他任青平工作团主任兼游击队长、指导员,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1941 年冬任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一营副营长。1942 年 5 月,冀东党组织任命周治国为冀东军分区第一远征工作队队长,先后建立了 4 个区政权,游击队发展到 200 多人。1943 年春,他带领的游击队和地方干部 200 多人被包围在光头山,突围后为保存实力而撤回关内。1943 年 4 月,他奉命再次率队到平泉、凌源、宁城一带秘密开辟游击区。5 月冀东地委决定成立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周治国被任命为办事处主任(县长)。同年冬季,冀东特委决定成立锦热边远征工作队,重返承平宁地区,他任工作队长,在叶柏寿北部开辟了游击区第七区。日本投降后,周治国任中共热东工委书记,热东地委副书记,冀热辽十八地委民运部长,辽西省工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鞍钢铸管厂、炼钢厂总支书记,鞍钢弓长岭矿党委书记,鞍山市财贸部副部长,鞍山市财贸办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1985 年 4 月,周治国离休。2000 年 2 月 22 日,周治国因病去世,终年 83 岁。

周哲明(周哲民),吉林省通榆县人。1936 年参加工作,1938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冀中军区司令部译电员,冀中七军分区参谋、股长,锦热边远征工作队指导员,冀热辽军区司令部联络科副科长、科长,热中军分区参谋长,广西军区司令部、中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长,广东省军区副参谋长、顾问等职。1984 年离休。

罗文,原名罗文波,又名刘裕光。1913年3月出生于辽宁省凌源县四官营子小房申村。1935年8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中军区十七团参谋长,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书记、七区队队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等职。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领导工作。1964年授少将军衔。1980年罗文离休,1996年10月29日,罗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郑紫明(郑维家),1911年11月生于湖北省红安县。192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分区三总队队长、营教导员、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建国后,历任四十五军政治部民联部长,中南第四工程局联合企业公司党委书记、经理,602厂厂长,中央建材部地质总公司党委副书记等职。1943年春,冀东特委决定建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在联合县活动的主要部队是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郑紫明任区队副政委。1943年冬至1944年春,郑紫明率领一个连的兵力100多人在天义以东和建平、朝阳以北一带活动。同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9月上旬,在冀热辽军区十一团和五十团的基础上在叶柏寿建立了二十五旅,郑紫明任副政委,主要活动在热东、热北一带。郑紫明带一O一团部分部队到朝阳、北票一带工作。1946年夏季,郑紫明所在部队又合编为十三旅,1947年8月十三旅编入八纵队为二十二师,建国后八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五军。

信修,原名孟宪章,别名孟新周,又名金城,出生在河北省蓟县瓦窑庄(现帮沟乡)普通的农民家庭。他是开创凌青绥抗日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1931年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任迁安县抗日救国会主任,从事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迁(安)滦(滦县)芦(龙)联合县组

建，信修任联合县办事处主任，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4月，信修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第九大队政治指导员、宣传科长。1941年信修被调到八路军第十三团政治处任宣教股长。1943年初，中共十三地委成立中共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信修担任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兼民政科长。1945年春，信修任第十六地分委和十六专署驻锦热办事处主任。同时成立抚(宁)青(龙)联合县和凌绥兴(城)联合县工委、办事处，信修任办事处主任。1945年8月31日，凌绥兴100余人的游击队在信修的率领下接收了绥中县城，迫使敌伪投降。解放战争时期，信修同志先后担任了辽西专署秘书主任、副专员，朝(阳)锦(县)义(县)中心县委书记兼地区支队政委、义县县委书记。解放后，信修同志先后任中共宁都地委宣传部长、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江西师范学院副院长。1976年9月28日病逝。

赵子卿，曾用名赵思、赵振河、赵光军，1921年3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西古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易县第十二交通站站长，县人民抗日自卫大队政治指导员、区武委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派出所所长兼区直党支部书记。1944年12月，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工作。1945年5月受党组织的派遣，于6月12日到达日伪统治区的朝阳县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7月1日，在朝阳县城秘密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赵子卿为组长。1945年9月初，赵子卿向中共辽西地委、专员公署汇报工作，被任命为朝阳县县长，赵子卿立即回朝阳筹建县人民政府。1945年9月10日，朝阳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与此同时，赵子卿主持建立了200多人的县支队。1945年11月，中共朝阳县委员会建立，赵子卿仍任县长(县委委员)。1946年10月初，中共热东地委调赵子卿任凌建县县长。1947年8月，中共热东地委决定撤销凌建县，赵子卿被调到叶柏寿县任县长。建国后，赵子卿历任中共锦州市土改工

作团书记兼工作团团长、民主政府社会局局长、四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六区区委书记兼西北区土改工作团书记;1949 年被选为中共辽西省委委员,任锦州市青年团筹委会主任;中共锦州合成厂总支委员会书记;东北财政部军需局处长;地质部东北地质局处长;地质部沈阳地质局、辽宁省地质局副局长;辽宁省质量标准局代局长、顾问等职。1982 年 12 月离休。1991 年 2 月 3 日于沈阳病逝,终年 71 岁。

高桥,原名高明海,字镜天。苏然、徐文良、高桥皆为化名。原籍黑龙江密山县,幼年随父母迁居辽宁省辽阳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进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学习。1938 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的派遣到唐山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做党的秘密联络工作。1938 年 7 月,参加了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任抗联迁安第十四总队总队长。1940 年 7 月,冀东军分区组建十三团,高桥任一营营长。1944 年 3 月 28 日晚,高桥和全排战士正在宁城县北巴四台区老西沟村宿营,被追击的伪热河警备厅警备队、特搜队 800 多敌人包围。29 日,突围时高桥壮烈牺牲在老西沟西大梁上。

高体乾,原名高赞兴,字化如,1911 年 11 月 11 日生于辽宁省建平县孤山子乡白音代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来到北平进入为东北流亡学生开设的东北学院,一边学习,一边寻找共产党,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1932 年春天,开始受到党的培养教育。6 月,中共党组织决定成立热河特别支部,派高体乾随热河特支回建平县开展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支委会认为由于此地群众基础薄弱,党组织来此时间又较短,不能立即组织活动,因此决定回北平向党组织进行全面汇报。8 月,经彭筱秋同意,他回到家乡组织起 20 余人的骑兵队,跟随义勇军部队去锦西攻打日本侵略军。1932 年 12 月,彭筱秋授予他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的番号,任命他为支队长。到 1933 年 3 月 12 日,支队已发展到 2000 余人。1937 年 10 月,高体乾被派往山

西高平县做发展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太南区党委决定他任高平县工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改高赞兴为化如。1938 年 3 月，太南区党委决定把壶关县自卫队编成壶关游击第一支队，高体乾任参谋长。8 月改为保安第九团时，他先后任团参谋长、团长。1940 年，保安第九、十两团合并为九团，接着又成立山西抗日决死三纵队，他先后任七团团长，纵队参谋长，又兼任太行三分区参谋长。1941 年 2 月，他到抗大总校学习。1942 年 3 月，毕业后到太行五分区任参谋长。1943 年，他被调到太岳军区三军分区任参谋长；1945 年春又被任命为太岳军区参谋处长。同年 10 月，任太岳支队支队长，并率队奔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此间先后任辽西军区五分区司令员、哲里木盟蒙汉联军司令员、四分区司令员、西满野战军参谋长、四十八军参谋长。1949 年 5 月，奉命进军江南，先后在江西、广东、广西参加剿匪斗争。1954 年被调到中南军区任训练处长。1955 年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同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并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 年调到中国军事科学院，任战略理论部副部长、部长，1970 年任副院长，1982 年离休。1998 年 5 月于北京逝世。

附录三：

朝阳地区抗日战争大事记

朝阳地区抗日战争大事记

(1931 年“9·18”—— 1945 年“8·15”)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守备队第二大队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一手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武装占领了沈阳城。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奉命“力持镇静,不准抵抗”撤出了沈阳城。

日军随即向辽吉黑三省武装侵略,扩大事态。东北军奉命撤退。

19 日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东北各界同胞抗日救国。

22 日 中共中央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

△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及土肥原、板垣征四郎等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密谋拟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策案》,拟建立一个包括东北四省与内蒙在内的“以宣统皇帝为首领”的亲日傀儡政权。

23 日 张学良通电宣布,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移到锦州办公。由张作相代理边防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主席。从此,辽西成为抗日斗争热点。

25 日 张学良在北平接见东北各界代表时表示:保证不卖国,但目前以不抵抗为宜。

27 日 高崇民、卢广绩、阎宝航、王化一等东北各界名流,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其宗旨是:“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卫主权。”

29 日 热河旅平同乡救国会连续发表两封“告热河同胞书”。

△ 朝阳留平抗日会和热河省立第九中学反日会同时发表

“告热河同胞书”声称:“告我热河父母,吾家可弃,吾身可死,宁作疆场上战死的好男儿,亦不为奴隶牛马、杀留任人之亡国奴。”

月内 以李铁然(即陈镜湖)为临时书记的中共内蒙特委,号召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全国各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0 月

2 日 在热河滦平县金沟屯召开了内蒙古(热察绥地区)各旗县党组织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内蒙特委,李铁然任书记。

8 日 日机 12 飞机架轰炸锦州,投弹 18 枚,中国军民死伤 31 人。

辽西、热东掀起抗日救国高潮。

月内 朝阳县上园跑达沟(现属北票市)人李海峰与义县刘龙台人马子丹,在以抗捐罢税为宗旨的“联庄会”武装的基础上,组成抗日武装,马子丹任司令,周成扬任参谋长,郭子章、王占一、李海峰分别任一、二、三团团长。

中旬 北票栾家窑人蓝天林(原在奉军中当兵,1930 年离开军队在锦县东苇塘一带领导部分农民占领盐滩,劫富济贫,号“平东”)率领 21 名爱国弟兄,在大凌河车站登上一列正在撤退的军车,强烈要求抗日。军方答复,蓝天林如就地抗战,可供给军火。从此,蓝天林便打出了“东北农民抗日拥张(学良)铁血军”的大旗。蓝天林为司令、薛振芳任副司令、王品清为参谋长。

月内 建平县朱碌科白音代沟人高赞兴(现名高体乾,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正在沈阳读书,毅然弃学去北平寻求抗日救国道路。不久,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学习。

11 月

中旬 马子丹、李海峰率部在义县双山口一带,对正在撤退的东北军十九旅宋子泉营发动政治攻势,晓以民族大义,动员他们就

地抗战，宋营官兵深受感动，宋子泉命令官兵把武器交给了马子丹部。不久马部壮大到400多人。

27日 日军向辽西进攻，在饶阳河遭到中国驻军的抗击，日军撤退。

月内 辽宁省政府公安处长黄显声，统一组织辽西义勇军，统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并向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建议派人出关整顿发展抗日义勇军。

12月

中旬 蓝天林率部在羊圈子袭击了日军的先头部队。

月内 喀左草场人李昆山在"救国会"的支持下组织抗日武装，被"救国会"任命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

△ 北票黑城子平安地人孟昭炎，受朱霁青的派遣自津率旧部30余人返回家乡，组织抗日义勇军。

△ 喀左大马架子人袁振民在家乡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袁振民被"救国会"任命为团长。

△ 东北军军官郑桂林毅然辞官回到辽西、热东抗日前线，组织发展抗日义勇军，凌南县(今建昌县)人邓文风率领乡中部分热血男儿参加了郑桂林部义勇军。

△ 凌南人张镇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任团长。

28日 日军再次大举进攻辽西。

29日 东北军主力部队自锦州撤到关内。

31日 以热河省议员毕占一为首，发动民众掀起了抗捐罢税、驱逐贪官周铁铮(汤玉麟的女婿)和军阀汤玉书(汤玉麟的五弟)的民众武装斗争。是日，毕占一率武装攻入朝阳县城。

月内 "救国会"对东北义勇军进行整顿，共编若干路军和支队。统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 "松沪义勇军""上海青年团""济南铁血团"等2000余人开赴锦州前线，参加抗日斗争。

△ 驻锦东北军下级军官发表宣言，谓日本攻锦血战五日，东北军曾“三次转电中央，请发弹药接济，无一应者”，痛责“中央抗日能力，仅于一纸电文，数张标语”。

1932年

1月

2日 日军又增调第二十师团参加攻锦。

3日 日军嘉村、村岛旅团攻占辽西重镇锦州。

4日 黄显声在北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

5、6日 日军相继占领锦西、义县、兴城。朝阳县、凌南县成为抗日前哨阵地。日军骑兵古贺联队进驻锦西县城——江屯。

9日 朝阳县烧锅屯(现属锦西)人刘纯启领导朝阳、锦西两县民众抗日武装2000多人在江屯附近上坡子村、西园子村及钱搭子屯等地伏击了古贺联队及松尾辎重队，共击毙敌40余人，重伤敌20余人。古贺传太郎少佐也被击毙。日本惊呼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11日 日军挟持投敌的锦西县长张国栋撤出江屯，把锦西县公署迁在连山(今葫芦岛市)。

刘纯启率民众抗日武装进驻江屯维持治安。又受民众推举，刘纯启以代理县长身份，署理县政40余天。“救国会”把这支队伍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三十四路军，刘纯启任司令。

17日 郑桂林部在绥中、兴城袭击日军。

21日 郑桂林部在兴城韩家沟与日军作战。

24日 郑部攻绥中沙后所及白庙子据点。

26日 张镇率部在绥中帽盒沟伏击日军。

2月

中旬 蓝天林率部与友军协同，在北宁路石山站袭击日军，击毙日军多名。

19日 郑桂林部在兴城黄沟与日军作战,毙敌多名。

月内 郑桂林回家乡凌南县药王庙郑家沟村祭祖,表示了誓死抗日到底的决心,乡里们深受感动。

△ 邓文风率部在绥中前所车站附近扒断铁路并伏击日军。

△ 凌南县和尚房子人王国瑞组织队伍参加了郑桂林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王任骑兵旅旅长。

△ 邓文风任郑部义勇军副司令。

下旬 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朱霁青(北镇县人)来到朝阳县南部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3月

1日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满洲国”。

9日 日伪在长春举行伪满洲国建国仪式,溥仪任执政。汤玉麟派代表谢吕西出席仪式。伪满洲国宣布汤玉麟为参议长兼热河省主席。

12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

16日 刘纯启部配合友军攻打兴城。

17日 郑桂林部攻打绥中车站。

21日 日军第三装甲列车侵入热河境内。这是日军对热河的第一次侵犯。该列车受义勇军攻击返回锦州。

△ 义勇军第十三路、十七路联合攻打绥中,李昆山壮烈牺牲。

24日 日本飞机侵入北票上空。

26日 建平县宋家店(今属喀左县甘招乡)人侯封福(号“侯托天”)领导抗捐民众捣毁了北公营子盐局子。从此,拉起一股民众武装。

月内 朱霁青在朝阳县南部建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并与辽西、热东的各股抗日武装进行联系。任命李海峰为第一师师

长、刘纯启为第九师师长、孟昭炎为第十四师师长。

△ "救国会"在凌源设热河办事处及兵站。高子达任主任干事。

△ 东北爱国人士冯庸率一股学生义勇军进驻凌源。

△ 热河当局在朝阳设立了六县指挥署，统辖朝阳、阜新、建平、宁城、凌源、凌南六县。

4月

4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热河政策》。

5日 日军将锦朝路客运列车强行开到北票。从此，在中国当局默许下锦朝路客运列车不定期运行。

9日 郑桂林部在绥中鲍庄子附近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歼敌50余人，我方伤亡30余人。

13日 郑部在绥中与日军交战击毙日军中队长小林三郎。

17日 朱霁青指挥李海峰、孟昭炎等部义勇军攻打义县城，未克。

19日 邓文风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去北平治疗。20余天后，伤未愈即返回前线。

20日 关东军第8师团开到辽西接替20师团防务。

月内 "救国会"任命张镇为义勇军第13路军司令。

△ 高体乾由北平返回家乡建平，宣传抗日救国，为组织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

5月

1日 郑桂林部义勇军在绥中鲍庄子与日军300余人交战，毙敌70余人，缴枪20余支。

10日 郑桂林率部攻打四方台日军，郑部参谋长金殿春腿部负重伤。

△ 凌源县刀尔登人魏俭聚众抗捐。

11日 郑部在马家营与日伪军700余人激战。

12日 魏俭率2000余民众砸了刀尔登税卡，痛打了恶名昭著的税吏钱沈儒。

13日 郑部在高岭车站与日军作战，缴获大量战利品。

月内 蓝天林在田庄台附近与日军作战中负伤。

△ 在上海由爱国团体与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以朱子桥(庆澜)为首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

△ 日军武装占领了朝阳寺(现上园)，热军及义勇军退守南岭。

△ 高体乾回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6月

月初 侯封福领导的抗捐队伍与“救国会”取得联系。

2日、8日、9日 郑桂林部在北宁路上与日军连续作战。

15日 侯封福的抗捐武装在三家村菜园子屯与前来镇压的热军董旅的21名官兵交战，击毙军官1人，生俘19人，仅逃回1人。

21日 日军一支武装由锦西侵入朝阳县境内，在二车户沟与龙潭沟的交界处与王震、赵清泉领导的抗日武装交火，日寇23人当场被打死。逃回的8名日军，又被王老凿的三弟王文祥率人在曹杖子后山伏击，打死2人。

23日 日军从锦州出动一支武装到二车户沟进行报复，与抗日武装交战一天后撤回。

29日 “救国会”把侯封福的武装编为东北民众救国军第7路军第4旅，侯封福任旅长。

月内 混入蓝天林部的“天和”匪徒，趁蓝天林离队养伤之机，挑起内乱，杀害了副司令薛振芳等10余人。蓝天林带伤赶回羊圈子地区重整队伍。

△ 中国共产党热河特别支部赵玉棋等3人随高体乾到建平县进行革命活动。

△ 5、6月间关东军第八师团派特务石本权四郎利用锦朝路通车之便，多次潜入北票，并在北票公开建立了“日本关东军北票联络所”，石本任所长。

△ 朱霁青返回关内宣传抗日救国，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

7月

2日 朱霁青在上海向各界发表谈话，介绍义勇军情况。

3日 日本军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第八师团长商谈热河问题。

9日 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在旅团长铃木指挥下，对辽西义勇军进行大讨伐。辽西战斗空前激烈。

中旬 日军动用重兵在小金屯对蓝天林部进行围剿，经过一天激战，蓝天林率部突围，进入广宁山区。

12日 朱霁青在上海发出救国通电和宣言。

17日 李海峰在南岭车站附近的破庙子处，在列车上抓获了日本特务石本权四郎。这就是当时震惊中日朝野的“石本事件”。

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中将当日即派出步兵的第三十一联队，在中村少佐指挥下，以装甲车为先导向朝阳寺快速前进。在朝阳寺隧道南口遭义勇军及热军阻击。

18日 上午日机1架到朝阳上空侦察。下午日机5架对朝阳城进行轰炸扫射，中国民众死伤32人。

19日 日军又派高桥支队到朝阳寺支援中村联队。

是日夜，高桥支队长约见了在北票的热河省参议邵子峰商谈有关“石本事件”事宜。

20日 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大举进攻郑桂林部义勇军。

中旬 高体乾等人获悉汤玉麟已命建平当局逮捕赵玉棋、高体乾等人。赵玉棋、高体乾等人撤回北平，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党组织决定派高体乾与“救国会”领导的第一军团司令彭振国取得联

系，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斗争。

22日 石本权四郎胞兄石本贯太郎赶到朝阳寺进行营救活动。

23日 日机数架侵入热河境内散发传单，威胁中方放回石本。

30日 日军出动3000余人进攻郑桂林部。激战后，义勇军撤退。

下旬 正在北平"救国会"开会的邓文风，病逝于前门外四合老店。

8月

2日 郑桂林部乘虚而入攻占了葫芦岛和连山。

3日 日军出动军舰，水陆夹击郑桂林部，郑率部撤退。

18日 日军从大凌河车站开出一列军车，直开到朝阳寺车站。以吉岗少佐(师团参谋)为代表，企图找李海峰谈判，用被他们俘虏的张连长与石本权四郎交换。

19日 在南岭一线双方交战一天，日军占领了南岭车站。

20日 在义勇军及热军的顽强反击下，日军撤回到朝阳寺。

27日 热军董福亭旅派一营部队镇压侯封福的武装。因武器不济，经过激战，侯部失利，军心涣散，队伍仅剩骨干数十人。

月内 朱霁青重返热东抗日前线。

9月

月初 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司令彭振国出关来到热东地区("救国会"将东北义勇军，按地区划分为军团，辽西及热河地区为第一军团)，高体乾随彭振国活动。

4日 活动在吉东的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之一的王德林慕名委任李海峰为"东北义勇军西路军总司令"，是日，李海峰发出就职通电。

12日 《京报》报道，日军悬赏10万元，通缉朱霁青。

15日 彭振国组织义勇军4000余人，再次攻打日军占领的江屯，杀伤击毙了日伪军多人。激战一日，占领了县城的大部分，后日本援军到来，义勇军撤出战斗。

△ 中共内蒙古特委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发出了“告蒙汉劳苦民众书”

月内 日军的战备公路，已从绥中修到绥凌边界的和尚房子。

△ 朱霁青在肖家店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抗日救国斗争。

10月

7日 日军从义县分三路出兵，向李海峰部的驻地进攻，企图用武力夺回石本权四郎。同时进攻了马子丹部的驻地刘龙台。李海峰率部并押解石本权四郎撤退。

10日 凌源刀尔登魏俭再次率抗捐队伍，分四路涌进刀尔登镇，捣毁了经界局和盐务局，把征收委员马华昌押送县署，县长答应免除杂捐。

19日 朱霁青再次指挥数千名义勇军攻打义州城。因日军防范甚严，攻城未下。

月内 吐默特右旗(今北票市)蒙古王子沁布多尔济，被溥仪封为和硕亲王，并任命为吐默特右旗旗长。

25日 宋九龄指挥义勇军攻锦州，未克。

11月

月初 高体乾部被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下属8个团的架子。高体乾任支队长。

9日 中共内蒙特委发出致中央信。内称，内蒙特委负责人已分赴热河各地指导抗日救亡运动。

12月

3日 日军驻义县宪兵队长矢加部宗太郎亲笔致函李海峰，花言巧语，企图说服李海峰放回石本权四郎。又派说客王洪宾持函找李海峰，许以重金，遭李拒绝。

日军连日派飞机进入热河境内进行扫射、轰炸。

6日 中共内蒙特委书记李铁然(陈镜湖)向中共中央写出报告书,分析了热河的形势,特委工作重心移至朝(阳)建(平)与赤(峰)开(鲁)间。

8日 日军制造了炮击榆关事件。

15日 李海峰在朝阳十家子河套处决了石本权四郎。

16日 郑部义勇军在四方台等地与日军激战,击落敌机1架。"救国会"奖励大洋2000元。

月内 日军以"满洲国"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派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代表参加。会上日方提出三项要求:①汤是"满洲国"委任的热河省长,必须派代表常驻长春;②为了"满热一体",要把锦朝铁路,延伸修到承德;③日本军部在承德设无线电台。

张学良电令张舜卿予以拒绝。

△ 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奉命支援热河,驻防于赤峰一带。

△ 1932年热河省共辖20县、2盟18旗,总面积5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650万。

1933年

1月

1日 日军进攻山海关。

2日 绥中伪警察20余人反正,参加郑桂林部。

3日 日军占领了山海关。

9日 日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

10日 日军向驻九门口中国军队进攻。

12日 九门口失守。

16日 日军3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从绥中明水塘门向凌南进犯,遭中国守军和义勇军反击,激战4小时,日军撤退。

△ 日机轰炸开鲁。

17日 日军1000余人到绥凌边界梨树沟门布防。

26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著名的“1.26”指示信),指示东北党组织动员东三省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并提出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荒术内田在议会上公然叫嚣进攻热河。

△ 日机又炸开鲁。

28日 汤玉麟通电全国表示“寸土有责,抗日救国,贯彻始终”。

△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大将下达了部署全面进攻热河的466号作战命令。部署第六师团和第八师团的进攻方向。

△ 郑桂林部向九门口日军进行猛烈攻击。

29日 耿继周、孟昭炎、李海峰等部义勇军收复了朝阳寺。

△ 日军50余人侵入朝阳县下府镇(现属北票市)。

月内 辽南、辽西及吉黑一些抗日义勇军部队撤到热河境内。

△ 郑桂林部主力退到绥中及凌建交界地区。

2月

2日 日机飞到承德上空侦察。

△ 朝阳寺再次失守,义勇军退回南岭一带。

3日 张学良发表谈话:日军进攻热河将抵抗。

△ 朱子桥代表“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发表支持热河抗战的通电。

7日 日军40多人到凌南边境侦察。

9日 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进攻热河的具体计划。

△ 日机一架在凌南县上空侦察。

13日 义勇军在北宁路大凌河车站袭击日军,击毙野村大尉以下30余人。

△ 郑桂林部在大毛山口与日军激战。

15日 日伪当局向张学良提出从速从热河撤军的无理要求。

16日 郑桂林部绕到明水塘门背后突袭敌人,歼敌100余人。

△ 以黄炎培为首的"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在北平成立。

17日 宋子文、张学良视察热河防务。拨款20万元作军费,任命张作相为前敌总指挥。

△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大将下达了473号命令,规定2月22日开始进攻热河。

△ "救国会"派王化一、杜重远等人携带大批军用物资及慰问品到建平县朱碌科慰问义勇军官兵。

18日 伪满洲国发表讨热声明,汉奸张景惠任讨热总司令,张海鹏为前敌总司令。

△ 承德集会热烈欢迎宋子文、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张学良等27人通电全国决心抗日。热河民众也发表决心抗日的通电。

21日 日军调集10万兵力大举攻热。北路以第六师团为主力由通辽侵开鲁;中路以第八师团第四旅团为主力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由绥中攻凌南、凌源。

日军主力集结朝阳寺,先遣队早川支队偷袭南岭后,分兵两路向北票、朝阳进攻。

22日 日军占领北票。

△ 中共内蒙特委领导的"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宣言》。

△ 中共内蒙特委给朝建区义勇军支部发出指示信。

△ 日军以"满洲国"名义,要求热河省内中国驻军于24小时内撤退。

23日 热军董福亭旅二一三团团长邵本良叛变投敌。南岭及口北营子前线动摇。

24日 日军攻开鲁,热军崔兴武旅仓惶西撤,开鲁失守。

△ 日军先遣部队到达朝阳城东及北部地区。

25日 日军占领热东重镇朝阳。

26日 “救国会”王化一等人在建平朱碌科召集各路义勇军领导人开会,并检阅了义勇军队伍。随后义勇军开始向关内撤退。

27日 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郎中将赶到朝阳,指挥侵略军西进。

△ 日军南路军服部旅团(十四旅团)进攻凌南县境内石嘴子、纱帽山等地,遭到东北军万福麟的抵抗。

3月

1日 汤玉麟一面通电到前线督战,一面准备撤退。

△ 凌南万福麟部不支撤退。

△ 日军占领了大城子。

2日 日军南路服部旅团占领了凌南、凌源。在庙岭附近遭东北军的顽强抵抗。凌源外国仍激烈战斗。

△ 日军川原旅团在建平境内遭到东北军第三十旅的顽强抵抗。

△ 北路日军占赤峰。

3日 日军占领平泉,并在该处集结兵力,尔后分兵向承德及长城各口前进。

4日 汤玉麟仓惶撤退,日军先遣队128人,兵不血刃占领了承德。

△ 日军占领长城冷口,国民党商震部进行抵抗。

△ 蒙奸李守信(朝阳人)在林西率部投敌。

7日 张学良通电辞职。

9日 日军犯古北口和喜峰口。

△ 驻凌源东北军二十九旅六八四团赶到建平朱碌科增援三十旅三八八团。

10日 建平境内中日军仍进行激战。

12日 夜投敌汉奸邵本良到建平中国军阵地前进行策反。

△ 古北口失守。

13日 东北军守军遭受重大损失，大部队撤退。坚持了10余天的建平阻击战结束了。

14日 日军在十家子河套找到了石本权四郎的尸体。并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发了电报。

18日 日军在朝阳为石本大肆悼念。

21日 郑桂林部在义院口击溃伪军赵雷部。

月内 义勇军首领蓝天林回到家乡栾家窑，整顿武装，待机再起。

△ 郑桂林部骑兵旅长王国瑞受命留在家乡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他率部在和尚房子大甸子袭击了日军，击毙、活捉日军各1名。

△ 伪"满洲国"实业部正式接管了北票煤矿，设立了"北票煤矿临时营业局"。

25日 日军在奉天葬祭场为石本权四郎举行了盛大葬仪。

4月

1日 郑桂林部与东北军一部在界岭口与日军作战。

15日 郑桂林部在滦县安山、石门一带袭击日军。

月内 高体乾部撤到察东。孟昭炎、李海峰部也撤到关内。

5月

1日 伪"满洲国"任命张海鹏为热河省省长。

3日 国民党下令取消义勇军，一律改编。

4日 侯封福率20余名战士在陈家沟北梁袭击了3名正在调戏妇女的日军，当即击毙1名，从而引起日军的重兵追剿。

月内 朱霁青撤回北平。

7月

15日 以朱子桥为首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被迫宣布解散。

16日　日军在凌源东赤里赤村(今属喀左县)制造了屠杀村民32人,伤5人,烧毁民房59间的惨案。

月内　日伪当局正式建立了朝阳县。

8月

31日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迫于形势,宣告解散。

10月

9日　留在敌后的义勇军刘振东部、王震部率领抗日武装在朝阳县羊山附近,击毙日军伊滕柯四矢等22名。

抗日义勇军领袖之一刘纯启病逝于朝阳县曹杖子村。

11月

15日　日军在朝阳县二车户沟村,制造了屠杀57人的惨案。把全村所有被抓获的男性一律杀死。

27日　蓝天林在家乡大甲营子再度举起“抗日灭满救国军”的大旗。明确提出了“推翻满洲国,驱逐日寇,消灭汉奸,还我山河”的响亮口号。

月内　高体乾部在察东沽源县境内,被东北骑兵第五师强行改编。

12月

29日　王国瑞率部智取和尚房子伪警察署,得枪500余支。

月内　日本侵略者把北票煤矿改组为日满合营的“北票煤矿有限公司”。

1934年

1月

7日　蓝天林率部进入大黑山地区。

20日　伪“满洲国”宣布实行帝制。

26日　王国瑞率部去攻打凌南县城,在白土岭遭伪军伏击,

经过激战打退了伪军。王国瑞率部撤回和尚房子蒲塘沟。

3月

1日 溥仪在长春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 侯封福在北公营子南山屯与一队伪骑兵遭遇。交战中打死伪军1人，侯封福腰部负重伤，突出重围，转入外地养伤。

5日 日军调集重兵围剿王国瑞部，激战2天，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义勇军小股突围，这支队伍解体。

月内 凌南县人邓文山(曾在马占山部下任营长，参加过著名的江桥抗战)在黑龙江省德都县毅然举起反满抗日大旗，报号"平康德"，开始抗日武装斗争。

5月

17日 蓝天林率部攻打黑城子蒙古王府，未果。

19日 日军在朝阳县南广富营子犯下了屠杀中国百姓27人，烧毁房屋400余间的罪行。

△ 日军在凌南县王砬子沟制造了屠杀群众13人的惨案。

6月

1日 日伪军300余人扫荡了朝阳县石明信沟，打死了"王老凿"的三弟王文祥和堂弟王文儒。群众财物被掠一空。

月内 奈曼旗八仙筒的抗日武装首领周荣久率部1000余人与蓝天林会合，广宁山一带的苑九占、老梯子、双红等部700余人也来投奔蓝天林。蓝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已达4000余人。经过整顿，蓝天林任总司令，周荣久任副总司令，王品清任参谋长，制订了严格的军纪"约法三章"。

月内 高体乾部在河南驻马店被就地遣散。

7月

15日 蓝天林调集全部兵力再次攻打黑城子王府。广大群众纷纷前来助威杀敌，形成万人攻势。第2天拂晓攻破外围墙。敌伪慌忙调救兵来援，17日蓝天林率部主动撤退。

月内　高体乾返回建平，智砸了伪满官营北公营子塔下村“大满号”(鸦片组合)，缴枪8支。

10月　伪满洲国设锦州省，朝阳县划归锦州省。

11月　日军在凌南药王庙一带进行一次大逮捕，17名爱国志士惨遭杀害。

12月

3日　伪满洲国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全面推行归屯并户。

17日　日军调动1000余名兵力，对朝阳县“王老凿”所在的石明信沟进行了一次血腥围剿。34名民众惨遭杀害，烧毁房屋200多间。

1935年

1月　高体乾重返建平，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他在南至公营子，北到下洼，东至老虎山，西到五家煤窑的广阔范围内，进行宣传发动工作。

4月

1日　刘纯启余部李树珍率部围攻锦西县城。

5月

8日　蓝天林部在鸡冠山伏击了日军的军车5辆，毙敌数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9日　伪热河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报，惊呼刘振东率部在锦热边界地区进行反满抗日活动。

12日　伪热河省警备司令部再次通报刘振东的活动。

29日　再次通报刘振东“匪情”。

6月

1日　蓝天林率部在洛湾袭击日本军车2辆。随后又在汤沟、东官营子一带多次袭击日伪军。

月内 高体乾在赵玉祺的协助下,在建平重新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活动。

7月

3日 伪《盛京时报》以"蓝天林匪猖獗"为题,报道蓝天林的反满抗日活动。声称:"势颇猖獗,积极活跃,扰乱朝阳……"

25日 周荣久率部攻占奈曼旗公署。处决参事官山守荣治等7名日伪军官。

月内 2日至28日伪满洲国第5军管区连发6份通报,通报朝阳、凌源、凌南"匪情"。并声称已派伪国兵骑兵5团及6团一部分赴朝阳县三区七道岭一带剿匪。

8月

1日 中共中央发表抗日宣言。

6日 刘振东、王震率部攻占了朝阳县南部重镇二十家子,活捉并处决了伪警察署长马兰廷。王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7日 蓝天林率部在蒙古营子附近伏击了伪军四十四团200余名骑兵。激战3小时,打死、打伤、俘敌共150余名,缴迫击炮1门、机枪2挺,长短枪110多支,马100余匹。

8日 蓝天林率2000余人乘胜包围了北票,与日伪军警展开了巷战。北票日伪当局四处告急。日军赶忙从皇姑屯、锦州、朝阳调兵援救北票。在激战3天重创敌军之后,在援军到达前,蓝天林率部于8月10日安全转移。

10日 伪《盛京时报》以"蓝匪2000余众围攻北票,战况剧烈友军由锦驰援"为题,报道了北票战况。承认日伪军死伤30余名。

17日 《盛京时报》报道,日伪当局急调松井讨伐队、满军第四十二团、兴安南省警备团讨伐蓝天林部。

18日 蓝天林率部攻入贝子府。《盛京时报》8月28日以"蓝天林攻破贝子府"为题报进了这次战斗,并承认"将警甲枪抢去10支""警甲殉职者6名"。

9月

20日、24日　伪第5军管区司令部增调伪军骑兵第三十九、四十团，步兵第三十三团到朝阳、凌南剿匪。

月内　喀左羊角沟人李天德(原为马占山部下的团长，号称“打一面”)转回家乡与侄儿李凤春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开展反满抗日活动。

10月

日伪当局调集重兵对反满抗日队伍蓝天林部、刘振东部、高体乾部进行大讨伐。

7日　日军松井讨伐队在朝阳县南羊山附近与刘振东部遭遇发生激战。由于人力武器相差悬殊，刘振东部遭受重大伤亡。

8日　日伪军又与刘部在北四家子镜子山下激战。刘部边撤，日伪军边追击，连续坚持战斗了10多天，直至10月18日，这支抗日队伍终被日伪军打散，刘振东化装突围后去北平。日军也付出重大伤亡。

13日　日伪军动用万人对大黑山进行合臂包围。蓝天林率部经过浴血苦战突出了重围，并与高体乾部会合。两部先向广宁山退去，发现敌人有备，又向中蒙边界远征。

11月

16日　日军血洗了朝阳县下五家子(现属锦西市)，屠杀了村民387人，全村400多间房屋一烧而光。

19日　日文报纸《新京日日新闻》以“从古贺联队以来的怨恨，歼灭刘振东匪徒”为题，报道了松井讨伐队与刘振东部作战的情况。

12月

蓝天林部与高体乾部撤回到热东开始分散活动。高体乾部解体。

1936 年

1 月

在敌人的残酷围剿和镇压下，蓝天林部解体。敌人在大搜捕中，抗日军民 300 余人惨遭毒手。仅大黑山区长条沟一个村，日军一次就杀抗日军民 26 人。

春节前日伪军再次洗劫了朝阳县石明信沟。

2 月

14 日 伪《大同报》报道，朝阳著名义勇军首领刘振东在北平被日军秘密逮捕，押回朝阳。后被秘密杀害。

3 月

高体乾返回北平，由党另行分配了工作。

4 月

28 日 日本关东军制订了《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纲要》。

月内 喀喇沁左旗公署正式成立。旗治设在南公营子，实行蒙汉分治。

5 月

24 日至 26 日 日军洗劫蓝天林曾活动过的大黑山地区，屠杀百姓数 10 人。

7 至 8 月 日军在大黑山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

12 月

12 日 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月内 曾在黑龙江北部坚持反满抗日斗争的“平康德”(邓文山)与妻李氏回到家乡凌南县继续坚持反满抗日斗争。

1937 年

1 月 伪满洲国开始在奉天、锦州、热河等地建立“集团部落”。

年初 凌源、凌南两县合并为建昌县,县治设在牤牛营子(今建昌镇)。仍实行蒙汉分治。

4月 邓文山拉起一支30余人的反满抗日武装,不久发展到100多人。

5月

11日 日军头目管奇率日伪军400余人在三道沟围剿李天德部。战斗2天,毙伪军3人。李部领导人之一李景隆牺牲。

7月

7日 爆发了芦沟桥事变。

8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14日 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宣言。

中旬 在北票南平安地(今属北票市)蓝天林被日伪军包围。他只身与日伪军拼搏了2个多小时,壮烈牺牲。

8月

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还确定发动冀热边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30日 日军血洗了朝阳县北水泉和东杖子2个村,屠杀中国民众99人。

9月 李天德率部700余人向关内转移,在长城线上被日伪军截回。

在日伪军的重兵追剿下,李天德和郭文联等人各带一部分队伍分散活动。从此,郭文联的队伍改称"仁义军"。

月内 刘少奇指示李运昌速返冀东,发动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

10月

21日 日伪当局开始在李天德活动的铁沟实行残酷的集家并村。

25日　日军在铁沟杀了汤小喜等村民12人，把西窝铺、卧虎沟等4个自然屯的214间民房及柴草全部烧光。

月内　李运昌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

1938年

2月

7日　邓文山部与伪军警作战，邓妻李氏负重伤，不久故去。

3月

1日　邓文山部在黄杖子小东沟，被伪军第5宪兵团500余人包围，经过激战，邓文山率部突围。

16日　郭文联部70余人在大城子西南沟与日伪讨伐队激战2天。事后伪建昌县警务科长向热河省警务厅呈文，要求增兵讨伐郭文联。

4月

20日　毛泽东、刘少奇电示彭真、聂荣臻组织一支部队向冀热边发展。

5月

27日　由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

28日　凌晨，邓文山部在建昌县玲珑塔房身沟里棒棰山被敌人重兵包围，激战1天，邓文山负重伤。突围后，队伍分散，邓在山中休养，不久伤势恶化牺牲了。

月内　中共京东特委并入冀热边特委，由胡锡奎任书记，李运昌任军事部长。

6月

8日　八路军四纵队分两路向冀热边地区挺进。

17日　四纵队攻克热河境内兴隆县城，次日撤出。这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第一次攻入伪满洲国境内。

7月

5日 郭文联率部在建昌大黑山与日伪军激战。

7日 李运昌、胡锡奎率众在丰润和迁安交界处岩口镇举行武装起义，拉开了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序幕。

8日 在牛蹄子山日伪军1000多人包围了郭文联部，激战1天1夜，双方均有伤亡。“仁义军”领导人之一张国栋牺牲。

9日 拂晓郭文联率部突围。

下旬 在八路军四纵队支持下，承(德)兴(隆)平(泉)联合县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伪满洲国热河省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

9月

1日 中共中央致电宋时轮、邓华和冀热边特委，祝贺“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胜利及与八路军纵队的会合”。

11月

24日 日军在朝阳县娄家沟(今属北票市)屠杀百姓11人，连同外村屠杀的10个人的人头，共21个人头挂在树上示众。

26日 日军30余人侵入朝阳县石明信沟，王老凿率家族武装与日军交战，击毙日军2名。傍晚日军撤退，王老凿三儿子王俊峰在战斗中牺牲。

1939年

1月 撤销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撤销了中共河北省委，成立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中共冀热边特委改为中共冀东地委。

3月 郭文联率一支10余人的小分队在南哨五道营子击毙了大城子伪警察署日本指导官小田宫平。

月内 李天德从水泉出发夜行军中摔成重伤，不久去世。这支抗日队伍由其侄李凤春领导，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6月

冀东抗日武装改编为隶属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第13支队，1940年春又改成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副司令员包森，参谋长曾克林，政治部主任刘诚光。

7月

19日 日军小头目鸠枝率领100余人再次洗劫了石明信沟。

月内 中共冀东地委改为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区党分委。

年内 日本人强迫热河人民种植鸦片。

△ 日军从关内抓大批青壮年和我军被俘人员，押送到北票煤矿强制劳动。将这部分人称做“特殊工人”。

1940年

5月

13日 郭文联又用调虎离山计在南哨南沟门击毙了大城子伪警察署又一任日本指导官日高宗秋。

6月

北票冠山煤矿“协和寮”(工棚)1000多名“特殊工人”在韩树琪、刘三领导下罢工2天。

7月

伪满洲国根据其统治需要实行蒙汉合治，把县一律并入旗内。

朝阳县与吐默特右旗合并后，将原朝阳县的管辖范围分为2个旗。原一、二、三区(现在的朝阳县)为吐默特右旗，旗治在朝阳，旗长为黑城子王府的四王爷宝音乌勒吉；四、五、六区(现在的北票市)为吐默特中旗，旗治设在北票，旗长是沁布多尔济。

建昌县与喀喇沁左旗合并，仍称喀喇沁左旗，旗治设在牤牛营子。

建平县并入喀喇沁右旗，旗治仍设在新邱(今建平镇)，1941年旗公署迁到平庄。

8月

中旬 李凤春在卧虎沟活捉了伪喀左旗公署警务科特务梁秀峰、侯锡三,就地处决。

19日 侯封福在家中被伪警察包围,只身与敌人拼搏,壮烈牺牲。

9月

4日 北票煤矿130多名"特殊工人"在韩树琪、刘三领导下暴动成功,打死矿警2名,集体逃出虎口。

年末 北票煤矿台吉一坑50余名工人集体逃跑。

1941年

2月

中旬 北票台吉矿100多名"特殊工人",以晚9点钟汽笛响为令,切断电线,打碎电话,打倒门警,集体逃跑成功。

3月

下旬 台吉矿"报国寮"50多名"特殊工人",打伤1名日本人集体逃跑。

4月

根据冀东区党分委的决定,成立了以周治国为主任的青(龙)平(泉)工作团,深入热河南部开辟工作。

6月

台吉矿"报国寮"再次发生100多人集体暴动逃跑事件。有10余人被抓回,其余人逃出虎口。

7月

月内 日伪当局以移民名义,从绥中、兴城将1600余名渔民,强迁到北票当矿工,当月就逃跑了70多人。

△ 张大山抗日游击队到凌源大河北碌碡沟山区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在菠萝树伏击破坏了日伪军的汽车2辆,打死日军2名,缴获大枪7支。

8月

台吉矿“报国寮”200多名“特殊工人”借领工具之机，集体暴动。与日伪军警激战，打死敌人3、4名，逃出虎口。

9月

中旬 李运昌率十二团、十三团各2个营及地方干部共3000多人，分数路跨越长城，进入热河境内。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开辟了锦承铁路以南的大片抗日游击区。

10月

日伪当局经过精心谋划，制订了《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工作实施要纲》，提出了在长城一线“国境地带无人区化”的“灭共政策”。并在热河开始了大规模的讨伐行动。

12月

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9日 中共中央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

1942年

1月

伪满洲国实行物品“配给”制，所有生活必需品，严禁私人买卖。

3月

5日 由于叛徒凌如喜的出卖，郭文联及其家属在赤峰东门外被敌人逮捕后押回建昌。

15日 冀东区党分委和军区改为晋察冀第13地委和13军分区。

4月

冀东地委组织了三支远征工作队，划区开辟热南及热东地区。以周治国为首的第一远征工作队主要开辟承(德)平(泉)宁(城)地区；以宋国祥为首的第三远征工作队主要开辟凌(源)青(龙)绥(中)

地区。

5月

17日 日本人在建昌组成特别治安厅，判处郭文联死刑。

18日 日本人在建昌杀害了郭文联。事后又把郭文联的头颅装木匣送到承德示众。

月内 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再次大规模跨越长城，进入热河境内。

△ 太行军区敌工部派共产党员金荣久到锦州做地下工作。

7月

9日 冀东军区派十二团一营部分队伍化整为零，深入到青龙、建昌、凌源交界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活动。

月内 晋察冀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书记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同时在冀东区也建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

8月

张化东、信修等同志率武工队出义院口、冷口进入凌青绥地区开辟工作。

10月

中旬 马骥率十二团一营部分战士和地方干部来到凌源河坎子一带活动。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

月内 日军沿长城一线大规模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实施其制造“无人区”的阴谋。

11月

21日 马骥同志率部攻克了建昌老达杖子警察分驻所。缴枪10余支，俘伪警察7、8名。

12月

中共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工委及行政办事处成立。张化东任工委书记，宋国祥任办事处主任。

1943年

2月

月内 日伪当局把北票煤矿改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下设冠山、台吉、三宝3个采炭所。

△ 台吉“报国寮”的“特殊工人”100余人暴动逃跑。强迁的绥中、兴城渔民也逃跑了100余人。

3月

月内 撤销了临抚凌青绥联合县，以长城为界建立了临抚昌(黎)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凌青绥联合县由张化东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

△ 马骥部队在凌源四官营子以西伏击了伪国兵，歼敌1个排，缴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

△ 凌青绥联合县派许忠到青龙、建昌交界处的岭上地区开辟工作，并开始建党的基层组织。

△ 李凤春在铁沟、瓦房、影背山一带张贴反满抗日标语。

4月

月内 北票煤矿台吉“报国寮”的“特殊工人”再次发生40多人的集体逃跑事件，被抓回的惨遭杀害。

△ 张化东派共产党员刘永春到北票搞地下工作。刘当推镐车工人，在矿里宣传抗日救国，培养骨干力量。

5月

6日 凌青绥联合县所属的李杰游击队，配合马骥部队，在青龙杨树窝铺与敌交战，缴汽车3辆、机枪3挺、步枪60余支。

月内 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在平泉县七家正式成立，杨雨民(化名黄云)任工委书记，周治国(化名国)为办事处主任。

△ 张化东调动工作，由刘光禄任凌青绥工委书记，信修任办事处主任。

6月

月内 承平宁联合县在平泉、凌源交界处建立了第五区，区委书记常野，区长李惠友；在叶柏寿以北，天义以东建立了第六区，区委书记兼区长贺文涛。2个区配备了1个区基干队，队长张野溪。

下旬 凌源大河北朝阳洞川西沟群众王万相，为掩护八路军游击队，被日军活埋。被乡亲救出后，过几日死去。

7月

19日 张野溪基干队在三区队二中队的配合下，奇袭了宋杖子车站，击毙了日特头目马昶夫妇和1名日军，缴长短枪5支。

月内 中共第13地委又改为中共冀热边特委，由李运昌任书记；第13专员公署改为冀热边行署，李运昌兼主任，朱其文为副主任。

特委、行署下辖5个地委和专署。承平宁联合县属2地委领导；凌青绥联合县受3地委领导。

军分区下辖十一、十二、十三3个团和一至八共8个地区队。

第三地区队由高桥任队长，黄云兼政委，主要配合承平宁联合县活动。第七地区队，由罗文任队长，马骥任副队长，刘光禄兼政委，主要配合凌青绥联合县活动。

8月

周治国、高桥率部队在平泉、凌源的交界处盘道梁与日伪军作战，击毙了伪平泉县协和会长任科信夫和宪兵队长夏古。

9月

刘永春返回冀东，向东工委汇报工作。

月内 由于敌人调重兵对承平宁地区进行讨伐，承平宁联合县部分人员撤回关内进行休整，留少数人坚持工作。

10月

11日 中共冀热边特委做出《关于恢复热南地区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凌青绥区队应即向北挺进，开辟建昌以南，要路沟以北

地区。”

月内 根据上述决定，成立了“锦热边远征工作队，”由周治国兼队长，周哲民任指导员。工作队的任务是向热赤铁路线以东发展，相机深入东北腹地，设法与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

△ 为了加强三区队的领导，派郑紫明(郑维家)任三区队副政委，郝福洪任总支书记。

△ 凌青绥联合县派出了以郝友(齐英)为队长的岭上武工队挺进到喀喇沁左旗的腹地(今凌源、建昌县)，广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 李惠友带人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伪三十家子八家村甲长任俊。

中旬 马骥率七区队沿佛爷洞、沟门子、松岭子、三十家子直抵凌源城郊，又绕牛营子、二道湾子回到岭上地区。一路上与日伪军警进行了数次战斗。茶棚一仗，击毙伪军队长 1 名，打伤伪军 4、5 名。二道湾子一仗，消灭伪军 1 个机枪排，缴获重机枪 2 挺。

11 月

月内 锦热边远征工作队进入到叶柏寿以北地区。

△ 承平宁返回关内的人员，陆续返回到原所在地区工作。

12 月

月内 郑紫明带三区队一个连到叶柏寿附近地区活动。郑紫明带一个精悍的小分队奇袭了深井伪警察分驻所，对伪警察进行了正面的爱国教育。没缴他们的 1 枪 1 弹，只借了 1 张军用地图。以后这个警察所成了我们的活动据点。

△ 凌青绥联合县民政科长张玉民在岭上开辟工作时光荣牺牲。

△ 李凤春在羊角沟的歪脖子沟捕获并处决了日伪特务郭春雨、修静波。

△ 凌青绥联合县在建昌要路沟建立了一个游击区，许忠任

区委书记兼区长。

△ 由于北票煤矿的“特殊工人”不断发生集体暴动和逃跑事件，日本人把全部“特殊工人”押送到北满。

△ 日军为割断八路军与广大群众的血肉关系，从1942年开始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经过多次反复，到1943年末，在大部地区完成集家，把大批群众赶进“人圈”。仅凌源的不完全统计，在集家期间，就烧拆毁民房46000多间，12000多户人家被赶进“人圈”，3000多人因冻饿而死。

全部长城线建成千里无人区，总面积25000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全热河有10万人死于集家并村。

△ 东工委派宋国祥到锦州打入敌人内部搞地下工作。

1944年

1月

10日 日伪当局出动伪军警20余人，在岭上武工队经常活动的马家沟进行了一次大搜捕，逮捕了群众56人。抗日积极分子邢宝海、杨永财、张占祥、许文奎被判了重刑。其他人被审讯拷打后放回。

25日 凌青绥联合县联络科长霍郁在岭上工作，被敌人包围。霍郁突围出去，他的警卫员陈树林牺牲了。

31日 山嘴子警察署出动30余人包围了岭上武工队队员王起先等人的住处——张函杖子北沟刘珍的家。王起先、李殿威、张玉书、张义、李峰共6名同志落入敌手。后在建昌被杀害。同时还抓去刘珍、王巨朋等6名群众。

2月

6日 杨雨民、高桥率三区队奇袭了宁城县城——小城子，毙敌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嘉奖。

14日 齐英和10多名武工队员在天盛号三路沟的薛凤珠家

学习、休整，被敌人包围。突围时，队员杨守环、张达义、韩福海3人被俘，先后被敌人杀害。

月内 郑紫明率领三区队的1个连，在贺文涛等人的配合下，从叶柏寿以北，经朱碌科挺进到建平、朝阳边界的老虎山口，后又撤回到叶柏寿附近。

3月

18日 周治国在建平五龙台处决了向敌人报告我军情报的汉奸分子王殿丰(东丰太村石匠沟人)，并张贴了处决布告。

23日 李惠友配合张玉武工队，在喇嘛沟马家村捉获了正在做反动宣传的三十家子协和会的何维藩和1名伪甲长，经严正教育后释放。

29日 三区队队长高桥在宁城老西沟战斗中牺牲。

月内 周治国、周哲民率一个小分队从叶柏寿以北出发，到朝阳县石明信沟拜访坚持反满抗日的"王老凿"，共商联合抗日大计。

△ 马骥率七区队奔赴光头山地区增援三区队，中途受阻未果。回返途中，在凌源城北40里处，伏击了尾追的伪国兵第五团和一个日军大队。击毙敌副连长1人，歼敌一个班，缴重机枪2挺。

△ 刘永春从冀东返回北票。

△ 李风春在铁沟附近的小黑山落入敌手，不久被日军杀害于崔杖子后山石砬子底下。至此，坚持10年之久的李天德的抗日武装彻底瓦解了。

△ 本月内日伪当局又一次调集重兵对承平宁和凌青绥两地区的抗日军民进行大讨伐。

4月

月内 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承平宁、凌青绥2个联合县的部分党政干部和武工队员撤回到关内。

△ 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布《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和任务》，指出："团结冀热边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坚持根据

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最后胜利。”

△　冀热边东工委派刘永生到北票做地下工作。他落脚到舅母家，以开豆腐房为掩护。

△　中共凌青绥工委书记刘光路调动工作，由罗文接任。

△　锦热边远征工作队指导员周哲民由抗日积极分子张瑞轩陪同，从建平出发，去吉林省瞻榆县(周的家乡)寻找东北抗日联军的线索。未果后，返回建平。

△　马骥率七区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新开岭锥子山歼敌100余人，缴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

△　北票煤矿台吉二坑工人400多人，反抗日伪当局的压迫，罢工1天。

6月

刘永生在与工人串联中，被日伪当局逮捕，后因无证据释放。

7月

19日　日伪当局在喀喇沁左旗全旗范围内进行一次大逮捕。把薛凤祥等26人以反满抗日罪名送往承德关押。

月内　刘永生培养的北票矿积极分子李少先、张庆恒等人，率100多工人，为要求按时开工资，砸了台吉一坑“劳务系”，打了催班的。矿方被迫按时给工人开工资。

△　周治国等承平宁联合县干部及三区队，陆续转移回关内，只留民政科长张立文等少数干部在赤峰、宁城一带坚持斗争。

△　齐英率岭上武工队撤回关内临榆县境内。

8月

刘永生回关内向东工委请示汇报工作。

9月

刘永生返回北票继续深入开展地下工作，并积极着手进行建党工作。

19日　中共冀热边特委做出《对恢复口外工作决定》，总结前

段口外的工作，检讨了工作中的错误，指出了迅速恢复口外工作的重要性。

月内 根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将中共冀热边特委改为中共冀热辽区委，行署及军分区也相应的改为冀热辽区行署和冀热辽军区。

10月

30日 喀喇沁左旗二道营子村白莲教徒30余人反抗日伪压迫，在李印凌的率领下砸了伪村公所、警察分驻所。接着又去攻打建昌旗公署。在扎兰营子与伪军警接战，18名白莲教徒壮烈牺牲。

月内 凌青绥办事处副主任张仲山率领武工队镇压了甘心认贼作父的要路沟杨杖子部落伪甲长陆林和自卫团长赵秀云。

△ 撤销了地区队建制。

1945年

1月 冀热辽区党政军机构正式建立。李运昌任区党委书记，李楚离任副书记；张明远任行署主任，朱其文任副主任；李运昌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楚离任副政委，詹才芳任副司令员，彭寿生任参谋长，李中权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5个地区，按晋察冀的统一序列统称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地委、专署、军分区。

全区25个联合县，深入热河及辽西的8个。

整个根据地东南至渤海，西至平津，北越锦承路到围场、赤峰和辽宁西部，全区10万多平方公里连成一片，有人口599万。主力部队共9个团，达2万多人。

2月

5日 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做出《关于热辽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指出："开辟与恢复热辽，解放东北人民，是冀热辽全党严重任务"，指示十六军分区"向都山东北绥

中、朝阳方向发展”。

月内 刘永生开始在北票发展党员。

3月

月内 为恢复和开辟工作的需要，十六地委决定撤销凌青绥联合县。为加强对辽西、热东、热南工作的领导，决定建立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第十六地分委。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兼地分委书记，张化东任组织部长。行政设锦热办事处，信修任主任。

在地分委的领导下，在原凌青绥建制的基础上，组建3个武工队(即联合县的联制)。凌绥兴(城)武工队由刘云鹤任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信修兼办事处主任；朝(阳)建(平)新(惠)武工队，由周鸣岐任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许明任办事处主任；朝锦(西)义(县)武工队，由华裕民任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田丰任办事处主任。新建抚(宁)青(龙)县，由何济民任县委书记，张仲三任县长。

5月

1日 李运昌在十六地委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开辟与恢复热辽工作问题的结论》的报告。

2日 冀热辽区党委决定，第3次大规模开辟热辽地区，由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地委和军分区组织挺北支队。

中旬 齐英率岭上武工队重返岭上地区。

29日 齐英率武工队捣毁了盆子窑“人圈”和警防所。活捉了部落自卫团长李万仓和10多名警察，缴获长短枪16支。处决了汉奸分子李万仓。

月内 凌绥兴武工队、朝锦义武工队相继出关，进入辽西、热东地区。

6月

月初 朝建新武工队进入辽西地区。

凌绥兴武工队，以绥中葫芦套、永安、塔子沟一带为据点，逐步向兴城境内及建昌大屯一带活动。

朝锦义武工队经绥中到梨树沟门，深入到建昌老沟、大屯进入朝阳六家子一带。其中有一个小组挺进到建平、大城子一带。

朝建新武工队23人经绥中明水塘门进到建昌黑山科，目标是向朝阳县老虎山挺进。在进到玲珑塔野鸡沟宿营时，派韩德发带一名战士到朝阳县石明信沟与“王老凿”取得了联系。由于受到敌人的尾追和节节堵击，进到老虎山的目标没有实现。

12日 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赵子卿(原名赵振河)到朝阳县做地下工作。赵子卿以学生探亲的身份住在胞兄赵振江家。

20日 赵文进领导的挺北第二支队出喜峰口，抵宽城。

22日 曾克林领导的挺北第三支队出义院口，抵绥中明水塘门地区。

27日 挺北第一支队出关向隆化、围场挺进。

28日 挺北第三支队部分队伍进到朝阳境内，攻克了敌人的一些据点。

7月

月初 李惠友率石成山、李明华、张思一行4人，重返承平宁5区喇嘛洞一带进行恢复工作。

12日 朝锦义武工队办事处主任田丰带一个小分队到朝阳县石明信沟与“王老凿”联系，田丰与通讯员郭凤久，趁黑夜找到了“王老凿”的家，因未找到人而未联系上。

队员李连胜黑夜掉队，天明时田丰等同志已走了。李连胜只身进沟会见了“王老凿”。因当时形势紧张，王家给李连胜安排了一个藏身处。

15日 伪吐默特右旗公署警务科长日本人大道义行，率日伪军警800余人大肆讨伐石明信沟，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因沟里人事先都逃进深山去了，日伪军只抓住了4个70多岁的老头。他们惨无人道的砍死了76岁的老人韩守昆，并放火烧了尸。又强迫沟外群众进沟砍树、挖房屋地基，填死水井。

19日 曾克林部在建昌、绥中的和尚房子、大青山一带与日伪军激战，攻占村庄7处。

20日 刘永生在北票已先后4批发展了李少先等25人入党。当日在王顺彬家召开了党员会议，商议组织工人暴动，计划8月17日起事。

21日 日伪军在石明信沟将李连胜搜出。

22日 日伪军在石明信沟烧杀抢掠了8天，直到他们认为，人已无法生存时，才撤回朝阳。把李连胜带回朝阳投入监狱。

月内 曾克林部队及各路武工队相继撤回关内。

8月

"八·一五"前赵子卿已先后发展赵振江等4人为中共党员。

8日 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9日 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10日 朱德总司令发布第1号大反攻命令。

11日 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连发6道命令。其第2号命令的第4条："现驻河北、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 蒋介石也连下3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驻地待命"；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

12日 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会议，研究执行中央2号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以李运昌为首东进工作委员会。由十四、十五、十六3个军分区组成三路挺进总队。军直和十七、十八军分区抽出部分部队组成第2梯队。全区共抽出干部2500人，部队13000余人挺进东北。

△ 刘永生筹备了400元做暴动经费，并拟定了暴动的具体计划。

13 日 苏联红军兵分 4 路进入热河作战。

14 日 晋察冀中央局决定派胡锡奎、工国权、段苏权等人赴热河工作。

15 日 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 东北光复前，在热河境内已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15 个联合县的组织。其中涉及现朝阳地区的有 4 个县，即朝锦义、朝建新、凌兴绥及凌源(一说凌建)县。

后　记

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市史志办与市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共同编辑出版了《朝阳抗战纪实》一书，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曾经使中华民族屈辱的那段惨烈的历史。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14年中，朝阳这片英雄的土地始终燃烧着抗日烽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雄的朝阳人民同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一样，为抵御日寇的野蛮侵略而举旗抗日，奋起抗争。在14年的浴血奋战中，朝阳人民以不畏强暴的拼搏精神、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有效地阻止了日军侵略进程，给侵略者以沉痛的打击。广大爱国志士和抗日英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誓死抗战，以身殉国，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书写了英雄的朝阳抗战史诗。

14年的朝阳抗日战争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阳革命史中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今天对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为了使广大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朝阳的14年抗战史实，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史实为依据，收集整理全市有关部门自上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的朝阳抗日战争史料和其它相关资料(参考书目附后)，把握历史脉搏，突出重要人物和事件，以《热土沦陷篇》、《义勇救亡篇》、《敌后抗战篇》、《血海深仇篇》四个篇章来反映朝阳地区的抗战经过、原东北军和广大义勇军的武装抗日斗争、共产党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历史及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朝阳人民、实施“三光政策”，剿杀抗日武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集中地向

广大读者再现了60年前所发生在朝阳大地的抗战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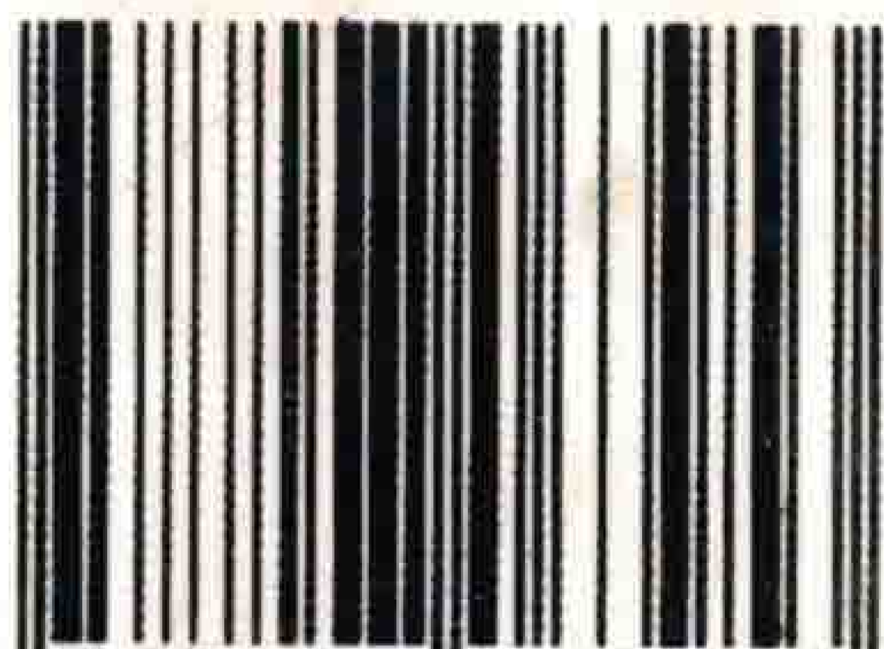
在《朝阳抗战纪实》一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和有关部门、同志的大力支持。市委书记宋勇、市政协主席王振基亲自担任本书的编审，宋勇同志并且为本书作序，明确提出"牢记悲壮历史，矢志振兴朝阳"的要求。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树轩，市政府副市长高炜，市政协副主席陈宏辉等领导同志为本书审定篇目，严格把关。原市委党史办主任秦奎一同志作为本书的顾问，对每篇资料的选取和采用认真核对，确保编辑质量。本书所采用的资料大多属市、县史志部门已编辑出版发行的书籍及相关资料，在编辑过程中根据成书需要进行了综合整理，故不署作者姓名，请谅解。在此，对在《朝阳抗战纪实》一书编辑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财政局、各县(市)区史志办、本书采用资料的原作者及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5年7月

附:《朝阳抗战纪实》参考书目:

1、《喋血抗暴》
2、《敌后烽火》
3、《中共喀左地方史》
4、《北票风云》
5、《中共朝阳地方史》
6、《历史的疤痕——辽宁境内万人坑》
7、《抗暴烽火》
8、《血海深仇》
9、《凌河激浪》
10、《热河革命史稿》
11、《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
12、《朝阳党史人物》
13、《凌源地区日军暴行与民众抗暴录》



ISBN 7-207-06395-4/Ⅰ·848

定 价：30.00元